



Jon Sav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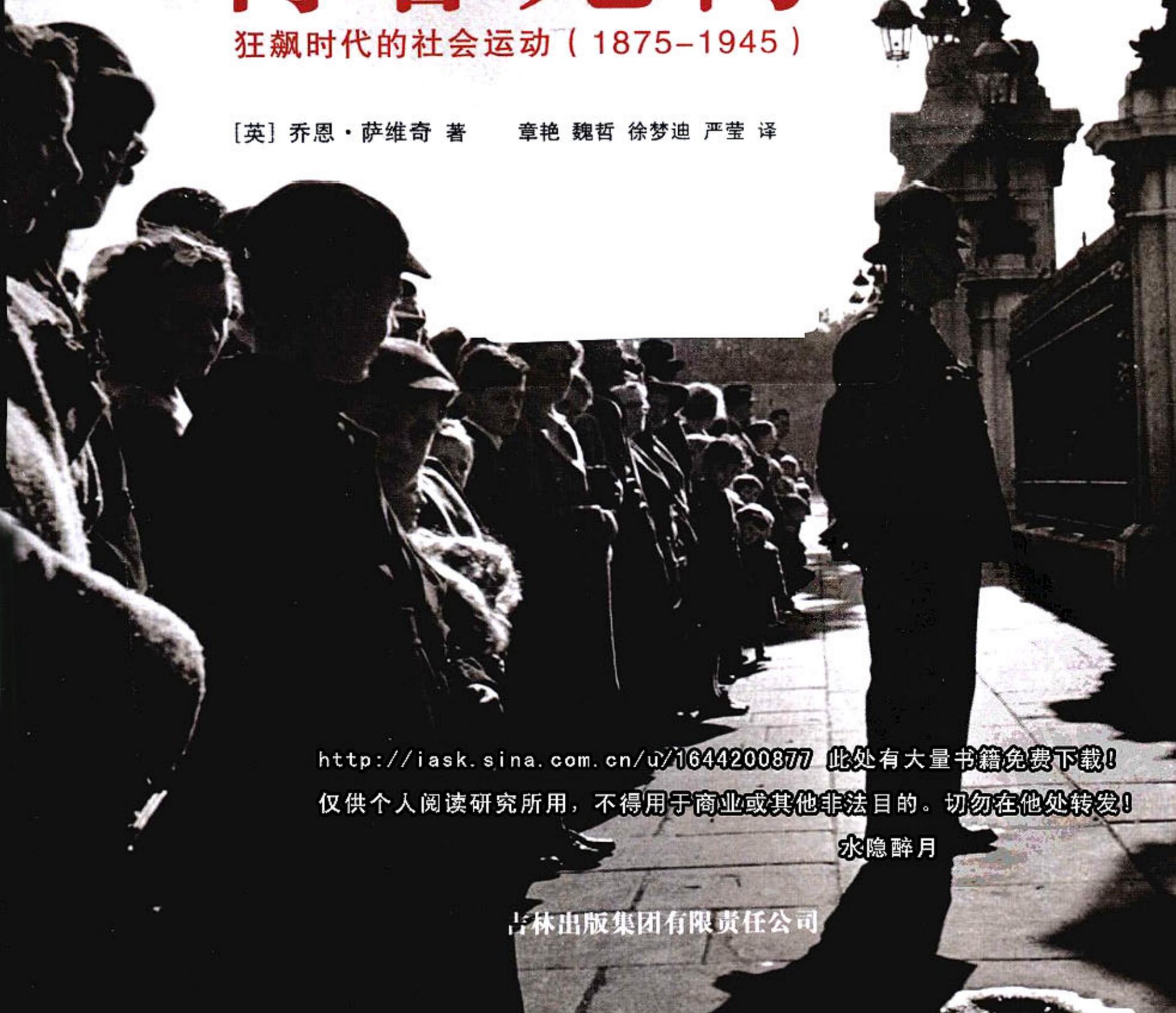
# 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

# 青春无羁

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

[英] 乔恩·萨维奇 著 章艳 魏哲 徐梦迪 严莹 译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此处有大量书籍免费下载!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 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水隐醉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Jon Savage

# 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

# 青春无羁

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

**by Jon Savage**

Copyright © 2007 by Jon Savage

The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ake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Jilin Publishing Group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英)萨维奇著;章艳等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4

书名原文:Teenage: the Creation of Youth: 1875~1945

ISBN 978-7-5463-2624-5

I. ①青... II. ①萨...②章... III. ①文化史—欧洲—1875~1945—青少年读物

②文化史—美国—1875~1945—青少年读物

IV. ①K504-49;K712.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0371号

## 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

责任编辑:武学

版式设计:林涛 秦巍

出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130021)

发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19-A226 邮编:100052)

发行电话:010-63106240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8.625 字数:563千字

版次: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3-2624-5

定价:54.00元

---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 序 言

在人们的想象中,美国曾经是一个年轻人的聚集地。年轻人在美国,而其他人在别处。

——约翰·列农 1940 年出生,1966 年接受采访时说了上述话

这本书的尾声,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980 年 1 月,我开始参与筹备一个有关年轻人群亚文化历史的电视系列节目。那时,我是曼彻斯特格兰纳达电视台的研究员。这家电视公司很快以其节目的创新性和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捕捉而闻名。在我当时的制作人杰夫·莫尔(Geoff Moore)的支持下,我们建议做一个讲述“战后风尚”的节目:“泰迪男孩、披头士、摩登派、摇滚者、嬉皮士、光头党、闪光摇滚男孩、朋克”,以及“无业黑人男孩和拉斯特法里派”。

促使格兰纳达电视台产生这个念头的是迪克·何柏第(Dick Hebdige)1979 年出版的《亚文化:时尚的含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这本书巧妙地填补了学术研究与广大读者之间的差距。《亚文化》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次提出这一课题。何柏第的这本书将社会学、文艺阐释和法国理论融为一体,对英国战后的许多青年风尚进行了简要的历史回顾,同时也留意到了诸如阶级和种族等其他因素。

何柏第引用的例子与我对伦敦朋克事件的观察相吻合。1976 年,在那场迄今为止还未能被冠以名号的伦敦朋克事件中的先锋们,将一些零散的青年风尚草

草拼凑在一起,用安全别针穿成一串,然后自豪地向世人展示。一个60年代的“摩登派”夹克下搭配了一条“阻特套装”(zoot-suit)的裤子和“泰迪男孩”的“超厚底的橡胶底鞋(brothel-creepers)”:一种巨大的厚底的鞋子,与19世纪40年代巴黎流行的“扎祖一族”(Zazous)不尽相同。这样的效果既轰动、迷幻又有危害性。

这些栩栩如生的拼凑物四处传播。它们受到英国国王路一家专营各种化装服饰的店铺的推崇,这家店铺的主人是马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和薇薇恩·韦斯特伍德(Vivienne Westwood)。从1971到1976年,这家店曾多次更名,从最早的“摇滚吧”(Let it Rock,泰迪男孩服饰)到后来的“来去匆匆,英年早逝”(Too Fast To Live, Too Young To Die,摇滚和阻特套装),以及接下来的“性”(Sex,恋物情结服饰)和“叛乱者”(Seditionaries,朋克摇滚设计风格“为英雄所穿”)。每一个时期,深入的研究和对细节的关注都使他们的服装具有鲜明的特征。

但是朋克历史性的拼贴艺术标志着60年代向前的直线运动被环形运动所代替。突然之间,所有流行文化的物质化时代到来了,同时立即走进大众。回想起来,这个过程始于1966年,那时正是现代主义流行的高峰,但它历经10年才成为青年文化鲜活有用的一部分。而在19世纪80年代初,当时最新的青年风尚——新浪漫主义将其进一步发展,这种对过去的剽窃,重申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段漫长却没有详细文献记载的青年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甚至更早的时候。

在之后18个月的进程中,我的制作人和我为格兰纳达电视台可能制作的一个系列纪录片中的一档探索性节目撰写青年文化方面的材料。第一辑一小时长的节目叫做“青少年”(Teenage)。它涵盖了1945至1957年间的英国青年文化:战后严谨朴实生活的转变,有爱德华七世时代特点的人的首次出现——他们后来也被叫做“泰迪男孩”,以及1956到1957年间摇滚乐的影响等。但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探索未能完成,电视系列节目也被取消了。〔1〕

然而我仍保持着对这个题目的兴趣。在之后的大约10年中,我继续收集有关青年文化的所有相关资料——尤其是那些标有“青少年”这个关键词的资料。越往下读,我越觉得在二战之前有一整部被隐藏的历史。在阅读有关青少年“候鸟运动”(Wandervogel)和20世纪20年代美国大学市场的材料时,我意识到这背

〔1〕关于《青少年》取消的一些原因,详见玛丽·哈伦的《年轻之梦永不消逝》(Teen Dream That Won't Fade Away),嘉德公司(Guardian),1982年7月13日。

后有一个被掩盖的故事,与我们普遍认为青少年文化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观点大相径庭。

20世纪90年代初,当我找到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的《青春期》(*Adolescence*)一书时,我的想法更加清晰了。霍尔的前言包括了一个具有预言性质的宣言,因为他写书的时间比战后的青年文化早了半个世纪。在他看来,青少年是人生一个独立的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负担,因此,应予以特别的照顾和关注。他的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观点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明确年龄界限的基础上提出的。这部由两册书组成的鸿篇巨著似乎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但这本书应该是青少年文化的背景。

在20世纪,还有另外两本重要的文献与《青春期》互相印证,它们是L.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的《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和J. M. 巴里(J. M. Barrie)的《彼得·潘》(*Peter Pan*)。这两本书都极具浪漫色彩,又有着不可思议的预见性,并且都在努力说明那些已经盛行却仍没有确切名字的东西。在世纪之交,青少年应被定义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的观点尚未成熟。但这些虚构的作品探索了各种感情的诸多可能,即使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他们也预示了青春——或稍纵即逝,或万古长青。

美国作为新世纪冉冉上升的势力,体现出这一预兆。霍尔明确地把他的国家——“被上帝选中的国家”——和他想要定义的年龄阶段联系起来。他说:“毫无疑问,我们认为我们很年轻,这个信念在将来就像一剂强心针,总有一天我们不仅可以用无与伦比的自由和机会吸引全世界的年轻人,还会进一步发展精神、道德和感情上的教育,在最大限度上,最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为他们下一阶段的人格成长做最好的准备。”

同时,欧洲以浪漫主义者和革命年轻人为典型代表的势力依然很强大。19世纪晚期的西方国家也在经历相似的发展问题,如城市化、工业化、军备重整这些问题导致对青年问题的更加关注。美、英和北欧在19世纪中期就开始了关于青少年违法行为的讨论,这些构成了斯坦利·霍尔引用的众多研究数据的主要部分。

因此,青少年文化的初期阶段并不只局限于美国,也应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我原先把意大利和俄国的资料也加了进来——包括讲述19世纪30年代流浪青年(*bensprizorni*)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但受篇幅限制不得不删去。最初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促使我在20世纪中叶做出停下这本书的决定。但是,越进行

下去,我越发觉得,我的研究必须继续下去,至少应该讨论到“青少年”这个词的应运而生,以及让人们改变了对未来看法的原子弹爆炸。

因此,这本书讲述了欧美两个大洲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试图定义、说明和控制青春期的历史。除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之间的对话外,这本书中还包含了其他一些内容,如青春期阶段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剑拔弩张,以及为提升或捕捉这些转瞬即逝的状态所做的种种尝试。个人证词——在青春期以日记的形式试图寻找自己和世界的意义,同媒体报道和政府政策一起出现在书中。这种把青少年当作一个以年龄段为单位的独立群体的观点,和以往把他们当作一个经济和社会群体的事实完全不同。社会学家、犯罪学家和心理学家为了使青少年正常化做出了各种努力,他们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人都要经历的阶段,并不只属于特殊的群体。这些青少年代表了一个时代,并正走向即将到来的未来。

总的来说,社会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加深了青少年对自身重要性的认识。当20世纪大步向前时,青少年越来越频繁地发出真实的声音,并逐渐摆脱成年人的控制,这真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在另一层面,这本书包括了青少年如何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故事,虽然他们还是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但这些条件都是他们能够认可和接受的。“青少年”能够成功地成为一个普遍使用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微妙的平衡。

\* \* \*

尽管我并没有亲身经历本书所涵盖的时代,但在材料选择方面却包含着一些潜在的自传成分。我生于1953年9月,接近第一个战后生育高峰的结束。我父亲在二战中表现出色,关于这点我很少听他提起过。我母亲青春期的早期就在二战那六年中度过,她后来对国际旅行的爱好可以说明她希望摆脱那个充满限制和束缚的时代。

我在伦敦西部的近郊长大,那里的环境几乎是为了那些经历了多年苦难和恐惧后希望重新开始的人们存在的。年少时我不喜欢郊区,后来才渐渐意识到搬到那里是经历过战争的一代人最合理最自然的选择。那些中心城区因为战争而遭受严重的损毁,伦敦市中心的爆炸点一直保存到80年代中期,但郊区却非常安全,令人感到安慰,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我度过人生头13年的理想之地。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试图消除另一代人的经历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存

在潜在的危險。经历了60年代到70年代充满风波和压力的青少年时期后，我渐渐认识到我这一代人的部分任务是帮助我们的父母修复战争造成的伤害。对那段时间持续的恐惧以及氢弹爆炸所引发的对生存问题的思考，都是当时青少年文化的一些极端表现，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很久之后，我能够和我父亲谈论他三、四十年代的青春时期，这有助于我理解他的经历。我也幸运地能与生于1904年的外公有很亲密的关系。他关于二、三十年代生活的故事让我浮想联翩，而他对爵士乐和美国流行音乐的喜爱也引发并解释了我自己对音乐的痴迷，他在1920年曾去看过“原创狄克西兰爵士乐队”（The 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的演出。

因此，我的家庭经历帮助我掌握了20世纪头50年的情况。同时，我试图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材料，并且希望不要遗漏主要的运动或者表现。如果有任何的省略，那将纯粹是我的责任。但是，请记住我是想写一部关于流行文化的书而不是长篇累牍的学术专著。

还有最后一点。也许有人会说，我过分关注特殊事例而不是普遍现象，追求极端而牺牲了常规。对此，我必须辩驳。对这些特殊青少年的关注是为了有别于学者、青少年专家和政府对青少年的标准化，有别于时代的主流青年。例如，少数对抗希特勒的德国青年和同时代成千上万加入纳粹国家组织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的青少年就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书中有特殊和普通青少年之间的对比。然而，如果我必须做出选择，我永远会选择从普通中找到特殊，这是由我的性格和作品的主题所决定的。《青春期》的首版也有相同问题，在1905年的书评中，J. M. 格林伍德（J. M. Greenwood）批评斯坦利·霍尔把“人们称为民族异类”的人排在重要位置，而没有对占人类主体的普通人给予足够的重视。

这个批评是合理的，但我认为它并没有说到点上。青少年由于自身的特质，一直被认为能代表未来：大众媒体持续不断地将青少年塑造成为天才或怪兽，这说明了成年人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充满希望和恐惧。为了循规蹈矩者而忽视那些站出来的先锋就是拒绝参与到未来当中，也是误解了青春的本性。像G. 斯坦利·霍尔一样，我非常自豪，对这个主题我抱着浪漫的态度，因为我希望能有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 目 录

序言 /1

## 第一部分 1875—1904

- 1 天堂和地狱 马丽·巴什基尔森和杰西·波默罗伊 /3
- 2 民族主义者和颓废派艺术家 欧洲反革命 /15
- 3 流氓和阿帕切 青少年犯罪和大众传媒 /31
- 4 “忽见天堂” L.弗兰克·鲍姆和《绿野仙踪》 /46
- 5 美国世纪 G.斯坦利·霍尔和青春期 /59

## 第二部分 1904—1913

- 6 彼得·潘和童子军 大不列颠帝国青年 /71
- 7 中学新生和工人来源 美国青少年和工业 /85
- 8 候鸟运动和新异教主义 欧洲的回归自然运动 /95
- 9 五分钱影院和动物舞蹈 美国的梦幻经济 /107

### 第三部分 1912—1919

- 10 祈祷 欧洲的代沟 /123
- 11 牺牲 战亡者以及新与旧的对抗 /132
- 12 1902年生人 少年犯罪和一战 /148
- 13 爵士乐队和美国大兵 美国青年进入欧洲 /159

### 第四部分 1919—1929

- 14 战后的震荡 法西斯、德国联盟和“森林生活知识团” /171
- 15 酋长和希巴 美国的青年市场 /187
- 16 灰姑娘情结 美国大众文化的问题所在 /207
- 17 追求享乐 “光明的年轻人” /224

### 第五部分 1930—1939

- 18 纳粹思想指引下的士兵 希特勒青年团 /245
- 19 儿童军团和新政 经济萧条中的美国青年 /266
- 20 “少年英雄”和红色威胁 美国青年的极化 /285
- 21 吉特巴舞及其舞迷 美国的摇摆乐和青年的消费主义 /304

### 第六部分 1939—1943

- 22 征服者与统治者 战争时期的希特勒青年 /325
- 23 无奈的应征兵和社会主义英雄 战争中的美国青年 /334

- 24 社交界新人和美国兵 学校和军队中的美国青年 /348
- 25 德国的摇摆青年和法国扎祖一族 纳粹欧洲的摇摆乐 /362
- 26 阻特装青年和“胜利女孩” 动荡的美国 1943 /377

## 第七部分 1943—1945

- 27 和平入侵者 美国士兵和英国青年 /397
- 28 赫尔姆斯·休博内、白玫瑰组织和安妮·弗兰克 纳粹欧洲的抵抗运动  
/408
- 29 青少年时代的到来 《17岁》创刊 /426
- 30 元年 胜利的青少年 /438

谢辞 /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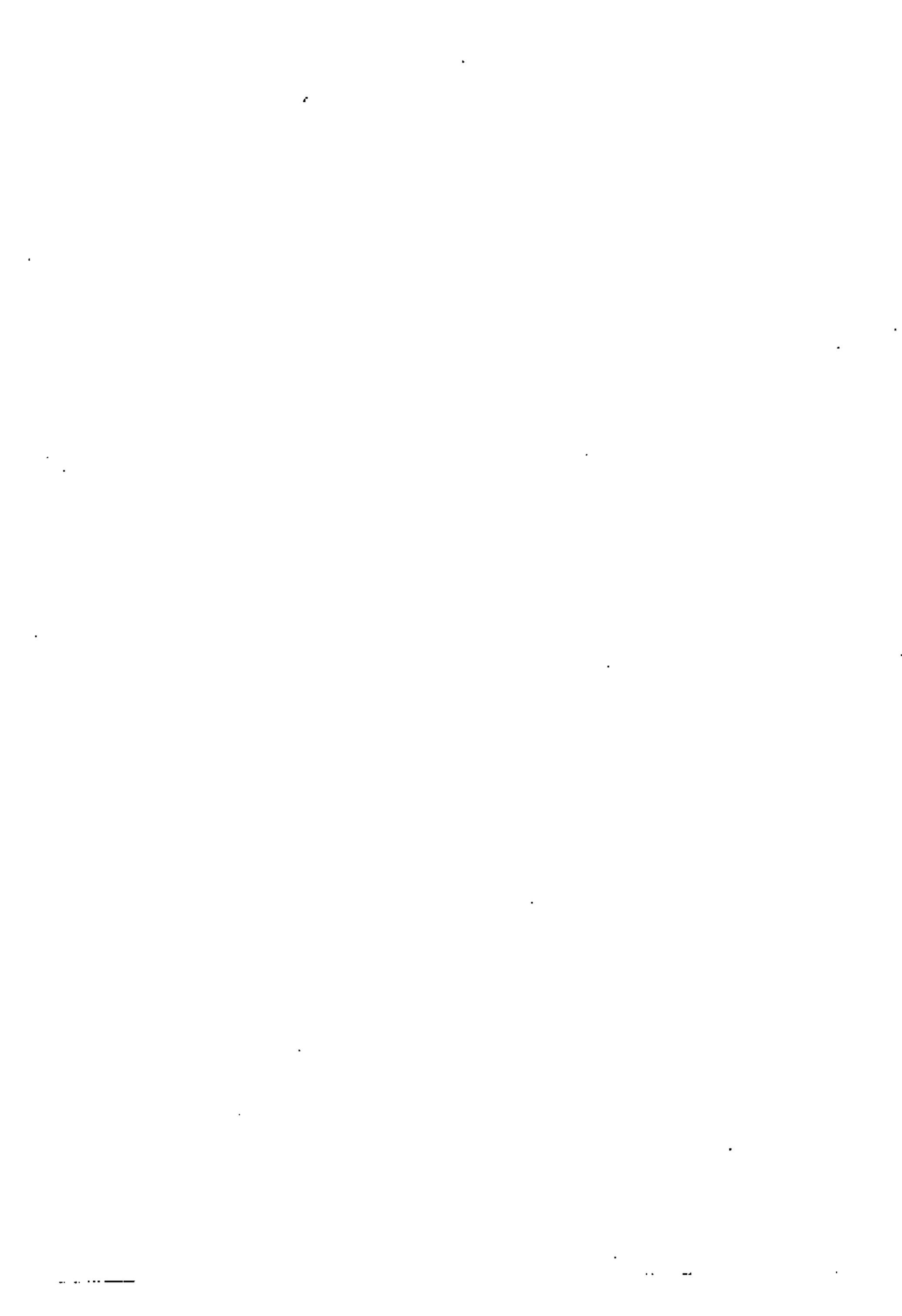
注释 /455

译名对照表 /546

译后记 /605

第一部分

1875—1904



# 1

## 天堂和地狱

玛丽·巴什基尔森和杰西·波默罗伊

男人不能总是像个孩子。在命中注定的某一刻,他会离开童年。这一刻虽如此短暂,却意义深远。就像呼啸的浪潮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不断上涨的热情同样预示着什么。压抑已久的兴奋警告我们危险即将来临。

——让-雅克·卢梭:《爱弥尔》,第四册(1762)



玛丽·巴什基尔森 (Marie Bashkirtseff)  
1870s



西·波默罗伊 (Jesse Pomeroy), 1874

“我飞起来了。我高高地飞离地面，手持一把小竖琴，却连一个音符都弹不出来，因为琴弦不停地断开。我还在上升，看到无际的地平线，大朵的云彩：蓝色、黄色、红色、彩色、金色和银色，奇异地交织在一起。之后，万物发出灰色耀眼的光芒。我仍然在上升，高度已让人晕眩，我却毫不畏惧。云层此时变得苍白、灰暗，但仍发着光——仿若一块块石墨。突然之间，天昏地暗，我依然紧握那把琴弦已松的小竖琴。在我脚下，远远挂着的是一个淡红色的星球——地球。”

1875年11月27日星期一的凌晨，玛丽·巴什基尔森从梦中醒来。这个17岁的女孩因为头天晚上喝了太多红酒而无法入睡。现在她打算用忏悔的方式来释放此时此刻紊乱的思绪。“现在是凌晨两点，”她开始写道，“我把自己锁在房里，身穿长长的白色睡袍、赤脚、头发蓬松，像一个圣洁的殉道者，我沉浸在思考之中。”

玛丽并非向她信奉的天主教神父进行忏悔，而是她的笔记本，她的私人庇护所：“这本日记承载了我全部的人生，写日记是我最安宁的时刻。也只有写日记时，我才得到片刻平静。烧毁一切、发怒、喊叫、承受磨难、活着，活着！为什么他们让我活着？噢！我已经厌倦了这样活着。我的辉煌即将到来。我相信自己会成功。但是我被告知这一刻永远不会来临，我将穷尽一生等待，等待！”

日记不仅仅是一种发泄情感的方式，它更可以长存于世间。玛丽期待着万众瞩目。“如果我早早地死去”，玛丽在那一晚写道，“我将烧掉这本日记；但是如果我长寿，人们会读到它。我相信，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迄今为止从未有过关于一个女人的生活及其全部思想的记录。是的，全部的生命，全部的想法。那将会非常有趣。如果我不久便匆匆辞世，来不及烧了它，人们便会评论说，‘可怜的孩子，她深爱奥蒂弗雷德，绝望也因此相伴而生。’”

在这混乱的一年的年底，玛丽心绪难平。回到第二故乡尼斯，她也曾经像许多女学生一样迷恋遥不可及的哈密尔顿公爵(Duke of Hamilton)，但玛丽的心很快转向了24岁的艾米尔·奥蒂弗雷德(Emile Audiffret)。接下来的数月中，她沉

迷于记录这段初恋。12月26号,奥蒂弗雷德取消了一次约会,这是严重的怠慢行为。在这之间,玛丽的妈妈曾向他发出了邀请,家长的干预激怒了这位暴躁的女儿。

1875年的秋天,玛丽17岁了,这又一次刺激了她。玛丽写道:“我厌倦了默默无闻,在这阴郁中我快要发霉了。阳光,阳光,阳光!让我们出发——鼓足勇气。这段日子只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我是疯了?还是愚昧?无论如何,我受够了!”玛丽总是厌倦:厌倦母亲的迟钝,厌倦家庭节日的沉闷,厌倦世界的乏味。对于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少女来说,生命总是如此缓慢。

作为一个富有的俄国移民家庭最受宠爱的女儿,玛丽被惯出了一身坏脾气。她的服饰都是根据她的奢华设计在巴黎手工定制而成的。她随家人游历欧洲,结交社会名流。在尼斯天使大道上的巴什基尔宅邸里,她有一个套房。房间里有一个密室用作卧房,墙壁覆盖着蓝色绸缎,屋顶垂下塞夫勒吊灯,酷似“住在一个密封箱里”。

虽然极受宠爱,玛丽被赋予了特殊的命运。在她还小的时候,一个算命的人告诉她的母亲她将会成为一个明星。从此以后,玛丽便是那个“最漂亮的、最出色的、最重要的”孩子。她所有的怪念头都会得到鼓励,她有着那个时代与她年龄相仿的女孩子没有的自信。当她开始用日记记录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时,她一点也不怀疑它对后世的冲击力:它无疑将是一本“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书”。

最初,她主要专注于记录自己的外表:头一天还自我感觉良好,第二天就变得“丑到鬼见愁”。她会觉得自己就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sup>[1]</sup>:“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副好身材,平肩,丰胸,翘臀,小脚。不出5分钟,我就会变成一个丑八怪,衰老憔悴,胸部下垂,肩部高低不平,不堪入目。我的脚变得又扁又长,我的眼眶凹陷,牙齿黑黄。”

但是,对身体不自信只是她自身问题的冰山一角。进入社会后玛丽发现她的家族声誉不佳。她的叔叔和弟弟保罗常常触犯法律,父母分居,姨妈因为一个多年没有结果的案件被跟踪。人们也不信任玛丽,这要归结于她热情奔放、异乎寻

---

[1]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是小说中那个疯狂科学家的名字,他用许多碎尸块拼接成一个“人”,并用闪电将其激活。“弗兰肯斯坦”一词后来用以指代“顽固的人”或“人形怪物”。——译者注

常的时尚品位：一条拖着鸵鸟羽毛尾巴的溜冰裙对于尼斯这样的小镇来说，似乎有点太超前了。

巴什基尔森家族因为丑闻而无法融入当地社会。玛丽敏感地察觉到旁人的轻蔑：“我有污点的姓氏几乎要了我的命。”在家族受到俄国移民同胞托尔斯泰的陷害时，她写道，“我哭得像动物，沮丧、羞辱。”14岁时，玛丽的强大欲望中又加进了复仇的成分：“我一定要被社会容纳，因为没有·一个名人出身贱民或来自贫民窟”，她在1873年3月声称，“我梦想着成名。”

受到了算命师预言的激励，更饱受来自狭隘的尼斯小镇的冷落，玛丽将全部的怨恨与愤怒倾诉给日记，她基本上每天都要向日记彻底坦白她自己和家庭的全部事情，好像因此就可以与周围所有错误划清界限，她认为“谎言和伪装”都毫无意义。这点在她的日记上表露无遗：她喜怒无常、与保罗之间的兄妹争斗、第一次尝试酒精和烟草、拒绝承认成人世界和他们的制度，以及对自己外貌的痴迷。

在19世纪70年代，这样的年轻女性是不受欢迎的。正如为玛丽写传记的作家多玛·克莱斯通(Dorner Creston)后来评述的，在这样一个时代“几乎整个中上层阶级，尤其是妇女，都染上了一种畸形的虔诚感。玛丽故意和当时“自我克制、顺从、顾家”的妇女典范形象对着干。她轻蔑地评论道：“男人们真会享受。女人都是牺牲品。我倒想当回男人，绝对比那些所谓绅士强许多倍。”

1875年的夏天，已经被不安和愤怒灼烧的玛丽，遭受了致命一击。“我胸口很痛，”她在7月份透露，“我以为自己得了肺结核。这种痛让我非常担心，最近5天来我开始咳血。真是太可怕了。”虽然她对自己的诊断直到7年后才得到证实，但是那年春天她说的一句戏言——“死神是我的近亲”，现在几乎成真，依然使她深受震撼。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得珍贵了。

1875年11月，玛丽梦到了一次太空飞行，这唤起了她无限的遐想。浪漫主义作家认为这种遐想能力只属于青春期少年。16岁的卢梭(Rousseau)曾经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得到一切”，为此他离家出走。正如他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中回忆道：“我别无选择，唯有发动自己，向前，翻越，飞越天空，满载着功成名就带来的安全感，我进入了这个大千世界。”

然而，高度戒备没能使玛丽察觉来自她潜意识的危险信号：琴弦已松，阴云笼罩。她的一生就摆在面前，但是伴随着她这种失重的是残酷的现实。诚然，她希望破除阶级、性别、家庭、甚至肉体的束缚，她明白生命正在“飞速”流逝。梦境在

一个揪心的悬念处打住：玛丽最终会像古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那样坠落，还是会抱着重新修复的琴弦继续飞下去？

\* \* \*

正当玛丽与病魔作斗争时，另一个青年人也在热衷于写自己的自传。同玛丽一样，杰西·波默罗伊也面临生死挑战，不过他是咎由自取。1875年夏，他因为在前一年12月份的一起谋杀案中罪名成立，被囚禁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萨福克县监狱(Suffolk County Jail in the American state of Massachusetts)。虽然他只有15岁，比玛丽差不多小了整整一岁，他却面临着死刑。

波默罗伊成名了，更确切地说是负面名声：恶名昭著。1874年他因谋杀贺拉斯·H·米伦(Horace H. Millen)被捕，波默罗伊的名字立刻成为极度堕落的代名词。受害者仅4岁，在南波士顿海岸线的一片沼泽中被发现，尸体已经严重损毁。波默罗伊多次用刀捅向他的胸部，刺穿他的眼球。在试图割断贺拉斯的喉咙时，波默罗伊几乎把他的头都割掉了，最后还试图将他阉割。他当之无愧是全美尽人皆知的“魔鬼男孩”。

波默罗伊众多残忍无比的绑架残杀案件一经披露，顿时引起一片恐慌。这10名受害者中，除一名之外，其余均为4到8岁的男童，他们都遭受了一系列可怕的羞辱殴打和利器刺伤。在其中一个案例里，受害人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被砍伤脸部、背部以及大腿，这些伤口上都被洒上盐水。1874年7月，波默罗伊的第一个牺牲品凯蒂·柯伦(Katie Curran)的尸体被发现。如果不是已经进了监狱，这个魔鬼男孩可能早就被人撕成碎片了。

虽然早在1874年11月波默罗伊已被判处死刑，但他却得到了缓刑处理。如此年少却如此残暴，这些引起了一场全国范围关于死刑的激烈争论。<sup>〔2〕</sup>虽然陪审团针对波默罗伊的案子提出了用终身监禁代替死刑，但是新闻社论和数以百计的请愿书表达了大多数人的观点，那就是波默罗伊应被处以绞刑。

1875年7月2日，州长执行委员会宣布判处波默罗伊死刑：横在他与绞刑架之间的只有断头台了。生死未卜的波默罗伊被单独囚禁着，没有塞夫勒枝形吊灯、天蓝的缎子墙面和床脚雕刻了狮子形状的贝壳形大床，波默罗伊拥有的只是

---

〔2〕 美国之前处决的最年轻的犯人是在19世纪30年代，年仅18岁。

一张小铁床、一把木椅和两只污水桶。极度的孤独加上随时可能到来的死刑促使他产生了为自己辩解的念头。

那个夏天,他有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来自《波士顿时报》(*Boston Times*)。他们出版了这个“道德怪物”的“自传”两部曲。波默罗伊非但不承认那些不可饶恕的罪行,他还巧妙地回避了整个事件。在结尾处他写道:“我有理由认为,如果我犯下如此罪行,那一定是因为我疯了,或者是出于迫不得已。尽管如此,我仍坚信我没有做过这些事。”在文章中他辱骂出庭证人和陪审团,并称陪审团为“十二个蠢货”。

然而波默罗伊在狱中写的一系列信件揭露了他的真相。1875年6月,14岁的男孩威利·巴克斯特(*Willie Baxter*)因盗窃入狱。他发现那个臭名昭著的杀人犯就在隔壁。尽管犯人之间严禁联系,这两个年轻人却一直在设法保持通信直到巴克斯特被判刑。与人接触让波默罗伊非常高兴:“让我们尽情写信来消磨狱中的时光,但是要警惕。”

波默罗伊沉醉于自己的名声中:“告诉我所有你听说的关于我的事情,尤其是坏事情,不要担心,我决不会生气。”他还承认了他在法庭上否认的那些谋杀罪行:“那个女孩一天早晨来店里买纸,天啊,威利,你不知道我有多讨厌那女孩,还有那个男孩。我记不得我对他说了什么,总之你知道我杀了他。我真替他难过,但是相信我,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使得波默罗伊声名狼藉的还有一个原因,在美国的“镀金时代”,人们根本无法解释这种不可抵挡的冲动。除了不可解释外,他还不愿意承认自己做了这些事,除了冲动他再也不能找到更合适的借口。“一些东西驱使着我。”他能做的只是描述这种像是坐电椅般的痛苦,从头这边横穿到那边,这种感觉导致了他的攻击行为。

作为一种新恐怖类型,波默罗伊的形象深深地震撼了美国人的心。没有任何现行法律可以界定他的冷酷和残忍,尽管整个19世纪人们一直在讨论和定义青少年犯罪。19世纪的头10年有了“少年犯”这个词,第一个定义“少年犯”的法律条文于1924年在纽约市通过。根据普通法对儿童和成人的划分,少年犯指的是21岁以下的人群。

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大西洋两岸的英美两国形成了一个青少年犯罪的资料库。1835年,玛丽·卡彭特(*Mary Carpenter*)出版了《少年犯:社会状况和处理方

式》(*Juvenile Delinquents: Their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这本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书中建议, 那些 10-20 岁却仍被视做孩子的少年“儿童”, 应该与 20 出头麻木冷酷的成年罪犯区别对待。一方面是犯罪行为的恶化, 一方面是对儿童减免罪责, 这使得法律对青少年年龄的界定降低标准, 有些案件中降到了 16 岁。

在现行法律定义中, 波默罗伊仍旧是儿童, 他犯罪时年仅 14 岁, 但他却面临着成人的判决。虽然根据他的年龄他应该被减免罪责, 但出现在权威人士和公众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完全明白自己做了什么, 而且具有区分善恶的能力。事实上, 在整个警察审讯和法庭盘问过程中, 他言谈举止非常镇静, 这只能说明他的顽固冷酷以及早熟。

在波默罗伊令人震惊的犯罪事实和现行少年犯概念之间, 存在很大争议。人们用当时很流行的颅相学来解释这个少年杀手杀人动机之谜, 其结论被广为接受。〔3〕颅相学主张, 罪犯都有返回到人类发展初始阶段的现象, 返祖现象在生理上表现为不规则的头骨、外貌损伤和其他畸形特征。

虽然波默罗伊的身高正常, 但是相比于身体, 他的头部却显著过大, 同时右眼覆盖着一层乳白色的薄膜。曾有一名记者说: “只消看他的脸一眼, 你就能想象他会犯下使他日后被囚禁的害人行径。”他的双眼“阴郁、如野兽般邪恶”, 眼神中“毫无同情与怜悯”。“肤色苍白”、“思想卑劣复杂”的他是证明基因倒退的最佳教课书。

另一种可能解释波默罗伊杀人动机之谜的是他对低俗小说的狂热, 那些讲述冒险故事的廉价平装书在美国青年人中风靡一时。像《莫霍克的护林员》(*Rangers of the Mohawk*)和《珍妮的遭遇: 骚动的女英雄》(*the Heroine of Whoop - Up*)这样的书, 事无巨细地描述了发生于印第安人和美国拓荒者之间那场血淋淋的战争。波默罗伊对印第安人的活动非常着迷, 他在白人叛变者西蒙·葛蒂(Simon Girty)身上找到了认同感, 并从折磨和谋杀的描写中汲取灵感。

这条调查线索引出了一场这个年轻囚犯和著名出版商詹姆斯·T·菲尔德(James T. Fields)之间的对话。当被问到他的杀人冲动是否来自那些低俗小说时, 波默罗伊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血腥的画面、战俘、剥头皮”。可是他仍旧避开

---

〔3〕 第一个针对此主题的权威性的著作发表于 1876 年, 切萨尔·隆布罗索(Cesar Lombroso)《犯罪论者》(*L'uomo delinquente*)。

承认这会影他的行为：“我反复思索，而现在看来它们对我确有影响，当然或许如果我再仔细想想，我觉得还是其他什么事。”“是什么事？”“嗯，先生，我说不好。”

波默罗伊的杀人动机如同一个谜一般呈现给法庭，它将决定这个谋杀案的最终审判。证实他精神不健全是唯一可以免除死刑的途径。他的律师叫来两位“精神病专家”作为证人。约翰·E. 泰勒医生(Dr. John E. Tyler)认为被告患有强迫性的“精神紊乱症”因而“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克莱蒙特·沃克(clement walker)医生更进一步将杀人犯的“缺乏控制”归咎于某种不明确的癫痫。

然而这些精神科学家们具有开创性的新证词对公众毫无影响力。就公众而言，杰西·波默罗伊的罪行是“可怕的偏执”的后果。对大多数人来讲，杰西·波默罗伊是“一个年轻的魔鬼”或者是只“疯狗”，应该从速处死。《美国法律评论》(*American Law Review*)做出一个比喻性的说明：“如果这个男孩冲动的行为可以被控制，没有任何理由去挽救他的生命。如果他的行为不能被控制，他与狼又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他有人类的智慧，而这使他更加危险。”

这也正好符合美国人认为这个年轻杀手是一种低等人类的想法。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想到一种推断，而这种推断很可能给社会带来更广泛的启示：城市贫民区造就了波默罗伊。随着移民的加速增长和城市的盲目扩张，恶劣的环境使年轻一代不得不自食其力。这些孩子得不到教育，只能沦为童工，他们的青春期往往是开始为生存而挣扎的标志。

在那个世纪的中叶，改革先驱查尔斯·罗林·布雷斯(Charles Loring Brace)评论道，“大量的男孩和女孩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无所事事，在他们中不断滋生着罪犯、妓女和无赖。”贫民窟的孩子往往以魔鬼般的形象出现在报道中，这让人们注意到犯罪组织迅猛的增长。1873年的一期《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称那些无法无天的青年是“浑浑噩噩的、懒惰的、一无是处的流氓”。

波默罗伊在波士顿的贫民区切尔西长大，父亲酒后暴力给父母的婚姻刻下了深深的烙印。1872年父亲被赶出家门，也就是这期间波默罗伊第一次犯罪。在母亲为付账单而忙于工作时，杰西整天流浪街头。他混浊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很怪异，往往成为被欺负的目标。他对自己长相的不自信从他给威利·巴克斯特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问道：“你怎么看我？我看起来坏吗？我的头是不是很大？”

不过，正是父亲的毒打给他留下了最深的疤痕。他在狱中的一封信里就透露

出了对“鞭刑”的着迷。他对巴克斯特说：“跟你讲讲我受到的最重的一次鞭打。我因为逃学还有偷我妈的钱被我爸拖进柴房，他扯掉我的夹克背心和两件衬衫，让我光着背。他拿了条鞭子对我一顿痛抽。那次真是疼啊，每次想起来我都好像又被抽了一顿。”

这些埋藏了一个多世纪的信件，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杰西给“镀金时代”出的难题。他似乎只是学大人样子学得太像了，以至于他丧失了人性，结果被抽象成了恶魔的符号。当时盛行的“男孩文学”，正如赫罗西·阿尔杰(Horatio Alger)的《衣衫褴褛的迪克》(*Ragged Dick*)和托马斯·贝雷·奥尔德里奇(Thomas Bailey Aldrich)的《顽童故事》(*The Story of a Bad Boy*)中所描述的男孩往往是一副淘气又不失可爱的样子。与之完全不同的是，波默罗伊像一阵恐怖的阴风：一个直接从试验室逃出来的弗兰克斯坦似的怪物。

波默罗伊就像玛丽·雪莱(Mary Shelley)创造的那个怪物一样，他是不可能被许可再次返回这个社会的。他预言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说我必须死，我就死定了。如果他们将我终身监禁，也是置我于死地。”在他的知己威利于1875年夏离开萨福克县监狱后，这个少年谋杀犯又不安地等待了一年才收到将死刑改为终身隔离监禁的判决。虽然他从来都不甘心被囚禁，但是在接下来的四十一年中他再也不能与任何人接触。

\* \* \*

1887年间，正当杰西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试图越狱时，玛丽·巴什基尔森的日记出版了。从1875年开始，她的一些愿望得以实现。18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狭隘愚昧的尼斯小镇，去巴黎学习艺术。尽管她一直坚持治疗，肺炎还是无情地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她拼命画画，仿佛她的来世就在这些画中了。在沙龙画展上，她的贫民窟孩子们的肖像画《会面》(*Un meeting*)得到了认可。

玛丽最终死于1884年的4月，时年25岁。那年初，玛丽为自己希望能够流传百世的作品写了一篇序言：“我希望我的日记能够出版。它一定会使人感兴趣。我希望它被人阅读，这一期待是否破坏了或者毁灭了它的价值？完全没有。我长期写作，没有想过让别人读它。而现在，我希望人们从日记中读懂我，认为我是个真诚的人。如果出现半点含糊其辞、情节失真，那么这本书就完全没有存在的理由。”

正因为其坦诚的特点，这本日记在法国第一次发行时就成了畅销书。为了能

够彻底表现出她年轻时的心情,玛丽·巴什基尔森表露出一一种不被当时文化和媒体认同的感受。人们把她的书拿来和卢梭的《忏悔录》比较,但是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的差异:玛丽从女性的视角写作,她记录下当时的感受和经历,而不是在晚年回忆那些事情。

这本日记史无前例地对青春期的内心进行了描述,影响了整个欧洲大陆、美国和英国。许多杂志,诸如《女性世界》(*Woman's World*)、《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都有关于她的文章。在《十九世纪》中,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称她为“一个真正的天才,在某个国家一代人当中只能出现一两个的怪才”。玛丽最终获得了她梦寐以求的声誉,成为“思想解放者”。

可是,就像她预见的那样,这种成功总是相伴着讽刺。这本日记是她用死亡签下的“浮士德契约”(Faustian pact)[4];正是因为预见到自己的生命短暂,她的作品才具有特别的力量。但是由于其作品内容私密、反对传统,所以只能在她死后发行。致命的诊断加剧了她与生俱来的紧张情绪,也正是这种紧张气氛吸引了年轻读者。玛丽代表了一种以早逝加速生命历程的浪漫主义思想。

\* \* \*

玛丽·巴什基尔森和杰西·波默罗伊的共同点不仅仅是他们处于同一时代。他们用自己不同的方式,迫使各自所处的社会认识到现存对待儿童和成人的惯例已经过时了。青春期的生理变化依旧始于十二三岁,而结束于十八九岁。然而这位“真正的天才”和“魔鬼男孩”都证明,认为成年期紧随童年期是不够的:他俩作为先驱代表了一个还未命名的中间状态。

这个中间状态的到来并不是悄无声息的。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已经关注到这个话题。事实上,玛丽和杰西不过是卢梭早在100多年前就预示的“关键时期”的缩写。在《爱弥儿》(*Emile*)(其中一册在1762年一经出版便因为内容太过分就被焚毁)中卢梭认为,青春期对人的情感和精神产生的影响之大不亚于“一次重生”。青春期的症状集中体现在“脾气改变、易怒、总是心血来潮”。

10年后,歌德(*Goethe*)在“飚狂运动”(Sturm und Drang)中的经典之作《少年

---

[4] 靡非斯特今生愿做浮士德的仆人,为他解愁除闷,寻欢作乐,获得一切需要;但当浮士德表示满足的一瞬间奴役便解除,浮士德就属恶魔所有,来生便做恶魔的仆人。浮士德根本不相信“来生”,便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场赌博,立下了契约。——译者注

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发展了卢梭的观点。他描述了一个有天赋但是有自杀倾向的青年的情感崩溃。小说里维特的信件中展示的青春期病症,许多也出现在100年后的玛丽身上:情绪极度不稳定、对社会轻视的敏感以及自怨自艾。“除了坟墓我看不到痛苦的尽头。”虽然维特有在自己周围“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神圣天赋”,他与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

歌德1774年的小说在世界范围的成功说明人们对于青春抱有一种浪漫主义观点,在他们眼里,青春就意味着风暴和压力的困扰,这种困扰如此强烈,他们的英年早逝——自杀或者意外——就可以说明问题。这个趋势在英国浪漫主义作品中达到顶峰,代表人物托马斯·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既是一位年轻诗人,又是一个造假者。在他17岁服砒霜自杀后,雪莱(Shelley)、华兹华斯(Wordsworth)、柯勒律治(Coleridge)和济慈(Keats)都在一系列的诗作中悼念他,称他为被误读的天才,他的青春因死亡而永恒,永远不会消失。

18世纪末,经济和政治的骚动改变了西方社会对青年概念的理解。工业革命发起了一场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迁徙,开辟了一个建立在唯物主义、消费主义、大规模生产基础上的新社会。在拥挤陌生的城市里,工作、邻里和家庭的传统结构被打破。青年和孩童承受着革命带来的冲击,做着危险而单调的工作,或是游荡于肮脏的郊外,出现在亨利·马修(Henry Mayhew)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中。

同时,宣告真正民主的新政府出现了。美国的十三个州在武力推翻了英国国王的“专政”之后,于1776年7月4日发表了《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欧洲陈腐的封建主义相比,年轻的美洲大陆向所有人敞开了大门。

1789年8月,革命的法国议会颁布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里面重申了这些民主思想。《人权宣言》明显基于美国的蓝本,它声明“人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4年后国家议会补充了其他十八条附录。第二十八条声明“任何一代人不得迫使其后代隶属于他”。在一场由年轻人主宰的大革命中,其意义再清楚不过了:代沟产生了。

这些事件的影响贯穿整个19世纪。在新生而激进的平等政策的支持下,年轻人一方面代表了希望和未来,另一方面也是不稳定的危险分子。一个极端的例

子就是年轻人参与了各种革命运动,比如人民宪章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效仿俄国的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代人的觉醒转变成了激进的意识形态,可能威胁到社会秩序。

同时,青年希望即使不能实行民主也要实行大众共享。整个大众时代的开端在19世纪的后半叶,它使人们认识到在这个新的社会秩序中任何阶层都不应被忽视。长期被忽视的阶层,如城市里受雇的穷人和青年人得到了新的关注。迅速成长的大众传媒加速了关注的进程。19世纪70年代,年轻人可以买到针对自己年龄的书籍或产品,例如低俗小说或者男孩文学。

大城市也提供了许多机遇。那个时代大部分年轻人的生活严重受缚,但也有些人决心改变命运,这些人第一次出现在法国小说家亨利·穆杰(Henri Murger)的作品《波希米亚生活》(*Scènes de la Vie de Bohème*)中。穆杰的小说聚焦于19世纪80年代一群身在巴黎奋斗的画家和女工,作品中宣扬的观点是,城市是一个挣脱主流伦理道德、让持不同政见者和年轻艺术家追求自己的理想并推迟成长的地方。30年过去了,波希米亚风席卷了柏林、伦敦和纽约。

改变并不总是朝着好的方向,年轻人身上开始出现成年人才有的恐惧。工业革命和同步的政治革命带来的利益驱动都不在人类和政府的控制中。贫民窟里的孩子、男孩谋杀犯、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了一个被野蛮、愚昧力量统治的未来。就像弗兰克斯坦向它的创造者倒戈,西方的青少年同样也可以背叛父辈及其建立的制度机构。

卢梭对青年人有着不同寻常的理解,他在《爱弥尔》中就认识到青少年容易走极端的倾向。他总结说儿童期和成年期中间的过渡阶段很长,“通常当教育阶段结束时,这个过渡阶段就开始了”。19世纪70年代,他的建议才被慎重采纳:在记者、改革者、小说家披露了一些野蛮孩子令人震惊的现实状况后,美国和欧洲政府开始创办机构对他们进行义务教育。

卢梭的观点并不仅仅限于创办学校。他提出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教育,将青春期作为一个单独的生命阶段,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提供指导,以减少社会上的种种罪恶。在19世纪80年代中叶,玛丽·巴什基尔森和杰西·波默罗伊象征着青少年的两个极端:天才或是恶魔、世界的创造者或是毁灭者。日记作家和少年谋杀犯所暴露出来的愤怒和冲动引导具有探索精神的人们开始接受卢梭的建议。未来面临着危机:未来究竟是美梦还是噩梦,是天堂还是地狱?

2

民族主义者和颓废派艺术家

欧洲反革命

我想象着--场战争，  
一场关于公正或绝对真理的战争，  
一切如同乐句那般简单。

——阿尔图尔·兰波，《战争》(1874)

WILL YOU HELP US TO TURN  
THESE



INTO  
THIS?



IF SO

PLEASE FILL UP AND RETURN THE FORM  
ON OPPOSITE PAGE.

基督少年军传单, 19世纪90年代

欧洲的传统主义者知道怎样处理青春期过剩的精力。不必担心年轻人的发展,制服他们的野性只需要给他们以体育为主的教育,然后将他们系统化地入编预备军官组织。19世纪70年代,德国作为一个新兴的野心勃勃的民族国家,一个足以动摇陈旧欧洲秩序的国家,一个发起了之后40年军备竞赛的国家,它的崛起更加推动了这一潮流。

与此同时,那些具有浪漫主义思想和波西米亚主义情结的艺术家、作家和思想家们认为青年应被视为人生的一个独立阶段,他们强烈反对这种新军国主义。他们回避19世纪大众社会对物质的需求,同时又在探索年轻人的心灵深处。所谓的颓废派艺术家的名字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但这的确展示出他们道德和身体方面的弊病,虽然他们同时也在探索永葆青春会是什么样。

随着新世纪的日益临近,颓废派艺术家和民族主义者争相将自己构想的未来强加给年轻人。这是一场力量悬殊却又必须争个你死我活的战争。但是,双方却抱着同样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们让青春终结于它的鼎盛时期,以此来提升它的价值。不论是在战场上英年早逝的英雄,还是如同流星般在青春期就陨落的天才,永恒的年轻就像是圣杯:不管是被杀害还是自我牺牲,他们永远都不能成年了。

40岁的德国陆军中校格尔茨男爵(Baron Colmar von der Goltz)清楚地说明了关于青年的军国主义构想。他在1883年问世的著作《全民武装》(*The Nation in Arms*)中准确地预见到,作为战争的一种“大变革”,所有人都将卷入到任何国家冲突中。以“完全征服敌人”为目的,新的战斗局势需要绝对忠诚,需要士兵和非战斗人员做出重大牺牲。

格尔茨认为“18到24岁是最适合从军的年龄”。他还巧妙地提出应该怎样开发这个年龄段人群的生理以及心理特质:“这个时候的身体精力旺盛足以克服一切艰险,思想上没有任何负担。轻率冲动的性情、年轻人独有的新鲜气质是他们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优质催化剂。一支年轻的野战队,年龄相差无几,都非常年轻,他们将战无不胜。”

他的观点务实却又神秘：“只有年轻人能使痛苦远离生命。这个年龄的人还没有被世俗束缚双腿。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要节省时间。他们试图破解的谜团依然摆在面前像一本合上的书。他们爬上高山却没有察觉另一边陡峭的悬崖。他们对冒险的热爱使他们崇尚战争。”最后他总结道：“国家的力量存在于青年人中。”〔1〕

德国非常适合发展带有军国主义性质的民族主义。这个国家刚刚统一，工业发展堪称欧洲的奇迹，却受到封建主义的阻挠。尽管英国、法国、美国都受到了中产阶级革命的改造，但是在德国，独裁的社会结构却控制着中世纪普鲁士人的理想，它强调“对君主绝对忠诚、对国家极度热爱，自我否定，甘愿牺牲”。19世纪60年代，征兵热潮席卷全国。

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法国蒙羞惨败的事实让德国更加坚定了其“终极胜利”的理想。虽然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1793年引入征兵制度的国家，那个时期革命政府需要对抗保皇军队，但由于他们是通过抓阄的方法来征募新兵的，军队系统性的不足很快暴露出来，1872年间第三帝国颁布的更加严格的征兵条例涵盖了20岁到40岁的年龄组。

英国作为欧洲另一个强大的帝国，由于受到海洋的保护，他们没有庞大的常备军。他们没有大规模征兵，而是用理想激励青年随时准备为军队效力。在1888年出版的《给男孩们的书》(*Book for Boys*)中，W. H. 达文波特·亚当斯(W. H. Davenport Adams)指出男孩们应该具备“狂热、诚挚、百折不挠、身心纯洁、自律、谨慎、高尚、虔诚、执着”的品质。

在19世纪后30年的时间里，英国公立学校逐渐形成一种教学风气，将宗教、纪律、文化、体育和精神融入到一个强大万能的体系中。这些学校虽然叫公立学校，但他们的招生对象是有选择的，而且是收费制学校。这种新的教育理念由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的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在19世纪30年代发起，它强调“首先是信仰和道德准则，然后是高雅的举止，最后是智力”。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在写于19世纪中叶的小说《汤姆·布朗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中揭露了学校里的欺凌现象，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阿诺德试图“塑造基督教男人，因为要塑造基督教男孩是几乎不可能的”。过去

---

〔1〕 原文为意大利语。

的公立学校制度导致青少年缺少管教、自由散漫，阿诺德创立的新制度成功地在师生间建立起相互的尊重，同时给予了老师最大的权利，这和卢梭倡导的自由学校是完全不同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理想化的和谐被纳入到重体力而轻智力的男性崇拜中，这非常符合英国在19世纪后30年的战略。在那段时间，英国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扩张帝国。从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以来，英国一直没有卷入任何欧洲的重要冲突。在这段和平时期，英国的公立学校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塑造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青少年上，使他们成为大英帝国制度的执行者。

19世纪早期的冒险精神已经开始过时，它横穿大西洋重新扎根在美国的新疆界。原先的帝国征服者一个个变成了理想球员，团队比赛诸如足球、板球和橄榄球，成为性格测试最重要的方式。尽管在校学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公立学校的教育采用了一套全面完整的体系，这套体系的严格和残酷程度堪比某些部落礼仪。

十二三岁时，男孩们就被从家里带出来，置身于一个类似于兵营的同龄人社会，这个地方通常被称为宿舍，他们由一套有效的同龄人管理制度进行统一管理。同时，他们每天的每分钟都要遵循严格的时间表，这样管理者就可以知道在特定的时间每个青年所处的地点。这些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引用达文波特·亚当斯的话来说，懒惰是一种罪恶。

毫无疑问，这套体系成功地打下了烙印。正如一名匿名男学生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写下的，“对运动的激情，/燃烧着马保罗学校不同年龄的学生。/大家都在狂热地打板球，/足球无所不在，/不论到哪里，话题总是一个，/饭桌人们都在谈‘赛事’。”宗教也和这种对体育和团队比赛的痴迷结合在一起，正如一个校长所说的，“在每一个优秀的寄宿学校，礼拜堂就是公共活动的中心”。

公立学校理想的毕业生就是肌肉发达的基督教徒，在他们的道德标准中包括自律、勇敢、遵循宗教信仰以及富有服务精神这些品质。在达文波特·亚当斯的定义中，自我修养、勤奋刻苦、责任感是通向“纯洁、高尚和积极人生”的第一步。对家族的忠诚与对学校的忠诚缠绕在一起，最终成为对国家的忠诚——自愿的顺从一直持续到死亡甚至来生，为国捐躯使生命永恒。

然而，公立学校系统所能提供的人还不能满足帝国的需要。由于没有普遍征兵制度，工人阶级的青年人缺乏足够的动力去参军，对于他们来说，参军是一种使他们摆脱贫困的途径，或者仅仅是追求刺激。在G. A. 亨蒂(G. A. Henty)的帝国

主义小说中,勤奋的男孩英雄遇到了摩西(Moses)、汉尼拔(Hannibal)或者拿破仑(Napoleon)这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些小说固然让人觉得从军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帝国的需求和新欧洲的挑战迫使人们采取更具体的行动。

由于军事招募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改革家们开始教化城市流浪汉。公立学校和大学的附属学校效法汤恩比馆(Toynbee Hall)的做法,带着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搬进穷困地区。他们建立青年俱乐部和社团中心,旨在灌输一种中产阶级意识:正如牛津劳动人民和青年协会(Oxford Working Men's and Lads' Institute)的创办者所说的,“在一个社会里,更高级的阶级有权力告诉下层阶级的人们应该如何生活。”

与此同时,新的志愿者组织不断完善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建于1844年)和布斯将军救世军(General Booth's Salvation Army)(建立于1878年)的福音传道,使之成为一个专门针对青年的项目。最早的一个代表是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1883年创立于格拉斯格的少年军(Boys' Brigade),他们结合阅兵训练和周日学校学习,有着明确的目标,即“在少年军中进一步巩固建立基督王国,提倡尊严、自律和自重,倡导真正的基督精神的男子气概。”

史密斯正是动员了当时志愿者组织未能包括的这一部分青年人。正如一个最初的少年军成员回忆说,“到了13岁时,我们都觉得自己已经过了上周日学校的年龄,然而还要再过很多年,直到我们17岁了,才能参加基督教青年会。”军事训练是少年军最主要的活动。每次集会都从列队阅兵训练开始,迟到者不许找任何借口,发放的制服、药盒帽、皮袋和背袋作为日常衣物必须随身带着。少年军的座右铭是“坚定不移、脚踏实地”。

少年军以严格守时、恪守纪律、服从命令为风气,不仅仅是预备役的基础,还为他们将来工作中的老板提供了可靠的参考。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少年军已经成员过万,而且它的分支遍布全英。“英国少年禁酒会”是当时一个很有影响的儿童禁酒团体,教会少年救世军是它的分支。所有的这些就像把“宗教的枝丫嫁接到军队的树干上”。

同时,在一些公立学校,诸如查尔特修道院和道尔维奇学院的倡导下,军官学校的数量增加了。1889年,南渥克军官学校(Southwark Cadet Corps)成立于英国南部,两年后合并了汤恩比馆形成了一支完整的军队。会员资格帮助劳动阶级的

男孩子们避免了“违法”和“低俗音乐”的诱惑。当这些年轻人穿着制服走过街道时,人们可以注意到这支队伍的人数有了可观的增长。1889年,一张报纸做出评论说,英国社会“大量蔓延军国主义精神”。

殖民主义价值观的表达方式是给那些“未经良好教育、肮脏、泼悍的”城市劳动阶级野蛮人带来“文明”。整个帝国都认为他们的统治权来自种族优势。19世纪80年代,当最后的大陆——非洲——被殖民化后,民族主义结合基因科学形成一种正统说法,这种说法非常强大以至于左右了国家政策。他们认为,欧洲血统注定比非洲血统优秀。

\* \* \*

在此观念系统中,每个国家的目标都不仅仅是革命进程,而且还包括实现其独特的种族命运。格尔茨的构想在德国的同盟和敌人中都掀起轩然大波。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力真的属于年轻人,那么年轻人作为一个整体将被赋予新的重任,这个整体不仅指那些正值服役年龄的人,也包括更小的年龄群体。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例如德国,取决于军事扩张,那么就没有别的选择。

任何不符合标准的青年人不仅仅是懦弱或者不爱国的问题,而是影响到种族的未来。反对军国主义的人被斥为低等人,精神病学家 B. A. 莫雷(B. A. Morel)把这些离经叛道者命名为“堕落者”。他在1857年杜撰出这个术语,用来描述那些生活在恶化的环境中的有缺陷的人,这个术语影响到其后的几十年。在民族主义者看来,任何拒绝或反对服兵役的人,毫无异议都是堕落者。

然而,仍有一小部分年轻的反对者。1891年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将自己对其兄弟自杀事件的推测,写成了剧本《春之苏醒》(*Spring Awakening*),他不满足于德国针对年轻人建立的残酷的兵营管制制度,却没有提供任何可行的人生指南。对性和自杀的描写使这个剧本触及一个新的敏感地带。而自杀正是19世纪80年代德国社会的最大问题:根据当时精神病学家埃米尔·克莱普林(Emil Kraepelin)和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克海因(Emile Durkheim)书中所写到的,工业文明带来的压力和紧张直接导致了自杀。〔2〕

---

〔2〕 艾米尔·克莱普林的《精神病治疗法》(*Psychiatrie*) (1893);埃米尔·杜克海因的《自杀》(*Suicide*) (1897);《春之苏醒》直到20世纪才公演。

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那么多年轻人决心要自杀,这对呼声正高的军国主义来说是一种不祥之兆。年轻人往往向成年人反映出社会的主流观念,然而青春期自杀现象显示了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在看似乐观的表象下全盘皆输的预兆。虽然德国的军队和海军遍及全球,对新大众时代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社会退化的恐惧正困扰着这个伟大的帝国。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The Crowd*)出版于1892年,引发了对大众时代的争论。在新的科技社会中,“天赋王权”已经被“天赋大众权”所取代。从本性上讲,从众心理来自于返祖现象:他们的“冲动、兴奋、丧失理性”,以及他们“对情绪的夸张”,所有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在“进化过程中的下等人群——女人、野蛮人和儿童”身上看到。摩登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无政府状态的阶段”,在这样的时代里,大众社会管理将是一个关键问题。

在这样一个反乌托邦的社会里,年轻人的立场至关重要:不仅因为今天的孩子就是明天的公民,更因为堕落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堕落的一代。种族的将来危如累卵。人们普遍担心因为血统不纯而导致种族灭亡,担心欧洲会消失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之所以有这些担心,是因为残酷的军国主义逻辑可能会导致全面战争,于是年轻人开始积蓄他们自己的力量。

对大毁灭的向往成为颓废派和军国主义背后的核心动力。正如歌德和魏德金注意到的,长时间以来这种向往也有力地证明了青少年的愤怒。但是,谁的世界将消亡?19世纪90年代在民族主义和颓废派中掀起了一场讨论,他们争相定义这个新世纪。格尔茨著作中预言的加速度军备竞赛果真出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北欧青年的地位政治化了。

\* \* \*

文明的确死了,这个信息来自当时的极端种族理论者和先锋派。这个信息出现在乔治·安东尼·罗彻格罗斯(Georges Antoine Rochegrosse)1891年画的《巴比伦最后的日子》(*Les derniers jours de Babylone*)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乔伊斯卡尔·丁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小说《逆流》(*A rebours*)预见到“巨大的美洲监狱被搬运到欧洲大陆”。他厌恶“那些金融家和暴发户身上无处不在的、难以理解的粗俗”,他诅咒他们的唯物论:“好啊,让社会崩溃吧!消灭旧世界!”

这种极端的世纪末言辞起源于法国不足为奇,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里这个国家仍旧遭受着政治动荡,1789年以来这种动荡一直伴随法国历史。年轻人在革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在1830年、1848年和1871年的政变反叛中表现突出。尽管第三共和国已经扩大征兵,但是19世纪80年代一系列的无政府主义恐怖行动表示年轻人仍旧处于情绪激动、政治性很强的状态。

从一种很直接的意义上来讲,将人们从这种悲观情绪中拯救出来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最黑暗时期的诗人。在1870到1871年的冬天,阿尔图尔·兰波(Arthur Rimbaud)住在靠近比利时边界的查尔维尔的一个小村庄里,那里是普法战争的第一线。新年前夜,他们全家躲在屋子里,当时普鲁士人正在袭击附近的梅济耶尔的中古城堡,它和查尔维尔仅隔一条默兹河。16岁时,兰波生活在战争的废墟中:残疾的士兵、破败的城市、残缺的城市景观。

他沉迷于破坏中。“我看到一片火海,烟雾漫天飞扬”,他后来写道,“在我的左右,财富像无数的雷电那般爆炸扩散。”作为法国陆军上校家庭的第二个儿子,兰波早先曾离家出走十年,他有充分的理由厌恶军队。当他的哥哥弗雷德里克满腔热情地去参军时,兰波却对此不屑一顾。法国战败后,他走遍查尔维尔告诉每



17岁的阿尔图尔·兰波,  
由艾特恩·卡加拍摄

个人他们的国家多么幸运,法国的失败让他获得了自由。

16岁时,兰波是那种典型的乡下青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厌倦家庭和故乡。他等不及要离开那里。普法战争带来的混乱局面使他内心的愤怒表现出来,也给了他一个考验自己的机会。那个冬天,他离家出走,在去往普鲁士前线途中的某块荒地上,他得到了启示:“在冬天的一个晚上,我独自走在路上,我无家可归、饥寒交迫,冰冻的心里重复着一句话:‘弱者还是强者,只要还活着,就是强者。’”

2个月后,兰波梦想成真。首都的穷人联合数千学生和工人奋起反抗建立了巴黎公社。1871年4月到5月的那段短暂的时间里,无政府主义者占领了首都,年轻诗人们控制着警力。数以千计的年轻流浪者如飞蛾扑火般奔赴革命的巴黎,兰波就是其中的一个。由于人数众多,公社被分成两个阵营:“公社孤儿”和“迷失儿童”。

虽然兰波刚到几个星期,公社就被粉碎了,但是亲身经历使16岁的他了解了解放的意义,并决心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1871年5月13日,他在给朋友保罗·德门尼(Paul Demeny)的信中写到,“问题在于打乱所有的理性到达未知的地方。痛苦是巨大的,但是你必须强大,你必须天生就是个诗人。”他主张“我是另一个人”,他的话很快就变成了行动。

对于兰波,诗歌有一种神秘的使命。他沿着浪漫主义、爱伦·坡和查尔斯·波德莱尔的轨迹,一路走来。1871年后,他的诗作中充斥着革命骚乱、反中产阶级的谩骂、异教徒的神秘主义和狂热的预言,所有这些混合在一起形成坚固的宇宙论。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观点预告着世界末日:“是爆发的时候了,海洋已经沸腾,地下也已爆炸,整个星球都在急速旋转,接下来的确是要灭亡了。”

作为一种存在,它确实深深地影响了同时代的人。那年秋天,兰波受诗人保罗·魏伦(Paul Verlaine)的邀请来到巴黎,他被视为最年轻的天才受到巴黎文学界的吹捧。这个17岁的少年对长辈不仅没有应有的尊敬,而且对那些他认为高他一等的人回以污秽的咒骂。他打断朗诵、恐吓主人、在一个朋友的杯子里倒迷幻药,一次,他还弄伤了摄影师伊恩特·卡加。

卡加为兰波拍摄的两张现存的照片上出现的是一个长着娃娃脸的年轻人,他牙关紧锁,薄薄的嘴唇透着冷意,头发呈爆炸状,一双灰色的眼睛流露出固执的神情——完全是青年狂热者的典范。保罗·魏伦称他为“一个儿童版的卡萨诺瓦”,他“英俊坚毅的下巴似乎在对任何空想幻想说‘走开’”,这个年轻人一头“蓬乱的头发”和“蔑视穿着打扮的男子气”代表着一种“魔鬼般的美”。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兰波和魏伦追求着一种疯狂的二人世界,这段感情经历了堕落和贫穷,备受排斥,最终以暴力和疲惫枯竭告终。“厌倦已经取代了我的爱情”,兰波在《地狱之季》(*Une saison en enfer*)中写道。“盛怒、反常和疯狂,我全经历过这些冲动和灾难——我已放下全部的负担。”21岁时,他停止了写作,当他的一个朋友问起他的诗作时,他回答说,“我再也不想写了。”不久,他就移居非洲抛弃了以前的生活。

对自己思想和感觉的深入探究推动了兰波火箭般的事业轨迹。他在《秘密》(*Conte*)中把这种对自己思想和感觉的敏感称为“无尽的年轻的利己主义。”他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进行写作的时候,年轻人还没有权利,他敏锐地察觉到年轻人“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他的诗作运用大量青春期男性的反常行为替代了浪漫的修辞。在《故事》这首诗中,他把自己比作卡利古拉式的王子,他问道,“毁灭会带来喜悦吗?残酷会使人年轻吗?”

他的消失使他成为谜一般的人物。像少年维特和托马斯·查特顿那样,他让自己永远停留在年轻时代的顶峰期。兰波早就预见了他的命运。在他1871年的宣言中,他描述了一个这样的预言:“他会触及那些未知的东西,即便变得疯狂,失去了理智,但他至少看到过。如果他由于投身到那些传说中难以名状的事物中死去,更多的后来者会无畏地继续,他们将在其他人倒下的地平线上开始。”

兰波的形象作为法国堕落的化身于1883年被确立下来,这一年保罗·魏伦在诗文选《被诅咒的诗人》(*Les poètes maudits*)中出版了他的诗选《全民武装》。兰波“对毒药的信赖”和亢奋的“疯狂”为把性和死亡结合在一起的新运动树立了一个样板。魏伦描述道,“在敌军来犯的号角声中,崩溃于被感官消耗殆尽的火焰里。”虽远在非洲深处,这个救星也被这种始料未及的名声吓坏了。

然而,这一风尚无情地传遍了整个欧洲并且跨越了大西洋。一代又一代的颓废派越来越走向极端,他们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到19世纪90年代,他们建立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苦艾酒、吗啡、蓄胡子的导师、巫师降神会、专门刊登“来自伪兰波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稿件”的评论和宣布“毁灭旧秩序,为二十世纪准备崇高国家文学新素材”的社论。

\* \* \*

由于靠近法国,英国成为欧洲国家中颓废派发展最肥沃的土壤,当然也不乏

其他原因。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里,对宗教信仰的科学批评和大众时代的加速影响逐渐削弱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尚。国会权力以外的政治活动也在增加: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开始出现,新女性和女性投票权力引起关注,关于同性恋权力的讨论也第一次展开。同时,劳动阶级青年发起的城市暴力行动越来越多。

公立学校投身正义运动的形象正在受到质疑。长期以来,古典教育是公立学校的主要组成部分。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那些厌倦了肌肉型基督教的人改写了拉丁和希腊的教学大纲,使之成为一种新的唯美主义,这种唯美主义可以代替上帝和运动。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作为被希腊化的人中最出名的一位曾这样回忆说,他在学校的日子“沉浸在野蛮之中”：“痛苦和徒劳是毫无争议的事实,比虚度最美好的年华更糟糕。”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提出另一个关于青年的定义。在第一部小说出版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就已经确定了其煽动者和作家的地位。虽然已经结婚并生育二子,但是他在同性恋的下层社会里过着另一种生活。《道林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一半是寓言体,一半纪录了王尔德和他的社交圈,这部小说是浮士德神话的现代版改写:在这里,生命取决于永恒青春的承诺。

故事可以追溯到 1884 年 6 月,当时王尔德正在巴黎度过他的蜜月之旅。他已经接触到了兰波式的颓废,结识了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的狂热门徒——诗人朱丽斯·罗利娜,但是给他最大冲击的是小说《逆流》。王尔德对主人公爱桑迪丝(*des Esseintes*)非常认同,以至于于斯曼这种神秘的唯美主义“成为他生活的一种预设。而事实上,这整本书仿佛是他人生的写照,只是写在他人生开始之前而已。”

王尔德一直徘徊于堕落派和社会主义乌托邦之间,但是他把这种紧张情绪化为动力。1891 年,他出版了两本重要著作,代表了他的双重性格:哲学评论《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和标准长度的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如果前者宣扬“进步产生于反抗”,那么后者则视青年的力量为神圣:“生活!活出生命的精彩!年轻!年轻!没有什么可以与年轻的生命抗衡!”

道林格雷混迹于所有风月场所——画家工作室、音乐厅和鸦片烟窟,最令人震惊的并非他毫无道德感可言,恣意毁掉与他接触的那些人的生活,而是王尔德对主人公彻底消亡的描写,他消亡在“可以让魔鬼的影子真实的梦中”。小说道

德说教的结尾并没有削减这种邪恶的快感,因为浮士德式的合同已经让他付出了代价。一具完全不能辨认的尸体取代了一个年轻的美少年,那具尸体“憔悴干瘪,而且面容令人厌恶。”

王尔德由于其过分的谨慎无法认真提出永恒青春的猜想:格雷陷入厌倦和疯狂之中,这种状况的危险性显而易见。然而,他的犹豫不决还是暴露出他的无知。虽然批判堕落,他的小说却反而帮助他更进一步推广了这种堕落的风格。王尔德的一系列开场警句更是引起争议,例如他说“罪恶和美德是艺术家创造艺术的原材料”,这足以让于斯曼所说的那种英格兰“沉重的监狱气氛”天翻地覆。

如果王尔德有先见,他可能不会选择这么让统治阶级不安的语言。他推崇的价值观——同性恋和社会主义的双重罪——与肌肉发达的基督教徒完全相反。他反对团队精神,提倡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彻底认识到自身的天性是每个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意义。”他认为男性不是坚强的战士,而是“一种复杂多样的生灵。”最重要的是,随着他同性恋身份的公开,他开始揭露贯穿整个英国的同性教育系统的弊病。

王尔德开始影响年轻人。他写道:“说年轻人无知真是无稽之谈,我虚心听取的意见皆来自于比我小得多的人。”作为唯美主义的大主教,王尔德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仰慕者,其中包括牛津大学学生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Lord Alfred Douglas),《道林格雷的画像》一出版道格拉斯就立刻赶去拜见作者。在此之前,王尔德秘密的同性恋生活已经持续了许多年,然而两人的公开恋情却是英国的传统体制所不容的。

1894年12月他在牛津大学的新月刊《变色龙》(*Chameleon*)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青年人运用的短语和人生观》(“Phrases and Philosophies for the Use of the Young”)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对人们关于宗教、时间、艺术和历史、代与代之间的关系等根深蒂固的观点提出了异议。“老年人相信一切,”他写道,“中年人怀疑一切,年轻人知道一切。”虽然王尔德并没有明确地描写性,但其他人写了,最著名的就是道格拉斯勋爵,他颂扬“不敢谈及的爱。”当他们之间的丑闻败露,王尔德受到了社会的谴责。

1895年4月至5月在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中,王尔德对年轻人的影响成为讨论的焦点。由于受到道格拉斯勋爵的父亲昆斯伯利侯爵的不断骚扰,王尔德起诉他诽谤。王尔德的朋友都劝他不要这样做,而且他们最害怕的事情还是

发生了。当被告进入无罪答辩阶段时,他被指控鸡奸了12名青少年。原告认为,这些放荡的生活在《道林格雷的画像》里已经一目了然,这本书就是在“颠覆道德,鼓励恶行。”

在审判期间,人们越发把王尔德和小说里的人物混为一谈,王尔德完全被视为带坏格雷的罪魁祸首——亨利·沃顿勋爵(Lord Henry Wotton)。当权者决定以堕落和鸡奸罪处罚他做两年苦工,在总结陈述中,法官宣判王尔德是“青年人腐化世界的中心。”这次依照1885年《刑事法律修改法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的成功定罪,向公众完全否定了同性恋:“一个终究腐烂并祸及全身的伤口。”

这个裁决不仅是王尔德个人的灾难,对于由于他而引起世人关注的唯美主义者和同性恋也同样是场灾难。王尔德的作品被禁,1900年去世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仍然一直是公众污蔑的对象。法庭和报刊用来描述同性恋者的医学隐喻和迈克思·诺尔道(Max Nordau)的基因理论不谋而合,诺尔道在《退化》(Degeneration)中对唯美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并使其基因理论深入人心。这本书1892年在德国首次发行,之后一度在英国流行。

诺尔道在书中给萨切尔·隆布罗索(Cesar Lombroso)的献辞里认为,那些宣扬个人主义反对传统道德的艺术家,比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尼采(Nietzsche)和王尔德是社会的威胁,[3]诺尔道特别指出王尔德是“人种的病理变异”,他在1895年春的审判中提出了最“有效的”治疗“世纪末情绪”的方法:“把这些主要的堕落者纳入精神病人的行列:揭露并谴责那些与社会为敌仿效这些堕落者的人;告诫公众不要相信这些寄生虫的谎言。”

王尔德最大的过错是向公众展示了统治阶级隐藏在正义表面下的东西。正如记者W. T. 斯蒂德(W. T. Stead)在这个裁决之后评论说,“一段时间以来,公立学校允许男孩们沉溺于某些行为,但在毕业后这些行为可以让他们成为苦工。”这件事也分散了公众对一起涉及首相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和另一名昆斯伯利后裔德兰姆兰里格子爵(Viscount Drumlanrig)的丑闻的注意力——这段感情以那个年轻人的自杀而告终。

---

[3] 诺道把玛丽·巴什基尔森作为特例,专门挑出来进行评论:“一个死于肺结核的堕落女孩,道德疯狂的牺牲品,有一点妄自尊大。”

由于这些暗流,在王尔德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权派下定决心拒绝反省诱因而只谴责表面现象的行为就不足为奇了。中产阶级的孩子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受到这个堕落者的诱惑,灵魂濒临毁灭。有报纸明确地说“在校大学生和公立学校六年级男生”都“必须认真反省这个受到正义审判的人的信条和人生。”

这样的指责是有依据的。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两个根据阶级归类的青年团体,他们拒绝向西方帝国的唯物主义低头:在美国,这些人被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n Veblen)称为“世袭康乐阶级”和“下层社会罪犯”。在英国,这些人中包括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中不受世俗陈规束缚的人:这有一部分要感谢王尔德的努力,浪漫主义审美的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到英国资产阶级的生活中,成为军国主义和革命之外的第三种生活方式。

对王尔德的判决扼杀了英国现代主义的进程。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在《爱的成年》(*Love's Coming of Age*)一书中探索了女权运动和同性恋的关系,这本书在1896年一经出版便遭到封杀。哈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划时代的著作《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中列举了青春期性欲倒错的病例,一年后也被禁止发行。王尔德过去的同事奥布雷·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对此“举措”的势头评论道:“迅猛的清教主义势如涨潮,紧接着的是持久的退潮。”

整个欧洲的颓废派在一种更为强劲的新正常状态来临时,开始渐渐消退。诺尔道在《退化》一书中,把身体健康和心理及精神健康等同起来。他认为和颓废派完全对立的品质包括:意志坚强、富有责任心、勤奋工作、尊重不可改变的进化规律。在书的结尾处,他请读者想象一场“竞赛”,竞赛的一方是颓废派,他们是“医院、疯人院和监狱里”死气沉沉的居民,而另一方则是“早起的人,他们一整天干劲十足,他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肌肉结实。”

在法国,人们对堕落进行了猛烈抨击。在1899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一个名叫阿尔伯特·马蒂兹(Albert Mathiez)的激进人民党青年抨击“那些只为自己而活的年轻人”和“涂着香水活得像女人的男人”,他们最愚蠢的地方在于宣布自己“离开本根”。作家莫里斯·巴莱斯(Maurice Barrès)称这种个体性是“一个巨大的我脱离了世界而存在。”虽然巴莱斯曾经非常沉迷于堕落派,[4]但是他在

[4] 他是巴什基尔森日记的早期支持者。

1897年出版的三部曲《离开本根的人》(*The Uprooted ones*)[5]中探讨了他们的决裂。

《离开本根的人》跟随七个省的青少年从洛林地区到巴黎的脚步,对他们背井离乡的生活进行了描述:“他们离开了出生的地方,学习如何与自己的同伴竞争,这一切都使青少年悲观厌世。”由于没有成人的养育和教导,个人主义越发猖獗。莫里斯对没落政权的批评激发了他对政治的热情,他试图召集那些被他唤醒的年轻人——他的“年轻的王子们”——加入到一种新的神秘民族主义中。

重塑民族主义也被维多利亚时代一个杰出的英国人提上日程。身为律师、小说家和编辑,亨利·纽博尔特(Henry Newbolt)坚信“英国的力量覆盖世界并引领世界”。他充满热情地描述了母校克利夫顿大学(Clifton College)1898年的一次晚宴:“凌晨3点钟,我还坐在那个我从没见过的男人的床上,读他写的关于苏丹的日记。他是常备军的陆军上尉,正是他的榴弹炮攻破了乌姆杜尔曼(Omdurman)的城墙。我离开一年后他来到克利夫顿。”

纽博尔特相信“为了形成民族主义的品质及这种品质中的各个部分,战争有时是‘最好的工具。’”1898年晚些时候,他出版了诗集《岛屿之争》(*This Island Race*)。在《生命的火炬》(*The Torch of Life*)中,他歌颂了体育运动和骑士精神之间的联系,视它为英国统治全球的关键所在。在务实的英国,连神秘主义也以进球数量来衡量胜负。而纽博尔特的诗歌大声宣布了帝国对英国青年的期待:

今夜的决赛场地一片沉寂,  
拿到十分,赢得比赛,  
用力投掷,灯光熠熠,  
还有一个小时,胜利就属于我们。  
不是为了获得漂亮的球衣,  
也不是为了一个赛季的盛名,  
队长猛击他的肩头,  
“加油!加油!赢得光彩!”

[5] 原文为法语,*Les déracinés*. ——译者注

沙漠已被浸红，  
 红色染红了破败广场上的废墟；  
 加特林机枪卡住了，上校阵亡，  
 尘土硝烟遮蔽了军队的视线。  
 死亡之河已经决堤，  
 英国在远方，为荣誉而战，  
 男生喊着队列：  
 “加油！加油！赢得光彩！”

这是年复一年的誓词，  
 在她的土地上，学校已经建起，  
 她的儿子们必须听着，  
 谁也不该忘记。  
 每个人都欢欣鼓舞，  
 让这些话语像燃烧的火炬伴随一生，  
 奋力为祖国而战，  
 “加油！加油！赢得光彩！”

军国主义的颂歌在接下来的20年里依然回荡，欧洲的青年人不断奔赴战场。与《退化》和《离开本根的人》一样，《生命的火炬》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试图永久地驱逐那些“疾病缠身的”颓废者的鬼魂。纽波特的诗歌虽然语气热情坚定，但其间却是死神出没。〔6〕颓废派虽然都摆出一副厌世的架势，他们却在颂扬着年轻人对生命的渴望。在他们“健康的”对手精心准备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之后，这种对生命的渴望将更加强烈。

---

〔6〕 一战后，纽博尔特对这种说法避之不及。

### 3

## 流氓和阿帕切

青少年犯罪和大众传媒

穷人中的佼佼者从不感恩 他们忘恩负义、贪得无厌、桀骜不驯、无法无天。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

——奥斯卡·王尔德,《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1891)



《啤酒桶党的会议》雅各布·里斯摄

在19世纪末的大都市里,许多儿童和青少年被遗弃,自谋生路。处于缺少成年人管理的体系中,他们自己组成了几乎无法掌控的帮派。在19世纪90年代之交,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在南曼哈顿偶然碰到一群年轻的流氓,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虽然他曾经处理过孩子无家可归的问题,但是他认为必须接近这帮年龄更大的“流氓”,而且要更小心。只有迎合他们的虚荣心才能使自己免遭殴打——他请求他们为他拍一些烟盒上的图片。

这群人“接受了我的请求并作了很多准备,他们抱来一只肮脏丑陋的羊(从附近一家关闭的屠宰场)作为他们的一员。这些人中最丑陋的那个流氓坚持在拍脸部照片时拍上一个啤酒壶〔1〕,趁机喝掉了里面剩下的啤酒,引起了其他人短暂的不快,但是其他方面都进行得很顺利。准备好相机后,我漫不经心地暗示他们拍香烟照片的要领,这个暗示立刻就生效了。除了大胆迎合这群人的性格,我无须再做什么。”

他们在照相机面前表现他们每天的恶行:“其中一个跌跌撞撞走进一个小棚子,装作睡着了,这时其他两个向他俯过身子搜查他的口袋,其熟练程度令人发指。为了从我这里得到好处,他们向我解释他们表演的是怎样‘得手。’其他男孩觉得这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他们都争先恐后要求拍照。他们爬上那个小棚子,坐在棚顶,脚荡在外面,对着照相机摆出各种能想象出的造型。”

由此产生的照片《啤酒桶党的会议》(“A Growler Gang in Session”),提供了一张有关少年流氓的精彩之作。在一个低人口密度城区的屋棚和草场里,七个“蒙哥马利警卫”(Montgomery Guards)着装统一姿态一致地展示着他们的团队思想。他们头戴帽子,身着黑衣,态度轻蔑,站在斑驳的阳光里。中间的那个少年满脸嘲笑,一个年轻的酒鬼闯入喝干满满一壶酒,这些都让他们的傲慢无礼一览无遗。如果看到这种场景,你肯定会溜之大吉。

---

〔1〕 啤酒壶此处是指一个用来装不太新鲜或者廉价的啤酒的壶。

曼哈顿的报纸长期报道这些团伙的所作所为。1857年夏天,《纽约时报》公开调解“包华利男孩”和“死兔子男孩”之间的可怕冲突。他们响亮的名号和令人发指的行为为这个城市的记者们提供了理想的题材。前者希望提高知名度,而后者希望获得吸引眼球的图片素材——活生生的低俗小说情节——他们把新闻的两个理想元素结合在一起:刺激和批判。

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青少年不良行为的问题变得愈发迫切。然而,直到1890年,雅各布·里斯出版了《另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其中包括关于“啤酒桶党”的照片以及其他一些照片,才使美国民众看到了城市青年人生活状况的证据。作为一个致力于改革的警察部门专访记者,里斯认为这种新发明的照相机是记录那些流浪汉生活的最佳工具。这些人的生活经常被拿来讨论,却很少被真正看到:他展示了一个虽然不是自治但绝对独立的年轻人的世界。

像所有研究堕落人群的理论家一样,里斯旨在说明堕落的生活归因于堕落的环境,而年轻人又最易受到影响:“1889年警察逮捕的82200人中,10505人都在20岁以下”,他写道。然而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把这些贫困的曼哈顿青年从黑暗中解救出来,而仅仅是阐释这样一个问题。相较于人种改良,里斯的方法更倾向于取消种族差别:《另一半人怎样生活》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有可能会影响国家政策去改革居住环境、公共场所和公共教育。

19世纪最后10年中,里斯并不是唯一报道年轻人犯罪问题的作家。随着少年犯罪的数量急剧增加,贫民窟孩子的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如果要想一个科技化的大型城市社会正常运行,那么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资产阶级制定的准则,如节俭、负责和自律。城市里的混乱局面是不可容忍的。美国的改良运动将少年犯罪作为首要目标,同时,英法两国不断出现的丑闻也使这个问题成为重大新闻。

这些评论者没有考虑到煽动人心的报道对被报道人所造成的影响。年轻人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当将他们与犯罪、冷漠粗俗的行为联系起来时,这个话题变得更加敏感。能够见报可以帮助他们赢得地位。通俗报刊第一次显示出威力,让贫民窟的野蛮人进入公众视线,并为新世纪提供了一个试验案例。流氓和阿帕切〔2〕们

---

〔2〕 原文为 Apache,音译为阿帕切,是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叫阿帕切族,在美国的西南部。相传阿帕切是一个武士,他英勇善战,且战无不胜,被印第安人奉为勇敢和胜利的代表,因此后人使用他的名字为印第安部落命名,而阿帕切族在印第安史上也以强悍著称。本文中主要指那些野蛮、好战的少年流氓。——译者注

宣告了独立,这种独立虽算不上决裂,至少也会令人恐慌,大众传媒和青年之间的共生关系从此开始了。

对青年人的突然关注反映了一个事实:到19世纪80年代,许多城市青年已经决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管改革者和记者怎么想,他们都会不择手段得到自己想要的:酒精饮料、武器、衣服。流氓和阿帕切这样的新人类将奇装异服作为荣誉徽章,他们夸张的穿着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他们通过服装宣布了自己的反叛。

\* \* \*

在新大陆,少年犯极其猖狂。从1880年到1910年,美国的城市总人口增长3倍,从1400万人跃至4200万人。导致人口激增的原因有二:在大陆内部,估计有200万人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大陆外部,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西欧和东欧的移民潮达到顶峰。这种大量迁移震撼了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称之为“一场空前迅速、广泛、彻底的革命”。

年轻人正处在这场革命的第一线,像“蒙格马利警卫”这样的帮派随时提醒着人们,美洲大陆的社会福利机构和基础设施跟不上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速度。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里斯·简·亚当斯(Jane Adams)这些社会新闻改革者,携手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和史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怀着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描写了美国青年面对的严酷选择。他们的视角也许很阴暗,但他们却有着务实的目的:改善城市贫困居民的日常生活。

城市下层社会的孩子成为美国社会状况中最受人关注的部分。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他们体现着美国的主流价值观。而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的青少年在这种新的大众传媒中反而不那么受到注目了。街头混混和黑帮生动地提醒着,尽管美国想要建立一个不同于欧洲传统的新社会并且有言论自由,如果没有根本上的改进,不公正仍将深深扎根于经济和社会系统中。

虽然宣传资料振奋人心,但是你的未来——除了少数人之外——往往取决于你的出生。如果你出生于一个看起来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家庭,就很有可能肩负了家族的期待和理想:如果是男性,可以进入家族企业或者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是女性,最好的是嫁入豪门,如果没有做到,那么就从事与法律或医疗相关的工作。尤其是年轻男子,他们的面前摆着一个现成的通往成功的阶梯:小学和中学

之后进入大学,毕业后从商、创办企业或者从事某些专门职业。

这些灌输给美国中产阶级青年的理念反映出美国的战略方针。虽然内战使这代人对战争毫无兴趣,但是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好战心理,这种好战心理体现在当时任公务员委员会委员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身上,美国要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一员。在1885年畅销书《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中,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预言不出一个世纪美国会成为“一个政治集合体,它拥有任何帝国从未有过的不可估量的权利和地位。”

因此,明天的统治者不断地被灌输实现此愿景的技能和态度。即使在1898年美西战争以前,军国主义就已经深入人心。罗斯福认为“真正的男子气概必须具有铁一般的意志”,他的这一观点与“强壮的基督教”这一精神理想以及高度发达的运动文化完全一致:垒球、足球和健身成为这个国家中产阶级男子的主要休闲活动。然而,在前帝国的美国,这种训练的终极目标并非战争而是贸易。

在英国,公立学校也用同样的方法训练他们的年轻人来治理大英帝国,所以体育运动不仅可以训导年轻人,而且可以使他们为今后“艰辛甚至危险的努力”做好准备,这种努力正是罗斯福认为要让美国实现“真正的国家强大”必须做到的。这并不意味着要让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形成一支特殊的队伍。也许“青春”犹如潮汐,但这潮汐会随着教育和休闲的不断阶级化而逐渐退却,这意味着年轻人受到比以往更多来自年长者的监管。

虽然让享有特权的青年拥有发言权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代人都不能以此为自己辩护。成年人主宰一切。在T.德莱塞1893年出版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中,家庭富裕的乔治·赫斯伍德也许可以“在个人权利方面表现得过于敏感和夸张,并且试图让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有特权的人。”然而,“对于一个19岁的青年来说,这样的想法就是荒唐而且毫无意义的。”

很多贫民窟孩子在19岁之前已经走完了生命的旅程。在美国大都市严酷的环境中,他们必须为生存挣扎,这种高强度耗尽了他们的体力和精力。由于大量的移民和拥挤的环境,曼哈顿对年轻人格外苛刻。孩子们常常被遗弃街头:许多死去了,幸运些的找到一些像送报、卖花这样的临时工,有的加入帮派,或者沦为扒手。没有福利机构,也没有安全保障。

这些青少年的基本社会组织模式是本地化或地域性的,能够体现他们所在城市的状况。纽约市是一个开放的城市,是一个“新时期的罪恶之都。”他们怎么可

能不在这个城市里留下自己的痕迹呢？从19世纪中期开始，帮派组织便开始有组织地发展壮大。到了19世纪90年代，根据专门研究青少年帮派的作家赫伯特·阿斯伯里（Herbert Asbury）记载，“曼哈顿时代广场南部已经被帮派组织划分成了很多界限明确的小王国，边界犹如国界般严格把守。”

在这个城市的战争区里，曼哈顿的种族隔离在对阵战和种族暴动中展开——从这条街到那条街，从一个区到另一区。但是，比较常见的动机是冲动犯罪和兄弟义气。新的黑帮吸纳了更小的年龄群，即10—12岁的成员，为保护他们的重要成果——通常都是和所在社区相关的非法活动，他们还发动地盘战争建立自己的市场优势。他们的组织非常有序稳固，几乎可以和已经开始主导美国贸易的公司媲美。

随之而来的瓜分引发了曼哈顿版图的变动。“五只猎犬”（Five Pointers）〔3〕霸占了百老汇和鲍威利地区；“伊士曼”（Eastman）沿着鲍威利把地盘延伸到东河地区。在其他地方，“煤气房党”（the Gas House Gang）、“北美地鼠”（the Gophers）、“时装样片”（the Fashion Plates）、“边缘人物”（the Marginals）和“珍珠纽扣”（the Pearl Buttons）都在争抢各自的领地。由于人员经常流动，这些帮派从各地的青年联谊会中招兵买马。一些本地首领建立的帮派会起一些诸如“鲍威利印第安人”（the Bowery Indians）、“向前冲”（the Go—Aheads）这样振奋人心的名字。

这个世界白行其是。所有的常规都被颠覆了，而谁破坏了新的规矩谁就要倒霉。19世纪90年代初最成功的帮派“哇—哦”（Whyos）列出了一张详细的价目单，上面有完成勒索和谋杀任务可以得到的报酬——“打斗”只值2美元，而“做一桩大活”可以拿到“100美元甚至更多”。“巴克斯特街头男孩”（The Baxter Street Dudes）开了自己的地下剧场，嘲讽地命名为“大公爵剧院”（Grand Duke's Theater）。来自城市各个角落的年轻人和贫民窟孩子（“大象猎人”）到这里来举行帮派复仇挑战赛，观看用偷来的布景和道具进行演出的戏剧。

性是帮派世界的一大吸引力，这在美国这种清教徒社会里显然会有格外的诱惑力，但这只适用于男人。1896年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在轰动一时的小小说《街头女郎梅姬》（*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中描述了这种不平等交易背后

---

〔3〕“五只猎犬”及以下的“煤气房党”、“北美地鼠”、“时装样片”、“伊士曼”“边缘人物”、“珍珠纽扣”、“鲍威利印第安人”和“向前冲”等都是当时帮派的名字。——译者注

的残酷。他的女主人公“成长于烂泥塘”，她只能利用自己的青春：“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美貌的价值。”梅姬不愿意受到血汗工厂的奴役，她成为一个当地流氓的女人。一旦她没有了利用价值，她就一文不值，成了又一个“化着妆的混混。”

虽然妓女是帮派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但是坚忍的女性也可以决定自己的人生。除了常见的鸨母和沙龙经理，一些联谊会派生出一些女性帮派，这些联谊会包括“洋槐女”（Lady Locusts）、“第四区女性解放组织”（the Lady Liberties of the Fourth Ward）、“卡车女司机联盟”（the Lady Truck Drivers' Association）等。“战斗排女士社会”（The Battle Row Ladies' Social）和“体育俱乐部”（Athletic Club）隶属于“北美地鼠”（the Gophers），她们受“战斗安妮”（Battle Annie）的领导，她们也被称为“北美地鼠女士”（the Lady Gophers），她们“与警察的频繁对抗”证明了她们的力量。

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帮派首领都是男性，“大人物们”例如“五只猎犬”的首领保罗·凯利（Paul Kelly）、他的亲信比夫·艾利森（Biff Ellison）、“哇-哦”的丹迪·约翰尼·杜兰（Dandy Johnny Dolan）和蒙克·伊斯曼（Monk Eastman）都非常有威信，以至于他们的手下都跟了他们的姓。许多成功的帮派首领都通过穿着显示自己的权威：阿斯伯里指出“越危险的匪徒、杀手穿的越花哨”，凯利“衣冠楚楚、谈吐文雅”，而艾利森“非常喜欢用香水，他使用自己特制的混合香水，并让香水师发誓保密。”〔4〕

在曼哈顿的廉价公寓里，这种地下社会彻底颠覆了美国的价值观。从各方面说，成功的帮派首领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一个成功的大学运动员的形象，他们是自己领地上的佼佼者。他的权力使许多年轻的恶棍都竭力效仿他的言行。19世纪90年代，伊斯曼成为“东区最著名的市民，无数年轻人模仿他的言行举止，简直就像成立了一个培养流氓和恶棍的蒙克·伊斯曼学校。”

这些冠冕堂皇的境况粉饰了帮派世界的残酷现实。每个发迹的首领身后都有上千为他打拼的小混混。他们的首领也许成了“大人物”，而这些小混混简直就是反面写照。阿斯伯里观察到“这些年里，廉价公寓生活的痛苦和拥挤夺去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根据警方和监狱的纪录，‘北美地鼠’、‘伊士曼’和‘5只猎犬’

---

〔4〕 艾利森也开了一间迎合同性恋的酒馆，以治疗梅毒的药物所产生的副作用将这个酒馆命名为“局部麻醉厅”。

这些帮派成员的平均身高不超过5英尺3英寸,体重在120—135磅。”

这些体重偏轻的年轻人营养不良,居住条件恶劣,嗜好酒精和其他兴奋剂,还选择了危险的职业。由于暴力是他们的原则,他们在成年之前就可能被刺杀、射杀、或者殴打致死。其实,这种高度可能性意味着很多人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决心要体验卢克·桑提(Luc Sante)所说的“整个成人过程中的各种感觉。”20岁时,他们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呆在监狱里,要么已经筋疲力尽。

里斯在他1890年的相片中捕捉到这种紧张刺激。照片中的人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平静,他们正处于两次“偷袭”之间的短暂停顿。他们如此放纵完全是因为他们邪恶无度。“为了不让读者误以为这些年轻人都是无害的,”改革家特别说明,就在他们相遇后不到半个小时,三个“蒙哥马利警卫”成员因暴力抢劫犹太小贩而被逮捕。他们企图把小贩的头锯掉,“仅仅为了取乐。那个犹太人身边正好有一把锯子,所以我们就给他一顿狠揍。”

像“蒙哥马利警卫”这样的青年来自西28号街上被称为“穷人巷”的廉价公寓街区,他们如果不结成帮派根本无法生存,而一旦帮派形成,他们就奉行“强权就是公理”的标准。他们觉得里斯给他们拍照可以强化团队感,他们认为他们的团队代表荣誉而非耻辱。他们希望,除了警察给罪犯存档的冷冰冰的照片(那曾经是他们的唯一可能接触照相机的机会),里斯拍摄的照片可以向世界说明他们是大人物,而并非小打小闹的凶犯。

那些残酷的行为引发了改革家们一场热烈的讨论。1893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著名的演讲“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中认为,美国大陆的广袤土地已经完全开垦了。在整个19世纪,人们为了土地和发展向西部移民,并以此促进了美洲大陆的繁荣,这一切现在已经达到极限。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闲置土地,在1890年冬天苏族人“鬼魂舞蹈”的叛乱失败后,在美国印第安人居留地之外根本找不到印第安人。

粗野的边疆风气在大城市的角落里重新安家落户,由于缺乏有益社会的表达途径,结果就变成了毒瘤。印第安人虽然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了几千年的土地,但他们却侵入了那些野蛮街头混混的灵魂。《啤酒桶党的会议》揭示了一个让人不安的真相:一大批新的土著需要被驯化。年轻的恶棍流氓走出了黑暗:成千上万个可能成为杰西·波默罗伊的少年出现在从未拥有过的阳光下。

\* \* \*

在世纪之交,少年犯作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W. 道格拉斯·莫里森(W. Douglas Morrison)在1898年发表的《未成年犯》(*Juvenile Offenders*)中指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不论我们查阅的犯罪资料来自旧秩序还是新大陆,我们总是能发现青少年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某一个社会:这是全国每一个家庭都面临的问题;这是文明社会中常见的问题。”

在英国,随着城市工人阶级的孩子逐渐挤进公众视线,青年犯罪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题。正如1898年的报纸所说,“没有人在阅读了伦敦、利物浦、伯明翰、曼彻斯特和里兹的报纸后,还不知道年轻的街头暴徒和小偷携带着皮鞭、匕首和枪支随时危及我们的生活。对于每一个希望夜晚的街道安全、体面、不会被肮脏的叫骂和粗暴的行为玷污的人来说,他们要问的是能为这些城市男孩和贫民窟居民的发展做些什么?”

然而,这不是美国式目无法纪的结果,这是一个帝国繁荣局面长期、缓慢、片面发展的副产品。虽然三分之一的人口生存在贫困线以下,对于上层工人阶级,生活在好转——住房饮食改善、更多休闲设施(足球、度假胜地、音乐厅)和更多的消费品可以提供给新型的大众市场。城市青年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享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这些都让原本决心保持社会原状的资产阶级感到担忧和威胁。

19世纪中期以来,叛逆的城市青年就一直是一个社会问题。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杀人事件报道后,70到80年代报端经常有关于暴力袭击事件、银行休假日狂欢节和帮派斗争的报道。这些“爆发出来的叛逆”,正如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所称,“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频繁”,威胁着“既定的秩序和安全”。改革与这种增长并驾齐驱,19世纪80年代开始创立专门针对16岁以下罪犯的少年感化院和工读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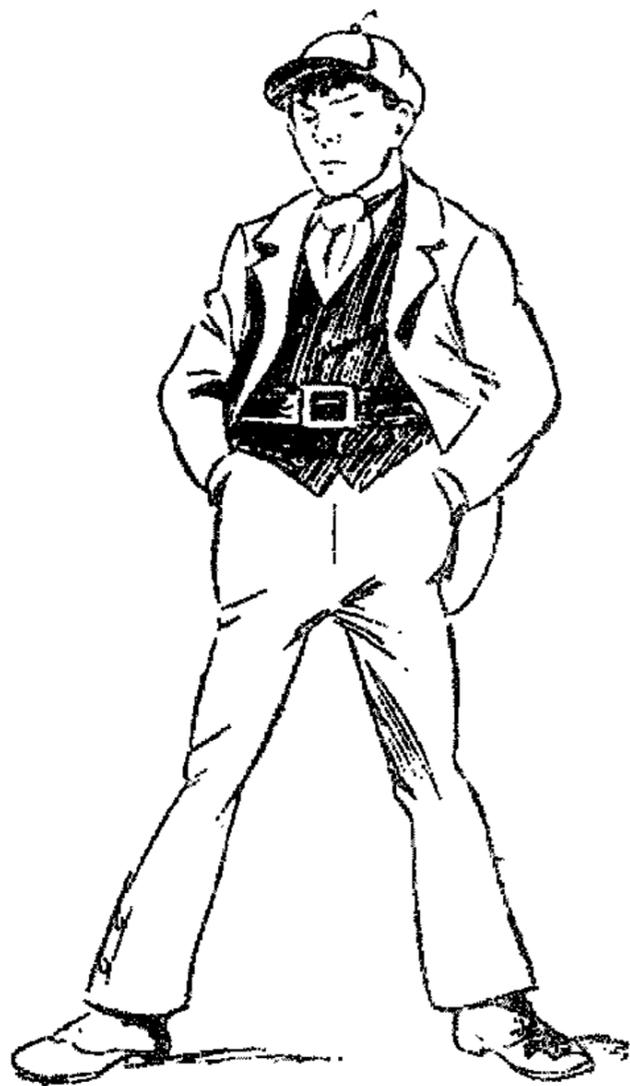
70到80年代,成年人最关注年轻人的问题是教育。对于许多孩子来讲,新的州立学校主张宗教教育、强制性运动和体罚,这使学校变成了战场。1880年的《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尤其不受欢迎,因为它不许11岁以下的儿童进入学校:年龄大些的青年才有权享受教育机会,而这些青年往往也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

法案开始实施得不错:19世纪80年代覆盖率达到60%。然而由于养家糊口比接受教育要重要,逃学成了家常便饭。大量无需技能的工作成了14到18岁人

群的主要经济来源：屠户、家庭佣人、送信男孩、街边小贩。在有限的程度内，这些工作给了这些孩子独立和零花钱，同时，针对这些年轻工薪族的新消费品应运而生：服饰、娱乐、杂志和连环画。

强制入学使得越来越多的儿童能够识字，相应的一个跨阶层的青年读者市场发展起来。长期以来，两种读物互不相让。一种称为“廉价恐怖小说”（penny dreadfuls），它的故事往往都是关于恶棍、谋杀犯、流浪汉、美国印第安人。另一种更为进步的读物，比如《男孩自己的报纸》（*Boy's Own Paper*）（1879）由“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发行。随着讽刺漫画《艾利·斯洛普的半个假期》（*Ally Sloper's Half Holiday*）（1884）的成功，一种新的漫画比如《连环漫画》（*Comic Cuts*）和《薯条》（*Chips*）诞生了，它们的主要受众群体就是受教育者和“半文盲”。

这两份周报以漫画、社会观察、各种流浪汉和高水平插画为主要内容。它们的联合发行量在1890年达到了50万份，促使人们竞相模仿。1893年，《云雀》（*Larks*）杂志创刊号的头版讲的是《波篷街的匪徒》（*Balls Pond Banditti*）的故事，并且用套索、面具和木桩作为标志：在六格漫画中，分别讲述了“新兵登记”、“宣誓效忠”和“会议之争”。那十几岁的帮派成员满嘴脏话、野蛮粗鲁，他们既反映了这个军国主义社会同时也在颠覆它：它们的战争并不是针对外国势力，而是成



“一个羽翼已丰的17岁流氓”，  
选自《每日画报》

人权威。

这些故事,虽然令许多家长震惊,但是却有现成的市场,因为它们反映了青少年读者“喜爱的活动:流连于市井街道、成帮结派、骚扰成人。”出于无聊、绝望、互相鼓励,这些帮派从搞些小破坏到更加恶劣的行为,对于参与者来说只不过是“鬼混”,但对于资产阶级成年人来说却是破坏了“服从这一封建制度中的良好习惯”。他们的孩子却不这样想。

一种新型的市内帮派诞生了。在1890年一次声名狼藉的事件中,曼彻斯特的“斗殴少年”发动了一次涉及500余青年的混战。“斗殴少年”一词最早源于兰开夏郡,“战斗”表示同一社区的两个帮派之间争夺领土的激战。在19世纪90年代,它开始代表一种新的青年风格,有着自己的服装和令人恐惧的用词,这些用词从曼彻斯特(“四十排”、“孟加拉虎”)传到伯明翰(“尖峰时刻”),传到利物浦(“风急浪劲”),再传到东伦敦(“猴子兵团”和“鲍威利男孩”)。

根据当时的报道,“职业斗殴少年”头戴“牧童帽”,穿着“阔脚裤”、脚蹬铜黄色尖头木底鞋,腰间戴着专门定做的刻有花纹的粗大皮带,这些花纹包括蟒蛇、星星和刺穿的心脏。“男孩专家”查尔斯·拉塞尔(Charles Russell)发现曼彻斯特少年的打扮有所变化,戴“一条松松的白色围巾”,头发“服帖地固定在前额”、“用有檐的帽子遮住一只眼”,穿着“水手式喇叭裤”。他的女朋友“通常穿木底鞋、披着长发、穿着竖条纹裙子。”

像拉塞尔这样的评论家试图将斗殴少年纳入年轻人热情向上的传统,但是那段时间的新闻报道讲述的是一个更阴暗的故事。1892年,在曼彻斯特发生了一起轰动社会的谋杀案,主谋是三个16岁的“莱姆大街”帮的成员,他们从背后给了对手一刀。凶手威廉·维兰(William Willan)赤着脚被带出法庭,哭喊着:“哦,大人,可怜可怜我。我只有16岁,我不想死。”暴力行为有时也带有种族歧视:在1897年著名的案件中,一个亚美尼亚移民被“南伦敦”帮杀害。

1898年8月间,这些骚动演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丑闻。那是一个异常炎热的夏天:正如《泰晤士报》(Times)社论里写道的,“难道炎热的天气使那些伦敦的暴徒和流浪汉热血沸腾,使他们变得像南方气候下热情奔放的意大利人或者普岁旺斯人?”8月的银行假日庆祝引发了一场逮捕违反公共秩序的浪潮,伦敦所有酗酒、斗殴、街头抢劫和袭警的人都被逮捕。新闻界感觉到传统的称呼不足以描述他们的特

征,于是给这些人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流氓。〔5〕

这个可能和爱尔兰恶棍胡力根(Hooligan)有关的名称为这一迫切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说法。那个夏天每个帮派冲突都标以此新名称,无论是来自克拉肯威尔的“狮子男孩”或者“手枪帮”,还是“特里鲁街男孩”和“假散男孩”。而这些当事人欣然接受了媒体对他们的评价。在一起广为报道的事件中,“苏莫斯小镇男孩”掀翻了一辆意大利小贩的冰激凌手推车,并且袭击了警察。当他们逃跑时,有人听见他们喊道,“小心流氓。”

英国报纸第一次明确了穿着和流氓之间的联系。《每日画报》(*Daily Graphic*)详细描述了一个“马锡坎”被告在1898年夏的样子:“他的头发剪得紧贴头皮,头顶的一小撮儿垂至前额。”很快,这份报纸又分析了流氓的制服:“他们都系着特别的围巾,帽子很随意的戴着挡住眼睛,裤子的膝盖处很紧而脚踝处又格外松。”

在克拉伦斯·鲁克(Clarence Rook)1899年出版的《流氓之夜》(*The Hooligan Nights*)中,17岁的主人公阿尔夫(Alf)穿着“时刻准备战斗”的制服。在这些人身上,时尚和暴力并存:“脖子上系着有白点的蓝色颈巾,令我印象深刻;身着鲜艳的运动衫。”斗殴少年腰间的“粗大的皮带”不是他唯一的武器:“他把手插入胸前的口袋,小心地环顾四周,然后拔出一把方便实用的刀,放在手上掂量了一下,仿佛是要让自己保持镇定。”

鲁克描述了一种新的城市形象,这种类型和大众熟悉的恶棍形象完全不同。阿尔夫“身高5英尺7英寸。他看起来很阳光、活泼而且结实。从他脸上看到的不是残忍,而是睿智,显示了他高度敏感的天性。眼睛是他最令人过目难忘的特征。它们就像鸟的眼睛一样敏锐,拥有360度的视野;当他生气的时候,眼睛里愤怒的火焰恶魔般熊熊燃烧。”由于“从幼儿时代便不得不面对现实”,阿尔夫冷静、

---

〔5〕 这个术语的真正起源一直是个谜。克拉伦斯·鲁克(Clarence Rook)在1898年将帕特里克·胡力根(Patrick Hooligan)当作帮派的“佛祖”或者“穆罕默德”,并为曾因杀害警察入狱,随后死在狱中的骗子兰贝斯写了一个传记概述:“这个职业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这个男人必须有强有力的个性,别致生动,有魅力,这些使他成为典范……虽然他的个性可能被传奇所掩盖,但是他生活过,死后也必将留下痕迹。”这些话使这篇传记看起来更像是神话故事。在他对此术语的调查中,杰弗里·皮尔森(Geoffrey Pearson)引用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美国“歹徒”(hoodlum)的误用;两个姓胡力汗(Hoolehan)的职业拳击手兄弟;从一个骗子的名字改变而来的——爱德华·胡力先生(Mr. Edward Hooley)——他总是出现在当时报纸的头版头条。

神秘、善变，十分适应当时大都市的困苦生活。

鲁克关于“南伦敦人”(South Londoner)的报道发表于1898年大恐慌的那几个月，这个年轻的帮派由于“流氓传统的制约”而格外稳定。鲁克给大家描绘了这样一幅图像，“这些年轻人走到你身边，随时打算掏你的口袋，洗劫你的房子，甚至如果他觉得不费事的话会在黑暗的角落殴打你。”对于那些抱怨鲁克给犯罪渲染了一层“迷人色彩”的人，鲁克在新闻报道中回应道，“我并不赞成我这个年轻朋友的行为，或者是为他的所作所为道歉。我只是把他的所作所为作为社会现实放在你面前，需要你们处理。”

从流氓和斗殴少年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希望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拉帮结派、争夺领地都成为他们维护自己、追求刺激和摆脱困境的方式。不是所有的成年人都能像鲁克理解阿尔夫一样去理解这些青年。新闻界将这些斗殴少年和流氓妖魔化，并在随后的几年中给了他们应得的惩罚。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记录的，一旦被抓，他们“成群结队地出庭，而且往往受到严酷的惩罚。”

19世纪90年代的新闻界将威胁社会的罪名集中指向流氓，但这只不过是透过扭曲的视角反映了统治者的价值观。克拉伦斯·鲁克笔下的这个青年英雄痛打了女友，觉得外国人是“一类”应该受到“鄙夷的人”。虽然阿尔夫觉得警察可能是天敌，他仍然觉得警察“既然是在玩游戏，就有权得到公平的待遇。”最后他总结说，“只要他还在玩这场游戏，你们就不能杀他，这个游戏的筹码不是生命。”

然而流氓引起的种种丑闻加速了英国针对流氓的制度改革。但是布思将军(General Booth)的救世军教义(Salvationist doctrine)将大批的贫民窟体力劳动者组成殖民团，并不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到了世纪末，这个问题变得格外紧迫，人们甚至从虚构的阿尔夫身上探寻专业的指导。他的意见是，抓住“青年罪犯”后：“帮助他，使他与以前的生活划清界限。教给他一种技能，使他成为水手、士兵、木匠或砖瓦匠，总之是任何一切能使他得到工作并且有稳定收入的职业技能。”

\* \* \*

那个流氓大行其道的夏天过去了。两年后，另一种新的少年暴徒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全国舞台。1900年12月，一个名叫亨利·费里耶(Henry Fourquier)的记者在《早报》(*Le Matin*)中讽刺说，巴黎幸运地拥有一群暴徒“阿帕切”，他们离开了落基山脉来到了巴黎一个特别肮脏的地区。他称那群暴徒为半游牧青年，这

群人没有父母管教,他们很容易就形成了警察所称的“犯罪军团”。

作为最新的城市恶势力帮派,“阿帕切”暴徒在1900年夏天第一次见报,他们的名字都惊悚而华丽,比如“钢铁之心”(Les Coeurs d'Acier)、“贵族”(Les Aristos)和“里福”(Les Riffaudes)。尽管这些名称都来历不明,但是根据犯罪历史学家克劳德·迪布瓦(Claude Dubois)的研究,这和法国人迷恋美国印第安文化和美国文化有关,这种迷恋始于詹姆斯·芬尼莫尔·库珀(James Fenimore Cooper)1826年的小说《最后的莫希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到了19世纪60年代,“红皮肤”一词已经被用来形容比较嚣张的巴黎黑社会中的年轻人。

奢靡的服饰使得“阿帕切”引人注目。他们常常穿着黑色的夹克,用一件彩色衬衫打底,有时系着一条软绸围巾。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穿着“腹痛”裤。这种裤子由毡布制成,上面的观赏型口袋大得让人们以为他们有严重的胃胀毛病。最有代表性的是他们的尖顶圆帽、文身和资产阶级傲慢的嘲讽气质。

在1901年冬天之前,“阿帕切”还只是一个地方问题。然而,轰动一时的乔瑟夫·普莱奥(Joseph Pleigneur)(又叫曼达)(a. k. a. Manda)行刺多米尼克·莱卡(Dominique Leca)一案,使这种新型犯罪组织臭名远扬。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曼达和莱卡都是巴黎拉皮条的,事情起因于一个年轻的妓女艾米莉·海莉(Amelie Helie),人称“金头盔”(Casque d'Or),这个女人既是他们两人的女朋友,又同时受雇于他们。巴黎记者来到镇上调查报道这起案件,虽然“阿帕切”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是他们依然卷入了这场黑帮丑闻当中。

1902年的前几个月中,这些城市里的野蛮人几乎每天出现在《晨报》(*Le Matin*)、《日报》(*Le Journal*)这些发行量超过100万的日报上。人们用“巴黎阿帕切”来形容这些犯了错误的少年。“阿帕切”的同类在蒙玛特尔的社团中迅速增长,他们使用混杂印度语的语言:“金头盔和阿曼达,第三者莱卡,阿帕切。”在5月末曼达一案开庭时,这个事件就像一场马戏,艾米莉·海莉在庭上叫喊着:“阿帕切!莫希干!金头盔!这都是记者的发明。我们互相之间称伙伴。”〔6〕

就像流氓一样,“阿帕切”也是一个媒体的产物,把一小部分法国年轻人的犯罪活动扩大为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然而这次骚动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曼达和莱卡一起被驱逐流放到法国殖民地圭亚那,并且永远不得回国,他们所代

〔6〕“这些全是记者的杜撰,我们称自己伙伴。”

表的新风尚已经由市内蔓延到市郊,由没有公民权利的城市穷人蔓延到叛逆的青年工人。在新闻界看来是丑闻的东西,对于叛逆的青年人来说却是集结号。

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生动地描述典型“阿帕切”的样子:“他是一个18到20岁的年轻男子,群居于城中。他是城里的年轻工人,一般都住在巴黎的边缘地带,他所在的帮派或组织以所在社区命名,他与家人不和。他拒绝付薪的工作,不承认父母的无产阶级地位,也不想‘穷困潦倒’。”工厂和贫穷是他的噩梦,他的消费欲沟壑难填。他总是游手好闲游荡在大街小巷,作为来自巴黎边缘地带的年轻人,他渴望来到城市的中心。

他穿着得体,打着丝绸围巾,戴着帽子,最重要的是,鞋保养得很好。由于看上去非常幽雅,市郊的工人认为他太过女人气。他时刻准备好登上汽车,拥有一辆汽车是他最大的梦想。阿帕切梦想着郊游、交友、恋爱,他喜欢跳舞和姑娘。在阿帕切的团伙里,女人的地位非常暧昧,她们拥有自由——如果她们对男人觉得不满可以随意更换——但同时她们要顺从男人。男人为女人打架,女人为男人卖身——那些男人通常都是皮条客。

钱能解决问题,但光有钱还不够。在求偶时魅力非常重要。阿帕切多愁善感,他精通世故,富有荣誉感,具有高雅品味。他不肯听天由命,期待自己有朝一日成名。作为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盗窃是公平的补偿,他在资产阶级身上“恢复自我”,那些人只是落入他掌中的“蠢货”。在建于1898年的巴黎大监狱里服刑,几乎成了他的成年礼。

正如流氓丑闻一样,阿帕切时代的到来为法律和制度的拥护者们提供了对付“惩处危机”的机会。青少年犯罪的上升速度触目惊心,除了使用鞭刑及其他肉体刑法来对付他们别无他法。他们甚至请求在法国重新启用死刑。在“金头盔”案发后的10年里,阿帕切从一个特殊群体的称呼变成了一个常用的名称——就像流氓一样——可以指任何一类暴徒或者小罪犯。

关于阿帕切的宣传目的虽然旨在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意识,并制定解决方案,但是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中,对英国、美国以及欧洲青少年犯罪的宣传却起到了一种暧昧的作用。从记者的角度来看,青少年犯罪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新现象,虽然不一定会引发战争,但这种现象把矛头直接指向社会的中心。不论站在什么立场,可以选择的解决方案要么是改善城市条件,要么将他们发配充军,甚至,更有效的办法是将他们遣送到最黑暗的殖民地角落。

## 4

### “忽见天堂”

L. 弗兰克·鲍姆和《绿野仙踪》

白天的某个思绪可能会让你在梦中扮演企业家的角色；但正如人们所说的，企业家虽有想法和计划来付诸实施，如果没有资本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他需要一位资本家来支持各项费用，这个负责提供费用的资本家之所以这样做毫无疑问是源于潜意识的某个愿望——不管他之前白天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1900)



安娜·罗琳(Anna Laughlin)在音乐剧《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饰演的桃乐茜,1902年

1893年夏,海伦·凯勒(Helen Keller)参加了世界哥伦布博览会。这场在芝加哥近郊举办的商品博览会,是为了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400周年。她回忆道“那些日子伴随着纯粹的欢愉,数以千计的天真梦想都化为美丽的现实。每天我在幻想中环游世界,我在地球的另一端看到了各种奇迹——神奇的发明、工业宝藏和技术,以及人类生活的各种活动。”

在镀金时代的美国,年轻人总是与幻想、白日梦和商业化的幻境联系在一起。海伦·凯勒在更高的程度上体现了这一联系:丧失了听力、说话能力和视力,她封闭在自己的感官世界中,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依赖于自己的想象。19世纪90年代,由于她勇敢地克服了这些困境,成为当时美国最知名的年轻人:她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并且与电话的发明人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Dr. Alexander Graham Bell)成为朋友。

这次访问博览会成了她生命中的一次重大事件。由于“亲身感受到博览会的盛况”,海伦非常激动,“这个坐落在西部的白城〔1〕仿佛是一个可以触摸的万花筒。每一样东西都令我深深着迷,尤其是法国的青铜器,它们如此栩栩如生,使我禁不住以为艺术家看到了天使的模样并把它用世俗的形状保留下来。”她的兴奋引起了其他年轻观赏者的共鸣,各式各样的陈列品使他们眼花缭乱,展览同时还出售纪念品、爆米花、汉堡包和苏打水。对他们来说“这仿若忽见天堂。”

芝加哥博览会上有来自50个国家的5万个参展者,无论从规模还是范围上来讲都是空前盛大。1893年,从5月初到10月末,美国当时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人都来参观了这个展览会。这个事件为当时的美洲大陆认识自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以前的任何事件都没有做到的。最重要的是,这是美国面向国际的一次开放,他的工业、文化以及对生活方式的认识都开始与欧洲相抗衡。根据旅游者和日记作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所描述的,这是“有史以来美国第

---

〔1〕 指博览会会场。

一次作为一个整体来表达思想。”

由于其银白色的外表、古典艺术建筑风格以及占地 633 英亩的宏大规模,杰克逊公园犹如一场舞台幻象,它拥有仅仅通过意志力就可以改造现实的力量。对一些欧洲人来说,它就像是幻觉:一名德国游客谈起这件事时说几乎不敢闭上眼睛,因为他怕这一切将会“像梦境一样消失。”大多数美国人都有相同的惊讶感。正如亨利·亚当斯所回忆的,“这里出现了一个断层——将连续的历史切断了!这一切是真实的,还是仅仅是一场幻象?”

1893 年博览会后,美国不仅证明了它不可思议的雄厚经济和技术实力,而且还让人们看到它从一无所有中实现梦想的能力。在这场造梦的把戏中,年轻人的天真无邪看似无足轻重,然而事实上正是这种天真无邪为它注入了活力。这也是美国把自己标榜为一个年轻国家的关键所在。在这样一片渴求快乐的土地上,青春的热情被奉为全国人民的信条。

\* \* \*

在 2700 万博览会参观者中,有一名来自芝加哥《晚间邮报》(*Evening Post*)的 37 岁的记者,他就是 L. 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在 1893 年之前,他已经从事过很多种职业了,例如剧作家、戏院主、商店老板。2 年前,他与妻子及 4 个孩子从南达科他荒原移居至芝加哥。白城一经开放,鲍姆就数次前去参观。他十分喜欢这些奇思妙想和童趣,这座墙内的城市让他眼花缭乱了,“每个人看起来都如此的幸福和满足,宛若太平盛世。”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 W. W. 丹斯洛(W. W. Denselow)的年轻插画家正忙于捕捉博览会上的奇光异景:“这个东西如此巨大,说它让人晕眩是毫不夸张的”,如迈克尔·海恩(Michael Hearn)所说的,“丹斯洛几乎每天都泡在白城的博览会里,为《芝加哥先驱报》(*Chicago Herald*)画场景和人物。”使丹斯洛着迷的还有那些纪念碑般的建筑物,它们包罗万象却又转瞬即逝:“当我得知这个场地只打算用 6 个月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当一切结束时,这将是多么壮观的废墟啊。”

这两人不约而同地将这份记忆封存起来,以便今后再派用场。出于对通神论整个宗教信义的浓厚兴趣,鲍姆敏锐地察觉到“我们的天性渴望揭示一切神奇的事物,我们寻求着一些答案,用来解释自然界和生活中不能解释的东西,即使那些答案是虚构的。”10 年后,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种新的才能,做一名作家:1897

年,在出版了《鹅妈妈童谣》(*Mother Goose in Prose*)之后,他决定写一种新的儿童故事,并试图在这个故事中捕捉美国历史中的关键时刻。

1899年11月,年度最畅销儿童读物《鹅爸爸》(*Father Goose*)的发行团队向出版商乔治·M. 希尔(George M. Hill)介绍了他们的下一个企划案。鲍姆着手写作《绿宝石城》(*The Emerald City*),并由丹斯洛配插画。第二年8月,这本书以《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之名出版,他们选用了24K的彩色铜版纸和100多幅插画,并设计了一个醒目的红绿相间的封面。第一版发行后才2周就已经全部售空。它很快就成为了1900年圣诞节前后最畅销的儿童读物。

书中的“奥兹国”(Oz)是为了与传统文化决裂而存在的。鲍姆在序言中写到,“现代教育往往包括道德教育,因此现代的孩子可以追寻乐趣的唯一去处是那些奇妙的童话故事。在那里,他们可以忘却所有不愉快的往事。正因为想到这些,我才写了《绿野仙踪》这样一个纯粹为了让今天的孩子们高兴的故事。我希望它能成为一个现代童话,在这个童话中,到处是惊奇与喜悦,没有伤心与噩梦。”这是一个美国式的故事,充满了“激动人心的冒险”、“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精彩绝伦的逃脱”。

为了超越“陈旧的童话故事”,鲍姆把故事安排在19世纪末的美国:堪萨斯州的“巨大灰色草原”,陷入了农业萧条期。故事一开头桃乐茜是一个孤儿,与叔叔阿姨住在一起。小狗托托是她生命里最大的快乐。然而她们的农场突然遭遇了龙卷风的袭击,桃乐茜“突然被卷走,离开了自己的国家,置身于一片陌生土地之中。”奥兹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拥有浓重的色彩、矮小的居民、拟人化的动物和法术高强的巫师:故事情节便以魔法和变化为中心展开叙述。

然而这篇幻想的土地却根植于美国的现实。正如堪萨斯州灰色的大草原是取材于鲍姆生活过的贫瘠的南达科他州,这本书最初的名字《绿宝石城》的灵感则来源于1893年白城博览会。博览会上那些奇思妙想的建筑物给丹斯洛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原版的《绿野仙踪》中配有标题插画,画中有翠绿色的塔尖和屋顶,这些房屋的唯一入口犹如一张长了翡翠绿宝石眼睛的脸,从画中我们还可以看见由圆屋顶和塔尖构成的城市天际线。

鲍姆对城市的描述加强了这种与现实的联系,熙熙攘攘的商店卖着“绿色的糖果和绿色的爆米花”,人们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幻想是一种悟性:正如巫师最后所承认的那样,“我命令善良的人们创建了这座城市和我的宫殿,仅仅是为了自娱

自乐,同时不让他们闲着:他们心甘情愿地做着,而且做得非常好。于是我想,这座城市既然如此青翠和美丽,我不如就叫它‘绿宝石城’。为了让这个更加名副其实,我让他们每个人都戴上绿色的眼镜,这样,他们看到的一切就都是绿色的了。”

《绿野仙踪》不但立刻就吸引了孩子们,而且还由于它在心理分析上的深度吸引了成年人。那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也刚刚出版了几个月,它为鲍姆的童话故事提供了强有力的阐释: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是一个典型的理想国,“这些愉快经历传达出的愉悦感受最终会转化成焦虑。”尽管鲍姆宣称他的故事会摒弃欧洲古老民间故事中可怕邪恶的部分,然而奥兹国依然充满了欺诈、离别,并弥漫着恐惧。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人类对性和破坏的原始欲望与有意识的自我控制之间发生冲突的产物,是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矛盾。“既然我们的思想在白天时会有意识地否定各种可能性——判断、推理、拒绝、期望、意图等等——为什么到了晚上我们的思想就一定只能受到愿望的限制呢?事实上,不可胜数的梦境不都可以告诉我们除了愿望,还有很多其他的精神行为吗?例如忧虑也可以转变为梦境。

因此,梦境不是凭空的幻想而是现代文明压抑下的一种心理迹象。“那些曾经在人们醒着的状态下控制他们行为的东西现在似乎已经被放逐于黑夜——正如原始武器弓箭,已经被成年男子放弃使用,但是却出现在幼儿园里。”无论如何,这里的关键词是“似乎”。弗洛伊德对各种病症的探讨表明,这种返祖现象远远没有得到根除;事实上,这种现象还可能随时大规模爆发。

“潜意识才是真正的心理现实,”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道。他得出的这个结论可以得到广泛应用。《绿野仙踪》和《梦的解析》出版时,都恰逢美国商业活动正在积极寻求给潜意识驱动力和幻想提供一种物质表现形式,更确切地说是商业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服务于物质主义竞争下的经济社会新秩序,这是1899年芝加哥社会学家索尔斯坦·维布伦在《有闲阶级理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一书中提出的,他称之为“炫耀性消费”。

\* \* \*

在19世纪末,公众对印刷出版物的需求迅速增加,无论这些出版物是书籍、杂志、报纸或者是广告。图片和语言文字成为都市新风景线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大众心理的主要成分。古斯塔夫·勒庞曾经警告过,“人们借助图形进

行思考,一幅图片又会让人联想到其他一系列的图片,而这些图片与第一幅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这种情形其实很容易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脑子里的一个念头会让我们联想到一连串其他的想法。

图片形象正是清教教义所批判的,而大量图片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建立的宗教信仰正逐渐衰退,并被一种全新的世俗的信仰所代替。19世纪90年代,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革。T. J. 杰克森·里尔斯(T. J. Jackson Lears)和理查德·怀特曼·福克斯(Richard Wightman Fox)总结说“这是一场从新教教义中来世的拯救到现世自我实现的转变。”在这种新道德中,自我牺牲和超凡脱俗的旧观念被一种“自我认同和及时行乐的新观念”所替代。

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站稳脚跟。在物质主义的浪潮中,国内移民为了逃离衰败的乡村经济而离开家园,第二代移民摆脱了束缚他们父母的欧洲社会,他们的体验和欲望都是至关重要的。1893年的白城再一次肯定了美国在表演能力、公开展示、积累财富和及时行乐这些方面的天分:一种新型的富有想象力的幻想被提升到一个国家运作方式的高度,这将原本互不相干的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

梦想可以实现经济信条满足迫切的需求,梦想成为美国的特征。幻想变成了金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主题公园、活动电影放映机、街头小报、畅销书籍和乐谱,人们可以在百货公司找到各种各样的消费品或通过目录邮购。所有这些新产品给人们提供了一条走出现实窘迫生活的捷径,同时也是对他们失去自由的一种安抚,它们代表了大都市的生活方式。人们通过消费寻求救赎:你在自己的消费品中找到自己,你花钱去买自己的梦想。

感谢伟大的马戏团节目演出经理人兼魔术师 P. T. 巴纳姆(P. T. Barnum),他创造了这一让人无法抗拒的产品,并因此稳固地奠定了自己美国天才的地位。然而在这个世纪之交,广告商开始联手新的电影和影印技术,并结合新的心理学进一步地探询人们潜意识和有意识的欲望。在这种风气的背后是人们对身份的态度,这种态度反映出许多美国人和过去一刀两断的经历:身份不是简单而一成不变的,它是变化的、受到社会的影响——它不仅具有个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

维多利亚时代物资稀缺,那时人们崇尚勤俭和谨慎,而现在人们颂扬物质繁荣。美国人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专利药品,并宣称自己可以医治地球上任何一种疾病:“所有神经失调、脾气暴躁、食欲不振或者身体虚弱。”蛇油或印第安秘方只是

越来越多的主流广告早期的版本,这些广告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推广自己的产品,这些产品用“精力充沛”的字眼来吸引一个崇尚健康与活力的国家。

这种新的活力论认定未来会更加富足而非贫瘠,它认为在人们变化的身份里会不断拥有新的能量,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是人们的终极目标,高效快速是生活的基调。这非常适合在人口密度高并且风格前卫的都市环境中打造一种新的美国观念,例如芝加哥的商务区卢普(Loop)。<sup>[2]</sup>对于欧洲人来说,时间意味着事件的更替,是过去到未来的流动,而对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来说,时间意味着此时此刻,是每一个“现在时”的无限延伸!

在这场人造旋风中,年轻人拥有过人的智慧和充沛的体力,势必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事实上,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称为生命论的重要组成部分(*élan vital*)就是青春的魅力,如果说健康是美国社会的追求,那么得天独厚拥有健康的年轻人就成了各种年龄段人群最喜欢的形象。在20世纪的头10年里,在被维布伦定义为“金钱竞赛”的氛围中,广告商纷纷启用中上层阶级的大学生来促销时装成衣及运动货品。

妇女在这场尊重自我的新式风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被确定为“妇女的领地”,于是,家里的“女主人”决定着大多数的家庭消费大权。白领工作的普及给妇女提供了就业自由,这在欧洲依旧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广告商开始使用年轻有吸引力的女性出售化妆品、衣服和煤气灶。在世纪之交,在桂格燕麦片(Quaker Oats)的推广活动中,宣传画上是一个健美的女子和一句广告语,“滋补调理,拒绝衰老。”

\* \* \*

美国活力论梦幻经济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新兴的音乐产业。1892年,继查尔斯·K·哈里斯(Charles K. Harris)的百万销量单曲《舞会之后》(*After the Ball*)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之后,“廷潘小巷”(Tin Pan Alley)类型的流行音乐蓬勃发展:仅1900

---

[2] 见1891年美国作家查尔斯·金(Charles King)对卢普区的描写:“抵抗、冲突、冲过去拣起被行人踏在脚下的帽子;街头的车祸,阻塞的交通,皮鞭抽打着马匹,夸夸其谈的警察,恶语相加的司机,俚语、粗话、喧嚣骚动、人声嘈杂、震耳欲聋……哐啷、哐啷、哐啷。‘你在挤谁?’哐啷啷、砰砰砰。叫骂、吵嚷,愤怒的锣鼓声。快跑,喧嚣。嘿!嘿!小心!小心!砰砰,哐啷。小心看路!急转弯。”这些句子读起来就好像是20年后的未来派艺术家的作品。

年就卖出了 20 亿份乐谱副本。流行音乐成为美国新的标志之一。在这种风格的音乐中,音乐能力与热烈的情绪表达和兴奋的节奏相比显得并不重要。如同它所宣传的那样,美国流行音乐很好地体现了美国一贯秉承的“有主见、激进的民主政治。”

流行歌曲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大力的宣传:为了能在当时正在热映的电影《唐人街之行》(*A Trip to Chinatown*)中插播《舞会之后》,查尔斯·K. 哈里斯个人支付了其所有费用。在一本名为《如何创作流行歌曲》(*How to Write a Popular Song*)的小册子中,他建议他的读者“看看报纸以获取写作灵感”,“使自己紧随时尚潮流”,还要“学会版权法”。流行歌曲行业将新移民和中下层阶级的孩子们作为主要受众群,他们敢于宣泄情绪并且感情用事,很容易对这样的音乐产生共鸣。

然而对于许多青年人来说,像《舞会之后》这种伤感的音乐不值得他们购买。他们需要一些可以更好表达激情的东西,于是他们在已经出现的一种新音乐形式中寻找这种东西,虽然这种音乐仍然被音乐界所忽视。在史蒂芬·克莱恩的小说《街头女郎梅姬》中,女主角和他的流氓男友去城里的一家酒吧,在那里“乐队演奏着黑人灵歌,一个灵活的鼓手在一打击器上拍打、敲击甚至抓挠,使它们发出噪音。”这种随意的音乐让“这个女孩如痴如醉。”

流行音乐为黑人打开了一扇进入美国社会的大门。尽管布克·塔·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他曾经于 1901 年在白宫被西奥多·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接见)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黑人的生活依旧艰辛。据统计滥用私刑——在 19 世纪 90 年代每年至少发生 100 起——只是冰山一角。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传记作者詹姆斯·林肯·克里尔(James Lincoln Collier)写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未来也不期待未来,在他们的前方,除了苦工、贫穷、疾病、死亡,什么都没有。一种‘及时行乐’〔3〕(*carpe diem*)的人生观成了这种情况下最明智的选择。”

红灯区遍布美国,诸如芝加哥、圣路易斯、堪萨斯、新奥尔良,在那里人们只追逐享乐和一时的刺激。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里,这些地区的扩展为大量旅行音乐家提供了正规的职业。在酒吧和俱乐部里演奏成为年轻黑人男女的谋生之道。〔4〕流

〔3〕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注

〔4〕 参见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和杰利·罗·莫顿(Jelly Roll Morton)的回忆录。

浪歌手的流行使更多的美国公众开始喜欢黑人音乐,那时已经是19世纪90年代末,人们开始摒弃造作的东西。

1898年,拉格泰姆音乐引发了全国性的热潮。这是一种将乡村酒吧音乐不连贯的节奏与经典的四分之二拍约翰·菲利普·苏泽(John Philip Sousa)进行曲相结合的音乐,它使舞蹈(这种新的舞步叫做踢踏舞)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时尚、甚至是语言。正如一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习惯了拉格泰姆的节奏,踏着它的拍子我才能行走/伴着拉格泰姆入睡,它的旋律我随处都能感受/拉格泰姆的烦恼和拉格泰姆的老婆/我就是为拉格泰姆而活着。”在双手切分音的节奏中,人们用新生事物打败了陈腐的东西,这种音乐因此而赶上了一个大陆辞旧迎新的热潮。

拉格泰姆音乐也曾在1893年的博览会上演奏过,不过不是在围墙内的城中,而是在它外面附近的低档小酒馆。一个乐队的白人领队在1897年首次发行了拉格泰姆音乐,此后,越来越多的黑人音乐家出版了自己的专辑。在这些专辑中,最出色而且销量最好的要属斯科特·乔普林(Scott Joplin)1899年发行的《槭树叶散拍乐》(*Maple Leaf Rag*)。对比鲜明的节奏和催眠般的曲调使拉格泰姆音乐迅速红遍了各个阶级和种族。在一张1903年拍的照片上,我们看到乔普林在白人舞会上演出,那些年轻人“疯狂地热爱他,当演出结束时,他们叫喊着他的名字,希望他们在他们跳舞的时候能演奏一曲。”

然而在向主流社会宣传这种不入流的形式时,人们面临着一个令人尴尬的取舍。年轻的白人爵士乐迷为了描述这种狂野,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汇“火爆”,它代表着性感、迷人的着装,最重要的是那一瞬间充分的刺激感。与此同时,一个害怕种族通婚的文化机构被这种音乐激怒了,他们将拉格泰姆音乐怒斥为“致命的毒药,犹如疟疾般的传染病,伺机入侵家庭和年轻人的大脑,让人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还头脑清醒。”

问题是,美国人不得不认真履行他们在宪法中的承诺。如果这是一个信奉平等的国家,而且事实上如果流行音乐真正能代表人们,那么它应该适用于所有人,不管这些人是何种信仰、国籍或种族。美国流行艺术的大力宣传十分具有说服力,这也意味着,人们将义无反顾地追寻解放和自由,这种追求不仅仅限于黑人,也将波及到其他群体,他们中的年轻人开始认识自己。

\* \* \*

虽然美国人天才的表演技能刺激了流行文化,但它同时也掩盖了一些迫切的社会问题。1893年的博览会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这座白城在它的姐妹城的衬托下熠熠生辉,而沿湖岸向下仅仅几英里之遥,它的姐妹城则是一座巨大的黑色城市。在博览会之前,芝加哥的面积在10年内扩大了一倍。虽然它是高楼、电梯和流水线这些新生事物的大熔炉,它的身上也留下了无限扩张的种种创伤。芝加哥的空气污染严重,散发出牲口棚的臭气,它的肮脏以及后现代化都已经超过了曼哈顿。

城市里的大部分新人口是移民:父母出生于美国以外的孩子占总人口的78%——其中包括意大利人、德国人和东欧人。大多数新居民的生活条件都非常恶劣,他们离开欧洲来到这座新的城市,适应新生活的压力沉甸甸地压在了这些新移民子女的身上。第二代美国人夹在两个大陆之间,他们本能地渴望挣脱社会工作者兼作家简·亚当斯(Jane Addams)所说的“旧世界习俗”的束缚,但是他们的父母无法帮助他们成为有自主权的公民。

这些孩子除了美国对其他东西一无所知,而他们的父母总是在追忆那个已经离开的国家,几乎一点儿不会说英语,这样的子女和父母之间必然存在隔阂,而青春期的到来又加深了这种隔阂。所以,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做事情。这种拒绝身边熟悉的人帮助的做法引起了亚当斯的关注,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她开始对自己接触的那些苦恼的芝加哥青年人进行记录,“工业主义让来自世界各地的大批年轻人聚集起来,”她写道,但是社会无法满足他们更深的需求。

作为美国第一代从大学毕业的女性,亚当斯没有从事在那个时代女性通常会选择的医疗、教育和传教的职业,而是去了伦敦,拜访了“汤恩比馆”,并且被其宣传的热情所感染。回到美国,亚当斯在一个以移民为主的社区创建了“赫尔大厦”(Hull House),其目的在于教会这个社区的女性一些实用技能和审美能力以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虽然她最初的重心是文化问题,但是芝加哥的状况使亚当斯很快就与城市的严重社会问题正面交锋。

她发现,青年人从14岁或者更小就开始工作,这加剧了青春期少年缺乏教育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这座城市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工厂,”她这样写道,“就好像工业的地位已经超越了一切教育以及社会工作。”贫瘠肮脏的工作环境给年轻人“天真的喜悦”泼了一桶冷水,开始让他们感到孤独或者空虚。史蒂芬·克

莱恩在描述吉米时这样说：“一段时间后，他开始蔑视眼前的一切，他变得如此尖刻，以至于不能相信任何事情。”

然而，工资也给了这些年轻人自由，他们“把钱花在某些恶习上，他们故意这样做以假装自己很快乐”。年轻是一个“困难”时期，不管在哪里都是如此。亚当斯出版了一本题为《青年精神和城市街道》(*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的文集，她在文中写到，“有时候，这座伟大的城市使人觉得它是在故意自残。”在这样一个大都市里，人们开始通过寻欢作乐和工业生产来衡量自己，青年人对刺激的不懈追求更加高涨，甚至有点过激。

没有灵魂的酒吧和巨大的舞厅散发着孤独的气息，芝加哥内城区的灯红酒绿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广告宣传取代了价值。“新觉醒的意识只对一切华丽的、感官的东西感兴趣，”亚当斯写道，“轻浮的街头音乐、色彩浓重的电影海报、无聊的爱情故事、插着羽毛的帽子、当铺橱窗里花里胡哨的廉价左轮手枪。这种状况并没有应有的关注，其结果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在某些情况下，城市青年“白热化的想象”将他们带进更危险的领域。亚当斯评论道，“这种对刺激的热爱，希望跳出单调生活的渴望，诱使男孩子们尝试酗酒与吸毒。这种诱惑力甚至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可卡因尤其刺激了“对梦境和幻觉的向往”。一个瘾君子对她说过，“在他的梦里，他看到了铺满黄金、白银和钱币的大房间，用来做墙纸的是花花绿绿的钞票，他用桶把这些钱财尽可能地运走。”

毒品是美国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使毒品成为人们理想补药的国家必须具有迅猛增长的经济。内战使吗啡成为全国普遍使用的毒品，而中国移民把鸦片带入了内地城市。可卡因是穷人的毒品，是妓女、流氓和贫民窟孩子的专用品。它既有刺激作用又有镇定作用，能让人精神振奋，让人感觉不到任何痛苦，这种毒品最适合他们所处的严酷环境。〔5〕

然而，吸毒现象并没有被视为这一代人主要的意识形态，它只是城市享乐文

---

〔5〕 根据赫伯特·阿斯伯里(Herbert Ashury)的记录，在世纪之交曾经有一个叫做“哈德逊除尘器”的帮派尤其受到新闻界的宠爱。他们的名声直接来自于他们的毒品消费：“虽然他们从来都不曾是‘伊士曼’、‘五只猎犬’和‘北美地鼠’的对手，但是他们依旧是一群少见的恶棍，而且他们名副其实。大概90%的‘哈德逊除尘器’成员都是瘾君子，而且在可卡因的作用下，他们变得凶险异常。因为毒品使他们神志不清，不再顾及普通刑罚，而且变得非常勇敢和残暴，虽然可能只是一时的假象。”

化的一部分,偷偷地附着在美国价值观上。亚当斯的线人所描绘的物质主义景象与当时的一首民歌《哭泣者威利》(*Willie the Weeper*)中的人造天堂非常相符,这仿佛是忽必烈在用新世界的语言歌唱:“红宝石丛林和钻石矿,翡翠树和蓝宝石藤蔓,数以百计的铁路绵延不绝,价值连城的煤炭堆积如山。”

虽然吸毒现象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但是这种违法的爱好的确反映了美国人对专利药品的迷恋。在19世纪90年代初,以可卡因为原料的软饮料可口可乐打出提神醒脑的促销口号。与此同时,非处方药比如雷诺的花粉病退烧药和粘膜炎特效药配在一起就是几乎百分之百的纯可卡因。不知情的消费者受了骗:“它毁了我儿子!”一位父亲在给美国化学总局当权者的信中写道,“我的儿子一直在用它,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一直试图帮他戒掉。但是只要他还能买到,我们的努力就毫无成效。”

这些强劲的药物不亚于美国大都市刺激异常的环境,使新大陆的人们更加追求各种各样的梦想。同时,过量用药进一步缩短了这些年轻流氓们的寿命,尽管他们的寿命已经因为贫穷和固有的危险生活方式变得很短了。由于可卡因可以带来更多快感,它比吗啡更难戒掉。可卡因使用者毒瘾发作时一刻不能等,这使得许多青年罪犯成为这种毒品最热切的消费者,同时也使他们永远停下了成长的脚步。

这种及时行乐的理念在当时跨越了阶级和市场。19世纪50年代的纽约市区弥漫着一种波希米亚情绪,这种情绪的始作俑者是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94年,乔治·杜·毛瑞埃尔(*George du Maurier*)的小说《特里尔比》(*Tilby*)取得空前成功,小说中出现的香肠、冰激凌、雪茄以及书中那顶著名的帽子,使波西米亚主义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尤其吸引了年轻的女性,根据卢克·桑提(*Luc Sante*)的描述,她们“从中获得勇气,封自己为艺术家或单身贵族女孩,她们一边抽烟,一边啜饮吉安蒂红葡萄酒。”

波西米亚代表了一种新贵族,他们的地位不由出身决定,而是由才能和名气来决定。这也是《特里尔比》和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畅销书《嘉莉妹妹》的主题。然而在这些道德说教的小说中,有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他们脱离了赋予他们才能的环境,多年的贫困和挣扎让他们遍体鳞伤。杜·毛瑞埃尔描写的特里尔比由于痴迷于明星梦而少年早熟,她注定像少年维特一样遭遇少年早逝的厄运。她生命的火焰燃烧得过于热烈,结果只能葬身火海。

与此同时,美国的大众消费削弱了这些极端的生活方式并使这些生活方式普及开来。“前卫的波西米亚主义夸大了生活在极端情况下的魅力”,杰克森·里

尔斯评论道，“在社会各个阶层，新生‘休闲产业’的领袖们非常了解人们对刺激生活的渴望。他们建造酒店和游乐场，把快乐商品化；他们竭力迎合焦虑的商人和厌倦生活的女店员；他们把移民和白人新教徒变成大众潮流的追逐者。云霄飞车、脱衣舞女和肚皮舞女孩都可以帮助人们暂时忘却现实的烦恼。”

在这种寻欢作乐的氛围之外有一种回流不容忽视。刺激的生活也许充满活力和浪漫，但却不会长久。要把不断扩大的娱乐产业的价值观和穷人的价值观联系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型媒体鼓励只顾眼前的做法，宣传那些孩子和青少年才会采取的解决方案，他们让孩子的本能冲动异常活跃。他们对大众的控制方法虽然很有吸引力，但却缺乏稳定性。

这个大都市接纳了千千万万来自美国农村和欧洲社会的移民。他们逃离了死气沉沉的大草原甚至是更差的地方，到这里来寻求另一种生活，不再为了生存而挣扎。然而，想要完全成为这个围墙内的公民，他们不但要克服暴力和麻醉剂所带来的死亡的威胁，还要和城市掌权者同流合污。面对这些诱惑和危险，他们发现他们生活的世界如此神奇，简直不亚于魔术师的把戏。

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摘掉翡翠色的眼镜，但是，正如鲍姆充分领会到的，骗子必须了解对手的梦想和欲望才能成功，那个时候假的就会变成真的。鲍姆将他的书取名为《绿野仙踪》并非偶然。尽管他书中的主要角色是个骗子，但是他也能够代表这片新的土地，在他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精神：“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要为自己得到的东西有所付出。”事实上，魔术师是个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我只是一个普通人”——魔术师的角色让我们认识了新资本家的形象：媒体业巨头。

20世纪，人们渴望神话，奥兹国并非第一个，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却是最经久不衰的一个。它与《梦的解析》一起出现在西方认识青年人的关键时刻。欲望开始进入儿童的世界，弗洛伊德开启了一个儿童性意识的隐蔽地带，这种意识往往是与青春期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一直是家庭中神秘的禁忌。

奥兹国表面上的纯真代表了美国人心中仍然保留下来的孩子般的好奇感，但是这种纯真慢慢地隐退成一种复杂的暗流。美国成为一个商品化的社会，这让人们认识到表面现象下面的黑暗力量。正如T. J. 杰克森·里尔斯指出的，广告商们也许只是“想释放天性而忽视了天性的阴暗面，”但是“人类潜意识里日益增长的愤怒和贪得无厌的欲望”是不能忽视的。欲望一旦被激发，就很难被压抑下去：潘多拉宝盒一旦被开启，就无法再合上。

# 5

## 美国世纪

G. 斯坦利·霍尔和青春期

青春期是一种新生。

——G. 斯坦利·霍尔,《青春期》序(1904)



G. 斯坦利·霍尔,19世纪90年代

当 L. 弗兰克·鲍姆准备《绿宝石城》手稿的时候,伊利诺斯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对美国青年意义深远。该法案颁布于 1899 年 7 月,旨在“管理和控制未成年的、被忽视的、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少年法院法》(Juvenile Court Act)规定凡是“不到 16 岁的青少年”,如果他们违反了“这个国家、城市或乡村的任何法律法规”,即被视为少年犯,该法令还明确了独立青少年法庭的存在。这是将青春期作为生命中一个独立阶段的关键一步。

在世纪之交,芝加哥少年法庭成立得非常及时,这不仅是因为该城市具有未来意识的环境,而且还因为它蓬勃的改革运动。这个法庭是经过几年游说努力才建立起来的,这些游说团体包括诸如赫尔大厦(Hull House)以及“芝加哥妇女俱乐部”(Chicago Women's Club)。过去那种纯粹惩罚性的方式已经明显无法根除青少年犯罪问题,现在,法院认为青少年犯罪是贫穷的社会条件引起的,这种进步的观点有力地反击了当时犯罪学家和社会学家提出的宿命论。

芝加哥的邪恶势力依然横行。投身正义的英国记者 W. T. 斯蒂德(W. T. Stead)在博览会期间访问了这座城市。他认为青少年受到压迫是人尽皆知的丑闻。“在芝加哥,孩子们很少受到尊重,”他在 1893 年写下了这些文字,“送信的孩子不超过 14 岁,整晚他们都在警察局进进出出,在那里与酒鬼和下等人接触密切,这对他们的教育毫无益处。”令他吃惊的是,“年轻的孩子们过早地接触到这座城市可憎的一切”,并且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一点。

这种严重问题使人们开始将注意力投向针对青少年的法律条款上,那些法律条款概念非常模糊。根据民法规定,青年人在 21 岁之前都被认为是孩子,这种观点一直被最早的美少年感化院和纽约收容所奉行。然而,19 和 20 岁的罪犯非常难以控制,其他机构,如“纽约少年收容所”(the New York Juvenile Asylum)已经开始将精力集中于较年轻的年龄群体。年龄稍大的青年人被视为成年人对待,虽然他们在法律上仍然只是个“孩子”。

随着青少年早熟被认定为一个重要问题,已有的年龄界限已经不足以应付复

杂多变的城市生活。《少年法院法》在童年和成年之间提出了新的分界点,旨在保护较年轻的罪犯不受惯犯的影响,该法还采用了一种灵活并且有预防效果的方式来对待少年罪犯。这个时候,杰西·波默罗伊依旧被“活埋”在监狱中,他证明了酷刑不会让罪犯改过自新,而只会让他们变得更加邪恶:1899年间,他第二十和二十一次企图越狱。

青少年法庭的成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在成立后的第一年里,首席法官理查德·S.塔海尔(Richard S. Tuthill)审理了将近1500起案件。在这些案例中,绝大多数是被控犯有盗窃罪(几乎占总数的45%)“扰乱社会秩序罪”以及“屡教不改罪”的男孩。最后这个术语“很明显是出于绝望而杜撰出来”的,用于指称城市中日常出现的大量犯罪行为:“在街上四处游荡,使用粗鲁的语言”,“既拒绝工作又不上学,逛街直至深夜”,“结党营私,拒绝服从父母,离家出走”。

女孩仅占这些案例的8%,她们常常被指控犯有“不道德罪”、“扰乱社会秩序罪”、“屡教不改罪”以及结交“恶毒之人”。大多数出席法庭的年轻姑娘都即将或已经丧失了她们的“美德”。简·亚当斯坚持这样的观点:“被带到青少年法庭的小女孩通常都是来自那些最贫困的移民家庭,这些家庭生活在条件最恶劣的贫民窟里。”她注意到“通过家中的男子而被卷入不法行为的小女孩数量惊人。”

被送上法庭的少年犯70%都来自移民家庭。作为一个不分民族的机构,这个法庭专门制定了一些针对这些新公民的条款,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未成年的、被忽视的”孩子被安置到收容所或者合适的收养家庭里。有不良行为的孩子可以被送到州改造所,或者被送到收养家庭,甚至可以继续呆在他们自己家里,但必须“受制于监督缓刑犯的官员探视”。采用最后一种措施的比例非常之高:法官塔海尔坚信缓刑是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最好方法。

在考虑应该怎样对待每个少年犯时,法官要求法院监视缓刑罪犯的官员考虑三点:“孩子的健康和利益”、“社区的利益”以及“家长和亲属的智力与感情”。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项目,给监视缓刑犯的官员提供了经常探视的机会,同时可以达到在犯罪发生之前进行预防的目的。塔海尔这样写到:“法院希望把孩子从被忽视受虐待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也希望把他们从成为罪犯或社会蛀虫的危险中拯救出来。”

青少年法院得到了广泛关注。尽管在实际操作中它没能根除产生不良少年的社会环境,但它介绍了一种进步的方法,这种方法提高了教养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响力,认为教养的作用更胜于天性。当时的社会科学家普遍信奉萨切尔·隆布罗索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宿命论,这种方法与宿命论却大相径庭。它的成功不仅催生了新一代的社会学家,同时还让人们对于少年犯有了一个更为准确的定义,这个定义已经困扰人们20年之久了。显然,称一个16岁的年轻人为“孩子”已经不恰当了。

到19世纪90年代末,当局正在积极寻求控制美国青少年的方法。无论是狂野不羁的市区团伙,还是狂热偏执的青年杀人犯,或者是纯粹的少年不良行为,对他们进行控制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同时,尽管他们的身上被强加上成年人对于他们未来的规划,他们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积极关注。成年人没有送他们去工作或让他们随意乱跑,而是鼓励他们待在学校里以延缓他们成年的进程。如果他们能够遵守规则,就会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

然而,人们还找不到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来描述这一变化。在19世纪,人们还没有把发育期看作是人生中一个独立的阶段。尽管人们把工作、服军役或者结婚视为成年的标志,但成年的年龄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当年轻人开始学徒生涯或者接受教育时,他们会在待在父母家里还是离开他们这两个选择之间犹豫徘徊。这段无法命名的时期被视为动摇不定的时期,甚至被叫做“半独立”时期。如果必须要给它一个名称的话,那它该叫做“青春期”。

用来描述童年与成年之间这段间隙的明确术语是由一位名为G.斯坦利·霍尔的遗传心理学家提出的。1989年,他正努力完成他的关于人生第二个10年的巨著,仅收集材料的工作他就做了5年。在那年夏天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第一个提出了“青春期”这个年龄概念。他的突破使人们认识到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卢梭提出并希望引起人们关注的中间状态不仅是生理决定的,同时也是社会条件决定的。

霍尔认为,“青春期不仅仅是发育期,它可以延续10年之久:女孩儿从12岁到21岁,男孩儿从14岁到25岁,高潮是在15或16岁。”霍尔注意到“野蛮民族”向来有重视这一阶段的风俗,而美国却从未有这一风俗,他因此感到遗憾。由于青春期不仅是“性冲动的时期”,也是美、英、法、德各国犯罪逮捕率最高的年龄阶段,因此它的正确过渡显得尤为重要。

霍尔的提议不亚于创造了一个崭新的、被普遍认可的生命阶段,而这个阶段延长了孩子依赖家庭的时间,并推迟了就业的时间:“随着文明的进步,教育范围

也在扩大。人们对于社会有了更高的期望,这使得学校教育的时间必然延长。”“当理想被高度文明化”,任何试图限制学校或高校教育时间的做法都将是“试图回到原始状态。对任何一个教育体制进行评估,都应该看到它是否能成功地让青年人在青春期获得最完美的发展。”

从表面上看,人到中年满脸络腮胡的霍尔不可能成为年轻人的预言家。他刚刚被任命为美国一个位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新建大学——克拉克大学的校长,这是他长期学术生涯的一个顶峰。他孤傲的行为举止并没有因为他的妻子女儿19世纪80年代初的意外死亡而有所改变。在内疚和抑郁的双重煎熬之下,50岁时,霍尔度过了一个重大危机阶段。面对“早期老年精神症状”的威胁,他开始寻觅一种新的学术热情。

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美国知识界中的主流是进化论。19世纪90年代,达尔文主义已经被用于各种学科,从萨切尔·隆布罗索的宿命犯罪学到赫伯特·斯宾塞的放任社会学,他们认为,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竞争能够带来进步。任何干预这种过程的企图,比如改革,都注定要失败。因此,城市里的孩子就应该放任自流,是生是死全在他们自己。

霍尔曾是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最宠爱的学生,然而,他却抛弃了19世纪90年代初的心理学成就。尽管外表严肃,他认为感情始终是第一位的,他认为这一点被詹姆斯和他的追随者们忽略了。“对心灵进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霍尔在1894年写到,“但它已经成为每个试图解决人类意愿、情绪和感情问题的人手中的万能钥匙。精神是旧哲学的开始亦是旧哲学的结束。心灵才是新哲学的开始。”

为了寻找另一种使进化生物学与心理学结合的方法,霍尔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亨利·德拉蒙德(Henry Drummond)1894年写的《人类的进步》(*Ascent of Man*)一书上。在这个更为温和的达尔文主义思想里,进化是“世界和谐的最终展现”:原先自然选择的残忍世界被“无私的爱”这一概念所代替,人类之母是进化的最高产物。德拉蒙德还提出人类是按照重演的法则发展的,所谓重演就是“在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在重复这个种族演化的形式。”

这与霍尔个人的观点倾向是一致的。他将德拉蒙德的进化生物论与个人发展融合在一起,他认为个体灵魂是整个宏观世界的一个缩影,是一个“回音室”,过去的每一代人都在其中一遍遍回响,因此个人的精神便与种族的发展联系在了

一起，一个自然的结果是个体正确的进化会对国家甚至整个民族产生深远的含义。不正确的发展则会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

为贯彻这一新发现，他重新回到儿童学运动这个研究领域，这一研究曾帮助他在19世纪80年代开辟出一个新课题。霍尔曾在德国跟从经验心理学创始人威廉·冯特(William Wundt)学习，并试图将此领域研究的手段应用于孩童行为的基本感情和心理特征的细节研究上。他这样做的动力来自他的一种信仰，如果让他用卢梭式的话来说，就是“每个孩子都是野蛮人”；如果要让他们正确地进化，这个深入的研究将是至关重要的。

与传统的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不同的是，儿童学研究运动的进步之处在于它试图发现孩子自己的想法和感觉。通过观察和问卷的方式，他们企图广泛地描绘出孩子的感情和思维过程，包括他们的身体成长、健康、同龄交往、恐惧与愤怒、他们的艺术以及他们游戏的本质。在教育作为一个整体备受公众关注的同时，儿童学研究运动迅速地影响到美国对儿童的社会政策。

在这个运动中，霍尔最大的成功发生在1893年博览会上。霍尔被邀请去组织一次公共代表大会的教育部分〔1〕，他撕掉了大会摘要，并发起了一场新的题为“经验心理学与教育”的会议，整整三天的会议全部用于讨论儿童学研究。然而霍尔并不满足。不知满足的他在1894年宣称他正在考虑一个全新领域的研究，即关于童年之后的阶段，这个阶段被他定义为青春期。

作为童年与发育期之间的空隙，有关青春期的数据已经成为儿童学研究资料的一部分，但并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来解释认定。然而，先前与孩子有关的依赖期正在延长。由于中学的数量在1880—1900年间增加了750%还多，越来越多的处于发育期的美国青年在学校里接受教育。鉴于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处于老师的管制和监视之下，延长儿童研究课题的年龄段成为可能。

研究发育期与霍尔个人的兴趣是一致的。霍尔曾被玛丽·巴什基尔森的日记和杰西·波默罗伊的无动机犯罪深深吸引，这些都被他称为“珍贵的心理学文件”。对城市黑帮的观察进一步激励了他，他开始着手收集被他称为“青少年”的这个人群的资料。要将他的发现出版需要10年时间，但在此期间，他在美国各地

---

〔1〕 在另一个会议上，弗雷德里克·杰克森·特纳(Frederik Jackson Turner)做了题为《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的演讲。

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讲,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探讨和加深他对这块未知领域的理解之上。

霍尔对青春期的研究与他自己的心理状态正好吻合,并且与美国作为一个新生国家的特殊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研究著书期间,他休了次假,考察了他成长期间生活过的农场。1899年他出版了题为《早期回忆注解》(*Note on Early Memories*)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在最早的童年时期和14岁青春发育期之间的那个阶段,叙述中充满了具体描写的轶事和记忆的片段。然而,对于一个心理学家来说,他对自己那个时期的感情也表现得不甚了解。

我们只有在文字的背后才能了解霍尔青春期的真实感情。去古老的坟地会勾起他“孤独的抑郁之感”和“一种奇异的恐惧”。他出生于一个清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个喜欢使用暴力的加尔文教徒,他的成长伴随着强烈的自我人格缺失和性罪恶感。像巴什基尔森一样,他希望自己能挣脱这样一个不堪的境地。他回忆起一次爬上山巅,在那里释放自己的愤怒:他“大声”发誓“要克服许多真实的障碍并且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人事,成为大人物”。

专注于青春期研究使霍尔能够重新审视并补偿他自己那段不充实的生活。当然,他对青春期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实现愿望的需求。他问道:“是谁创造了历史?不是这世上的智者,而是那些伟大的灵魂——卫斯理(Wesley)、落约拉(Loyola)、佛陀(Buddha)、基督(Christ),他们是伟大的灵魂,是世界的预言者。在我这么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发现,年轻的男女——尤其是年轻的男性首先需要感受情绪。他们必须激动,必须燃烧。”

由于新的心理学中关键的因素是“我们感觉的强度、种类和范围”,霍尔从巴什基尔森的日记里获得灵感就不足为奇了。霍尔从他自己的尝试中认识到回忆青春期的男性写作时会比女性“少些放任”。他们会“更倾向于描绘他们生命后期公共生活的变化特征,那时他们会感觉少些约束,也许因此不太有忏悔的需要”〔2〕。而女性在“重现和描述这个阶段美妙却渐渐淡忘的感情”方面远远比男性出色。

霍尔提倡的东西与美国年轻商人和帮派实行的刻板的男子主义是完全相反

---

〔2〕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同时在维也纳的发现,新的心理学在女性表现他们情感,如果没有沉溺的话,的意愿上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的。然而,他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既进步又保守。他解决年轻男子精力过剩的方法很简单:“对于这个年龄来说,冷水浴和游泳的好处几乎不需要说。”他对年轻女子的教育方法表明他将母亲置于进化的最高阶段。他严厉批评了被他称为“女权主义福音”的当时新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

然而,他的课题把他带到了未来。霍尔认为青少年与一个年轻大陆的崛起是分不开的。正如他1898年所讲的,“我们美国人是一个混合的种族,这使美国的青春期变得非常独特。在环境单纯的地方,这个令人激动的时期就会迅速无碍地度过,就像犹太人和德国人那样。然而由于美国种族混杂,这里的青春期被延长。如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时期的考验和危险,我们将造就世界上最伟大的男人和女人。”

霍尔出生于内战的大屠杀之前,他目睹了美国成长为这个世界前所未有的强国。他的国家是青春的同义词:“在目前我们民族快速转变和扩张阶段,未来和理想必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否则我们民族的发展就会停滞。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好时代。”霍尔开始将浪漫主义诗人的句子改写成一个新世纪的新神话,“年轻是一个预言”,他说,“最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人们还没有破茧而出显示出未来的模样。”

随着《青春期》(Adolescence)最终公开发表,关于青年的新概念在1904年被确定下来。霍尔曾宣称他的课题“完成”于1899年,从他对自己所用方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我的意图在于收集所有可能收集到的资料和文献”,他写道,“然后在简单的描述中体现整个过程的综合图像”。事实上,不断增加的数据和作者本身的长篇大论意味着到它出版时,这本书已经规模相当可观了。

《青春期》成为维多利亚时期名副其实的信息库,全书共有50多万字,分为两册,大约15000页。整本书的调子反映出作者对于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情感:“这是一个情感和宗教的时代,一个感情频繁波动的时代,世界显得崭新奇异。”正如他的一个同事所说的,霍尔这个孤傲、固执的教育家,自始至终抱着浪漫主义的理想,仍旧处处能找到孩子的喜悦。全书的主要败笔在于它对书中的数据没有给出充分的解释。

在今天看来,书里的很多资料似乎都有时代性,但该书仍闪耀着光芒,用它所包含的能量去照亮那些没有经过充分解释的数据:它是一本生机论的经典之作。

尽管霍尔举止古怪,他确实是第一个对青春期进行系统定义的人,而且他明确了青春期的年龄阶段:14—24岁。〔3〕《青春期》也是美国最早对弗洛伊德理论持肯定态度的书之一。它有力地证明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助于加强对这个“心理和道德陶醉”时期的理解。

霍尔认为,“童年与青年的心理活动以及每个普通人的心理活动”都值得人们最大限度地给予科学的关注。他清晰地将青春作为一种状态与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相联系,这使这种探究变得尤其迫切:“‘青年狂’(Ephebitis)〔4〕是科学家采用的术语,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国家的这种状态称为‘美国狂’,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处于青春期。”他在美洲大陆找到了青春活力,这正是这个国家及其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我们渴望最精彩的生活,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希望这种精彩的生活能够延展到最深最广。”

霍尔希望“收集各种精神状态”,对他来说,青春期总的来说是一个反复无常的短暂状态:“十来岁的孩子情绪不稳定,容易情绪化。这是一个处于自然陶醉状态不需要致醉物的时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柏拉图将青年定义为精神陶醉时期。这是一种要经历激情和狂热精神状态的自然冲动,情绪化是最明显的特征。”第一个青年色情出版物的发现让他非常镇静,他很快做出反应:“性会在很多方面确立其控制地位,并以堕落、放纵、疾病和弱化的遗传力等形式带来破坏。”

发育期标志着这种状态的开始:“对性的特别关注标志着青春期的到来。”霍尔引用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Breuer)在1895年发表的《歇斯底里研究》(Studienüber Hysterie)进行了总结,“精神错乱和神经机能病”大量存在于青春期前期,比其他任何人生阶段都多。这个时期会产生严重的情感紧张,有些人把这种情绪描述为压抑性精神错乱。他致力于研究极端行为,他似乎想暗示对于这些青少年来说,要建立某些行为规范是不可能的。

与这种青春期的神经衰弱同时存在的的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我们很难意识到,现代都市生活对青少年来说是不自然的、矫揉造作的”。霍尔把雅各布·里斯作为他的向导:“在纽约东部,对抗法律和秩序的团伙处处可见,在这些地方,那些

---

〔3〕 霍尔引用的出自1898年德国心理学家威尔(Wille)《青春期心理学》(Die Psychosen de Pubertätsalters)一书中发育期的概念。

〔4〕 原文为德语。——译者注

独自一人时原本懦弱无能的暴徒如果开始拉帮结派就会变得非常危险。他会强烈希望被逮捕,然后摆出英雄的姿势。”美国法院记录表明青少年时期是逮捕率高峰期。霍尔总结说,都市的温室往往“使事物提早成熟”。

作为萨切尔·隆布罗索的反对者,霍尔提出美国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复杂要求使青少年内在的负面因素更加恶化。随着大众对社会制约的要求越来越多,生活对于冲动鲁莽、专注于自我的年轻人来说更加困难了。由于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他们就显得更加引人注目:“少年犯罪率的上升令人悲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不完全是城市生活或年轻人的堕落,还因为社会日益增加的道德要求。”

与此同时,霍尔重申“那些年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不管成年后再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如此完美的状态了。”他的保守主义中已经掺入了进步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年龄理应得到同情、欣赏和尊重”,同时他也非常赞成快速扩展的中学体系,他认为离开学校的年龄应该推迟两岁,也就是16岁,大学生应该免于成年生活的紧迫状态:“学生必须有懒惰的自由。”

最重要的是,他致力于让延长青春期的做法得到社会认可。霍尔意识到“越来越长、越来越严格的见习期和专业化”的趋势,他支持“延长的见习期”。所有社会,无论是原始的还是发达的,都有他们自己的成人仪式,他们有“客观的规则”来标志童年与成年之间的间隙。但是在20世纪的美国,这个间隙的延长将会是“文明的另一个标志。”青少年应该得到一个远离工业社会苛刻要求的庇护所。

霍尔建议美国的各种机构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充分了解生活,年轻人需要闲适、安逸、艺术、神话、浪漫和理想,总而言之就是人本主义。”这些观点使人联想起卢梭的理想教育,开始逐渐渗透到美国的社会体制中。《青春期》一书的最终出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成功:霍尔的一个学生在纽约布塔诺书店买书时,他被告知这本书“虽然价格不菲但销量奇佳。”

凭借强大的学术影响力和横跨东西的市场,《青春期》一书加速了正在扩大的教育机会的需求,并让美国人注意到了这个无所不在却一直被忽视的年龄阶段。同时,霍尔让美国人看到了美国年轻的国家形象,它将成为下个世纪指引方向的明灯:“意识到自己的年轻会带给我们对将来的信心,总有一天,我们会以我们无与伦比的自由和机遇引来全世界的青年。”

第二部分

1904—1913



## 6

# 彼得·潘和童子军

大不列颠帝国青年

在这个特别的下午,范·琦看到了一幕日常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的景象。在橡树谷一片幽深的池塘里凸起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一个大约 16 岁的男孩躺在石头上,把湿湿的四肢尽情沐浴在阳光下。刚才游泳时弄湿了的头发紧紧地贴在他的脑门上面,他向范·琦望去,明亮的棕色眼睛里流露出机灵的小老虎才会有的敏捷眼神。这个出人意料的奇特场景让范·琦的心里充满了遐想。这个充满野性的小男孩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萨奇“加百利-欧内斯特”(1909)



《石头上的彼得·潘》,作者:贝德福德,1911

"TO THE WILL BE AN AWICELY BIG ADVENTURE?"

二战的最后一年,彼得·李维林·戴维斯(Peter Llewelyn Davies)开始编辑一部记录他家庭故事的书稿,这个中年书籍出版商把这部书稿命名为《太平间》(*Morgue*)。对于一部以英年早逝和走火入魔为主要内容的小说,这是个再恰当不过的题目了。彼得的不幸不仅在于与《彼得·潘》(*Peter Pan*)中永远年轻的英雄主角拥有同一个名字,他的不幸还在于,作为五兄弟中的老三,他创造出了“可怕的杰作”。彼得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偷走了,《太平间》的写作就是他为了驱邪所做的尝试。〔1〕

然而这仅存的片断,为中上层阶级的青年提供了一个窗口。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爱德华时代是最后一个黄金时代,那时社会稳定,拥有人类堕落前的天真无邪。在它之后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帝国走向了末路。1908年的夏天,彼得·李维林·戴维斯在新弗里斯特度假,与哥哥乔治捕捉蝴蝶,他对这段时光的描写似乎印证了他的话。他说那是“十分幸福的日子,他可以在丛林中漫步,常常带着网、瓶子和做午餐的三明治”。

然而此时,乌云已经开始聚集在11岁的彼得和他15岁的哥哥的头上了。在头一年的春天,他们的爸爸,阿瑟·李维林·戴维斯(Arthur Llewelyn Davies)死于淋巴瘤。妈妈西维亚领着全家,靠中年作家J. M. 巴里(J. M. Barrie)的资助过活。孩子们的生活一切如故。在彼得的记忆中,1908年那年,他们“生活在一个纯粹的男孩子的世界里,阿瑟去世了,悲伤的西维亚千方百计不让我们感受到痛苦,这一切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

在新弗里斯特(New Forest)的一次偶遇让他们意识到,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天堂般的地方,也有不可控制的外力和强烈的死亡预感。一天下午,乔治和彼得在偏僻的森林小路上遇到了一伙士兵。彼得记得“他们停下来休息几分钟,解下身

---

〔1〕 1951年,彼得·李维林·戴维斯放弃尝试。9年后,他在地铁卧轨自杀,当时的报纸头条是:“彼得·潘的自杀”;即使到死他都没能逃脱这种联系。

上的行装,如同那些走累了需要休息的行人一样,以随意的姿势躺在小路旁,乔治和我与队伍后排的一个军士还有一两个士兵攀谈起来。”

这两个孩子被士兵们迷住了。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模仿队伍行进的步伐:“我们紧跟着他们,享受有节奏的行进步伐,心里暗暗觉得和这些汗流浹背、满嘴脏话的士兵心心相印,这让我们很感动。”这场偶遇深深印在彼得的脑海中,“像一场无声电影”:“这件事对于他6年后真正的军旅生涯来说,是一个奇怪的有些浪漫的预言。对于这两个孩子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在有意识地做着从军的准备,虽然他们对命运一无所知。”

20世纪的最初几年在普通民众的脑海中并非一个繁荣的金色全盛时期,那时欧洲各个帝国都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至于发生了无可避免的冲突。在英国,波尔战争以及即将爆发更大战争的预感正在逐渐破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所确立的信仰。同时,这些信仰也因为妇女投票权运动、工会权力和国内对欧洲现代思想的回应而遭到质疑。这个世纪最成功的青年组织——童子军在民族和国家日益强烈的呼声中应运而生。

爱德华时代秩序井然的表面下暗藏着战争和死亡,虽然可能只是一时不理智的冲动。这种情况在《彼得·潘》里得到了最清楚地表述。这部作品于1904年首次亮相,从此成为20世纪的经典作品。〔2〕和同时代的美国作品《绿野仙踪》一样,《彼得·潘》虽然是专门写给儿童的故事,但是许多大人也被其中复杂的心理描写所吸引。它持续影响着几代人,人们不知不觉中早已忘记了作品当初创作的特定时间、地点和写作对象。

彼得·李维林·戴维斯遭遇士兵的情形在他随后10年的可怕经历中已经渐渐淡忘了,但是他的家庭遭遇却说明现实和梦幻灾难性地纠缠在一起是那个时代的标志。他们的母亲西维亚·李维林·戴维斯(Sylvia Llewelyn Davies)于1910年夏末去世。彼得和他的兄弟们被完全托付给了作家J. M. 巴里,他把这些孩子的生活写进了作品,并因此成名。在《彼得·潘和温迪》中,巴里模糊地提到了这些孩子在他生活中的出现,他写道,“彼得·潘到来之前,没有一个家庭能如此简

---

〔2〕 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彼得·潘》影响了当时流行的心理学著作(比如丹·基利博士(Dr. Dan Kiley)1983年的畅销书《彼得·潘并发症》(*The Peter Pan Syndrome*)、一些大制作的电影(如1978年拍摄的《天才》(*The Wiz*)、1982年的《ET外星人》(*E. T.*)和流行音乐界最独特的超级明星,迈克·杰克逊(Michael Jackson))。

单而幸福。”

1897年,巴里遇见李维林·戴维斯一家时已经拥有一定社会地位。但是,在他成功的外表之下,他深受疑虑和恐惧的困扰。巴里身材矮小,童年时期就失去了哥哥大卫,后来又被他称之为“噩梦”的婚姻所困。1896年,他失去了母亲和姐姐。他常常在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里长时间地漫步,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从别人孩子的身上寻找安慰。他并不是要代替那些孩子的父母,而是反映了他自己所说的困境:“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和乔治的偶遇使他有机会与这整个家庭结下了友谊。在他们接触的第一年中,他开始创作一个有关孩子的故事,故事里写到这个家庭中的所有孩子,对弟弟彼得尤其关注。他从当时的一个戏剧中获得灵感,<sup>[3]</sup>构想出一个名叫彼得·潘的角色,他逃出托儿所,希望过上鸟一般的生活。由于脱离了社会,他进退两难,只能成为一个叛逆者。当他想回自己的卧室时,窗户紧闭着:“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机会只有一次。”

这种想法在1902年的小说《小白鸟》(*The Little White Bird*)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部小说中,彼得·潘作为主要配角出场。故事取得成功之后,巴里开始着手于人物情节的扩展,并将其充实成为一部完整的“童话剧”;仓促的第一稿在1904年4月完成,并且在6个月后开始排练。当它最终于12月27日上演时,《彼得·潘》立刻在成人观众和孩子中取得了成功。达芙妮·杜·莫里哀(Daphne du Maurier)后来写到关于她的父亲杰拉德尔(Gerald)饰演男主角的表现时,说,“当胡克船长(Captain Hook)于1904年第一次踏上后甲板时,孩子们在观众席上开始尖叫。”

当时唯一的批评者迈克思·比尔博姆(Max Beerbohm)认为这部戏完全把小孩和大人混为一谈:“巴里先生从来没有长大过,他完全静止在孩童时代。”从表面上看,《彼得·潘》是写给孩子们的戏:和《绿野仙踪》一样,它让大人暂时放弃怀疑的态度和线性思维,害怕迷失和成为孤儿是这出戏的基调。但是,如果说《绿野仙踪》是温和而又满怀希望的——充满了对新大陆的乐观态度,那么《彼得·潘》则是困扰人心的:对于桃乐茜和达灵家的孩子们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家更

---

[3] 叫做《潘和小羊倌》(Pan and the Young Shepherd),莫利斯·休利特著(Maurice Hewlett)(1898)。

好,而对于彼得·潘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是他的家。

巴里故事的主题几乎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道林·格雷的肖像》(*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所写的一样:渴望永葆青春的理想,以及浮士德式的反自然契约。在他找到了自己丢失的影子后,彼得明确了自己的流浪者身份:“出生那一天起我就离开了家,因为我听到爸爸妈妈在讨论我长大成人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一直做个小男孩到处玩耍,所以我逃到了肯辛顿花园,与那里的仙女生活了很长时间。”

彼得·潘处在一种悬而不定的状态,他永远定格在未长大成人前。他拥有任意飞翔的能力——这不禁令人想起浪漫主义和玛丽·巴什基尔森不切实际的梦想,他可以带领达灵家的孩子一起来到一片神奇的土地——永无岛。彼得·潘是一个真正的“太阳的孩子”(sonnenkinder),〔4〕他拥有无限的自信,用自己的潘氏笛子吸引追随者——那些走失的男孩。他们都处在永无岛的危险中,虽然这危险从未真正来临,但是这些男孩依然依靠彼得·潘的领导。虽然他拥有魔法,除了自己的兴趣,他没有什么道德标准:“在一场战斗中,彼得从来没有坚定的立场。”

不去管他所代表的年龄——他还没有换牙——彼得·潘永远停滞在童年阶段。然而,他的行为却表明他已经到了青少年阶段。彼得似乎也想尝试性行为,但是总是临阵脱逃。一些女性角色希望得到他——泰格·莉莉(Tiger Lily)、甜克贝尔(Tinkerbell)和温迪,同时,成年人冷酷形象的化身胡克船长或许也想得到他,但是彼得是碰不得的:他的整个人就是“一个对自然规律的极度嘲讽。”他认为在他魔幻的领土上他可以躲开他最害怕的成人世界:在他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长大”更可怕。

然而,不想长大是要付出代价的。在戏的结尾,彼得离开了那些走失的男孩——他们都完全长大了,达灵一家也团聚了:“再没有比这更美的景象了,但是只有一个独自站在窗前的陌生男孩才能看到这番景象。他对此充满了憧憬,这是别的孩子可能永远无法领会的,然而他在窗外看到的是他永远也不会得到的快乐。”

《彼得·潘》像《道林·格雷的肖像》一样,用不同寻常的方式预言了一个以

---

〔4〕 sonnenkinder(德语)太阳的孩子。

年轻人为中心的世纪的到来。两者都采用自传体的形式,将青年作为一种抽象原则来展示,并解释了他们冲动的潜意识。然而在王尔德遭受流放之时,巴里却成为伦敦城里受人尊敬的人,其原因也不难解释。王尔德的书针对成年人,故事就发生在大家熟悉的同时代,而且他十分高兴成为堕落派领袖,使人们看到他最阴暗的一面。而作为儿童读物的作家,巴里书中明显的幻想特征使他幸免于批评,而且他的生活也未曾涉及丑闻。

王尔德对自己的怪癖不加掩饰,并最后演变成引起争议的道德问题,而巴里却是隐蔽却又无所不在的,他的性格在小说中若隐若现,就像他书中那“可望而不可及”的角色。作为儿童性欲的第一次探索性写作,巴里只能求助于写于同时代的弗洛伊德的原则:童年不是可以像蛇皮那样抛弃的状态,而是一直在追求成人的生活。其必然结果是,这些潜意识的冲动一旦受到成年的镇压,就很容易和暴力行为一起反映出来。

巴里笔下最后阶段的彼得·潘永远地与他的青年伙伴分离开来,这意味深长地表现了作者的情况:他感觉自己无法成为希望成为的那个人。作者对李维林·戴维斯家的孩子有一种异常强烈的亲近感,但是与王尔德不同的是,巴里可以很好地控制这种情绪,并很谨慎地运用戏剧化的夸张手法在他的剧本中掩饰这种蠢蠢欲动。第一位出演彼得·潘的是一位30多岁的女演员应该说并非巧合:欲望被升华为一种可以接受的形式,削弱性别和年龄的影响是关键。

用一位年轻的成年人来扮演书中的角色,巴里确保了他的作品不仅适合儿童,也同样适用于成人。同样这也表现了彼得所代表的遏制长大的意义,它可以延续至中年。而青春期本身可以从彼得的轻浮和唯我独尊中得到体现,成年前的那个阶段被省略了:这一时期的青少年仍被称为“男孩”。当性欲无法表达时,恋母情结的暗示却在绝望的状态下突然出现在剧中父亲形象的身上:比如陷入麻烦的达灵先生,以及受伤的胡克船长。

这种主角反串出演再一次强调了彼得·潘永远不会成年:他不能成长为一个男人,因为他已经是一位成年女性。让女演员扮演戏中的男孩,或让男演员扮演戏中的女人,这完全符合儿童剧的传统。尽管与其他儿童剧有着明显的不同,《彼得·潘》还是以精彩的技艺延续和发展了儿童剧的魔法和幻术,其中还包含了一点弗洛伊德的观点:对世界的探索来自内心,而不是来自外部。

儿童剧中的泛神论在《彼得·潘》中得到了体现。剧中主人公的名字并非随

便得来的,潘神(Pan)是一位著名的希腊神,这位牧羊神在孩童时被遗弃,它代表着舞蹈和音乐——他的潘氏风笛是欧洲风笛的起源。除了拥有预言的神奇力量,在他身上还有暴戾的亢奋性欲和可怕的外表。作为“暴力和恐怖的煽动者”,潘神看起来是最适合在帝国冲突时期出现在你身边的神。然而却有一个问题:潘神是唯一一个在他那个时代死去的奥林匹斯神,和一个凡人无异。

这是奇怪的帝国宣传。《彼得·潘》中最难以忘怀的时刻是他等待被淹死在美人鱼礁湖,这一时刻在 F. D. 贝德福德(F. D. Bedford)的著名插画中非常引人注目。他听到“来自身体内部的敲鼓声”不断重复着,“死亡是最精彩的冒险”。虽然说这话的是乔治·李维林·戴维斯,那时他正投身于 1900 年的波尔战争中,但巴里对死去儿童以及他们最终栖身的天堂般的永无岛的描写在乔治的脑子里种下了这么一个念头。

这也正是《彼得·潘》让人不安的地方。巴里情不自禁地把自己不健全的心理状态带入他跟李维林·戴维斯家的孩子的关系中,这就好像是用他自己的死亡情结来规划他们、催眠他们。1915 年 4 月,乔治去世,除了乔治,巴里最喜欢的孩子是老四迈克尔。他们异常密切的关系随着 1921 年 5 月迈克尔的死亡而结束,迈克尔当时 20 岁,留下一封有明显自杀迹象的遗书。在兄弟相继离去的情况下,你很难不同意彼得·李维林·戴维斯认为巴里偷走了他们灵魂的说法。

但是,彼得·潘不仅仅影响了这一个家庭:它在美国和英国都非常轰动,并且年复一年地重演,很快就成为孩子们娱乐的主要节目。这个剧目将儿童剧的性别探索带入到新的青年市场,帮助那些中性人成为连接青少年文化的主要符号。在英国,它引发了一场新的偶像崇拜,并且以英年早逝的方式重塑了浪漫主义的永葆青春。它也代表了 20 世纪头 10 年人们对年轻人的模糊认识。

年轻人被视为未来令人兴奋的先锋,一种天赋的力量,它既可以复兴昔日的传统,也可以毁灭它。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应该更加努力去驯服这些无法预料的野蛮的畜生。在英国,公立学校的理想仍然是塑造完美青年的典范,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毫不犹豫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也正是帝国最希望从孩子们身上得到的东西。“这是我最后的话,我亲爱的孩子们”,温迪在胡克船长的海盗船上慷慨陈词,“我感觉到来自你们生身母亲的信息,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能够像英国绅士一样死去。’”

\* \* \*

彼得最热烈的崇拜者之一是一位45岁左右的未婚男士,他叫罗伯特·史蒂芬·史密斯·巴顿-鲍威尔(Robert Stephen Smyth Baden-Powell)。他非常喜欢巴里的这出戏,以至于他一次又一次地光顾戏院,并且向朋友推荐,他还与扮演达灵太太的女演员桃乐西娅·比尔德(Dorothea Beard)有过一段恋情。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和民族英雄,做出这样的举动似乎有些奇怪。但是根据传记作家皮尔斯·布伦登(Piers Brendon)的说法,巴顿·鲍威尔一辈子都是“一个一直唱着歌的小男孩,一个吹着口哨的少年,他是发育停滞的典型例子。他是当之无愧的‘男孩—男人’。”

巴顿·鲍威尔生于1875年,1860年他父亲死后由母亲一个人带大。在查尔豪斯公立学校接受教育时,那里的运动氛围让他感觉如鱼得水,他超凡的运动和军事天赋足以弥补他学习成绩的不足。他表现出舞台表演方面的才能,并且由于经常独自去乡村而对大自然情有独钟。被牛津大学拒绝后,他加入了骑兵并被派往印度,这是他军旅生涯的第一站,之后他还去过阿富汗和南非。

大英帝国需要人们保持毫不松懈的警戒心,并坚持身体锻炼,这样个人才能服从帝国不断扩张和发展的军事要求。爱德华时代的儿童读物,比如出版于1980年的《我们帝国的故事》(*Our Empire Story*),详细讲述了英国人在全世界无所不在的英雄主义,不论是在北美,还是在澳大利亚,或是在印度。探险家们以惊人的耐力不断扩张,与原住民之间的殖民战争也在持续不断,罗克渡口战役中与祖鲁游牧民族勇敢对抗的“百名英雄”就是一例。

1900年,英国作为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和12万平方英里土地的国家,试图去控制散布在1150万平方英里上的3.45亿人口。由于数量上的悬殊,大英帝国开始感到一种被围困的威胁:每一次叛乱对于陆军或海军来说都是极度严重的事件。这种思想对巴顿·鲍威尔影响很大,在波尔战争期间长期被围困于马弗京时,他表现得极为坚定。在这场总体上损失惨重的战役中,连城镇救济都变成了难得的好消息:这样的情况在1900年5月传出后,顿时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自发街头示威运动。

波尔战争标志着这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情绪开始从自信转变为偏执。人们担心的不仅仅是失去已经获得的殖民地,而且还担心英国本土遭到入侵。这些担忧也在青年杂志上得到体现和宣传,例如《男孩之友》(*Boy's Friend*)和《男孩们的

信使》(*Boy's Herald*),他们连载令人毛发悚然的故事,讲述英国遭到法国、俄国和德国的入侵。正如一篇社论所说,“我的读者是否愿意相信,如果一个敌国要侵略我们这个小小的岛国,而现在我们却只有几百名士兵可以抵御侵略?”

随着英国人识字能力的普遍提高,年轻人开始愈发怀疑来自杂志或者畅销书潮水般危言耸听的宣传,比如厄斯金·奇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的《时间的谜题》(*The Riddle of the Sands*)和威廉·勒魁克斯(William Le Queux)的《1910年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1910*)。他们传统意义上的敌人是法国,但是自从1904年签订英法协约后,他们的关注点转向了德国。原来只有公立学校男生和基督少年军成员长期接受军事化训练,而现在英国的所有青年人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但是,虽说大多数新白领阶级和工人阶级表现出热爱祖国、忠于国家的热诚,但是他们显然力不从心了。

1898年的流氓恐慌使一大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受到关注,他们吸烟、酗酒,留连于音乐厅。两次波尔战争持续30年,当这些年轻的城市居民应征入伍参加波尔战争时,他们被发现体力都不达标。在一些比较贫穷的地区,三分之二的志愿者都被直接退回。当英国动用45万军队镇压4万荷兰农民起义的时候,很显然,维多利亚晚期的男子气概已经远远不像基督教理念所期待的那样了。

大英帝国的命运掌握在青年人手里,而他们却不能胜任。波尔战争之后,“男孩专家”数量激增,在他们看来,城市生活应当为此承担责任,正是它“邪恶的本性孳生了酗酒和赌博等恶习。”地痞流氓的劣迹依旧记忆犹新,关于波尔战争的传言让人恐惧,士兵们在使用无烟火药时对“特效催眠效果”上瘾,这些都让英国的青年管理层担心这些青年人是否适合作战。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制定一系列法案,致力于改变年轻人被忽视的状态,帮助他们走入社会。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在采取同样的措施,伊利诺斯州建立了青少年法庭,1899年间,将16岁以下被判入狱的孩子和成年罪犯一起关押的做法被禁止。1902年,《教育法案》(*Education Act*)第一次授权政府支持中等教育。然而,这些法律并不能解决城市环境的深层次问题。人道主义改革者和教会组织只能发挥有限的影响,当基督少年军或者教会少年队行军通过工人阶级城区时,他们常常会遭遇奚落的嘘声、迎面丢掷的石块和谩骂。

起码的尊重都已经消失殆尽。青年工人兼“男孩专家”查尔斯·拉塞尔(Charles Russell)评论道,“工人阶级男孩是批评家,而且毫不留情,他尖刻而且严

厉。他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那些试图控制他们的人的软弱,所以他绝不原谅他们。”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男孩们”很容易变成“四不像”,成为斗殴少年的后继者:“‘四不像’是个愚蠢的家伙,他常常放纵于各种不良嗜好中,不能控制自己的野蛮情绪,一旦有机会,就会让这些野蛮情绪自由发挥。”

贫穷与暴力在缺少爱国热情的城区往往是相伴相随的。拉塞尔总结说,“在曼彻斯特,所有接触普通工人阶级男孩的人都会感到震惊,这些孩子身上完全没有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和那些在公立学校长大的男孩完全不同。”如果后者是英国的完美典范,那么工人阶级青少年就是威胁帝国稳定的不利因素,他们会使种族衰退。他们糟糕的健康状况意味着他们无法担当“不断扩张帝国的重大责任。”

在美国,有关青少年的早期思考主要集中在对城市平民的控制。1903年成立的政府“国民体质下降委员会”明确了“下层阶级”青少年的问题,这些孩子像小鱼一样从教堂、学校或者志愿者组织这张大网中轻而易举地溜掉。尽管“委员会”对已经建立的青年组织,如童子军,表示赞同,他们还是建议进行更多的统一训练,重点放在“操练和身体锻炼”上,使“男性青少年”能够“不需要更多训练就可以上战场。”

巴顿·鲍威尔看到了自己的机会。1904年4月,他参加了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市举行的每年一度的操练视察及童子军复查。童子军创办人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主张要“重写童子军手册以适合男孩子们”,这让这位前任陆军上校想起了马弗京学生军训队(*Mafeking Cadet Corps*),那是一种准军事化的组织,所有人伍年龄以下的男孩都可以参加。学生军训队的年龄在9—18岁之间,他们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英雄模式:正如他在《男孩的童子军活动》(*Scouting for Boys*)中写道,他们“根本不在乎枪林弹雨,他们时刻准备服从命令,即使是冒着生命危险。”

在《彼得·潘》首场演出的5天前,巴顿·鲍威尔公开了他在伊顿公学《编年史》(*Chronicle*)中的宣言,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选择。他的文章一开始就讲到英国的劣势:“我们英国这样一个小国家被比我们武装强大得多的国家包围着,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消灭我们。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阻止他们?”受到中世纪做法的启发,巴顿·鲍威尔建议对“每个英国男孩”进行检验:“每个月1日都问他这样一个问题——‘除了个人娱乐和自我进步,我为这个国家的利益做过什么贡献?’”

巴顿·鲍威尔决定组织一系列地方性团队,先让他们阅读冒险故事做准备,然后教他们“怎么运用小型来复枪进行射击”,“怎样出操和作战”,还有怎样侦查。这些“军团”将不断地反复诵读骑士职责祷文:“1. 惧怕上帝;2. 尊重国王;3. 帮助残弱;4. 尊重妇女爱护儿童;5. 训练使用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6. 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自己的娱乐和财产,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上述理想的第一次严肃测试出现在1907年童子军野营活动的开幕式上。21个9—17岁不等的男孩在这次活动中接受了伦理和务实的教育:忠于国王和帝国、野营、做饭、打猎以及跟踪。最让巴顿·鲍威尔满意的是阶级混合,他的实验团队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他们既包括公学学生,也包括工人阶级男孩。“就行为举止、整洁度等方面来讲,来自较差环境的学生进步更大。”他写道,“他们观察、模仿其他人,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惊人的进步。”

童子军活动在1904年宣言后几经变化。巴顿·鲍威尔从各种各样的来源中获取灵感:古典文学,约翰·亨利希·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和弗里希德里·杨(Friedrich Jahn)等教育家的理论、斯巴达人和古代英国的仪式以及日本武士道。然而,给他影响最大的要数“美国印第安森林人”,这个组织是欧内斯特·汤普森·赛顿(Ernest Thompson Seton)在20世纪早年建成的。1906年,巴顿·鲍威尔访问英国时拜访了赛顿。但让赛顿不安的是,巴顿·鲍威尔把“美国印第安森林人”的模式变得更加军事化。

巴顿·鲍威尔利用他是马弗京战役英雄这一盛名,获得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出版商兼主创人C.阿瑟·皮尔森(C. Arthur Pearson)的支持。《每日快报》作为大众市场新闻报纸于1900年上市,该报具有明确的爱国主义色彩——“我们的政策是服务于大英帝国”。在这一世界观的指导下,皮尔森已经创立了“新鲜空气基金会”,他们将贫穷的儿童送往乡下。1907年间,他对巴顿·鲍威尔的竞选给予了巨大支持,包括讲演旅行和持续不断的竞选宣传。他还承担了竞选内部杂志的出版工作。

《侦察兵》(*The Scout*)的内容主要包括有关冒险和竞争的故事,它一经出版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到了1908年每周发行量已经超过10万份。皮尔森还帮助创造了这场运动的名称:“我认为帝国军不是一个好名字,”他于1907年写道,“在我看来我们当然应该用‘男孩’这个词,我认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童子军’。”由于报纸文章、讲演和出版物等多种形式媒体的努力,童子军运动的开展已经做好

了准备,其标志就是巴顿·鲍威尔的作品在1908年1月以连载的形式第一次出现。

这一宣言不仅一炮即响,而且取得了长期的成功。巴顿·鲍威尔拥有天生的强烈情感,这与年轻人的强烈情感一拍即合。他对跟踪技术的描写有一种致幻般的紧张感,而且他坚决主张密切观察大自然,注重现时现世,这些都是东方宗教的标志。最重要的是,他使这一切听起来非常有趣:“野营是童子军生活最开心的一部分……置身于山林之中,与小鸟和野兽做伴,还有大海和河流,徜徉在广阔的大自然中——可以说,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

《童子军活动》由26个“篝火故事”组成,包括了各个相关话题,如“野炊”、“追踪”和“自我提高”。大多数话题都非常实用,包含了许多常识和丰富的细节,如怎样打9种不同的绳结,这些为今天的野外救生手册奠定了基础。从这本形式活泼的书中可以看出,巴顿·鲍威尔从很多人身上得到了灵感:圣·乔治(St. George)的骑士们、北美加乌乔的游牧民族、祖鲁人和美国印第安人。

巴顿·鲍威尔还提到了一些著名的个人,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以及童子军风尚中骑上精神的一些典范,例如“被大家称为卡里(Currie)”的18岁的苏格兰男孩,他在火车逼近时救了一个女孩。这些典范都具有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巴顿·鲍威尔发现了一个名叫罗伯特·辛德马什(Robert Hindmarsh)的完美男孩,这个年轻的牧羊人运用森林知识,通过观察发现了一个流浪者杀人犯:“你应该记得你的行为可能被你身后的人看见,并且会被人效仿。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每一个童子军都受到誓言的束缚。这个誓言包括“忠于国王,忠于国家,忠于他的伙伴、父母、雇主以及那些不如他的人。”这也决定了“童子军必须无条件听从父母、巡逻队长或童子军团长的命令。”在他给“已经成长为帝国男人的英国年轻一代”的致词中,巴顿·鲍威尔重申了亨利·纽博尔特(Henry Newbolt)的观点:“不要学习那些丢人的罗马人,由于他们懒散,缺乏斗志和爱国热情,结果失去了前辈打拼下来的帝国。加油!在这场战争中,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这种训导说明,巴顿·鲍威尔的宣言并非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缺少政治思想。“童子军活动”体现了公立学校崇尚力量的基督教信仰。当时有一些以貌取人的漫画作品,长得像外国人或穿着外国人衣服的人自动成为怀疑的对象:一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文件表明,在这个时期,移民中窝藏了“罪犯、无政府主义

者、妓女和品质恶劣的人,其比例超出了本地居民人口的正常数据。”

通过禁止吸烟、喝酒、手淫和逃避兵役,巴顿·鲍威尔制定了那个时代的一套反堕落理论:“对于开小差和发牢骚的人毫无商量余地。”尽管童子军的建立针对的是工人阶级“小伙子”,他们被男孩专家认定为问题少年,然而童子军活动受到了各种青年的广泛欢迎。一些城市青年非常乐意玩这种刺激的游戏,加入同龄人团队,得到冒险的机会,在国内旅行,从父母、老师或者雇主的控制中解放出来。

在1910年前,童子军活动还不完全算是大众运动,它一直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之后才真正壮大起来。但是在1910年之前它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青少年团队,拥有成员十万人。但是,和少年军及其他教会青年组织一样,它的主要组成人群是下层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的青年。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它未能触及很大一部分生活在贫民窟的青年,而这些人正威胁着帝国。其中一个原因是统一的制服和签约金太昂贵,另一个原因是许多青年对运动中主张军事化管理和操练充满了敌意。

公立学校的风气通过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灌输给了城市贫穷青年。1908年,也就是《男孩的童子军活动》出版那年,《磁石》杂志首次发行,那时针对

No. 1 THE "MAGNET" LIBRARY. 11  
**NEXT TUESDAY'S COVER**  
 OF  
**The MAGNET Library**



**HE WAS REALLY  
 SORRY, BUT COULD  
 NOT HELP LAUGHING.**

《磁石》(The Magnet)杂志创刊号中的一幅  
 广告,1908年

不同阶级品味的连环画和图片杂志已经有了影响。创刊号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校园故事”，作者是弗兰克·理查德(Frank Richards)。故事讲的是一个目中无人的青年怎样被“脸色铁青模样可怕的老士兵”赶走。华顿上校(Colonel Wharton)发现自己的侄子已经变得“肆无忌惮”，于是给他打好背包送到寄宿学校，试图以此改变他“任性固执”的性格。

哈里·华顿(Harry Wharton)的故事引人入胜，他毋庸置疑的“勇气”绝对不是来自他一触即发的脾气。在《磁石》杂志的创刊号中，至少有五场真正的、血腥的战斗：许多血腥的场面满足了绝大多数斗殴少年的胃口。故事描写了封闭的、充满竞争的社会，在那里男孩子们无恶不作，但是最终还是改邪归正。这个故事使《磁石》杂志和格雷修道院的故事立刻取得了成功，不仅限于公立学校男生，也包括城市内的外来居民。

19世纪初，罗伯特·罗伯茨(Robert Roberts)在自己的回忆录《经典的贫民窟》(*The Classic Slum*)中回顾了自己在索尔福德的生活。他和他的伙伴们都对《磁石》非常着迷：“哈里·华顿和他的朋友们在格雷修道院所遵从的行为标准提供了一种社会规范，学生和其他年轻人都必须不断努力去适应它。根据格雷修道院的规则，从理论上讲，打架至少应该是这样的：当对手倒下时不能出手，不能用脚踢，除了男人的拳头外不能使用其他武器。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崇拜胆识、正直和传统，我们嘲笑饭桶、美国人和法国人。”

相比于现实中前景无望的学校，小说中建立的学校“成为我们真正的母校，我们对它怀有一种梦幻般的忠诚。”〔5〕罗伯茨认为“公立学校的校风被歪曲成神话，廉价抛售，不论是福是祸，它确立了一种理念和标准。我们自己的导师，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当人们回顾历史时，也许可以这样说：弗兰克·理查德在20世纪前25年里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年的思想和世界观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比任何人的影响都要大，甚至包括巴顿·鲍威尔。”

---

〔5〕 罗伯茨回忆起，有的“男孩非常渴望得到《磁石》和《宝石》的当期杂志，他们会长途跋涉去城市火车站等候刚从伦敦运过来的大批杂志，最早从书摊上买到杂志。我们中的一个男孩故意一直用一种急匆匆的步态走路，他是在试图模仿鲍勃·切利‘有弹性充满活力的大步伐’。在我们开玩笑的时候，我们会有意使用奇怪的俚语——‘耶—噢(Yaro-oh!)’‘我的妈呀(My sainted aunt)’‘放开!(Leggo!)’和许多其他俚语。《著名的五男孩》对我们来说象征着骑士，无所畏惧。”

# 7

## 中学新生和工人来源

美国青少年和工业

年轻一代的成长得听他们自己的。自从取消体罚后,学校的纪律只留于表面,而教会戒律成了空谈,即使家规形式尚存,也不过是个空壳。现代孩子从10岁开始就自己做主。

——伦道夫·S.伯恩《两代人》,《亚特兰大月刊》,1911年5月



《五个美国男孩》20世纪初

正当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欧洲霸主地位费尽心机时,美国已经将自己标榜为新世纪的工业和金融动力中心。1901年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创立,这充分表露了美国的野心。银行家J. P. 摩根·德沃夫(J. P. Morgan. Dwarfing)筹集了多达14亿美元的资金,将全美的钢铁生产商都集合起来,形成了卡特尔联盟。新公司的规模让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New Jersey)相形见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

美国人在20世纪初也曾怀有帝国的野心,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卷入欧洲的纷争中去,而是通过工业实力来体现国家的影响。此时,那些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正在因为军备竞赛消耗实力,而美国选择暂时退出,去寻求自己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这就是原始资本主义,决定它的不仅仅是工业生产,重要的是治理,要通过资金流动形成更大的公司,只有大公司才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规模和潜力。

在这个国家战略中,年轻人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正当北欧的年轻人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时,美国的年轻一代正准备在商界大展拳脚。这种迫切的愿望给美国的教育政策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当时社会上开始流行一种新的管理和服务行业,这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了工厂。随着城市化的扩张,个人主义、流浪汉和自给自足的旧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商人要求员工诚实可靠、身体健康,要绝对服从,并要具备团队合作的能力——用当时教育界的术语来说,要培养“社会能力”。和实行公立学校的英国一样,美国人也通过体育锻炼把这种风气有效地灌输给青年人,团队运动在中学和大学里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美国需要更多的人力来实现“天定命运”,单靠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当初征服这片大陆一样,训练全美青年人摆脱“返祖”一般的原始愚昧行为势在必行。

20世纪初,官方和民众对青少年的关注持续增加,最直接的原因是他们注意

到,来自下层阶级野孩子在城市内越来越无法无天,大有带坏中产阶级孩子的可能性。F. H. 布里格斯(F. H. Briggs)在当时所著的一本指南《孩子们的成长及重塑》(*Boys as They Are Made and How to Remake Them*)中曾指出,少年犯不可能“来自一个工作勤勉、受过教育、勤俭节约的家庭”,他们往往是那些在“巷子里鬼混的孩子。”

\* \* \*

格朗维尔·斯坦利·霍尔在《青春期》一书中成功地将青春期界定为生命中的一个独立阶段,但这个定义在当时却被商业界用来将他们的价值观强加于年轻人的工具。从1905年开始,青少年问题成了报刊和大众市场杂志的热点。《时尚芭莎》(*Harp's Bazaar*)、《时尚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以及畅销杂志《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等刊物经常会讨论诸如“如何适时地与孩子坦诚以对”、“我的孩子应该与什么样的孩子交友”以及“如何保持都市孩子的正直性”。关于“男孩子”与“青少年罪犯”的文章比过去10年间高出了10倍。

新兴的中产阶级市场使人们不禁想到,城市里年轻的暴徒依然严重威胁社会,青少年犯罪会波及甚至可能将毁掉一代人。作为当时全国最有名的青少年问题研究专家,斯坦利·霍尔卷入了这场全国性的论战。他透露曾收到上百封忧心忡忡的家长和朋友们的来信,“所有的来信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怎么办’,家长和亲属们已经无计可施,愿意采取任何措施。”他最后总结说,“美国的男孩们从未像现在这样难以控制。”

在1906年1月的采访中,霍尔称,美国有2700万5到21岁的孩子,其中只有1200万人在校接受教育,这是国家的耻辱。即便在接受全日制教育,那些孩子——尤其是男孩们——也因为松懈的教学大纲而逐渐堕落了。最遗憾的是学生竟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自己的学习内容”：“这种说法还是建立在公民甚至孩子都拥有个人权利的陈腔滥调之上,它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谁都有可能做总统。”

在他看来,美国的教育远不如德国的教育体系。在德国,学生一方面要在学校里待更长的时间,一方面也接受训练以更适应工业社会的需求。霍尔甚至认为,德国的语言也更有优势,因为孩子们很容易掌握他们的“技术词汇”。这个对比十分重要,因为“经常会有人问为什么德国能在工业、商业、技术、管理领域发展如此迅猛。”教育是这种“复兴”的关键,而且还有民族目标意识的支撑,这些地方

令美国自愧弗如。

美国学校的“软弱无能”是这一代青年目无法纪的重要原因。霍尔在1908年的文章中批评道，“迅速增长的女性化教学队伍”导致了这一局面：“道德劝说大行其道，鞭刑被废弃，在以男孩为主的学校里用感化和糖衣炮弹是毫无作用的。”在旁边所配的插图中，一组足球运动员与滑雪运动员正在与一个披着长发，身穿绣花锦衣的年轻艺术家进行较量，这个艺术家就代表着颓废派。

霍尔并没有完全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但他对高校教育的不足非常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这场讨论最终甚至担心到美国的国际地位。霍尔认为“流氓主义”是个纪律问题，这对教育家和商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的美国大众时代不喜欢个人主义和观点相异者。在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要扮演，但是，就像在欧洲一样，这个角色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而非阶级。

美国与德国同属暴富的国家，但两者的区别很难说清。德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德国的发家史既鼓舞人心，也令人堪忧。美国的问题是消费能力跟不上高水平的生产力。这种缺陷导致的结果是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及19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了经济大萧条。解决这种僵局的方法不是减少生产力，而是为更多的产品寻找并扩大潜在市场。

解决方式之一是加大出口力度。1893年博览会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功后，美国开始了海外航运与出口。1902年间，资深银行家弗兰克·范德里普（Frank Vanderlip）盛赞美国对欧洲的“商业入侵”：美国“把煤炭送往纽卡斯尔、棉花运至曼彻斯特、餐具卖往谢菲尔德、土豆运到爱尔兰、香槟卖给法国、手表卖给瑞士、‘莱茵’酒出口德国。”“天定命运”的信条战胜了孤立主义者的门罗主义。

美国的年轻人不需要像德国的同龄人一样防卫四处的敌人，他们的任务是在工厂里老老实实地工作，而这些工厂已经开始让他们心生厌倦。在商人们看来，每个不良少年和娘娘腔的男孩都在拒绝履行一个男人应该履行的责任。正当美国需要大规模生产的时候，本土青年却拒绝从事生产活动。雇主宁可怪罪学校，也不肯检讨自己工厂中糟糕的生产条件。

由于一系列的改革，到20世纪的头10年间，中学的人学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许多年轻人离开了劳务市场，但是新移民的孩子迅速填补了这些空缺。然而，企业家们很快就发现这些新鲜血液并非取之不尽的。许多美国新公民把原来国家的社会政策沿袭了过来，要求加强工会的作用。美国劳动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管理着学徒制度,联合会还试图提高年轻人的工资。

反童工运动已经初具规模:1900年前,28个州通过相关法律规范童工的使用。弗洛伦斯·凯利(Florence Kelly)是领导人之一,他成立了国家儿童劳动委员会(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呼吁联邦更加严格地控制“青年劳动力”。〔1〕1906年,约翰·斯帕格(John Spargo)发表了《孩子们的痛哭》(*The Bitter Cry of the Children*),对童工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斥责。霍尔对城市青少年问题的关注启发了简·亚当斯(Jane Addams),她提出了一系列观察报告和建议措施,这些都收在她1909年出版的《青年与城市街道》(*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一书中。

在书中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故事中,有一则关于一个15岁男孩在钢铁制造厂工作的故事:他的工作是“在小罐子里注满溶化的铁水时扳动杠杆。有几次,当罐子注满时,他愚蠢地用一小块镜子去折射金属的光,然后用光线晃他同事的眼睛玩。虽然工头曾为此大为恼火并两次没收了他的镜子,然而有一天在他找来第三面镜子玩时,忘记了已经装满铁水的罐子,几乎就在一瞬间,漫出的铁水烧掉了他的双腿。”

亚当斯像其他改革者一样,也有把自己所处阶级的价值观强加给城市青年之嫌。但是,她的著作提出了有效的措施,提高了人们对青少年问题的意识,她希望能够改善条件的愿望和大众的愿望和需求完全一致。改良原则已经在美国思想中根深蒂固。许多移民开始相信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把进入中学学习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即使不是为了他们自己,也要让他们的孩子通过学习成为真正的新世界公民。上学为孩子摆脱工厂提供了一条出路。

由于年轻工人不断流失到学校中去,导致了雇主们的反击。学校教育在他们看来,花费太多时间在诸如拉丁文、代数和历史这些普通课程上,学校实行的是白领教育。1905年,他们的游说组织全国制造商协会(NAM)成立了属于自己的工业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n Industrial Education),其最终目的是要与两大威胁作斗争,一大威胁是工业力量日益崛起的德国,另一大威胁是新的教育体系加强了

---

〔1〕 国家儿童劳动委员会历经几年的游说,于1916年通过了一项新的联邦法令《童工法》(Keating-Owen Act)。这项法令严格地规定了雇佣年轻劳动力的条件:工人不得小于14岁,矿厂和采石厂工人的最低年龄为16岁,小于16岁的工人不能上夜班。一天工作不超过8小时,一周最多工作48小时。虽然最高法院在1918年裁决该法案与宪法相违背,但它为许多州的独立法律提供了模板。

工会力量。

以德国的技术工业教育制度为模板,制造商委员会也试图给“美国男孩子们”提供管理和技能的训练,让他们适应工厂工作。通过另一个叫做“全国职业教育促进会”(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Education)的游说组织,他们激进地推出了一个等级划分的教育制度。正如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the School of Education at Stanford University)的院长在1909年所说,“是时候抛弃人人平等,社会没有阶级之分的过分民主的观点了。”

在这个新系统里,孩子们在入学时就被划分等级。名列前茅的学生将会受到全面的、精英式的高中教育,剩余的学生则接受职业培训,根据1908年全国教育协会大会规定,他们的课程包括“账目登录、商用算术、速记和打字、商务信函写作以及商务法律。在手工训练课上,学生们学习机械绘图,木工、锻铁、模板制作以及高级锻铁。”对女生还开设了一些家政技巧课程,包括“烹饪、缝纫、设计制作、服装制作和家庭理财。”

虽然这些改革很快融入了中学课程里,但他们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成。其问题在于“劳动者阶层”已经得到通过教育离开工厂这样一个台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再回到工厂去,尤其是工厂的工作条件依然恶劣残酷。更糟糕的是,这种教育等级划分制度开始导致一种已经存在的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制度:在一个黑人学生教育上每花1美元,在他的白人同学的教育上就花费超过33美元。

在推广这项制度时,美国商人和教育家们遭到了老师和家长的反对。他们没能认识到普鲁士制度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封建帝国的产物。19世纪第一个10年间,中学生的数量继续增加,学校教育者和职业教育者之间的斗争加剧了。如果说前者是致力于“社区与国家有义务让个人得到更好发展”的话,那么后者关心的是让“每个受雇佣者服从他所在工厂的生产。”

\* \* \*

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妨碍了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虽然14—17周岁年轻人在学校中的人数翻了一番,但是到这个十年末,这个数字只占这个年龄段全部人数的30%,而且大城市里的辍学率仍然居高不下。欧文·金(Irving King)在他1914年的调查报告《中学时代》(*The High School Age*)中提到在一些市区,高达88%的中学生未完成中学学业,因为他们“发现不可能也不值得

完成这些课程。”

中学本可以吸引更多学生,但现在却无法管理他们。迫于阶级划分的压力,课程也变得不合理。无论是生活所迫还是天性使然,许多贫穷的年轻人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促使他们留在学校,他们宁可到外面世界找份收入微薄的临时工或者沦为少年犯。在他们看来,即使口袋里只有几美分,就能给予他们地位和掌握自己生活的自由。

同时,中学被拔高成一个富有抱负的地方。它的形象被理想化,就像 H. 欧文·汉考克(H. Irving Hancock)1910年的畅销小说《中学新生》(*The High School Freshmen*)中所描绘的样子,一副小城镇和中产阶级的景象:甚至比富兰克·理查德为《磁石》杂志所写的故事更理想,他们非常符合当时的商业价值观。然而,虽然拥有比英国同龄人更多自由,美国贫民窟孩子的生活也很少能从政府作为中获益。

《中学新生》的故事发生于一个“人口大约4万的美利坚普通小城”,讲述了一个书店老板正直的独生子迪克·普雷斯科特(Dick Prescott)与为人险恶而且报复心极重的弗莱德·里得雷(Fred Ridley)之间较量的故事。“迪克的伙伴们都来自于经济水平一般的家庭”,“而律师里得雷给儿子弗莱德的零花钱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势利的年轻人的需要。”尽管只是个卑微的14岁中学新生,普雷斯科特绝佳的勇气和精湛的体育技能使他在学校的地位迅速上升。作为奖励,他被邀请参加高年级的舞会。

《汤姆布朗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和《磁石》都对斗殴和恶行进行了直白的描写。与之相比,《中学新生》则按照欧洲传统来讲述男学生的故事,因此带有说教的色彩。例如,面对羞愧的对手,迪克这样规劝他,“加油,弗莱德,改变一下自己。下定决心好好上完高中,以后好好生活,公正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快乐并且诚实——成为一流的人——这样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愿意和你交朋友。”要想获得同伴的尊敬,靠的不是钱,而是良好的体育技能和团队精神。

汉考克的小说与“男孩读物”所体现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他继托马斯·贝雷·奥尔德里奇(Thomas Bailey Aldrich)的《坏男孩的故事》(*The story of a Bad Boy*)和威廉·迪安·豪威尔(William Dean Howells)的《孩子镇》(*A Boy's Town*)之后,对美国孩子的观念产生了影响。在这些19世纪晚期的作品中,天性淘气精力丰富的男孩们被户外活动和务实的小镇精神驯服了。这些故事在一些儿童杂

志上连载,比如《青年伙伴》(*Youth's companion*)、《哈珀的年轻人》(*Harper's Young People*),以及一些具有明显导向性的读物,如欧内斯特·汤普森·塞顿(Ernest Thompson Seton)创办的《美国童子军》(*Boy Scouts of America*)。

这些男孩读物中所体现的道德观和塞顿 1903 年的小说《两个小野人》(*Two Little Savages*)一样,都继承了《青春期》一书中所探究的重要理论。对于作家约翰·T·特罗布里奇(John T. Trowbridge)来说,男孩是“粗鲁无礼的人。他们继承的不仅仅有来自父母的温和的一面,同时还带着野猫或猛虎般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让他们的祖先能够在困境中为生存而斗争。有时他的人性仿佛与他的夹克一样薄,松松地披在身上,而在外表下却是头野兽,剥去外衣你才能看到他们身上野兽的花纹。

这些书本为对付那些 8 - 14 岁的自以为了不起的野蛮小孩提供了切实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包括体育运动、父母监管和职业教育。欧内斯特·汤普森·塞顿创办的“美国印第安森林人”(American Woodcraft Indians)向青年人传授体育活动和实践经验。这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它绝不容许任何异议:就像塞顿在《怎么扮演印第安人》(*How to play Indian*)中所写,“不要反抗,反抗组织的任何决定都会招来开除的惩罚,这里永远要求绝对的服从。”

塞顿认为一个理想的人应该具有自我控制力和责任感。肖尼族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the Shawnee chief Tecumseh)廉洁无私,具有高超的领导才能,是“美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具基督教精神的形象,所以我选择他作为一个完美的典范来指引美国年轻人。”该运动的第一份完整宣言《印第安森林人的桦树皮卷》(*The Birch Bark Roll of the Woodcraft Indians*)发表于 1906 年,其自治性、奖励和等级划分制度、规章制度和誓言,以及神秘的户外活动,为童子军活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最成功的志愿者机构是“美国童子军”,它由芝加哥出版家威廉·D·博伊斯(William D. Boyce)创立于 1910 年,旨在为美国青年的旺盛精力提供一个有效的释放渠道。虽然是受到了塞顿的启发,但是博伊斯是个更好的组织者,并且留意到了巴顿-鲍威尔的成功之处:仅仅几年,他的组织就兼并了“美国印第安森林人”以及其他一些童子军团队,如“丹尼尔·布恩的孩子”(Sons of Daniel Boone)。同样是针对 11 - 17 岁的“男孩”,“美国童子军”采用了与英国同类组织相同的制度。

1911年,美国童子军发行了一本指南,叫做《男孩手册》(*Handbook for Boys*),其中有“美国童子军誓言”：“以我的荣誉起誓,我将竭尽所能,履行对上帝和国家的责任。服从童子军法律,时时帮助他人。保持身体强壮,意识清醒,品行正直。”童子军法描绘了对其成员们的要求：“一名童子军必须可信、忠诚、有用、友好、有礼貌、友善、服从、活泼、节俭、勇敢、正直、虔诚。”童子军的组织架构有严格的阶级之分,从最基本的小组巡逻队一直到更大的装备军。

该组织很快变成了一个国家武装力量。1912年,美国童子军第一次发行了他们的杂志《男孩生活》(*Boys' Life*)。这就在这一年,茱丽叶·“黛茜”·娄(*Juliette "Daisy" Low*)在亲眼见过“英国女孩卫队”(Britain's Girl Guides)后,成立了“美国女童子军”(American Girl Scouts)。两个组织共同强调户外运动、野营和森林知识:他们制定了一套规则来奖励童子军掌握某些技能,鼓励他们培养个人责任感、领导能力和社区服务的技能。1916年,国会为“美国童子军”颁发联邦特许状,自那时起,童子军在全美有超过25万人的规模。

不管怎样,中学依然为少年犯罪和童工等问题提供了最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像《中学新生》这样的小说有着明确的目标受众群体——“60岁以下的所有男孩”,它把现实生活中的学校和小说中的学校混为一谈。汉考克笔下青年人的英雄事迹掩盖了商业价值的迅速传播。汉考克总结说,“学校里并不都是游戏,学习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有许多伤脑筋的考试。尽管有体育活动,学校里的生活还是非常繁忙的。”

最初的中学被视为一种同化机器。为了满足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学生的需要,美国人发明了一种非常保守高度一致的社会机构。教室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同化工具。激进的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教室是让年轻人学习美国社会道德要求和标准的理想地方:一旦个体在团体活动中成为“参与者或合伙人”,他的信念和观点将会“变得和群体中其他人相似”。

然而,通过教育实现完全同化在20世纪的头10年代仍然是难以实现的梦想。由于中学要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大众体制,它无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想同时采用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两种教育手段。虽然美国社会宣称人人机会平等,美国的学校也宣扬这样的论调,但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依旧主导着学校教育,学校里还是无法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

对于全国统一课程的激烈争论也反映了美国青年和工业之间令人烦恼的关

系。简·亚当斯认为,对儿童和青年残酷的剥削,“将有熄灭青春之火的危险”。将教育工业化没有取得成功:到1912年,只有7%的高中生选修工业或贸易课程。成为一种“产品”或是“人体机器”不足以实现美国青年已经被赋予的社会角色,他们代表了一个新兴国家的蓄势待发。

我们说美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正处在“形成”的过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的特殊地位也应该得到承认,他们与欧洲那些突然成为破坏者或是牺牲品的青少年完全不同。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让年轻人服务于美国的国家计划,那就是把工业生产与对正在形成的美国精神的理解相结合——既追求现实,又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理想主义,这正是霍尔、鲍姆和其他先驱对青年人的印象。

亚当斯笔下的年轻钢铁工人不适应机械工作,因为在他这种年龄,他仍然还处在玩耍和梦想的阶段。欧文·金在对美国教育制度进行深入调查后总结说,“从传统意义上讲,青少年都喜欢梦想,他想要的东西连他自己都无法表达。他觉得他的脑子里有某个伟大的思想,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抓住这个思想。他觉得他将要解开生存之谜,这个谜至今为止还在困扰着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尽管年轻人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真正鼓舞美国甚至欧洲青年人的还是梦想经济。随着美国的产品穿越大洋,美国人人平等的承诺正在渐渐受到工业需求的破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这就好像美国的立国之本面临被抛弃之时,干脆走向它的反面,仿佛是在以毒攻毒。

## 8

# 候鸟运动和新异教主义

欧洲的回归自然运动

在仲夏的夜晚,我们又一次庄严地祭祀掌握永恒青春的诸神。停下前行的步伐,庆贺他的诞生和拯救。我现在还在回想那仪式:一定有火,还有水,那是日出时从圣洁的水晶杯中倒出的泉水;还有由犬蔷薇和金银花编成的花环;一只清晨时从笼中被放飞的小鸟;还有我们在朗朗的祷告声围着跃动的火焰舞动的身姿。

——雅克·拉维拉,《给凯瑟琳·考克斯的信》,1910年1月19日



鲁恩堡荒地上的候鸟运动,1909年

1903年早期,一位名字叫卡伦·霍尔耐(Karen Horney)的17岁女生在她的日记中记录下了她澎湃的感情:“我好像一名船长,从自己安全行驶的船上跃进了海里,在海里抱着一块木头。起伏的波浪时而把我卷到这边,时而把我卷到那边。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进入风暴的中心后,她使用了一首充满疯狂意味的诗,试图来表达自己的情感。诗中她看见自己被困在一座古老的砖石结构的堡垒中。“这堡垒存在了几千年,专为我而设,它的内部幽暗,空气凝滞——我渴望自由。”

尽管差不多要被埋葬在这座腐朽的砖石结构中,她又空手把自己刨了出来:“我呼吸生命的气息。强烈的光线差点使我失明——但很快我就习惯了这种明媚。我四下展望。视野很宽阔,视线可以游移到无限的远方。新鲜和美丽的事物在我眼前充斥着,肆虐着,简直让人吃不消。这时,一股强力的欲望占据了我,几乎要将我的胸口炸开。它驱使我浪迹四方,去看,去欣赏,去了解所有的一切。”然而这种新自由带来的不是同化,而是进一步的疏远,“我无家可归,居无定所,四处流浪。”

卡伦·霍尔耐参加动物解剖课的愿望被一名男性教师拒绝后,怒火中烧,决定代之以剖析自己:“这样也许要困难得多,但也会更加有趣。”她的朋友爱丽丝对她承认过自己时不时地和“一些陌生的先生出去”。与爱丽丝的一番谈话让卡伦·霍尔耐更加困扰,她记录了这次交谈:“我说:‘我以为这种事情不会在我们这些人中发生。’爱丽丝笑了:‘有很多。我们班就有个女孩曾经这样做过——甚至跟她的父亲。’我震惊得无言以对。”

霍尔耐思想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文学和传统的道德说教,这使得她陷于挣扎之中。她认定委身于一个自己真心喜爱的男子绝不有违道德,然而她又批评婚姻是假情假意的行为,认为所有的道德说教都是胡说八道,是伪道德。她在自己日记的结尾处展望了未来:“它会改变吗?将如何改变呢?什么时候呢?一个新时代就要来临,我全身心地希望,也许下一代人将不会了解到这些内心的挣扎。”

霍尔耐出生于一个富有的中产阶级家庭,她是德国最早得到教育机会的女性之一。在她的故乡汉堡,1901年后女性仅能进入高级中学——这是一种精英教育制度,至于大学,也是在1900年以后才开始接收女性,但仅限于医学院。霍尔耐的日记中有大量的篇幅是关于妇女权利的,她非常崇拜瑞典的女权主义者爱伦·凯(Ellen Key)。爱伦·凯在她的《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一书中倡导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霍尔耐是许多北欧中产阶级青年中的一员,他们都试图在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重塑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新的战斗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她写道,“我们渴望情感自由,渴望表达情感的自由,是自由而不仅仅是许可,因为我们感到了自然的呼唤。”对变化的渴求不仅限于仍被视作二等公民的女性。女权运动是年轻人对父辈所掌控的19世纪世界的反叛,他们把那个世界视为一场充满物欲、虚伪做作的噩梦,认为它使思维变得呆滞。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作为对军国主义和工业主义的回击,新青年运动在英国和德国兴起。年轻的追随者认为前进的唯一方向就是后退:倒退到异教的自然崇拜中去。然而,在寻求摆脱成人羁绊的过程中,他们表现出了欧洲人井然有序的生活中看不见的激情。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在《青年朵里斯》(*Young Torless*)一书中写道:“有一扇门通往另一个世界,那儿一切都被压抑着,一切都在涌动着,一切都在燃烧着怒火,一切都原形毕露,一切都具有毁灭性。”

年轻人的这种反应在德意志帝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20世纪早期的德国,资产阶级儿童享受不了英、法、美等国同龄人所享有的那种自由。这个国家的制度高度认可赞同德国上层社会严格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这样的制度下,这些青年发现普鲁士特权构成了一个瓶颈,挡住了他们前进的步伐。这种令人不满的状况由于各阶级中都存在的紧张父子关系而变得更加糟糕。

18世纪弗雷德里克王子(Prince Frederick)的故事代表了普鲁士理想的教育模式。爱好艺术的王子试图离家出走,以此来反抗自己严苛的父亲——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King Frederick William I),结果他被人出卖并被逮捕:对他的惩罚就是让他观看和自己一块出逃的亲密朋友汉斯·赫尔曼·冯·卡特(Hans Hermann von Katte)的处决。残酷的经历让他成熟并成长为这个国家的传奇人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这种残忍加深了父子间致命的敌意,而这种父子间的敌意弥漫于德国上下。

与此同时,全日制学校教育制度强调学术氛围和严格的纪律,但它无法像英国公立学校那样受到青少年的支持,因此造就了一批不安于接受摆布的学生。这就是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在《春夫的觉醒》(*Spring Awakening*)一书中所揭示的虚伪的独裁主义。同时校园里大批男学生自杀的现象未得到丝毫缓解。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克海因(Emile Durkheim)在他的学术著作《自杀》(*Le suicide*)一书中,比较了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自杀比例:16—20岁年龄段中自杀比例最高的是萨克森州和普鲁士。

最近被重新发现的作家弗里德里奇·荷尔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异常受欢迎,从这点可以看出德国青年那种深深的不满。他1797年写就的小说《许珀里翁和在雅典的隐士》(*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采用了《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中使用的第一人称视角:这种直接的称谓使这部作品在20世纪声名大噪。这位命运多舛的浪漫主义作家表达了拒不妥协的决心:“我找不到比德国人更加分裂的人。”对他而言,“青少年”不属于“人类”:他们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善自己。

罗伯特·穆西尔在他1905年关于军校题材的小说《青年朵里斯》中探讨了普鲁士教育在处理青少年澎湃的能量时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书中,朵里斯被另一个男孩的肉体吸引而饱受煎熬,这让他发现自己对那种有条不紊、合情合理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产生了怀疑。

如果这种斗争对于女青年来说是为了获得社会和性别平等,那么对于男青年而言就是脱离士兵或运动员这种固定模式,给自己寻找另一种定位。在王尔德和诺尔道的作品《堕落》(*Degeneration*)之后,颓废美学显得过时,受到诋毁,唯一的出路就是用一种新方式去探索男性的多愁善感。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在户外生活中才能表现出本能和自然的情感,才能发现自然神秘主义。这种狂潮始于20世纪,从此便风靡一时。

这种创立一个新式的、独立的青少年世界的强烈欲望最初在德国得以实现。“候鸟运动”(The Wandervogel)提供了一种简单却方便易行的逃避专制的形式。这个构思很简单,“候鸟”(wandering bird)的名字包含了这样一个概念:长期去乡下远足和宿营的小组。一名早期的追随者回忆道:“候鸟运动的实质就是远离学校和都市的羁绊走进一个开阔的世界,远离学习任务 and 日常行为规则去探险。”

1896年春,柏林附近斯特里兹中学(gymnasium of Steiglitz)的赫曼·霍夫曼

(Herman Hoffman)开始同他的学生进行远足,从而拉开了这场运动的序幕。他当时是一名年轻学生,同时也是该校的兼职教师。在这些长时间的野外远足中,大家燃起篝火,合唱歌曲,累了就倒地而睡。这些特点迅速吸引了不少男生追随者。户外远足风气大盛,到1900年,它甚至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团体。1901年,卡尔·费歇尔(Karl Fischer)担任这个团体的主席,他是个奋发有为、极具号召力的人物,在原组织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名叫“学生旅行委员会”(Ausschuss für Schulerfahrten)的官方组织。

德意志帝国仇视这场当代运动,因而这个组织的术语都有意使用了一些具有古老魅力的词汇。费歇尔被冠以“至高无上”(Oberbachant),这个名字在中世纪时是用来称呼旅行学生的首领的。费歇尔要求成员们对他绝对服从。该组织有一套成员考察试用体系,还设计了一套可追溯到前工业时期的制服,包括帽子和徽章。费歇尔将“意志权力”的概念引入到霍夫曼的自然神秘主义中。他将远足视作一种“宣传理念”：“拯救自己,握紧旅行的手杖,去寻找你那已经失去的自然和坦诚。”

尽管候鸟运动的领导很有控制欲,它仍然吸引了很多人,因为在这里他们能得到自由。汉斯·布鲁尔(Hans Blüher)是第一批的成员之一。他于1901年加入,那时的他刚进入青春期。在汉斯眼中,这场运动是一场自发的、浪漫的抗争,它摆脱了中产阶级的陈规旧律:在街头打架,受卡尔·梅(Karl May)西部小说的影响装扮成印第安人。这些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诱人之处,而抽烟、喝酒以及与真正的流浪汉交朋友使这场运动更加多姿多彩。

尽管存在诱惑,简单的生活方式才是候鸟运动的核心。他们用最少的钱和享乐品去完成旅行:以地为炉,在篝火上完成三餐,至于住的地方则在谷仓和帐篷中。成员们常常用诗歌或图画记录下自己远足和在乡野的感受,这些作品被编成小杂志出版。这些活动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了古歌谣,他们在吉他和诗琴的伴奏下集体歌唱,这促成了德国民歌的复兴。

与童子军不同的是,候鸟团体虽在一位长者领导之下,但他们是自己管理自己。典型的小组包括7—8名成员。后来,一种金字塔结构出现了,这种结构扩展到地方分支,包括某个城市中的所有候鸟团体,接着它又扩展到被称作行政又(Gau)的省一级分支。大部分成员都是刚进入青春期的男生:12岁以下的因为年龄太小而忍受不了远行的辛劳,而19岁以上的大多数青年都正在服兵役或在学

校受教育。

运动早期并没有派别之分,但逐渐地,派别开始出现,表现为佩带不同别针和徽章,或是戴一顶扎眼的帽子。各团体活动集中在名叫“海姆”(Heim〔1〕)的俱乐部会所,这种作为会所的小屋或房间里挂着俱乐部徽章,还有一个小型的图书室。跨国旅行是候鸟团体组织的最大型活动。这种旅行大多安排在夏日,但也有在周末和主要节日举行的短期宿营和远足。当时没有连锁经营的青年旅社,所以这些旅行简直就是史无前例的。

“候鸟运动”的成员们试图遁入恬静的桃源以逃避现实,但他们并未能与外部世界绝缘。同其他所有德国团体一样,他们也令人困惑地有着分裂的倾向。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公开宣扬的自由理想同他们经历的专制独裁的成长教育方式之间存在非常激烈的冲突,抑或仅是因为德国人乐于把成立好的团体再分裂。当然,造成候鸟运动被公众政治拒绝的还有一些深层原因。

这个运动只从个人利益出发,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章程:早期参加运动的人身穿中世纪的服装,思想开放坦诚,与具有同样反抗意识的同龄人团体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早期的追随者让当时的德国社会非常不安,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桀骜不驯,在性方面非常随便。这场运动准确地表达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心声,他们长期被夹在反抗意识日益增强的工人阶级和普鲁士精英阶层之间。但是它也间接地让人们对与血缘和种族观念紧密相连的现代主义产生恐惧。

随着这场运动的流行,它变得愈发多样化,愈来愈深入意识领域。新的小派别涌现,种类繁多,从政治上右倾的组织“幼鸟团体”(Jungwandervogel)到“汉堡旅行远足联会”(the Hamburg Wanderverein)之类更具都市文化气息的组织。其中也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一群梦想家聚集在瑞士的奥斯考那山村(Swiss hill village of Ascona)组成了一个公社。在这个公社中他们实践着素食主义、自然疗法和自由恋爱。这块由“真性情的拥护者”构建起来的区域为无政府主义者、文人还有候鸟团体的成员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赫尔曼·鲍勃特(Hermann Popert)在1910年的小说《赫尔姆特·哈里加》(*Helmut Harringa*)中讲述了一名青年的故事,他不仅反对德国普鲁士的学生组织,也反对酒精和婚前性行为。这本书的流行引发了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新趋势。

---

〔1〕“家”的意思。——译者注

在小说中,哈里加染上了性病,玷污了种族的清誉,他最后选择了自杀,“我再也没有勇气仰视我的祖先。”禁欲与种族的纯洁紧密相连,在20世纪第二个10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候鸟运动组织里吹响了禁欲的号角。

两年后,汉斯·布鲁尔出版了颇负争议的三卷本《候鸟运动历史》(Wandervogel history)中的第一卷,它的出版更深一步地传播了这一运动的理念。在第三卷里,布鲁尔揭露了该组织一系列错误中的一个。布鲁尔曾经因为其同性恋的身份而遭到“反候鸟运动”(Alt-Wandervogel)的主席威利·詹森(Willi Jansen)的驱逐,对此他非常愤怒。布鲁尔引用弗洛伊德、性学先驱马格斯·西谢腓(Magnus Hirschfeld)的理论以及维护同性恋权利的报刊《个性》(Die Eigene)提供的信息,在书中指出,这场运动中男性间情谊的维持有赖于同性相恋。

1913年,他的书一经出版,这一部分内容立刻掀起轩然大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其中的同性恋丑闻——特别是1907年的哈登·奥伦伊贝格(Harden-Eulenberg)事件——这些爆料揭露了普鲁士人平静外表下隐藏的激情。然而,这些风波却削弱了布鲁尔的主要观点。他认为在成为具有完全责任的成人之前,“候鸟运动”构成了一个缓冲带。卡尔·费歇尔构想了一个“校园男生”阶段和一个“生活圈”。在这个“生活圈”中,男孩可以而且必须为以后成为真正的男人做准备。

然而,布鲁尔对女性的仇视暴露了“候鸟运动”内部最大的缺陷:事实上,这个组织由清一色的男孩子组成,排斥异性。在运动的早期,不允许女性参加活动被视作一项基本原则。这种对女性的排斥一直持续到“候鸟德国联盟”(Wandervogel Deutscher Bund)的成立,它是一个由年轻女性构成的独立团体。此后,一些其他团体也有限制地允许女性的参加,条件是这些女孩们得由她们的母亲监督她们的行为,而其他的一些团体比较保守,仍然拒绝接受这一做法。

然而,压力却势不可挡:到1911年,已经有很多青少年团体的领导达成了共识,即青年女性在这场运动中具有同等的地位。尽管如此,关于不同性别之间是否应该被隔离仍然存在不少争议。令人惊讶的是性别混杂并没有使“候鸟运动”出现性行为混乱的局面。伊丽莎白·布斯·威尔逊(Elizabeth Busse-Wilson)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亲历者,认为这场青少年运动充斥了大量行为乖戾的女孩,她们把自己搞得毫无性感可言,并且“通过这场运动中发现了男人。”

霍尔把青春期表述为人生中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性别开始在一个个

领域确立它的主导地位。这场运动中的成员就是一大批“彼得·潘”们，他们摆脱父母的束缚，试图否认他们之间那种最明显不过的联系。禁欲给每个人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卡伦·霍尔耐在日记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冲突，虽然她极力去把自己从日常生活的道德束缚中解脱出来，但还是拗不过那个时代强大的规范。

她的解决之道是抛弃感官层面的快乐，她认为独身使女人走向强大：“只有这样女人才能独立于男人。否则，她会总是对男人充满渴望，在强烈的感官欲望中迷失自我的价值。”不过，在她追求独立自主的同时，她将自己想象为妓女。正如她自己承认的那样，关于妓女的想象隐含着一种受虐的想法，放弃自己的人格，匍匐在他人面前。在追求自由的表面下，其实隐藏着被征服的欲望。

青年们全身心地渴望自由，但理想变为现实后，生活在专制国家里的青年却不安了。“候鸟运动”日益强硬的政策就是这一悖论的明证。这个组织从一个由喜爱自然的青年组成的松散组织变成了一场内部分歧不断的运动。到1912年，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赫尔曼·鲍伯特的先锋队（Vortrupp），该组织推动了人种卫生学的发展，谴责纵欲、饮酒和抽烟等行为，反对构建平民社会。

似乎，自然崇拜的最终意义太过骇人而不可想象。男人接受异教思想而被指责为同性恋，而女性，即使不是色情狂也至少会被指责为妓女。“候鸟运动”在目的和手段上同童子军有很多相似之处——热爱户外活动和保证同龄人之间的联系——但由于缺少成年人对他们的领导，德国的青年们选择自我约束。他们试图在生活中摆脱父母的束缚，但内心却被他们一直要抛弃的独裁主义颠覆了。

\* \* \*

在英国没有相似的候鸟运动。对于这个国家的青年而言，自由在20世纪初还是镜中花水中月。在上流社会以及中产阶级中，过时的维多利亚时代风尚和独立自主的萌芽之间已经开始出现沟痕，父母们在努力抹去这个沟痕。尽管如此，在诸如斯坦利·霍尔的《年轻一代》（*The Younger Generation*）之类的戏剧中可以看到，人们对青少年的叛逆行为所表现出的宽容却是有限的。人们期望青年男性遵从父母为他们所做的职业选择，而女性青年仍要为了门当户对的婚姻而忍受诸多训练。任何男女青年之间的会面都有一名行为监督人严格控制着。

在大多数工人阶级的家庭中，父亲仍保持着绝对的权威。罗伯特·罗伯茨在他的《经典的贫民窟》一书中忆起20世纪初的这批青年，他这样写道：“女孩子尤

其受到严格约束,她们的父亲规定她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去,并且要求了解她们在哪儿,和谁在一起。父亲们还规定了严格的回家时间,很少有女孩子敢于违反规定。我的一个邻居家的女儿,已经19岁了,还是因为参加歌唱练习晚归10分钟而挨打。”各种束缚并不仅限于人身自由。

罗伯特在《萨尔福德》(*Salford*)中回忆:对音乐书籍或所有艺术的兴趣,以及对学问甚至礼貌与智慧的向往都会让人心存怀疑。随着上尔德审判所造成的影响加深,“文化与同性恋相联系”的论调扩展到各个阶层。只有在互不相识的大城市中,青年人才能实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在他描写丑闻的小说《安·维罗妮卡》(*Ann Veronica*)中制定的审美原则——“如果个性意味着什么,那么它就意味着打破束缚限制,意味着冒险。你是愿意恪守道德规范做一个性格分裂的人,还是愿意行为放荡但是做真正的自己?我们选择后者。”

尽管波希米亚主义只是少数人的选择,但是它还是成为那些不愿恪守陈规的特权阶级年轻人发泄情绪的少数途径之一。加入“费边社”〔2〕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也是方式之一。对于各阶层的女性而言,通过“妇女社会和政治联合会”为女性选举权进行斗争是一种最激进的选择。然而,没有一个团体是围绕青年人这一特定概念建立的,无论是作为一种理想目标还是实际操作原则。

新异教组织(Neo-Pagans)是唯一这么做的团体,它聚焦于奉行野外实践的童子军运动和候鸟运动,是一个由精英构成的新异教徒小团体。他们聚集在一起外出野营,讨论社会主义,享受裸体日光浴,对性进行理性的探讨。作为该团体的一员,葛温·拉弗拉特(Gwen Raverat)后来回忆说:“我们常常懒洋洋地靠着背椅,百无聊赖地谈论着艺术、自杀和性。”至少就他而言,反抗只是一时冲动,但对他影响很大:“当我看见所有的父母给子女带来的灾难时,就会想到所有人到了40岁都应该被杀死。”

新异教组织成员由大约20名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构成,他们围绕在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雅克(Jacques)、葛温·拉弗拉特和奥利弗四姐妹(four Oliver sisters)身边。他们是因为对费边社会主义理论的共同兴趣而走到一起,但他们也唤醒了人们的青年意识,他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束缚,赞成及时行乐。他们的自由性爱在推行行为监督人的时代无异于一颗惊天巨雷。但他

〔2〕 伦敦创立的一种渐进社会主义团体。——译者注

们太过陶醉于自己的活力、天分和美貌,因而走得太远了:他们怎样才能把时光留住呢?

1909年夏,鲁珀特·布鲁克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成为新异教团体的宣言。他开篇就假设地提出“世界的构成非常不合理,它所存在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人们将会老去。”身体的衰弱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灵魂的腐朽。接着,根据他的这个假设,他展望了自己所在组织的前景:“我们如今20多岁,到1920年,我们30多岁,到1930年我们40多岁,对着一些曾和我们一块年轻过、如今却已结婚、相当成功但却大腹便便、保守多疑的人说话。”

他评论说伦敦到处是“行尸走肉”,这些人曾经年轻过,“为他们终将葬身的文明着迷”。“假设过去有一批伟大的青年有组织地去逃脱这个强大的毁灭者,从而永葆青春,假设他们已经成功了,难道这不是一场神奇的、无与伦比的胜利么?”布鲁克曾号召全体成员于1933年5月1日早餐时间在巴塞尔火车站聚会,唯有如此他们才能永葆青春,他说:“我们要做儿童70年而非7年,要亲身去体验浪漫而非只是空谈。”

布鲁克的热情很快就感染了其他成员。他后来记述:“这种永葆青春的奇妙想法让我们着迷,我们想象着:一群青年,齐心协力,发誓要身体力行一种理想;他们暂时分开去完成各自‘在这个尘世的工作’,然后在20年后,一个约好的春日早上再次相遇于春风拂晓的路上。那时他们获得了新生,要共同创立和发现一个新世界,抛弃所有关于世界的陈腐知识,在阳光下、雨水中重生——我们立志要做这种人。”

通过决定24年后相聚,布鲁克是要人们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抛弃成人的责任和焦虑,从而抹平时间上的鸿沟。不是跨入中年而是神奇地返回青年时期那个优雅美丽的自己。这是对儿童浪漫主义观的一个新变化,是一门主张活力论和实际行动的哲学。它让人想起《彼得·潘》和《道林·格雷的画像》中对青春永驻的痴迷,并且将广泛流传于20世纪初那一代人中,被他们奉为圣旨。

布鲁克作为团体内的“金童”——用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es Darwin)的话来说:“布鲁克是‘一位年轻的阿波罗’,努力向上,具有超凡的魅力,但是他并不安分并且自视过高。”。作为一个深受私立学校束缚的儿童,他从十几岁就开始对他的这种背景进行反抗。在剑桥大学,他标新立异:留着长发,穿软底鞋,把衬衣领扣敞开耷拉下来。觉察出反维多利亚的征兆后,他迅速地脱离了造作的颓废,

转向素食主义和费边社会主义。

这些因素并不和谐地共存于布鲁克性格中,但他注重瞬间的永恒,这清除了他性格上的矛盾。他曾下结论:“我们继承了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要在未来哭泣?现在不就是属于我们的嘛!”然而除了间或提出费边主义的“提高觉悟”外,新异教团体的章程非常含混,缺乏切实的行动。青春、特权和自然也许能将他们粘和到一块,但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组织的行为准则。

尽管布鲁克热情洋溢、充满信心,新异教团体的成员们却陷入了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受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这些思想家有关异教主义和性开放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仍然信守中产阶级的道德信条,坚持认为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正如大卫·加尼特(David Garnett)后来所回忆的那样:“18岁时我能离一个漂亮女孩一两码远睡觉而不会动要跟她做爱的念头,这很自然,我就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

然而有很多必须要考虑的现实因素。对女性的惩罚非常严厉,因为她们一旦失足,不但会身败名裂,而且还会导致怀孕。新异教团体的成员们必须保护贞操、鼓吹禁欲。可是,这种性方面的约束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转移他们已经被唤醒的强烈本能,他们开始无数长时间的恋爱,中间不可避免出现的妒忌和被压抑的欲望几年内就让他们的组织四分五裂。

作为新异教团体的傀儡领袖,鲁珀特·布鲁克是这些冲突的化身,他的偶像地位掩盖了他内心激荡着愤怒和不安全感的真相。短短几年内,他追求了三名新异教团体里的女性,诺埃尔(Noel)、布林希尔德·奥利弗(Brynhild Oliver)和卡·考克斯(Ka Cox),同时又表现出阴阳人和同性恋倾向。在很多异教团体成员加入接受同性恋行为的布鲁斯伯里运动(Bloomsbury movement)后,布鲁克一下子无法自恃,他不寻常的消极状态使他陷入了他自己都厌恶的处境。

1912年1月,布鲁克的神经差点崩溃,这击碎了他的平静,也打破了团队的融洽关系。试图摆脱道德束缚的“彼得·潘”之梦就此结束。几个月后,新异教团体的成员们不欢而散,该团体内唯一的已婚人士,雅克·拉弗拉特(Jacques Raverat)曾预言过这种情形将会发生,他在书中写道:“青春具有欺骗性,年轻人一时疏忽,将很多人想象得过于美好。步入中年时才发现自己的灵魂和身体都在外面裸露着。”

从1912年开始,鲁珀特·布鲁克在艺术和社会方面开始退缩到保守主义,他

完全彻底地否定了之前的激进观点。当他访问现代主义的都市柏林时,发现这座城市中自己周围的人的行为举止都不拘泥于常规,对此他的反应是写了一篇充满田园牧歌情调的文章向自己的异教青春作别,在这篇名为“古老的歌兰切斯特牧师住宅”(“The Old Vicarage, Grantchester,”)的文章中,他怀念着英国乡村永远不变的传统。他开始希望以死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说:“那些最了解我的人(即我自己)认为我应该死去,我自己也不情愿存活于世。”

\* \* \*

新异教团体成员和候鸟运动的影响还仅限于象征意义,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与同时代的那些官方青年组织或青年政治团体相比,他们在数量上太微不足道了。英国的童子军让这些阳光中的孩子相形见绌。在德国,社会主义和宗教青年组织吸引了那些出身工人阶级的青少年,而候鸟运动对这批人来说却毫无吸引力可言。许多中产阶级的青年则加入了刚成立的“德国青年联盟”(Jungdeutschlandbund),该组织成立于1911年,由成人掌握,以军事活动为基础,它实际上是童子军组织在德国的一种变体。

然而,这两个崇尚自然、追求异教的团体只是系统地去尝试确立青年的独立地位,他们认为这种独立地位是新世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一些有远见的人提到青年自由的特征,但准确的特征还是不清楚。异教团体成员和候鸟运动成员本能地希望通过避免性行为和情感的投入来延长自己纯真的童年,但这使得他们极易陷入追求永恒青春的病态中。

王尔德和巴里所宣扬的死亡本能都是些镜中花水中月般的泛泛空谈。20世纪初的先驱们,如G.斯坦利·霍尔,认识到由于现代生活复杂性的要求,青春期应该被延长。然而,他们一头扎进带有非理性、特权和逃避主义意味的异教后,并没能带动广大的同龄人,相反却被困在旧世纪的诸多限制和新世界的狂野之间,成为了这个冲突的牺牲品。

## 9

# 五分钱影院和动物舞蹈

美国的梦幻经济

年轻人什么样的人生都想亲身体会，什么样的事情都跃跃欲试，什么样的东西都想拥有。突然有一天，他们开始读懂生活。这时的他们已经吞下了知识树上分辨善恶的果子。〔1〕

——兰道夫·波恩，《青春和生活经历》(1913)



《去看电影》下午2:30,新泽西州,泽西城,刘易斯·海恩摄,1912年

---

〔1〕 the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知识树上分辨善恶的果子”的典故来自《圣经·旧约创世记》亚当夏娃吃下禁果，——译者注

20世纪初,欧洲和美国的青年们为自己确立了不少新的独立形象。这些形象中的一部分来自当时流行于青年市场的报刊杂志,还有一些就是从迅速发展的大众传媒上直接照搬过来的。与美国对青春期的新生所给予的关注相伴而生的,是商业心理学的发展以及电影产业的发展,电影首先是从青年人群中打开市场的。根据斯坦利·霍尔的观察,这批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热衷的事物使他们稀里糊涂地成为了新型消费社会的实验对象。

当电影传播到欧洲时,美国的印第安人成了荧屏上最受崇拜的美国文化形象。这样一个凭空创作的人物形象通过多种途径得到了发展:水牛比尔(Buffalo Bill)的“狂野西部”展览(Wild West show)、爱德华·希尔韦斯特·埃利斯(Edward Sylvester Ellis)等创作的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故事、赞恩·格雷(Zane Grey)和德国人卡尔·麦(Karl May)的“西部”小说、查尔斯·N. 丹尼尔的歌曲“海华沙”(“Hiawatha”)带来了印第安人歌曲的风行一时。美洲这块大陆被征服的时候,印第安人无处不在,这提醒着人们个人主义将被新出现的大众社会打败。

20世纪早期,美国印第安人长期作为儿童读物的主要内容,被视为一种象征,吸引着广大青少年。尽管他们在与牛仔们的战斗中经常吃败仗,但北美印第安人充满野性,很自由。他们同广大青年一样有返祖倾向,由于他们身处弱势,因此很容易在寻找身份的新青年阶层中产生共鸣。这些美国和欧洲的青年们没有权力,但却一直被提醒要向国家尽义务,他们在印第安人逃亡的形象中看到一种象征,它象征着宽广的空间以及重压下的优雅。

这在20世纪初的黑帮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在汉斯·布鲁尔的关于《候鸟运动》历史的书中,他称赞这种关于印第安人的表演让人们摆脱了中产阶级的诸多束缚。在法国,巴黎的阿帕切人将这种认同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丑闻。而欧内斯特·汤普森·塞顿和巴顿-鲍威尔则是利用印第安人的影响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童子军活动》尤其强调印第安人侦察兵那种丛林生存技巧,“他们常常背披狼皮,匍匐前进,并在夜间潜伏在营帐周围,模仿狼的嚎叫。”

其他一些形式也从大洋彼岸传了过来。吟游诗在 19 世纪风行英国,而 20 世纪时阔步舞出现了。1912 年的音乐剧《嗨,拉格泰姆》(*Hullo Rag-time*)的巨大成功标志着这场征服的完成。白人作曲家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创作的歌曲《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Alexander’s Ragtime Band”)是该剧的主打歌,这些表演以狂野的音乐和黑人风格的舞蹈深深吸引住了观众。未来已经来临,对于作家 J. B. 普里斯里(J. B. Priestley)而言,拉格泰姆音乐家们“正将我们驱赶到另一种生活中去,在那种生活中一切皆有可能。”

这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感觉是美国梦幻经济最有吸引力的地方。除了煤炭、火车、钢铁以及刀具之外,欧洲人希望从美国获得的还有它的广阔空间、它的粗野、它的激情以及它节拍强弱倒置的节奏。然而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美国被视作一名青年,那么就假设它具有青年人的特质——这些特质很吸引人但也很危险。年轻也许意味着能量和激情,但这些也很容易因为过头而走向野蛮和暴力。

在美国,商业开发和对青少年的控制并存,从而引起了矛盾。广告商们对心理的深入研究使青少年身上的返祖特征受到关注,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以物质积累和享乐为基础的社会来疏导这些特质。通过消费对社会进行控制比通过极权进行控制更为仁慈,但这必然导致享乐主义和清教主义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进而出现各种扭曲的现象。

\* \* \*

美国梦幻经济在 20 世纪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力,这在 1893 年的博览会就已有征兆。将想象中的事物变成实实在在的现金非常符合这个民族的性格,同时这也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所需要的。新移民的迫切需要,加上商业的发展,都促成了这种将人的基本心理同未来的科技创新相融合的新大众文化。它不仅是一种文化,同时也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并且迅速演变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潮流。

美国在技术方面的专长堪称世界一绝。很多 20 世纪的主要产品都在这个世纪的头十年问世,这些产品包括:第一台 10 英寸的唱机(1901)、第一次电力飞行试验(1903)、胶印平板印刷术的商业运用(1904)、第一台自动点唱机(1905)、第一次常规化的无线电广播(1906)以及第一辆大众款的汽车——福特汽车公司标准化趋势。劳动的分工日益细密。

1913年,T型汽车的风靡促成了福特公司第一条生产流水线的运营:它将劳动简化为最基本的任务,如拧下螺丝钉,拉下操作杆,并且无休止地重复着。尽管工会方面仍然存在问题,但美国的这种社会经济体制正飞速地成为现实。如果外部环境是不能变化的,那么就生产者和广告商们而言,个人以及企业内部的发展就成了重点。

这样的现状对于一个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讲非常具有吸引力。美国的现在代替了欧洲的去,一切都这么真实,并且似乎将永远进行下去。1903年爱德文·波特(Edwin Porter)拍摄了《列车大劫案》(*The Great Train Robbery*)。这是一部创新性的电影,其中不同场景的镜头不断交替转换让人感受到震撼,波特在自己这部影片受到好评时曾这样说过,“未来永无止境。”这种紧张和强度被套用到商业活动的原则中去:一个人如果要发生变化,靠的不是艺术或政治活动,而是要靠获得必要的消费品。

在把无生命的物体变成高效大规模生产的法宝这个过程中,心理学起着积极的作用,但这既不是霍尔信奉的学术式心理学,也不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它只是一种精简过后的变体,由广告商这个买者和卖者的中间人提供。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广告业增长了10倍,伴随着这种增长,更大的野心也随之而生。广告商们为了直接深入人们的下意识,开始把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广告中。

19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贸易的杂志《油墨》(*Printer's Ink*)就已在期待着“广告撰写者像教师那样研究心理学的时代的降临。因为,虽然他们的职业乍看之下大相径庭,但是广告撰写者和教师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影响人类的思想。”大众教育的“启蒙”进程在新世纪加快了步伐:沃尔特·迪尔·斯科特教授(Professor Walter Dill Scott)是它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他在1906年曾强调过“成功的广告商必须研究心理学而且现在就必须这样做。”

斯科特非常赞成对人类具有返祖性质的欲望进行探索:“我们依靠本能反应行动来保留和发展(1)我们的身体、衣服、家、个人财产和家庭;(2)我们出现在他人脑海中的自己;(3)我们的心智。我们已经看到,为了确保行动能沿着这些线路进行,彰显这些行动的价值和它的必要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予一种适当的刺激,然后行动就会马上开始。”

新式的广告超越了单纯的信息传递。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里,仅仅了解专利药品和脆玉米片的特殊性质还远远不够:现在它们明确或含蓄地表现改变日常

生活的力量。因此,脆玉米片的销售并不依靠它的营养价值,而是通过一系列戏剧化的场景:“它砰砰爆裂!它噼啪作响!它松脆可口!”克劳德·霍普金(Claude Hopkins)著名的“释疑”系列活动曾成功地销售出牙膏和汽车,而他的办法就是告诉人们,购买这些商品会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趣。

这些技巧主要是针对妇女,但这种影响在生活更早阶段就已经开始。斯科特在他著名的《广告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一书中将消费与青少年联系在一起:“青年男性在女孩子面前尽可能地想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但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女孩子在场的情况下,男孩子总是卖力地炫耀着,他觉得应该这样做,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实在很滑稽。当他跟女孩子呆在一块儿时,他似乎是被迫去做一些能够引起她关注的标新立异的事。”

维布伦的“金钱竞赛”已经发展成为一项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产业,如斯科特所言,它根植于青少年的社会心理。“作为青年男性和男孩子,我们很痛苦,在购买衣服和房子时、在选择朋友和职业时,我们不仅需要参考自己的喜好,而且还要考虑他人的意见,我们似乎是被迫去追求这些东西,以提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在购买和选择中,我们挑选那些我们敬仰的人所认可的东西。”

20世纪第一个10年末已经有了大量针对年轻女性的产品。在一篇名为《十几岁的少男少女》(“The Budding Girl and the Boy in His Teens”)的文章中,斯坦利·霍尔观察到年轻女性更喜欢“漂亮的搭配”。当时“刘海、卷发、束胸内衣、褶皱、丝带、唇膏、胭脂、高跟鞋、夸张的帽子、墨镜、装饰性的钱包、手镯、长筒手套很流行——这些时尚对旁观者颇有影响,也就是说这些事物占据了人们的思想,商店的橱窗是她们的梦想。”

霍尔不得不运用流行的青少年心理学,虽然这不是他的本来意图。1908年10月他赞扬了《妇女家庭伴侣》(*Woman's Home Companion*)中由年轻的露西·诺曼(Lucy Norman)创作的新栏目——“10几岁和20几岁”。她的文章目标明确,就是要把年轻的女生在未來变成能干的妻子:“我肯定我们的书非常受人欢迎,那些10几岁和20几岁的读者会学会如同熟练地使用针线,如何打理房屋,如何让花园里的花草安全过冬,如何让室内植物有足够的温度。”

1909年夏,弗洛伊德和他当时的同事卡尔·荣格(Carl Jung)受斯坦利·霍尔邀请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访问,并在卡拉克大学做了演讲,这加深了人民大众对心理学的认识。这次交流对于双方都很有益。霍尔在提高心理学的学术地位

方面得到了支持,而弗洛伊德则渴求能有机会走出奥地利进行演讲,并且他真心希望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尽管在此之前他出版了《日常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一书,但是他依旧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虽然学术界有人认为他“肮脏下流”,弗洛伊德对这次受到的接待还是很满意的。

像大多数新闻报道所描述的那样,听众对他很尊敬,弗洛伊德后来曾写道:“当我站在渥斯特的讲台上为大家演讲我的《心理分析五讲》(*Five Lectures Upon Psychoanalysis*)时,我感觉就像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梦成为了现实。”心理分析不再是一种错觉,它成了现实中有价值的一部分。1909年的这次访问使弗洛伊德声名大震,并且促进了其思想理念的进一步传播:性的重要性、恋母情结、压抑、日常生活中潜意识的存在、心理分析在治疗精神病中的重要性。

无论是1911年美国心理分析协会(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的成立,还是“弗洛伊德口误”(“Freudian slip”)这个词的出现,都证明了上述理论在学术界和普通群众中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外甥爱德华·博那伊(Edward Bernays)是公共关系领域的奠基人,他宣扬“大众心理学”,认为它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使弗洛伊德的理论同美国的环境更加适应。弗洛伊德坚持日常精神病理学的研究,这强化了“日常生活中也存在心理学”的概念,而这一认识更是被广告商们、生产者以及购买者们铭记于心。

\* \* \*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0年,大众娱乐日益流行。最引人注目的当推电影的发展,五分钱剧院令人惊异的成功促进了电影行业的问世,电影对公众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大约有1000万到2000万之间的人每周都会成为影院的座上客。这些人中很多都是儿童和青年,他们成百上千地被吸引到一个与现实不同的未来环境中,他们觉得那里才是属于他们的世界。

童工现象的副产品就是青年消费行为的开始,这直接促进了电影行业的迅速发展。在关于一战前生活的小说《长在布鲁克林的树》(*A Tree Grows in Brooklyn*)中,贝蒂·史密斯(Betty Smith)描写11岁的女主角弗朗歇·诺兰(Francis Nolan)在拿到薪水时的感受:“弗朗歇有了50美分的镍币,弗朗歇也就有了权力”。到了百老汇便利商店后,“她在走廊里走来走去,把玩任意一件她梦想中钟爱的商品。那是一种多么美妙的感觉,拿起一件物品,把它抓在手里,感觉它的轮廓,让手滑

过它的表面,再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她的镍币给了她这个特权。”

在“钱是美好的”声音中成长起来的美国年轻人将独立跟消费联系在一起。到了19世纪末,报童、街头商贩以及学生在糖果店和便餐馆里消磨时光,买些糖果、汉堡和冰淇淋。然而,最受欢迎的地方是便士走廊,或是娱乐小店;商店前或是大房间里有自动售货机,19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万花筒,一种通过小孔看滚动照片的机器。

从一开始,电影便走向了美国年轻人的生活。这当然是因为这种媒体的新奇性,但是真正吸引人的是银幕上的理想国与这些成长中的青年的心灵非常吻合。根据G.斯坦利·霍尔的说法,这个时期“人们对理想生活充满了激情,没有一个时期的人们在心情和性情上像现在这样受到激情的影响”。他觉得青春期是以“内在吸收和想入非非”为特点的,最终将会变成“自恋”。

一旦万花筒被幻灯放映机所取代,电影便广泛流行开来。在大屏幕上看电影让人更加享受,而且价格也更加便宜,它也为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在夜间聚集在一起的合法场所。19世纪中期,由于五分钱影院的出现,通过看电影和朋友相聚的好处更加突出。那些更加正规的剧场十分受欢迎,甚至于简·亚当斯这样的观察家也感叹说“如雨后春笋,不知是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据估计,在“新兴的电影观众”中,孩子和青年占了四分之一到一半之多。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新移民的孩子,因为五分钱影院大部分都开在工人阶级和市中心地带。年轻的美国人在电影中能感同身受。“五分钱廉价”表演,特别是在下午和午夜,使他们能摆脱成人的管制,得到些许自由。亚当斯注意到,“年轻人成群地进入五分钱影院,他们身上带有天生的‘帮派’本性,在‘自家影院’里大谈电影和特技。”

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人还能赚钱。学校里的考勤制度并没能阻止他们去做童工。在19世纪第一个10年间,通过对爱荷华学生的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学男生都在课余时间赚钱。店员和发送报纸的差事最受欢迎。年轻女孩的比例要低很多,在四分之一以下。参加“电影展”是他们首选的娱乐方式;抽样调查也显示,接近一半的男孩和三分之二的孩子每月看一到六场电影。

到1910年,新电影吸引了1000万的固定观众。很多改革家认为电影对年轻人有不良影响。简·亚当斯援引“芝加哥一位知名的精神病学家”所陈述的话,

该精神学家接触到的“在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中有许多人”在定期前往影院观看电影后已经“成为幻觉和心理失常的受害者”。更让人警觉的是这些“孩子”很认真地模仿“演员在银幕上的表演。”

亚当斯引用了一个例子,3个年龄在9到13岁之间的男孩儿看到电影里抢劫一辆马车的场景后,便试图像电影中一样对当地的送奶工实施“套马、谋杀并实施抢劫”的行动,“幸好当时,他刚一抛马套,马就惊了”。1912年那场轰动一时的审判中,那个青年人被指控在一次拙劣的列车抢劫中冷酷无情地谋杀了他的朋友。一篇新闻报道认为埃德文·波特的著名影片《列车大劫案》是这次暴行的罪魁祸首:这次悲剧“完全重演了电影。”

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年轻的犯罪嫌疑人将电影作为犯罪活动的灵感来源,这使成年人对这种新形式加倍谴责。然而,电影业扩张的速度比管理建制的速度快,在这个事实面前,为了控制它而进行的尝试也只能流产。联邦审查委员会(National Board of Censorship)于1909年成立,但在1914年以前,95%的电影作品都在这里被审查通过。这是过分自由的结果,美国人感到惊异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它的弱点: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出现了一系列表现美国社会错误思想的电影。

广告宣传画的产生使越来越多的人更加频繁地走进电影院。在比沃格拉夫放映公司(Biograph)这类老公司和新公司的竞争中,新公司在过去用来表演杂耍的剧场里放映篇幅更长的影片。这些大型剧场增加了观众席位和奢华装饰,因此更具吸引力,1913年上映的《灵魂的交易》(*Traffic in Souls*)出人预料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关于“白奴交易”的电影引起轰动:3万人在上映第一周里观看了这部影片,大部分观众是16到18岁之间的年轻女子。

同年,少年犯罪的题材出现在影片《少年法庭的拯救》(*Saved by the Juvenile Court*)中,在这部影片中,一位名叫本·林赛(Ben Lindsey)的法官对少年罪犯进行了改造。这部影片表现的是在法律控制之内的犯罪少年,而拉乌尔·沃尔什(Raoul Walsh)的影片《再生》(*Regeneration*)表现的是青少年街头帮派以及年纪更大的街头帮派。这部电影是由鲍威利城区和曼哈顿东下区的真实匪徒帮助拍摄的,电影以“鲍威利男孩”帮派头目欧文·基尔代尔(Owen Kildare)的回忆录为蓝本,把19世纪90年代贫民区的这些青少年留在了银幕上。

其他的早期电影作品试图以改革的态度来处理青少年问题。1914年,根据杰克·伦敦(Jack London)的小说《大麦约翰》(*John Barleycorn*)改编拍成的电影

描绘了青少年的酗酒和吸毒现象：影片中不乏孩子醉酒的镜头，这部电影让人感到需要“强烈要求戒酒。”也是在同年，《毒品交易》(*The Drug Traffic*)通过一个典型美国青年因吗啡致死的故事强调了进一步管理致幻药品的必要性。然而，这些电影只是少数：电影从未被看作是纪录片或是社会意识的表现。

电影只是一种娱乐：甚至是在处理当代题材时，这些电影也总是落后于时代或流于煽情。它们不是用来反映现实的，它们是出产虚构戏剧的“剧场”。尽管这两者之间的混淆在早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电影显然代表了一个仙境，它将美国的幻想工业化，变成了一种拥有前所未有的影响力的新媒介。《绿野仙踪》找到了一条完美的路径，并通过它使人们落入了翡翠城的陷阱。

电影和美国的年轻人之间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它们代表了一个幻想世界，那里有远离日常喧嚣的平静。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在银幕表现能反映青少年生活各个方面的画面，这些画面经过微妙的处理后，又反作用于人们丰富的内心。结果是观众与制作人之间复杂的较量：工作室也许能抓住电影制作的关键，但观众拥有让电影成功或失败的权力。很多情况下，正如《灵魂的交易》一样，结果可能是出乎意料的。

年轻的影迷们真正想看到的是现实的升华版，这个版本既可以让他们有认同感又能把他们带往另一个世界。这些强烈的愿望促成了新型公众形象的出现，这个公众形象是新闻界的大肆宣传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前，电影演员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通常是无名氏，如果要介绍他们，他们会被表现为公司的代言人，如“比沃格拉夫公司女郎”(the "Biograph Girl")。1910年初，为了回应有人故意散布她在一次有轨电车事故中死亡的传闻，比沃格拉夫公司为此女子取名佛罗伦萨·劳伦斯(Florence Lawrence)。

两周后，一篇报纸的文章中介绍了劳伦斯，文章写道：“制片商只是刚刚意识到公众需要了解演员的信息，也认识到演员个性的价值。”人们预言，“演员和其他明星一样，都需要媒体为他们服务，这样的时代即将到来。”同时，《综艺》(*Variety*)杂志将20岁的劳伦斯描述成“电影女明星”。到1912年，她已变成了“下面女郎”。

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明星，佛罗伦萨·劳伦斯发出异样迷人的光彩——奥斯卡·王尔德笔下像彼得·潘那样的孩子明星变成了现实中年轻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这个形象随即通过电波被复制一千份放大在银幕之上，最终变成大众的消

费品。在这个新异教的信条中，〔1〕明星是神或女神。很快，20世纪的明星就像是古希腊奥林匹亚山诸神的重现：这是一个有关人类冲动的复杂的价值体系，既适用于整个民族也适用于个体需求。

青春期是这个系统的中心环节，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性的吸引力和理想化的纯真。明星的青春定格在胶片中，似乎可以像小说中道林·格雷或彼得·潘那样可以永远不老。小说家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研究了 this 时期最受欢迎的男主角，风流倜傥体格健壮的道格拉斯·菲尔班克斯(Douglas Fairbanks)，“他永远不会老——除非银幕会变老。”确实，青春如此美好，让人无法抵挡它的魅力，尤其是在明星时代的早期。

电影具有混淆现实与幻想的力量。随着1915年《有过一个傻瓜》(*A Fool There Was*)的成功，当时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西达·巴拉(Theeda Bara)迅速走红，她被定型为经典的荡妇形象：画着厚重烟熏妆的双眼，燃烧着“放纵的情欲”。她所在电影公司的新闻部门将其描述为“公主的女儿，以蛇血为奶，是斯芬克斯神秘婚姻的产物”，但事实上，她是西奥多西娅·古德曼(Theodosia Goodman)，俄亥俄州一个裁缝的女儿。这场假面舞会产生美妙的效果：一旦以另一形象出演，她的事业随即告终。

这只不过是新体系中容易出现的一种陷阱。人们越来越需要这些生产出来的神。除了那些能将实实在在的人变得抽象的化妆术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混乱，演员的形象完全取决于电影公司的要求。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扮演的总是些朝气蓬勃的12到16岁天真的卷发女孩，但现实中的她正好相反，她已经20出头，背弃她的丈夫，与人有染，喜欢留长指甲，喜欢吸烟。这个明星完全变成了弗兰克斯坦式的怪物。

真实年龄和虚构年龄的差别在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饰演的人物身上也显得毫无意义。他把流浪汉变成了一个喜剧典型。对于评论家帕克·泰勒(Parker Tyler)来说，卓别林那条宽松下垂的工装裤和那件紧身上衣的著名装扮代

---

〔1〕第一部大片——D. W. 格里夫斯(D. W. Griffith)在1916年推出的《不能忍受》(*Intolerance*)让这种异教徒的特征更加明显。这部电影是以《圣经》故事中巴比伦王子贝尔沙萨(Belshazzar)为原型拍摄的，由于规模宏大、华丽壮观的场景，巴比伦的没落被表现得令人震撼。同样取得巨大成功的还有画家罗克格罗斯(Rochegrosse)的《巴比伦的最后一天》(*Les derniers jours de Babylone*)。

表了“孩子眼中成年人的形象,孩子常常羡慕地仰望他。”卓别林 1914 年开始制作电影,此后没多久就取得了第一次巨大的成功,通过《流浪汉》(*The Tramp*),他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卓别林故意选择了这个社会边缘人作为典型来表现中产阶级最可怕的噩梦。

随着拓荒时代的结束,流浪者开始被妖魔化。到 20 世纪头十年的中期,流浪汉仍代表着令人不安的疯狂的过去,很多美国人都非常希望能够把这些人抛在身后。1914 年冬天纽约一群无家可归者发动的暴乱更是提醒了人们,这些游民对于美国社会的有序生活来说是一种威胁。查理·卓别林选择了这个最受鄙视的形象,发挥了他的全部才智,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技术设备,假借娱乐的形式把这个黑暗的世界表现出来。

认为明星可以让流浪汉也变得富有魅力,这让电影更加有吸引力。亡命之徒一直以来被美国人视为英雄,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让你父母痛恨的形象更具吸引力。在电影《家中的一次死亡》(*A Death in the Family*)中,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描写了他的清教徒母亲第一次看到《流浪汉》时的反应,卓别林“小心翼翼地握着他手杖一端,并用另一端的弯头勾起了她(女演员)的裙子,把它勾到了膝盖,这正是母亲所厌恶的。每个人都直直地盯着女演员的腿大笑,只有母亲装作没看见。”

这些早期影片完美地展现了美国人的特征,它被鲁珀特·布鲁克定义为“纯粹野性与完全规范的结合”。在 1913 年旧金山的“堕落地带”(“vice district”)被关闭时,一位名叫霍·摩尔(*Hal Mohr*)的年轻摄影师拍摄下了最后狂欢的片段。《北非海岸的最后一夜》(*The Last Night of the Barbary Coast*)的广告在这种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即将消失的最后时刻仍在宣传它,“看那著名的火鸡舞步、得克萨斯汤米、兔子舞。看那黑人舞厅里跳的从未见过的舞蹈。”

\* \* \*

不仅是电影,美国流行音乐也让家长们感到不安,他们的孩子在享乐主义与禁欲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在 20 世纪早期,音乐产业在其发展“软件”的同时持续扩张,1890 到 1909 之间,乐谱带来的收入比原来多了 3 倍,后来几年间,超过 2700 万台留声机唱片和圆筒出产。到 1914 年,这个数字又增长到了 3100 万。由于公众对新产品的渴求,印刷业和唱片公司不断发行手头的任何作品。

这个时期畅销的是伤感的民谣,拉格泰姆音乐也受到人们的喜爱。大量国内移民促进了它文化上的传播。随着1914年战争爆发,欧洲移民被严格控制,北方的实业家便开始积极四处寻找新的劳动力资源,并劝说南方黑人接手因战时物资需求而出现的新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接近100万黑人从南方搬进主要的城市中心,像纽约、芝加哥和底特律,他们把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一起带进了大城市。

更多的黑人表演者在南方以外的地区找到了现成的听众,拉格泰姆和布鲁斯音乐继续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向外延伸,这种延伸让他们在年轻白人中间也受欢迎。拉格泰姆音乐在19世纪90年代也许就已经流行于黑人贫民窟中,但这种风格音乐的第一张百万唱片,是由欧文·柏林1911年的畅销作品“亚历山大爵士乐队”(“Alexander's Ragtime Band”)创造的。让一个真正的白人推销黑人音乐,和最初的地下风格冲击主流音乐一样,都能引起人们的痴迷。这就是交易:一种新的交换形式。

拉格泰姆的成功转型引来了负面评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音乐美国人》(*Musical American*)认为拉格泰姆就像会让人上瘾的毒品。1913年,《音乐信报》(*Musical Courier*)声称美国“受到被公认为是‘破碎年代’音乐的影响而沦为黑人集体的牺牲品。”这完全是“国民性的灾难”,正如拉格泰姆“代表了原始道德,表现出黑人在道德方面的不足。黑人对性约束一无所知,从而造成了最广范围的道德不定性。”

在说教者的眼里,“亚历山大爵士乐队”成功后,泛滥在市中心的“动物舞蹈”(“animal dances”)明确了音乐、种族和性别之间的联系。火鸡舞是一种从19世纪集体踢踏舞演变来的舞蹈,节奏欢快活泼,它的成功让所有人都开始在拉格泰姆的伴奏下舞蹈,仿佛一整本动物寓言书中的动物都在起舞。这些舞蹈动作有的像兔子、有的像大灰熊、还有的像猴子在爬、负鼠行走,袋鼠弹跳。正如欧文·柏林在他1911年的畅销作品中提到的“现在每个人都这么做”。

在跳这种动物舞蹈时,舞蹈者一边做动作一边前进。跳华尔兹或波尔卡时,跳舞者彬彬有礼地和对方保持一臂的距离,舞者的手臂和腿交错着旋转。而跳火鸡舞时,女方的下肢,从腰部到膝盖都要被男舞伴用腿围住。大灰熊舞中包括了一个全身体接触的拥抱,这远远超出了先前的礼仪规范。这些滑行和摇摆动作只限于杂耍表演者和黑人舞者,有教养的年轻白人是不能这样做的。

可是,美国的年轻人并不在意。就像电影中出现的幻想世界一样,动物舞蹈

是为他们的心灵量身定做的。“青春期是节奏感形成的黄金时期”，斯坦利·霍尔写到，“舞蹈是年轻人单纯玩耍和能量需求的最好表达。”更现实的是，提供女舞伴的新式舞厅在这股热潮中应运而生，这些舞厅成为美国已经工作的年轻人可以远离成人监督与朋友见面的公共场所，也是他们可以自由求爱的场所。

年轻女性占据主导。1911年纽约娱乐界的一次调查显示，88%的女孩子承认她们知道如何跳舞，并且几乎所有人都说她们喜欢跳舞。据青年工作者鲁斯·特鲁(Ruth True)说，一些在曼哈顿工作的女孩，“每周都有几个晚上在舞厅”。鲁斯注意到，这些女孩子中的很多人都住在女生宿舍，这些地方“不是娱乐消遣的好地方，空间狭小，感觉很压抑”。“男性朋友的拜访”尤其“不受欢迎”。

在舞厅里，女士们可以单独跳舞。两个成年社会改革者在一份1911年的报告中发现到了这个规则：“大多数女孩子都是自己去舞厅的，年轻男子也是自己单独去，然后在舞厅里找舞伴。他们通常不需要引荐；两个女孩子一起跳舞，旁边两个年轻男子觉得合适就来找她们一起跳。有的小伙子会在跳过舞后和她们聊天，有的则不会。”他们得出结论，尽管女孩子们“充满活力，开心愉快并且喜好娱乐”，但并不在意“她们遇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这阵狂热蔓延到市中心以外的地方。1912年2月，《生活》(Life)杂志报道说，动物舞蹈正在“从上到下各个阶层中”流行起来，“我们城市中跳这种舞蹈的人超过50万。”在朱利安·斯特里特(Julian Street)1913年编写的纽约夜生活指引手册中，他发现这种舞蹈创造出了一种“这个国家想象不到的社会融合——在这个大杂烩中，年轻体面的已婚或未婚女子，甚至是第一次踏入社交界的人，都在一起跳舞，不仅是在同一片屋檐下，而且是在同一间屋子里。自由——平等——博爱。”

这种狂热似乎刺激了阶层和种族的融合，它所带来的革命意义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纽约娱乐界委员会”(New York Commission on Amusements)和“职业女性度假资源征询处”(Vacation Resources for Working Girls)批评这些舞厅宣扬“放纵和堕落”，他们让审查人员进入时尚宾馆和舞厅进行调查。像“将‘火鸡舞’和‘大灰熊舞’赶出第五大道”这样的新闻标题让人们对世风日下的状态感到了更广泛的恐慌。

随后，1913年8月出版的《流行观点》(Current Opinion)里有一篇文章几乎是歇斯底里地批评道，“它把美国变成了性爱实验地：性的恶浪以及关于性爱的讨论似乎已经入侵到整个国家。”人们总是把动物舞蹈与卖淫现象的增加以及白奴交

易的盛行联系在一起：一些年轻女孩被绑架或染上毒品，最后成为妓女。毋庸置疑这两种情况都会发生在舞厅里，但并没有像新闻和电影《灵魂的交易》〔2〕中所表现得那样骇人听闻。然而，公众宣传已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刑法学家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1915年在他百科全书式的《个体犯罪》(*The Individual Delinquent*)中写道，“歌厅是现今道德败坏的罪魁祸首。”社会改革家和当局都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平息这股热潮。由于不能完全关闭舞厅或是消灭那些跳舞狂，他们便开始瞄准市中心地带，那里是一切堕落的源头。正当美国黑人音乐找到更多的国内和国际听众的时候，旧金山和圣路易斯的红灯区却被隔离开来，并最终完全关闭。

但这一切都太晚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无视改革者和立法，依然夜夜涌向舞厅。他们用腿表明自己的态度。动物舞蹈的风行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的前20年里，年轻人开始通过城市里这种充满动感的集体娱乐活动找寻自己的文化。这种起源于社会边缘组织的娱乐活动，非但没有得到尊重，而且还被视为带着返祖特征。

年轻人已成为美国大众文化中独立的一部分，这无形中鼓励了青少年去探索那些被其他美国机构——尤其是学校——试图压制的野性。如果说这个冲突还不够严重的话，那么把年轻人和寻欢作乐结合起来的做法后果就更严重了。激进派青少年专家伦道夫·波恩(Randolph Bourne)写道，“这一类型的年轻人只是昙花一现”，“寻欢作乐很快会耗尽他们的生命，到时候年轻人会发现他们在中年时就提前结束了生命。”

明星、时尚以及各种舞蹈的变化代表了青少年瞬息万变的热情，这也正是消费经济的特点，这种消费经济提供了一种新旧替换十分迅速的理想工业模型，也成功地让大多数美国年轻人摆脱了波恩这些激进分子的影响，激进分子认为年轻人真正的任务就是挑战成年人。然而，这种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事实上，这种被工业化的美国青年流行文化是浪漫主义思想的更新换代，也深深地受到了浪漫主义不健康思想的影响。

---

〔2〕1910年国会通过了禁止贩卖白奴的《白奴贩卖法》(White Slave Traffic Act)，后来这项法案被称为《曼恩法案》(Mann Act)。它还特别禁止了跨越洲界贩卖16岁以下的妇女。这项法案后来被用来斩断了重量级黑人拳王杰克·强森(Jack Johnson)的双翼。1913年，他被指控犯下了莫须有的罪名。

第三部分

---

1912—1919



10

## 祈祷

欧洲的代沟

复制品总是牺牲品。

——G. 斯坦利·霍尔,《青春期》(1904)



《作为异教徒的弗兰西斯·科恩福特》,1914年8月

1912年,两个年轻的法国学者亨利·迈西斯(Henri Massis)和阿尔弗雷德·塔尔德(Alfred de Tarde)对巴黎18至25岁的男性作了一项调查,所有这些被调查者都正在接受中学或大学教育。抽样虽不具代表性,但体现了大都市年轻人中有影响力的一部分人对其自我和其所处的社会的思考方式。但样本却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这些精英们比任何同辈人都自命不凡,他们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掌权。

调查是带有偏见的,因为迈西斯和塔尔德在教育方面是传统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学校安排的课程没有满足法国年轻人的精神需要,用日耳曼社会学代替正统的学科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迈西斯已经出版了一本专著,高度评价了莫里斯·巴莱斯,迈西斯认为巴莱斯启发了他们这代人去怀疑和探索,“让我们重新有了活力,这种活力来自意志。”有意识地去重新认识一切。正如迈西斯所说,“我们发现巴莱斯那一天,我们也同时发现了自我”。

这两位学者之前已经发现了新出现的这一类年轻人,他们反对当前已经存在的那些社会组织,他们决定针对这一已知的结果进行一项调查,就像后来许多市场研究者的做法一样。这项调查叫做“战争中的勇敢”(“brave in war”),第二年被收录在《今天的年轻人》(*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这本书中,并且署以“阿加松”(Agathon)(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作为笔名出版。这项调查完全达到了他们批评的目的,其中一个被调查者尖刻地抱怨说:“他们的教学迫使我们充当愚昧的奴隶,激起了我们的反抗。”

“阿加松”发现了代沟。这项调查对比了1912年的年轻人和1885年达到法定年龄的人。结果发现过去的那一代人比较悲观,他们所信仰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使他们颓废,使法国在19世纪70年代陷入困境。由于对他们所感受到的法国近年来的混乱感到不满,正在崛起的这一代法国青年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1912年的青年人“抛开了自我怀疑”,也正是“这种特性使他们能够建构秩序和社会层级,而先前那一代人却只会制造混乱和破坏。”

这种不同给两代人之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冲突。儿子认为父亲不够保守,过

于自由甚至堕落。他们觉得,诗人兰波(Rimbaud)不仅仅是见证了战争的受害者,而且要通过他的诗直接为法国1871年战败的耻辱负责。这里面有一段个人的经历,迈西斯认识巴莱斯的侄子查尔斯·德曼歌(Charles Demange),此人1909年自杀。迈西斯认为德曼歌“活得过于热烈,这种热烈让人害怕,他拥有过人的勇气,但他错用了这种勇气。”

为了摆脱这种青春期的冲动和“自我崇拜”,迈西斯和塔尔德试图寻找英雄主义的例子来验证巴莱斯的民族主义。他们在作家欧内斯特·普希卡里(Ernest Psichari)那里找到了绝好的榜样,那时作家将近30岁,健康且自律。然而他并非一直如此,10年前他痴迷于社会主义,1903年,他一度走到自杀的边缘。就在这个危机时刻,普西卡里开始服役,并成为一名正规部队的士兵。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随所在的部队深入非洲,像兰波一样消失了。

1913年,也就是进行阿加松调查的同年,普希卡里的小说《呼唤武器》(*L'appel des Armes*)出版。小说充分表现了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书中激进的父亲和保守的儿子“颠覆了人们对父子关系的普遍观点”。莫里斯·文森特(Maurice Vincent)被派往非洲服役,并且深受一位上尉的影响,这个人是个“过去的权威”,他“纯洁、清白、没有受到现代社会丝毫的污染”。所谓的“进步”是美国精神的表现形式,“美国精神使他厌恶”。在书的结尾,文森特已经成长为一个完美的战士,“法国的化身”。

为军队效劳意味着为了更多人的利益牺牲自我,这种精神像宗教一样被人祀奉,这是一个被遗忘的法国曾经拥有的纯洁和忠诚。作家查尔斯·佩吉(Charles Péguy)在1910年发表了《我们的青年》(*Notre jeunesse*),这个作家对“阿加松”有很大影响,使他更加注意到宗教和军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佩吉在书中表现出一种世界末日的大彻大悟,“我们是最后一批人,在我们之后,这个世界就会很快变成我们所说的现代世界,一个试图变得更加聪明的世界,这是一个属于聪明人士和先进人士的世界……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属于那些怀疑一切的人的世界。”

“阿加松”主要想表达的是,1912年这一代人身上已经自然而然地拥有了普西卡里和佩吉这些先贤曾经努力追求的品质。18至25岁年龄的人们喜欢行动,他们对飞机和体育运动的兴趣比对书本更浓厚。他们信奉天主教,比起1885年那一代人,他们在性的方面更加保守,而且更愿意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他们厌恶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腐败,他们要在即将发生的战争中向德国人讨回公道。但

这场带着祈祷的战斗(“battle mixed with prayers”)带来的却是无情的殉难。

《今日的年轻人》(*Les jeunes gens d'aujourd'hui*)引起了媒体的轰动。1885年那一代人被贬为“无能的”一代,这一代人的一位小说家反击说,新一代典型的年轻人对“享乐和暴力充满激情,很容易被这个时代虚伪的言辞蛊惑,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容易接受“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的野蛮教义,如民族主义、保皇主义和帝国主义。但是莫里斯·巴莱斯却认为“正在崛起的新一代是法国历史上最出色的。”

\* \* \*

战前,许多欧洲人试图去发起新的青年运动,而阿加松的调查只是代表之一。这些运动试图将青春的活力以及青年人的社会重要性转变成一种艺术或社会思潮。过去,青春的状态是由成年人来决定的,而现在,他们开始强烈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1911年,当16岁的神秘主义者吉杜·克里希纳木尔蒂(Jiddu Krishnamurti)被神智学者(Theosophists)带到伦敦,他成为了第一个青年人的弥赛亚(messiah)。“青春”几乎变成了宗教,成为崇拜的对象。

那几年是发表青春宣言的黄金时期,一批批愤怒的青年骄傲地宣称他们“永恒的黎明”已经到来,强烈谴责他们的父辈。这其中有许多原因:高等教育的兴起、交通改善、社会流动以及对缓慢社会变革的失望,此外还有更深层的心理因素。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文学中的一个隐喻,这就是弗洛伊德在1910年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这个概念又让两代人之间冲突这个问题上掀起了新的热潮。

发表宣言是浮躁的年轻人处事的经典方式。生长在一个由父辈掌控的世界里,青年人清楚地看到所有的社会弊端,但却无能为力。相反,他们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他们明知道已经陈腐不堪的世界里。这种挫败感导致了他们极端化的言语,非黑即白。21岁的表现主义作家汉斯·莱堡德(Hans Leybold)在他1913年的宣言《革命》(*Revolution*)中写道:“你们受人尊敬,外表光鲜,有影响有地位,而我们要伸出舌头鄙视你们! 同伴们,你们应该说,老家伙们,我们要回击了!”

这也是各种“主义”盛行的黄金时期:立体主义者(the cubists)、表现主义者(the expressionists)、未来主义者(the futurists)和漩涡主义者(the vorticists)各派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已不再是一场运动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一种社会思潮彻

底的胜利,这种思潮像宗教一样强大。这又一次印证了斯坦利·霍尔对于青年人的观点:他认为,在这个年龄段,宗教皈依是“一个自然而正常的过程,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现象”。这一时期,先锋派(the avant-garde)提出“上帝死了”,一时间,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extremist)也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有一个关键词意义的改变标志着这些强硬意识形态的形成。在19世纪中期,“代”这个词用来表示“基本上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所有人”。在美国,它指的外来移民融入美国社会的状态:第一代或第二代。到1900年,这个词开始有了与青年相关的意义,比如“新一代”这样的短语随处可见,这和这个词的拉丁意义——“形成”非常相符。这个词也经常出现在19世纪90年代流行的“退化与再生”的话题中:在为民族国家的未来所进行的斗争中,青年人占据着前沿位置。

在“代”这个词广泛使用以至于控制社会思想的同时,“青年”被定义为一个独立的阶层。然而,成年人也鼓励这个新生阶层增强自我意识,虽然结果无法预料,正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最终还是与他反目成仇。这些青少年有意或无意中认识到,获得权力的第一步是在成年人行为准则中增加“青年”这个词。因此整个20世纪,用来划分年龄的这个词“代”已经失去了它的支配地位,反而成为一个极端主义者的号角。

意大利评论家乔万尼·帕皮尼(Giovanni Papini)在发表于1912年的自传《失败者》(*Un uomo finito*)中写道:“每当一代人在生活的平台上展示自己时,就好像世界的交响乐要开始新的节奏。”“对于20岁的年轻人,所有的长辈在他们看来都是敌人,所有的思想都值得怀疑,所有的伟人都要重新来评判,历史像漆黑的长夜被灯光打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耐烦地等待,光明在今天终于到来。”

然而,早期这种对自由的追求充满了困难。年轻的极端主义者强迫自己不受长辈经历的影响,使自己隔离在社会传统之外,他们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后果。伴随着代沟这个概念,人们还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正如罗伯特在《1914年这一代》(*The Generation of 1914*)中写道的:“成长中的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是牺牲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在这样的真空中,许多极端主义分子最后还是无法抛弃他们努力抛弃的价值观。

\* \* \*

最初使用这种“代”的说法是有审美意义的。1906年,德国的迭·布鲁克画派

(又名“桥”)(Die Brücke, the Bridge)的画家们号召“所有的青年人团结起来”,“创造空间和自由来抵制来自长辈的阻力”,事实上,这样的做法最后只是促成了表现主义(expressionist)和野兽派美学(fauvist aesthetics)的发展。不过,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futurist)同这些流派彻底决裂。乔万尼·帕皮尼在自己创办的杂志《莱昂纳多》(Leonardo)中,号召意大利青年抛开顾虑,为冒险、梦想和“永恒的事业”而生。

由于受到这些有关“代”的思想的影响,1909年2月,艺术家F. T. 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发表了自己对于未来世界的看法,他想象中的未来世界将会由青年人制定的法则来支配,在他的未来主义宣言中,他说,“我们中最老的人是30岁,所以我们至少还有10年时间来完成我们的工作。到我们40岁的时候,其他更年轻更强壮的人们将把我们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就像作废的手稿一样。我们期待着这一切的到来。”

然而,马里内蒂宣言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他提到的科学技术。随着汽车、飞机、电台和电影的发展,人们可以超越体能的限制,置身于从未到达过的时空。他写道“我断言,世界会因为速度而变得更加美丽。装有许多喷气管的赛车像呼啸的蟒蛇,飞射出去比《萨莫色雷斯有翅胜利女神像》(Victory of Samothrace)还美丽。

这些意味着和“候鸟运动”或新保守主义异教徒的自然崇拜彻底决裂:人造机器不再是令人厌恶的东西,相反它们受到了欢迎。正如马里内蒂警告世人:“我们已经走入极端,因为我们创造了永恒的、无所不在的速度。我们将赞美战争,这是让这世界保持健康的唯一方法:军国主义、爱国主义、追求自由者的毁灭性行为、值得付出生命的美丽理想、对女性的蔑视。我们将摧毁博物馆、图书馆和各种各样的学术机构。我们要向道德准则、女权主义和所有怯懦的机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宣战。”

未来主义者使二十世纪的思想 and 美学有了新的发展,但这一切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马里内蒂和“青年意大利”这个好战社团中的其他人一起闯入了·一片未知的领地。他们反对颓废的“阴柔”,赞扬刚毅的民族主义信仰,强调强硬的纪律和绝对暴力,这一切体现了男性的阳刚。女性在这样一个“战神”统治的新世界里毫无立足之地〔1〕。

〔1〕 以霍尔斯特在1914—1916年创作的著名组曲《行星》(The Planets)中的《火星—战争的制造者》(“Mars, the War Bringer”)为标志。霍尔斯特在占星术方面的兴趣始于1912年。

马利内蒂的理论体现了异教信仰和科学技术的融合：斯坦利·霍尔的“电灯下的野蛮行径”。他的野蛮言论使他在1914年6月伦敦访问时自食其果，他受到一个新艺术运动拥护者们的攻击。尽管受到未来主义者的强烈影响，漩涡派画家和他们的领袖珀西·温德姆·刘易斯(Percy Wyndham Lewis)没有对这种弑父行为表示反对。面对一群分裂喧闹的人，马利内蒂发表了有关速度的演讲，这番演讲几乎要使他被“撕成上百块愤怒的碎片”。

漩涡派画家在1914年6月发表了他们的第一份出版物，巨大的棕色封面上写着一个标题——《冲击》(*Blast*)以此来阐明他们的立场，画家温德姆·刘易斯在每一页上都印上“冲击”(“BLAST”)和“祈福”(“BLESS”)的字样，给英国的文化生活加入了新的刺耳的音符。漩涡派画家反对布鲁斯伯里社团(Bloomsbury group)的繁文缛节，试图将欧洲的现代主义同伯里尼西亚(Polynesian)的雕塑风格融为一体，并且推动未来主义接受科学技术，推动都市化走一条硬面孔，硬线条的美学风格：“我们是现代世界中原始的雇佣军。”

青年人的活力是他们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序言“漩涡万岁”中他们写道，“我们希望世界生机勃勃，感受到自然的能量在我们身边流过”。温德姆·刘易斯诅咒“英国的唯美主义者”并呼吁“伟大的青年们，冲破重重束缚”。他们赞美战前充满了矛盾和不安的生活，而他们自己在漩涡的中心始终保持平静：

漩涡主义不惧怕过去，过去已经被忘记。

漩涡主义将未来看得和过去一样脆弱。

对于漩涡主义，只有现在是有意义的，

生活是过去和将来，

只有现在是艺术。

1912、1913、1914年，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一切走到了一个转折点。由于19世纪的意识形态开始消解，漩涡派开始将一切纳入它不可阻挡的动力之中。青年在这个野蛮世界中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最轰动的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e*)〔2〕中得到体现，这些艺术作品过于新潮以至于在1913年5月初次亮相

---

〔2〕 所有艺术作品。

时〔3〕,几乎引发了一场骚动。他们表演的是俄罗斯的最新芭蕾舞《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由“能克服重力”的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4〕主演,所用的曲子是由伊葛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创作的,音乐中不断重复机器发出的刺耳的声音。这出舞剧赞美的是部落祭祀。

谢尔盖·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的《俄国芭蕾》(Ballets Russes)臭名昭著,一方面是因为其作品的奢华和创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作品引起的反感:在1912年的《牧神的午后时光》(*L'Après-midi d'un faune*)中,尼金斯基在舞台上对性高潮的模仿在巴黎已经一石激起千层浪。谢尔盖·贾基列夫的现代派作品成就很高,他崇尚原始和青年人的激情,反对新兴的大众文化。《春之祭》将视觉艺术、音乐、文本和舞蹈融合,对当时流行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科技-异教崇拜背后的推动力在斯特拉文斯基的歌词中得到了揭示,旨在唤起“春天的创造力”。芭蕾舞起源于牧羊神之笛和迎春祭奠,在“献祭”之前,“女祭司们整夜都在进行神秘的仪式,绕圈行走。其中一位女祭司两次被命运选定作为神圣的牺牲者,在舞蹈中两次被俘获。女祭司们祈求祖先保佑,将选出的牺牲者交到年迈的智者手上。当着老者的面,为了这神圣的舞蹈,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牺牲者》(The Victim)这一章节中,斯特拉文斯基的第一个题目强调“重生必然伴随着暴力”。尽管《春之祭》不属于《彼得·潘》那种类型的艺术作品,但它也同样做出了残酷的预言。青年们的精力为冲突而存在,为了迎接二十世纪的到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1914年7月,评论家莫里斯·杜邦(Maurice Dupont)评论这出芭蕾舞剧“是尼采梦中的酒神节狂欢,是这个世界走向灭亡之路上的灯塔。”

早先一代那些信奉逃避主义的异教徒没有机会面对这种严酷的真相。在《春之祭》轰动一时的首演后5个月,“候鸟运动”在卡塞尔(Kassel)附近的霍迈斯纳高地(Hohe Meissner)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这场运动规模很大,超出了德国的

〔3〕 美国戏剧评论家卡尔·范·韦可腾(Carl Van Vechten)在1913年5月末的一天晚上观看了这场芭蕾舞剧的首场演出。他说:“法国人被这种新奇的艺术惊呆了,好像被冒犯一样,不停地发出愤怒的唏嘘声。”

〔4〕 塔玛拉·卡沙维娜(Tamara Karsavina)的自传中写道:“有人问尼金斯基,起跳时在空中停留是不是很难?起初尼金斯基不理解,后来他亲切地回答说‘不!不难!’你自然而然就跳起来,然后能在空中停留片刻。”

国界。世界各地代表各种政治倾向的青年社团云集于此,他们中有无政府主义者,有反工业主义,也有种族主义者。这场集会似乎决心要拉拢各个独立的团体,联合成为一个同盟,纳入名为“自由德国青年会”(Freideutsche Jugend)的组织。

莱比锡战役(battle of Leipzig)胜利是德国军国主义者引以自豪的事件,1913年恰逢100周年,为了遏制其他各种爱国集会的影响,“自由德国青年会”专门设立了“自由德国青年日”(Freideutsche Jugendtag)。同那些社会认可的啤酒馆沙文主义相反,他们希望自由塑造他们的生活,远离那些死气沉沉的陈规戒律。然而,漫无目的的发展使他们难以兼容并蓄,包容所有的意识形态和世界理论。

许多人都提出了反面的观点,其中包括鼓吹战争的论调,包括“义务教育运动”(Free School movement)的创始人古斯塔夫·维内肯德反对民族主义诱惑的左派思想。维内肯德的一番话将演讲推向了高潮:“我们必须有勇气与祖国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强制灌输给我们却不让我们思考的爱国主义保持距离。”但是这个观点并没能更加深入地探讨下去。《自由德国青年日报》(Freideutsche Jugendtag)上发表的几乎所有言论都来自成年人,读者对这些观点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这和报纸创办的初衷完全不同。

尽管大家普遍认为迈斯纳高地集会很成功,但关于怎样将所有不同的德国青年团体联合起来这个问题,会议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计划。很快,联盟中出现了传统的左派和右派政治路线,裂痕由此出现。同时,由于担心“候鸟运动”的影响,当局开始组建由成年人控制的青年团体来限制自然崇拜,想方设法把德国青年的思想纳入到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中。

其中,最成功的是宣扬民族主义的“德国青年联盟”,1911年为了对德国青年进行适当的军事训练在普鲁士成立。这个组织是政府批准的,和军队关系密切,他们对成员进行实战训练和军事演习:包括操练、急救、全面机动等,旗帜鲜明地倡导军国思想。取得初步进展之后,军队和行政部门试图将其他青年运动组织也收入麾下。

到1914年为止,“德国青年联盟”已经吞并了“候鸟运动”的组织。毕竟,生存空间论(Lebensraum)和男子情谊论的理念和普鲁士扩张称霸的动力没有太大差别。在该组织的杂志中,“牺牲”代替了自然崇拜,“战争是美好的,它可以提升人们的心灵。这一时刻即将到来,天堂欢迎德国青年,我们希望敲开上帝之门”。“德国青年联盟”集结了75万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青年组织。

# 11

## 牺牲

战亡者以及新与旧的对抗

年轻人天生就会和这个世界发生冲突。

——G. 斯坦利·霍尔,《青春期》(1904)



鲁珀特·布鲁克, 薛利尔·谢尔拍摄, 1913年

没有人知道战争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爆发。但是在1914年盛夏的欧洲街头,人们正在感受着一种温德姆·刘易斯评价伦敦游行时所说的“微弱的兴奋”。暴风雨在6月28号这天终于降临,导火索是一次暗杀事件。哈布斯堡王位(Hapsburg Empire)继承人弗朗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一个19岁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波斯尼亚青年团(Mlada Bosna)成员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枪杀。

危机进一步发展,尽管有抗议,战争的呼声还是在高涨的民族情绪中盖过了一切。古斯塔夫·勒庞在1895年就曾警告世人:“民众的主张越来越清晰,就是要完全摧毁现存的社会。”正如有人预言的,这个技术革新的年代正在酝酿着第一次真正的人类冲突,这场冲突将夺去上百万士兵和平民的生命。

局面不明的六周过后,8月3日星期一德国侵占比利时,这场战争一触即发。在英国,前一个周末是个公众假日,《泰晤士报》报道说:“休假的人们纷纷聚集到首都伦敦,他们希望在这危机时刻出现在首都。”周一晚上,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伦敦的公共场所聚集:“爱国和忠诚一时间让人如痴如醉,直到最后人群被驱散。”

一个名叫维克·科尔(Vic Cole)的伦敦人回忆道,当时他17岁,“那天下午我在城里,在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前的林荫大道上闲逛,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还有一些集中在白厅门前,准备向威斯敏斯特方向去。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就在午夜之前,最后通牒已经下达,消息传来,我们已经和德国开战。我十分兴奋,人们议论多年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想,德国随时都会入侵英格兰。”

10岁的时候,维克·科尔在伦敦水晶宫观看过一个叫“侵略”的实景展示。这是一个同实物大小相当的英国村落,教堂、酒馆一应俱全。有些乡亲从村头缓慢走来,有些在街尾喝啤酒,一幅安静的乡村景象。这时空中突然响起了德国飞机的警报声,炸弹落地,浓烟弥漫。当烟雾散去时,德国士兵占领了村子。然后,国防义勇军到来把敌军赶走,一切安然结束。

尽管不够服役年龄,科尔却不甘在哀叹中白白等待:“我梦想像书中描述的那

样手持钢枪冲向战场。”登记入伍之后,他跑回家去把消息告诉家人。“我几乎顾不上关门就大喊‘我参军了’!奶奶嚷嚷道:‘上帝啊,我可怜的孩子。’他们都没多说什么,但当我坐下来,奶奶紧紧搂着我。姑姑流着眼泪说:‘孩子,我想你现在大概需要喝点水。’”

北欧的青年们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却狂热地应征入伍。法国人把它看作是洗雪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战败之辱的绝好机会,并要求夺回1871年失去的阿尔萨斯(Alsace)。7月末的动员号召得到了压倒性的赞成,以至于当社会主义党领导人简·饶勒斯(Jean Jaurès)主张用工人阶级的协商努力来代替冲突时,竟遭到狂热民族主义者的暗杀。8月2日,德国在1870年后,第一次越过法德边境。

改写历史的机会来了。欧内斯特·普希卡里(Ernest Psichari)认为冲突“来得正是时候,并且以人们预期的方式来临”。法国的资产阶级青年们也都这么认为。罗伯特·普斯提斯(Robert Poustis)当时还是巴黎的一名学生,他记得1914年8月“每个人都吵着想去前线。汽车上载满了士兵,火车上插满国旗贴着标语‘打到柏林去!’我们迅速到达柏林,拿着尖刀和长矛追赶德国人。我们本以为战争会持续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德国方面将这场战争看作它在国际舞台上炫耀武力的机会。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里体现了他们的座右铭——要么征服世界,要么走向衰落(Weltmacht oder Untergang)。这一切都有狂热的群众支持,理智早已被抛到脑后。厄恩斯特·扬格(Ernst Junger)1914年应征入伍时19岁,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对恐怖的兴趣是让我们义无反顾投入战场的复杂原因之一,上代人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那些法律和秩序会让我们渴望生活发生变化。”

多年来军国主义的煽动和“德国青年联盟”等组织的长期影响,已经将战争描绘成了一种宗教活动。普鲁士剧作家、“候鸟”组织成员沃尔特·弗莱克斯(Walter Flex)在1914年写道:“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而是这个神圣群体中的一员,我随时准备为祖国牺牲。”“候鸟”杂志战时第一版中写道:“我们是真正的男人,我们不搞特殊。我们希望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

德国青年沉迷于自我牺牲,厄恩斯特·扬格是这种军国主义教导下的典型例子。他在后来的回忆录《钢铁风暴》(*The Storm of Steel*)中写道:“我们成长在一个物质年代,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渴望那种非凡的经历。战争像美酒一样进入我们

的生活。我们在鲜花簇拥下启程去寻求英雄般的牺牲。战争是我们伟大、光荣、权利的梦想。这是一个男人的使命，决斗的战场上，鲜花被鲜血染红。世间没有比这更美妙的死亡。”

\* \* \*

德法两国青年整装待发。到1914年8月，两国各集结兵力360万。相比之下，英国军队不受重视，后勤保障不足，只有25万正规军官和士兵。加上预备役部队和临时志愿者，英国能调动的所有军事力量也不到75万，只有其他参战国的四分之一。没有征兵，这个空缺只能由志愿者填补。在战争情绪感染下，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周里，30万人应征入伍。

他们中有J. M. 巴里和李维林家两兄弟乔治和彼得。乔治21岁，已经是剑桥大学的学生。彼得17岁也即将升学。8月的第一周，他们都受到了剑桥军官培训学院学生会发来的一封信，信里“指出对于每一个大学生来说，都应该马上尽其义务。”他们发现自己的学校经历足以使他们获得入伍资格。当负责征兵的陆军上校得知乔治是伊登学院的板球队员时，他“变得尤为亲切”。

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青年人应征入伍毫不稀奇。通过基督教思潮的影响，他们在运动场上、在自我管理的社团里，早已被灌输了战争的理念。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当时是查特豪斯学校(Charterhouse)的学生，他回忆说：“当一位部队的将军在1913年访问他们学校的训练营时，当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对德战争在两三年之内必然要爆发，我们随时准备奔赴战场。”

不久，格雷夫斯卷入了一场辩论，他回忆说：“学校赞成义务兵役制，100人中只有6人反对，19人弃权。我由于反感军官训练营里无条件服从的做法，刚刚从那里辞职，我是主要的反对派。”格雷夫斯代表了仅占5%的少数派，他反对当时的军国主义思潮，但绝大多数人还是集结成队，蓄势待发。

其他来自少年团和童子军的孩子们迅速应征，他们发现整编训练正符合他们的理想。正如理查德·霍金斯(Richard Hawkins)后来回忆道：“有四个排的战士不得不从孩子们中挑选。如果你来自童子军，那么，你可以直接成为下士。”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时年19岁，9月初入伍：“我是少年团成员，并且参加了运动员俱乐部。所以，我可以适应有组织、有约束的军队生活。其实，部队的召唤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我。”

和“候鸟运动”一样，英国的童子军很快适应了战争的需要。从1910年起，他们越来越多地开展关于责任和纪律的教育运动，以此来抵制“日前青少年缺乏自律”的“严重社会危机”。这个准军事机构给国民服役联合会(National Service League)的征兵号召提供了一股新鲜动力。罗伯茨亲王(Lord Roberts)和巴顿-鲍威尔上校这样的军国主义者认为，对18至23岁的青年进行普遍军事训练是拯救“英国社会道德沦丧的良药。”

战争爆发时，巴顿-鲍威尔认为这给了童子军一次绝好的锻炼机会。除了给童子军配备统一制服外，他还为15至17岁的孩子们成立了侦察防御部队(Scout Defense Corps)，对他们进行一些常规的军事训练，包括射击、发信号、修工事等。对这些孩子思想的长期洞察使他了解到，这些单纯的孩子向往战争。“所以，在一切爆发的时候，他们完全陷入对战争的幻想中。对于这些头脑发热的孩子来说，一切劝阻都无济于事。”

但是，60%的英国青少年毕竟没有受过战前训练。他们对战争的热情除了受到战争热潮的影响外，其中也不乏其他方面的因素。一些人厌恶工作想去冒险。根据当时的征兵惯例，一个地方所有的工人都被集体征用。这意味着你的同事和朋友可以在同一部队服役。当你的朋友都赶赴战场，你不可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1914年，基础产业部门的工人和19岁以下的青少年可以不用服兵役。然而，这个年龄限制经常被忽略。在那个战争狂热的年代，伦敦小伙子雷金纳德·海因(Reginald Haine)去报名参军：“我的朋友介绍我去找一位军官，他问我：‘你愿意参军吗？’我说：‘愿意，长官。’他又问：‘那么，你多大了？’我说：‘18岁零1个月。’他说：‘你是说你19岁零1个月？’我想了想说：‘是的，长官。’‘好吧，你在这里登记。’”

对于那些不那么热衷参军的人来说，随着1914年秋天失业人数的增多，军旅生活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月，由于贸易路线中断和经济波动，将近50万人失业。波尔战争期间被传为全国性丑闻的穷困工人健康问题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对于英国城市中心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来说，军队配给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征兵军官向大家承诺“天天有肉吃”，这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罗伯特·罗伯茨回忆道：“当新兵回到索尔福德休整时，个个变得更加高大、魁梧、挺拔、信心十足”，“跟走的时候判若两人”，他们鼓励身边的人赶快入伍。军官查尔斯·卡灵顿(Charles Carrington)回忆说：“新兵来的时候，他们是一群面黄肌瘦、

胆战心惊的孩子。因为战时粮食短缺,他们生活贫困。但是经过6个月的部队生活,伙食好,空气清新加上体格训练,他们变得连自己的母亲都认不出来了。”

应征入伍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压力。在战争早期,成千上万的女青年负责监督。她们把白色羽毛发给没有穿军装的男孩,以此批评他们的怯懦。这个主意是一个退休海军上将提出来的,大街上贴满了海报,上面写着:“你的梦中情人穿卡其衫了吗?如果没有,你难道不认为他应该穿吗?如果他不愿为你和你的祖国而战,那么这个人不值得你爱。”

这种做法非常有效,在年轻人心中,一身军装更能吸引异性注意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不论你是不够服役年龄,还是已经应征入伍,每一个看上去像“逃兵”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牺牲品。16岁的伦敦男孩诺曼·德穆斯(Norman Demuth)收到白羽毛时异常惊恐:“我试图说服医生和招募军官我已经19岁,因为我必须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所以我满腔热情地去了征兵办公室。”

一个名叫哈里·奥格(Harry Ogle)的年轻美术教师回忆说:“恐惧的情绪四处蔓延,充斥着这个国家。那些没穿军装的男孩子们惊恐异常地被年轻女孩(同样没穿军装)插上白羽毛。40岁以上的男人,认为自己有一份‘重要’的职业做保障,怂恿年轻人去参军,这些人除了年轻的生命外没什么损失。我曾经在一对年迈的夫妇家借宿过,他们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他们对我很冷淡。他们高声赞美泰德·普勒(Ted Pullen),因为报上说‘这位青年为国捐躯了’。”

\* \* \*

在诸多压制反战情绪的手段中,这些只是一些最普通的方式。反战的声音从一开始就有,比如一些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左翼杂志的社评、罗素这样的剑桥学者们和“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小组。“领土防御法”(the Defense of Realm Act)于1914年8月8日通过之后,这些反战行为被依法镇压。当权的政客和文人宣扬“战争是防止民族腐化的消毒剂”,而现代运动是最恐怖的顽疾。

1914年12月,宣传战争的戏剧《白天》(*Der Tag*)〔1〕首次登台,詹姆斯·马修·巴里写道:“英国人变得死气沉沉、大腹便便,他们已经失去了梦想,不知道如何点燃激情。”1914年10月,牛津大学美术教授塞尔温·伊马奇(Selwyn Image)

---

〔1〕 德国人庆祝胜利。

在一次题为《艺术、道德与战争》(Art, Morals and the War)的演讲中说：“我们需要一次大清洗，一声刺耳的召唤，恢复健全的心智，理清思路。”对他而言，战争是“有益的警醒”。另一个民粹主义作家认为现代派“将在战争中毁灭”。

在战争的头18个月里，总共动员了300万士兵，但清醒的反战人士却少之又少，整个4年中只有大概1.6万人。成为反战者，必须要有很坚决的立场。尽管这些反战者中80%的人未服役，但有相当一部分人作为战地医护人员在 frontline 工作，但这份工作依然遭到同胞的鄙视。其中，大约有6000名最坚定的反战者被送进监狱严刑拷打。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很多青年在入伍时没有丝毫畏惧。虽然表面上虚张声势，很多人对未知的将来还是有所担忧。彼得·李维林·戴维斯回忆说：在去报名参军的路，他的哥哥乔治“突然感觉到一阵眩晕，并伴随呕吐和头痛的症状。乔治从小就有病根。他不得不坐在兵营外休息一会儿。我当时真恨不得掉头回去，回到伦敦。我宁可让人耻笑也不想失去自由。但是这时乔治缓了过来，他推着我走进了黑暗之门。”

戴维斯和他的哥哥来到军营开始接受训练的那一天，他们得知：“八个年轻的军官正赶往法国，要去马恩河兵营替换伤者。他们也只不过是一两周前刚入伍的新兵。突然面对这些紧急的情况一时间让我们感到非常压抑。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脱了衣服躺在帐篷里，长久的沉默之后，乔治说：‘兄弟，咱们平生第一次面临真正的险境……’”

这种焦虑是正常的。所有的战士都梦想一场短暂而轰轰烈烈的战役，这场欧洲大战也不例外。8月份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战争会在圣诞节之前结束。随着伤亡人数的增加，两军在伊普雷斯(Ypres)形成势均力敌之势，军事上进展缓慢，这时军方开始意识到，这场战争无法速战速决。灵活机动的小型骑兵团派不上用场，取而代之的是两军对垒。这不是一场体现个人英雄主义的战争，而是缓慢的僵持。

战争状态本质的改变对于1914年理想主义的志愿者和应征入伍的战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很多人发现从和平时期转入战时状态很困难：毕竟，从青少年到成年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而这个过程中有不可避免的抵触情绪。约克郡青年F. B. 佛汉回忆说：“刚开始要遵守那些命令真的很难，但渐渐地我们学会了怎样四人一组装右边的车轮和左边的车轮。换句话说，我们都成了训练有素的男人。”

入编常规步行军、组装刺刀、挖战壕,6个月的步兵训练消灭了个人主义情绪,并且向新兵们灌输了基本的部队原则和价值观:不惜一切代价服从上级命令,忘记和平时期对杀生的禁忌。同时,年轻人的自由散漫、不服管教的性格在这个等级森严、纪律严明的世界里完全消失了。从本质上来说,这与经典的军事训练并无不同之处,但是之前的战争只关系到很少一部分青年人。

在这场战争中,上百万的青少年即使没有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它不但毁了整整一代人,而且其后果不可预料并且持续了很久。鲁珀特·布鲁克参加了比利时港口的安特卫普(Antwerp)战役,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他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写道:“这是一场血淋淋的战争。在这场现代化的战争中,人们手持武器不断屠杀。半数的欧洲青年在疼痛中倒下,化为乌有。”

大战爆发时,布鲁克已经通过一些关系,比如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关系,得到了一份立刻就能上任的任务,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专长。宣战后不久,他在一篇简短的自传文章《一个不同寻常的青年》(An Unusual Young Man)中提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青年,尽管恐怖将至,“他却异常高兴”。参军并且可能光荣地为国捐躯,这恰恰安抚了布鲁克难以消除的迷茫的情绪。正如他写道:“我盼望明年能有一颗流弹击中我,这对每个人都是最荣幸不过的事情。”

安特卫普战役(Antwerp)之后,布鲁克从战争中吸取灵感,写成了长诗《1914》。在这本明显倡导青年文化的小册子中,他写道,“现在,感谢上帝/跟我们开了个玩笑/然后攥住了我们的青春,将我们从梦中唤醒”——布鲁克将新异教徒不屑一顾的宗教牺牲变成了战争所需要的军事牺牲。他将第三部分命名为“死亡”,他在文中为陨落而喝彩:“那些人本应是,/他们的儿子,他们奉献了,他们永恒的青春。”这正是他在文中一直暗示的他这一代人最终应该接受的“遗产”。

这首诗在1915年3月初一经发表便迅速引起轰动。在众多作品中,这是第一部试图用平易的、反思的语言来描述这场战争的作品,完全不同于严格审查制度之下的新闻和军方报道。《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说:“这些都是表达个人感情的诗,继西德尼〔2〕之后再没有人写出这样的诗,英

---

〔2〕16世纪著名的战地诗人。5月3日,《环球》杂志称布鲁克是“自菲利普·西德尼在1856年聚特芬战役中受伤而死后唯一一位为祖国战争献出生命的诗人。”

国青年人的鲜血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表达。它们歌唱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所有那些时刻准备着、一呼即应的人们。”

然而,这绚丽的诗篇却没有反映大战的真实情况。1915年3月,乔治·戴维斯在战壕里给巴里写信,他看到一位战士的头靠在胸墙〔3〕上:“他的头顶被子弹射飞了,他自己还没有感觉到。那场面太恐怖了。”听说戴维斯的舅舅盖伊·杜·莫里哀(Guy du Maurier)已经战死,巴里回信时说:“我过去对于战争的憧憬现在彻底毁灭了,现在看来,简直是惨绝人寰。”三天之后,戴维斯头部中弹身亡,实现了他“理想中最完美的死亡方式”。

4月初,圣保罗教堂的教长在复活节布道中宣读了《1914》的一段,然而这时的布鲁克正在发高烧卧床不起。4月23日,他因败血症去世。他原本就被公认为伟大的战争诗人,他的死更是让他受到瞩目,悼念文字源源不断。《星报》(*Star*)说:“他是我们民族青年的象征。”《每日新闻》(*Daily News*)说:“他是世界青年的代表。”《泰晤士报》刊登了由爱德华·马什(Edward Marsh)执笔的长篇讣告,“青年们为他的死而深感悲痛,同时为真诚英勇的灵魂欣喜地祈祷。”

这不是真实的布鲁克,他的朋友试图说出真相,但一切徒劳。《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指出:“这是一个神话,一个围绕着虚构人物编织的神话,与真实的人相去甚远。”但是,这些质疑被汹涌的民族情感淹没。为了塑造一个经典形象,著名摄影师薛利尔·谢尔(Sherril Schell)设计了这个帅小伙形象。布鲁克时时出现在海报上,代表了数以万计为国捐躯的青年,他们的名字刊登在《泰晤士报》的光荣榜里,人数越来越多。

德国同样弘扬这种青春永不消逝的变态风气。在战争的前一阶段,第一批志愿者在兰格马克(Langemarck)的弗莱米什(Flemish)村庄牺牲。据报道,在11月的这次战役中,有上万人组成的临时军队,其中有的是工厂学徒,有的是大学生,甚至还有小学生。面对对方联军的强烈抵抗,他们在绝望中死去。在神话中,一个年轻的声音唱着《德国,德国高于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uber Alles*”),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这场无谓的屠杀后面是弥天大谎,鼓动人们自我牺牲。许多死者过去都是“候鸟”成员:原先对于自然的狂热似乎隔代遗传演变成了现在这种战场神秘主

〔3〕 一种用泥土或石头筑起以掩护士兵免遭敌方火力的坝。——译者注

义。一个年轻的志愿者说：“在我们看来，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它使整个国家从陈旧的传统中彻底解放出来，无论谁在战争中死去，这都是一个伟大的突破。战争点燃了我们的激情。”

这种转变在战时一部著名的小说中反映出来，书名叫做《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流浪者》(*A Wanderer Between Two Worlds*)，作者是一位名叫沃尔特·弗莱克斯(Walter Flex)的服役军官。这部小说赞扬了弗莱克斯的朋友厄恩斯特·沃驰(Ernst Wurche)，他认为德国所有的荣耀和未来都来自“候鸟”。弗莱克斯说，沃驰代表着纯洁和光明的灵魂。“候鸟”倡导各种各样的读物，如“歌德选集、拜火教的创始人和战场版的《新约》”，沃驰以此类比对军旅生活打了一个比方：“在战壕里，各种各样的思想被迫交汇，书如此，人也如此。”

沃驰死后，弗莱克斯为了纪念这位朋友，常常借沃驰灵魂之口表达他的思想，当弗莱克斯丧失信心的时候，沃驰的灵魂显现，告诉他：“这不是你想象的衰老，而是成熟。你的行为和你的死亡让你成熟并让青春永驻。正是活着让人变老，变得贪婪。死亡才是保持一切不变的元素。难道你不知道这世上除了死亡，没有任何事物能让青春驻足？这是上帝的意愿，让不朽的死亡使衰老的生命返老还童。这才是死亡的真谛。”

弗莱克斯将“候鸟”的神秘主义和军国主义融合，他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在国家战败或是有英勇牺牲时就能体现出来的坚定的道德信仰”。1917年底，在弗莱克斯死后不久，小说《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流浪者》出版，它帮助人们从毫无意义的事情中找到意义。直到最后，作者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正如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写的：“我清楚地知道，所有正在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都只不过是生活的发展，死神也无能为力。”

弗莱克斯和布鲁克的作品用表面的光彩掩盖了赤裸裸的大屠杀。1915年春，战争的悲剧愈演愈烈。在攻打新沙贝勒(Neuve Chapelle)的战役中英国7000人阵亡；德国第一次在进攻中使用化学武器；第一艘齐帕林飞艇袭击伦敦。西线的士兵陷入困境，阵地从英吉利海峡一直延伸到瑞士边境。这其实是一场动员了所有人员和武器的消耗战。

1915年秋，英国在卢斯战役中有80%的兵力伤亡，这就是德国将军所发明的阵地战(Stellungskrieg)的可怕之处，这是一种新的防御战略，会使整个军团像“查理·卓别林那样”顷刻倒下。厄恩斯特·扬格说：“这里不再有骑士，一切都听命

于这种新型战争的节奏和机械的规则。”重型炮火持续轰炸,战士们在顷刻间集体阵亡,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对于那些幸存者,这种经历都对其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创伤。除了炮火攻击,还要应付喷火器、毒气、狙击手。每天生活在寒冷、泥泞、老鼠、虱子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寄生虫中。在这种人间地狱,人们迅速衰老。罗伯特·格雷夫斯认为军官们的“最佳状态”是在来到前线后第三到第四周这段时间,随后便会患上“神经衰弱”。年龄在23岁到33岁之间的军官比更加年长或者年轻的军官具有更强的承受力。

1914年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太大,战士们不得不开始去追问那些虚构的谎言。布鲁克和弗莱克斯被奉为英雄,这只是标志着将青年、死亡和不朽联系起来,而不意味着自由。事实上,他们都是“杀婴礼”的牺牲者,是亚伯拉罕(Abraham)的儿子以撒(Issac)〔4〕——只是这次他们为自己的牺牲欣喜万分。但是,尽管战争是青年的“游戏”,但必须按照成年人的规则进行,他们除了服从别无选择。

\* \* \*

在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青年们自身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这场特殊的冲突虽限于口头的争论,但却充满苦涩。几乎就在他们被视为神明的时候,《1914》中水晶般的思想几乎成了扔在地上的废物。在布鲁克死后,20岁的军官查尔斯·索雷(Charles Sorley)批评了他对军队生活的伤感描述,“这是一种高强度的、不同寻常的、有牺牲的冒险,但不过是局势所迫而已。”

同年早些时候,公立学校学生出身的军官罗兰·雷登(Roland Leighton)在卢斯的战壕里写信给他的未婚妻,他写道:“天真的少年,瘦骨嶙峋,奉献着美妙的青春,除了荣誉、祖国的荣耀或他人对权力的欲望,他们看不到更加实际的东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雷登怀着理想应征入伍,他呼吁发动战争的人们“应该认识到,所谓伟大光荣的事业就是榨干所有青年,毁掉他们的幸福和生活,把他们置于死地。”

---

〔4〕在《旧约》中,以撒是亚伯拉罕之子,被作为祭品献给上帝。祭献在最后一刻因神意的干预而被阻止。——译者注

当英国政府征兵时,青年的核心作用更加无可置疑。伤亡太严重了,前线迫切需要新军增援。1915年8月英国开展了一次人口普查,强制要求16岁到65岁所有男女提供他们的详细资料。由于1915年10月的一个志愿者计划没有达到要求的人数,1916年2月开始强制征兵,所有18到41岁的未婚男子一律入伍,这一次一共征得两万多士兵。5月之后,由于已婚者也在征兵范围之内,入伍人数又有了增加。

就在这时,德国发起了对凡尔登决定性的突袭。在这场持续9个月的屠杀中,法国50万人阵亡。6月,索姆进攻开始,第一天就有6万英军阵亡。青年们理想化的言论还在持续,如1916年出版的文集《追求真理》(*The Quest for Truth*)中收录了牛津大学学生莱克斯·弗里斯顿(H. Rex Freston)的诗,这位青年到战场不到10天就牺牲了。“这一切快点到来,趁着我们的四肢还健壮,趁着我们的歌声还嘹亮。”

对有些士兵而言,这种浪漫的诗句简直是该死的谎言。1916年有人第一次开始质疑这种宣扬牺牲精神的思潮。不知不觉中,一部分受过军事教育的人内心发生了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官阶级冲在第一线,这种作战方式使得军官阶层比其他任何阶层的死伤率都要大,前公立学校学生的死伤惨重。〔5〕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质疑青年人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为什么如此巨大。

对弗雷斯顿自我牺牲那套说辞最直接的回击来自一名年轻的军官,亚瑟·格雷姆·韦斯特(Arthur Graeme West),他用“无奈的恐惧”来形容他在前线的经历。然而,他没有足够的“牺牲精神”来宣扬他的和平主义倾向。在非常不情愿地回到前线后,为了回应弗雷斯顿的《追求真理》,他不无讽刺地写道:“上帝,我多么恨你,你们这些欢乐的年轻人。”在这首五十多行的诗歌里,他尖刻地讽刺了战争浪漫主义、煽情的挽歌、后方的舆论宣传和公立学校长期以来宣扬的体育竞技精神。

韦斯特的诗歌直到1918年才公开发表,一年前他已经阵亡在巴波姆(Bapaume)战场上。他的诗歌揭露出了战争的真相。士兵和军官们对于官方关于战争的说辞心知肚明,战争诗人虚华的言辞,或是《一位普通士兵母亲的回信》

---

〔5〕哈罗德记录了516名在战争中死去的公立学校学生,他们都应征入伍1年,差不多每3天就有1个阵亡。

(“A Mother's Answer to a Common Soldier”)这种煽情的纪录片,都无法让人理解1917年战争的恐怖。这一年后方闹饥荒,在帕斯尚达尔之战中,3个月里英军有25万人阵亡,德军有40万人阵亡。

公立学校的青年仍然还是官方树立的为国牺牲的榜样,1917年英国最轰动一时的书却要颠覆这个偶像。书的名字叫《青年的隐现》(*The Loom of Youth*),作者亚历克·沃(Alec Waugh)是正在服役的一名军官。作者后来承认自己“带着叛逆的情绪。公立学校制度作为大英帝国的支柱受到推崇,在这种光环下树立了许多理想的公立学校男生典范——如吉普林(Kipling)笔下的布鲁斯伍德男孩(Brush Wood Boy)。但是这种神话纯属谎言,我觉得,我遇到的麻烦有一半都是这种谎言造成的。我要揭穿这个谎言。”

一方面,《青年的隐现》沿袭了二十世纪初吉普林的《斯托基公司》(*Stalky & Co.*)和贺拉斯·瓦谢尔德的《山》(*The hill*)这类校园小说的传统。但是,沃的愤怒使他又超越了这种传统。1911年,小说的主人公戈登·卡拉瑟斯(Gordon Caruthers)进入了书中的芬赫斯特(Fernhurst)学校,他很快就明白了学校的首要办学理念:“忘记一切,成为一个运动健将。”“公共教育体制……喜欢平庸之辈,要像接受《旧约》那样,毫不怀疑地接受一切。”戈登首先牢记“不能犯错”。

“军国主义”与奥斯卡·王尔德和美国拉格泰姆音乐格格不入,这些矛盾使男孩们感到困惑。戈登的朋友泰斯特(Tester)有些颓废,他的信条是:“我只做我喜欢的事,是与非只是相对而言。”一些更加叛逆的男孩们喜欢我行我素而拒不接受20世纪的虚伪文明,他们曾几次戏弄运动员。他们排练斯坦利·霍顿的《青年一代》作为向父辈挑战的宣言,“那些所谓成熟的思想束缚了青年的手脚,我们要打破枷锁。”

战争爆发后,他们全部报名参军,但却没有被舆论宣传所愚弄。泰斯特说:“我们这一代是牺牲品,当然,这不可避免。但是牺牲实在太惨烈了。我们的父辈已经看到他们的一部分理想实现,而我们什么也看不到。我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我想,不会太快的。但无论什么时候结束,那时玫瑰花已经凋谢。起初,我们被战争的煽动言论所欺骗,以为会壮烈地死去。现在我们明白,我们被童话所迷惑,战争中没有荣耀。”

牺牲被奉为民族理想,这种理想的实现对于那些牺牲者们意味着什么?而那些幸存者又作何感想呢?沃的预言很悲观,他认为战后这一代人将一无所有。尽

管人类文明在将来又可以重现辉煌,但他们这一代人已经失去了灵魂,他们的青春已经被偷走了。泰斯特说:“我们只能活一次,即使只有一次,我们也应该享受清风和海浪,享受活着的爱与快乐。但这一切都破灭了,我们不可能真正地活着。”

作为第一部明确指出牺牲是这一代年轻人身上的枷锁的作品,《青年的隐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真正引起公愤的并不是它的反战情绪,而是书中含蓄地提到了同性恋。在奥斯卡之后的20年里,同性恋依然是禁忌。虽然很多军官认为书中的描述过于夸张,但也足以使他在1917年底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作家起来回应,如《青年人的梦想》(*The Dream of Youth*)倡导用骑士精神来抵制腐化。

到1918年,战争已进入第四个年头。1914年的理想主义思潮早已消失殆尽。战争到这个阶段时,英国军队征集了空前多的青年,他们遭遇了战时的物资短缺,仿佛来到了人间地狱。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后,俄国退出大战。50万德国军队从东线撤回,打算大举进攻西线,自1915年以来,西线阵地几乎没有推进。

3月份,德军用最猛烈的炮击开始发起进攻,最年轻的战士挑起了重担。一位一等兵回忆说:“我手下有四个孩子,他们刚过18岁,才参军三周,然而这第一次的战斗经历就如此残酷!他们哭着,有一个不停地喊“妈妈”,没有人责备他们。这种人间地狱让最勇敢的人变成懦夫,没有谁的身体和精神能承受如此可怕的折磨、噪音、恐惧和精神创伤。”

很明显,在这种压力之下,只有严酷的军纪才能确保年轻士兵坚守战线。威廉·福尔摩斯(William Holmes)是伦敦的一名士兵,他回忆说:“有两个刚来的年轻士兵,大概十六七岁。”当下令进攻时他们“吓得痛哭流涕。”因为逃跑,他们被没收了肩章,按临阵脱逃罪被枪毙。对福尔摩斯来说,这就是“战争”:“军人就是来打仗的,对军令稍有怠慢就会被枪毙,惩罚不过是家常便饭。”

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尽管临阵脱逃的比率达到1.026%,但一共只有266人因此被处决。战士们不得不待在战场上,一方面是害怕军法处置,同时也担心被战友排挤。然而,很多前线的战士还是用堂皇的言辞解释他们坚持战斗的原因。公立学校出来的男孩们依然遵守军人的准则,而那些工人出身的士兵仅仅出于非常实际的目的——“完成任务”。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动力是各个阶层的融合。查尔斯·卡灵顿回忆说：“战壕里的士兵是一根绳上的蚂蚱，由于大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大家必须互相信任，不能对同伴的道德或体格有任何怀疑。”这种“战友情谊”是至关重要的，它穿越了英国军队长久以来严格的阶级。直到战争中期之后，军官阶层才被分离出来。

在战争的大熔炉中，来自各阶层的人们聚在一起，学会了如何相处：他们别无选择。公立学校的富家子弟们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无产阶级。现在他们发现，这些在其他场合可能被忽视的人不但和自己生活在一个星球，从他们身上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战壕里，矿工的技术显得弥足珍贵。一个战友对亨利说：“你们这些学生虽然有知识，但在这里用不上。挖坑铲土这些活还得看我们的。”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互相的。一位来自兰开夏郡的士兵认为：“我们的军官很不错，他们总是关照我们，确保我们能喝上热的东西。”但显然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乐观：战争并不能根除阶级矛盾。但这种大融合的理念在战争后期成为最有力可行的精神。这种实用的观点取代了牺牲和荣誉的浪漫情怀，在战争最后几年中产生很大影响。

齐格弗里德·威尔弗雷德和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的诗开始企图用不同的说辞来重塑自我牺牲的理念。在士兵们深厚战斗情谊的影响下，一些诗歌如《少年的鲜血》(*The Blood of the Young Men*)和《命中的少年》(*Anthem for Doomed Youth*)愤怒地谴责——不是德国人，而是老一辈。曾经受人尊敬、具有权威的长辈们都成了戕害子女的凶手，他们就像是诗歌《父子的故事》(*The Parable of the Old Man and the Young*)里的父亲，“杀害自己的儿子和欧洲一半的后代，一个接一个。”

这些声音仍然是少数的，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但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到大战的最后一年，英国的青壮年劳动力数量跌到最低谷，服役年龄的上下限扩大，服役的上限是55岁。从1918年春天起，许多军团大部分都由学龄少年组成。到冬天，在法国和比利时的185万英军中，18岁的少年占了一半。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在这种强调战友情谊反对社会层级对立的军事文化的影响下，新一代的认同感出现了，这毫不稀奇。阿加松1912年的《牺牲的一代》(*sacrificed generation*)中所描述的情景已经成为现实，只是到1918年，这牺牲的一代人不仅仅是社会精英，而是涉及从少年到中年的广大人群。1914年的梦想破灭了：和英国一样，法

国、德国的士兵大梦醒来，不得不面对道德和精神的真空。

在法国，“1914年的一代”已经被更年轻的一代所取代。有人谴责无能的军事将领和那些蛊惑青年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有人则操起了虚无主义的黑色幽默，在役军官雅克·瓦彻(Jacques Vache)在1918年夏天写道：“我很高兴自己活得如此幸福，像一部12x18相机。这只是等待最后结局最终来临的一种方式。我获得了力量，为未来积蓄力量。你将看到我们的将来一片混乱，这让我们可以无愧地杀人!!!”

德国的青年也同样质疑弗雷克斯笔下的流浪英雄和战争神秘主义。弗里茨·冯·温鲁(Fritz von Unruh)在他1917年出版的禁书《牺牲的方式》(*Way of Sacrifice*)中写道，牺牲的一代人的“神圣战斗友谊”枉费在理想化的社会主义中。事实上，冯·温鲁想象着把力量从老年人身上转移到了团结在一起的年轻人身上：“那些曾经躲在王位上的人现在坐在电话旁，脸色苍白，浑身颤抖，他们为我们服务。我们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攥有主动权！再也没有人能够迷惑我们！我们拥有青春！那些陈腐的人们将被甩在身后！”

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老一辈希望青年人保持的机械服从已经永远不复存在了。牺牲的神话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年轻的士兵希望恪尽职守，但一旦幸存下来，他们认为自己获得了讲述这段神话的权利。如果他们牺牲了，他们也不是为那些躲在家中的老人牺牲的。不，他们的牺牲是为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中有数百万的人相互作战，共同经受了折磨，他们的命运将永远被这可怕的经历连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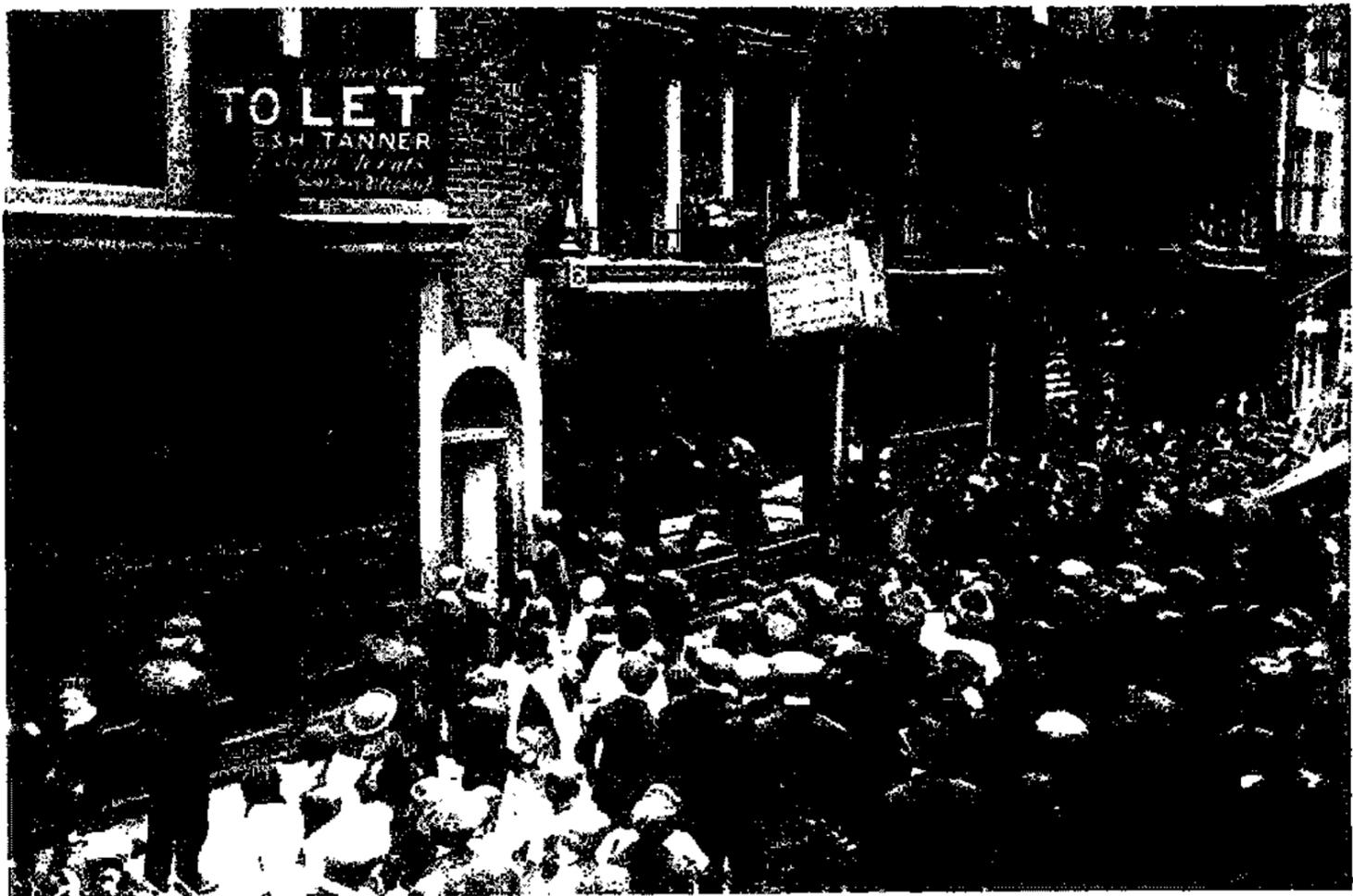
## 12

### 1902 年生人

少年犯罪和一战

“噢，我知道，我知道，你们都以为我疯了——你们的眼神告诉我你们正是这样看我。（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控，音调随着喋喋不休的话语逐渐升高。）但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这件事。年轻人身体力行，老年人也觉得做它是件荣耀的事。”

——迈尔斯·马里逊(Miles Malleson)《黑尔》(1916)



反德国法西斯的青年暴动，1915年，东伦敦

1916年1月,加拿大军队一个19岁的士兵遇到了难题。他叫弗朗西斯·切斯特(Francis Chester),16岁的时候从加拿大潜逃到纽约,并做了一名通信兵。他为一个倒卖可卡因和吗啡的中年人卖力,鉴定毒品,那人称他为“忠实的中尉”。17岁的时候,他吸食吗啡成瘾,开始走私毒品以满足自己的需求。然而,对毒品的依赖并没有完全消磨掉他对冒险的乐趣,在朋友“讨厌鬼”的劝说下,切斯特在1915年的夏天混进了加拿大军队。

唯一的问题是吗啡和可卡因的常规来源都被切断了。正如狼会循着血腥味走一样,切斯特和他的伙伴很快找到了伦敦的中国城,在那里,他们不仅仅可以享受到吗啡注射的乐趣,还能躺在床上吸烟枪。虽然这是非法的,但切斯特难以抵挡毒品的诱惑,“他成了吸烟枪的高手,有整整3个星期,他躺在一间中国屋子里,什么也不做,就是吸大烟。”他说“那些中国人从来不和我们一起做这些,他们通常偷偷地把我们带进去,再偷偷地带出来。”

由于他在军职上的玩忽职守,他被打发回肯特的军队本部克利夫海岸。然而,严厉的军队纪律也难以抵制毒瘾的折磨。他的朋友“讨厌鬼”是一个善于偷窃耍滑头的家伙,他帮助切斯特弄到一张离开部队的通行证,然后二人径直奔向离军部最近的小城福克斯通(Folkestone)。切斯特回忆道,“‘讨厌鬼’从军队的什么人那里买到把手枪,直到今天我还认为那东西根本不能射出子弹来。”

不管是不是真的,这枪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用来吓唬人足够了:“我们把银箔纸团成球塞进枪管,让它看起来像是塞满了子弹,然后闯进一家药店。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男孩,我用军大衣口袋里冒出的枪管点着他说:‘听着,小子,我们不想伤害你,只要给我们些白面儿就行了。’”他茫然不知所措,紧张地说:‘白面儿是什么东西?’‘我们要所有的可卡因和吗啡。’‘好好,军官。’他从架子上取下两三个瓶子,目瞪口呆地看我们离开了。”

这个故事出自切斯特的回忆录《全景拍摄》(*Full Shot*),从中可见一战给欧洲后方带来的巨大影响。上面那个年轻药剂师的反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对于他来

说,“白面儿”这个来自北美俚语的词是前所未闻的,他“目瞪口呆”是因为他经历了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经过16个月的战争折磨,平民和士兵们都开始发现,想要回归战前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了,人们做事的方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些方式甚至还没有个明确的叫法。

随着一战的继续,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开始受到质疑。心理学家斯·G·坦利·霍尔忧心忡忡地观望着美国的战局,他能给出的唯一解释是人们集体得了“精神分裂症〔1〕”,这是当时社会状况下派生出的新词。按霍尔的解释,“这是心理学家用来描述精神错乱者的用语,这种人就像哲基尔-海德博士一样〔2〕,白天还是好人,到了晚上就成了作恶的魔鬼。”文明衰退了,野蛮随之而来。战争扯下了“文化虚假的遮羞布”,让人类回到“粗俗原始的情感世界中”。

“嗡嗡! 咣! 轰! 嘭! 轰轰轰!”没有什么能比这持续不断的炮弹爆炸声更能形象地表示大规模死亡状况了。“随着第一声隆隆的炸弹声,人性的一部分就被狠狠抛回了原始年代。”小说家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后来写道,“作为士兵,我们出发了,抱怨也好兴奋也好,一旦到达前线,我们就回归了人的本性——动物。”战争的铁轮碾过,它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对精神的创伤也是毁灭性的。

心理学家查尔斯·迈尔斯(Charles Myers)在1915年把这种新型战争创伤称为“弹震症”(“shell shock”)。医生们很快举出一系列受炸弹爆炸伤害后的症状,如“瘫痪、麻痹、失眠,以及看过舞蹈家尼金克斯(Nijinsky)战前舞蹈后引发的难以遏制的四肢痉挛。”1915年的7月,剑桥大学医学教授记录道,“神经官能混乱,神经系统乱了套路,甚至陷于瘫痪。难以想象这些弹震症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出了什么毛病……歇斯底里、麻木、茫然。”

这些症状太普遍了。1914至1918年间的德国,有超过60万例的“战争受创”患者。1915年4月至1916年4月,约有24000例“弹震症”患者被遣送回英国。这是场大规模、群体性的“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现象,1913年有一批

---

〔1〕 苏黎世著名精神病医生布鲁勒教授(Professor Bleuler)1911年称这种“自我暗示”为精神失常,它伴随着一些症状如“情感脱离了和外界环境的联系,否定一切,唯唯诺诺,会出现幻觉”。

〔2〕 哲基尔医生是英国小说《化身博士》的主人公,是一个拥有善恶双重人格的人。——译者注

心理医生对此进行了合法的医学研究,只有他们才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心理健康问题在北欧凸显出来,一战也成了第一场引发人类心理问题的战争。“弹震症”带来的神经系统崩溃是史无前例的,人们需要通过接受精神病专家的治疗来抚平这一创伤。

然而,心理治疗仅仅作为一项特殊训练,面对士兵展开。那些留在家里的人们得不到这种缓解病痛的机会。在当时那种情感复杂的环境下,人们将任何悲伤甚至恐惧的表现视为禁忌。正如一个失去了未婚夫的年轻英国女子所说的,“我仅仅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呆一会儿,不需要和别人说话。”这种被英国人称作“咬紧牙关”的做法成了人们生存的原则,拦住即将崩溃的情感大堤来防止它冲垮已经到达动荡边缘的社会。

然而,“弹震症”患者表现出来的一目了然的恐惧说明这种策略仅仅起了部分作用。在战地后方,对强烈情感的压抑总的来说做得很成功,然而仍造成了一系列难以解释的奇怪现象,如毒品泛滥、少年犯罪和“性滥交”等。整个战争带来的冲击加速了社会和道德观念的变革:正如马格斯·西谢腓来写的,“做任何事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一时快感,因为只有当时那一刻是最真切的。”

\* \* \*

这种关注眼前、寻求精神安慰的做法代表了人们反对宗教的另一种方式。从1916年起,在法国、德国以及英国,人们对教会支持战争的做法非常反感。在英国,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求助于巫师,希望通过巫师和死去的年轻亲人心灵相通。美国的资本主义开始削弱基督教宣扬的自我牺牲精神,战争的经历更是让人们沉浸在及时行乐的心态中,这成了青少年精神的主流。

在以往的战争中,士兵和平民的地位是泾渭分明的,然而这第一场欧洲大战把这种差别碾得粉碎。仅仅是前线阵亡的人数就意味着大多数后方平民都不能免于上战场的命运。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平民被看作是合法的后备兵源。在法国、德国和英国,平民的死亡数(包括营养不良、疾病、战乱致死)达到了战争死亡人数的10%。在法国,这个数目约50万,在英国是30万,德国约62万。

战争的蔓延意味着战场后方也处于紧张之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年轻女人以及被恩斯特·格勒泽尔(Ernst Glaeser)称作“1902年生人”的欧洲青少年,他们幼小的记忆中只有战争,在战争的摧残面前无能为力。即使还没有成年,孩子们也

要面对随时被征兵去前线送命的危险,这成了他们少年时代的必修课,他们成天被为国牺牲的宣传包围着。

战争动员愈演愈烈,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们被迫在成人的工厂做工。过去严格的童工法律随着战争的推进松懈下来:1917年,德国有将近30万的年轻男女应招去工厂做工;英国的数字是60万。许多孩子未满法定年龄14岁就离开了学校去做工,或者特许一个礼拜做33小时的工,前提是上半天课。在一些农村地区,有将近一半的孩子派到至关重要的食品行业工作。

与此同时,那些从事儿童教育管制工作的权威人士消失了,因为家长、老师、姐姐和警察等都应征入伍了。学校关门了,亲人投身战事,大量的青少年处于无人照管的境地。从1915年开始,他们就生活在同龄人组成的世界里,没有成年人的监护。由于营养不良以及战争爆发带来的暴力性引导,失去监控的青少年很容易走上不正当发展的道路。

征兆最先出现在1915年5月,英国一艘名为“路西塔尼亚”(Lusitania)号的客船被击沉。据城里一家报纸记载,“愤怒的青年男女聚集在德国人开的店铺附近,对店铺进行暴力攻击。”这种排外情绪横扫整个国家,从赫尔到伦敦,再到利物浦。暴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然而它直接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少年犯罪。

1915年,在英国的17个主要城市中,16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比例已经达到了33%。这引发了政府的忧虑,一个警察局长在给警察总署的报告中写到:“毫无疑问,主要原因是缺乏父母的管教。在大多数家庭里,父亲在外面服役,而母亲在军火厂或其他什么地方做工,结果没有家长留下来监护孩子。这种情况很严重。”

同样的情形在德国反复上演,1914至1916年间,少年犯罪比例窜至60%。孩子们最常犯的错是无故逃学:有许多可以赚钱的工作职位,战事前景惨淡,读书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柏林市的一次调查显示,90%的犯罪少年都有个工作在外常年不回家的母亲。在没有成人监管的情况下,德国的少年们组建了许多不正规的青年社团,事实上和黑社会没什么两样。政府部门对这种“道德沦丧”深感担忧,他们试图把青少年的精力转移到和战争有关的活动上去。

无法逃避的事实是青少年在模仿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正当他们开始踏入社会的时候,他们发现外面的世界正陷入一场暴力争斗。出生于19世纪中叶的柏林作家萨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认为这场争斗似乎有着让人走火

入魔的吸引力：“它仿佛一场黑暗、神秘的游戏，永无止境。它邪恶的诱惑吞噬了周围的一切，使日常生活变得陈腐。它像赌场的转盘和鸦片一样让人欲罢不能。4年里，我和我的朋友们沉迷于这个游戏，没有人打搅，也没有人指责。”

在英国的街头匪帮，人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形。流氓团伙再现了，带着更加邪恶的面具。其中臭名远扬的是格拉斯哥（Glasgow）的安德森·里德斯金（Anderston Redskins）家族，他们的存在曾让整个城市瑟瑟发抖。《星期天记事报》（*Sunday Chronicle*）曾描绘过这样一幅可怕的画面，“这些团伙一个比一个野蛮和残忍。女士们被打劫，警察在执行公务时被棒子打伤，被破瓶子扎伤，老人们被殴打，他们的口袋被翻个里朝外，然后被扔在街上无人管。”

一战爆发的第一年，一个叫做“纳普”（Napoo）的曼彻斯特匪帮自诩要重演美洲印第安人的故事。据一个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回忆，“他们在街上看到年轻女子会悄悄跟在后面，然后一把抓住人家后面的辫子——那个时候非常流行梳长辫子——用剪刀咔嚓剪下来，拿着辫子就跑，留作纪念。”他们变得越来越大胆。“一些匪徒通常会在晚上候在电车上，如果遇到独自一人乘车的女子，他们就趁其不备，迅速剪掉人家的头发，然后闪电般逃跑，不会被抓住。”

“纳普”家族发迹于安克特（Ancoats）的工业区，他们家族的标志是人人带着粉红色领巾。由于大家都听说了他们这种喜欢给人“修剪头发”的怪癖，他们迅速臭名远扬。“他们臭名昭著，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一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曼彻斯特孩子回忆道，“他们什么都做，砸碎玻璃，殴打任何他们想打的人。他们口袋里装着剃须刀，那是用来割喉咙什么的。不过谁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大家都是道听途说，大家都这么说。”

一战期间英国的少年犯罪率的确在增加，但是公众因此产生的恐慌要远大于数字表面，报纸上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起了作用。青少年犯罪不仅代表了一个愈加疯狂的世界，而且，正如犯罪学家塞西尔·勒桑（Cecil Leeson）在他1917年《儿童与战争》（*The Child and the War*）中写到的，“我们这个国家现在最不堪承受的是浪费生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每个人都要演好自己的角色，“简单地说，我们这个国家在人口大量被战争吞噬的情况下已经不能再承受少年犯罪的压力了。”

勒桑承认“孩子们现在的生存环境阻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蓄意破坏、盗窃和损毁公共秩序的行为愈演愈烈，然而这一切都是可以解释的。大量的征兵减少了警察的数量，新警察都是些老头，他们为了和这些诡计多端的孩子周旋费尽

了脑筋。严格限制街灯的开放时间也助长了犯罪的烈焰,似乎“爱惹事的人都喜欢黑的地方”。除此之外,缺乏父母监管,正常学业被打断,也是造成少年犯罪的原因。“非正常的社会现状”也难逃干系,到处都是阴谋诡计和复仇情绪。

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们过去通常是少年犯罪的攻击对象,但是战争年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全天在工作,这也意味着他们能赚更多的钱,比别人活得更自信。勒桑写道:“这些小伙子享受成人的工资,所以尽管他们并没有成人那种社会经验,人们已经像对成年人一样对待他们。因此他们总想弄点什么乱子出来,结果就可能会犯罪。”工作让14岁的孩子们希望体会到做成人的乐趣。

《领土防御法》不断升级,追求乐趣的想法在战时的英国是不可能的。战争一开始,橄榄球、板球和赛马比赛就被禁止了。到1917年,人们被禁止在公共场合饮酒。〔3〕在一个管制愈加严格的国家,想寻找乐子的孩子被看作社会安全之大患。由于大多数男人都在前线打仗,人们把视线都聚集在孩子们身上,女人和孩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是利是弊莫衷一是。

\* \* \*

战争是男人的事情,基臣那尔大帝(Lord Kitchener)曾经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女人参加战争”。那些想做更多事的年轻女子发现她们仅仅充当辅助的角色,基本上不了前线。然而,她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加入战争,医护似乎是最普遍的工作了。将近50万年轻女子——其中一些人刚刚年满19岁——都积极投身到志愿者救助分遣队(Voluntary Aid Detachments)中。对于许多中产阶级妇女来说,她们从小受到男女平等思想的教育,这种思想现在通过战争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对于内城的女孩们来说,在工厂做工带给她们更多收入和独立感。罗伯特·罗伯茨(Robert Roberts)回忆起他的大姐珍妮,她那时候在一家机械厂工作,“她偷偷地用化妆品,直到一天晚上爸爸发现了她那满满一手提包化妆用的玩意儿,他把它们扔到火里。我还记得,房子里满是那种气味。‘乔·戴维恩(Joe Devine)(我们的一个邻居)就因为她女儿用这种东西把她赶出家门,’他咆哮着,‘难道你不知道吗?她再也不敢……’珍妮镇定地站在那里,说:‘就算你把我扫地出门,

---

〔3〕 源自大卫劳埃德乔治,一个节制运动倡导者的话。政府部门一直关注公共场所的开放时限,一天大概有18个小时,而到了1917年,这个时限缩短到每天3到4个小时,全国都这样。

我也会继续用化妆品。’”

在男女关系方面,维拉·布雷特(Vera Brittain)发现照顾那些伤病人可以帮助她从维多利亚式禁忌中释放出来。“我过去从来没有看过成年男人赤身裸体的样子。”她写道,但很快就不一样了,“在这四年做看护期间,除了和他们上床,其他亲密的接触没有没做过的。我仍然要感谢这个经历,使我能更多地了解男性的身体。”

战争期间两性频繁的接触更大程度上释放了战争带来的压力。马格斯·西谢腓认为,“1914”年代表着“对传统伦理约束的突破”,大家都去从事“政府禁止从事的活动”,关于谋杀和性滥交的禁令被推翻了。因为年轻人迟早要去送死,及时行乐的观念占了上风。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军装引发的性冲动以及享受眼前时光的想法同样难以抗拒。

尽管还没有达到前线那种近乎疯狂的境地,在后方,性自由已经到了近乎泛滥的地步。然而,后果堪忧,未婚先孕,娼妓人数和感染性病的人数都在增长。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甚至成了整个民族的耻辱。1916年,据英国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统计,伦敦工人阶层大约有10%的男人感染梅毒,更多的人有淋病。

随着战争的继续,做妓女的女孩趋于低龄化。21岁以下的女孩占到了50%。勒桑举了一个名为“D案例”的例子,一个14岁的女孩“最近被捕了,因为她在一个车站和一帮士兵混在一起”。1918年,伦敦的第一女子监狱狱长霍洛维(Holloway)见证了从事妓女行业的女孩子的堕落,“她们大多数很年轻,很单纯,很邪恶也很腐化,她们通常来自外省或乡下。很明显,她们是战争的产物。”

年轻女子的行为被严格监管起来。只要她们抽烟,或是在公共场合化很浓的妆,人们都会把她们同妓女联系起来。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现象,很多成年人都认为这是无风不起浪。随着人们对青年男子健康状况越来越重视,一些可怕的故事四处流传,在这些故事中,成千上万的年轻女子充斥着大城市的码头、公共场所和娱乐场所。

这种找替罪羊的做法在战争初年就开始了。在英国,对女人行为的指责和另一个道德问题联系到了一起:尽管《领土防御法》的禁令一严再严,伦敦的夜生活仍是屡禁不止。1915年的秋天,一家全国性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了关于游荡在伦敦西城街头的“饭店女郎”。“过去她们只有在男性朋友的陪同下才会出

去吃晚餐。然而现在,她们有了钱,却没有了男性朋友,她们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去吃饭”。伦敦成了“男人挥霍金钱的宝地”。

为了抵制荒淫无度的夜生活,“伦敦西区波西米亚圈子”的年轻女子们求助于毒品。在1916年1月的一份专栏上,记者奎克斯(Quex)写道,“寻求可卡因的刺激已经成为风尚”：“吸毒再容易不过了,仅仅是吸鼻子而已。没有人知道这些肉体 and 心灵都被榨干的女孩子们为什么会这么着迷。在一间女更衣室里,清洁工发现两个环形的盒子被丢在那里——那是装可卡因的盒子。”

丑闻仍在继续上演,1916年2月,《每日邮报》(*Daily Mail*)报道弗朗西斯·金斯利(Francis Kingsley)被捕,他暗中向一个加拿大下士兜售可卡因:弗朗西斯·切斯特不是唯一兜售可卡因的军官。可卡因不再专属于那些被叫做“荡妇”的年轻女子,它成为战争带来的幽灵。政府部门不得不采取行动了。1916年7月底,《领土防御法》颁布40D号法令,明确“持有可卡因和大麻是违法行为”。

在战争的后两年,《领土防御法》已经无处不在,俨然成为一个霸道的女性改革者。为了禁止“卡其热”,约有2000多队女警在公共场所巡逻,防止那些“迷迷糊糊”的女孩子们去做“职业妓女”。教会资助的组织如“社会整风运动联盟”联合发动了一场反对妇女饮酒的运动。1918年,《领土防御法》发布40D号法令,任何感染性病的女子和国家军队里的军人发生关系都是非法的。

1918年夏天的“潘波图诽谤案”(Pemberton Billing libel case)把这场道德警戒运动推到了顶峰,被告是一个在议会中持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应该提倡在公共场合宣传优良风尚”。1918年,在他主编的杂志《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中,他暗示有大约47000名公众人士,因为性变态导致叛国。他们中有许多人去剧院看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在审判过程中,潘波图把王尔德称作“被社会唾弃的人”,说他“在社会上倡导鸡奸,走遍各地把年轻人带坏”。

这个古怪的审判仅仅是一战最后一年遍布北欧各个国家的反常行为的一个缩影。1917年的运动不但没有带来新的突破,反而使得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1917年6月至1918年5月期间恶劣的天气让欧洲战场后方的生活雪上加霜。物资供给和后备兵源都到了枯竭的地步,欧洲居民普遍营养不良。随之而来的是绝望的情绪。英国一家报纸写道,“民族的志气衰落了,团结一致的信念也被碾得粉碎。”

受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的影响,1918这一年出现了罢工、士兵叛乱和暴乱

等现象。“西班牙流感”大肆吞灭着不堪一击的生命。到那个时候,许多欧洲人都明显感到,欧洲大陆不可能回归到战前的稳定了,那时人们已经看到了黄金时代的影子。正如罗伯特·罗伯茨所说的,“1917年是20世纪真正开始的一年。新思想传遍整个世界:人们在规划着未来。”

\* \* \*

战争带来的精神震荡和红色革命掺杂在一起,催生了这个时期的欧洲青年艺术运动。由于在这些充斥着好战分子的国家里组成反战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4〕,大批的反战者纷纷涌向中立国瑞士。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和里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这样的革命者以及从欧洲各地来的年轻艺术家蜂拥到苏黎世的安全地带。据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回忆,“要想知道达达主义(Dada)产生的环境,首先必须了解苏黎世的自由氛围,即使是在战争中这种氛围仍然存在。”

宣告达达主义诞生的是1916年2月2日的一个媒体声明:“大批年轻的艺术家和作家集结于伏尔泰歌舞表演厅,将这里作为一个艺术娱乐中心。艺术家们在这样一个地方演奏音乐、做诗。”这个广告来源于一些作家之手,他们来自德国、法国和罗马尼亚,他们是雨果·鲍尔(Hugo Ball)、艾米·亨宁斯(Emmy Hennings)、汉斯·阿尔普(Hans Arp)、马塞尔·简柯(Marcel Janco)和特里斯坦·扎拉(Tristan Tzara)。这些人尽管年龄都在20到30岁之间,但无一人曾在军队中服役过。

鲍尔写道:“三天后晚会开始的时候,场面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人多到屋子快要挤破了,许多人在外面进不来。”观众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强烈的通感。“喧闹的音乐,四到七个人在同时大声朗诵诗歌,人们戴着奇形怪状的面具穿着花哨的衣服在舞蹈,有人在用法语或是德语诵读什么东西,听起来不知所云。”援引理查德·赫尔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ack)的达达主义诗歌来说,这简直是“世

---

〔4〕 在德国,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罗莎·路森博格(Rosa Luxemburg)在1915年4月因领导公众抗议而被捕入狱。在英国,《领土防御法》法令愈加严酷,在公共场合做反战演说是违法的,要受到罚款、入狱和流放等惩罚。拒绝征兵联盟(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的发起者克利福德·阿兰(Clifford Allen)受过刑,做过苦工,放出来后又投入监狱。1918年1月,反战者亨利·福斯(Henry Firth)被处死。三天之后,伯特兰·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因为公开支持和平谈判而被判6个月监禁。

界末日”。

事实上,正如由它引发的其他运动一样,达达主义并非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同过去彻底决裂。只是战争使它的异教思想和反抗精神表现得更为激烈,“混乱、毁灭、无政府状态、反对一切——为什么我们要制止?混乱、毁灭、无政府状态、反对一切,又会怎么样?”伏尔泰歌舞表演厅里的场景表现出了一个许多欧洲人开始明白的事实。战争不仅仅毁灭了梦想、生命和政体,它还完全摧毁了语言、意识和理性。

达达主义者把西方战事前线的“噪音的世界”翻译成抽搐似的言语攻击,并模拟精神分裂患者的语言:“滋滋乌拉拉,滋滋乌拉拉,滋滋滋,宗宗滋滋拉拉,艾里凡托里,布鲁萨拉,布鲁门。”甚至它的名称都带有烦扰的意味:达达,这个毫无疑问的重复,和战争引发的神经衰退合拍,它被本·谢珀德(Ben Shephard)称作回归“童年”。达达听起来像一个孩子在叫他的爸爸:然而在这种情形下,这不再是一声呼唤,而是诅咒。

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被毁灭。“我们竭尽全力播撒不安的种子,”汉斯·里希特写道,“造成这种不安的有多种因素,有人认为可能或者必要铺开一条新路;有人认为那是因为缺乏信心,对社会、艺术、道德甚至我们自己缺乏信心,人类是无可救药的禽兽,是输得精光的赌徒;对于另外一些人,这种不安来自他们内心,也许是受到周围世界的影响,也许只是年轻人的反叛。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种不安是因为年轻,也因为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

达达主义在战争期间的影响力甚小。然而,它占尽了天时地利。战争的确带来了“世界末日”,它的阴影遍布所有参战的国家,战争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整个欧洲。人们对战争的野蛮有了切肤之痛,人仿佛变成了机器。1914年的伟大事件最终被看穿是一个谎言,取代理想主义的,是“人们前所未有的鲁莽和冷漠”。

然而,所有这些异教牺牲主义神话只是一场新轮回的开始,因为一个世界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的到来。19世纪帝国主义的瓦解迎来了更公平也更纷杂的新世界。战争摧毁了欧洲参战国赖以存在的等级森严的阶级体系。战后,那些地位低下的社会阶层得到了某种程度上自信和自我肯定。

世界大战让老年人不再希望他们的孩子温良恭顺。无论他们属于1914年那一代,还是1902年生人,这批由上百万年轻人组成的群体经受了同样的洗礼。由于不得不在未成年时就承担成年人的责任,他们再也无法回归童年时天真无邪的状态。战争创造了这样一代人,也让这些年轻人变得冷漠残忍。

13

## 爵士乐队和美国大兵

美国青年进入欧洲

“我不想像老人那样生活”，威廉认真地说，“我宁愿及时行乐，然后早早死去。”

——布斯·塔金顿《17岁》(1916)



美国青少年，20世纪10年代

战争爆发两年了,美国依然保持中立,但已有少部分美国青年参战。1915年9月,西奥多·罗斯福号召“每一位有志青年离开大学”,奔赴欧洲,“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援助”。大约25000名大学生参加了各种志愿组织,如“援法志愿军”(French Foreign Legion)、“鲟鱼小舰队”(the Lafayette Escadrille)或美国野战勤务团(the American Field Service)。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和哈里·克罗斯比(Harry Crosby)。

对很多人来说,驱使他们奔向欧洲战场的是内心的狂热。他们中最典型的代表是诗人阿兰·西格(Alan Seeger)。1916年7月他在一次进攻前写下了这些话:“我很高兴能成为先行者,如果你做一件事,那就要全力以赴,这是最精彩的经历。”西格不久便在索姆战役(the battle of the Somme)中战死,在这场战役中,英国的志愿军全部阵亡:仅第一天,伤亡就达6万。弗兰德斯(Flanders)战场上横尸遍野。

大西洋让美国远离了这个人间地狱,但是天真的美国青少年们却向往欧洲战场,做着童话般的“彼得·潘”式的英雄梦。“墙外光影掠过,在一块白色的空地上时而跳动。头上一轮明月透过枫叶洒下细细的光束,玫瑰色的星球在蓝色天空中成列浮动”。这就是布斯·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在他的畅销书《17岁》(*Seventeen*)中所描述的人类毁灭前的田园风光。

这时塔金顿已经是著名的小说家了,1914年他的畅销书《彭德罗》(*Penrod*)让他名声大噪,那是一本很受男孩子欢迎的小说。在《17岁》这本新书中,作者让主人公彭德罗长大了几岁,他试图捕捉青少年的感觉:“在年轻人眼中,时间并非正在流逝。时间很漫长——如此之长,以至于用之不竭,今天似乎是永恒的。”《17岁》的副标题《青少年和夏日时光的故事》(*A Tale of Youth and Summer Time*),小说各部分独立成节的风格很适合杂志连载和青少年读者的理解。

布斯·塔金顿将青少年梦想中的世外桃源定格在一个美国中西部的小城,这

里远离战火,人们宁静地生活着,不受外界的干扰。对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17岁少年威廉·希尔文纳斯·巴克斯特(William Sylvanus Baxter)来说,最让他困扰的是他追求洛拉·普拉特(Lola Pratt)遭到拒绝。洛拉是一位身穿白衣、讲话如同孩子般的女孩,威廉对她一直念念不忘。情节围绕着威廉复杂的求爱经历展开,古怪冷漠的普拉特小姐给他设置了各种关卡。

威廉不写歌颂大众自我牺牲精神的赞歌,却一直在写蹩脚的情诗。他是个典型的美国式空想家,居住在塔金顿所谓的“玫瑰色薄纱般的”世界里。他幻想自己是诗人、演员,想象自己像《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中的西尼·卡顿(Sydney Carton)一样为了证明自己无私的爱被吊上绞刑架。但现实总是另一回事。他的妹妹和其他女伴对他这种高尚的感情嗤之以鼻,他一窗之隔的邻居帕彻先生(Mr. Parcher)无法忍受他的求爱场面,只能躲到卧室里去。

这些反映小城家庭生活的小故事背后其实蕴涵着尖锐的社会问题。塔金顿有意将威廉·巴克斯特这一角色设定为介于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年龄,而这个年龄还不能说是真正的青春期。在诠释这个关键年龄段的过程中,他确立了后来成为青年文化永恒主题的观点:到了17岁,青少年开始冲破父母控制的枷锁,投身于同龄人的世界中,逐渐走向独立。〔1〕

塔金顿还用准确到位的心理分析吸引读者产生共鸣。威廉是个喜怒无常的人,正如他的同龄女伴们所说的:“他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他17岁了。”他总是希望自己能成熟一些,他老是提醒父母:“我马上就18岁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可以结婚并且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但是这毫无作用,他的父母可以纵容他一时的任性,但他还是要服从他们的决定:当威廉拒绝穿礼服时,他父亲说:“威廉,这就证明你还太年轻。”

无论如何幻想,威廉还是处在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的阶段:思想独立,但在现实中依然必须依附于父母。塔金顿认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对外界事物都看不顺

---

〔1〕 17岁确实是个特殊的年龄,这个观点影响了后人的作品。参阅1942年莫琳·戴利(Maureen Daly)的流行青春小说《第十七个夏天》(*Seventeenth Summer*)、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的歌曲《我看见她站在那里》(“I Saw Her Standing There”)(又名《17岁》),同样还有“性手枪”(Sex Pistols)乐队的《17岁》。格雷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在他1938年的小说《布莱顿硬糖》(*Brighton Rock*)中的主人公品奇(Pinkie)也是17岁:“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毒药,虽然他也常常微笑。他仍受到攻击:因为他们觉得他17岁了。”

眼,觉得一切都不完美,无论是世界观、对财富的积累、对家庭关系的看法、还是在公共场合下着装的审美。但同时,他内心的孩子成分又在不断地表现出来,这使那些说话不客气的人还是把他当作孩子。

塔金顿的语言巧妙、机智,他一方面嘲笑笔下的这些年轻人物,另一方面又同情他们。《17岁》虽然只是关注一个过渡阶段,但它影响深远,他完善了对青少年的定义,同时也告诉人们:中产阶级的青少年置身于一个游离的世界中。这本书让人们更加意识到,青少年是个独立的群体,他们不仅仅只是一个社会问题或是一部需要修理的出故障的机器,同时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市场,成为一群有志向的人。

最重要的是,这本书表达了人们对一个正在消逝的时代的怀念。虽然战争只是在欧洲进行,但1916年的美国也告别了过去的那个时代。在巴黎和纽约度过一段时间后,1911年塔金顿回到他的老家印第安纳波利斯,他发现,家乡已经被工业严重污染。他对一些大型企业感到十分恼火,说他们是“野蛮人”。作者决定不写这些烟雾和粉尘,而是选择了一群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少年作为书中的人物,他们生活在前工业时代未被污染的中西部小城,“这种轻松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塔金顿一方面是在写自传,一方面也是在追寻一段已经失去的黄金时光。他沿袭了大多数儿童读物的写作风格,既针对孩子和青少年,同时也能吸引富裕的中年人。《17岁》本来可以把这个群体的年龄跨度扩展到14岁,但他有意避而不谈青少年的性问题,这些已经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提出,并且很快被美国商业开发利用。巴克斯特和他的伙伴们正处于自我意识开始萌发这个关口。

从某种意义上说,《17岁》在发表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它没有关注城市中的青少年文化,如动物舞蹈、拉格泰姆音乐和电影。然而,这本书本来就不是纪实的,而是作者的幻想。这部作品的成功使美国青少年这种特征得到彰显:他们喜欢梦想,并且敢于梦想,他们拥有无尽的热情和纯真。就像美国这个国家一样,威廉·巴克斯特没有历史带来的沉重包袱,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并且充分享受着眼前的生活。

\* \* \*

青年人的这种无拘无束在1917年初一本完全不同的畅销书中也有体现,这

本书反映了当时城市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尽管带有道德说教色彩,黑人音乐和舞蹈在全国上下各阶层中持续传播流行。正当改革者们开始关闭新奥尔良的思多利维尔红灯区(New Orleans red-light district of Storyville)时,黑人音乐却在这些地方开始萌芽。这些音乐刚刚面世,还没来得及起个名字,就已经随着演奏者们传遍全国各地。

1917年3月,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胜利者留声机”唱片公司(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发行了“原创迪克西兰爵士乐队”的两部唱片:《迪克西兰乐队独步舞曲》(“Dixie Jass Band One Step”)和《马夫蓝调》(“Livery Stable Blues”)。“原创迪克西兰爵士乐队”是一个新奥尔良白人组成的五重奏乐队,那年1月份他们刚刚移居纽约。当时已经有一些其他新奥尔良乐队在纽约演出,但那些乐队只是作为歌舞杂耍节目的一部分。与这些乐队完全不同的是,“原创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引人注目,吸引着很多在曼哈顿享受夜生活的跳舞者。

纽约观众从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在“雷森韦伯俱乐部”这种时尚场所,舞池里挤满了激情四溢的大学生和大胆的社会青年。这个城市依然是音乐产业的中心,迪克西兰爵士乐队刚来一个月,就受到“哥伦比亚留声机”公司(Columbia Graphophone Company)的邀请去试音。他们的音乐极其嘈杂、尖锐,结果乐队和录音师之间没法沟通。四周后他们去为“胜利者留声机”公司录制唱片,这回他们一举成功,双方都竭力想让这种新的爵士风格跻身流行音乐圈。

“爵士”这个词语,同这种音乐形式一样,来自新奥尔良的红灯区。它起源于一个表示性交的非洲词语。尽管这种音乐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但“爵士”这个词直到20世纪10年代中期才开始广泛使用。仅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比泰格拉姆音乐更加松散、狂野。“爵士”代替了起源于19世纪的教堂葬礼进行曲,迅速走红。乐队包括几种管乐和钢琴,强烈的节奏几乎让人窒息。

迪克西兰乐队的短号手尼克·拉若卡(Nick LaRocca)和竖笛手拉里·谢尔德(Larry Shields)这时都接近30岁,他们同新奥尔良最出色的伴舞乐队指挥杰克·“爸爸”·莱恩(Jack “Papa” Laine)一同演出过。他们曾经受到过先锋黑人乐队的鼓舞,这些乐队包括基得·奥赖的棕色皮肤乐队(Kid Ory's Brownskin Band),以及因西德尼·贝彻(Sidney Bechet)与金·奥利弗(King Oliver)而出名的奥林匹亚乐队(Olympia)。与很多新奥尔良乐手一样,他们开始走出新奥尔良。他们先去了一年芝加哥,在那里成立了“迪克西兰”乐队,后来由于得到娱乐歌舞

演员艾尔·乔森(Al Jolson)的资助来到了纽约。

对美国的中年人来说,《迪克西兰乐队独步舞曲》听起来一片嘈杂,像农场里的噪音。拉若卡和谢尔德的演奏充满阳刚,而艾迪·爱德华兹的伸缩喇叭让人震撼,19岁的鼓手托尼·萨巴罗(Tony Sbarbaro)也同样出色。乐队很激进,他们的口号是:“刺耳的和声配以辛辣的旋律”,或者用拉罗卡的话来说,他们是音乐无政府主义者,爵士乐是“对悦耳旋律的暗杀”。

爵士乐刚刚得到媒体的关注,它还处在一个过渡期,迪克西兰很快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将人们对动物舞蹈的痴迷带到了一个新层次:根据当年3月《多样》(*Variety*)杂志的报道:“这种辛辣的摇摆乐正是舞者需要的。和电影公司一样,音乐工业同样容易被大众品位所左右。尽管音乐出版界靠伤感和怀旧音乐控制市场,但他们对新鲜事物总是很感兴趣,拉格泰姆和蓝调当年就是这么兴起的。”

这种全新的风格刚出现时或许一名不文,然而它一来到东海岸就引起了新一轮的狂热。《迪克斯兰乐队独步舞曲》也许不是第一张爵士乐专辑,但它是第一张打动大众的专辑。这部专辑专为伴舞设计,很快就抢购一空。到1917年4月末,也就是司各特·吉卜林去世的那个月,已经卖出了100万张。它的成功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尽管这部专辑的创作环境很艰难,但它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新鲜活力。



原创迪克西兰爵士乐队,1919年

\* \* \*

乐队的成功恰逢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4月2日，经过3年的游说和辩论，国会决定向以德国为首的轴心国宣战。公众花了一段时间才开始接受战争的事实。反对参战的势力包括强大的德国和爱尔兰的游说集团、亨利·福特（Henry Ford）这样的和平主义者以及信奉门罗教义的孤立主义者。同时，美国利用中立也得到不少好处：到1916年底，英国40%的军需品是由美国提供的。

美国不得不从零开始建立起一支军队。由于美国没有经历过像欧洲那样10年以上的战事，所以过去没有必要建立一支常备军：在宣战之时，军队只有12.5万名军官和平民。但这个国家的凝聚力很强：1917年5月，国会的《征兵选拔法案》（*Selective Service Act*）一经通过，就迅速开始征兵，所有21岁到30岁的男子都在征募之列。

到1917年6月，有将近1000万人报名参军，随后的7、8、9三个月中又有1500万人应征——几乎占美国男性总人口的一半。但是这些迅速调动起来的民众并没有马上投入战场，其中只有10%的入伍者真正投身于美国远征军（*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他们要在美国本土先接受6个月训练，再到法国训练2个月。

并非所有的美国青年都欢迎战争，但多数人还是与战争保持了一致的步调。政府的宣传攻势持续又猛烈，这促使许多人做出了参战的决定。大多数新闻媒体支持战争，好莱坞开始制作电影《柏林怪兽》（*The Beast of Berlin*），同时流行音乐出版界也发行了许多战争歌曲，比如乔治·M·柯汉的唱片《在那里》（*Over There*）1917年的发行量超过100万。斯坦利·霍尔认为：“战争是这个‘懒散、物欲横流’的国家必要的清洁剂”，他认为美国1000万年轻人应该接受“严峻的考验”。

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在第一草案拟定时，有5万人要求免除服役，而另外25万人没有参加应征。抗议者的领袖是那些在宗教上或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的人，持不同意见的人在新移民、少年犯和波西米亚人中也为数不少。黑帮势力也对草案影响了他们的活动表示不满，而那些为社会主义杂志《群众》撰稿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则认为“战争是丑恶的群体疯狂行为”。

反对者并没有得到重视。反战集会进行得轰轰烈烈，其领袖人物如爱玛·古德曼（*Emma Goodman*）和社会主义领袖尤金·德布兹被捕入狱。清理逃兵役者的行动，如1918年夏天纽约展开的“懒鬼搜捕”（“*slacker raid*”）行动，涉及1.6万

人,他们被当众羞辱。德国书籍被焚毁,德国人受到迫害。1917年7月,在东圣路易斯,黑人工人的到来引发了一场种族暴乱,大约100人遇害身亡。

20世纪初的改革主义运动只是1917年4月那场镇压的彩排。利用排外的狭隘情绪,反沙龙主义联盟的禁酒主义者借助爱国主义来推进他们的改革。重要人物韦恩·惠勒(Wayne Wheeler)成功地说服战争部长“保护青少年免受酒精的麻痹”。1918年9月中旬,同盟还在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发起“世界禁酒大会”(“Worldwide Prohibition Congress”),这时美国的禁酒令早已是预料之中的结局。

然而,在1917到1918年这段时间里,旧世界的人还从未见过美国的真面目。饱受战争煎熬的欧洲人认为美国大兵的到来带来了健康、活力和希望。远离四年战争的美国大兵出现在西部战线上,在他们看来就像一个奇迹。根据一位法国军官的描述:“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印象,那就是我们将看到新鲜血液的注入,它将给死气沉沉的法国带来新的生机。”

对于大部分欧洲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亲眼看到美国人,这些“友好、微笑”的模范给他们带来了绝望中的希望。战争终于要胜利了,维拉·布雷特在1918年4月第一次看到美国大兵时这样写道:“我们的救星来了,在大路上行进,他们有好几百人,毫不畏惧,昂首阔步,他们就像堡垒一样保护着亚眠市。”

1918年夏天,和德国相比,法国无论是在至关重要的人力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开始显得不足。美国的加入带来了一整套全新的理念、方法和习惯,迅速改变了人们已经被战争毁掉的命运。美国集工业实力、文化活力和国民士气于一身,在欧洲人眼中,它代表了未来和希望。1918年11月的休战暴露了参战国的实力空虚,人们越发对美国满怀希望。

正式停火日期是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这个数字的巧合对于这场有统计的战争来说显得很神秘。轴心国集团共有350万人阵亡,而同盟国集团死亡人数达到500万。战争期间,平均每天有5600人战死。由于当时不像现在这样关注青年,没有人做伤亡人数的年龄段分析。假定14岁至24岁的青年占到战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大约为900万),那么就意味着有将近300万青少年被屠杀。〔2〕

---

〔2〕 这个人数还没有算上精神上受到伤害的士兵,以及成千上万死去的市民。这些市民有些是死于战争,还有些死于战后瘟疫。

战争整整毁了一代人：这是一种巨大的、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11月11日之后的庆祝活动无法抚平人们的伤痛，尽管同盟国首都的大街小巷人潮涌动，但很多战士感到愤怒、空虚。维拉·布雷特意识到“这是另一个世界，同四年战争中他们已经习惯了的世界迥然不同，这个世界的人们无忧无虑而且健忘。他们自己、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娱乐比政治理想和国家大事更重要。”

而德国的青年连胜利的安慰都没有。在柏林，残疾的乔治·格罗兹(George Grosz)发起反对德国“达达主义”的运动，我们的行为是“彻底的无政府主义。我们质疑一切，包括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的是空虚，一切都是虚无。”对于11岁的萨巴斯蒂安·哈夫纳来说，战败意味着所有的价值观体系全都崩溃了。“如果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都是骗人的，那么到哪里可以找到稳定和自信？”他回忆道，“我凝视着深渊，对生命感到恐惧。”

\* \* \*

战后立刻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德国的11个城市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在柏林街头，革命者同右翼的“义勇军”为了争夺德皇退位之后留下的权利真空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伦敦，22岁的女明星比莉·卡列顿(Billie Carleton)在伦敦艾伯特大厅的盛大庆功宴之后因吸毒过量而死，〔3〕让人们对“可卡因香烟”充满恐惧。一位德国人试图用致幻剂来毁灭这个民族。

1919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雅克·瓦彻由于吸食鸦片过量在南特(Nantes)死亡。在停战的前三天他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安德烈·布伦登(André Breton)，他说：“我将离开战争。我会有些疯疯癫癫，就像村子里的傻子一样(我真希望这真的会发生)……或者……或者……我扮演的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啊！那些轰隆隆开过的汽车、那些倒塌的桥梁、那些在地上匍匐前进的士兵……毫无用处，而且无足轻重！”

旧世界已经毁灭，新世界接踵而来。美国的电影和音乐同它的士兵们一起横跨大西洋。从此，欧洲的舞蹈会换一种新的音乐伴奏。1919年1月，伦敦《塔特雷》(Tatler)杂志写道：“他们看到夜总会要排队入场，裁缝们说，来定做舞裙的人络绎不绝，把我们都累坏了。他们找不到足够的黑鬼来演奏爵士乐，我听到他们

---

〔3〕 玛尔克科恩在《毒品女孩》第97页写道：“卡列顿的死因可能是她过量服用佛罗拿。

在讨论先雇些疯子来演奏疯狂的爵士音乐,然后想办法用船把纽约的黑人音乐家运过来。”

3个月后,迪克斯兰乐队来到伦敦,并且待了很长时间,这次他们给欧洲人带来了真正的爵士乐〔4〕。4月初在伦敦跑马场的首演之前,一篇报纸文章评价爵士乐是“红脸印第安人、黑鬼和西非野人的组合”,但他们向读者保证,表演者“全是白人,地地道道的白人”。最后演出时,他们受到了空前的欢迎,以至于当红笑星乔治·罗比(George Robey)威胁说如果不解雇乐队他就辞职。

尽管受到争议,但乐队的演出是成功的。他们称自己是这种新式风格的先锋,这一点在他们起用的舞者乔尼戴尔所展示的最新爵士舞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舞蹈灵活、敏捷,像即将入瓮的水蛇。”争议的背后体现了代沟:中年批评家们认为爵士乐“不够庄重”,而年轻的歌迷却为之疯狂。

1919年初,青年对于欧洲来说弥足珍贵。四年的摧残过去了,回顾从前已经没有意义,只能昂首向前。青春期的自然冲动和爵士乐的新奇一拍即合。美国代表了纯洁和激情,这无疑吸引了欧洲青年。这片大陆成了他们心中新的世外桃源——一个科技异教徒的快乐世界。在19世纪初,它比以往任何地方都更加吸引人,而更大的诱惑在于人们离这种生活仅仅一步之遥。

---

〔4〕 这次将 jass 改为 jazz。

第四部分

1919—1929



## 14

### 战后的震荡

法西斯、德国联盟和“森林生活知识团”

1919年2月23日。多云有风。我急切地找寻着春天来临的任何一个讯息，因为这种讯息让我感到轻松。但是战争带来的后果是黑暗的。未来还不确定，生活如同悬在半空中，左右不定。以下是值得注意的几点：(1)巴黎和会(the Paris conference)促成了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产生，并且解决了一些其他问题。一种真正的精神正在形成。(2)德国这个敌人已经筋疲力尽，但正以极快的速度复苏。冷漠横行，但是布尔什维克对此的控制力度并不够。(3)俄国成为整个欧洲的症结所在，那里充斥了混乱和黑暗。(4)在如今的俄国，罢工变成了常态，矿工举行的罢工正对这个国家构成威胁，这也许就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主义。(5)新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呢？会不会整个世界都变成俄国那样？

——《一个18岁男孩：少年的日记》(1947)



来自“伟大力量的证明”青年组织的营员，1928年

1919年的青年人面对的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世界。由于世界范围内的互相残杀,冲突不可能得到很快的解决。正如美国远征军指挥官珀欣将军(General Pershing)那时所观察到的,协约国军事集团不可能完全摧毁德国军队,这就决定了和平只是暂时性局面。与此同时,1919年的局势还预示了日后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动乱:越来越多的基础产业工人参加罢工暴动,由于粮食短缺城市居民也开始骚乱,政治两极化状态不断加剧。新一代的年轻人身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极端不稳定的烙印。

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的签订表面上似乎宣告了战争的结束,然而它不可能治愈人们生理及心理上的创伤,立起的一座座纪念碑也无法减少人们心中的伤痛。在这些纪念碑中,有一座是为了纪念一位年轻人,在英国公众的眼里,这个年轻人是战争一代的缩影,他就是鲁珀特·布鲁克。那时他的《吟诗集》(*Collected Poems*)已经出版并且发行量巨大。1919年5月,人们在橄榄球学校的教堂里举行其肖像徽章的公开揭幕仪式,以此纪念布鲁克。这一理想化形象的最佳模板来自于希瑞尔·斯盖尔拍摄的这位天神阿波罗式年轻人的一张侧面裸体照。

崇拜一个似乎永远年轻英俊的诗人当然很简单,但是要治愈在战争中受损的神经就难得多。布鲁克代表了人们希望在返回家园的军人身上能看到的一种形象:1914年那种面容生动、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形象。然而现实却完全不同。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认为“整个世界都在弹震症的折磨之下”。所谓弹震症,就是从健忘到神经分裂的一系列形形色色的症状。正如很多心理失常的军人所表现的那样,弹震症是真实存在的,同时它也成为了一种修辞说法,比喻在遗忘、癫狂和享乐主义中彷徨的欧洲。

记者菲利普·吉布斯(Philip Gibbs)在提及返家军人的时候写道:“他们重新换上平民的衣服,就如同1914年8月以前在和平年代里正常上下班的年轻人一样照看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然而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些年轻人了。他们身上

的某些东西发生了改变。他们情绪起伏,脾气古怪,时而极端消沉,时而放肆追逐享乐。”维拉·布雷特试图回想“被战争改变前的年轻时代”,指出她的同龄人“思想懒散,做事虎头蛇尾。”

罗伯特·格雷夫斯觉得从战争到和平的突然转变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从学校直接参军,因此我不仅没有经历过独立的平民生活,甚至战后心理和神经上还是高度紧张,时刻准备战斗。夜里时常梦见炸弹在我床上爆炸开来……白天遇见的陌生人会在梦中幻化成死于战争的朋友的面容。”这种战后效应表明,许多参战军人都经历了这种心理失常状态。由于这种心理疾病不能得到公开承认,因此需要很长时间来治愈。

社会上对年轻人存在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他们现在经历的只是阵痛,另一种则认为他们已经完全被打倒了。在这两种极端看法之间,还存在另外一种看法。珀西·温德姆·刘易斯在对20来岁的人所作的评论《青年的宿命》(*Doom of Youth*)中提到,战争一旦结束,“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新生。抛开过去,尤其是战前那段时光,这就是他们的想法。”但是,想象总是很简单,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很难。尽管有些从前线回来的年轻人才刚刚18岁,但就经历来说,他们已经80岁了。很多人纵情享乐,希望借此抹去记忆,然而过去总是在那里。

尽管由于出生太晚而没有在战争中服过役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被理想化为完美的“白纸”,但他们发现自己实际上处于一个相当矛盾的境地。战争支配着当时所有的一切,然而由于他们无法参与进去,这一重大事件对他们来说就像从记忆中被完全删除了一样。尽管他们参加过战的长辈或者稍大一点的同辈人被视为精神楷模,但是返家战士的实际表现与他们的英雄形象完全不相配。对立由此产生,并且导致了双方的仇视。

被恩斯特·格勒泽尔(Ernst Glaeser)称作“1902生人”的战后一代在战争的4年里遭受了很多不幸,例如疾病、饥饿和无知。他们在既没有父母照看也没有学校教育的状态下成长起来,觉得自己的不幸似乎通过一种过去难以想象的自由度得到了弥补,但也正因为如此,1919年的家庭结构重建也就困难重重。多年不见,他们的父亲“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一个胡子刺渣,令人生畏的暴君形象,像纪念碑一样令人压抑。他们了解我们什么呢?他们知道我们住在哪里,但是却再也知道我们长什么样子,在想些什么。”

青年人身上承载了新的积极价值观,与此同时,战争的爆发似乎又应验了前

10年间反成人的预言,这两者的结合加剧了几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1919年预示着欧洲范围内的青年人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抽象一点说,青年人代表着一种通往未来的力量,这种力量虽然莽撞,却很积极。充满确定性的19世纪、以稳定和自由进步的思想进行自我伪装的战前世界在这种力量面前似乎将得到改变。

青年不再按生理划分,他们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罗伯特·沃尔认为,到1920年“青年”这个词“与年龄之间只存在一种极其微弱的联系。‘年轻’只意味着拥有对新事物更强的接受力,拥有迎接并战胜危机带来的无尽折磨所必需的活力。”青年人似乎成为能够折中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在两者之间找出第三条道路的一种新的革命力量。“现代文明将亡,”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莱斯利·保罗认为,“未来只属于我们青年人,而我们将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这种观点下隐藏的是深层的愤怒。一度只有少数几个异议诗人赞同的观点如今在这种对立下迅速传播开来。1920年,也就是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的诗被集结成册的那一年,菲利普·吉布斯发表了最新的修正主义宣言《战争的真相》(*The Realities of War*),披露了自己对于“那五年间,我亲眼所见的青少年所做的牺牲”的真实感受。应该怪谁呢?“老一辈的人导致了青少年的牺牲,而奸商们则发起了国难财,我们的憎恨之火在爱国热情和社论的鼓动下愈燃愈烈。”

\* \* \*

时代背弃了青年,而现在就到了清算一切的时候。战争结束的随后几年里,欧洲范围内野心勃勃的青年人数迅速增多:无论是反映在新法西斯党的激进跨阶级政治上,如阿诺尔特·布莱尼(Arnolt Bronnen)的《杀父者》(*Vatermord*)的表现主义派戏剧,还是反映在试图对这些隔阂进行定义的社会调查上。在1919和1920年“父亲”这个名词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曾经把青年人送上战场的那一代。战场上的老兵以及他们年轻的追随者们试图扭转局势,重新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随着“一代”这个词变得普遍并且越来越能激起情感上的共鸣,对其做出一个更精确的定义显得更为必要。1920年,法国一位43岁的社会学家夫莱斯瓦·蒙特(Francois Mentre)对阿加松的战前调查作了更新和补充,起名《社会的代别》

(*Les Generation Sociaels*)。他试图提出“代别理论”(generational theory)的中心问题:每天都有婴儿出生,因此人口的变化是持续的、不间断的,生物学上没有明显的割裂。那么,为什么一群人不同于其他人的基于年龄的身份?这个断裂是怎么产生的呢?

蒙特给出了答案,把“社会代别”这个名词定义为“持续30年左右,足以标志父子之间不断争斗全面展开的时间跨度。”这一观点清楚地涵盖了集体自我意识:“当一个人提及他这一代,他用的是一个相当清楚的表达,尽管这个‘代’并不是以时间来排序的。他把那些和他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同学和朋友,和他同时成长起来的人以及和他有着相同活动范围和影响力的人叫做他的‘同一代’。”

这实在是一个专属于杰出人才的概念:“大部分的人在人群中扮演的是没有台词的角色,为历史的眩目舞台提供背景。”蒙特相信每一时期都有其主导的一代人,这一群体决定了他们同时代人的基本需求,由此进一步决定了整个国家的基本需求。这个群体就像一支军队:“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广大群体”,“他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辈人,而是感受到相同推动力,被共同的抱负和希望所激励的人。”

这一理论为解决“代”的定义问题开了一个好头,却也存在自己的问题,因为它没有把法国战后筋疲力尽的那几代人之间的不同考虑进来。30年的时间跨度太长了,不能适应变化之快。蒙特承认,战后的社会代别可以分裂成2个、3个或者4个部分。他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青年人成为人们议论焦点的愿望太急切了,容易侵犯他们长辈的权利。”

战争打破了宁静的局面,不同代别的人相互竞争知名度。19世纪80年代出生的A代助燃了1914年的战争之火,是保守主义理论者;1890年左右出生的B代在他们成年的早期就踏入战场;较晚几年出生的C代则是从学校直接进了战场;而1902年的D代呢,他们战时太小了,不能投入1914到1918年的战争,却已经可以在战后争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

所有人都强调他们的战时经历非常重要。尽管A代看上去是B、C、D代明显的共同敌人,但实际上这三个年轻一代之间的关系却也并不轻松。B代从骇人的战争经历中存活下来,却并不是载誉而归。他们最能说会道的发言人,生于1893年的皮耶罗·丢拉罗歇尔(Pierre Drieu La Rochelle)表达出了他们理想的幻灭。不同于1914年梦想着能得到的骄傲和荣耀,他觉得退伍老兵是“可怜的孩子,走

火入魔,茫然无措”,他们“被排除在一切的门外。”

最极端的两代是在战前不曾经历过成年生活的 C 代和 D 代,他们在战后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最早发表看法的就是国际达达主义的年轻艺术家和作家。1920 年 3 月随着杂剧在作品剧院的上演,国际达达主义运动在法国的触角延伸到了公众的视野范围内。面对拥挤而吵闹的观众,23 岁的安德烈·布伦登宣布了“残酷的达达主义宣言”：“达达本身是无可触摸的：它就是虚无,虚无,虚无。就像你的希望：无；就像你的天堂：无；就像你的偶像：无；就像你的政客：无；就像你的英雄：无。”

1921 年《莫里斯·巴莱斯先生的控诉和审判》(*Mise en accusation et jugement de M. Maurice Barrès*)这本书对 A 代的精神领袖地位进行直接攻击,成为了审美虚无主义关注的一个政治焦点。这场审判非常正式,原告、被告、目击证人样样俱全,但这一引人注目之举却实际上加速了法国达达主义的瓦解。它的问题很明显：一切皆是虚无的消极过后,积极因素在哪里呢？如果没有,那么消极力量只能自我消亡。1919 年这一运动的宣言《达达预言》早就预示了这一点：“达达只有在停止存在的情况下才能生存下去。”

对代与代之间的分歧最引起轰动的描写是 19 岁的瑞蒙德·瑞迪戈特(Raymond Radiguet)在 1923 年写成的小说《肉欲之魔》(*Diable au corps*),这部小说以战时男学生和士兵妻子私通的故事情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为让·考克多(Jean Cocteau)宠爱的门徒,早熟的瑞迪戈特被视为继亚瑟·瑞姆鲍德之后最杰出的怪才。他的小说以其讽刺的开场白实践着所谓的“夸张法”：“让那些原本对我就怀有敌意的人们这样认为吧：战争对很多年轻男孩来说就意味着 4 年的假期。”

选择服役士兵最担心的事情——妻子的不忠来描写,瑞迪戈特让他 16 岁的主人公对战争完全不感兴趣,相反,完全沉迷于和 18 岁玛索的不伦关系中：“我梦想着人们期待的那种生活。我们会生活在乡间,我们会永葆青春。”战争没有摧毁这一幻想,但玛索的怀孕却摧毁了他的幻想,表明“青年人要想变成一个真正的男人还要经历无数的矛盾”。

正当参与战争的这几代为没能在战后世界获得显赫地位而哀伤的时候,D 代也在为争取尚未得到的显赫地位而努力。瑞迪戈特对丑闻描写的成功激发了一些人进行自我审视,从而使早熟以及缺少父母管教这一主题得到了发展。像马赛

勒·阿兰德(Marcel Arland)、安德烈·查姆森(Andre Chamson)、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和皮耶罗·吕歇尔(Pierre Luchoire)这类作家全部出生在世纪交替的时候,都认为自己是这场战争的牺牲品。

就像达达主义者一样,他们似乎更确定自己反对些什么,却并不清楚自己应该支持什么。对于吕歇尔来说,战争就是“事实的课堂”,使他的同辈们愤世嫉俗却也变得现实。阿兰德认为他的同辈们很消极,这种消极和他们对行动的迫切渴望结合在一起,会导致极端主义。马尔罗不知道他充满暴力的同辈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们自我否定,总把生活中不值一提的小事夸大成伟大的事件,并且不知道如何才能和生活真正挂钩。”

\* \* \*

在英国,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也很明显。很多上过战场的士兵认为他们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被那些战时由于太年轻而不能参战的年轻人给篡夺了。菲利普·吉布斯的小说《年轻的无政府主义》(*Young Anarchy*)中失业老兵弗兰克·哈代痛苦地说,“你看,我们这些人经历了战争,除了老了4岁,什么对和平年代的工作有用的本领都没有学到。可以说,我们错过了机会,那些年轻的家伙们占了我们的位子,还对我们指手画脚。”由于战后经济的不景气,20世纪20年代初,失业率不断攀升,1921年夏天失业人口达到250万的顶峰。

即使是拥有特权的老兵也觉得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维拉·布雷特1919年返回牛津,她注意到“饱受战争之苦的人和那些避开了战争最残酷影响的人之间”存在对抗。她强烈地意识到了“误解导致了战争一代和稍许年轻一代之间的矛盾,而这种误解的产生有很多种可能性——当一个群体经历了另一个群体没有经历的事情时,这种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对稍许年轻的一代来说,战争已经是“过去时”了。

年轻一代并没有长久地居于劣势。1920年9月,亚力克·沃的弟弟伊乌林大力颂扬“青少年的异常繁荣”：“每个学生都在描写他的学校,每个小孩都在描写她的玩偶之家,每个婴儿都在描写他的奶瓶。年轻人几乎已经完全垄断了书本、媒体还有美术画廊。青少年正迎来他们自己的时代。”1921年,他注意到“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和1912年时风华正茂的那代人之间横亘着战争的巨大沟壑。他们代表着什么呢?他们将做些什么呢?”

J. M. 巴里观察到这种代与代之间的冲突,并且在1920年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部戏剧。“老年人主要的敌人是青年”,他写道,“这两个阵营(实际上是年长者和年轻人——也就是战前一代和战后一代)不明白(不承认)他们判断道德的标准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战争带来的后果,尽管这种后果一开始隐而未现。年轻人并没有向年长者宣战,他们只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并且反对其他人的世界观。”

年龄大战宣告爆发。年轻人认为送他们上战场或者至少说毁了他们青春期的长辈留下了道德上的空白,而他们在这种空白里进行反叛是理所应当的。不管关系有多紧张,战时的三代人在两个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第一是他们都对老人极端厌恶,第二是他们都要求得到社会认同。曾经在战场上搏杀过的老兵们认为这是重温他们已逝青春的方法;而在那些太年轻没能上战场的人看来,这代表着不辜负“青年”这一名号而进行的共同努力。

但年长者却不这么认为。国家已经赢得了战争,因此,他们看不到任何理由去改变19世纪由义务、权威、服从构成的道德标准。但是战后人们对不同代别之间冲突的讨论揭露了一个事实,谁年长谁就有权威这种观点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谎言。当权者认为年轻人应该盲目地服从,一旦他们得不到这种自诩的特权,他们的反应异常激烈。警署、治安维持委员会和大众媒体联合起来,指出生活中的不道德潮流,继而对它们进行围攻。

饮酒、跳舞、泡吧,一切的一切,只要是年轻人喜欢做的都受到压制。战争期间,《领土防御法》不断升级,各种各样的规定已经使公众娱乐变成了一个禁区。而参战的两代人则大为诧异地旁观着这一切,他们在战时把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标准视为敌人,现在要再次实施这一标准实在是太过分了。他们以为《领土防御法》的很多规定不过是暂时的,然而事实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让他们非常不满。

他们更年轻一点的兄弟姐妹们反应更加强烈:他们刚刚有了一点乐子,如果当局者真要这么做,他们就更要变本加厉,任凭当局者们去抱怨。1922年的年轻男女们早已经被他们的长辈们看成是愤世嫉俗而又冷酷现实的一代,他们干脆就和长辈背道而行。如果主教、大众还有政客们都对饮酒、跳舞、爵士乐严加谴责,那么这些活动就是他们的生活标准。他们开始接受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享乐是新一代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政治在他们的生命中

只扮演了一个过客的角色。尽管英国在战争结束的初期政局混乱,种族暴乱、罢工、叛变以及前所未有的高失业率等等问题层出不穷,但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受到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1924年的选举选出了史上第一届工党政府,社会主义的温和派开始掌握政权,但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者却仍然只是一小部分。在政党政治中,青年人还算不上一个阶级。

非激进的青年人参与政治不多,却用别的运动表现着他们的理想主义。弗兰克·布什曼(Frank Buchman)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牛津派(Oxford Group)实践了独立的宗教复兴。它不设成员名单或者教义,实施的是一种全新的基督教:它的信徒主要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他们参加周末的聚会,在那里互相忏悔自己犯下的罪。这一教派追求道德改良以及和平主义,他们有四点教旨,即绝对诚实、绝对纯洁、绝对无私、绝对仁爱。

与此同时,国际联盟致力于帮助战后元气大伤的国家实行重建。到1923年,它已经拥有52个成员国,并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影响力。虽然联盟成立的最主要目的在于阻止德国势力的死灰复燃,它为未来世界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政府模式。战争席卷整个世界,这增强了人们的全球意识,而对于参加国际联盟组织的富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来说,这就是实现世界和平的绝佳机会。

英国最显眼的青年人组织受到童子军运动和战前德国“候鸟运动”的影响。巴顿-鲍威尔发起的童子军运动在战争中扩大了影响力,因为童子军在战争中起到了积极有用的作用,例如干农活、空袭时检查街道防空设施、送信以及做饭等等。随着巴顿-鲍威尔的控制逐渐弱化,童子军们成功地适应了战后的状况。在帝国主义的土地上,他们推进了阶级和谐、国家重建以及国际化进程。到1925年,他们的成员数量与1913年相比几乎翻倍,达到了30万人。

但是,在历史上,这些组织已经留下了分裂的烙印。由于不满巴顿-鲍威尔的军国主义思想,欧内斯特·威斯特莱克(Ernest Westlake)于1916年成立了“森林侠义秩序”组织(Order of Woodcraft Chivalry)。这一组织受美国的森林印第安人运动以及斯坦利·霍尔的《青春期》一书影响,致力于通过庆典、宗教仪式以及木工训练把重演理论付诸实践。美国印第安森林人运动希望建成卢梭的《爱弥儿》中所描述的乌托邦:通过欣赏自然来追求个人自由,但是,这一组织的成员构成没能在其中上层阶级的基础上得以扩展。

“伟大力量的证明”(Kibbo Kift Kindred)这一组织则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

约翰·哈格雷夫(John Hargrave)因为“不忠诚”而从童子军运动中被驱逐出去,却控制了成立于1920年的“伟大力量的证明”组织。对于其早期的成员莱斯利·保罗来说,组织的宣言“像一阵清新的风一样吹拂着我们青年人的世界。在H. G. 威尔斯的影响下,它强烈呼唤世界和平统一以及一个世界性的政府。”这一组织带有严重的空想主义色彩:“我们设想中的新社会必须类似于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在《无处不在的新闻》(*News from Nowhere*)中描述的社会那样。”

尽管其运动带有中世纪精神和理想化社会主义融合的色彩,“伟大力量的证明”说到底是一种个人崇拜,领袖的强大个人魅力占据主导地位。哈格雷夫在加里波利作为担架手和艺术家的战时经历使他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童子军英雄”,在他极具感召力的努力下,“伟大力量的证明”成员得以重新整合。保罗认为“他尤其喜欢和千百万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交谈,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在童子军运动中成长,从中汲取我们父母所不能理解的对于生活的希望和梦想。”

但是,这一运动的矛盾很快就显现出来。尽管它追求和平主义理想,却把武士道精神视为一种军事理想。保罗记得哈格雷夫有很多个迷信的神物——埃及人崇拜的长着狗脑袋的神阿努比斯:“它们提醒着我在这个新的运动中存在着用迷信力量来弥补不足的现象,可能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组织成立时相关的神智学者有关,但是我突然觉得这种只有女仆才会相信的荒谬信仰使我们的运动变得粗鄙。”

1925年2月,保罗从“伟大力量的证明”中脱离出来,组建了他自己的组织——“森林生活知识团”。这一组织依据“伟大力量的证明”还没有被哈格雷夫的个人崇拜主义腐蚀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而建立,希望通过传授实用的木工手艺来促成社会重建和精神复兴。保罗19岁时就计划通过建立一个“实验小组”来和他的伙伴一起“试验当时我们所有人称作‘部落训练’的教育理论。”

宣告其组织成立的宪章上也明确了这一目标:“我们希望在自然的环境里进行野营生活,通过磨炼自己的双手和意志,通过与他人的真诚相处,促进身心健康,加强社会责任感,以此服务人民。我们宣布,我们希望了解世界历史以及人类缓慢进化中的进步因素,进而或许能够理解促使一切事物不断进行自我完善的那种伟大精神,并对之心生敬意。”

保罗在后期的回忆录《愤怒的年轻人》(*Angry Young Man*)中讲述了《爱弥儿》和《青春期》对他新建的组织中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后者的“风靡一时”主

要归功于霍尔的重演论。保罗认为“从天真的男孩到开化的人”之间的转化只有在“男孩重演了一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他必须躺在湿漉漉的战壕里,向敌对那派扔石头,由此体验现代战争的紧张和危险。他必须拥有抽烟喝酒的自由,并且通过学习跳舞、在社交场合结识女孩来获取心灵的安宁和自信。”

支撑这一理论的是空想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的结合:保罗认为“群体的福祉”只有在“一切直接或者间接摧毁人类生活的因素都不存在的时候”才能得到保证。成立“森林生活知识团”的目的在于他们希望在对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神圣战役中扮演战斗核心的角色:“我们就是革命。我们拥有强健的体魄,我们训练出的那些人拥有可传承的智力和体力,我们必将为标志着人类新生的经济结构重组扫清障碍。”

“森林生活知识团”不像“伟大力量的证明”那样教条,它也慢慢从1926年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发展起来。为了适应当时的国际主义潮流,这一组织和德国、澳大利亚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联盟取得联系。他们试图吸收更多工人阶级出身的青少年。根据保罗回忆,“毫无疑问,我们发起的野营活动和户外生存活动给了孩子们运用他们的能量和独创性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由此给了贫民窟那些小个子孩子一个做梦的机会。”

但是,这个青年人的乌托邦同样存在问题。它的社会主义导向只不过是“装点门面,不自觉地沉浸在当时‘左’的风气下。我们之间存在着类似歃血为盟的兄弟关系。我们追求理想化的坚韧,于是不可避免地蔑视安逸和名望,仇视弱者、病者,最主要的是,仇视长者。”在这一简单的想法背后隐藏着对于“年华悄悄溜走”的恐惧,“机会稍纵即逝,除非我们现在就过上我们应该过上的生活。”

“森林生活知识团”严格的项目训练掩盖了其内部的混乱。保罗后来承认他和他的伙伴们“实际上为了自己立下规矩。我们觉得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伤害,由于情感和性上的痛苦以及经济上的拮据,生活对我们来说已经无比丑陋。其他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些伤害而很容易盲目地排斥成长。我们觉得有责任来结束这样一种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读教育学并且使之理论化的原因。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法,总会找到一条体面成长的道路吧。”

保罗把他所有的痛苦都融入了组织的建设中,最终使之走向了灭亡。“森林生活知识团”这一组织的立场太过狭隘,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英国的一支主要力量。和其他的战后几代人一样,保罗和他的拥护者们总是在反对些什么,他们发

现青年人是有缺陷的,并且针对这一点制定了管理原则。“森林生活知识团”的领袖们可能在对成年人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是面对他们的信徒,他们本身也很脆弱:他们领导的是一群“反对18岁‘成人’专制统治的孩子们”。

\* \* \*

在战后德国,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甚至更加激烈。战前的“候鸟运动”拒绝工业文明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但是面对在战败中清醒过来却处于崩溃状态的国家,青年人对兄弟情谊的幻想中逐渐纳入了外部世界的这些因素。德国的军事投降使政治社会变革太快,甚至在停战之前,由于受到俄国革命的鼓舞,愤怒的军人、不满的工人以及理想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就在几个大城市组织建立了劳工代表会议。

由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ic Party)执政的德国首届民主政府就在这样一片混乱中上台。但是,当这一新兴的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征召退役军人组成后备军组织——自由团来镇压苏维埃主义者时,它就迅速地腐化了。柏林起义的领导人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和罗莎·卢森堡被残忍地谋杀了。国家的重建不可能简单地依赖于机械化的政体改变。就像乔治·格罗兹所回忆的那样,太多的德国人“不能适应一个正在蜕变中的、不再正常的世界。”

工作岗位稀缺,“街上充斥着失业的人”。在这些未知的领域,“野蛮大行其道。道德标准不再存在。嫖妓、淫秽之风盛行。‘我不在乎’,每个人都这么咆哮着。到处弥漫着混乱与动荡。”和英国的情况类似,失业的德国青年人从新世界的音乐中寻找鼓舞,组成了“小规模乐队,模仿美国爵士乐进行演奏,以此赚取扔进他们帽子里的极少的便士。乍听上去,这些音乐都显得很开心,但实际上隐藏在里面的的是仇恨和失望。”

青年人处在国家分崩离析的关键时刻,前四年的好战的军国主义思想由向外扩张转为内部争斗。德国的青少年把战争带回了家,他们在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持下进行激烈的巷战。乔治·格罗兹记得“德国青年自发地组成松散的政治群体,穿着衬衫一边前进一边唱,‘犹太人去死’,而在他们后面另外一组人则有节奏地唱着:‘莫斯科万岁!’冲突不可避免。头破血流,胫骨碎裂,甚至有的时候,肚子被子弹穿孔的情况也会发生。”

这种极化现象影响了“候鸟运动”。战争主义与和平主义,左派与右派之间

的分歧已经扎根,而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更使这种分歧政治化,结果就在青年运动中形成了疯狂的个人崇拜主义和小党派主义。战前势力最大的组织——“自由德国青年会”向左派转化。1920年秋天在霍夫盖斯马,他们怀着建立一个“青年人统一前线”的初衷召开会议,却因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基本政见不同无疾而终,这种分歧和成年人间的斗争惊人地相似。

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幻灭,加上俄国革命的影响,使得革命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很多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人。就像他们所看到的一样,随着大规模生产经济变成了武器的大规模生产,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在冲突中灭亡。青年人和工人阶级首当其冲地承受了这种改变带来的冲击。要使这种冲击不再发生,社会必须要转型。转型的唯一方法就是让人民获取权力领导国家,由大众而非民族主义者或者剥削阶级当家作主。

共产主义者坚持社会统一和集体行动,试图为大众的时代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从法国革命开始,随着人民不再作为被统治阶级而作为统治者掌握权力,这一理想逐渐走向成熟。尽管坚持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却陷入了另外一个玄幻谬说的泥潭中。在他们最初的狂热驱使下,类似乔治·格罗兹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们深信一种新的人类机器正在形成:“个人命运将不再重要。”

俄国的新领导人认识到其政权的建立得到国际力量的支持,因此于1919年建立了共产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史称第三国际(Comintern)。第三国际由莫斯科领导,其成员致力于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煽动革命。尽管人数不多,这些小股力量却发挥了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影响力。共产主义变成了一种强势的新理想,受到艺术家和新成立机构如宝豪丝建筑大学(Bauhaus)中知识分子的追捧,并经德国共产党之类的组织在德国的许多城市中得以广泛传播。

尽管极化现象正在蔓延,很多“候鸟运动”的资深成员还是希望这一运动回到战前那种无邪的状态中去。但是,中立态度是再也不可能了;1919年在科堡举行的“候鸟运动”战后第一次重组大会上,3000名成员见证了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混战。就像一些青年团体青睐激进社会主义一样,另外一些则倾向于右派如“自由团”的军国主义思想。随后在富其德勒山上召开的“候鸟运动”大会上,旧式的温和手段被大部分成员所废弃,由此迈出了军国主义的步伐。

许多新兴的青年组织试图以兄弟组织的名义为“自由团”保驾护航。1918年,一个名叫渥泰戈·戈哈夫(Otger Graff)的现役军官创建了一个披着中世纪骑

士外衣的组织。他的“德国青年团”(Jungdeutsche Bund)主张德国的对外扩张,反对资本主义和基督教,并且号召“在纳粹党党徽的卐字标志下”完成国家复兴。另一个组织,“新探险者”(Neupfadfinder)吸收了“部落教育”思想以及来源于“伟大力量的证明”和诗人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民族主义哲学。

格奥尔格的“联盟”是一个由对20世纪的大众社会怀有敌意的人组成的与世隔绝的群体,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信奉“老套的平等和进步”。马丁·沃格凯勒(Martin Voelkel)领导的“白色骑士”(White Knights)在这一组织的基础上又有了改变。“联盟”的青年成员们以骑士精神作为他们的目标,将带领德国人挣脱锁链,进入未来“第三帝国”的无限荣耀中。这种中世纪的神秘论使以男性为主导的日益专制的“联盟”更具吸引力。四年的战争教会了他们为了更伟大的事业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魏玛政权没能满足很大一部分青年人的要求。在那段时间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德国的青年人走上左派道路和右派道路的几率是相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冲突开始爆发。1918年11月以后,真正送年轻人上战场的年长者们不再是青年人反抗的对象,魏玛共和国取代凯撒·威廉埃(Kaiser Wilhelm)成了父辈形象的代表,年轻人的敌意都瞄准了这种脆弱的民主。

萨巴斯蒂安·哈夫纳在卡普政变失败后回忆说,“所有男孩对政治的热情都有所减退。所有的政党都在妥协,因此政治作为一个整体失去了吸引力。”极端主义就在这种政治真空中应运而生。“只有极少数的一些人对政治怀有真正的情,很奇怪的是,这个想法第一次在我脑子里闪现的时候,我想的是,他们是我的同学中最蠢、最低级、最令人生厌的。他们迫不及待地进入‘右派’的社团,德国国家青年协会(German National Youth Association)或者俾斯麦联盟(Bismarck League),然后他们就开始在学校里把手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拿着短棍甚至警棍到处耀武扬威。”

哈夫纳曾经看见这些恶霸中的一个“在他的笔记本上胡乱地画了一个奇怪的设计”：“这个奇怪的式样一次又一次地被重复,一些笔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令人愉悦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像箱子一样对称的结构。我立刻被吸引了。‘这是什么?’那是在一节无聊的课上,我很小声地问。‘反犹太标志’,他也断断续续地小声回答我。‘埃尔哈特旅的士兵们把它佩戴在帽子上,意味着要赶走犹太人。你应该知道的。’然后他继续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卐字标志。”

\* \* \*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青年人本身既不具有进步性也不具有反动性。就在第三帝国野心勃勃地想要在欧洲范围内对青年人形成广泛的影响时,右倾思想已经成功地把很大一部分的青年带入了极端主义的政治思潮中。作为同盟国军事集团中的一个,意大利在战后也同样经历了价值体系的崩塌。正如退役老兵安多洛夫·奥莫迪欧(Adolfo Omodeo)在1919年春天写的那样,“我似乎生活在一个完全失去了道德意识的世界里,国际上如此,国内如此,个人也如此。”

1919年春天,一个名为“战斗的法西斯”(Fasci di combattimento)的新政党成立,旨在把退伍老兵的愤怒情绪全部集中到一个政党当中来。这一法西斯政党与其他试图赢得退伍老兵关注的其他组织不同,它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青年人的活力。政党的创建人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在1919年7月说,“在法西斯中没有腐烂陈旧的思想,没有虚弱的老年人,没有常规价值体系中的等级制度,有的只是年轻人、冲动和忠诚。”

“战斗的法西斯”不注重细节,却在浮夸和场面上做足文章。就如1919年11月在米兰召开的会议,以“宏伟的火箭爆破”开场,结尾则安排了火炬传递。利用这些巧妙编排的场面,法西斯给很多青年资本主义者的革命冲动披上了退伍军人“战斗”精神的铠甲。正如一个未来主义者在1919年所写的那样,“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让我们臣服在正回归的军队面前吧,他们的活力将书写下领导整个世界的法令,世界掌握在他们的手中。”

把年轻人牢牢团结在以法西斯党歌“青年!青年!”为标志的口号下,墨索里尼——尽管他的年纪和青年人所敌视的父辈一般大——在1922年10月迅速地掌握了政权。尽管最初的法西斯党并不像后来那样极权,它还是设下了先例。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墨索里尼证明了一个事实,青年不论是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还是充满能量的现实,都会被新型政党所俘虏,这些新型政党崇尚技术和异教思想,试图超越19世纪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这种政党出现的结果就是,似乎一种权势和斗争并存的全新政治出现了。这种政治对于无法释放暴力倾向的战时那一代来说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年轻继任者尚未有机会施展的暴力冲动。对很多激进主义者来说,1914

年到1918年那场大范围的动荡证实了尼采那个最著名的预言。如果上帝死了，那么取代他的一定是世俗的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由于他们内心呼唤斯坦利·霍尔所谓的“宗教变革”，欧洲的很多青年人一定会联合起来。

\* \* \*

在德国，随着战后混乱愈演愈烈，极化的政治也就越来越具吸引力。1923年法国军队侵占了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德意志的标志由此全然倒塌。萨巴斯蒂安·哈夫纳回忆道，“生活的花费失去了控制。商人疯狂地追逐利益。昨天只值5万马克1磅的西红柿现在要卖10万。上个星期五带回家的6.5万薪水在这个星期二已经不够买1包烟。”

这一骇人听闻的货币贬值成了拖垮德国的最后一根稻草。1923年过后，德国人的灵魂里似乎注入了一种“不受限制的、愤世嫉俗的想象，不可能实现的虚无主义的快感，以及自我了结的能量。那一年，德国的整整一代人似乎都被抽走了精神上一个重要的器官：这一器官给与人们坚定与平衡，同时也给人们以惰性和麻木。它可能以意识、理性、经验、尊重、道德或者对上帝的敬畏等等形式变化出现。那一整代人学会了，或者说以为他们自己学会了可以不依赖于这些东西而生活。”

20世纪20年代的大批青年陷入了一个致命的裂缝中。他们否定长辈的价值观，认为凭他们自己的力量就能改造世界。但是，由于切断了几乎所有已知的联系，他们把自己置身于危险的境地中。莱斯利·保罗事后反思说，“我们追寻新异教主义，我们试图成就新野蛮主义，对现代文明的抵制在各地都变成了一种狂热，并且促使很多组织的产生，欧洲史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被青年运动代表的情绪所改写。”

# 15

## 酋长和希巴

### 美国的青年市场

我剪了短头发,这是摇摆女郎形象的象征。(啊!这多么令人惬意啊!)我在鼻子上抹了点粉。我穿着带流苏的裙子,亮色的毛衣,围着围巾,配小飞侠衣领,以及“最后的跳跃者”的低跟鞋。我喜欢跳舞。我把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开车上。我参加舞会、球类运动、划船比赛,以及男子学校里流行的其他很多项目。

——艾伦·威尔斯·巴芝,《一个摇摆女郎对父母的恳求》,《展望》,1922年6月12日



美国的年轻新女性类型摇摆女郎,  
20世纪20年代早期

F. 斯考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在《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里以表格的方式列出了一种新青年的类型,这种青年的出现标志着“与传统学校的虚伪第一次真正地划清了界限。‘花花公子’从本质上区别于以前学校提倡的‘伟大的人’,开始成为成功的一个确定因素。”

#### “花花公子”

1. 聪明的社会价值感
2. 穿着讲究。假装认为注重穿着是肤浅的——但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3. 参加能表现自己的活动
4. 上大学,在社会能力方面很成功
5. 头发油光可鉴

#### “伟大的人”

1. 有点木讷,缺乏社会价值感
2. 认为注重穿着是肤浅的,因此不太关心穿着
3. 出于责任感而对所有事大包大揽
4. 上大学,但前途渺茫,觉得失落
5. 头发上不抹油

菲茨杰拉德的这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20年,小说追溯了青少年的历史,从布斯·塔金顿的田园诗到当下战后“如恶魔般不安宁”的堕落状态,宣告了在美国,青少年这一概念似乎完全形成。《人间天堂》聚焦于中学和大学里的青少年,通过现代主义写法描写了自我意识觉醒并且认识到自己社会力量的一代人。它还抓住了人们对青春的痴迷,这在美国文化开始席卷西方世界时,是一个极大的卖点。

尽管美国式的纯真是这一理想中最重要的因素,《人间天堂》和这一时期另一部关于青少年过渡期的成功作品,舍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的《俄亥俄州的温尼斯博格》(*Winesburg, Ohio*)都认识到美洲大陆的纯真品质已经日益失去光泽。写到工业革命时,安德生认为“过去那种无知虽然显得有些未开化,却带有一种美好的纯真在里面,但这种纯真已经永远消失了。”布斯·塔金顿的主角永远身处中西部地区,而安德生书中的主角,乔治·维利亚德在他刚满18岁时就

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俄亥俄州。

《人间天堂》把男孩们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从中西部的世外桃源到了日益堕落的大都市。菲茨杰拉德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描写详细刻画了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美国青年的社会活动:学校里自我封闭的世界、性经历、疯狂的跳舞和饮酒、突然的车祸死亡。小说提到了海斯曼、布鲁克以及王尔德,这说明豪饮、性爱以及速度带来的阵痛为这个被战争摧毁了幻想的时代提供了一种新的浪漫主义。

由于卷入战争,美国也和英国、德国以及法国一样,出现了青年一代和老一代的冲突。就像22岁的士兵约翰·多斯·帕索斯1918年在前线写的那样,“所有的年轻人都相当体面,要是我们能领导这个世界该有多好啊!而不是那些穿着长礼服的傲慢的老顽固们。”另外一个青年士兵,瓦尔特·A.哈芬纳(Walter A. Hafener)在1919年1月给斯坦利·霍尔写信说,“我们想做的只是脱下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然后躲起来。如果有人要告发我们,我们只有杀了他。”

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美国年轻人,不管他们是退伍军人,还是大学生,按哈芬纳的说法,没有什么比限制他们“在酒馆里喝一两杯”的自由更让他们不安了。在《人间天堂》完成到发表的过程中,美国通过了宪法的第十九次修正案。禁止酒的消费、广告和生产的《沃尔斯特德法案》于1920年1月17日成为法律。违反这一法律成了青年一代反抗“老顽固”的常用手段。

禁酒可能是战前改良运动延续的一个必然结果,但它同时也标志着战争带来的反自由主义运动的高涨。在反对和平主义者、不同政见者、尤其是有组织的劳工的活动中,支持战争的力量日益壮大。美国似乎下定决心要消灭布尔什维克的病毒。1918年8月对113名世界行动主义的国际工人的公审刚刚结束,1919年底一系列大规模的袭击和驱逐就在一个名叫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的野心勃勃的年轻律师的策划下爆发了。

正当美国的种种自由成为照亮整个欧洲的灯塔时,美国自己却如同一只蚌一样封闭了自我。由于少数派集中反对,禁酒法案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它代表着用宗教道德信仰来限制当时大部分人都迫不及待选择的俗世消费主义价值观,也标志着对新系统带来的自由进行武断的限制,因此不可避免被青年人斥为伪善。确实,《人间天堂》中所描写的许多痛苦都来源于青年人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得到的各种关于欲念和渴望的讯息。

在禁酒法案颁布的同时,刺激消费成为美国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像

伊丽莎白·斯蒂文森(Elizabeth Stevenson)所写的那样,那是“第一次一个社会大规模地鼓励一系列的生活方式,鼓励人们去满足自己的渴望和需求,鼓励他们在买卖的过程中建立信心。”作为未来的希望,青年人成了生产经营者们瞄准的对象。正如商业广告杂志《油墨》在1921年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你能把产品卖给青年人的话,这个产品也就同时征服了年长者。”

1918年综合杂志上的广告总量不过5850万,而两年以后,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2950万。大部分的广告是针对年轻人的,就像某个广告权威所认为的那样,年轻人是“市场上的激进分子”。针对年轻人的产品有衣服、杂志、化妆品、电影、唱片、还有香烟。杂志《电影剧本》(Photoplay)于1922年调查了不同年龄层的消费习惯,结果表明最受18岁到30岁年龄层欢迎的产品是针织品、内衣裤、唱片和磁带。

美国的青年人在争夺社会地位的战役中经历了并不漂亮的开端和前20年间不断失败的尝试,终于在消费革命中占据了先锋的地位。20世纪20年代间,高中扩招了两倍于前的学生,大学教育也不再是精英们的特权,而是成为全国青年都能梦想进入的殿堂。广告商们开始野心勃勃地把目光投向大众教育成功创造的“彼得·潘”式的新青年阶层。对很多美国青年人来说,教育与其说是一种学习方法,不如说是训练他们成为“明日消费者”的手段更为恰当。

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923年写成的长篇小说《巴比特》(Babbitt)围绕青年和老年、自由和专制、选择和强迫种种之间的矛盾展开探索。作为中西部男生读物当中的一本,《巴比特》刻画了美洲大陆由工业化前的田园社会向机械化的统一社会转变的过程。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中年人乔治·巴比特(George Babbitt)曾经幻想过“自己是漂亮的孩子,做着-一个比银色海边的红宝塔更浪漫-的梦”,但是当消费主义变成大众所信仰的一种世俗宗教时,他内心主观的梦想不得不向之屈服。

当“青年”这个词逐渐带上物质主义的色彩时,“彼德·潘”们也逐渐变成了精力充沛的消费者。《人间天堂》刻画了青少年由于一些早熟的经历而不再单纯这一特点。书中出现的成人形象非常少,蒙西尼奥·达西(Monsignor Darcy)是这些少数人对青年人抱有同情心的成年人,他说,“你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太不容易了,比我的同辈人经历的要艰难得多,就像90岁的老人那样经历坎坷。”但与此同时,菲茨杰拉德的这部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却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尽管它批判了美国的青年文化,却又把这种文化传播到更广的大众中去。

尽管菲茨杰拉德醉心于描写爱抚聚会和酒后飙车,他却很清醒地认识到把青年人拔高到社会理想的位置上是极其危险的。小说主人公阿莫里·布雷恩(Amory Blaine)说,“青春就如同拥有一大盘糖果。感伤主义者认为他们希望保持吃糖果时的那种简单纯洁的状态。其实不然,他其实只是想再重复一次吃糖的乐趣。成熟女人不愿重新经历少女时期,她只希望再来一次蜜月;我不想再经历纯真时光,我渴望再一次享受失去纯真的乐趣。”

战争似乎在历史上造成了断点,而欧洲社会的青年人就在这一转折点全面登上历史舞台,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人间天堂》中有明确的年龄分段,小说完美阐释了那种年龄造成的迷惘感,这种迷惘感不可避免地会在青少年中蔓延:这个世界是成年人创造的,它不属于你,你只能在这里漫无目的地漂流。关于菲茨杰拉德,女演员罗莎琳德·弗勒(Rosalinde Fuller)觉得“他是那种永远不会对生活满足的人”,而他小说中的青年人形象也体现了他永不满足的渴望,但实际上他还有另外一面。

菲茨杰拉德在23岁时以一种孤注一掷实现梦想的姿态完成了这部小说,他想超越父亲的成就,掩埋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失败,并且赢得梦中女孩的青睐。在这本书出版后的一个星期,他就如愿以偿地和19岁的丽尔达·莎伊瑞(Zelda Sayre)结了婚。这本书很快取得了预想中的成功,并且使他们双双成为青年人中的名人。菲茨杰拉德后来说,尽管当时自己还很无知,却已经“被推到时代发言人以及典型时代产物的位置上去。”而对丽尔达来说,1920年的纽约“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 \* \*

菲茨杰拉德夫妇忙着对新消费青年最显著的特征进行评论。斯考特于1920年出版了第一部名为《摇摆女郎与哲学家》(*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的短篇小说集,而丽尔达也在1921年6月写成了《摇摆女郎赞歌》,在这本书中她坚定地指出像她一样的“首批摇摆女郎”所争取的自由包括剪短头发、“行为大胆、涂脂抹粉”、“为了好玩”而调情等等,所有这些都变成了大众女青年所接受的标准。

自从上个世纪最后几年家庭主妇被定位为模范消费者以来,商业媒介就起到反映并且限定美国妇女生活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广告业瞄准了占从业人员20%的年轻职业女性。“如果我是杂货生产商,”纽约大商场“雷曼兄弟”的一个采购员在1922年写道,“我肯定要吸引十七八岁到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女性,因为

她们正处在养成足以影响其一生消费习惯的关键时期。”

作为青年的一种,摇摆女郎式的新青年女性很清楚地把青年和女性消费者的传统联系起来。就像斯坦利·霍尔在1922年一篇名为《美国新女性汇编》的文章中洞察到的那样,战争加速了这一过程。它使得“她从女伴的身份中完全解放出来,送小旗子、徽章或者美味食品给街道上的年轻小伙子变成了一种爱国形式,有的时候,如果他们穿着军装的话,甚至还可以和他们交个朋友。她的行为变得自由而随意,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一丝过去那些规矩的痕迹。”

“摇摆女郎”这个名词在19世纪90年代第一次出现在欧洲大陆,那时候是用来指非常年轻的妓女。这种现象在战前得以改变,人们用它来指德国人(还有斯坦利·霍尔)口中的“煎鱼”——即身材像男孩一样的十来岁的小姑娘。战争期间,“摇摆女郎”在英国被重新定义为追逐享乐的独立年轻女性。尽管这个词语带来的最不堪的类似吸毒之类的联想在1918年以后已经消失,“摇摆女郎”却仍然保留着她们从社会边缘人转变成摩登女郎这个过程中的痕迹。

潮流和不断变化着的道德标准携手并进。从战前巴黎缓慢传开的短发造型和逐渐流行的及膝裙,使青年女性越发大胆地表明自己的性主张,青年人以及行为乖张的人群中开始出现中性特征。1920年,好莱坞以轻喜剧《摇摆女郎》成就了一颗最耀眼的新星——奥立弗·托马斯(Olive Thomas)。影片剧照成为了美国这一类人的典型形象,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迅速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

斯坦利·霍尔1922年的文章中把这一类型定位在10多岁而不是20多岁的女孩身上,但是他同样观察到有一大批产品和习惯都与这些新潮时髦的女学生密切相关。这些产品和习惯包括衣服、软饮料、香水、电影、还有其他和“接近天堂”的舞蹈有关的一切。他觉得这些消费品的存在和流行加上新女性的自信,对年轻女孩来说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习惯,能够帮助她们顺利地度过青春期。

丽尔达·菲茨杰拉德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认为这种摇摆女郎风格起源于精英学校,然后被“数千大城镇商店里的女孩们”所模仿。以此类推,这种最新风格接下来又被“数百万小城镇的美丽女孩们”“通过逛她们各自镇上的‘新奇商店’”进行模仿。她引述了一个把美国所有社会疾病的根源“推到摇摆女郎头上”的社论,拒绝承认社论中对这一类人没有道德感的指控。相反,她教导美国的青年人“要把她们的天生条件转化成资本,要物有所值。”

这一类型逐渐进入主流,大胆而不受约束的性行为成为一个显著特征。好莱

坞迅速做出反应,培养新星来满足这些人的需要。1921年最轰动的电影《酋长》(*The Sheik*)讲述了一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这是一个发生在一位英国贵族女子和一个残酷成性的阿拉伯酋长之间的禁忌之爱。电影改编自同名畅销小说,小说的年轻女作者 E. M. 赫尔(E. M. Hull)在书的结尾处披露这位酋长原来是英国的子爵,于是就具备了可婚血统,终于使这段异域狂风暴雨式的性关系合法化。

这部电影于1912年12月首映,立刻就捧红了26岁的意大利人鲁道夫·范伦铁诺(Rudolph Valentino),他在以前的电影《启示录四骑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中的演出就已经引起过轰动。范伦铁诺皮肤黝黑,很受女性的青睐并被奉为女性心目中的经典男性形象,他代表了一种全新的非美国式的男子气概。他对男人和女人都产生了惊人的影响:到1921年底,他每周能从疯狂的女影迷那里收到900封信。而这部电影的走红使得一种新的男性青年类型“酋长”由此得名,他们模仿范伦铁诺的中分头、结实的腰、以及半遮半掩的性诱惑。

这是一个全新的异教世界。《酋长》的宣传词是这样写的:

看  
把漂亮女孩拍卖到  
阿尔及利亚贵族的后宫里  
看  
无与伦比的恢宏场面  
野性的自由生活和爱恋  
年度最炫的屏幕震撼  
三千演员的大制作

而范伦铁诺就是这个异教世界里最崇高的神。1920年7月他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展示了其魅力。在这篇极尽夸张的造星描述里,他被形容成具有神一般品质的“非凡青年”：“活力可追唐璜；奢华更胜堂吉诃德；勇气堪比达达尼昂；激情澎湃似邓南遮〔1〕；力量强过火神伏尔甘；以自身实践奥马‘昨日已逝明日永不到来’的哲学理论。”

〔1〕 达达尼昂是《三剑客》中的主人公之一,邓南遮是意大利诗人。——译者注

异教的享乐在 1923 年最畅销的小说《烈火青年》(*Flaming Youth*)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在序言中,作者瓦纳·法碧昂(Warner Fabian)说这本书是献给现代女性的一面镜子。

他把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定为“不安分、极具诱惑力、贪婪不知满足、渴望激情、无拘无束、有一点病态、非常自我、智慧、未接受过教育、奢侈逸乐、盲目放任本能和任性的幻想、身体健康然而意志软弱、神经质、精力充沛、崇拜供奉在香气四溢的圣坛上相貌堂堂的神、与这一时代轻率鲁莽且愤世嫉俗的男性相配的女性。”

瓦纳·法碧昂这一酋长式的笔名掩盖了他的本来面目,其实他只是一个极力迎合读者品味的中年记者。《烈火青年》中描写了婚前性行为、堕胎、裸泳聚会、非法酗酒等现象,以及一个青春期少女在一个年长男人手中失去童贞的故事。在这一系列的骇人现象中,青年人永远是主角。“你难道不想再一次变得年轻吗?”少数的成年人这样问道,“成为一个 20 岁的亡命之徒! 这些孩子,他们全都是亡命之徒! 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活力;男孩女孩都是,女孩更甚于男孩。”

由于这本书明确迎合不管是本来就年轻还是渴望变得年轻的现代女性,这种刺激的小噱头极其适合好莱坞,于是在同年,由法碧昂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就上



穿着西装的酋长式美国青年,  
20 世纪 20 年代

映了。主角选用了23岁的科琳·莫(Colleen Moore),因为她在试镜时剪了一个荷兰式短发,前面还留着“刘海,就像一个日本女孩的发型”。大胆地以“裸露、爱抚、亲吻、为享乐疯狂的女儿,追求感官刺激的母亲”作为电影的宣传口号,《烈火青年》在公众的想象中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极其大胆的女性形象。

这部电影影响很不一般。斯考特·菲茨杰拉德后来写道,“我是点燃‘烈火青年’的星星之火,科琳·莫就是那火炬。我们多么渺小啊,然而我们引起的麻烦却那么大。”也正是由于这部电影,短发成了现代女性的象征。布鲁斯·布利文(Bruce Bliven)1925年在社会调查《摇摆女郎简》里提到她的最新短发造型“后面几乎没什么头发,前面的也就一点点长,就和大提琴演奏家(男性)在这个季节留的头发长度差不多,比钢琴演奏家的要短,当然更远远短于小提琴演奏家的头发长度。”

\* \* \*

到20年代早期,美国的梦想经济变成了一个庞大繁杂却有利可图的产业。从1915年起,电影取代民间杂耍和戏剧,开始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娱乐方式,并由此进入了其艺术和商业两方面的“黄金时期”。1922年左右,至少45%的美国青少年每周去看1次电影。与此同时,唱片销量达到一亿多张的顶峰,而广播这一媒介也在全国大行其道——在1923到1924年间听众达到2000万。

这些新型产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从各种媒介对诸如《烈火青年》之类影片的宣传推广中窥见一斑。到1923年,电影、杂志、广播、广告以及唱片业都参与了发掘、复制和传播青年人新风格的过程。这一过程进展之快,熟练程度之高,往往给人就是这些媒介创造了这些风格的错觉。而事实上,它们仅仅把这些青少年中真实存在的现象转化成了资本。

美国的青年人绝对配合这一过程:利用新自由显示他们这一代的力量,然后看着他们的行为通过银幕或者类似卡尔·艾迪(Carl Ed)写于1919年的《少年哈罗德》(*Harold Teen*)之类的流行漫画得到肯定。青少年完全适应了社会的主流价值,并进一步和大众媒介形成了一种共同进退的关系,这种关系加大了判断某种行为或者潮流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难度。实际上,如丽尔达·菲茨杰拉德所说,像“摇摆女郎”这种青年类型“只不过把商业手段应用到年轻这种状态中去。”

这种产业上的关注不仅加剧了成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代沟,同时也意味着青

少年在十二三岁就变得世故,比以前的人大大提前了。但是,这一切不能仅仅归咎于好莱坞太过煽情的影响。有数据表明,1920年有37%的14到16岁之间的美国青少年报名上学,随着这一数据越来越高,高中开始成为大众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再加上学校以相同年龄为标准划分年级,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正迈入一个独立的同龄社会。

巴比特的儿子泰德(Ted)的形象就集中体现了学生成为产业化产品的特征:“他穿着学校里最流行的紧身上衣,裤腿的长度刚及闪闪发亮的硝皮靴子,腰间系着合唱团统一的小方格式样的腰带,背上还系着实际上不起作用的背带。他的围巾是一块硕大无比的黑色丝绸。他有一头纹丝不乱的亚麻色头发,不分头路地一起梳到了后面。”泰德穿着华丽,完全信奉美国的商业价值。

撇开一致性不说,美国青少年实际上从这种初期的同龄人文化中学到了很多。在逃离成年人的窥视后,广播、留声机、电影、杂志以及最重要的汽车给了他们很多享受快乐的机会。但是,去舞会、买衣服、看电影等等都需要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真正的代间大战一触即发。青年人在经济上还不得不依附于父母,但他们已经不再那么轻易地屈服于父母的权威了。

同样的,青年女性也第一次有了一些平等的机会。越来越多的以年龄为基础的男女同校教育也青睐女孩,因为她们往往比男同学思想更成熟,也更自信。斯坦利·霍尔注意到摇摆女郎对待男孩的方式让人觉得“性别差异并不存在。她对他有时几乎是盛气凌人的。在晚上她和他一起去看表演,一起走路;学校走廊上,她可能熟络地拍拍他的肩,勾住他的脖子,亲密地挽着他,甚至晃来荡去。”

对很多成年人来说,摇摆女郎对于性的大胆是新青年文化一个令人不安的特征。年轻的职业妓女公然把性作为谋生工具,这种文化还通过《真实故事》(True Story)之类的“性投机”杂志、《电影剧本》之类的影迷杂志以及《烈火青年》之类的大众电影得到推广。中西部一家报纸报道了1924年一部电影的开场:“‘酋长们’和他们的‘希巴们’在整个过程中坐着一动也不动,也没有耳语半句。银幕上是做爱的场面。”

婚前性行为尽管刺激十足,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禁忌。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人比他们19世纪90年代的同龄人多了很多体验的机会,但限制仍然存在。青少年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多,但是这种新的同龄人文化以其错综复杂的制约和形式还是对摇摆女郎有一定限制,这些女性的化妆、自由松散的行为、越来越短的裙子

以及活力四射的爵士舞似乎解放了整个世界被禁忌的原罪。

事实上,中学提供了一个安全场所,在这里复杂的求爱行为能够相对安全地得以通过。它开始是礼节性的调笑,然后就是比较直白的方式,一般是女孩采取主动。就像一个女学生所写的那样,“男孩们,让女孩子独自去学校的娱乐场所,这样公平吗?到现在为止,我去任何一个娱乐场所,都能看到四分之三的女孩没人陪同。最令人作呕的是,男孩们甚至摆出一付不知道他们把女孩子置于何种窘境的姿态。”

年轻的女孩子通过约会来展示主动性。女孩先把男孩介绍给父母,然后就在晚上出去,11点左右再归家。约会是一种很好的结交朋友进而交男朋友的方式,但是这里面并不牵扯任何承诺,这似乎是一个共识。就像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女孩抱怨的那样,“一个男生够绅士能带女孩回家,并不说明他爱她。我们需要的只是殷勤,而不是丈夫。”

尽管约会过程中没有人监控,这一系统中其实仍然存在控制力量。父母参与的必要性意味着可能成为约会对象的人已经受过审查了。对年轻男人来说,约会的吸引力在于性,但这同样也受到所谓的爱抚规则的约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亲吻和抚弄,但不能有性交。但是,问题的本质是,旧式的道德约束仍然存在,性开放的年轻女性会受到更多批评。

约会使得受人欢迎成为中学生活中最主要的追求。每个人都希望具备那些受欢迎的条件,使之变成一件颇具竞争性的事。罗伯特·S.林德(Robert S. Lynd)和海伦·莫瑞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1924年到1925年间在印第安纳的一个小镇芒塞调查时采访了一个受欢迎的女生,她看中的男生应该具备的品质包括“是篮球队或者足球队的成员。如果一个人仅仅是学习好,他受欢迎的几率就很低。长得好、跳舞好、如果家里有车都能加分。”

林德夫妇总结说教育“看上去为大众所需要,但原因并不在于它的内容,而是因为它是一个标志——对工薪阶层来说教育是能让他们的子女奇迹般敲开本来对他们关闭的世界大门的敲门砖;而对于商人来说,教育就是一个极有力的辅助手段,能让他们获得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种同龄社会分级系统后来扩展到了美国的大学里。尽管它们声称追求学术理想,但是对很多大学来说,学术上的成就并不是重点所在:普通人,而非杰出的学者,才是理想的毕业生。

1919到1920年间,大学生的数量翻倍。家庭规模变小,大量15到24岁之间

青年的存在以及美国商业的进一步繁荣使得高等教育的实现成为可能。公司法人化需要全新的管理人员,1899年到1929年间,从事管理的人翻了3倍。在米德尔镇的一家眼镜公司里,在总经理之下,还有“生产经理”、“销售经理”、“市场经理”和“人事经理”。

大学教育成为进入这种新精英阶层的先决条件,而上大学的最高目的莫过于爬上职业之梯。美国社会被赋予了不断向上的天性,于是大学教育的吸引力就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阶层或者阶级了。不仅仅是商人阶层希望子女上大学,有些工人阶级的家长也不惜为几年的昂贵学费做出牺牲。正如米德尔镇的一个工人父亲抱怨的那样,“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孩子上大学,但是我们会去努力的。现在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教育背景的话,哪儿也去不了。”

就业的需要反映在商业管理和家庭经济这些新开的课程上,也反映在新的消费文化上,这种文化推广了大学里的风尚,使之不仅成为学生内部的潮流,也影响到广泛的年轻人。斯考特·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使大学生人数遽增。从世纪之初起大学生的行为和风尚就吸引了公众的眼光,但是随着这一次大规模的增长——从1890年到1924年,大学生人数翻了4倍——大学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变成了一种产业。

打工挣来的工资或者从溺爱子女的父母那里得到的零用钱让大学生们有能力买时髦的衣服,参加社会活动,他们就这样显示自己和其他人的不同。“如果你能把产品卖给大学生,你就能卖给很多以大学生为偶像的年轻人。”杂志《销售经营》(*Sales Management*)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观察到,“就穿着来说,这个国家跟随大学生引领的潮流。”对当代学生的调查表明他们有着广泛的物质需求。

20世纪20年代对年轻的哈佛本科生的调查表明他们1年买6到8件衬衫、8条领带、6条内裤、12块手帕、12双短袜、12条袜吊和3双鞋。所有接受调查的25岁学生都有留声机,大多数有打字机。学生中有85%吸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女生每年买7件外套、5件毛衣、3件衬衫、1件大衣、3顶帽子、4双鞋、25双袜子、12套内衣和4双手套。这种常春藤盟校的花费方式影响到其他普通大学。

和大学生市场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集短发、抽烟、迷你裙三位为一体的摇摆女郎风格,但这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筒形外衣、网眼套鞋、黄色雨衣、丝袜、以及系在头上或者腰间的花色丝质大手帕。有些女性甚至选择通常情况下适合男性的打扮:背心、领带、还有灯笼裤。男性则以他们肥大的运动外衣、灯笼裤、高尔夫袜

以及极端狂野的“范伦铁诺裤”为荣,保守一点的就穿软领衬衫、低膝冬季牛津鞋以及无吊袜带的袜子。

大学生也是一个庞大的媒体消费群体。平均来说,每个学生每周去一次电影院,尤其是当电影开始反映大学生生活时,这种情况就更甚。这类电影的代表是1925年改编自波希·马科斯(Percy Marks)关于大学新生的小说《塑料时代》(*The Plastic Age*)的电影,捧红了“明日之星”克莱拉·宝(Clara Bow)。音乐和舞蹈则深受当时流行的爵士乐影响,不管是金·奥利弗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热五》,还是当地学生乐队演奏的流行配乐,都非常受人欢迎。

大学生成了爵士乐的首批追随者,而大学校园也给爵士乐的爱好者和实践者们提供了一个肥沃的土壤。印第安纳大学里最受欢迎的组合是狐狼乐队,其中又以喇叭吹奏者毕克斯·比德贝克(Bix Beiderbecke)最为有名。这个20岁的青年人曾经学习过长时间的爵士乐,见过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芝加哥著名的黑人酒吧“林肯公园”演奏过。当他的乐队坐在一辆卡车的后车厢里到各个联谊会演奏小夜曲的时候,他总是穿一件蓝色的旧毛衣,带着一罐私酿的烈酒,他似乎成了校园里的一道固定风景。

20世纪的大学市场标志着青年风格第一次被完整地定义并且推广到全国。这些风格专属于新精英阶层或者准精英,但这一事实并不妨碍很多出身工人家庭的青少年成为著名小说家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 Farrell)所描述的“冒牌大学生,以分期付款方式买大学生西装的那种人。”但是,大学校园所能提供的自由也只是具有很大限制的自由。“你按照某些固定的模版来穿衣服,来武装思想。”《塑料时代》中的一个人物如是说。

美国消费主义的普遍标准经常在其试验品——青年人的精神世界里得以体现。尽管青少年拥有极大的自由,大学里却似乎存在着严格的同伴标准。“你永远不可能摆脱同伴的影响”,一本大学杂志在1922年提醒它的读者。“对个人的评价是通过观察他的同伴和他所加入的组织来实现的。”另外一个观察者列出了受欢迎所必备的条件:长得好看、有钱有车。就跟在中学里一样,成为足球队成员永远比成绩得A等更重要。

尽管有些大学生来自工人阶级,但是大学说到底还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大学社团严格以兄弟会的形式出现,这些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社团在新生刚刚进校的那一刻就开始做工作,这就是所谓的抢夺“新生流”。一旦新生做出选择,接下

来就是宣誓和入社仪式。这种仪式以所谓的“受辱”作为标志,也就是对申请者进行诋毁和侮辱,通常是行为上的暴力与精神上的折磨同时进行。

这些社团得到学校的官方支持,因而能够给成员提供很多好处:如地位上的保障,以及现成的社会生活。但是,他们的高度统一性让没参加社团的学生的校园生活变成了难以忍受的酷刑。“他们穿同样的衣服、在同样的时间做同样的事情、用内部语言思考和交流,实际上还有着相同的利益。”欧洲一个访问者在1923年注意到,“统一性就是标准。所有不同的人都是‘疯子’,可能是书呆子之类的。”

大学生活全然不是它所吹捧的那样,三分之一的学生在毕业前就离开了。在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系统里,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赢家的,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如犹太学生,以及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明显处于劣势。用功或者学习好的学生被称为“书虫”或者“书呆子”,他们的地位很低;曾经有一位大学杂志的编辑提醒过新生们必须在成为“孤立于大部分学生”的学者还是当“在伙伴中受欢迎的角色”之间做出选择。

20年代实用主义的大学生一代尽管是“急切的资本主义者”,但是他们并不缺乏批判能力。就像他们中学里的小兄弟一样,他们津津乐道于自己这一代的力量。有一部分尽管居于少数但绝对重要的学生喜欢批评大学教育体制的缺点,换言之,他们其实是在批评成人世界。他们崇尚艾玛·戈登曼(Emma Goldman)、塞达·巴拉(Theoda Bara)、鲁道夫·范伦铁诺以及斯考特·菲茨杰拉德这些异质文化领袖,渴望至少一定程度上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通过享乐来实现。

由于爵士乐的流行,舞厅在20年代早期迅速遍布到全国各地,里面充斥了“目的在于‘放纵自我’的大学男生,”以及“希望变得老成的中学男女生”。在这一“完全受情绪支配的氛围”里,美国青年可以完全地沉溺自我,而不必担心受到成年人的干预。但是,就像20世纪10年代动物舞蹈热潮引起改革者的愤怒一样,爵士乐及其相应的舞蹈也持续受到负面的攻击。

早在20年代早期,爵士乐就引起过代间分歧。《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就掀起过一场反爵士乐的“圣战”：“任何一个说‘两性能够溶化在亲密的拥抱中’——腿缠腿,胸贴胸——而不受污染的人都是在说谎。那令人憎恨的爵士乐队让人不停地扭动,刺激感官,冲击着人们的感官中枢。如果你愿意相信年轻人在经历过这些以后还完全和以前一样,那么愿上帝保佑你的孩子。”

摇摆女郎“对待爱情本身的异教态度”已经够震撼了,爵士乐及其舞蹈——尤其是首演于1923年的音乐剧《狂野奔跑》(*Running Wild*)中的查尔斯顿快步舞发源于黑人社会的这一事实则更增加了美国社会的危险性。由于吸收了黑人文化,大学生被指责把原本只和“芝加哥的黑人地区以及纽约东部地区”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带入了中产阶级白人的生活。但是,道德家们的严厉指责却让爵士乐更具吸引力。

更多女孩喜欢被爱抚。1924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在男女同校的学校中,有92%的女生曾经经历过这种行为,成年人对这一行为的批评仅仅让年轻人看清楚成年人多久没有触摸过彼此了。让老一辈不齿的“爱抚派对”广受欢迎,这也代表了年轻人“探索的一种形式”。没人会走得太远:就像俄亥俄州立大学一个年轻学生1922年所写的那样,大学女生“在最受非议的环境里是安全的——她知道底线在哪里,而正因为她了解这些知识,她几乎能经历性爱的全过程。”

由于玛格丽特·塞格(Margaret Sanger)的不懈努力,避孕法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商人阶级以及他们上大学的子女接受。但是,虽然林德夫妇认为年轻一代中有“一些试探性的享乐”,婚前性行为仍然是一个禁忌。对于女大学生来说,完全丧失贞洁还是需要慎重考虑的,而男生们则更愿意通过看“黄色书籍”或者嫖妓来解决这一问题。“随便的女人”或者“祸害女生的坏蛋”即使不会被学校开除,也很容易受到同伴的排斥。

对于20年代的大学生以及他们很多的同龄人来说,中心战场实际是反对禁酒运动。非法饮酒不仅是他们能接受的,而且是他们渴望的。如果一个学生甚至连“一点挥霍的意向”都没表现出来的话,他会被看成“蠢人”,但是如果他挥霍无度的话,就不是“蠢人”了。反沙龙联盟曾经瞄准城市工人和穷人来推广禁酒法案,但是它的失败印证了一份大学报纸所指出的,非法饮酒已经“从沙龙和低级餐馆里转移到社交圈以及昂贵的舞厅里。”

禁酒法案由一个少数派组成的压力集团推广到全国,成为一项广受争议的法律。《科纳尔学生报》总结了大学生的态度,他们称之为“没有任何必要推行”的“玩笑”。当这种非法行为让学生们接触到了其兄长们从未接触过的思想、态度和人时,对这项法案的蔑视就慢慢地使他们变得激进。这种激进的情绪逐渐变成对“新的行为多元论”的接受,以及对成人世界更公开的批评。

\* \* \*

20世纪20年代的那一代一方面被利用,一方面被谴责,被困在清教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间,成为他们国家矛盾态度的早期受害者。对于一个从未开展过的大众试验来说,青春只是一个短暂的主题。在酋长和希巴充满活力的异教形象下掩盖着的是野蛮不驯的冲动:大学社团充满偏见和暴力的人社仪式、毫无节制的酗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以及青年团伙间一触即发的暴力事件都呼唤对非法的庞大烈酒市场进行控制。

1924年4月,当时的私酒贩卖首领25岁的埃尔·卡本(Al Capone)“公然展示他令人敬畏的力量”,控制了芝加哥近郊的西塞罗,这一行为并未遭到警察或者政客的反对。1个月后,隐藏在美国人对青春的痴迷态度背后的黑暗力量被20世纪一桩最令人发指的谋杀案大白于天下。5月21日,芝加哥一名叫雅各布·弗兰克斯(Jacob Franks)的富裕商人收到了一封勒索信,信上说他最小的儿子被绑架了,需要1万美元才能赎回。

第二天,人们在城市郊区的一处沼泽地发现了14岁的鲍比·弗兰克斯(Bobby Franks)的裸尸。媒体疯狂了,拼命地报道“芝加哥孩子面临的危险”。警察调查了所有疑犯,但没有结果,最后通过遗留在犯罪现场的一副眼镜以及用来打勒索信的打字机的独特印记锁定了犯罪嫌疑人。这一骇人听闻史无前例的犯罪实施者竟然是两个大学生,都还不满20岁,分别名叫内森·里奥波德(Nathan Leopold)和理查·娄波(Richard Loeb)。

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人震惊了。里奥波德和娄波并不是像杰西·波默罗伊一样来自贫民窟的变态孩子。他们英俊富裕,是青年精英阶层的代表人物;他们衣着时髦,头发按照酋长式风格光滑地梳到后面;他们似乎享有一个青年人在青年主导的社会里所想要的一切东西:车子、女伴、狂欢作乐的大学生活,甚至拥有由法制不健全而带来的刺激感。但是,他们觉得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高自己的伙伴们一等,于是一念之差越过底线实施了谋杀。

警察们随后发现这两个人为这桩自认为完美的犯罪谋划了很久:在研究过勒索信投放地点和抛尸地点后,他们开始在肯伍德地区近郊的高档住宅区寻找受害人。5月21日那天,鲍比·弗兰克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由于认识里奥波德,他上了这两个人租来的越野车,随即遭到殴打,他立刻呼救,看他一直叫个不停,两人强行把他闷死。他们开着车在附近一直兜到天黑下来,在死去

孩子的脸上和身上洒上盐酸,然后把他丢在下水道里。

在这一发现引起的第一波反响中,里奥波德和茱波被形容成怪兽:“正常人”是不会做出“这么令人发指的事”来的。这个案子引起了广大媒体和公众的关注,《芝加哥周日论坛报》(*Chicago Sunday Tribune*)列举出了公众关注的各个原因:“预谋的绑架和谋杀中体现出来的魔鬼似的精神;受害家庭的富裕与名望;两个青年人知识上较高的成就;堕落带来的启示;供词中体现出来的奇怪想法——他们杀害孩子一方面是为了赎金,另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经历,寻求严密谋划所带来的满足感。”

里奥波德和茱波实施了一种新的犯罪类型,一种集抽象性、高智商性、尤其是偶然性为一体的犯罪。他们造成了一个谜,一个让全国人都耿耿于怀的谜。媒体广泛的覆盖率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和青年人之间关系的-一场全国性讨论。这两个人成为他们那一代“方向性错误”的标志。正如青少年犯罪研究专家本·林德塞法官(Judge Ben Lindsey)在1924年6月上旬所写的那样,“这是一种新的缘由引发的新型谋杀。我们可以从青年人的现代心理状态和现代自由当中找到这种缘由的蛛丝马迹。”

作为青年人阴暗面的化身,里奥波德和茱波的案子被人研究和记录,其广泛程度前所未有。公众的关注增加了他们的傲慢,使他们变成了虚无主义版的电影明星:“穿着时尚而体面,显得如此纯洁无瑕,”一个专栏女作家如是说,“他们在屏幕上优雅地闲逛,如范伦铁诺般迈步。”正当他们哭泣的姐妹让这两个“酋长式的被告”稍显人性化的时候,大批群众拥向里奥波德、茱波,以及位于肯伍德郊区上流住宅区的弗兰克斯家的住所。

对这两人的审判变成了一项媒体盛事,完全不亚于好莱坞电影首映式,或者更夸张一点,就类似于一场罗马的斗剑比赛。诉讼程序的这一特点很适合里奥波德和茱波的辩护律师——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律师格莱伦斯·达洛(Clarence Darrow),他受雇于这两人的家庭,试图帮助他们逃避死刑。尽管他们都不承认参与过谋杀,他们的罪行毕竟无可否认,因此达洛决定把他的目标定位在减轻刑罚上,以此来逃避陪审团的审判。

他抓住精神错乱这一问题,努力避开法律上对这一名词的严格定义。他的两个被告忙于向各大媒体通报他们所穿衣服的颜色和衣料,显然没有精神错乱。而实际上,法律对精神错乱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这就给了他们一个生的机会。达洛

聘请了3个全国最有名的心理学家作为主要的证人,结果在美国法院系统和大众媒体间引发了一场对心理学理论的公开讨论,这种现象自杰西·波默罗伊一案后就没有出现过。

杰西·波默罗伊一案后的50年里,很多事情改变了。和原告根据传统所请的证人不同的是,达洛请的证人——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威廉·希利和本纳德·格鲁尔克(Bernard Glueck)都了解并认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同时,被告方还请了两位内科医师,哈罗德·S.霍尔本特(Harold S. Hulbert)和卡尔·M.伯曼(Karl M. Bowman),他们详细检查了两个被告,并用14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分析了他们的家庭状况、智力水平以及他们的生理心理状态,这给急于爆料的媒体提供了全新的素材。

从心理学、占星学甚至颅相学等各方面对这两人犯罪特征的分析充斥了各大报纸。娄波被一种“对性的狂热爱好”所支配,而里奥波德则拥有一种“毁灭的本能”并且“性格多变”。威廉·鲁道夫·赫尔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甚至愿意给弗洛伊德提供专用邮轮,让他来美国写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而其竞争对手《论坛》(Tribune)则愿意给弗洛伊德2.5万美金的报酬来给两个犯罪嫌疑人作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因为生病,并且不愿意来到一个他不喜欢的国家,最终没有同意这两个邀请。

但是,被告方所请的心理学家还是揭露了两人甜美表象下所隐藏的东西。两人都和他们的家人和伙伴关系不和。父母抚养他们,关系却并不很亲密,两人都有家庭女教师,智商都高于160。娄波和里奥波德分别在17岁和18岁获得了他们的第一个学位。他们在芝加哥大学同住一间寝室,但是两人看上去是如此奇怪的一对朋友:娄波很有魅力,很受欢迎,而里奥波德在知识上却很傲慢,是一个狂热的尼采哲学信奉者。很多同学都喜欢娄波,但是大部分人觉得里奥波德高深莫测,令人不快。

这两人在1920年结识彼此,他们似乎是懵懂地闯入一个所谓的同龄社会,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比他们年长,同时受到所谓自由的诱惑,他们开始了为期3年的自我放纵。最初只是偷车,后来慢慢发展到纵火和入室盗窃。尤其是娄波,他希望有媒体来报道自己实施的这些犯罪,却总是落空。在安尔本的一次入室盗窃搞砸后,他们两人闹翻了,随后却在一些互相妥协后握手言和。这些妥协包括:娄波在实施犯罪行为时需要里奥波德的协助,而里奥波德可以随时要求娄波的“陪

伴”。在实施谋杀前他们两人都考虑过自杀。

这种奇特的盟约关系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类似受虐狂倾向的情感和性的关系。正如怀特博士所证实的那样,娄波的内心世界包含了对被困的幻想:“他会看见人们透过被告席偷偷看他,讨论他是一个大罪犯,带着好奇看待他。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子。”这确实是事实。在法庭上这两个人被年轻女性围绕着,就像莫琳·麦肯南(Maureen McKernan)注意到的那样:“这样骇人听闻的犯罪对这些摇摆女郎来说似乎没有任何感情上的影响,她们拼命要求进来。”

酷热的天气以及几个月以来媒体持续的关注让审判充满了狂热的气氛:到8月中旬,这两个人“几乎已经开始以一种传说中英雄的形象出现了。”作为名人,他们拍了一系列的照片:和警察的合影,和格莱伦斯·达洛的合影。在这些照片上,他们华丽的现代作风通过他们成年人般扭曲畸形的脸庞表现出来。他们变成了明星:“这两个男孩在审判过程中的态度让看着他们的人感到惊异。每天报纸上都刊登他们在法庭上微笑的照片。围观的群众笑,他们也笑。”

就在这样狂热的气氛中,格莱伦斯·达洛开始了他的总结陈词,花了三天时间讲述了尼采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青年人内心的恶劣影响、还有青少年自身的天性,简直就像是给研究生上的课。达洛辩解说“这两个孩子都正处在一个孩子一生当中最令人烦恼的阶段。”他把这个最令人烦恼的阶段定义为“15岁到20或者21岁之间”,这个时候“孩子们承受着青春期发育和性强加给他们的负担。女孩子可以待在家里,得到妥善的看管。但是没人来指导男孩子,他们只能靠自己来渡过这一阶段。”

达洛总结说“在这个恐怖的悲剧中没有一桩行为不是孩子的所为。”但是娄波和里奥波德都已经不是孩子了。他们的儿童期可能拖得稍微晚一点,但是如果说青春期的两个标志分别是性经历和从父母身边独立出来的话,他们两个都达到了。达洛无意中强调了美国对待其年轻人的一个盲点:就是仍然忽视了从儿童到成年人中间的那个阶段。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年龄的定义还没有标准化:男孩可以是男人,青少年可以是小孩。

那天这个著名律师的能言善辩控制了局面,因此法官卡夫莱宣判时选择了终身监禁而非死刑:“法庭考虑到被告的年龄均只有18岁,19岁,所以作此宣判。”他觉得“不把死刑强加在不足年龄的罪犯身上”是法庭的“本分”。两个罪犯很快

被押解到朱丽叶监狱,在那儿没有女性来评价他们的“光辉”事迹,在从公众的关注和视线中隐退后,随之而来的是长时间的沉默。

这个案件打破了 20 年代青年文化的全盛局面。尽管他们智商很高,或者说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两人没能融入美国青年视为理想的大学文化中。他们觉得自己完全被孤立在社会之外,于是借机报复这个社会,这就促成了这次偶然的谋杀。这不像杰西·波默罗伊一案中突然爆发的愤怒,而是一种内心深处冰冷的疏离。对娄波和里奥波德来说,其他人都不是有血有肉的,而只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符号。可以说,他们完全代表了隐藏在 20 年代大众社会背后的反人性的工业化力量。

## 16

### 灰姑娘情结

美国大众文化的问题所在

男孩：“父母一点都不了解他们的子女，也不知道他们在做点什么。”

女孩：“他们不想知道。”

女孩：“我们也不想让他们知道。”

男孩：“我们身处的是一个迅捷的世界，而他们已经太老了。”

——罗伯特·S. 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米德尔镇：美国文化研究》(1929)



鲁道夫·范伦铁诺头戴黑色羽饰的典型形象,20世纪20年代中期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欧洲和美国的很多作家、学者、思想家都清楚地认识到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预言的革命已经开始了。大众或者说群众,这个词从定义上看并不理性,但正是由于它的蔓延感染力,体现了文明社会试图驯化的那些野性本能。勒庞曾经告诫说大众思想只存在于“想象中”:它“首先需要一个神”。一旦被提升到一个准宗教狂热的状态,大众就会被动地释放出所有毁灭性的力量。

未来学家开始想象社会如何才能控制这种力量的爆发。勒庞的书写于19世纪90年代,他没有提及新时期的一个基本要素,那就是使世界大战的屠杀和消费品的批量生产成为可能的机器。人和机器的关系在20世纪变成科学幻想中最主要的话题。为了适应大众社会,人不得不变成机器,但同时他又可能成为这一新理想所带来的反人性化效果的牺牲品,无法掌控偶尔出现的故障。

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所写的戏剧*R. U. R*于1923年在英国首演,首创了“机器人”这个词。戏剧的情节很简单,描写一家工厂生产出的机器工人反抗他们的人类主人的故事。社会在本能被压抑以及技术掌控出现混乱的情况下表现出的反乌托邦性(Dystopias)在叶文京奈·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1924年的小说《我们》(*We*)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弗里茨·朗(Fritz Lang)1926年拍的电影《大都市》(*Metropolis*)则全然利用达达主义场景,把《时光机器》更新成莫洛克式工人和伊利亚式精英之间的一种洪水般汹涌的力量斗争,挑起这一斗争的是一个怪兽般的金属机器人,一位女性科学怪物。

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工业所采用的越来越非人性化的工作方法也把工人日益逼入工作机器的境地。到20年代中期,亨利·福特的批量生产系统已经牢固树立了其作为美国潜在救世主的地位。爱德华·A·费林(Edward A. Filene)作为连锁经营的先驱和商业思想家,号召“把批量生产的原则运用到美国的产业中去”。他宣称大众消费作为批量生产带来的必然结果,会提高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但是,美国社会商业和深层次的情感需求相互融合的现象下隐藏着暗涛汹涌。娄波/卑奥波德一案和埃尔·卡本控制西塞罗的行为表明弗洛伊德在1923年继尼采(Nietzsche)之后所定义的“本我”(id)概念并不受理性思维支配。美国商业在刺激人类最根本的需求和恐惧的同时,也给一把装有子弹的枪上了膛。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本我可以被分割成两个组成部分:生的能力(Eros)和死的愿望(Thanatos)。前者由生存的本能所组成,而后者则包含了残酷的死亡本能。“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是在这两个世界间不断妥协平衡的过程。”

20年代所有这些反乌托邦小说描述了理想的社会如何被青年人内心深处的死亡本能所摧毁。消费社会正在创造其自己的怪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德华·博那伊所说的“群众心理”产生了。禁酒运动树立了一个蛮横专制地进行社会控制的典型,但是正如博那伊观察到的那样,这在20世纪来说太具说教性了,因此很难说真正有效。当禁酒运动仅仅引发了“法律的倒塌”时,他试图通过心理学和暗示法这些更合乎新机器时代特点的方法来控制“群众心理”。

费林把美国的“范围更广的社会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尝试”对立起来,而博那伊和他一样,意识到大众社会的模式不止一种,他试图找到未来学家所探索的那种极权主义的一个替代品。他在1928年的手册《宣传》(Propaganda)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超级阶层,一个能够“对大众有组织的习惯和想法进行有意识有效控制”的“隐形政府”。他并不倡导通过暴力来控制社会,而是希望通过一种感知手段来塑造理想的消费者。

如果说博那伊的理想是成为“公共关系顾问”,站在幕后掌握着公众的感觉,那么青年人在这一独特的“宝石城”建设过程中则处于中心地位。作为批量生产的机器时代的第一代“人”,他们“在市场中很激进”,是广告的主要对象,是宣告消费之夏到来的第一批燕子。另外,他们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大学生和高中生身上。

工人阶级的子女们提供了便宜而又极具可塑性的劳动力资源,因此能够进入新的青年人市场。青年人以“速度和耐力”著称,是适合加速批量生产的理想人选。林德夫妇注意到“一个操作几星期机器的19岁男孩所实现的劳动量可能比他45岁的父亲实现的劳动量更大。”但是,尽管他们的工作场所、娱乐、教育日益标准化,美国的一部分年轻人还是不愿牺牲他们的个性。

这种大众控制的新系统有赖于老道的控制,却也暴露出了美国社会的很多问

题。宪法早就明确保证了所有人的平等地位,在现在使用的新定义中,社会的平等性将通过隐性统治者所设想的大众消费主义表现出来。根据爱德华·博那伊的理论,这个新的机器时代不是“使人类生活标准化”,而是“把大众从争取人类生存的斗争中解放出来”。大家都把那个关于人人平等的承诺牢记在心,这会带来各种无法预计的后果。

\* \* \*

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进入“宝石城”的许可证,而它的一部分吸引力也正来源于其排他性。正当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在20年代的青年人商业文化中享尽特权的时候,城外的青少年却被忽视了。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能加入到消费者社会中。他们有需求却缺乏实现这些需求的途径,于是就想方设法希望能被接纳。正如一个少年罪犯告诉学者爱丽丝·米尔斯(Alice Miller)的那样,电影“让你想得到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得到了。”

禁酒运动给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必要的资金。在鼓励消费的社会里,烈酒不能合法消费这一事实说明宪法第十九次修正案存在漏洞。烈酒消费的非法性没能阻止人们喝酒,反而让酒由于稀缺创造了更加大的价值。一个庞大的、涉案数目达上亿美元的非法产业围绕着烈酒的供给壮大起来,这个产业虽然对美国的社会、政治、道德生活都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但是却似乎理所当然地得到大部分美国居民的谅解。

这一产业的中心是美国的城市实验室——芝加哥,“全世界最腐败最无法无天的一个城市”。如何无法无天可以从埃尔·卡本控制西塞罗的行为中窥见一斑,在那之后这个城市迅速地充斥了“无礼、喝酒喧闹、大摇大摆的流氓团伙,并被沙龙和赌场所包围。”这就像未开化以前的西部。卡本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强盗,而他类似电影明星的排场也使他成为了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一个游离在法律之外的现代英雄。

一个当代观察者注意到20年代的典型罪犯“只是一个模仿成功歹徒类型的男孩,这一类型在他周围到处都是。他并不是什么古怪的人,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看到了在这个自己无意闯入的社会中哪些东西是成功的标志——凯迪拉克、巨额的银行存款、体面的房子。他怎样才能获得这种被认可的地位呢?他几乎永远拥有超常的主动性、想象力和能力,他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成为他那个时

代的产业领导或者核心政治人物。”

禁酒法案长时间受到嘲弄,以至于它创造了自己的一个平行世界:美国主流价值的镜像世界。20年代的青年罪犯“没有机会去耶鲁大学,成为一位银行家或经纪人;他没有途径获得哈佛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但是,在他面前有一条相对容易的路来获取那些他不断被灌输作为美国公民应该获得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他就不能算是美国公民,这条路就是当强盗。”

对于很多第二代的青年人来说,在他们周围贫穷的社区中生根发芽的非法制酒业代表着一条可行的职业道路。他们选择的职业和投机的资本主义者一样具有高危险性;他们和所有生产者一样,只不过提供给了大众他们想要的商品。和欧洲持不同政见的青年人组织不同,他们的反叛并不是针对现代技术型的大众社会,相反他们深谙其道,完全成为这一社会的追随者。至于他们生意手法的野蛮和暴力,正好体现了美国自由经济的残酷性。

禁酒运动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其带来的后果却是毁灭性的。撇开其引起的有组织的犯罪不说,禁酒运动还使改革变得举步维艰,19世纪90年代高瞻远瞩的社会改革家的计划在一个严酷而又支离破碎的环境里搁浅。20世纪20年代中期仍然在芝加哥赫尔大厦工作的简·亚当斯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城市变成了一个个混乱的街区,到处是醉汉、分裂的家庭、效仿流氓的青少年、腐败的警察和荷枪实弹的私酒酿造者。

作家詹姆斯·T.法雷尔是芝加哥人,他在巨著《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Studs Lonigan trilogy*)中描绘了这种状况,他把这部作品“看成是这一时期一个普通美国男孩的教育故事,在对斯塔兹·朗尼根的教育中重要的机构是家庭、教会、学校和游乐场。这些机构垮掉了,并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街头生活变成了这个男孩生活中一个潜在的教育因素。”暴力和放荡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对于禁酒运动希望树立的节制和道德典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 \* \*

青年人的问题开始成为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对此,社会呼唤新的解决方法。1924年5月,G.斯坦利·霍尔写了一篇题为《大众能统治世界吗?》(“Can the Masses Rule the World?”)的文章,在文章中他重申了自己的神秘论。他觉得大众社会的唯一希望是展开一个涉及世界范围的青年运动,这一运动

“为建立一个新的宗教、新的光芒、新的人、新的时代、新的状态、新的经济关系与和平而奋斗。”第二个月，他就以81岁高龄辞世，很多讣告高度赞扬了他对“青年、自由和新知识”的热情。

但是，霍尔对青年的浪漫幻想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尽管如此，也正是由于他的先驱性工作，青少年在西方社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一个独立的阶层。但是，对于青年人中出现的新情况，已经再也不是简单几句概述就能说明的了。霍尔刚开始他的研究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但是在这之后的30年间，很多能够反映青少年各种各样现状的新学术研究方法已经超越了他的方法，但他仍然功不可没。

这些研究中最具影响的研究来自美国的未来之城——芝加哥，芝加哥大学1921年设立的社会学系使极端的经验主义发展起来。这个系设立后发表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由纳尔斯·安德生(Nels Anderson)所写的《论流浪和无家可归》(*On Hobos and Homelessness*)，在这篇文章中安德生把“亲身经历”加入到个人严谨的学术作风中去。他也曾经是个流浪汉，因此坚持认为只有流浪者才能把原本的先驱精神坚持到最后：“谁不曾有过抛开一切责任，探索未知世界的紧迫感？没有一个成人能比男孩的这种感觉更强烈。”

这个系接下来出版的一本书更深入地挖掘了芝加哥青少年的生活，这就是弗雷德里克·M. 思拉舍(Frederic M. Thrasher)于1926年发表的《团伙》(*The Gang*)，在这本书中他调查了11岁到25岁之间的几百个青少年。他归纳说人的行为跟生长环境有关系，芝加哥这个城市里大部分的歹徒团伙活跃于“铁路和工厂周边的混杂地区，环境恶劣，流动人口多。”这些地区蕴藏着更大的问题：“美国的工业城市没有时间安顿下来，它们太年轻，需要经历年轻带来的挣扎和不稳定。”

这些无人管理的地段被城市青少年所占领：“孩子们在这些地方能够享受到少有的自由，而在一些比较好的住宅区这些自由会受到治安部门的种种限制。”他们重演了另一版本的先驱神话：“一方面，这些冲突不断的地区就像边疆城市；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就像一片‘无人之地’，没有法律、没有上帝，狂野而蛮荒。”思拉舍认为匪徒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浪漫主义：“青少年的幻想笼罩了全世界，对于成年人来说，这种幻想可能是没有新意甚至是丑陋的，但是对他们自己来说却是新奇而又浪漫的希望之光。”

所谓“匪徒团伙”的基本特征从里斯的时代起就没怎么改变过,大部分团伙都以种族或社区为单位勾结在一起。但是,它们的规模、人数、组织、熟练度、以及野心却是越来越大。这些匪徒团伙如马上的骑士般肆意使用暴力、实施强奸、谋杀,放纵而堕落。新媒体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诱因。一个被采访者告诉思拉舍,“他以前是如何把时间消磨在电影院里,仅仅为了看到劫盗们是如何被‘肢解’的,除开充斥荧屏的恐怖片和‘性感’浪漫片,还有其他吸引他的东西。”

是什么让匪徒们变得如此邪恶?思拉舍列出了几个因素。大众媒体对基本冲动的刺激使得道德脱离了已知的限制。正如他观察到的那样,“这些团伙中的孩子们能从各种渠道接触到社会上的反道德模式,从各个街头小巷、从他们的匪徒前辈那里、从酒吧、从社会的底层。”这还会产生其他影响,因为不同的人“对性、烈酒以及赌博存在相互矛盾的标准,这就使得要对孩子所处的环境做一个归纳性定义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显而易见:“违法造酒、赌博以及卖淫给芝加哥联盟形式的匪徒团伙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机会。”潜在的利益、匪徒的偶像化、以及“建立在生意效率基础上的”的严重犯罪使得小规模匪徒团伙更有可能转化为势力遍及全城的犯罪集团。思拉舍以一系列具体的建议结束了他的调查报告,这些建议包括更加积极的社会工作以及对家庭结构的监控。他保留了改革者的自信,坚信美国社会是能够变好的。

禁酒运动并没有消灭改革的冲动,只是改变了其本质,从强调教化转为关注社会现象,体现这一转变的先驱代表人物就是简·亚当斯这样的进步人士。新一代的改革者认为环境影响行为,倡导一种更全面的方法。犯罪学家威廉·希利和奥古斯塔·F. 布罗纳(Augusta F. Bronner)在他们深具影响力的著作《违法者和犯罪者》(*Delinquents and Criminals*)中谈及对犯罪行为应采取的手段时,和思拉舍一样,认为每个青少年罪犯应该接受一次彻底的心理及环境调查。

这种对环境因素的重新关注直接导致了对美国社会更广泛的批判。《团伙》似乎在很多方面与另一本改革派的作品不谋而合,这就是杰克·布莱克(Jack Black)的《你不可能赢》(*You Can't Win*),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罪犯被同情心感化的故事。布莱克在19世纪90年代还是个青年的时候就开始了自己的研究,而他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揭露了“强盗”、“瘾君子”和“骗子”的地下世界。在这本书成功出版后,布莱克游历全美,到处举办讲座,号召刑事改革,或者按照他自己

的说法，“反对太多的法律和刑罚。”

《你不可能赢》给下层阶级的青年犯罪者描绘了一幅历史性的图景，也帮助指出了现今越来越令人烦扰的问题。1926年，仅芝加哥的匪徒团伙就实施了76件凶杀案，似乎是在炫耀其“贫民窟独裁者”的至高地位。更具毁灭性的是非法造酒本身：1926年，纽约有759人死于酗酒。1927年的一份分析表明，经检查，98%的这种酒含有甲醇之类的化合物，能够致人失明或瘫痪。很多喝这种酒的人年纪轻轻就死于詹姆斯·T.法雷尔所说的“老鼠药”。

很多喜欢追根究底的人开始思考青年人当中这种拉帮结派、无家可归、放荡堕落的问题是否反映了美国生活本身机械化神秘化的本质。就像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在《你不可能赢》的序言中所写的，“现代生活给了青年人足够的精神鼓励吗？汽车、电影、烈酒、还有性，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原始刺激，刺激着青年人努力把一些色彩和活力注入到一种专制而又单调的标准化工业生活中去。”杰克·布莱克本人对这一问题是毫无疑问的：“社会就像一台机器，把我碾成碎片。”

\* \* \*

20世纪20年代，青少年变成了“明日的顾客”，即消费者社会的实验品。但是，很明显这一实验不是完全按计划实施的。根据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看法，青少年违法犯罪不过是更广泛的“美国病”的症状。“如果说青少年是因为他们生长的社会环境条件而陷入困境和痛苦中，”她写道，“那么让我们尽一切办法改善这个环境，以此来减轻压力，消灭调整带来的损伤和痛苦。”

米德的第一本书《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1928年第一次发表时轰动一时，但是，公众的狂热似乎都集中在她所揭露的萨摩亚人自由的性生活上，对她对于“西方文明”的猛烈抨击反而关注不够。她的第一个论点是说“大量关于青少年的理论”不可信。她毫不客气地批判了斯坦利·霍尔对这一年龄段“困难和矛盾无可避免”的说法，问道，“遇到这些所谓的困难是因为处在这个年龄段呢，还是因为在这个年龄段处在美国？”

她的解决方法是“走入一个不同的文明中去，研究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同文化环境中生长的人们。”她去了萨摩亚，研究这个小岛上的女性青少年，她发现在这

个社会里,孩子们“对人体构造和作用非常了解。”青少年的性行为不会受到压制,反而会受到鼓励。另外,抚养子女更趋向于是整个群体的责任,这似乎能“防止孩子们产生诸如恋母情结、恋父情结之类的畸形心态。”

米德的观点在一片激烈的论战中达到顶峰:就像她后来所写的那样,她的书既是写萨摩亚的,也是写“1926年到1928年间的美国”的。

尽管米德承认“心理的发育必然会充斥着矛盾”,但是她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是造成其青少年各种问题的罪魁祸首。“一个大声呼唤选择的社会”,她写道,“在这个社会里,每个群体都能言善辩,都在呼吁对自己的救赎,呼吁属于自己的那种经济哲学,这样的社会会让新的一代不得安宁,直到有一天因为不能忍受太多选择而崩溃。”

米德认为青少年所有痛苦的根源在于美国社会“金钱至上的本质”,“赚钱是拥有名望的捷径。”媒体使这种状况进一步恶化:“动画、杂志、报纸,所有的一切都在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反复讲述灰姑娘的故事。”像《它》(It)一类的电影宣扬了一个观点:任何人,即使是“收银员”也能变成商店的“重要买主”,嫁给老板。由这些大众媒体创造的灰姑娘情结利用了被米德称为“我们具有无穷可能性的美国理论”,滋生了混乱而矛盾的种种欲望。

\* \* \*

正当米德即将完成《萨摩亚人的成年》一书的研究时,曼哈顿爆发了围堵事件。这一事件的导火索是鲁道夫·范伦铁诺的去世,那是在1926年8月23日,是一个星期一的晌午。在此之前的一个星期,他突然生病已经成了媒体争相报道的大事件,他的影迷们不分昼夜地守候在医院里。成千上万的人开始聚集在范伦铁诺的安息之所——位于百老汇65号街上的弗兰克·E.坎培贝勒(Frank E. Campbell)葬礼教堂,燃烧的香火环绕着这位被人们铭记于心的英雄的灵柩。到了晚上,这个地区挤满了人,给警察维持秩序增添了很多麻烦。

1925年的11月,一些女影迷曾经围住范伦铁诺,并且扯坏了他的衣服。但是他死后的景象让以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无足轻重。到8月24日中午,围聚的人群已经达到1万,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中。一群喧闹的年轻“酋长们”加入了最先聚集的女性影迷队伍中,这些年轻人穿着“运动无钮短夹克,戴着牧羊帽”,穿着“气球裤、鞋罩,头发光滑,蓄着长长的络腮胡”,这些都是由于范伦铁诺才流行起

来。刚到下午,围聚的人已经达到2万,这些人身体强壮而“心理麻木”,他们试图从葬礼场地的各个门涌入。

混乱随之产生。在警察的坚持下,教堂向大家开放。人群开始鱼贯而入,很多年轻女性都亲吻了范伦铁诺的棺柩。但是,这样的进法太慢,不能满足围聚人群的要求,因为到晚上的时候围观的人已经达到8万。教堂在午夜时终于关闭,骚乱就更严重了。第二天,警察在9万人已经瞻仰过遗容后试图关闭葬礼教堂,前一天的骚乱再次出现:等在外面的几千哀悼者争抢着要进去,由此产生的激烈斗争一直持续到凌晨。

由于媒体仍然不断地煽情,局势持续紧张。8月30号那个星期天举行的范伦铁诺追悼仪式上一片混乱。当这名演员的遗体最终被移出葬礼教堂后,公众的骚乱才终于平息了,但是随着范伦铁诺的棺柩在美国运送,一股追棺热潮又开始了。尽管下着大雨,还是至少有5000人围聚在芝加哥的拉萨尔车站,因为范伦铁诺的棺木在那里做短暂停留。更多的人则等在好莱坞公墓外面,参加葬礼。

这不是一场完全自发的动乱。鲁道夫的突然死亡给他的工作室联美公司(United Artists)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由于两部范伦铁诺式电影《鹰》(*The Eagle*)和《酋长之子》(*The Son of the Sheik*)刚上市,这样一来联美公司必然会损失上百万美元,除非范伦铁诺的名字能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人们后来渐渐获悉纽约的这一围攻闹剧完全是由弗兰克·坎培贝勒和联美公司的宣传人员哈里·C.卡勒姆方斯(Harry C. Klemfuss)联手导演的,当时他们俩就躲在葬礼教堂附近,确保一切按计划进行。

他们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仅仅在几天内,两部电影就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票房成绩。放眼全世界范围,任何一部尚未发行的范伦铁诺的电影都被抢购一空,然后在挤满人的房间里放映。公众寄往工作室的观众来信10年内都不会减少。电影产业第一次发现了一个报纸行业已经人尽皆知的事实:死亡很值钱。鲁道夫·范伦铁诺在电影胶片里被永远定格在他最美好的年华里,永远也不会变老。

这是消费者时代的一种全新的浪漫主义,在世界大战的年轻死伤者身上已经实践过的一种信仰——上帝偏爱那些死去的年轻人。尽管范伦铁诺1926年时已经30岁了,他仍然和男子气概、力量以及令人窒息的性感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也正是年轻的“酋长和希巴们”所推崇效仿的。他的死就像那只琥珀中的苍蝇一

样,把这一切都定格了。对于工作室的老板们来说,这样最理想不过了。他们造就的明星再也不能以他的喜怒无常和花样百出的要求来妨碍他们平坦顺利的生意道路了。范伦铁诺活着的时候是个麻烦,死了,他就是个理想的产品。

1926年8月的这场混乱作为耸人听闻的头版新闻,向美国当权者生动地展示了青年大众的力量。为一个死人出现骚乱使他们的行为在成人的眼里显得极不理智,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梦想经济利用心理因素操纵大众谋取利益带来的必然结果罢了。范伦铁诺的年轻影迷们被鼓动着把他们的明星看成一个神,由此他们演绎了列朋关于大众具有毁灭性力量的预言——就像生的能力缠住了死的愿望。

这一围攻事件也揭示了消费主义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因素。电影这类对青年人有着特殊吸引力的大众娱乐让青年人产生参与社会的理想,但同时因为这种愿望过于强烈而注定要破灭。20世纪20年代的很多改革者和社会学家曾经评价过电影对青年人心理的强烈影响。爱德华·博那伊把“美国电影”看作“当今世界最有力的宣传载体。”

但是,灰姑娘情结是有其两面性的。如果观众从来没有梦想过能过上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生活,那么很多明星会发现现实其实和他们梦想的那种天神式的生活并不一致。以范伦铁诺为例,他曾经以为明星的身份可以洗刷掉他成名前穷苦生活的印记。但是,当他成名后,他发现自己面前的不过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尽管他疯狂的影迷们把他看成超人类的神,但是对工作室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件可动的个人财产;尽管总是被狂热的女性所包围,他的两次婚姻却总以失败而告终。他既是神,也是人;既是主人,也是奴隶;既被追捧,也被鄙视。

这些内在的矛盾终于在1926年7月爆发出来,起因在于《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发表了一篇题为《粉色粉扑》的文章,对范伦铁诺进行恶意的人身攻击。文章开头就用一种骇人的笔法描写“在一间男厕所”里发现了“粉底自动贩卖机”：“我们亲眼看到两个‘男人’……走近,投入硬币,拿手帕垫在出口下面,拉开控制杆,然后拿起那个漂亮的粉色玩意儿,对着镜子把它擦在脸颊上。”作为“美国男性的典范”,范伦铁诺被指必须为这种“娘娘腔的堕落行为”负责。这一中伤困扰着他直到死的那天。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女星身上。1927年,克莱拉·宝(*Clara Bow*)因为主演摇摆女郎为题材的电影而走红。这部改编自艾莉娜·格林

(Elinor Glyn)所写的畅销小说《它》(*It*)由派拉蒙公司制作的电影太具典型性了,所以米德在批判灰姑娘情结的时候引用了其情节。如果说这部电影的片头是可信的,那么《它》所拥有的“磁力”不过是克莱拉·宝所表现出来的性诱惑。用斯考特·菲茨杰拉德的说法,她才是“卖点”。公众自然而然地这么认为:这部电影使她成为好莱坞最卖座的明星,也成了“无忧无虑的烈火青年的最抢眼的代言人。”

梦想成名的欲望让克莱拉·宝一旦梦想成真后变得格外脆弱。就像范伦铁诺一样,这个意大利女孩经历了不堪回首的童年。她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有好衣服穿,很多时候也没什么东西吃。我们只是活着而已,就只是这样了。别的女孩子对我避之不及,因为我穿得太寒酸了。”16岁时赢得一场选秀比赛后,她来到了好莱坞,开始在《塑料时代》等影片中崭露头角。宝凭借《它》一举成名时,年仅22岁。但是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

作为新的性开放的代言人,宝成为观众的希望和偏见的焦点。学者爱丽丝·米尔斯引用了很多青年人对她最出名影片的反应。“一个14岁的童子兵这样评价一部名为《它》的电影:‘我认为克莱拉·宝主演的《它》对社会来说只有负面影响。’而一个17岁的男孩在写到同一部电影时说:‘我喜欢《它》。这是一部完美展示迷人年轻女性的电影。’”

到1928年春天,宝已经变得炙手可热:每个月她的影迷来信已经超过3.5万封。在她如日中天初期采访过她的记者兼剧作家阿德拉·罗杰·圣约翰(Adela Rogers St. Johns)注意到,“她的生活似乎没有模式,也没有目标。她从一段感情游弋到另一段感情,但是她什么也没有得到,也没有为未来存下什么。她完全生活在当下,甚至不是为今天而活,而是仅仅为这一刻而活。”在另一本杂志做专访时,她说出了真相:“几个月以来,我从来没有开心过。你们在银幕上见到的人完全不是真正的我,那只是银幕上的我。”

宝在放纵的挥霍和性生活中寻求安慰。然而,以好莱坞的“道德标准”来看,她在私生活方面确实有点太过放纵了。对于男明星来说,私生活的不检点可以增加他们的魅力。但是女星则不一样,她们在这一方面需要更加谨慎。这就是现实。宝的行为被认定严重有碍风化,在失去工作室的支持后,她的职业生涯变得停滞不前。由于不能适应新的有声电影的要求,她在1931年官司缠身以后,声名大打折扣,精神也一度陷入崩溃。25岁那年,她作为演员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这两个人高度浓缩的人生闹剧引出了灰姑娘情结的悖论。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所有明星身上：《烈火青年》的主演科琳·莫后来就快乐地活到高龄。但是爬得越高，摔下来就会越疼。像宝和范伦铁诺这样红极一时的偶像也许是抛开了痛苦的过去投入到光鲜的世界中，但他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的性感为他们赢得了追捧，却同时也招致了敌意。就像其他任何产业制造的产品一样，他们都受到淘汰规律的支配。

但是他们的光彩也促成了一个新的类型：在他们的个例上，性别角色都很混乱，这就引发了所谓的中性，在很多社会中这个词语都是和年轻的神或者演员们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形象撼动了主流，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带来了希望。电影担负着表现数百万观众愿望的重任，它要为大家提供一个在社会上取得成功的榜样。在这里，即使是流浪汉也能找到自己的梦想，少数人的成功似乎可以代表边缘阶层不断向上攀登的过程。

\* \* \*

大众文化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大众认为他们应该在更大程度上融入社会。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后，美国青少年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不管是摇摆女郎、遍布美国城市各个角落的匪徒、还是认识到自己潜力的大学生，美国的青少年都开始通过消费主义合并力量，并且发表关于解放的各种主张。

1923年，一本名为《新学生》(*New Student*)的杂志批判了美国大学生不关心政治的现象：“我们几乎是所有人中唯一有时间和机会来研究当下这些争议问题并且可以付之行动的一部分人。今天的力量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但是我们有没有去研究工业、经济和国际问题，然后再简单地把它们解释给街上的人们听呢？这似乎是我们作为学生最自然不过的作用，但是我们没有做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太不成熟了，还没有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我们有力量，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利用它。”

到20年代中期，美国的学生们开始这样做了。他们主要瞄准了禁酒法案，因为大学杂志的编辑们希望争取修改这一法律。1926年在常春藤联盟的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87%的学生都倾向于废除这项法案。《普林斯顿日报》(*Daily Princetonian*)认为禁酒法案已经“严重威胁了大学的优秀传统。以

前学生们都只在拿骚小屋(Nassau Inn)喝酒,而现在他们把烈酒带回来,放在寝室里,没有了就到路边旅馆买。这完全是藐视法律。”

美国的学生们对成年人的这种伪善反应激烈,他们开始拓展自己的政治视野。1925年,245个大学生集中在普林斯顿开会讨论国际联盟新设立的国际法庭(World Court)问题,在同一个会上,他们成立了美国学生联盟(National Student Federation)。作为会议的一部分,反对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强制征兵的呼声显得尤为强烈。大部分学生仍然认为军事训练是令人向往的,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加入这个训练队应该以自愿为原则。

但是,他们的政治情感并没有超出他们自身改变社会的需求。以大学生为例,尽管他们很喜欢爵士乐,也经常到一间充斥了黑人的名叫“黑色与棕色”(“Black and Tans”)的酒吧泡吧,对于种族问题,他们只会鹦鹉学舌般表明出一种常规态度。由于对黑人偶像即使不算狂热的但也绝对真诚的效仿,白人组建了自己的爵士乐队,而且数目越来越多,这让普通大学生觉得更没必要过分关心美国最棘手的问题——种族隔离。

到20年代末,爵士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人们对它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小型的乐队转到庞大的组织,例如保罗·怀特曼(Paul Whiteman)的三十件式管弦乐团,它在全国进行巡演,引起了类似范伦铁诺之类的明星曾经掀起过的狂热。1929年6月在内布拉斯加的一个火车站演出的时候,演奏者还没登台,这个乐团就引来了5000人的围观。爵士的名字在1927年被具有革新性的有声电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所挪用,主演这部电影的是当时还不出名的艾尔·乔森。

但是,爵士乐变成了美国青年的共同交际语,但这一过程并非悄无声息地进行的。这一音乐形式的流行给各种族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看到黑人音乐和舞蹈在白人青年中流行并且日益在大众媒体上传播,一些年轻的黑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决定为争取相应的解放而努力。随着爵士乐成为现代性的一个国际象征以及作者艾伦·洛克(Alain Locke)提出所谓的“美国文化的新民主”,他们觉得是时候彻底走出奴隶时代了。

美国实现这一转变的理想似乎对所有被排除在外的人伸出了真诚的手。洛克1925年具有革命性的文选《新黑人》(*The New Negro*)旨在给新的“黑人复兴”提供一个框架。文选列出了“新一代”的年轻作家,如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康梯·喀伦(Countee Cullen)等,这些作

家运用极端现代主义手法和传统土话,神奇般地把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变身为社会的骄傲。如果他们是要推进“一种新的生命审美哲学”的话,那么其中心是在哈莱姆(Harlem)。

哈莱姆临近曼哈顿岛(Manhattan Island),由25个街区组成,总人口达17.5万。它拥有黑人经营的生意、娱乐场所以及多样化的政治社会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就像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正如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观察到的那样,它就像“种族问题上一个大范围的实验室。”就像洛克所言,正是在这儿,黑人的生活“抓住了其种族自我表现和自决的第一个机会”。在这个“种族之都”的理想中,青年人处于中心地位。

1926年5月,兰斯顿·休斯在《国家》(*The Nation*)中宣布,“我们年轻一代的黑人艺术家现在想不带一丝恐惧或者耻辱地表达我们黑人的个性。如果白人对此感到高兴的话我们自然高兴。但是即使他们不高兴,也没有关系。”作为“献给年轻黑人艺术家的季刊”,《火》(*Fire*)的绝版于同年11月出版,介绍了像休斯这样20到25岁之间的作家。刊登的作品包括理查·布鲁斯·努京特(Richard Bruce Nugent)为同性恋所写的散文赞歌《烟,百合和玉器》(“Smoke, Lilies and Jade”),以及刘易斯·亚历山大(Lewis Alexander)的诗歌《小小灰姑娘》(“Little Cinderella”)。

哈莱姆不仅成为全美黑人的灯塔,同时也吸引着白人。娱乐业是其魅力所在:1923年棉花俱乐部(Cotton Club)开业,3年后更加针对黑人的萨瓦舞厅(Savoy Ballroom)也开业了。由于爵士乐和爵士舞蹈的流行,哈姆莱以及黑人文化价值也逐渐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和尊崇,这种肯定不仅仅局限在大学生中,同时也蔓延到曼哈顿上流社会。几乎就在年轻的黑人作家预告哈莱姆复兴的同时,这一复兴经一位中年白人批评家兼时尚领袖介绍为更广大的读者所熟知。

这个人就是卡尔·范·维克腾(Carl Van Vechten),他出版于1926年末的《黑鬼天堂》(*Nigger Heaven*)是一部经典的通俗著作,书中提供了一幅对哈莱姆这一不为人知的世界的导游画卷,其真实性足以吸引同道中人。尽管范·维克腾对黑人文化表现出了真诚的兴趣,他的这本小说在出版的时候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暂且不说书名中的禁忌词,一个白人从争取黑人平等的运动中获利这一事实就令人难以忍受。就算“黑人以及黑人相关的所有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但是社会包容黑人这条路仍然行不通。

但是,这一争议最终以维克腾的胜利而告终,由此也让好几本年轻黑人作家写的小说在20年代末得以出版。在这些书中,作者们揭露了他们生活的复杂性,他们仿佛是在通过哈哈镜拙劣模仿美国白人的价值观。华莱士·瑟曼(Wallace Thurman)的《黑草莓》(*The Blacker the Berry*)中描写了“太黑的”女主人公艾玛·洛·布朗(Emma Lou Brown)在一所全黑人的大学里被她肤色稍浅一点的同伴们排挤的故事。和克劳德·麦凯的《到哈莱姆去安家》(*Home to Harlem*)一样,这本书同样揭示了高度的自我仇视和怀疑经常会导致自我放纵和自我毁灭。

尽管他们幻想着种族和睦,但事实上哈莱姆复兴却并没能改善种族隔离的现实。兰斯顿·休斯曾经不悦地评价著名的棉花俱乐部,说它“是供匪徒和有钱白人娱乐的黑鬼俱乐部”：“陌生人们坐在最好的圆桌旁,看着那些黑人顾客,就像看着动物园中那些供人玩乐的动物一样。”相反的情况却不可能发生,“黑人们说:‘我们不可能到市中心在你们的俱乐部里这样看着你们。你们甚至连进都不会让我们进去。’”

哈姆莱复兴显示了灰姑娘情结的局限性。大众媒体关注对象的多样性给人们提供了融合的希望,但是他们关注的对象本身对自己如何被刻画却并没有发言权。为了能走上通往自由权利的曲折道路,他们甚至屈服于歪曲和剥削。很多内部人士这样评价哈莱姆复兴:它由一场解放运动变成了新奇潮流,这种所谓的新奇只不过是利用了的一时狂热,当潮流一过,就会被无情地抛弃。哈姆莱复兴见证了这一过程中人们的痛苦。

\* \* \*

仔细研究过这些术语的人们就会发现,情况或多或少都是这样。20世纪20年代,美国媒体所宣扬的青年人形象只不过是为消费者社会做宣传之用。他们看来新潮,充满吸引力和性诱惑,但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权力问题,他们就成了安慰剂:他们对于美国的社会和法律结构来说没有任何或者说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自由是让他们充满魅力的一个必要成分,这还是引发了人们新的思考,并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间结出丰硕的果实。

20年代青年人日益增长的独立性并不完全是一个幻想。在一个抑制激进骚动的国家里,青年人的独立性更多地体现在态度上而非政治上。当大学生和青年团伙们公然反抗禁酒法案的时候,比他们更年轻一点的小兄弟们开始向他们的父

母宣告独立。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反叛是如何反映在美国米德尔镇的一个青少年身上的,一位困惑的家长说,“现在12或14岁的孩子都表现得像个成人。”

1929年出版的《米德尔镇》刻画了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城市,在那里权力的天平已经坚定地向着青年人一方倾斜:“十二三岁以后,在影响孩子个性发展的其他因素面前,家庭的作用开始减退,到十八九岁,孩子就被当成小成年人,日益独立于父母的权威之外。”他们引用了一个“受欢迎的高中女生”在试图和“拥有时髦车的纨绔子弟”出去遭到反对时对她父亲说的话:“你们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天天晚上就坐在家里?”

20世纪20年代,青年人开始不只把自己看作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而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特殊的阶层。就像这个国家其他被剥夺了权利的阶层一样,美国的青年人认为自己受到的关注度能够允许他们向社会提更多的要求。这种青年政治可以通过美国所保证的全民平等体现出来。但是,他们把自己消费先锋的地位和真正的政治权力混淆起来,这一现象是建立在狂热却又脆弱的繁荣景象上的。

# 17

## 追求享乐

“光明的年轻人”

班迪：你变老了。

尼基：是啊，上帝，真是糟糕！

班迪：太糟糕了，亲爱的。

尼基：有趣的是我们妈妈这一代年轻的时候老是想变老，而我们则想方设法想保持年轻。

——诺埃尔·科沃德，《漩涡》(1924)



布兰达·丹·保罗在喧闹的20年代

在20世纪20年代的鼎盛时期,布兰达·丹·保罗(Brenda Dean Paul)参加了在梅费尔〔1〕(Mayfair)为轻歌舞剧《黑鸟》(*The Blackbirds*)全体演员举办的派对,这部歌舞剧随即就席卷了伦敦。《黑鸟》以其狂野的舞蹈和爵士乐给英国人第一次展示了哈莱姆真实的一面,并很快渗透到英国上流社会。在其长达一年的巡演过程中,主演弗洛伦斯·米尔斯(Florence Mills)以及其他的“黑鸟”们成了伦敦很多有钱青年人派对上的座上宾,这些年轻人从一开始就对剧中“这些有色人种的歌唱和舞蹈”入了迷。

对于19岁的伦敦人丹·保罗来说,这个光芒四射的晚上对她意义重大。当一小群人在两个“完美的钢琴演奏家”伴奏下跳舞时,她和弗洛伦斯·米尔斯建立起了友谊,在她眼里,米尔斯“充满自然魅力,而且泰然自若”。米尔斯告诉她,她可能“出生在哈莱姆”以后,丹·保罗决心做一个“有色舞者”：“和这些迷人的人在一起,我感觉非常自在,而房间里的每个白人都过于彬彬有礼,简直有些做作。”

《黑鸟》派对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丹·保罗后来又参加了一系列这样的活动,如“大规模的化装舞会”和“怪诞派对”等。很多怪诞派对有着令人狂热追随的主题,如大卫·坦纳特(David Tennant)举办的“回到20年前”就是一个疯狂的孩子派对：“甚至连乐队成员都穿着伊顿公学的西服和衬衫,戴着学生帽。”随后的怪诞派对包括：“睡衣派对、希腊派对、俄国派对、水手派对、美国派对、谋杀派对、沐浴派对等等。”

后来回忆起这些被华丽的服装、鸡尾酒以及喧闹的爵士乐所包围的夜晚时,丹·保罗选择了其中最极端的美国派对来讲述。所有参加者都被“要求打扮成‘流浪汉’、‘淘金者’、‘乞丐’、‘黄油鸡蛋人’、‘甜蜜的人’、‘匪徒’、‘应声虫’、‘女记者’等等。”喝着“自助餐中的香槟”,人们完全沉浸在其中：“乐队都是专门

---

〔1〕 伦敦上流社会聚集地。——译者注

从哈莱姆请来的,不用喝酒,音乐似乎都能醉人。”

对于一个从阶级的缝隙间偷偷溜出来的年轻女孩子来说,这些夜晚足以改变其一生。丹·保罗的父亲是一个准男爵,丹10来岁的时候就受尽了父母离异带来的耻辱。17岁的时候,她得知母亲没有钱让她参加初次社交,于是决定加入母亲所在的工作室。她签下合同,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在这里,有的人放荡不羁,有的来自上流社会,有的来自俱乐部区下层。也正是这几种人构成了英国20世纪20年代最耀眼的青年文化——“光明的年轻人”(the Bright Young People)。

对于这些媒体生物来说,外表、魅力和风度就是他们的全部,而丹·保罗恰恰具备所有这些特质。由于她天生丽质而且带有一种无所畏惧的鲁莽气质,她似乎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因此她的照片常常见报。“有好多年我在凌晨四五点之前是不会睡的。”她后来这样回忆道,她的这种生活方式实质上也就是不考虑明天的疯狂享乐。在怪诞派对的漩涡中,时间加速,然后静止,就像那些穿着华丽衣服的名人照片一样定格在那一刻。



“光明的年轻人”仅仅是20世纪20年代席卷欧洲的追求享乐的青年文化中的一种。开派对是一种追求享乐、活在当下的生活方式,这和19世纪的基督教道德标准截然相反,这也是战后一代公然反对父辈价值观的理想方法。“理想主义”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所有伟大的主题都在世界大战的照射下蒸发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鲁莽轻率的享乐主义。

就像美国人仍然循例把“童年”和“青少年”混为一谈那样,英国和欧洲对于青年人的准确定义也是相当有弹性的。20世纪20年代的派对一代就包括了真正的青少年以及二十五六岁到二十八九岁的人。后者当中有很多像南茜·库纳德(Nancy Cunard)和哈里·克罗斯比(Harry Crosby)那样不需要工作的有钱人。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同样是战争的牺牲品,他们的生命停滞在1917年或1918年。通过派对,他们可以重新找回被战争偷去的年轻时光。所谓的年轻不在于年龄,而在于心态。

派对同样也适合大西洋另一端的年轻人。对于年轻的欧洲人来说,跳查尔斯顿快步舞是新奇而刺激的,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努力追求的现代主义精神。20世

纪20年代的年轻人被定义为社交和商业动物,他们希望用自己的语言来庆祝自由。斯坦利·霍尔在《青春期》一书中指出“野蛮人几乎都是伟大的舞者,他们模仿所了解的每种动物,跳出他们自己的传说,这种仪式很严格,出错就意味着死亡。”撇开其肤浅的表面现象,派对就是一代人共有的仪式。

过去,国家的好战性要求人们付出前所未有的义务和牺牲,而1919年以后人们开始为这种义务和牺牲索要赔偿。随着旧的顺从心理消亡,原本严格的阶级结构也开始瓦解。20世纪20年代早期,欧洲的大众社会开始萌芽。面对一个摇摇欲坠政治日益极化的德国,为苏联和意大利法西斯提供一套可行的社会系统显得尤其重要,美国对此给出了完美的处方。

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曾经为战争提供资金,而现在它的媒体和青年文化又定下了和平的基调。这一过程经新东迁运动达到高潮,在所谓的东迁中,数百名美国的作家、音乐家以及享乐主义者来到了大西洋对岸。这在巴黎尤其明显,在这里1美元几乎可以兑换27法郎,或者1个月的面包供给,这一有利的汇率意味着在一个支持审美和性实验的文化里生活开支很少。在美国国内饮酒是非法的,而这些把自己流放到国外来的年轻人则可以不带任何负罪感地纵情享乐。他们聚集在“屋顶上的牛”(Le Beouf Sur Toit)之类的场所,朝拜让·考克多。到20年代早期,出现了一股狂热的考克多潮,来自法国各地的年轻人争相来朝拜这个在青年中有如天神下凡似的人物。他的崇拜者中最著名的是瑞蒙德·瑞迪戈特(Raymon Radiguet),这位曾经以极具争论性的第一部小说《肉欲之魔》震撼整个巴黎的年轻人20岁时死于伤寒。这是“迷惘的一代”。美国编辑罗伯特·麦克阿尔蒙(Robert McAlmon)在“屋顶上的牛”遇到时尚模特萨丽(Sari)时,她严肃地告诉他:“16岁时就对生活了解得太多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对于处在潮流中心的人来说,巴黎就是一座派对的城市,不管是私人派对还是“黑人舞会”(le Bal Nègre)这样一年一度的社会活动。每年最盛大的派对是6月份由城市的艺术学生主持的“四艺术舞会”(Four Arts Ball)。一名1927年参加过舞会的人记得和一群年轻学生一起冲进了克拉瑞奇酒店(Claridge's Hotel):“我们半裸着,在走廊上大叫大嚷,冲进餐厅,揪那些客人的鼻子,抢他们的酒喝,扰乱跳舞的人,甚至冲到楼上的卧室区去,推开任何一间没上锁的门。”

这种舞会在1923年到1929年间每年举办一次,其狂欢的诱惑不可抗拒。诗人、巴黎居民哈里·克罗斯比从压抑的波士顿背景中解脱出来,在这种混乱中感

到巨大的欢愉。在1927年的舞会上,他穿了一件由7只死鸽子和装在袋子里的10条活蛇组成的服装。“一点钟的时候大家都变得很狂野,”他后来写道,“男人女人们全裸着跳舞,大家冲来冲去……我打开了装蛇的袋子,从我们住的地方往下倒了下去。尖叫声四起。但是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坐在一个丰满的女孩旁边,看到她正在给其中一条蛇喂奶!天哪!”

1923年马克严重贬值后,生活在柏林对于美国人来说更便宜了,也吸引了很多其他移民。萨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回忆说德国的首都那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城市”。他和他的朋友们“对外国人不仅很友好,而且还很热情。周围世界里不仅仅是德国人,这让生活变得多么有趣、美好而又富有啊!我们欢迎所有的客人,不管他们是像美国人和中国人那样自愿来的,还是像俄国人那样逃难来的。我们的大门总是朝他们敞开的。”

柏林以它的世界大同主义而闻名,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这座城市变成了对所有享乐主义者都开放的招待所。1923年马克的严重贬值加剧了这种状况,就像哈夫纳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一事件帮助年轻人暂时获得了自由:“那些年轻、脑子灵活的人干得很好。一夜之间他们变得自由、富有而独立。在这种状况下,那些思想僵化或者停滞不前的人都会受到饥饿和死亡的惩罚,但是对新形势能够做出迅速判断和反应的人则会得到天降横财的奖赏。”

哈夫纳记得“21岁的银行行长是如何出现在人们视线当中的,还有那些靠自己稍大一点的做证券的朋友给的小费生活的高中生。他打着奥斯卡·王尔德式的领带,组织香槟派对,接济他困窘的父亲,在所有的悲惨、绝望与贫困间,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年轻气息,放纵而狂野。现在,年轻人有钱了而年长者没有。此外,钱的本质变了。它的价值只存在几个小时。它就这样被挥霍掉,似乎以前从未有过,以后也再也不会。”

德国马克稳定下来以后,“好莱坞影片”的影响减少,柏林作为德国娱乐之都的地位开始建立起来。除了主题饭店和爵士舞俱乐部,还有大型的娱乐场所,如占地一整个街区每小时能容纳6000名顾客的“豪斯之家”(the Haus Vaterland)。在其莱茵兰酒台上,每隔1小时就会有一股持续5分钟的强风取代莱茵河晴朗而平静的景象,这就是弗里茨·朗(Fritz Lang)拍摄的《大都市》(Metropolis)的真实再现。

柏林在国际上具有吸引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它是世界的性爱之都。20世

纪20年代,它拥有提供亲密歌舞表演的餐馆、色情音乐剧和毒品,另外还有女同性恋俱乐部、异装癖舞会以及无数的妓院。柏林夜生活的开放性以及年轻男妓的存在、流连在各个酒店及拱廊街道上的玩偶男孩和男妓对英美的同性恋者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吸引。从1923年开始,很多年轻的德国人聚集到柏林,加入到这个某男妓所说的“疯狂的骑术比赛”中。

这些放荡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国家要崩溃,反而代表着稳定。1924年以后,魏玛共和国由外交大臣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掌权,他迎来了哈夫纳所谓的“我们这一代德国人经历过的唯一一段真正的和平时期。”这一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结合体:“人们拥有足够的自由、和平和秩序,到处都可以看到自由的心态、良好的薪资待遇、不错的伙食水平,以及稍稍的政治倦怠。大家都可以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按照自己的品味来安排自己的事情。”

1928年哈夫纳21岁,他回忆说这一时期充满了“某种很好的特质”,这些特质“在最好的德国青年身上悄悄地成熟”。新自由主义打破了阶级障碍:“有很多学生在业余做苦工,劳工中有很多是学生。阶级偏见和等级观念已经过时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自由和坦诚。”

但是,他认为很多德国人在对待魏玛共和国所给予的自由时都有一种病态的心理。这个国家“已经习惯于无序带来的各种情绪”,现在开始效仿青年人的榜样,而这些人在性格形成时期已经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带给他们的伤害。德国人在一个专制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已经不知道如何学着去过独立而稳定的生活了:“他们不但没把政治紧张状况的结束和个人自由的回归看成是一种恩赐,反而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权利的剥夺。他们觉得厌倦,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愚蠢的想法,他们开始生气。”

\* \* \*

由于美国消费主义思潮的传播,英国社会也开始转型。尽管战争胜利了,英国却对其曾经的盟友负债累累。这两个国家间的真正权力游戏围绕着战争借款赔偿的问题展开:英国欠美国9亿英镑,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坚持一种高利贷的还款方式。经济控制与文化入侵双管齐下,这让英国人对美国产生了敌意,一些时事评论员坚持认为正是美国让英国比衰落期的罗马更糟糕。

现实主义的时代来临了。20年代早期,英国传统的重工业被一些休闲产品

如汽车、无线电机、留声机、化妆品、手工织物等产品的制造业所取代。一些白领服务类职业如簿记、会计、销售和广告招收大量的员工，广告业也变成了一个在1921年成功普及心理学、创造了1亿英镑巨额价值的产业。第二年，英国广播公司(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开始面向全国观众提供广播服务。

美国电影打着查理·卓别林和玛丽·璧克馥的旗号称雄电影院，而爵士乐以及与之对应的舞蹈，如骆驼舞步、西迷舞和布鲁斯等等取代了拉格泰姆音乐。尽管不是很明确地瞄准青少年市场，美国的电影和音乐在英国受到各个阶层青年人的狂热追捧。他们追求新奇与乐趣，以及一切非战争的东西，无意中扮演了美国式大众消费先锋的角色。这种生活方式中更为松散的道德准则以及更为轻松的社会氛围对英国的特权阶层来说有着腐蚀性的作用。

年轻女性站在新现代主义的最前沿。这种美国模式在残酷的人口统计事实面前愈发彰显：七分之一的适龄男性死于战争，因此男女比例不平衡，女性多出了100万。婚姻不再是必然的了。随着1918年妇女的部分解放，她们参政议政逐渐成为现实。女性通过她们在战争中做出的贡献赢得了更大的独立：越来越自由的就业和离婚法律，以及由于玛丽·斯特普运动(Marie Stopes's campaigns)而日益觉醒的节育意识都可以证明她们的独立。

各阶级的众多年轻独立女性开始涌入大城市里。十八九岁或者二十一二岁的女孩子能够找到像记者、商店助理、侍应生或者秘书之类的工作。传统上一满14岁就开始做家庭佣人的工薪阶层的女孩们现在开始果断地拒绝这种在她们眼里类似奴隶制的系统，而比较倾向于“作坊或者工厂里的任何工作，甚至在类似伍尔沃思公司(Woolworth's)之类发放最低工资的地方工作，因为这里有自由，最重要的是，这里有结识男人的自由。”

这种“年轻人的解放”在新“摇摆女郎”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战后普通劳工的女儿们如1910年的‘淫荡’女演员般涂脂抹粉，喷洒香水，她们在这种新自由中自然欢欣鼓舞。”短发短裙之类的时尚潮流震惊了成年人，但正是随着这股“爆炸性的”战后舞蹈热潮从伦敦的锻工舞厅(the Hammersmith Palais)之类的娱乐场所传播到全国各地，新青年文化的深度才得以完全地体现出来。

在索尔福德(Salford)，罗伯特·罗伯茨记得“成百上千16岁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涌入舞厅”；“一些人一个星期几乎来跳6次‘快步舞’。我们用来照顾新手的大‘房间’至少能容纳1000人。除了星期五(这天晚上人们通常在家做清

洁),这里几乎每晚都挤满了年轻男女,人们之间第一次没有了阶级之分。每人花6便士(星期天1先令),这些来自工人阶级各阶层的年轻人们,从包身的学徒,到‘贫民窟的渣滓’,都可以在其他人的臂弯中愉快地跳着狐步舞。”

很多舞厅严格遵守20世纪10年代由“伊雷娜和弗农城堡”(Irene and Vernon Castle)开创的规矩,但是它们所允许的个人接触程度仍然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新式的舞厅作为独立的青年人世界被建立起来,拥有装着闪光灯以及各种异国情调装饰品的娱乐大厅。罗伯茨记得“在我们的天堂里,弥漫着一种淡淡的摩尔式风格,这种风格可能是通过墙纸表现出来的,因为墙纸上印着尖塔,顶壁上还高高地印着狭窄的凉亭。就在那里一支出色的乐队几乎从不停歇地演奏着。”

美国文化在工人阶级的年轻人中很流行,这种文化和他们遵循的各种新价值携手并进。这些新价值包括:更广泛的阶级平等、更少的父母控制、更广泛的个人自由和性自由、更多的能动性。随着对成年人的尊重日益减少,青少年饮酒、游荡街头的状况也越来越突出,这些情况又反过来加剧了成年人对青少年犯罪的担忧,最典型的就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1923年在《青少年犯罪》(*Young Delinquent*)中所作的调查。这本书的扉页反面印着“B.1 (AGED 15 7/12)”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嘴里叼着香烟,表情乖戾,显得非常傲慢。

\* \* \*

消费带来的融合原则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得以被英国人所接受,它和致力于把下层社会的青年人融入社会的各种新评估标准目标一致。1918年入学年龄提到14岁以后,一个为下层社会的青少年争取地位的强势草根运动开始了,青少年犯罪率的减少可以证明这一点:1917年到1924年间,在青少年法庭上接受审判的人数减少了40%,一直到1926年的大罢工前,没有一起严重的工人骚动发生,而1926年的罢工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名,而非青年主义。

现代性给了很多工人阶级的青年人一定程度的自由,同时也确实分散了他们的一部分能量,否则这些能量很可能会被用在政治上。这种现代性对于少数虽少却绝对显眼的一小部分特权阶层来说,是一面反叛的旗帜。享乐主义已经被提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但是自从威廉·乔伊森·海克(William Joynson Hicks)就任



B.1 (AGED 15 7/12)的头像

以后,他成为了这个世纪以来最专制的内政大臣。在他的统治下,控制享乐变成了一种禁酒式的讨伐。开派对也被政治化。

乔伊森·海克——或者说人们迅速给他取的绰号吉克斯——生于1865年,属于把年轻的英国人送到战场去送死的那一代人。当他宣布向性广泛宣战,特别是对同性恋以及伦敦的俱乐部生活宣战时,一部分年轻人纷纷应战。英国的年轻现代主义者继承了战争诗人对代间关系的论调,在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荒原》(*Waste Land*)出版前的几个月,两个年轻的伊顿公学学生,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和布莱恩·霍华德(Brian Howard)〔2〕创办了一本旨在宣布艺术革命的杂志。

这本名为《伊顿烛光》(*Eton Candle*)的杂志出版于1922年3月,收录了斯特维尔(Sitwell)兄弟、奥斯博(Osbert)和撒切维瑞尔(Sacheverell)以及年轻小说家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人的作品。哈罗德·艾克顿写了《解读让·阿尔图尔·兰波》(*A Note on Jean Arthur Rimbaud*),而布莱恩·霍华德的诗《献给

---

〔2〕 哈罗德·艾克顿的母亲是美国人,父亲是英国人。布莱恩·霍华德的父母都是美国人,生下布莱恩后就移居英国。

死于1914—1918战争中的年轻作家和艺术家》(*To the Young Writers and Artists Killed in the War: 1914—1918*)则严厉指责了谋杀了“伟大的年轻一代”的“一批该死的老人”；“啊，我们将为你们的理想而战——我们，太年轻了所以没和你们一起被谋杀……但是——我们并没有忘记你们。”

这两个盎格鲁裔美国青少年实践了他们信奉着的理想。他们两人性格不同，艾克顿结实而高深莫测，霍华德清瘦而眼光大胆，他们都用花花公子的方式宣布自己的不同。艾克顿引领了很多时尚潮流，包括那种带宽边褶皱颜色鲜艳的裤子，这种裤子后来被称为“牛津布袋”。他还因为通过扩音器诋毁《荒原》这一类的现代主义诗歌而臭名远扬。艾克顿和霍华德是内部的外人：他们和精英阶层们一起接受教育，但由于出身和性格他们还是只能成为局外人。

生活在一个敌视同性恋的社会里，他们是同性恋的事实反而给他们的反叛附加了力量：他们没有隐藏，而是选择了勇敢的公开。工薪阶层女孩的“男生”打扮可能暗示着她们同性恋的倾向，但这次这两个人却是明确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在任何别的时期，他们的这种举动可能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战争已经夺去了英国十分之一男性的生命：19世纪晚期那种强大的活力和军事宗教主义已经和伤痕累累的现实不相符合了。

女性变得越来越强大，这不仅仅因为她们人数更多，而且因为她们在新的消费主义社会里处于尖兵的地位。戴上不同的面具，扮演不同的角色，尝试不同的想法和态度，艾克顿和霍华德两个人显示了男性也可以带有这种柔韧的气质。以前，公立学校的男生们都时刻准备着服兵役，对外殖民扩张。而20世纪20年代，来自这一阶级的两个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准备着艺术实验，霍华德还准备着开献身派对。

这种新的男子气经由诺埃尔·科沃德〔3〕1924年的戏剧《漩涡》流行开来，这部戏剧对滥用毒品的描述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但这只不过是这出戏引起关注的一个表面原因。科沃德认识到青年人中有新的类型出现，他把他的主人公安排成了一个恋母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从一个漩涡主义作家到写成《漩涡》，这之间存

---

〔3〕科沃德完全符合现代主义风格，公众形象恶劣，一直是报刊丑闻的主角。《素描》(*Sketch*)杂志上刊登了他躺在床上的一幅照片，“穿着中国式长袍，表情傲慢而堕落”。正如他对《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所说的，“我永远也摆脱不了吸食鸦片和可卡因，还有其他的恶习，我的内心混乱而堕落”。

在着情感和性方面的巨大分歧：20世纪20年代，最新奇的年轻人类型不是野心勃勃的未来主义者或者拳击家，而是伶牙俐齿、行为亢奋、雌雄难辨的“彼得·潘”式青少年。

这在男性女性身上都能体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最有名的女性反叛者也是一个盎格鲁裔美国人。她就是当时一个著名的船运家族老板的独养女儿南茜·库纳德。库纳德出生于19世纪末期，在一种特权生活中成长起来，结果眼睁睁地看着这种生活被战争摧毁。经历一次灾难般的婚姻后，她开始追求新奇事物和满足感，并向她憎恨的母亲进行报复。由于“不断酗酒”，她原本纤弱的体质一直没有改善，整个人骨瘦如柴，因此给所有见过她的人都会留下难忘的印象。

她如钢般冰蓝的注视、飘逸的步伐以及敏捷的姿态增加了她的狂野形象。尽管以传统眼光看来她并不很具吸引力，但是她代表了一种新的令人震撼的类型。她有着大大的眼睛、参差不齐的头发、蜂腰，总是穿着如温德姆·刘易斯1922年所画肖像中那种男人穿的衣服。她的一个情人阿尔多斯·赫胥黎认为她具有“一种男人的超然。她能把自己的欲念与灵魂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尽管在赫胥黎的小说中她被描写成一个腐蚀性极强的荡妇形象，她却觉得自己代表了“完美的陌生人，从生活的规则中被放逐，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库纳德所过的伦敦俱乐部生活开始出人意料地成为创造新青年类型的重要土壤。20世纪20年代早期，伦敦出现了大量的夜总会，如上流社会在梅费尔的聚会地“皇室咖啡厅”（Café Royal）和“大使馆”（Embassy）、索霍北区（North Soho）的“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以及索霍街区有名的梅瑞克夫人（Mrs. Meyrick）的“43俱乐部”（43 Club）。在这些俱乐部中，战时萌芽的文化得以传播，这种文化混合了享乐主义、贵族主义、歌女或妓女作风以及由加拿大和美国士兵带人的来自大西洋彼岸的影响。

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在其1924年的畅销小说《绿帽子》（*The Green Hat*）中描写了这个世界潜在的空虚，他以库纳德为原型刻画了主人公爱丽丝·斯多姆（Iris Storm）的形象。尽管在人前光芒四射，这些年轻人“除了自己，他们漠视其他一切，但是他们对自己也没兴趣。”“被无聊无聊至死”，20年代早期的这一代把他们的失落掩埋在如布鲁斯一般缓慢的黑人舞蹈中。“这种舞蹈的节奏就像是一颗失落的心在跳动”，阿伦写道，“你为死者的出现而哀悼，你为生者的记忆而哀悼。”

去俱乐部的人可能是为了寻求解脱,但是正如阿伦冷眼观察到的那样,追求享乐既是一个俗世宗教,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梦。爱丽丝·斯多姆激情澎湃地谈论着“我不可言说的欲望。终有一天当我们都死了,现存的任何东西都消失了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它。当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他们能够找到的只有我们无法言说的梦想。它不是巧克力、不是香烟、不是可卡因、不是鸦片、也不是性。它不是吃喝玩乐、不是爱恨情愁。”生命最好的礼物,她归纳说,“就是梦想更好生活的能力。”

这种似乎能吞噬一切的强烈冲动经过喝酒吸毒愈演愈烈,这一现象增加了当权者对他们的敌意。20世纪20年代早期,领土防御法的某些限制有所放松,去俱乐部的人能够享受到在美国无法想象的自由。但是,1922年3月歌女弗丽达·坎佩顿(Freda Kempton)吸食过量可卡因引发的丑闻加上吉克斯就任内政大臣,使得政府对这一现象的镇压力度全面加大。但是这种镇压没能阻止伦敦夜生活的繁荣,而新就任的内政大臣惊奇地发现,这些俱乐部里并没有挤满妓女和吸毒者,那里有很多“同伴”。

吉克斯发起的道德教化运动反而使刚刚进入伦敦俱乐部的更年轻一代更不安分,激化了他们“鬼才在乎”的态度。“光明的年轻人”一代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是在1924年7月,《每日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寻证据,新社会游戏,伦敦的午夜追逐,50辆摩托车,“光明的年轻人”》(“Chasing Clues, New Society Game, Midnight Chase in London, 50 Motor Cars, the Bright Young People”)的报道。这个小群体由一些上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女性领导,注重穿着、喜欢恶作剧、无节制地追求财富,代表了“吸引所有聪明伦敦人的运动”。

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活动实际上隐藏着深层的社会变革。布兰达·丹·保罗认为,这种社会变革应该归因于“税收、女性新近觉醒的独立意识、以及社会上普遍的松懈状态。一个新阶级,或者说一个新的英国社会分支已经从战时的动荡中破茧而出,形成了‘新穷人’阶级”。她这一代“不想参加陈腐的私人舞,不愿拘泥于其他形式的陈规,他们渐渐游离出来,成为媒体所熟知的小群体或者‘小圈子’——‘光明的年轻人’。”

那种以初进社交界的少女、私人舞以及女伴形式存在的旧世界已经随着“新型的主人和女主人”的出现而开始瓦解了,丹·保罗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之一在于年轻女性的大量过剩。这种“新型”人物包括《青年的隐现》的作者亚力

克·沃,正是他发明了鸡尾酒派对,还有大卫·坦纳特,他在1925年开业的夜总会是索霍街区历时最久的夜总会之一,以及反叛的现代主义者嘎高懿尔(Gargoyle)。正如丹·保罗归纳的那样,“青年人间一种新的同志情谊开始出现,独立而平等,一种新的社会举止也随之出现。”

酒是消除阶级壁垒的最好工具,也能消除如伊芙琳·沃(Evelyn Waugh)在日记中详细记载的所谓文明举动的常见限制。派对如果没有纵酒作乐就不能称其为派对。1926年11月,他参加了一个由一些女同性恋熟人举办的派对:“鲁鲁·沃特斯·薇芝(Lulu Waters - Welch)来了,他和埃芬汉(Effingham)未婚同居;布莱恩·欧布莱恩(Brian O'Brien)来了;企业联合会的会长也来了。阿里斯代尔(Alistair)和我都喝得很醉。我好像记得我对鲍比(Bobbie)很无礼。有两个人打了起来。一个女警察把大伙儿都吓坏了,琼(Joan)变得非常好斗。”

这更年轻的一代并没有经历过他们战时的前辈们所经受的痛苦,爵士乐则给他们的旺盛活力一个合适的疏解口。美国精神席卷各处。“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陪伴着沙发上每个乱七八糟的人”,哈罗德·艾克顿回忆说,“它似乎具有鸡尾酒的一切醉人因素。”伊芙琳·沃则记录了去看《黑鸟》时遇到一个美国“怪兽”演员的经历,这个演员“随身携带着一包包的牙粉,他说那是海洛因,每个人都拿了一包。”

英国媒体关注度的改变意味着这个小群体拥有了与其规模不相称的知名度。20世纪20年代中期,面向全国发行的报纸渐渐发展起来一个新的栏目:署名闲话拾零专栏(the bylined gossip column)。第一个署名的日记作家是这个小组中的卡斯特勒罗斯勋爵(Lord Castlerosse),其后很快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专栏作者,如汤姆·崔尔伯格(Tom Driberg)、查尔斯·格雷夫斯(Charles Graves)以及伊芙琳·沃。这是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强烈的世界:这些年轻人和他们的朋友一起去派对,然后把人和派对的情况都写下来。报纸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竞争效仿的地方。成人对此也非常关注。

“光明的年轻人”的风格是现代性与厌恶父母情绪的混杂体,他们的表现形式是看似毫无意义的享乐主义。很多领军人物和他们父母的关系都很差。伊芙琳·沃曾经做过一幅著名的木刻,名叫《冷酷弑父》(*That Grim Act Parricide*),刻画了一个拿枪对准老父亲喉咙的年轻人。布莱恩·霍华德1928年以后拒绝和他的父亲说话,而南茜·库纳德1930年出版一本小册子公开自己和母亲争吵的行

为,轰动一时。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ey Nichols)在1929年还试图谋杀过父亲。

旧的有钱阶层和新的中产阶级的反叛令人震撼,因为正是这个阶级领导了战争,并且受损严重。战争英雄的女儿们变成了荡妇甚至更坏的形象,这就意味着反叛的一代人出现了。正当专栏作者们鼓吹追求享乐的时候,社论文章则猛烈抨击了现代的青年人,如《每日快报》就在1925年攻击了“现代女孩的兄弟”,那个“丝绸缠身的叭儿狗”。

但是,这些情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强化了传统的特权。年轻的工人可以在遍布全国的大型舞厅里追求享乐,但是他们吸引不了媒体的眼光,也代表不了时尚。所谓的解放走得并不很远。如果说“光明的年轻人”有什么意识形态的话,那就是表现在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著名的打油诗中的享乐主义和藐视道德的态度:“无视乔伊森·海克先生/我们是战后的人/我们是1926年的女孩。”但是,这一年发生的事表明他们内心里还是传统主义者。

“光明的年轻人”可能和流动摊贩混在一起,用伦敦腔进行交流,他们在从化妆舞会回家的路上搭识女工,但是当情况危急时,他们还是服从自己阶级的使命。在1926年大罢工期间,这些热衷派对的人有许多都站在了政府这一边,反对罢工,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到5月中旬罢工结束的时候,工人运动的核心已经不复存在了。

“光明的年轻人”实质上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作为胜利的反革命力量,这一类型迅速在中产阶级青年人中流传开来:贝弗利·尼科尔斯回忆说1926年之后“牛津充斥了狂欢的气氛。到处都是放纵的情绪”。派对数量也疯狂增长:《时尚》(Vogue)杂志一名作者1927年写道:“我在汉普登楼(Hampden House)里见到的口红数量比我这辈子见到的都多。波特林顿勋爵(Lord Portarlington)和他的儿子卡罗勋爵(Lord Carlow)分别打扮成维多利亚时期的母亲和初次参加社交的女儿,涂满了口红。”

“光明的年轻人”在1927年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期,而他们的最新明星斯蒂芬·坦纳特(Stephen Tennant)作为格拉斯哥的最新接班人,在迈入21岁的这一年几乎无处不在:在“闲话拾零专栏”里他化身“罗马尼亚皇后”,或者在扮演乞丐时穿上“绿颜色的破衣服”。在给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当摄影模特的时候,他穿着橡胶布衣,模仿他崇拜的美国女演员风格——烫发、口红和面部妆

容——很好地诠释了现代性。

坦纳特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持自己的名声。1928年春,他和布兰达·丹·保罗一起为弟弟大卫·坦纳特的婚礼主持了一场派对,受邀的宾客有布莱恩·霍华德、哈罗德·艾克顿以及斯特维尔兄弟,而他自己则“乘坐着爱德华时代的电动汽车”到来,出尽风头。接下来的一个月,大卫·坦纳特举办了一场吸引J. M. 巴里参加的睡衣派对,斯蒂芬穿着“白色的缎服,中途又换成了绿色的”;6月,人们看到他出现在切尔西艺术俱乐部(the Chelsea Arts Ball),“穿着华丽的纱质或者绒质的衣服,显示出毕加索式的色彩风格”。

但问题在于要想引人注意就必须有新花样。“光明的年轻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那些兴之所至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自觉的东西。布兰达·丹·保罗认为这一运动的消亡“有两个原因:公众的关注和社会的败血症。”“派对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缺乏独创性和娱乐性”,她回忆说,“等他们把纵酒狂欢传播开来,这些醉眼朦胧、无视道德的光明年轻先驱者们也已经筋疲力尽,不得不倒下。”

享乐已经不够了。“我烦透了伦敦和伦敦的派对”,布莱恩·霍华德说,“这些派对和5年前的那些完全没有分别。伦敦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朋友阿兰娜·哈珀(Allanah Harper)则把这些派对看成是“杰罗姆·博希式的地狱”:“我和布莱恩一起去的最后一个派对上,”她说,“我的衣服被撕破了,一簇簇头发也被当作战利品一样举起。”诺哈·C. 詹姆斯(Norah C. James)在小说《白白受累》(*Sleeveless Errand*)中写道:“大众由于纯粹的无聊而聚集在一起。他们想逃离自我而选择了派对。我们彼此厌恶,却无法走开。”

\* \* \*

就像美国的大学生一样,“光明的年轻人”的存在激发了媒体对青年人的兴趣。他们是英国青年文化的先行者,预示着青少年开始作为一种理想而不仅仅是生命出现。到20世纪20年代末,广告或者报纸都在宣扬“40岁的人孩子似的天真”或者探讨战时和战后几代之间的冲突。“似乎没有能逃过媒体的视线,”温德姆·刘易斯注意到。“它把视线集中到‘青年’身上,发现这并不美好,但却有利可图。”

和美国的同龄人不一样的是,“光明的年轻人”不存在灰姑娘情结,也不是社

会融合的典范。他们的荒唐行为只不过是富人特权的一个例证。如果是出身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引起这种混乱的话,他们会立刻就被抓起来的。连“闲话拾零专栏”的作者们都观察到了这个群体领袖人物如斯蒂芬·坦纳特的“倨傲态度”。但是,尽管他们希望得到仿效,他们也引发了敌意,受到大众的质问和嘲笑,就好像他们穿着属于这个舞厅的服装却进了另一个舞厅。

因为和社会脱节,到20年代末,“光明的年轻人”们开派对已经没有东西展示了。这一团体的解体指日可待,“看看我们这一代,”诺哈·C.詹姆斯写道,“还有下一代;我所谓的下一代就是在战前或者战争中出生的那些人。你难道不觉得他们像是毫无希望地在海上漂流一样吗?”伊芙琳·沃则认为20年代的这一代在战后被赋予了“任何一代人都未曾得到过的机会。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整个文明,等待他们去救赎,去重塑——但他们所做的似乎只是胡闹。”

当19世纪90年代的那一代在20世纪20年代末终于夺回发言权时,他们相继出版的一系列书不断重复了这一无情的批判。很多书的笔调苦辣而讥讽,如R. C.舍里弗(R. C. Sherriff)的《旅程的终结》(*Journey's End*)、理查德·奥尔丁顿的《英雄的死亡》(*Death of a Hero*)、查尔斯·卡灵顿的《皇家陆军中尉的战争》(*A Subaltern's War*)、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摆脱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和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新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意外的是,这些回忆录所记载的和“光明的年轻人”精疲力竭的状态完全吻合,但是这种相似并不能提供任何安慰。老兵和现实脱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他们把战前的岁月看成黄金时期、无邪的世外桃源、完美的夏天、还未粉碎的青年时光。19世纪90年代的那一代人觉得自己经历了三重失落:如果说战前生活就像童话故事那么遥不可及的话,战时经历就仿佛仍在眼前,接下来,20世纪20年代的那种狂热的物质追求则让他们的幻想彻底破灭。实际上,这个说法完全符合事实:死于战争的同伴已经不在,而幸存者则从公众生活中隐退。

不管他们是把自己藏起来还是像比他们小10来岁的青少年那样参加派对,他们都觉得失落。“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多余的”,雷马克承认,“我们应该更年长一点。我们中的一些人能适应,其余的一些人会做出调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做什么。”老兵寻求安静,选择逃避,他们仿佛处在一个真空状态,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战后那些喜欢去派对的人如此不安分了,因为他们和身边的长者之间找不到一点有意义的共同语言。狂热的享乐主义没能消除战争带来的阴影;事实

上,它已经变得更深,更阴暗。

一些老兵对20世纪20年代的一代抱有强烈的批判态度。1929年末,一个名叫汉斯·齐赫(Hans Zehrer)的前自由军团志愿兵在很有影响力的右翼杂志《这些行为》(*Die Tat*)上说由战争老兵组成的“年轻一代”被两种风潮所左右。第一种在狂欢中已经烧尽了自己,而第二种——安静地生活,获取世界的经验——现在已经为革新德国做好准备。他总结说德国将在“前线的男人”手上得以重建,而不是一味模仿美国人年轻人那些“滑稽的行为”。

这一比较揭示了战争老兵对20世纪20年代青年文化的抨击,而这种文化中自我陶醉的追随者却无力回击。清算的时刻到了,结果却发现他们并不够格。这些青少年们的问题在于他们永远也不想长大,因为长大就意味着他们会变成令人讨厌的父亲。战争结束,突变开始,一切就像一张白板,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运动以为他们能建造一个与成年人完全隔离的世界。

让·考克多在1929年的小说《折磨人的孩子》(*Les Enfants Terribles*)中对这个隔离的世界作了一个极妙的比喻,那是在保罗(Paul)和伊丽莎白(Elizabeth)典型的青少年“卧室圣地”里:“地板上散落着空箱子,还有毛巾和各式内衣。墙上每一寸可利用的空间都钉上了图钉,贴着报纸、从杂志上撕下来的彩页、节目表、电影明星、杀手以及拳击手的照片。”保罗和伊丽莎白把自己关在这样的房间里,演绎着“永远青春的传奇”,直到子弹和过量吸食鸦片结束了他们还未成熟的生命。

这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是让(Jean)和让娜·布赫光特(Jeanne Bourgoin),他们和瑞蒙德·瑞迪戈特一样很早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考克多把他们两人加工成保罗和伊丽莎白这样的艺术形象,认识到如果缺乏成人的控制,青少年的心灵探索注定要失败。“自省需要自律,而这就是他们缺少的。他们面对的是黑暗和鬼魅般的感觉。”

从痛苦的经历中,考克多理解了极端的青年主义的诱惑和自我毁灭:过长的童年扭曲了他们的心灵,死亡对他们产生浪漫的吸引力,他们缺乏顺利过渡到成年期的能力。《折磨人的孩子》是一则劝世寓言,但同时也鼓励热情的年轻读者对之进行效仿。因为尽管保罗和伊丽莎白最终逃不开死亡的厄运,但他们还是有吸引力的:“令人心碎的悲剧性幻灭,他们必定沉沦地狱。但是一切都开始得那么无邪,到处是孩子式的游戏和笑声。”

1929年左右,享乐主义青年文化的很多领头人都是小小年纪就去世了。酗酒和毒品是罪魁祸首:为了把派对永远地维持下去,把派对发展的抛物线永远定格在最高点,他们过度地依赖了酒和毒品。私酿的劣酒结束了很多美国年轻人的生命,其中最显眼的是明星短号手毕克斯·比德贝克(Bix Beiderbecke),而布兰达·丹·保罗则因为吸食海洛因而成为英国最臭名昭著的瘾君子。让娜·布赫光特于1929年12月死于巴比妥酸盐过量,而其他的很多人,如斯考特·菲茨杰拉德和布莱恩·霍华德一辈子都在试图摆脱酒瘾。

更具戏剧性的是那些不能跟上时代变化的人的命运。不管是布兰达·丹·保罗、让·考克多、斯考特·菲茨杰拉德、迈克尔·阿伦,还是伊芙琳·沃,这个时代几乎所有有关青年的书里都会出现灾难性的车祸,不是身体受损,就是神经受损。和沃描写的阿加莎·朗西保(Agatha Runcible)一样,丽尔达·菲茨杰拉德在疗养院度过了20年代的最后几年,她的神经系统一直处于过度紧张状态。最戏剧性的可能还是哈里·克罗斯比的死,他和情人一起在1929年12月双双自杀。

到那时为止,派对文化的光环已经被其他的事件所掩盖。美国证券市场1929年10月的突然崩盘是政府鼓励大众投机事业带来的必然结果。头脑发热的潮流开始变成无情拖垮美国和欧洲的漩涡。但是,西方世界不会一夜就改变。经济影响到日常生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以前没有经济萧条的先例,人们并不能预料它的发生。正如英国作家伊瑟尔罗·曼宁(Ethel Mannin)观察到的,“‘20年代’的情绪延续到30年代早期”。

美国大众社会的经济基础被严重动摇了,根基却依然有力。在这个年代最后一本伟大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阿尔多斯·赫胥黎想象了一个噩梦似的未来,在那里魅力和身世取代暴力威胁决定一切。赫胥黎认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将大行其道,因为它触发了每个人心底的那根弦。正如博那伊所说的,社会控制的铁腕已经套上了享乐的丝绒手套。

但是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经济萧条的恶劣影响还是会被暂时搁置: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会冲出来填补空缺。1929年10月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死后,一个日益分化的德国就成了这场战役中的第一块阵地。在这个国家里美国化的青年已经成为垂死时代的童仆,历史的舞台正对激进的、异教的青年政治组织敞开,其中包括各种各样憎恶现代主义特别是魏玛共和国的“德国联盟”和“候鸟组织”。

不管是美国的大学生、“光明的年轻人”还是“森林生活知识团”，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运动在创造他们的孤立世界方面都太成功了。他们的这种做法提醒制造商、政府以及理论家们，青年人已经成为了一股社会力量，这股力量太过强大因此不能任由其自由发展。在意大利法西斯看来，青年人已经被当成一种民族政治的尖兵力量。青年人展示了自己左右国家未来的能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变得更加政治化。

第五部分

1930—1939



## 纳粹思想指引下的士兵

希特勒青年团

挥舞起你们的旗帜,加入我们德国工人党吧!青年人们,和我们一起反抗旧制度,反抗旧秩序,反抗老一辈。我们是维护自由的最后斗士,和我们一起为社会主义,为自由,为面包而战吧!

——希特勒青年团基尔分会散发的传单,1932年夏



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纽伦堡视察希特勒青年团的一支编队,他身后是鲁道夫·赫斯(打领带的)和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巴尔杜·冯·席腊赫(赫斯右),1938年。

1933年1月30日,一个名叫梅丽塔·玛舒曼(Melita Maschmann)的德国女孩和她的父母一起观看了标志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帝国总理(Reichschancellor)的火炬游行。那个柏林之夜的那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一直伴随她的余生:“响亮的脚步声、红色和黑色旗子的肃穆景象、在那些面孔上闪烁不定的火炬亮光、以及旋律极具侵略性与煽情性的歌曲。这些人行进了数小时。在他们当中我们不断看到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女孩。”

30年后写到这一情景的时候,玛舒曼记得当时15岁的自己正努力地寻找一个“基本的人生目标”:“在当时那个年纪,我们的生活里只有学校作业、家庭出游以及生日宴会等毫无意义的事情,没有人会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兴趣而称赞我们。没有人说,‘有些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吧!’一旦涉及严肃的事情,我们就没有发言权。但是那些在游行队伍中的男孩女孩就很有用。他们就像成年人一样举着写满死者名字的横幅。”

玛舒曼从小受到的教育就要求她尊敬死于战争的军人,热爱“神秘地被悲伤笼罩受到危险胁迫的”德国,这正是民族社会主义者们宣扬的精神。她被民族社会党对“普通人民”的接纳所吸引,这体现在她家一个驼背的裁缝师身上:“我认识她那么久,总是看见她在外套的翻领下方别一枚印有卐字标记的金属徽章。那天她最后一次公开地戴这个徽章,当说起希特勒的胜利时,她灰暗的眼睛闪闪发光。我母亲很不高兴,她认为没受过教育的人来关心政治太放肆了。但正因为她仅仅是普通人中的一个,她对我来说就很有吸引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自己和她处于同一战线了,经常在心里袒护她,反对我母亲。我现在意识到自己对资本主义的势利表现非常反感,我很小的时候也有过这种势利,但在反对专制主义教育的行动中开始反对这种态度。”

玛舒曼的母亲“期望她的孩子像女仆和我父亲的司机那样绝对服从。这种态度反而激起了我的反叛,这种反叛已经超出了青春期纯粹的个人叛逆,而上升到反对我父母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价值的高度。”她的父母对游行持保留态度,这种态

度反而加强了她的“走一条与家族传统强加到我身上的保守路线所不同的道路”的愿望。

但是,这些表面的原因和这一事件引发的强烈情感相比显得苍白无力。“我希望投身于这股洪流中,被它淹没,被它带走”,她后来回忆说,“‘我们时刻准备为旗帜而死,’那些火炬手们这样唱着。这不是衣着、食物或者学校作文的问题,而是生与死的问题。谁会为旗帜而死?我会吗?在我问自己这个问题的那一刻,我回答不出,但是我知道我被一种强烈燃烧的欲望征服了,那就是要成为那些为旗帜而死的人中的一个。”

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希望看到的反应。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一样,他们在理论上鼓吹青年是促成变化的积极力量,在实践中通过冲突、行动以及培养归属感来动员年轻人,纳粹由此掌握了权力。1月30日游行那样的行动就是为了影响像玛舒曼一样具有不满情绪的年轻人。“我想逃开孩子式的狭隘生活,我想附着在一些基本但重要的东西上。我和无数同龄人一样有着这种憧憬。”

到1933年底,有差不多350万的德国年轻人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这一方面是由于新政权采取的高压政治手段,但另一方面纳粹也利用了“代间对抗”。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给了德国没有目标的青少年一个生活目标,以及反抗父母的力量。他们的父母多多少少都和受唾弃的魏玛共和国有某种联系。就像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巴尔杜·冯·席腊赫所说的,“从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青年人永远是对的。”

这是因为青年人处于民族社会主义者革命前景的核心地位。在1933年1月的一次采访中,德国新的当权者说出了他对未来的计划:“我们要从年轻人入手,我们年长者的力量已经耗尽了,我们已经烂入骨髓,我们身上已经没有不受限制的本能。我们懦弱而感情用事。我们背负着屈辱的历史,我们的身上是融入骨血的奴性。但是,我伟大的年轻人们!世界上还有任何地方有比你们更好的青年吗?看看这些年轻人!多么出色的材料!有了他们,我能创造出一个新世界。”

\* \* \*

1929年的经济危机加速了北欧大众社会的到来。资本主义的拥护者们鼓吹批量生产改变“整个社会秩序”的能力,但是他们没有预见到它的衰败趋势。当它正常运转时,一切都是好的:工资更高、价格更低、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当它不

再运转时,带来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1931年随着失业率不断增高,人们清楚地看到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害是全方位的。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带来的大众融合从此以后受政治支配了。

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欧洲公众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是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他的《大众的叛变》(*The Revolt of the Masses*)一书中所说的“大众参与完善社会权力”。但是,这个新时代有它自己的极权主义动力:“正如美国人所说的,‘标新立异就是不体面。’大众碾碎一切不同的东西,一切优秀的、独特的、合格的、精选的。任何不像其他人的,不认为自己像其他人的人,都担负着被除名的危险。”

就像前10年的反乌托邦所警告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推崇向大众投降的个人。我不再是个体,而是千百万当中的一分子:正如巴尔杜·冯·席腊赫1934年所说的那样,理想化的希特勒青年是“思想指引下的个体士兵”。在欧洲,表面上是人民掌握了政治,但实际上权力的杠杆还是把持在一个精英的手里,这个人开始用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宣传手段给独裁统治披上了一件人民执政的外衣。与此同时,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控制社会的方法还保持着-一个稳定的水平。

尽管美国的资本主义使人丧失信心,消费主义对于所有类型的政体来说还是非常管用的:它帮助消除西方民主中的更大不定因素,粉饰极权主义国家的恐怖政策。但是在大众掌权的假象背后是大众被征服的真实状态,伴随而来的是幼稚、愤怒和暴力等等心理影响。确实,这个年代里的很多事件都能证明古斯塔夫·勒庞的诅咒:“大众是被奴役的一群人,没有主人的话做不了任何事。”

政治成了新的大众宗教,而极化现象就相当于形成一个教友组织。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世界上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之间的斗争”。青少年没受到死亡、年龄和妥协的污染,他们心里很容易产生黑白分明的想法,让他们有一种类似宗教的那种明确态度。当时很多关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各国青年人的报道都问了同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

20世纪20年代的那一代最明显的特征是愤世嫉俗、追求享乐以及功利主义。相反,30年代的一代人却担负着另外一个重大的任务:颠覆资本主义。但是,这些年轻人的冲动却有着严重而又长远的影响:随着乌托邦思想成为全国性的意识形态,赌注越来越高,也更残酷。1914年前的伟大思想被世界大战所摧

毁,现在又卷土重来。

不管是站在左派一边还是极端右派一边,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政治都有着神秘的色彩,要求个人牺牲自我,融入集体主义的理想中:这种牺牲在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的笔下被描写为“通过放弃自我来实现自我满足”。但是,这种真诚而又理想化的牺牲被纳入了这个时代两种截然相反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轨道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对死敌竟有着同一个基本信仰:我们想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即一个新系统。

这种选择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及在德国那样赤裸裸。由于经济明显衰退,失业率上升,魏玛政府被推翻了。大众的仇恨在1930年9月举行的国民议员选举中得到了宣泄,在这次选举中,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人数少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的总数。这次选举预示着纳粹作为一个正式的政治党派登上历史舞台,同时也宣告了以往被看作边缘恐怖组织的政党具有合法性。

在此之前,民族社会党人把年轻一代组织起来的努力很少成功。希特勒青年团成立于20年代中期,却并没有融入主流“联盟”,他们充其量就是街头混混。1928年巴尔杜·冯·席腊赫就任领袖以后,希特勒青年团吸引了新近潦倒的中产阶级,成为通过在大城市里进行大规模游行来争取大众支持的一个准军事组织。这些游行引发的暴力对年轻人和不安分的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资本主义的失败为它的仇敌们让出了控制大众的舞台。德国共产党人以莫斯科为榜样,想要和资本主义一决最后的胜负。而民族社会党人刚好相反,他们受墨索里尼执政长达10年的法西斯政府影响深远。〔1〕希特勒1932年说“褐色的衬衫离开黑色的衬衫很可能就不存在了”,而且他从法西斯那里学到了很多:一党制的建设、军国主义色彩编码的军服、对年轻人的军事化管理,以及对年轻人的强大吸引力。

政党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把仇恨外族、种族神秘主义以及大众媒体的催眠功能结合起来,开始了他吸收德国年轻一代的活动。1930年选举以后,民族社会党人笼络全体国民的计划开始发展成准宗教的大众运动,预示了反个人的前景。年轻的高中生中自杀率还是居高不下,就像19世纪90年代那样成为一个全国性问題,而纳粹党对于直接行动的呼吁吸引了相当大一部分对民主怀有敌意且在绝望

---

〔1〕 墨索里尼于1922年10月当选为意大利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时年29岁。

中挣扎的德国年轻人。

面对这种极化现象，青年运动中白称为领导者的那些人无法找到一个民主的或者温和的平衡状态。所有独立联盟中最大的“德国自由团”（Deutsche Freischar）在1930年的选举中没能组成一个拥有强有力领导核心的政党。除了极左或者极右的政党组织，还有很多准军事集团，他们依赖于军事准则、人民理论以及反魏玛主义，偏向右倾，就像新教青年团体和童子军组织一样。

保守的“这些行为”派在1931年的一本名为《年轻一代站在哪边》（*Where Does the Young Generation Stand?*）的小手册上分析了这一关键的时刻。作者恩斯特·威廉埃·施曼（Ernst Wilhelm Eschmann）批判了德国把青年人当作一种“奇迹处方”的政治幻想。但是这种青年神秘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年长者们用以否认青年人在国家生活中应有地位的一个诡计。这种说辞和现实之间的差异引发了代间冲突，留下了“一大批没有组织的青年人”。

作为大部分青年运动基调的反民主情绪开始结出痛苦的果实。受1930年选举胜利的鼓舞，纳粹党策划了一次成功行动，抵制美国影片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新西线无战事》。由于影片大胆地描写了战争的恐怖，这种修正主义的历史让右派深恶痛绝。1930年12月，一组纳粹分子破坏了影片的首次公映。因为害怕发生更多的暴力事件，当局禁映了这部影片：对于惊惶失措的旁观者来说，这种对恶势力的屈服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 \* \*

暴力有了成效。对很多德国年轻人来说，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他们更倾向于战争：萨巴斯蒂安·哈夫纳说，希特勒承诺过“复兴1914年到1918年间的伟大战争游戏”，而这种呼吁引起了共鸣。那一年，失业人数达到500万，其中有很多青少年。青年人代表着700万张潜在的选票，因此代表着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问题在于赢得他们的心。激进的法国记者丹尼尔·格林（Daniel Guerin）于1932年8月选举过后访问了德国，他感觉这个国家“已经转向纳粹那一边了。它的威力正在四处传播。”

格林选择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四处游访德国。作为一个快30岁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他是满怀希望地开始这次游历的：“在这样一个年轻、现代而又充满活力的德国，在这样一个我从小就无限向往的国家中进行这次行动，或许我能真正地找

到自我。社会主义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在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正是在这里,世界上最好的、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工人阶级已经成形;正是在这里,经济社会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极点。”

这个法国人被“候鸟运动”“逍遥自在”的同志之情所吸引,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仍然坚持这一点。在德国的第一晚,他住进了青年旅馆,这里满是“15到20岁之间的年轻人,金发、声音浑厚、面容坚毅。他们穿着卡其色或者绿色的运动衫,卷着袖子,露出黝黑的手臂。轮廓清晰的膝盖从灯芯绒或者皮制短裤下露出来,上面是两条吊裤带,在胸前被一条皮带连在一起。他们的腿黝黑,肌肉结实而坚硬”。

但是表象下藏有潜流。格林拿起旅馆的访客簿,只看到“提示:‘不许在上面写你的政见。’但是,当我一页页地翻开时,每一页上写的都跟政治有关。尽管旅馆采取中立的态度,政治却无时无刻不在折磨这些年轻人,而他们无力抵挡这种折磨。某个人写道,‘世界上的工人们,联合起来!’但是另一个人用笔狠狠地涂抹了这个口号。在另外一页上,三根社会主义的箭头刺入了一个卐字符号。”

从前并不关心政治的青年流浪者团体不可挽回地分裂了。旅馆的公共休息室分裂成了两个竞争的小集团,互相唱歌叫板,“就像战争的前夜”。他们中的一个这样解释道,“其实我们内心深处追求的是同一样东西……一个新世界,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这个世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在千百万人忍饥挨饿时去糟蹋咖啡和麦子。一些人坚信希特勒会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另外一些人则信奉斯大林。这就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同。”

随着游历的深入,格林意识到德国青年人很迷惘,并且在痛苦中分化。“候鸟运动”的理想变成了无望的流浪:“50万无业的年轻人在街头徘徊,他们没有要求社会援助的权利,通常是因为他们家庭里至少还有一个人在工作。在他们讨厌的工人阶级邻居眼里,他们闲得无聊;而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他们又是一个负担。他们在春季出发,然后在森林里到处游荡,直到秋季结束。有些人就像这样游荡了很多年。”

虽然政治信仰不同,格林认为左翼和温和主义者一样,他们“冷静的争论”在这样一个“分裂”的国家里都没有争取到基础力量的机会。他两个月的旅行中看到的最震撼的青年组织就可以非常有说服力地说明这一点:这是一个他在柏林郊外遇到的一个“奇怪团伙”,尽管表面看来很像一般的“候鸟运动者”,这个“无家

可归的青年团伙却很‘野蛮’，他们有着流氓阿飞那种颓废愁苦的脸庞。”

他们戴着卓别林式的圆顶硬礼帽，“那种老女人常戴的那种有亚马逊风格卷边的、装饰有鸵鸟的羽毛和徽章的帽子”，“手帕和围巾的颜色过于鲜艳”。他们的耳朵上吊着“垂饰或者大环”，而他们的皮短裤上“挂满了大量的三角形皮带，五颜六色的，画满了难解的数字和人物的侧影，或者刻着例如‘狂野自由’和‘强盗’之类的字。”

这类团伙起源于混乱的世界大战中，在战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后的失业阶段数量迅速增多。由于完全没有成年人的控制，这种“环形青年团伙”在柏林郊外那些组成同心圆的环形道路上横行。他们的数量激增到几千人，这些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大多数是16岁到18岁之间——自发地组成了一种部落式的社会，全然藐视社会道德准则。他们把仇恨发泄到抛弃自己的社会上。

这些野蛮团伙取的名字就很好地诠释了他们“脱缰的本能”：“鞑靼人之血、印第安人之血、哥萨克人之血、放肆犯罪、女孩的恐惧、红色阿帕切、黑色之爱、滴血的尸体、森林海盗、还有酒鬼。”他们没有任何合法的收入或者政府的援助，通过同性卖淫、偷车以及夜盗谋生。这些团伙的成员有男有女——“野人”和“女流氓”——他们通常强制向成员收取常规费用，以帮助在警察那儿惹了麻烦的同伴。

秘密的入团仪式——暴力、残酷的团体放纵——揭露了这些野蛮团伙野性的真面目。由于完全游离在社会之外，他们任由青少年性行为猖獗，而这种行为是历代的青年问题专家都警告要反对的。格林总结说他们代表着“自发回归到蒙昧状态。毕竟，文明开化只是一层最近才出现的、薄而脆弱的表面装饰板”。他感觉到“一种真正的焦虑：那些知道如何管教这些伪阿帕切人的人可能会把他们变成真正的流氓”。

这些野蛮团伙只是他们这一代集体抛弃理性的一种最极端的表现形式，这个事实最令人震惊。民主的根扎得还不是很深：魏玛共和国存在了13年，在这期间就换了17届政府，因此很难说达到了稳定状态。就算是在相对稳定的斯特莱斯曼时代，还是很明显地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德国年轻人的支持，这些年轻人在对危机和冲突的痴迷中成长起来。

魏玛共和国没能消除帝国主义的结构和态度。大学对民主明确地表示敌意，这种态度和传统宗教以及军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态度一样。德国几乎有四分之三的青年人加入了这些组织中的这个或那个组织，因此它们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1918 年左右出生的那些满怀仇恨的阶层在形而上学民族主义和准宗教奉献的文化滋养下长大,追求德意志帝国的伟大复兴,已经准备好为伴随他们出生的失败而复仇。

纳粹党的宣传手法就是试图利用这种追求来实现神秘的、复仇心切的管辖。这个政党非常擅长组织引人注目的群众集会,其中包括 1932 年 10 月波茨坦的那次成功集会。原以为会有 2 万人聚集,结果有 10 万名年轻男女聚集在柏林郊外,使交通陷入瘫痪。由于人数太多了,这些男孩的游行从上午 11 点持续到了下午 6 点。这一切给无党派的围观者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当参与者们发现他们意外参与了如此盛大的集会时也精神振奋起来。

这种民族社会主义运动高度仪式化的本质对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这在流行的纳粹小说《希特勒青年夸克斯》(*Hitlerjunge Quex*)中有很好的阐述。在走进一片林间空地以后,年轻的主人公遇到了“一群年轻人”,他们似乎延伸到“世界的尽头。就在他的前面,成行排列着和他一样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拿着绑有三角旗的杆子,竖直地伸向天空,黑色的符号,鲜红的旗帜,上面还有参差不齐的标志。每个年轻人看上去都跟其他人一样。”叙述者觉得这个现象不可怕,反而振奋人心。

由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非常成功,更加强了这种献身的冲动。影片再现了纳粹 1932 年夺取权力的场景,生动讲述了 12 岁男孩赫勃特·诺库斯(Herbert Norkus)的故事。他在工人阶级控制的“红色”威丁区散发纳粹传单时被共产党人抓获。攻击他的人在他的背上刺了 5 下,胸前刺了 2 下,还把他的脸毁得无法辨认。这个故事被转化成为一个殉道者的寓言:在影片的最后,在镜头切换到希特勒青年团的行进入潮之前,垂死的年轻人还在坚定地表达他的信仰。

尽管纳粹公然宣称仇恨现代主义,他们还是仔细研究了美国在控制大众上的实验:格林 1932 年观察到“整个德国被美国式的权力梦想冲昏了头脑。”他们成功地进一步发展了博那伊的大众宣传理论:他们用自己的手段,确实把这个概念落实到社会控制的基本行动上。他们政权的一大特点可能是它体现了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是达到最新发展水平的技术,另一方面是野蛮的种族和社会控制观点。

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宣传方法解决了美国先驱者在控制大众的过程中由于他们的民主制度而遭遇的障碍。纳粹党对民族主义情感和神秘力量不加掩饰的推

崇使它在 1932 年底 1933 年初激烈的权力争斗中更有优势,这种优势完全不是因为它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而是因为一种蔑视法律的快感。由于魏玛共和国打击包括希特勒青年团在内的民族社会主义组织,违反法律的诱惑增加了希特勒青年团的吸引力。在与共产主义者争夺街头地盘时,意识形态让纳粹党的工人阶级追随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

1933 年初,希特勒青年团已经有 10 万成员,在人数上超过了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青年组织加起来的总数(8 万人左右),但是还远远少于保守的青年组织人数(超过 25 万)。如果非纳粹的青年组织结合起来,希特勒青年团会遭受重创。但是渐渐地,右翼和新教青年组织开始偏向希特勒青年团。对很多德国年轻人来说,共产主义是可恶的,而纳粹是最好的选择。

他们给在动荡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带来了希望和稳定的组织结构。民族社会主义者们关于自我牺牲和纪律的观点也在强大的德国形象中找到了例证:弗雷德里克大帝的武士神、很多候鸟组织都信仰的“联盟式”的中世纪精神、以及兰格马克战役(Langemarck battle)中体现出来的十字军式的自我牺牲精神。如果说像荷尔德林(Holderlin)一样的浪漫主义者曾为德国年轻人的分裂而哀叹的话,那么纳粹可以把国家和年轻人都变得完整而强大。

在绝望的环境下,非理性和权力的吸引力就显得尤为强大。希特勒一掌权,异议就不会有存在的机会了:那些不同意他关于新世界观点的人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在希特勒的世界里只有严格的黑白两色:要么同意,要么反对,这和很多青少年和宗教狂热分子的观点一样。1933 年 2 月发生了国会大厦纵火案,很多人认为这是纳粹自编自演的,在这个事件之后,民族社会党人进行了一次内部突袭,到 7 月为止,他们成功地驱逐或制伏了几乎所有的反对派。

3 月,希特勒被授予非常时期的非常权力。根据萨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说法,这种权力包括“废除言论自由、废除所有私人邮件和电话的机密性、警察搜查、取证、征用和逮捕的权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新一轮的选举中,希特勒把共产党排挤出了国会大厦,并且通过了授权法案(the Enabling Act),有效地扼杀了德国的民主。一周以后的 4 月 1 日,对犹太人的经济抵制计划也开始实施。希特勒政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也在同一时间组建起来。

春天和初夏,工会被接管,罢工被禁止,最后,社会民主党被废除。马格斯·西谢腓博士的性学研究所(Sexual Science Institute)被洗劫一空,所有的藏品,包括

几千本书,都被焚毁,而这些焚烧的画面则被传到世界各地。这些官方行为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恐怖活动:殴打、射杀、未经审判而把人关押在仓促建成的战俘营。整个工人阶级地区都被警戒线隔离进行肃清,尤其是左翼势力地区如汉堡的阿尔托纳区和柏林的威丁区。

法律和暴力并举的现象得到最新技术的支持。广播成了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主要工具,这种宣传手段是无止尽的,利用“永不停止的进行曲和鼓声”来进行自我鼓吹。希特勒掌权后的几个月内,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纳粹德国是一个要完全控制全体人民的新国家。大众要永远忠于国家,没有人能游离于政权永无止境的要求之外。

德国的大部分人很快妥协了:1933年3月的好天气和持续不断的庆祝让很多人加入了纳粹党,这些人被嘲弄地称作“3月的紫罗兰”。哈夫纳越来越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分析了这个“严重精神崩溃”背后的原因:“最简单的原因,如果你看得深一点的话,可以说最基本的原因是恐惧,加入暴徒的行列以免被暴打。还有一个不太明确的原因是一种愉悦,统一带来的陶醉,群众的吸引力。”最后一个原因,是希望“成为看得见的成功的一部分”。

丹尼尔·格林1933年4月返回德国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最深切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当他住进一个“满是伊森无产者的儿子女儿”的青年旅馆时,他受到了“傲慢轻蔑的对待”。取代过去自由歌曲的是歌颂“行进中的冲锋队员”的军国主义赞歌。他遇到了一些候鸟运动的坚持者,他们告诉他纳粹将“毫不留情地对音乐家和乞丐”穷追不舍。就像他后来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梦想的终结;“很快,夜莺就不会在笼子里歌唱了:在现在的德国,能听到的只有皮靴的声音。”

\* \* \*

这个预言太准确了。青年人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占有特殊的地位。希特勒认识到很多生长于魏玛共和国期间的人不会把自己“内心的存在”向纳粹革命妥协,于是不遗余力地向下一代灌输思想,因为他们的价值观还没有形成。正如他在1933年所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站到你那一边,’我平静地说,‘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了……你会死去,但你的后代现在站在一个新的阵营里。不久之后他们除了这个新组织之外什么也不会知道。’”

就像纳粹的冲锋队员们强制查禁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派一样,希特勒青年团也

开始着手对付以前活跃而多样的德国青年运动。刚开始,很多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们认为有可能和新政权达成妥协。1933年2月27号,各政治领域青年组织的200名代表——纳粹、共产党人、童子军,还有社会主义青年——聚集在柏林的斯特丁内车站(Stettiner Station),试图找到一条可行的方法。但是,这一想法很快被当晚国会大厦纵火案(Reichstag fire)引发的镇压扼杀在摇篮里。

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巴尔杜·冯·席腊赫的直接目的在于吸引尽可能多的青少年进入这样一个垄断的系统。很多非政治的青年组织试图通过组建一个新的名叫“伟大德国联盟”(Greater German League)的联合组织进行抵抗,但这个组织也在6月瓦解了。只有宗教性质的联盟维持了下去:新教组织于1933年12月合并进希特勒青年团,由于和教皇碧岳十一世(Pope Pius XI)有约在先,天主教的青年团体虽然处于高压下,但还是维持到了1939年。

尽管冯·席腊赫外表阴柔,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1933年6月,他从希特勒青年团的青年领导人晋升为德国青年的领导人。这一含义是显而易见的。希特勒青年团变成了德国青少年唯一可以加入的组织,而任何反对这个官方青年组织的行为就是反对国家的行为。同时,要从事例如教师律师之类的职业就必须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而所有的工作也是青年团成员优先。在这样一个普遍失业的国家里,经济需要和政治意识一样强大有力。

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有很多理由:除了一些人只是为了加入一个团体外,其他人可能是由于同龄人和国家的胁迫、经济压力以及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确实有很多德国青年人加入到这个大部队里,其成员数从1933年初的10.8万人增加到年底的360万。巴尔杜·冯·席腊赫立刻为这个膨胀的组织设计了一种新的结构,男女都是按年龄来编制的:对于男孩来说,10岁以下的是儿童团团员(Pimpfs),10到14岁的组成少年团(Jungvolk),14到18岁的就是希特勒青年团(Hitlerjugend)。对于女孩来说,10到14岁的组成少女团(Jungmadel),14到18岁的则编制进德意志少女联合会(Bund Deutscher Madel)。

希特勒青年团的管理系统是一个类似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坐镇顶端的就是冯·席腊赫。他下辖5个大区,再下面是21个分区,每个分区又可以分为6级。最底层的是小组,每组15人,直接对他们的组长负责,组长又对上一级的长官负责。这一系统是纳粹党等级制度的复制品:年轻人从很小的时候就被训练来适应这样一个结构清晰纪律严明的制度。他们长大以后,这种等级观念已经根深蒂

固,反抗即便不是不可能的话,至少也是难以想象的。

希特勒和冯·席腊赫都希望建立一个对德国年轻人进行一辈子控制的系统。希特勒把这个国家对分级的狂热以及纳粹对极权主义的追逐嫁接到巴顿·鲍威尔童子军的军国主义上。每个新成员都要以上帝之名起誓忠于组织,这样就使得背叛的罪过更加严重。入社仪式过后,新成员要经历2到6个月的试验期,最后要通过一项包括体育、近距离搏斗以及党史在内的考试。

一旦正式加入,希特勒青年就会收到发放的军服,体现了当局在青年管理上的统一性。基本的男性装束和纳粹冲锋队员的军服很相像:褐色的衬衫、卐字的臂章、黑色的短裤、还有军用防水帽。女孩子则穿沉重的行军鞋、白色上衣、蓝色裙子,棉制围脖上有刻着组织徽章的环状物。唯一允许的不同是他们肩上表示不同级别的肩章以及代表所属武装力量的徽章。

每天数小时的运动、体操以及军事训练就是希特勒青年的生活重心。俄里卡·曼恩(Erika Mann)在其作品《野蛮人的学校》(*School for Barbarians*)里引用了1933年一本手册上的希特勒青年的课程表,包括像“投掷炸弹”之类的“和平运动”。丹尼尔·格林警告说“一代人正在公然地进行自我准备。他们不用强制性地服役,他们觉得通过背负行装在路上行军、进行遭遇战演习、在练习场上匍匐前进、敲打旧锅子来对城市居民进行防空演习等等方式扮演士兵是很有趣的。”

军事的教化开始得很早。正如一个学员记得的那样,“我们在德语课上大部分的阅读材料是关于世界战争的文学作品,但是我們都很自觉地读了。”他记得这些书大部分是关于“前线的同志情”和行动中英雄式的死亡,但是也有变化:“青年运动英雄、‘两个世界间’敏感的流浪者、‘兽性的布尔什维主义部落’的无情斗士、蔑视人类的人、技术装备精良的武士、《钢铁风暴》(*Storms of Steel*)里贵族掠夺式的20世纪英雄。”

纳粹在那些要求机械学习和盲目服从的课程里加入了一轮常规的运动项目。这背后的基本理论在希特勒1927年的宣言《我的奋斗》(*Mein Kampf*)里说得很清楚:“民意国家要调整其教育项目,不仅仅要重视知识的教化,首要的是彻底增强国民体质。与此相比智力水平的发展是第二位的。但是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必须优先发展坚强的意志和决心,另外要时刻准备着承担责任。”

这一理想最完美的体现是在莱妮·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所拍的描写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电影《奥林匹克:美丽的节日》(*Olympiad: Fest der*

Schönheit)里。在一幕幕令人震撼的场景里,一排又一排完全一样的金发年轻人穿着灵活的运动装,耀眼地站在阳光下,成百地展示他们同样夺目的结实的身體。对德国年轻人的体质教育开始于他们10岁的时候,那时候有潜力的“少年”会经历一个为期6个月的试用期,在这期间要通过诸如12秒内跑完60米以及36小时徒步行军等困难的体能测试。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在服兵役的过程中传奇也产生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兰格马克战役。由于铭记“服从命令是最重要的、自我牺牲是终极理想”等观点,纳粹教育出的年轻人就在此战役中迫不及待地书写了传奇。当局者擅长制造盛大而神秘的场景,《意志的胜利》这部政治宣传记录片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这部片子融行军、歌曲、音乐、灯光、舞台和演讲为一体,让人叹为观止。

这些手段也被用在为新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女少年儿童团团员举行的常规欢迎仪式上。这些标志着儿童期以及个性终结的重要仪式经常是在4月20日希特勒生日那天举行,地点一般选在恢宏的大厅或者装饰有火炬、横幅、蜡烛以及德国英雄照片的城堡里。10岁的孩子们在那里宣誓:“我志愿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始终以爱和忠诚效忠元首——上帝保佑我吧!”

这就是希特勒关于新一类的德国超人的设想,从儿童时期起就在纳粹严酷的熔炉里进行锻造。“我想再一次在那些年轻人的眼睛里看到骄傲的光芒和捕食猛兽的独立性。”他在1933年说,“我的年轻人们必须强壮而英俊。我会让他们经受体能的全面训练。我计划拥有身强力壮的青年人——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最主要的事情。由此我将根除人类千百年来的驯化史,我的面前将出现纯洁、高贵而又自然的材料,有了他们我就能创造新秩序。”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拖垮魏玛一代的怀疑、软弱和自我沉沦完全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对希特勒来说,德国的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和皮革一样坚韧,和猎狗一样灵活,和克虏伯钢铁一样坚强。”这些词语被充满激情的青年拥护者们当作真理来记诵。梅丽塔·玛舒曼知道“我们需要拥有的‘坚强’是‘接受惩罚’时表现出的坚强。我认为我们在面对困境、惩罚和苦痛的时候都得学会坚强。”热爱德国是最重要的,正是在这种热爱中年轻的纳粹分子“希望使自己变得‘坚韧、灵活而坚强。’”

玛舒曼一有机会就离开学校加入到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新闻宣传部中。“我想以政治教化民众,当然,是以明确的民族社会党人的路线来教化他们。”她是少

数几个享有特权的人中的一个：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女性和男性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最理想的是从事家政工作、生孩子以及干田间地头的农活。少女团和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结构和活动都很落后。对于女孩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的或者精英的组织——所有的女孩都差不多，就是用来做服务工作和生育下一代的。

希特勒青年团任何分支中的生活都是残酷的：持续的紧张状态满足了青少年们行动的需求。理想就是充实一天当中的任何一刻。不管是体能训练、文化作业、社会指导，或者甚至是必须参加的讨论政党目标的非正式“家庭聚会”，一切都是在竞赛。这种无尽比赛的结果就是个人内心生活的减少。冯·席腊赫以每一年的目标项目来命名这一年，这也加强了组织的管理。1934年，也就是开始实施这一政策的第一年，被称作“训练年”。

这个组织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青年人是由青年人来领导的。1932年纳粹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年领导人都只有20来岁。年轻人们在希特勒青年团中每天的生活都是由同龄人而非等级中的长者来领导，这样他们在这个新政权里就占据了中心的重要地位。他们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帝国的活力种子，而且是社会系统里的中心支柱。正如冯·席腊赫不厌其烦地一再重复的那样，民族社会党是“青年人的政党”。

代间的关系一举颠倒了。青年人现在处于支配地位，而且用“一种冷淡的傲慢”来表达他们的优越性。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以后，这种傲慢对新的政权来说是有用的：既然“青年人的时刻”已经来临，很多希特勒青年大起胆子回敬“自由资本主义的伪善”。他们以一种“啤酒瓶战役”的方式扰乱学校生活、打破给他们低分的老师的窗户、帮助在小学和中学里发动清洗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运动。

纳粹教育的方针很简单，他们仇视理性，怀疑知识。每个年轻人都被反复灌输对元首的个人崇拜以及“人民共同体”推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政策，认为雅利安人种是“文化的缔造者”，他们仇恨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毁灭者”。纳粹的意识形态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是诠释右倾思想的诗歌，还是关于犹太人是异族的问题。像经典作品、艺术以及大部分科学类课程被取消，男女之间的差别变得格外悬殊。

在这种颠覆一切的政策指导下，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变得混乱了。梅丽塔·玛舒曼不得不秘密地加入德意志少女联合会，因为她的父母不同意。持异议的或者慎重的父母可能还是会暂时阻止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是总体来说加

人这个团体才是大势所趋。如果父母不让孩子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可能会被罚款甚至面临监禁。一些孩子甚至被带离其父母身边,因为这些父母“政治上不可靠”——这个罪名也加在那些帮助犹太人的人身上。

这就造就了一个镜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取代父母居于控制地位。积极的青少年告发父母的情况时常发生。一个名叫瓦尔特·赫斯(Walter Hess)的希特勒青年团年轻领袖因为直接向国家秘密警察组织揭发其父亲而声名远扬并得到晋升。作为一个前共产党人,海赫·赫斯(Herr Hess)称元首为“嗜血的疯子”,并且批评儿子参加纳粹活动的行为。当天晚上他就被捕了,死于达豪集中营(Dachau)。希特勒青年团的告密者们不断地报告发生在学校、工作点和家里的对话。猜疑变成了家庭生活的基调。

对付不参加青年团的人还有另外一个强大武器,那就是排斥,这个方法简单可行,因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必须一直穿着制服。落后分子受到同龄人的捉弄、老师的侮辱,如果是成年人还要接受处罚:例如,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身份对教师或公务员来说是必需的。如果孩子不参加青年团,他们的父母也不会得到晋升。更顽强抵抗的一些人由希特勒青年团专属的警察力量来对付,所谓的专属警察力量就是建于1934年7月来监管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无纪律行为的巡逻队(the Streifen dienst)。

这一结构的中心就是元首本人,对很多人来说他取代了生父的地位。1934年的纽伦堡集会上,青年人在一种狂热的氛围里举行了游行。希特勒抓住这个机会重申了青年人在其新世界秩序里的地位:“我们需要的是如燧石般坚硬的人,我们希望你们从少年时就能学会克服困难和逆境。在我们的人民之间没有阶级之分或者阶级差别,你们永远不能让阶级差别的意识在你们中间扎根。未来德国的一切都寄托在你们身上。”

希特勒与青年团孩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状态正是冯·席腊赫希望看到的,他提出了“你的名字,我的元首,是青年人的幸福;你的名字,我的元首,对我们来说就是永垂不朽的生命”之类的口号。希特勒的神性在一股强烈的青年宣传潮流里得以强化:希特勒青年团的广播和杂志通过销售纳粹党的小玩意以及元首本人的半身像瞄准了任何年龄层,而元首半身像几乎成了孩子卧室里无处不在的固定装置。对于够幸运的人来说,真正遇到这个伟大领袖的机会还是很多的。

\* \* \*

尽管当局采取高压政策,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也愈演愈烈,一些青年人还是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是,这种抵抗也找不到其他可供选择的组织。前共产主义者,青年J.纪尔基(J. Georgi)“在1933年大部分青年运动领导人都已在民族社会主义者面前屈辱地投降时”感到了“难以忘怀的失望”。新的法律是:修正或死亡。这种逐个击破法是纳粹经过深思熟虑后实行的战术,在一种恐惧、猜疑、谴责夹杂的氛围里,就连每天的人际关系都是不确定的。

持不同政见即使不足以致命的话,至少也是困难的。根据一个成功拒绝加入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德国青年卡玛·劳胡特(Karma Rauhut)所说,“这就像你在一张蜘蛛网上,即使你在某个地方振动一下并不真正发出声音的话,蜘蛛也总是能注意到。人们会说,‘嘿!你可以逃啊。’我们能逃到哪里去?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只能抵抗。到处是令人恐怖的折磨,同时也是对你整个家庭的折磨,还有死亡和集中营。我们都不是英雄。我们害怕得尿湿了裤子。不是所有人一生下来就有英雄气概的。”

拒绝服从的人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无尽的紧张状态中。正如纪尔基回忆的那样,“我们中的一些人经受不住这种难以忍受的紧张,也屈服了,尽管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内心。”抵抗可以被看作这种心理死胡同的一个出口:用异议者阿诺·克隆(Arno Klonne)的话来说,“这是对强加在青年身上的监狱组织的一种健康的抵制。”在他们刚刚执政的几年里,纳粹不得不应付在魏玛政权下长大的青少年,这些人不愿意放弃自由,因此给当局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旧的青年组织的残余试图继续他们的行动,但是他们太容易自我暴露然后被取缔。在新政权建立的第一年,一个名叫鲁道夫·库斯特曼(Rudolf Kustermann)的年轻学生组建了一个非法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取名“红色冲锋队”(the Rote Stosstrupp),把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青年组织结合起来,但这样做太晚了。它以柏林为据点,吸收大城市里的其他小团体,但是很快就被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组织发现了。持续时间长一点的是武士风格的非法组织d. j. I. II,它在10年里一直存在于几个城市中。

一些叛逆者选择像旧的候鸟运动那样前往开阔的乡村,但是这些组织都是非正式的,这种做法因为不容易被发现所以更成功。青少年们偷偷地溜出城镇,建立秘密据点或者山区隐退处。尽管警察对这种反抗行为报告得很多,这种对旧的

自由流浪精神的继承仍然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150名法兰克福异议者在成功迁徙到陶努斯地区以后,聚集在了一个地势低洼的荒原上。

工人阶级联盟很难消亡。在莱茵-鲁尔(Rhine-Ruhr)地区,来自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the Socialist Worker Youth)、红色猎鹰(the Red Falcons)、联盟(the Bunde)还有天主教组织的反叛者们合并成大型的特殊违法组织,取名为尼禄泰拉海盗团(the Kittelsbach Pirates)。由于规模庞大,而且了解当地情况,他们公然反抗希特勒青年团,最终使这个组织在某些地区“事实上消亡”。而最坚定反抗纳粹的是天主教青年组织,他们在被明确命令并入希特勒青年团后仍然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希特勒青年团内部也存在管理的问题。就像很多成功的垄断组织一样,它的突然扩张超出了自身的容纳能力。青年人领导青年人的做法也暴露出一些结构上的缺陷。对以前的青年组织进行强制性接管让当权者很担心系统内部会有颠覆破坏分子。一些内部的反对派于1934年冬天策划了误报和违抗的活动,在一些大城市造成了暴力的“少年队叛变”(“Jungvolk rebellions”)。

由于缺乏成人监管,频繁的不正当性行为成为一个问题。同性恋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在一起严重的“道德堕落”案中,16名亚琛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沉溺于集体的相互手淫。但是组织内部的异性乱交行为却得到当局的宽容:正如冯·席腊赫的一个助手所说的,“除了上床,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女孩们还有什么用呢?这是必须的,因为不这样的话她们可能会变成同性恋。”当地组织的这种极端行为给父母们留下了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存在“某种堕落”的印象。

但是不同的政见仍然存在,如同森林之火一样蔓延:在一个城市被扑灭,又在另一个城市燃起。冯·席腊赫因此决定把1936年命名为“德国少年队年”(“Year of the German Jungvolk”),旨在希望出生于1926年的所有男孩女孩——他们在那一年刚好10岁——能够“自愿”地为元首的生日及时组建成最年少的希特勒青年团组织。在几乎达到了全体注册率以后,冯·席腊赫又试图把这种全面招收扩展到18岁,超过18岁的成员必须进入武装力量,如冲锋队(SA)或党卫军(SS),或者强制性地服陆军兵役。

1936年12月通过了“关于希特勒青年团的法律”(“Law concerning the Hitler Youth”),任命冯·席腊赫为“德意志帝国的青年领袖”(“Youth Leader of the German Reich”),直接向希特勒负责。法律条目很简单:“1.在帝国疆界之内的所有

德国青年都受希特勒青年团支配；2. 所有的青年都应受到家庭和学校以外的教育，在希特勒青年团以民族社会主义的精神指导加上服务国家和组织的决心接受体能、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全面教育。”这个详尽的法令代表了纳粹青年政策的最高点。

希特勒青年团已经被巩固成纳粹的特权阶层，但是这个法令颁布以后，这个组织和纳粹的精英部队党卫军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新近被任命为国家警察局局长，目标每年吸收2.5万到3万名希特勒青年，大概是每年可征召入伍的总人数的10%。几百名18岁的青年开始效力于党卫军军事分队(SS - Verfügungstruppe)、党卫军特别机动部队(SS special - duty troops)、或者党卫军骷髅总队(S - Totenkopfverbände)，这支死亡部队专门负责集中营的工作。

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希特勒青年团的警察力量巡逻队之间的联系也得以加强，巡逻队在1937年上半年获得了对“德国青年中的所有政治犯罪活动”进行监管的权力。这个组织那时候能够在希特勒青年法庭上提起诉讼，以及为常规的民事法庭提供信息。1年以后，巡逻队的职责范围从监督希特勒青年团青年扩展到监督所有德国青年：到那个时期希特勒青年团青年和德国青年已经是同义词了，而希特勒青年团也成为党卫军成员最重要的后备力量。

\* \* \*

1936年的法令通过以后，希特勒青年团青年变得受人尊敬，他们基本来自于中产阶级，因为三分之二的领袖阶层毕业于语法学校或者有大学教育背景：这些人取代了革命时期的工人、农民还有无赖。希特勒青年团进一步由一种新的精英教育系统推动。这种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由于德意志民族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sanstalten)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Adolf Hitler schools)的建立而产生，在这些学校里运动至上，而且无时无刻不在灌输纳粹的意识形态。

希特勒青年团的英雄阶段已经结束，他们已经赢得了战役。1936年以后，18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机会逃脱政权的支配。但是，30年代末的几年里，这个全国性的青年组织遭遇了无法预见的紧张。它已经从革命的冲击波变成一个拥有独立管理人员和成员结构的新机构。为活动而活动的政策让这个组织变得越来越

军国主义,过分严格的管理使这个组织开始走下坡路。也正因为如此,它就要求成员更绝对的服从。

尽管纳粹政权具有神秘的吸引力并采取高压的极权手段,它还是没能完全控制德国青少年。20世纪30年代末,在德累斯顿、汉堡还有慕尼黑这些大城市里,团伙们又继续采取了旧的候鸟运动的生活方式,而“莱比锡群”(Leipzig Meuten)则搜集了批判政权的数据,计划用暴力推翻它。他们的口号是俄国先驱者口号的断章版本:“准备着。”这个组织的规模(多达1500人)及其明显的共产主义倾向使其成为大规模镇压首当其冲的目标。

部分的问题在于纳粹对青少年自治的鼓吹,正如德国的流放者在1938年报告里注意到的:“就情绪而言,年轻人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影响。这一事实使当局者在夺取政权后的头几年里更容易赢得年轻人,但是现在似乎是这同一事实使当局者要永远奴役年轻人变得困难。”以普通情绪“清醒”为例,报告总结说“年轻人有理由特别失望。他们得到了特别多的许诺,但是这种许诺大部分是不能实现的。”

幻想的破灭带来了一股新的压制潮。1938年12月,希特勒对其针对德国青年一生的策略作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表述,这种策略在他们10岁进入儿童团的时候就开始了。18岁一离开希特勒青年团,他们就被吸收进劳动阵线、冲锋队或者党卫军。如果他们错过机会的话,可能会被调入劳务公司。任何坚持“阶级意识”的人都会被追加2年的兵役,在此之后“我们立即把他们带回冲锋队、党卫军以防止其故态复萌,他们的余生再也没有自由可言。”

从1938年开始,人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看出德国正在为一场更广大范围内的冲突做准备,而在这个冲突中青年人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那一年,125万希特勒青年接受了“防御准备”和以清楚的军事目标射击与地势演习训练为内容的“防御能力”的教育。同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数达到870万,是1933年底成员数的2倍还多。就像巴尔杜·冯·席腊赫警告的那样,“任何德国血统的人都属于我们的组织。在青年人的旗帜下,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到第二年,820万德国青少年中只有160万没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是这种程度的服从还是不够的。1939年3月,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令,强制规定所有16到18岁的青年人服兵役,并且给予了德意志青年团的领袖们干涉组织生活方方面面的特殊权力。这项法令使违抗变得尤为困难:警察可以强迫青少年加入,要求他们服从当地领袖。希特勒的计划离实现更近了:对于所有的10到18岁之

间的德国青年来说,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组织的支配。

纳粹德国是第一个把大众控制的原理应用到青年人身上的国家,这和它创造一个全新社会的要求相一致,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在其制度中给青年人以特权的国家。确实,对很多青年人来说,这种政策提供了以前难以想象的自由。但是,由于陶醉在这种革命里,他们没能注意到这种浮士德契约的另一面:看似自由其实是奴役,最终他们会被捆绑着封上嘴巴送入复杂无情的战争机器中。

## 19

### 儿童军团和新政

经济萧条中的美国青年

他从经济大萧条的第二年开始就衣衫褴褛。他之前那些快乐的前辈们开快车，他却只能扒火车。他的家人从一所大房子搬到公寓再到一个单间，他和他家族的几代人一起挤在这个房间里，直到他流浪街头。他就在铁路侧轨的货车车厢里度过那些疲倦的夜晚，他没有任何梦可做。他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

——克林奇·卡尔金斯，《青春一去不返》(1933)



这个男孩已经在街头住了4年

“1932年8月24日。和老人斗争。他没权力指挥我。收拾衣服离开。爬上装满家具运往路易斯维尔的一辆货车。两个人开车。他们是好人,给我饭吃。睡在货车里。他们轮流开车。我们从一个农民那里偷了一些甜瓜和苹果。”这段不连贯的日记是由一个名叫布林克的流浪男孩写的,代表了经济大萧条期间全美25万流浪的“货车车厢男孩女孩”的典型命运。和魏玛德国末期他们的同龄人一样,他们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钱,也没有成人监管。

布林克关于流浪的简单记载被托马斯·迈汉(Thomas Minehan)抄录下来供后人阅读,1932年这位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年轻社会学家决定要记录美国国内“青年人对社会变化的反应”。他穿着“破烂的衣服”伪装自己,以便混入这些年轻流浪者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流浪的男孩女孩数量如此之多让他感到震惊:“他们的家在哪里?他们将去向哪里?他们住在街头已经多久了?他们为什么离开家?”

这些日记不是感情或者思想的文字流露,而是活文献。对街头情况的了解可能意味着生或死的差别。迈汉把经历中的感想最小化,只强调观察到的事实,比如“住在白色大房子里的胖女人给我3根猪肉肠,4杯咖啡,还有我想要拿来当早饭的所有薄饼……我离开院子的时候被一头牛吓了一跳。充满敌意的城镇……为上帝传道已经没有用了。除了咒骂和苦难,什么也没有。”

布林克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荷兰男孩,他在去西雅图的路上在俄亥俄州遇到了迈汉。他的日记记录了自己在美国中西部地区漫无目的长期流浪的经历。有一些人挺和善,另外一些人则非常“苛刻”。一个小镇上的罗马天主教会给了他吃的,但是让他“在外面的走廊上吃”。有个农民给他提供了工作,但是报酬少得可怜:“只给25美分。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不喜欢他。”在整个旅程中,他都苦于警察的盘查:“在谢尔比维尔,警察抓住我,把我送进监狱,必须工作2小时才有中饭晚饭吃,整个晚上呆在牢房里,一共六个人。不好。”

布林克脱离家庭的轻松感让他熬过了刚开始流浪的几个月。但是经过一年

的艰辛生活后,他不再认为这个世界“是很有意思的东西”。他精神和肉体上都伤痕累累。迈汉记录了“他离开父亲的农场时两只眼睛都是好的。现在他只有一只了。在他的左半边脸上留下了一个不断渗血的小窝。眼泪冲刷着灰尘和油渍,在他的脸颊上画出长长的条纹,并且在鼻子旁边留下一个奇怪的有分泌物的伤疤。他在圣达菲的时候由于未烧尽的煤渣吹进眼睛失去了这只眼睛。”

迈汉是第一个揭露 20 世纪 30 年代年轻流浪者生活全景的作者:他的《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Boy and Girl Tramps of America*)出版于 1934 年,他的研究让人们加深了对国家所处严重状况的了解。主流杂志登了一系列的文章,如马克森·戴维斯(Maxine Davis)的《20 万流浪儿童》(“200000 Vagabond Children”),由此“儿童军团”反映出的“青少年问题”在 1932 年秋季成为头条新闻。这一类故事正式宣告了作为这一时期代表的新一代出现了,他们和 20 世纪 20 年代自信的消费青年相比完全不同。

像布林克、或者迈汉忠实的伙伴德克萨斯这样的青少年代表了结成松散团伙的一种新型的野孩子。但是他们和德国的野蛮团伙不一样,他们没有机会充分表现自己的狂野。无家可归的严峻形势使他们不可能组织起来,也偷走了他们的青春。“我看着德克萨斯在一年当中不但肉体上发生了改变,心理上也变化了,”迈汉写道,“他冻伤的耳朵和僵直的手指是心理变化的外化表现。他从一个明媚机智、满怀梦想和活力的美国学生变成了一个阴险而且充满掠夺性的人。”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一个名叫芭芭拉·斯达克(Barbara Starke)的大学生决定漫游全美,以寻求自我实现。她的经历独一无二,最后写成了一本非常成功的书:《生于圈养》(*Born in Captivity*)。然而对她来说是不落俗套的流浪行为,对于很多下一代的孩子来说,却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可怕经历。在这样一个大部队里,没有任何独特性可言,而所谓的人类同情心也很快消失殆尽。由于政府对此置之不理,这些年轻的流浪者们又回到了 20 世纪早期改革者们努力希望改变的那种恶劣生存环境中。

对于和迈汉一样的年轻激进者来说,这样的状况足以让他们质疑美国社会的本质:“我曾经看过受革命伤害的俄国野孩子的照片。我也读过描写世界大战后德国自由青年的书。我知道在每个国家,瘟疫、侵略或者革命过后,孩子们离开父母,变得流离失所。在我经历这一切之前,我总认为在美国我们能把问题解决得更好一点。但是面对经济解体和社会变革,我们的孩子们也流浪街头。”

这位年轻社会学家的调查是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家灾难最深重的时候进行的。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经济危机都很严重,但后果都远远比不上这次经济大萧条。从1929年秋季到1932年夏天,股东们在每况愈下的股市里损失了740亿美元,相当于每个美国人损失了616美元,几乎有5000家银行破产,流失了32.6亿储蓄款。这一切还仅仅只是开始。大萧条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在于它并没结束,反而持续地恶化。

20世纪30年代初,失业率一年比一年高,刚开始是影响社会上那些比较脆弱的、处于劣势的群体:黑人、蓝领工人、还有女性——1930年五分之一的的女性劳动力失业。到1932年春天,失业已经严重影响到中产阶级,没人能够幸免。7月,《纽约时报》报道说在5个区里已经有1万名美国名校的大学毕业生失业。

对那些没失业的人来说,生活质量也由于工资的减少而日益下降:调查显示,平均年收入从1929年的1499美元下降到1932年的960美元。同一时期,白领阶层的收入减少了40%。美国震惊了。20世纪20年代末延续的繁荣期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更关系到国家地位问题。工业和商业成为20世纪美国的神秘特征。大萧条不仅仅被看作一次经济危机,还被看作这个国家的中央信仰系统面临的一次危机。

在开始痛苦地自我审视的过程中,美国也开始向外看。经济危机对其他国家的的影响也很明显。1931年和1932年,关于革命的讨论变得非常普遍。在10万人移民去俄国争夺6000份技术工作之类的新闻报道催化下,时事评论员开始讨论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各阶层的美国人也开始表达建立一个不同社会制度的愿望。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会完全垮台,那些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当中会爆发暴力革命。

经济危机狠狠地打击了美国的年轻人。40%的高中适龄青年不能上学,而尚未毕业就提前退学的人数也开始增加。同时,青年失业率也大为增加。400万16岁到24岁之间的年轻美国人外出寻找工作:他们中40%的人还处于上高中的年纪。到1932年,流浪的“儿童军团”达到20万人,并且仍在迅速地增长。这个数目相对于140万10到20岁之间的青年总数来说是很小的一部分,却让人无法忽视。

家庭开始分裂。露丝·凯文(Ruth Cavan)在其作品《家庭和经济危机》(*The Family and the Depression*)中指出失业的结果在于家庭的“瓦解”。很多家庭搬到

小一点的公寓,这就意味着父母和孩子“比原来有更多的机会看到彼此,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小地方。没有隐私可言,摩擦增加了。”迈汉发现大多数年轻流浪者们是因为“岁月艰难”而离开家的。就像得克萨斯告诉他的那样,“大麻烦来了,没人有钱。”

迈汉调查的青年流浪者中有 90% 来自父母、兄弟姐妹失业或者接受救济的家庭。20% 的男孩子“经常挨打”。面对这种时不时就要被当作出气筒的恐怖环境,美国的孩子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流浪。这种情况超越了阶级之分。正如民主政治家牛顿·D. 贝克(Newton D. Baker)1932 年所写,“据社会工作者和其他每天接触他们的人说,今天的年轻流浪者一般都是来自殷实家庭的正常孩子。”

孩子们的这种反应完全符合美国的民族气质,美国是一个由流动劳动力建造的国家,人们的心中仍然涌动着边疆梦。正如《哈珀》(*Harper*)的作者莉莉安·塞姆斯(Lillian Symes)1933 年底所说,美国有着“激进的,甚至是异常激进的传统。但这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传统,而不是集体的激进主义。美国式英雄是个体的冒险家,而不是领导某些运动的领袖。无政府主义毫无疑问是最贴近我们性情的哲学,这在一个复杂的工业世界里也是最无用的。美国吸引着不安分的个人主义者。”



美国的年轻人不是唯一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人,很多年长的人也开始流浪,而且他们的数量随着中西部和南部平原连续几年干旱不断增加了。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受电影和汽车的影响,为了追求自由才去流浪的。1933 年,16 岁的吉姆·米歇尔(Jim Mitchell)决定从他威斯康星州的家出走:“最快最容易闯出去的方法就是扒火车去某个地方”,他回忆说,“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神奇的铁路浪漫史”。

选择离开最主要的理由是为了找工作。一些使用临时劳力的工作引发了季节性的迁移。夏天,人们可以去西部从事水果采摘工作;秋天,人们从乡村移往大点的城市。加利福尼亚因为气候温暖,成了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伍迪·格斯(Woody Guthrie)的《伊甸园》(“Garden of Eden”)在 1933 年底吸引着每月 1000 名青少年涌入好莱坞。这个城市太受青睐了,以至于它不得不对所有的流浪者“宣战”,1936 年封锁了几个星期的边界。

绝大多数的人选择坐火车,在火车上至少有互相保护的可能。但是就算是在这个简单的群体里面,也有等级之分。最上层的是贵族式的“流浪乘客”,也就是那些喜欢乘特快列车的年轻人,大部分的街头流浪者们乘坐的是货运列车。坐加利福尼亚水果专列的人仅次于“流浪乘客”,接下来是选择丝绸列车的人,再下来是乘坐快运货车的人,然后是乘普通旅客列车的人,最后是乘坐无盖货车、棚车、还有花岗岩货车的大多数人。

火车上存在很多危险,尤其是如果这辆火车不是用于客运的话。由于购买这种火车票的几乎都是年轻的盲流,火车得不到很好的维护保养,于是在寒冷的天气或者颠簸的情况下就容易翻车。上千不知姓名的人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了。与此同时,臭名昭著的被称为“公牛”的铁路警察会用任何他们觉得合适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管辖区。一旦火车停在一个小镇上,年轻的流浪者们就面临被投进监狱、强制做苦力、被殴打然后赶走的危险。

大城市则安全得多,他们停靠的第一地点是等待分配救济品的地方,可能是贫民救济会、救世军低级住所、或者市立福利站。登记以后,年轻流浪者们会领到一张身份卡,通常这张纸片能让持有人领到至少一顿饭。但也就是这样了。城市里可能更安全,但是工作和挣钱的竞争也更加激烈。找休息的地方也很困难。在经济萧条的初期,上千人睡在公园和公共场所。

年轻的出逃者们永远处于筋疲力尽的状态,因此很快就发现自己踏上的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吉姆·米歇尔曾经“以为流浪会是迷人的生活——‘上帝啊,我们要去闯荡江湖,外面的某个人需要我们。’”为了争夺工作机会,到处都是剥削和虐待。一些流浪的孩子甚至没有工钱只要有吃的就愿意工作。能做的工作都是临时的,通常和农业有关,干几个小时重活也就只有很低的报酬。

流浪的孩子们过早地变老了。俄亥俄州的一个社会工作者在当时的调查里总结说他们“不了解任何的金融安全,因为他们本身就来自因为这个原因而破裂的家庭;他们被折磨,被踢来踢去,并且被自己不能控制的事物搞得茫然。因为老得太快了,他们觉得失落而愤恨,他们咆哮着争取不能从自己群体内部得到的东西。他们太老了,却也太年轻了。他们看到了太多,知道了太多,却思考得太少。他们可能年龄上只有16到21岁,但是就某些东西而言,他们已经30岁了,再就另外的东西而言,他们或许才10岁。”

一些年轻的离家者们为了相互支持和保护而聚集到一起。10来人的群体会

一起流浪,住在他们自己的出没地。他们喜欢远离人类住所的地方。不管是在密西西比河排水沟的下水口附近,还是在靠近铁路的一片废弃开阔地,总会生活着近 50 个年轻的流浪者,他们自己管理自己,完全就是一个微型社会。迈汉发现“这些流浪的孩子自己解决自己的事情,他们生活在社会之外,他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条例,推举领导人,不假长辈之手实施惩罚。”

冲突无处不在,任何原因都可以引发冲突。最普遍的原因是种族问题。黑人组成了一小部分流浪者,根据 1935 年的调查显示,他们只占全体 15 到 24 岁年龄群体的四分之一。对很多同龄的白种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经历没有种族隔离的状态,大多时候他们能够宽容相待。但年轻的黑人都很敏感,并且始终都有性妒忌的因素存在,迈汉记载了一群“17 岁的黑人男孩”夸耀他们“和白人女孩或者妇女发生关系”,这样一个混合状态在流浪者们没有法律存在的世界里是极其危险的。

这种情况在 1931 年变得更加明显,9 个 12 到 20 岁之间的黑人组成的团体在亚拉巴马被捕。对于这些斯科茨伯勒男孩 (Scottsboro Boys) 来说,流浪生活在噩梦中结束了,这个噩梦会困扰他们一辈子。“我们所有人都为了相同的原因爬上了货运列车,那就是去某个地方,找到工作”,海伍德·帕特森 (Haywood Patterson) 回忆说,“我们的家庭很困难。我只认识来自查塔努加的另外 3 个人。我们的父亲养不活我们,我们想帮忙,或者至少也要填饱自己的肚子。我们扒上了开往孟菲斯的列车,这个时候斗殴发生了。”

这 9 个人当中有 4 个登上了一节货车车厢,里面一些地方堆满了碎砂,另外还坐着 2 个穿着男人罩衣的年轻白人妇女以及另外 7 个年轻男人,这个时候麻烦来了。有人开始骂人:“黑杂种,这是白人的列车。你们最好滚下去。你们所有的黑人杂种最好都滚下去!”帕特森以牙还牙地还击了侮辱,白人们撤了。不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但是帕特森得到了另外 5 个“黑人兄弟”的支援打败了挑衅者。在其中一个白人将要摔下疾驰的列车时,帕特森出手救了他。

但是,火车停在下一站的时候,所有参与斗殴的年轻流浪者们都受到武装民防队的检查,并被投入斯科茨伯勒监狱。在那里 9 个黑人小伙子发现那两个白人姑娘,鲁比·贝茨 (Ruby Bates) 和维多利亚·普赖斯 (Victoria Price) 告他们强奸。帕特森认为这是因为“那些白人家伙因为我们的大胜觉得很恼火。”指控在亚拉巴马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从他们被抓的第一刻起,斯科茨伯勒男孩们就面临着私

刑和一个几乎确定的死刑结果。

审判过程很荒唐,在此期间起诉者竟然敦促法庭,“不管有罪没罪,让我们干掉这些黑鬼。”审判结束后,9个人被判有罪处以死刑。尽管抗议声如潮,但是亚拉巴马法院介入,第一次重审以后,还是把他们判处死刑。这一次,司法私刑成为全世界范围声讨的丑闻:参与讨伐的人很多,包括南茜·库纳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欧洲和美国还举行了一系列示威,并在1933年5月的一个盛大抗议游行中达到顶峰〔1〕。

斯科茨伯勒男孩一案揭露了美国种族关系的阴暗面以及流浪的孩子们相互竞争的状况。由于经常和黑帮混在一起,一些流浪的孩子就开始通过购买枪支和勒索钱财来模仿歹徒作风。对于当局者来说,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对把自己逼上这条道路的社会充满了愤怒。和其他的年轻专家一样,迈汉认为布尔什维克思想正在抬头:“实际上所有街头的男孩女孩,不管是不是共产主义者,都相信如果情况没有改观的话,美国很快就会发生一场革命。”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青少年作为新的大众消费主义的旗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他们成为了“萌芽期的买主”和“明天的顾客”。但是经济危机过后,这种优势已经蒸发了:用一个中年流浪者的话说,感觉就像被“剥夺了王储身份”。尽管成为流浪汉是一种极端的反应,在这样一个把年轻人理想化的国家里,流浪的男孩女孩们还是提醒了人们:灾难已经降临到这个国家头上。

这本不应该发生。仅仅是这些年轻流浪者的存在,更不要说他们的外貌和行为,就引发了令人震惊的公共论战。他们的出现告诉大家,不管是我们还是我们的国家都没有未来。《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站在他们这一边,预言大萧条过后美国将进行变革。禁酒法案后消退的变革冲动重新回到了这个“流氓和掠夺者猖獗”的城市。

改革者们警惕地盯着俄国和德国,他们很关心革命的可能性。但是,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体现在流浪者们对虚幻边疆的追求上——使他们无法采取集

---

〔1〕 这次游行过后,亚拉巴马当局被迫命令再次重审,还是判处帕特森和克拉伦斯·尼姆斯(Clarence Neems)死刑。尽管判决结果被美国最高法院推翻,帕特森于1936年1月要求第四次重审,被判处在亚拉巴马监狱服刑75年,“活受罪”。9个人当中的4个在1937年夏天终于被无罪释放,但是帕特森失去了父母。“在那之后一切都毁了。我什么也不信,我恨每个人。”

体作为。尽管国家的劳动纠纷急剧增加,例如1932年3月发生的反福特汽车装配厂的大游行,共产主义还是没能在大众运动中占上风。年轻的美国共产主义者确实存在,但是他们和同龄人相比只是极小的一部分。

但是,青年问题专家和父母们一样注意到:即使是在大部分的仍然以工作或者职业(男孩)和婚姻或者家庭生活(女孩)来定义未来的年轻人中间,也存在一种新的不满情绪。罗伯特和海伦·莫瑞尔·林德1935年6月回到芒塞以后,发现在他们第一次访问之后的10年里,“年轻人中一种更自觉的亚文化已经成长起来了。”他们观察到“随着成年人世界在大萧条中分崩瓦解,成年人要求青少年顺从父母、学校和公众观点的这些限制进一步减弱。”

生于20世纪10年代晚期的年轻人正融入一个与他们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面对的不是青年消费的繁华景象,而是失业的威胁。这种情况让他们日后更倾向于反对成年人世界的严酷监管,而这种倾向在所有阶级所有年龄的人都公然反对禁酒法案的潮流下愈发明显。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禁酒法案已经消磨了人们对法律和所有权威的敬畏之情。正如某个高中团体1932年接受《父母》(*Parents*)杂志采访时所说的,“你们不能谴责我们怀疑你们的标准,有些标准……实在是太愚蠢。”

在这种氛围里,顺从的旧观点已经不再有约束力。基督教青年作家W. 赖兰·布尔曼(W. Ryland Boorman)在其1931年出版的《少年的个性》(*Personality in Its Teens*)一书中引用了他的一位高中校友的话:“你抓住一个17岁的少年,用铁腕手段控制他,约束他。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他和我一样的话,那么不久之后你就会得到一个闷闷不乐的、背后伤人的倔强少年。这个少年可能参加主日学校、为教会服务、或者加入教友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不久之后,他可能冲破所有束缚,不懈地追求一个更自由的氛围。”

这不亚于代间的斗争。“我们的印象是:历史上任何两代美国人之间都不可能经历现在的美国父母和孩子之间在态度和行为上的这种巨大分歧,”林德夫妇总结说,“社会变化的累积速度,包括从工商业到宗教、教育、性和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在以一种类似几何比例的方式加大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分歧,过去“正确”的东西和今天合理的东西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

美国的青年人再一次成为了问题的焦点。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前10年里为青年而唱的赞歌已经被忧虑和批判所取代。国家的将来危如累卵。托马斯·

迈汉在他对年轻流浪者所作调查的结尾处,充满激情地呼吁政府的干预:“明日的美国青年必须得到引导。他们必须得到一些人的引导,这些人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国家将去往何处,以及他们希望青年人去往何处。”

\* \* \*

尽管“儿童军团”问题越来越突出,很多的美国青少年还是能继续上学。虽然受到大萧条的影响,但美国还在上高中的17岁青年人数与1900年相比,还是上升了至少5到6倍。在这种高中教育体制里,青少年完全处于一个同龄人的世界中。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认为自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一样,如今他们上高中的弟弟妹妹们也有相同的感受。

年轻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开始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林德夫妇注意到在米德顿中心高级中学,“全方位的文化包容和文化排斥并存;有些父母认为涂指甲油、涂胭脂的女孩‘可爱’、‘有吸引力’,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知道怎么掌控男孩子”;另一些父母试图减少电影对自己女儿的影响,希望她们‘单纯’、‘自然’、‘心灵健康’。这些来自不同家庭的女孩们坐在同一个教室里。”

对于瑞兰德·布尔曼来说,美国高中的同龄人世界一方面体现了未来的所有希望,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家庭和教会的影响”。他观察到“空闲时间的增加也意味着零用钱的增加,这会导致一些新问题。这一代的年轻人疯狂追求享乐的程度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是令人惊愕的。男孩女孩关系上的新自由毫无疑问是主因。”

同伴之间的攀比是20世纪30年代早期教会和童子军组织针对美国青少年而创办的一系列新杂志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些杂志包括《美国女孩》(*American Girl*)、《每个女孩》(*Everygirl*)和《学生杂志》(*Scholastic*)。一名高中生问《每个女孩》,如果她被父母逼着穿“羊毛内裤、棉袜和宽大的男孩式牛津鞋”,“这样的女孩怎么可能漂亮而又迷人?”这些杂志没有回避或者否认这种攀比现象的存在,而是在假定青少年能够理解它们提出的常识和常规价值观的基础上,给出合理的建议。

这些杂志的存在反映了父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子女生活的控制,揭露了两代人之间没有共同点的真实情况,但也通过再次强调传统价值观缓解了冲突。对男孩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就业。类似《美国男孩》(*American Boy*)之类的杂志

强调了竞争道德：“你将为生存而工作，为职业而斗争，这种竞争的激烈、残酷以及微妙程度你前所未见。”而相反的，女孩则准备结婚，主持家务。

父母和孩子紧张关系最主要的焦点在于性。正如1932年1月刊的《妇女家庭杂志》头版“女孩必须通过性才能受欢迎吗？”提出这一问题的年轻女性发现她的父母毫无帮助：“他们对自己的青春感到悔恨，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必须甜美、贞节而纯洁。”她面临的两难在于是选择在“拥有青春”的时候尽情享受，还是“在通往受欢迎的道路上转身，改掉吸烟和其他恶习，每天晚上待在家里，热切地盯着曾经活跃的电话。”

坚持性行为的限度这一责任不仅落在男孩身上，也落在女孩身上。年轻的女孩子发现她们的父母在疑惑和规约之间摇摆不定，转向提供建议的专栏作家寻求帮助，如《每个女孩》的切里阿姨(Aunt Cherry)就曾建议过禁欲：“就对你自己说：‘还不是时候。’”但是，正如一次又一次被证实的那样，这种方法并不总是可行的。由于青少年怀孕仍然是一大禁忌，父母们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父母们被鼓励和这种新的青年专家一起合作，引导孩子们的做法，而不是发布起反作用的命令。

引导的一种方法就是将自己融入孩子们的社会生活中去，由此可以审查将来的求婚者。正如《父母》(*Parents*)杂志的一个记者1932年观察到的那样，通过把女儿引入“正确的”群体，让“青年人对不相称的人残酷地排斥”发生作用，可以孤立不合适女儿的追求者。对于其他有争议的话题如抽烟和化妆，父母们也应该提出意见，而不是一味专制。

造成这种变化的有几个因素。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学校里性教育的缺失：“我们的高中里没有任何有关性的教育，因为我们不敢。”一个“博识”的老师这样告诉林德夫妇。

彻底的禁止可能会引起反叛。有一个16岁的女孩，在受到父母的警告后，还是和一个15岁的男孩子发生了性关系，由于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她怀孕了。在她和这个男孩亲密交往时，“她觉得自己正在做一些父母不赞成的事情，这让她有一种满足感，因为这给了她独立的感觉。”

与此同时，传统的控制手段正和一种继续刺激人类基本欲望的媒介作斗争。大萧条并没有消除消费主义，林德夫妇注意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芒塞，20年代的那种休闲方式正以“更消极、更正式、更具组织性、更机械、更商业化的形式”飞快地蔓延。在这些媒介中，最麻烦的就是电影：每周有2800万的美国家青少

年观看电影,它们被改革家和道德学家视为“下一代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威胁。”

电影的精神力量在胡佛政府 1932 年所作的最后一次调查中得到确认。在《传播机构》(“The Agencies of Communication”)一文中,马尔科姆·威利(Malcolm Willey)和斯图尔特·A.赖斯(Stuart A. Rice)报道说流行电影杂志的编辑们被影迷的来信“所淹没”,这些来信“充斥了自我揭露,有时候是故意的,但更多时候是无意识地显示了电影内容对举止、穿着、准则还有感情问题的影响。这些信表明人们的自我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影明星的影响。”

\* \* \*

相关的一个主要例子就是米高梅公司(MGM)1931年耗巨资投拍的风靡一时的电影《国民公敌》(*The Public Enemy*),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年轻的爱尔兰人从街头混混发展成贩卖私酒的大匪徒的“基本真实的故事”。在扮演汤姆·鲍维斯(Tom Powers)这个突破性人物时,詹姆斯·贾克奈(James Cagney)以一种新的美国恶魔形象震撼人心。这是一个胆大包天、无政府主义的年轻匪徒,在其虚张声势的表象下带有一点程式化的颓败,他的生活里充满暴力和施虐倾向,这在他把切好的葡萄柚掷在女朋友梅·克拉克(Mae Clarke)脸上这著名一幕中得到了深刻的展现。

贾克奈欢快活泼的表演削弱了影片结尾明显的道德教化意图:犯罪永远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就连他缓慢的、芭蕾舞似的死亡都显得很迷人。他主要的陪衬者,琼·哈洛(Jean Harlow)和他一样出色。片中还有其他的女主角,如琼·布朗德尔(Joan Blondell)扮演的活泼的好伙伴,或是梅·克拉克塑造的好发牢骚的受气包,但哈洛和她们完全不同,她和贾克奈势均力敌。她染过的淡金色头发、复杂的动作加上吵闹的口音,使其从一个可辨识的青年形象抽象为一种武断大胆的性女神形象,也就是坏女孩的化身。

正是这种模糊了幻想和现实的特征使得如《国民公敌》之类的影片成为关注的焦点。研究者们发现年轻的观赏者们无视具有道德教化意义的开场字幕,仅仅从影片中吸收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一个年轻的罪犯打扮成贾克奈的造型,他喜欢演员的表演,但并不赞成其死亡:“‘这是影片中的鬼话。他们总是死去或者被捕。这不是真的。看看乔·西趣、派卓·沙拉米还有托尼·汶德塔。’他提到的这些名字是他周围的‘大亨’或者匪徒,他们以犯罪发家却未受到惩罚。”

20世纪20年代的私酒贩子以一种英雄的形象回归。改革者们同样还注意到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在20世纪30年代的影片《小霸王》(*Little Caesar*)中成功扮演了邪恶的里科(Rico),这部影片“如旋风般影响了这一地区很多群体的男孩。”匪徒电影使得犯罪对于下层社会的年轻人来说“非常具有诱惑力”：“这个群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模仿贾克奈瞄准肋骨、下巴、肩部‘啪啪’击出的组合拳。他们模仿他的小快步,或者贾克奈式的昂首阔步。他们像贾克奈一样微笑,甚至像贾克奈一样穿带矛头标志的衬衫。”

电影“创造的大量烈火青年”随着道德学家们在禁酒法案之后寻找新目标而成为了激烈指责的对象。改革家亨利·福尔曼(Henry Forman)认为电影让年轻人更加相信“享受奢侈品和轻松获取金钱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现阶段经济的衰退让我们认识到财富易得这一几乎被普遍接受的概念会带来恶果,对不同年轻罪犯的研究表明,年轻人从这些电影中获得这种概念,结果毁了他们的生活。”

福尔曼出版于1934年的《电影制造的孩子》(*Our Movie - Made Children*)一书收集了20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电影研究评论会所作的研究,这个评论会是致力于电影分级审查制度的一个压力集团。他们关注的一个中心要点是以性和暴力为题材的电影。一名研究者指出了115部电影中刻画的16个“主题”:排名前十位的主题中有“复仇”,排在第五位;以及“为获得而犯罪”,排名第七。1930年,另一个专家判断说所有的电影中有72%涉及3个重要的主题:“犯罪、性和爱”。

福尔曼认为这就像把毒液注入了水的源头:“如果无人监管,极有可能创造出一种任意的、混杂的不良民族意识。”对500名高中生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孩子“明显模仿电影中做爱的方式”。在250多名的违法女孩中,超过一半的人说看完一部如《异教徒》之类的热辣电影后,“她们想和男人做爱”。一个16岁的女孩承认说,“当我看到让我兴奋的电影后,我总是想回家,做电影中他们所做的那种事。”

显然,好莱坞不做拍摄记录片的生意。但是那时候,它为了迎合道德学家而把青年人表现为一块被好莱坞的涂鸦污染的白板。事实上,年轻的观众比他们刻画的要挑剔得多。以下是4个大学女孩之间对话的真实记录,显示了她们对电影塑造现实能力的清楚认识。

“——她对大学的想法来自于贝布·丹尼尔斯(Bebe Daniels)和理查·迪克斯(Richard Dix)。”

“《一分钟去发挥》?”

“对,还有《烈火青春》。”

“好吧,你知道我们中的很多人来到大学的时候脑子里都是这些。”

“我们不用很久就能摆脱这些。但是那些永远上不了大学的人却会把这些东西理想化,他们真的相信大学不过是一个盛大的派对。”

真正的问题在于《电影制造的孩子》中调查的这些犯罪者的极端行为不过是对美国文化价值的一点小小扩充。国家的崩溃似乎反映在青年人的行为上,道德家们没有努力去探求原因,却只着眼于症状。他们认为电影用催眠术加剧了青年人扭曲的性爱和暴力行为,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为呼吁电影审查制度的出台带来了新的力量,1934年,一部电影制作法规《海斯法典》诞生了。

庸俗杂志产业的新兴让人们更加担心年轻人受到美国大众媒体过度刺激。明尼苏达州出版的《吉姆贾姆杰姆斯》(*Jim Jam Jems*)提出要“砸烂克利夫兰的鸦片烟来解放白人奴隶女孩”,揭露“毒品、春药和东方怪兽”危害。1932年,《曝光》杂志(*Exposed*)甚至做出了对“疯狂一代”的更直接的谴责:“18岁的绑架者! 16岁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杀手! 我们的文化一定是出问题了,以至于如此之多的孩子走上犯罪道路! 我们能做什么呢?”

\* \* \*

如果说美国对这一集体危机的反应是遵循这个国家开创性的边疆精神的话,那么它不安分的个人主义则为新型的犯罪添加了燃料。在禁酒法案期间建立起来的隐形犯罪组织不会解散,它以向商号收取保护费、非法贩毒、绑架、抢银行等形式得以多样化,最后两种行为是经济萧条期间最明显的犯罪形式。据媒体所说,中西部的危险团伙活跃异常,如以玛·巴尔克(Ma Barker)、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机枪手凯利(Machine Gun Kelly)和漂亮男孩弗洛伊德(“Pretty Boy”Floyd)等为首的团伙。

19世纪那种旧式的匪徒团伙和种族组织已经被一种新的类型所取代,这种新组织是流动分散的,而且具有随意性。里奥波德一案的后10年里,无情杀手的

数量大大增加了。1933年,犯罪率激增:美国境内发生了1.2万起谋杀案、3000票绑架案以及15万件抢劫案。20世纪30年代最著名的青年罪犯常常是这种样子:他们驱车数千里驶过德克萨斯、俄克拉何马、亚利桑那或者新墨西哥的偏僻公路,在一系列拙劣的银行抢劫案中恣意杀人。

克莱德·巴洛(Clyde Barrow)和邦尼·帕克(Bonnie Parker)分别出生于1909和1910年,他们并不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罪犯,但却是最出名的。他们的故事经典般简单:就是发生在一个坚毅的年轻罪犯和一个聪明但患有裸露症的女孩之间雌雄大盗的故事。他们在1932年夏末开始的18个月的逃亡生涯中杀死了12人。他们是小偷和杀手,但是由于媒体频繁曝光,他们大胆的逃亡、惊险的速度以及心理变态的暴力成为了传奇。

不管是邦尼的打油诗《自杀的萨尔》(*Suicide Sal*),还是他们手握枪支摆造型的照片,甚至是克莱德·巴洛发给亨利·福特本人的对于V-8汽车“速度稳定持久,令人享受远离麻烦的自由”的大胆评价〔2〕,都体现出这两人对媒体前所未有的熟知程度。他们甚至预测过自己的死亡:“道路越来越暗,”邦尼在《邦尼和克莱德的故事中》(“The Story of Bonnie and Clyde”)这样写道。这是一首自我神化的诗,1934年5月这两人被警察中途拦截并当场击毙后,这首诗被媒体传播开来。

对于被禁止警察跨州追捕逃亡犯的法律所拖累的当局来说,最可恨的是如此之多的人把这两个残暴的杀手当作民间英雄般膜拜。当他们的尸体被隆重安放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阿卡迪亚镇时,围聚的场景使人联想到鲁道夫·范伦铁诺葬礼时的情景:数千人围聚在葬礼会客厅,主人不得不往他们身上喷洒尸体防腐液。联邦调查局(FBI)局长很震惊,开展了一次联合行动以消除这种危险的魔力。

1934年对邦尼、克莱德、约翰·迪林杰以及漂亮男孩弗洛伊德进行公开歼灭以后,J.埃德加·胡佛于次年获取了联邦权力,一举废除了过时的法律限定。同年,他在美国公众中创造了一种新的打击犯罪的超人形象:G刑警。通过类似考特纳·莱利·库珀(Courtney Ryley Cooper)的《万人公敌》(*Ten Thousand Public Enemies*)之类的书,胡佛把人们对犯罪的恐惧转化成一种产业。到1936年,上百

---

〔2〕 两人葬身其中的破损了的V-8汽车40年后仍然在展出。据《时代》杂志所说,1973年这辆车卖了17.5万美元,比希特勒的梅塞德斯车还高出2万美元。

万美国孩子消费着特别针对年轻人推出的G刑警相关产品：徽章、玩具冲锋枪、睡衣甚至杂志。

青年人的“心理爆炸”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像威尔·海斯(Will Hays)和J.埃德加·胡佛之类的改革者寻求以传统的道德准则控制美国青少年，尽管禁酒运动已经表明这种方法是危险的。新一代的进步论者也同样相信美国的年轻人作为“精神病态时期的产物”过于脆弱，无法“躲开电影、广播、快车和酒精之类媒介的影响。”但是，他们试图通过改革青年结构和青年政策来缓冲经济萧条带来的影响。

愤怒的流浪者和精神病匪徒的存在提出了明确的警告：控制大众的手段是失败的。胡佛总统听之任之的方法使国家陷入灾难的边缘，国家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原则。1932年8月，经济历史学家乔治·索尔(George Soule)观察到美国人正处于“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之中”。资本主义已经不合格了，但是可以通过一个拒绝其“过时”竞争机制的新管理阶层加以改革。应该往个人主义的心田里注入些社会主义思想了。

索尔关于“统治权力可能发生改变，也许是通过宪法手段”的预言在1932年得到证实，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通过选举成为美国的新总统。罗斯福宣誓要“为美国人民实行新政”，在1933年国会特别会议之后的“百日”里建立了一整套新的政策，可谓硕果累累。新政通过了一系列从农业配额到新的劳工权利和实际救济的措施，完全被视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

新政很快在1933年春夏间减少了四分之一的失业人口。罗斯福把国家的调控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去，减少了政治和社会瓦解的直接威胁。革命由此得以避免，资本主义以另一种面貌存活了下来。和20世纪20年代彻底的“物质主义”原则不同，30年代的人们为了未来的集体收益而辛勤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理想的完全改变：消费者理想并没有被彻底取代，只是被推迟了。

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处理年轻流浪者的问题。在就任总统的第一个月里，罗斯福就建立了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对所有18到25岁之间的未婚男性开放，每月给服务于公共项目的人发放30美元。保护队建立以后的3个月内，25万年轻人在近1500个营地安顿下来。总体说来，这一政策是有积极意义的：正如吉姆·米歇尔充满感激地回忆道，这个项目“规划了我没

有方向的人生”。

保护队提供了适量的食物、团体结构以及成就感,这些对先前把自己看作被排除在社会大门之外的年轻人来说是无价的。其公共项目包括公园建设、植树、清理沙滩和建造水坝。尽管像吉姆·米歇尔这样的积极分子在保护队中找到了“一种奇妙的社会混合感”,这一项目本身还是有局限性的。由于其最低年龄限制是18岁,它仅仅吸纳了极小一部分的流浪青少年,有很多习惯于自由的人面对这些“罗斯福栖息所”的管辖畏缩不前。

新政的其他政策也开始改善流浪者的恶劣环境。1933年颁布的临时救济法案(Temporary Emergency Relief Act)敦促社区至少为流浪者提供“一顿免费的饭、为第二顿饭工作的机会、地板上的——张床、但到第二或者第三天他们必须离开”。与此同时,政府建立了联邦流浪救济服务(Federal Transient Relief Service),成立了上百个流浪中心,致力于把离家者遣送回家,或者给他们安排有偿工作,或者把他们送入民间资源保护队的营地。

鼓励美国青少年待在学校里变成了一项政府政策,因为在学校里他们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成人监管。罗伯特和海伦·莫瑞尔·林德观察到“找工作变得比以往难得多,这种状况有可能一直持续,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必须有效地延迟学生进入社会,并且成为青少年和年轻的成人能满意地度过尽可能长时间的场所。”到1936年,尽管流浪者的数量减少得很慢,几乎三分之二的高中适龄青少年都待在学校里。

这项政策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因为很多美国青年渴望着加入成人世界。正如一个16岁的孩子告诉广播听众的那样,“我们这个年龄的很多人都想尽快长大,但是父母们并不希望如此。”可能正是出于这种内疚,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变得更加“民主”:辛克莱·刘易斯在其小说《慷慨的父母》(*Prodigal Parents*)中表现了这一倾向,描写了成人在他们孩子不知足的要求面前让步的现象。但是,由于高中生的入学率越来越高,这有效地减缓了青少年成年的步伐,加强了青少年同龄人社会的力量。

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也非常关注青少年。她在1934年末赞助成立了美国青年代表大会(American Youth Congress),据这一组织中的一个领袖人物约瑟夫·拉什(Joseph Lash)说,代表大会成为了“新政的学生心脏”。罗斯福夫人同情学生政治,设法劝服了美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右翼分子和白

官共同协作,而不是反对现有政治和新政。作为回报,总统夫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帮助缓和了青年人的不安分带来的威胁。

埃莉诺·罗斯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美国针对青年人采取的措施还远远不够。“当我想到我们可能会失去这一代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了恐惧”,她在1935年写道,“我们必须把这些人领入社会的积极生活中,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用的。”大萧条开始已经5年了,革命的威胁并没有消失。另外,罗斯福宣誓就职后一种新的法西斯大众青年政治出现了。正如马克森·布朗(Maxine Brown)在其讨伐性的调查《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中所写的那样,“德国的先例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中西部的林德夫妇见证了新政仅仅改善了美国迷惘一代中极少数人的生活。不管是采取玩世不恭、轻微犯罪还是“愤恨反叛”的形式,“无所事事的青少年的问题在1935年的米德尔镇尤为明显。”工人阶级孩子的幻想破灭得最为彻底,但是他们同时也代表了“本地高中和大学形象良好的毕业生”的“平静的痛苦”,他们告诉林德夫妇,“我们这个群体认为我们已经彻底停滞不前了。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就是没有将来可言。”

这种情况在整个大陆不断重演:到1935年5月,有287.7万名16到24岁之间的青少年需要救济。政治极化带来的怨恨正静静等待反攻时机的到来,左翼的各个激进学生组织合并成美国学生联合会(American Student Union)。约瑟夫·拉什回忆说这一联合会的形成和来自莫斯科的最新指示不谋而合,莫斯科“面对希特勒主义德国日益增长的威胁,冲进国际联盟,指挥所有共产主义者组织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s)”。

到30年代中期,在一位名叫查尔斯·E.库格林(Charles E. Coughlin)的天主教牧师的传播下,法西斯的政治主张进入了上百万的美国家庭。作为一个疯狂的新政拥护者,库格林一贯坚持平民路线,是个极右分子,他赞美墨索里尼和路易斯安那的州长休伊·朗(Huey Long)。美国同样有三K党(Ku Klux Klan),这一组织开始和希特勒上台后德裔美国人组建的各种亲纳粹团体取得联系,很快就成立了德美协会(Amerika-Deutscher Volksbund)。

对于像查尔斯·W.陶西格(Charles W. Taussig)一样的新政拥护者来说,这一极化现象使得国家干预变得更为迫切。“一些人开始接受那些对国家具有摧毁力量的政治和社会信条”,他写道,“现在我们必须制定有关自由思想、自由言论

和自由教育的基本原则。在正确的方向领导下,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而且必将发展出一套更明确更有希望的生活哲学。除非我们教育今日的年轻人在现代民主中发挥作用,否则民主政府必亡无疑。”

罗斯福总统在此之前一直拒绝将更多的国家资金用在青少年身上。他曾担心“一个特别联邦青年机构可能会被误建成政治组织或者对青年进行管辖的组织”的担忧。但是,面对着600万靠救济生活的18岁以下的美国年轻人〔3〕,他改变了主意。在埃莉诺·罗斯福和查尔斯·陶西格的不懈游说下,罗斯福于1935年6月成立了全国青年总署(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并在下一个财政年度拨款5000万美元供其支配。

全国青年总署旨在为16到25岁之间的高中、大学以及已经毕业的学生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它的举措中并不包括无偿救济:和《绿野仙踪》表达的观点一样,罗斯福总统坚持“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必须为得到的东西付出努力”的美国规则。这个机构为18到24岁之间的未婚年轻人找工作,让他们以此获得平均每月15.73美元的报酬。最终,他们为青少年提供了150多份不同的工作,如办公室文员工作和环境保护工作等。

这一机构的形成标志着美国对待青少年的态度有了重大转变。不同于19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那样需要自己照料自己,这一时期的美国青年人已经成为政府目标和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而摆脱了孤立。正如大萧条帮助他们呐喊出自己的声音一样(他们在很多调查中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和政治倾向),大萧条同时也确定了他们作为美国生活中重要成员的身份。但是,这种情况只不过加剧了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因为给予的特权常常会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

---

〔3〕 占年轻人总数的七分之一。

## 20

# “少年英雄”和红色威胁

英国青年的极化

每年学生中新的一代都在产生,每一代都在把他和他的同龄人往成年和领取失业救济的深渊中推进一点。男孩的队伍庞大,学校里有上百万的男孩,马洛公司能够永远地运作下去。当他们的时代结束以后,他和他的同龄人会变成什么呢?如果每个公司都玩马洛那样的游戏,那么还有什么希望呢?如果!一种恐怖的猜疑攫住了他。如果说现状是一种已经建立起来的新秩序,那么一个人一旦脱离了自己的时代就会永远地失业!

——沃尔特·格林伍德,《爱在失业》(1933)



失业青年,1935年

1935年,一名左翼作家成立了一个名为“失业帮”(“The Unemployed Gang”)的英国青年组织。这个组织中的一名成员详尽描述了他如何在17岁的时候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废物:“16岁的时候被赶出来,因为主人想找一个更便宜的男仆来做我的工作……在一个水果店工作:在柜台上帮忙,打扫店面,骑自行车送货,从上午8:30到下午7:00。噢,星期六我们上午8:30开始工作……直到打烊。工资是每星期10先令。我有一次工作时发生了一起自行车事故,出院以后发现自己丢了工作……我再也找不到别的工作了,我太老了!”

和托马斯·迈汉在美国所做的一样,W. F. 莱斯特兰奇(W. F. Lestrangle)在他的故乡英格兰和威尔士游历了上千英里,了解那些被经济萧条摧毁了的青年人。他的所见所闻让他几乎无法遏制心中的愤怒:“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你认识到几百万被国家(指的就是你)误用和浪费了的年轻人实际上和你的子女、兄弟姐妹并无区别,只不过他们中的太多人营养不良。”

莱斯特兰奇的报告《废弃的生灵》(*Wasted Lives*)把政府统计数据 and 口头证词结合起来。他回忆了一个典型个案:“不久之前我在失业厅(作为当时的一个名义成员)和特雷沃玩桌球。特雷沃快18岁了,我在第四局的时候赢了他(他赢了前三局)。为了安抚我受伤的虚荣心(因为我认为自己能玩桌球),我说:‘你很棒,特雷沃。’”这个年轻人曾经以送报为业,但是他一满16岁就被辞退了:他硕大的褐色眼睛“在凹陷脸颊的衬托下显得尤为突出”。

“他回答时刺耳的声音让人感受不到威尔士口音如音乐般抑扬的音调,‘我不得不这样,我每天上午10点就在这儿了,一直玩到午饭时间。下午也没事可做,所以我到这儿来,一旦有空桌就玩。乒—乓!把小小的明胶球敲来敲去!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所有能做的就是打桌球。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以为我会成为……希望成为……’他跑出房间,留下我自己思考他的话。我认为他在哭。”

莱斯特兰奇瞄准教育政策、学徒制度和童工中的不正当行为,他的报告和迈

汉的《美国的男孩女孩流浪者》一样，旨在震撼读者，从而影响政府政策。这绝不是一个局外人所做的工作。莱斯特兰奇在隶属于工党的一个小左翼团体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League)的协助下工作，和政府部门、商会、大制造商、国家报纸以及城市政务会取得联系，以期全面表现英国青年人绝望的境遇。

莱斯特兰奇尤其关注了被委婉称作“特别地区”(“Special Areas”)的地方，即南威尔士和受经济萧条影响最严重的东北部地区，它们都是英国以前的工业中心。他拍的照片揭示了完全崩溃的经济留下的垃圾和碎石，照片上还留下了泰恩赛德地区(Tyneside)被封的街道——在这荒凉的地方发生了10年间最著名的失业抗议，1936年的贾罗大游行(Jarrow March)。

事实上，并没有“特别地区”，只有“被遗弃的地区”，在这些地区，生活水平低下，同时还存在其他很多问题，如“废弃的钢铁厂、废弃的煤矿——铁锈和矿渣堆积、已成废墟的建筑物和毁坏的机器，这些都让人难过。这就是可恶的废墟，而就是在这片废墟中孩子们正耗尽他们的财富，男孩女孩们正在无望的悲观中吞噬自己的心灵，年长一点的男人女人们正在质问上帝为什么要同意把他们生下来——为什么允许他们生育孩子，对这些孩子来说他们能继承的遗产就是生命中的死亡。”

《废弃的生灵》具有的创新性以及英国软肋的无情关注是这一时代的产物。20世纪20年代，媒体对年轻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精英阶层以及各种形式的享乐，这些享乐方式有的受到鼓励，有的则被严厉批评。而到了30年代，关注焦点变成了非精英阶层，即弱势群体：前10年的价值观已经过时而不足信了。这是经济危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同时也显示出真正让人担心的是这种萧条的景象可能进一步造成的政治极化。

到处都是革命的信号。美国的年轻失业者开始了行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年轻而灵活的国家拥有的强大能量，在这些年轻人中酝酿着革命热情。在德国，他们虽然有自治的名义，实质上是法西斯政权的炮灰；在英国，如果他们理想，他们去远足，如果没有理想，他们就三五成群地在废弃的街角游荡生事。莱斯特兰奇的照片抓住了他们的无聊和虚张声势，在他们的背后是残败的城市远景。他们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吗？

\* \* \*

英国经济大萧条的最初影响被刻意掩盖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失业人口

始终在 100 万左右徘徊。但到了 1933 年,失业人口最终上升到了 300 万的顶峰,原先被控制在“特别地区”的情况在全国蔓延开来。30 年代失业和贫困变成了全国性的普遍问题。营养不良加上不卫生的生活环境使得天花、流感、白喉之类的疾病开始滋生,而抑郁和心理疾病也开始蔓延,自杀变得司空见惯。

年轻人因为失业而受到非难,当局者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命运负责。正如《时代》杂志 1930 年 1 月宣称的那样,“如今大部分的男孩女孩几乎是被训练着混日子,他们厌恶工作、厌烦管教,除了足球场和电影院,他们对其他场所都提不起兴趣。”但是,当作家们开始揭露英国黑暗面时,他们却发现现实是另外一个模样。

20 世纪 20 年代关于工人的书总体上来说很少,而伴随经济萧条而来的是评论家伊瑟尔罗·曼宁所谓的“社会学小说”(sociological novels)的泛滥:F. C. 波顿(F. C. Boden)的《矿工》(*Miner*)、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s)的《爱在失业》(*Love on the Dole*)、A. J. 克罗宁(A. J. Cronin)的《帽商的城堡》(*Hatter's Castle*)、詹姆斯·汉利(James Hanley)的《男孩》(*Boy*)、亚历山大·麦克阿瑟(Alexander McArthur)和 H. 金斯利·朗(H. Kingsley Long)的《重要的城市》(*No Mean City*)。这些小说是社会现实主义者的文献,同时也是激情洋溢的檄文,他们帮助确定了新时代的风格和当务之急——从厌倦到参与,从梅费尔到索尔福德。年轻人失去了生气,他们被废弃了。

工人阶级在过去十年里被忽视,现在这类小说要重新回顾一整代工人阶级的历史,包括 20 世纪 20 年代早期第一次失业风波、历久而痛苦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带来的影响,以及匪徒生活中的城市亚文化。他们不仅是“事实的印记”,同时也是有力的控诉,控诉了一个不论失业与否都难以摆脱贫困的社会。结果是一样的:正如《爱在失业》的主人公哈里·哈卡索(Harry Hardcastle)最终认识到的那样,“和在血腥的监狱里也差不多”。

《爱在失业》表现了一个 20 世纪 30 年代盛行的制度问题:16 岁合法保护开始以后,临时工的生涯或者说“学徒期”也就结束了。但是,30 年代随着雇主开始缩短工作时间、无视工人权利,学徒制度开始快速缩水。新技术和自动化操作的出现是另外一个因素,再加上以“合理化”为借口的“工时与动作规则”(time - and - motion imperatives)。“一小撮人工作;大批的失业人员看着”,这就是格林伍德对“现代进步”的总结。

技术和管理相结合创造了人类的自动操作:如《大都市》中的机器人,赫胥黎

的《美丽新世界》中的埃普斯隆族人。最有名的新技术在美国最先得到运用,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引进英国。柏道格斯系统(the Bedaux system)持续的监管——这是一个“科学的”工时和动作系统,在此系统中,任何工作都被分解成小的计量单位成为每小时或者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这是一种非人性化的状况。正如英国总工会(Trade Union Congress)1932年宣称的那样,“在此系统下工作的工人自己是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为了提高产量而不停地运作着。其结果是消除个性和所谓的技能,把工人变成单纯的机器。”

新国家政府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1931年末开始对申请补助者进行经济情况调查(means test):此举意在剥夺有存款或者有亲戚救助的申请者获得“过渡性福利”的权利。《五月报告》提出了降低福利的政策建议,提出削减9600万美元的公共支出,其中三分之二用于失业救济。经济情况调查在地方一级开始“残忍地”实施。仅仅在其推行后的2个月内,就有超过25万人的福利被削减。

由于有工作就意味着家庭其他成员申请的福利中会被扣去多余的钱,经济情况调查也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W. F. 莱斯特兰奇观察到需要养家糊口的青年人“肩上压着千钧重担”。他举了伦敦人乔的故事:

作为一个好公民,四年里他支撑着家庭;那时他19岁。不,他不是个慈爱的父亲:他的家庭由他的父亲(受伤而未获任何赔偿后无限期地失去了工作)、母亲,还有仍在上学的弟弟妹妹组成。

他从来没有给自己买一件新西装,因为家庭里总有别人,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更迫切地需要一件新衣服。说起这些,乔显得非常平静。

乔和我讨论过婚姻。他说(不那么平静了):“要照看这么一个大家庭,我能结婚的机会很小。明年我可能得到商店里的一份工作——或者奇迹会出现,我会得到提升。”

奇迹几天后就发生了。乔得到晋升,每周多了10先令的工资。谈到新衣服和他中意的姑娘,他容光焕发。然而到星期六他却像生病了一样。

“出什么事了?”我问。

这男孩满面愁容地说:“你应该告诉我的。你肯定知道所有这种事情。”

“什么事情?”

“经济情况调查。我涨工资就意味着我爸从政府那里少领10先令的救济,因此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就算我以后被提升,我也永远无法改善生活。我脖子上缠

着我的家庭,该死的!”他脸红起来,看上去有点局促。“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并不是他们的错。但是……妈的,一个人不停地工作自己却永远也得不到好处……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生活,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而又复杂的制度下,年轻失业者的选择少得可怜。移民到殖民地是一条可行之路,每年有2万人采取这种方法。参军是另外一种选择,尽管有45%的申请者会被军队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拒之门外。对于年轻的无业者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加入劳工营地,这种营地和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队一样,非常强调纪律。但是,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年轻人,大部分人很快就会想办法避开这些“奴隶营”,因为里面的管辖太残酷,就像在蹲监狱。

最成功的尝试是地方上的“失业福利中心”,也就是鼓励打桌球、合唱、踢足球等业余爱好和活动的社会俱乐部。另外由于受候鸟运动的影响,青年旅馆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徒步旅行非常流行。但是,由于地域狭小,年轻的英国失业者发现自己很难像美国的同龄人一样放纵自己。只有那些最大胆的人才选择离开。1936年春天,两个年轻的兄弟偷了一艘拖捞船,然后驾驶着这艘船航行了8000多英里。

英国的一些年轻人还是可以沉浸在消费主义潮流中,这一潮流继续慢慢地在英国某些地区传播,如受经济危机影响最小的东南部地区。这就是作家J. B. 普里斯特利(J. B. Priestley)观察到的新的美国式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到处是看上去像展览厅的车站和工厂,还有大电影院、舞厅、咖啡馆、带小车库的房子、鸡尾酒吧、沃尔沃斯零售店、公车、无线电、徒步旅行、看上去像演员的女工、赛车和赛道、游泳池以及可以换烟券的一切东西。”

对英国年轻人来说,美国还是一个风向标。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注意到分期付款的钱足够让一位无业的年轻人“买一件西装,如果不近看,就像是在伦敦萨维尔街剪裁出来的。女孩子要想看上去时髦所需的费用甚至更低。你可能口袋里只有一个半便士,毫无前途可言,只有破烂的卧室一角做栖息之所,但只要穿着你的新衣服你就能站在街角,把自己想象成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心理补偿。”

即使是这种有限的花费对很多被“追求体面东西的欲望”困扰的人来说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有一个最直接的解决方法。莱斯特兰的很多照片表现的是穿着收腰西装、脸上带着挑衅神情的年轻无业人员,他们的身边是军队的布告、劳工营

地的照片以及监狱里的牢房。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是仅有的选择,因此走上犯罪道路也就变得很自然:“有个人走向街头一群无所事事无精打采的年轻人,把他最好的兄弟拉到一边,‘事情已经这样,不可能再坏了。我们去撬一辆车,找点乐子玩玩。’”

街头匪徒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前人数更多,也更邪恶。复苏的公众意识带来了许多青年小说的成功,如亚历山大·麦克阿瑟和 H. 金斯利·朗的《重要的城市》,主要描写了高伯地区一个匪徒头领的故事,小说表达了对少年犯罪的担忧。在书的结尾,作者再现了一系列当时的头条新闻,如“格拉斯哥电影院中的恐慌”和“青年帮派的牺牲品”等。正如作者总结的那样,“类似的新闻可以在最近几年格拉斯哥和国家报纸上看到,令人作呕。”

一些年轻的犯罪者延续了流氓阿飞式夸张的穿衣风格。一名伦敦北部帮派的成员回忆了他那个时代的时尚:“牛津布袋裤,也就是裤腿可能有 20 英寸宽的裤子;这种裤子真的很宽大,每个人都穿这种裤子。材质是灰色法兰绒或者软法兰绒,很便宜。而鞋子,是大家所谓的‘尖头皮鞋’。幸运的是我不常穿这种鞋,因为穿着脚疼。运动衫很流行,到我 18 岁的时候,又流行起圆顶礼帽。”

这些服装的传播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引发了越来越多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关注,当局者把这种状况称为“无业游民综合症”。好莱坞电影被指应该为“上百名”来自贫民窟的男孩“进行结伙赛马、驱车行窃、打破商店橱窗将贵重商品偷走并迅速逃离”等等罪行负责。“消灭恐怖帮派”之类的新闻头条耸人听闻,反映了英国犯罪活动上的变化。赛狗帮和赛马帮利用英国人希望发财的欲望进行非法赌博,英国人每年用在赌博上的钱高达 4 亿英镑,这些帮派成为新的国民公敌。

1933 年《儿童及青少年法》(*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中相对开明的措施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关心、保护和控制”17 岁以下的违法者,认为这种年纪的人不能对其行为负全责。这个法律不主张通过机械的判刑解决问题,而是提出了多种解决方法,从青少年教养院到“工业”学校或者——到目前为止最普遍的解决方案——缓刑。批评家们认为,通过特殊的宽大处理,年轻违法者们实际上比以前更大程度地置于国家监管下。

由于了解失业者的生活状况,社会工作者提倡采取更具同情心的方法。在《伦敦坏男孩》(*London's Bad Boys*)一书中,S. F. 哈顿(S. F. Hatton)提出由成人监管直到 18 岁的想法。在他对贫民窟居民“艾尔夫·阿特福尔”(“Alf Artful”)、

“比利·多卒珀”(“Billy Dustup”)和“雷吉·斯迈希姆”(“Reggie Smashem”)的描述中,他说他们的犯罪“不过是健康活泼的青少年表现出来的青春期症状”。同样,警察哈里·达利(Harry Daley)也认为某些层面上的青少年犯罪还是在现有的游戏规则之内的。

但是,政治骚动就被看得严重得多。1931年冬,抗议经济情况调查的大规模活动在英国的31座城市爆发,这些城市包括伦敦、格拉斯哥、伯明翰、利兹还有纽卡斯尔。迎接他们的是警棍和高压水管。1932年10月,贝尔法斯特的一次示威失去了控制,军队朝人群开了枪。两周以后,伦敦海德公园的大规模集会最终变成警察和上千名示威者在伦敦中心上演的街头大战。

越来越多的民众示威相继爆发,英国的政治格局开始发生变化。海德公园集会的同一个月,奥斯瓦德·摩兹利(Oswald Mosley)在组织新党失败后,开始了他最新一次的政治冒险,成立了英国法西斯党(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与此同时,大不列颠共产党员的数量开始增加。政治极化现象把欧洲撕得四分五裂,现在又将在英国的土壤上重演这一幕。随着失业的工人阶级越来越得到同情,精英阶层也开始效仿他们。

严重萧条的经济对原先坚不可摧的资产阶级造成了威胁。由于资本主义似乎让人看不到任何将来,成千上万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开始转向极端主义政治寻求救赎和希望。他们年长一点的哥哥姐姐们曾经拒绝长大,以此来表达对那些把持国家的“老人”的蔑视。他们似乎不在乎任何事任何人,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成年的这一代人注意到那些更不幸的人的困境,吹响了他们反叛的号角,以“满腔怒火”反抗英国中产阶级。

但是,希望实现W. H. 奥登(W. H. Auden)所谓的“旧团伙的死亡”只是斗争的一个原因。真正的动因还是对经济萧条带来的人员损失和政府表面上的瘫痪的不满。危机的时代要求极端的解决方法,而英国经过一整代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努力,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开来〔1〕。这些人中包括温斯顿·丘吉尔的侄子埃斯蒙德·罗米利(Esmond Romilly)和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曾

---

〔1〕这些人中包括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和埃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诗人W. H. 奥登(W. H. Auden)、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以及斯蒂芬·斯本德(Stephen Spender),还有苏联间谍盖伊·伯格斯(Gay Burgess)和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最后一个是间谍机构的支柱人物,40年后才公开身份。

孙鲁珀特·康福德(Rupert Cornford)。这两个人都和“世界的暴力振动”振幅一致,于是在极端主义者的行动和事业中成为尖兵。

到1933年为止,学生中主要的号召力就是争取和平的运动:就在这一年爆发了著名的牛津联盟论战(Oxford Union debate),通过了“议会将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斗争”的异端动议。1933年休战纪念日(Armistice Day)那一天爆发的反战游行加速了共产主义思想在剑桥的传播,这一游行后来降格为抗议者和“爱国”分子之间的暴力事件。媒体认为这种行为发生在英国的年轻精英分子身上是不可接受的,他们把这些年轻人称为“因为亵渎了神圣的日子而罪有应得的年轻流氓”。

“光明的年轻人”一代通过享乐主义来抒发他们对19世纪公立学校把培养力量型基督教徒作为理想的唾弃,而新一代具有特权的反叛者就直接得多。他们痛恨“反知识的沙文主义”,决定直接向帝制的核心开火。埃斯蒙德·罗米利在休战纪念日那一天由于在军事学校散发反战传单而引起了骚乱,他不得不逃走加入了主张马克思主义的学生团体联合会(Federation of Student Societies),在那里他宣布为公立学校的学生创办一本激进杂志。

1933年1月,罗米利和哥哥贾尔斯(Giles)一起发表《越轨》杂志宣言(Out of Bounds manifesto):

在我们这个时代,分裂影响了整个社会。它深刻地影响了公立学校,表现如下:

- (1)在现代问题面前思想困惑;
- (2)学校有意要脱离政治和文化现状;
- (3)公立学校被公然作为反动势力的武器;
- (4)让法西斯主义者有机可乘。

……《越轨》将通过各种方法公开拥护进步力量,反对反动力量,如强制性军事训练和宣传人员培养。

在媒体以“公立学校中的红色威胁”这样的标题攻击这一宣言之前,它的传播范围并不很广。共产主义似乎正在进入国家的心脏,而丘吉尔机会主义的“红色侄子”在这过程中欣然相助。罗米利在为一份国家报纸写稿的时候,打出了极端主义的牌:“青年人面临的选择很清楚,不可能有砌到一半的房子。他们要么就站在寄生虫和剥削者的一边,‘为富豪同志维护世界安全’,要么就站在工人阶级的阵营里,打破资本主义制度,为没有阶级之分的社会打下基础。”

极化了的暴力动乱在1934年6月随着奥斯瓦德·摩兹利在伦敦宏伟的奥林匹亚大厅召开大规模的黑衣党员会议(blackshirt meeting)时第一次达到高潮〔2〕,这标志着他的政党历史上一次关键的转折。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政权安然地掌握着权力,而摩兹利也掌握了他们学说和世界观的要素:盛大的仪式、对美国大众文化的恐惧、把责任推卸给某个局外人。青年一代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妥协和堕落充满了敌意,这一点正好被英国法西斯党利用了。

英国法西斯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80%的成员年龄在30岁以下〔3〕。它最重要的组成人员和希特勒的支持者来自同一个阶级,也就是技术工人和半技术工人。它在工业化的北部地区和伦敦东区被广泛接受,一开始就旨在吸收失业人员。纳粹的残忍面目还没有被揭露出来,摩兹利开始在一高度紧张的气氛中吸收对政府不满的人。他管辖下的“少年英雄”〔4〕队从头到脚都穿着黑色,很好地体现了暴力和性欲的结合。

在奥林匹亚,这种高度紧张的气氛终于爆炸了。据哈里·达利说,抗议者面临的问题在于执勤的警察被告知“不要干预”任何以私人名义组织的活动。结果每次抗议者一站起来,“就会有人突然扑过去攫住他,把他拖离大厅”。然后成群结队的黑衣党员就开始暴力袭击“手无寸铁的质问者,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会站着用胳膊和手挡着弯下来的头,直到被打倒在地”。达利回忆说“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奥林匹亚事件发生在英国法西斯党第一次成员人数激增的阶段——1934年上半年达到5万人——并且开创了政治暴力的先例。

英国法西斯党大部分大规模的活动模式都相似:大厅外部布置大量人手,内部则维持“法西斯纪律”。在利物浦,当地的反法西斯委员会(Anti-Fascist Committee)组织游行,成员包括共产党人、工党(Labour Party)党员以及全国失业劳工运动(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的代表。这种合作反映了第三国

〔2〕 这一时期的极端主义思潮体现在米特福德三姐妹采取的极端主义政治主张上:成为英国最赫赫有名的纳粹分子的尤内蒂;成为共产主义者并于1937年嫁给埃斯蒙德·罗米利的杰西卡;还有1936年嫁给奥斯瓦德·摩兹利的戴安娜(Diana)。

〔3〕 英国法西斯政党留下的硬数据总体说来并不很多,因为1940年这个政党被划为非法组织以后大部分的记录都被销毁了。

〔4〕 英国法西斯武装。——译者注

际新的人民阵线政策：团结一切左翼的团体组成反希特勒甚至是维护民主制的联盟。

但是，奥林匹亚暴力事件结束了英国法西斯党通过常规选举手段获得成功的机会：媒体的曝光使得这个政党失去了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激进的反闪米特族力量开始居于支配地位〔5〕。历史为持续巷战空出了舞台，这种巷战使这个国家的青少年陷入了已经席卷德法两国的暴力之中。英国以前从没有出现过这种政治上的分歧，严重的公众骚乱虽然不断爆发，但从没有涉及如此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管是在伦敦东区的街道里，还是在省会城市的大厅上，或者特权阶层的家里，英国的青少年总是在彼此斗争。开始可能只是邻里争议或者玩笑，后来就变成了至死方休的抉择问题。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记得她的姐姐试图劝说她加入英国法西斯党时的对话：“‘你难道不想也加入吗？黛卡，〔6〕这太有意思了，’她说道，在我面前挥舞着全新的黑色衬衫。‘想都不要想。我痛恨残忍的法西斯分子。如果你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就加入共产党，就是这样。’”

于是杰西卡在15岁时就面临人生中的分叉口：“我之所以这么说，不仅仅是习惯性地选择和布德相反的一边。我所了解的关于法西斯的一点知识让我对它感到厌恶——他们的种族主义、超军国主义、还有兽性。”姐妹俩共住的房间变成了一个微观世界，反映着分割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她们把房间从中间一分为二：杰西卡这边是与共产党有关的纪念品，尤内蒂放的是法西斯标志：墨索里尼和摩兹利的照片以及纳粹卐字徽章。然后她们会上演“激烈的战争，相互扔书和唱片”。

随后尤内蒂·米特福德(Unity Mitford)开始进入社交界。她可能会更适合“光明的年轻人”那时候自我标榜的时代，但是时间在流逝，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邪恶的东西。她加入了英国法西斯政党的牛津分会，负责推销这个组织创办的报纸——《战斗》(Action)，但这并没有持续很久。“我要去德国看希特勒”，尤内蒂向妹妹宣布，并且在1933年10月到纽伦堡参加了纳粹上台后的第一次集会。

与此同时，杰西卡“坚定了逃离的决心，把自己的命运和反法西斯联系在一

〔5〕 其中主要人物包括二战中最臭名昭著的卖国贼，爱尔兰人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也被称为呵呵勋爵(Lord Haw Haw)，他由于战时做亲纳粹的广播节目而在1947年被处以死刑。

〔6〕 家庭语言中，尤内蒂被称为布德，而杰西卡则是黛卡。

起”。她不得不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因为当时“家庭如一个森严的堡垒主宰着我的生活,几乎淹没了其他的一切。我选择了与家庭对立的阵营,这是一个很孤独的阵营”。读着有关她的二表兄埃斯蒙德·罗米利创办公立学校“红色”杂志的报道,她发现自己对他的钦慕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并且确定他就是自己的救命稻草。

尤内蒂在慕尼黑成功接近希特勒后,迅速地成为他的亲信。她出身英国上流社会的身份给了她很多特权,这种身份令元首很惊喜,并且直到战争爆发,这种身份给纳粹政权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1935年,也就是剥夺德国犹太人权利的纽伦堡法令(Nuremberg Decree)出台的那一年,她给慕尼黑的一家报纸写了一篇文章《一个英国法西斯女孩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Fascist Girl”),声称“英国法西斯党是一个由前线战士和青年人组成的政党”。两姐妹间的紧张关系在“以拳打脚踢告终的激烈争吵中”爆发。

这种激烈的对抗一次又一次地爆发。共产主义者对英国法西斯党的抵制使得黑衣党人边缘化,也迫使他们采取更激进的暴力手段。英国法西斯党的成员数从1934年夏天的5万减少到1935年10月的5000左右。英国法西斯党决定在伦敦东区乘胜追击——这一地区移民人口和犹太人众多。这里持续几个月的小冲突在1936年10月上旬达到最高潮,英国法西斯党在犹太人街区精心组织的游行遭到10万人组成的反示威队伍的回击。

按照惯例,警察试图不让抗议者靠近游行队伍。当地居民设置路障来阻止摩兹利前进,警察们冲进来,但是正如一名年轻的抗议者查理·古德曼(Charlie Goodman)回忆的那样,“上面是廉价公寓,女人们就从那里斜靠出来,把她们能拿到的一切东西扔下来,砸在警察身上,我所谓的一切东西就是一切东西:热水、沸腾的水、烹饪用油、肥肉、小便、大便,一切她们能找到的东西。”

“其余的警察恐慌起来,他们中有些人站在那里喊‘希特勒万岁’之类的话,试图挑衅。然后有人往这些人中扔了一块砖头,警察们开始出击,对着各个方向的人一阵乱打,把人群推后了一点。他们就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痛打人群,甚至敲开商店或者橱窗的玻璃打人。”就在这种混战中,古德曼看到一个警察“正准备抽打一位妇女的头部”,他上前对着警察的脸打了一拳,但很快被大约十几个警察围住逮了起来。

尽管抗议者们享受到了让英国法西斯党的游行无法前进的满足感,大众对

电缆街战役(Battle of Cable Street)的关注还是让英国法西斯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多吸收了成员。但对政府来说,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这一点很清楚:1937年1月1日,《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明文规定,公共场所不能穿政治组织的制服,不能成立准军事组织。到那时为止,两方阵营都已经找到了施展身手的更大舞台。

\* \* \*

1936年春,西班牙爆发了一场军队领导的政变,民主选举出的人民阵线政府被推翻:1个月后,内战全面展开。英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是不干涉原则:1936年8月,英国和意大利、德国以及俄国签订了不干涉条约。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违反了这一条约,这显然可以吸引年轻一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全欧洲的问题,表现得如此明确:民主对法西斯”。

欧洲极化了的年轻人知道这是最后的摊牌。1936年8月上旬,约翰·康福德(John Cornford)潜入西班牙。早些时候的夏天,他写了一篇题为《老人的年轻思想》(*Young Minds for Old*)的文章:“嘲笑年轻人的狂热很简单,对一些人来说是种安慰。像共产主义运动这样年轻的运动有时不可避免地会显得简单幼稚、不够成熟甚至狂热过头,难免给吹毛求疵的人留下话柄。但是它仍然是一场严肃的运动。”现在,考验它的严肃性,在实践的熔炉中锻造理论的时候到了。

在接下来的18个月中,几千名英国青年来到西班牙,和佛朗哥(Franco)将军的军队作战。记者汤姆·温特林厄姆(Tom Wintringham)回忆说大部分的志愿者“以前是体力劳动者,14岁就离开了学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只能这样做,不管他们多么聪明或者能干”。英国营的领导人中只有3个人上过大学,其中包括温特林厄姆,但是他们“在失业高峰时期都曾经经历过找工作的困难和挫折,他们痛恨英国的社会和阶级制度,因此更坚定了反法西斯的决心。”

社会各阶层的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甚至一起死亡,他们在共产主义信条指导下的斗争中团结起来。革命让英国的这些志愿者们看到了新型大众社会的希望。约翰·康福德来到了无政府主义者控制下的城市巴塞罗那,他发现这里的街道整天都挤满了人:“这就似乎是在伦敦,武装工人正控制着街道——很明显他们不会容忍摩兹利或者任何在街上卖《战斗》报的人。这并不是说这座城市没有自由,这实际上就是民众的专政。”

西班牙内战激励了一代人。人民战线的理论从共产党内部流向革命潮流中更广大的民众中去,而维克多·戈伦茨(Victor Gollancz)创办左派读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取得的成功就体现了这种潮流。英国第一次产生了一个范围广泛的知识分子阶层,既有左翼分子,也是国际主义者。参与到西班牙内战中已经变成了一种重大仪式,比少数志愿者实际参加内战的做法更加重要。20世纪30年代那样幻想在所有阶层中实行人民集体自治的乌托邦思想在无政府的巴塞罗那变成了现实。

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来自各阶层的狂热的年轻志愿者们很快就认识到他们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家,一个长期存在的、高度复杂而又紧张的社会深渊,他们面临着一个残忍的敌人。他们加入的民兵组织在军服和武器装备方面都很简陋,还常常发生内讧。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不是团结起来和共同的敌人法西斯作斗争,而是经常相互争斗。不管表面看起来多么理想,说到底就是一场战争。

英国的志愿者们出于理想主义联合起来,但是他们很快就自己发现了政治实践的危险性。1936年8月下旬,一位名叫弗里西亚·布朗(Felicia Browne)的共产党员被杀,她是美术系学生,是第一个死去的英国志愿者。就在布朗牺牲之前,她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证实,“你说我逃避画画和制作雕塑的任务。如果没有画作或者雕塑等着要完成的话,我就不需要。我只能做对我来说正确而迫切的事情。”对她来说,艺术的实践让位给了“革命中正爆发的地震”。

约翰·康福德认识到“革命中没有儿戏”,他变成了一个专业的阶级斗士;埃斯蒙德·罗米利记得1936年底遇到他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严肃的人,一个严格的纪律维持者”。作为一个主要由工人阶级组成的英国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康福德已经变成了“一名出色的战士”,成为他的志愿者伙伴们的榜样。但是,1936年和1937年之交,他死于科尔多瓦前线的洛佩拉镇附近。随着这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年轻人的死亡,20世纪30年代的人民战线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少年偶像”。

约翰·康福德得到的关注和鲁珀特·布鲁克非常相似,他和那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象代言人般的人物一样成为神化了的殉道者:为理想而死的斗士。布鲁克的死被当局者利用来给技术屠杀戴上一张充满吸引力的人类的面具,而康福德回避了自己特权阶级的背景:他的暴力并没有被隐藏,反而以当时一种功利主义、

几乎匪徒式的方式得到推崇。他激发了人民,也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了代价,更坚定了精英阶层必须卸下特权融入民众社会的事实。

但是,这种现象将以一种 30 年代中期的激进分子意想不到的方式得以诠释。从 1937 年的年中开始,不满和失望的情绪在“国际纵队”中传播开来。面对法西斯民族主义势力的优势地位、国际民兵持续的无组织状态以及志愿者死伤大半的“血腥混乱”,英国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打退堂鼓了。对于其他人来说,共产党人严重的门户之见,坚持自己应该是革命的唯一领导力量的狭隘观点仍然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骚动还在继续。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左派读书俱乐部运动达到高潮,它的很多讨论小组〔7〕和活动——流浪、骑脚踏车、和失业者一起工作——为成千上万中产阶级的青少年提供了反法西斯的切入点。作为“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的召集人,坎特(Kant)在给戈伦茨的一封信热情洋溢的推荐书上指出了这个组织范围太广的问题,“左派读书俱乐部成立的第一个月我就加入了。我不属于任何政党。我的人生观,很显然是左倾的,但这是一个太过混乱、愤世嫉俗而且幻想破灭了的人生观。”

法西斯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巷战已经变成英国生活中的家常便饭。1938 年 9 月,摩兹利的新政党英国联盟(British Union)组织了一场游行,却以警察、黑衣党人和左派的抗议者在议会广场上的持续混战而告终。正如一名旁观者注意到的那样,“现在一群法西斯分子高举着布告牌出现了。别着共产党徽章的一个年轻人冲过来,对着他们中的一个人喊‘摩兹利笨蛋’。这些人中的一个转过来说,‘跪下来把手贴在地上,你这只共产主义老鼠!’”

尽管失业作为一个全国性问题已经开始得到控制,但是失业人口在 1937 年还是稍稍上升了一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 1919 到 1920 年的生育高峰造成的。东北部和其他“特别地区”的悲惨状况还在继续,但失业人员对这种状况应经已经变得习以为常。在绝望中,全国失业劳工运动开始了一项行动的新政策:在牛津马戏团的中央静坐,占领里兹的茶室。这些事件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并没能改变现状:对很多失业的年轻人来说,全面备战可能是解决他们问题的唯一方法。

---

〔7〕 据计 1939 年这种小组超过 1000 个。

\* \* \*

到1937年末,很明显另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酝酿之中,相比而言,西班牙内战不过是一场彩排。随着纳粹德国在别国的姑息和让步中吞灭了苏台德区、奥地利以及捷克斯洛伐克,3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感。国际形势异常严峻。1937年3月,第一批毒气面具工厂建立起来,也第一次开始了空袭警报测试,而这一年里英军也升级为“现代军队”。

即将来临的战争——或者它的对立面,“任何代价换来的和平”——开始取代30年代中期的极化斗争,成为年轻人主要的政治动力。共产主义者认为他们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被证实是正确的,而奥斯瓦德·摩兹利则试图把英国联盟重新定位为一个和平的政党。与此同时,失业带来的最坏后果因军备改良得到扭转。到处又有钱了,这就意味着英国消费者社会的发展加快了步伐。

对那些在新的服务行业工作的人来说,生活正在日益变好。即使对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来说,分期付款也使消费变得可能。到30年代末,路面上行使的小汽车增加到200多万辆。1938年以后,1100万工人每年开始有了1周的带薪假期,英国第一个假日公园布特林斯就利用了这个新的休闲机遇。除了电影和爵士乐,当代美国文化中的其他娱乐方式也大量涌入。庸俗杂志如《搏击故事》(*Fight Stories*)和《战斗故事》(*Action Stories*)开始拥有大批的读者。

美国的消费主义经受住了经济大萧条的考验。新一代罪犯的产生预告了从行使义务向追求享乐的转变。詹姆斯·柯提斯(James Curtis)1936年描写下层人的小说《镀金孩子》(*Gilt Kid*)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不法分子,他想成为一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认识到“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胡说”。他在索霍俱乐部里忠告一个共产主义者:“听着,你们搞示威、集会、反饥饿游行等等之类没用的。他妈的这些有什么好处?不过是一些笨蛋被捕了,另外一些被警察用警棍敲破了头。你可别告诉我这就是革命。”

\* \* \*

《镀金男孩》是早期小说中出现的“野孩子”〔8〕。这些新的罪犯不关心阶级

---

〔8〕 还有罗纳尔多·维特斯比(Ronald Westerby)的《野孩子从不工作》(*Wide Boys Never Work*)(1937)、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的《马场杀手》(*Brighton Rock*)(1938)以及约翰·渥比(John Worby)的《骗子的进步》(*Spiv's Progress*)(1939)。

斗争，一心只想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为此孤注一掷，不是欺诈，就是凭借棍棒、小刀和枪支等暴力方式。他们主要聚集在索霍和派丁顿的街头和俱乐部里，那里住满了赛马帮匪徒、从事卖淫的男女、同性恋以及底层犹太人。“野孩子”在30年代晚期乏味的英国社会里刻下了一道重重的痕迹，他们是实践新型美国式享乐主义的先驱者。

与此同时，美国式的群众说服力终于在英国找到了立足之地。最早的实践是报纸和期刊所作的读者调查，调查结果对广告商开放。这种方式被美国民意测验专家盖洛普(Gallup)博士大力提倡，他在1936年美国选举中成功以后建立了英国民意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9]。3名年轻的激进主义者汤姆·森(Tom Harrisson)、汉佛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和查尔斯·马奇(Charles Madge)借鉴了这些方法，决定创立自己的民意调查形式。

1937年1月，他们建立了“大众观察”组织(Mass - Observation)，旨在创办“我们自己的科学”。创办者中有艺术、新闻学、人类学方面的学者以及左翼政治分子，他们认识到“普通民众被自鸣得意的媒体和冷漠的政府误导了”。对这种信息阻塞现象唯一的对策就是“坚持事实真相，把他们当作正常智商的人一样对待”。而在实践上他们关注日常生活中经常被大众媒体忽视的具体事件：指导思想是记录下通常所谓的“俗事”突显其重要性。

“大众观察”的最初调查涉及3个主要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类似工作镇项目(Worktown Project)这样的详尽研究，这是对北部的一个小镇沃博尔顿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进行为期数月的深入观察；第二个方面是把数百名志愿者，也就是“民意调查员”所写的一系列报告汇编成书，如对国王乔治五世(George V)继位25周年纪念所作的调查《5月12日》；第三个方面是一些“想在反对法西斯反对政府忽视大众的斗争中有所帮助”的人写的日记。

“大众观察”和市场调查的关系很难界定。创办者们攻击广告公司和各种日报说：“这些大机构利用了人们的头脑容易受暗示影响这个事实，因此往往针对人

---

[9] 尽管对温度变化非常敏感，杰西卡·罗米利还是在那里获得了一份工作，并且发现“目的在于把信息汇编起来供研究大众对不同产品的反应的广告公司所用，为此我们拿着详细的问卷挨家挨户上门调查。当然，问题随着产品的不同而不同。为早餐食品或者家用清洁剂所作的调查基本都很普通，而关于除臭剂的问卷则有可能包含这种问题，‘你觉得多久有必要洗一次腋下？’”

们头脑中迷信因素占支配地位的那一部分。”他们最初的调查如《应对广告》旨在揭露这些隐形的程序。虽然他们持批评的论调，他们研究发现的应对方法对于他们反对的民意调查专家来说还是有用的。

英国第一份现代的、以插图为主的周刊是这种转变带来的另一个产物。这份周刊叫《画报》(*Picture Post*)，相当于美国的《人生》。《画报》由牛津大学毕业生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和匈牙利难民斯蒂凡·洛伦(Stefan Lorant)特共同创办，第一刊出版于1938年10月，即慕尼黑危机发生后的几天，上面刊登了一幅站在集市的风中大笑着展示自己的吊袜带的年轻女子图片。由于其创新性的版面设计以及政治时事性，这份杂志立刻取得了成功：短短几周内就卖出了100多万份。

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画报》也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内容充斥了为各种产品所作的广告，如飞利浦收音机、“气浮式”粉扑以及明星代言的香烟。除了政治议题，它还包含了通俗文化元素和娱乐业的故事：如英国本土明星格蕾西·菲尔兹、好莱坞明星费雷迪·巴塞洛缪以及对美国最新音乐和电影情节的报道。《画报》以其“贴近生活本来面貌”的图片和彩版吸引了很多读者。

“大众观察”和《画报》取得的成功迫使左翼知识分子们认识到，密切关注大众的需求和感觉能够消除阶级战争的威胁。在社会融合面前，革命的吸引力开始减退。与此同时，美国资本主义的复兴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提供了第三条可走的道路。大众消费主义提供了另一种社会融合：正如左翼独行侠克劳德·柯克本(Claud Cockburn)观察到的那样，“这可能代表了经济生活的一种民主化。”

这种观点在英国仍然很新，而年轻人就充当了先锋。“大众观察”和《画报》都特别关注英国的青少年。前者详尽调查了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如1938年3月对“富勒姆的青年组织”(“Youth Organisations in Fulham”)的报道；而后者则明确瞄准了年轻读者，发表了《魅力少女的一天》(“A Glamour Girl's Day”)和《新舞时尚的诞生》(“Birth of a New Dance Craze”)之类的文章。1939年3月，《画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掌舵的青年》(“Youth at the Helm”)的社论，这篇文章就和斯坦利·霍尔曾经的做法一样，浪漫地把青年人与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等同起来。

“青年人是一股悬而未决的力量，”《画报》的所有人爱德华·哈尔顿(Edward Hulton)说：“所有人都在谈论他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有哪个记者没写过他们？”

有哪个政客忘记讨好他们,对他们许愿?领导者、教会和国家都在争取把他们组织起来。就连英国广播公司(B. B. C.)也作了一期名为《青年人谢幕》(‘Youth Takes A Bow’)的系列节目。”哈尔顿认为对青年人的这种关注源于英国已经进入“转型时期”,但是隐藏在这种新的关注焦点之下的是极端主义的阴影:“年轻人由于缺乏耐心和理解力,容易变得极端偏执。”

1939年,“大众观察”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在冲突和消费主义之间徘徊的年轻人的本质,这篇文章起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题目——《英国》(*Britain*)。它所作的第一手的报道表明:一方面,左翼分子和摩兹利派力量之间的暴力斗争依然激烈,而另一方面,英国年轻人开始涌进如“斯特雷特姆全新的洛卡诺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伦敦公园也开始举办大型的露天舞会,一名目击者称“一对对年轻人跳着非正统风格的舞。”

尽管在经济大萧条中遭遇了很大苦难,年轻的失业者们并没有在那种使德国分裂的暴力中爆发。原因有很多,消费主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乔治·奥威尔观察到在消费品中间,“鱼和薯条、丝袜、鲑鱼罐头、打折巧克力(这种2盎司的巧克力只要6便士就可以买5块)、电影、广播、浓茶以及赌球”已经“引发了革命”。这就是通俗文化的开始,英国年轻人已经形成对这种文化的一种独特品味,并很快变成一种迷恋。

## 21

### 吉特巴舞及其舞迷

美国的摇摆乐和青年的消费主义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舞迷，却毫无乐感可言；他是一个怪人，有点乖僻，全身充满了感伤主义因子；他是一个杀人狂，却也仅仅是一个寻常人；他可能留下鳄鱼的眼泪，本质上却还是一只凶猛的鳄鱼。

——《杰出舞迷》，选自《吉特巴舞》第一期（1939）



加利福尼亚的吉特巴舞者来到小镇，1939年12月

1937年3月3日上午7点,本尼·古德曼交响乐队(Benny Goodman Orchestra)的成员们来到位于时代广场能容纳3664名观众的派拉蒙剧院(Paramount Theater),为他们即将到来的常驻演出作开场彩排。他们没有意识到将会有不同寻常的事发生,但是接下来在还没开场的的时间里看到的事情让他们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尽管售票处还没开门,那里已经聚集了六七百名歌迷,大多数都是来自纽约市各个区的高中生,他们舞着、喊着,甚至生起火来驱走寒意。

到7:30,“歌迷的数量每分钟都成倍地增长,他们从时代广场地道的各个出口涌出来,就像蜜蜂从冒烟的蜂巢中涌出来一样。”一个小时以后,乐队的成名曲口《让我们跳舞吧》(“Let’s Dance”)的第一个音符轻轻响起,演出开始了。随后,音乐声变得越来越大,乐队成员们也从地下舞台升起。精彩的演出让拥挤的观众们全都站起来,他们就站在舞台边,在各条过道上疯狂地舞着,簇拥着舞台,而引座员们则慌乱地维持着秩序。

这样的场景在那天举行的五场演出中一再重复:没人去关心同时放映的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主演的电影《塞勒姆的姑娘》(*Maid of Salem*)。一个星期后,观众看演出的时候已经会爬到舞台上,这样离他们的偶像们更近,同时也给他们施展杂技式的舞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就像古德曼后来承认的那样,这些舞动着的孩子们不仅仅是被动的观众。“我们看着他们,我在想,他们在表演,而我们是观众。”

派拉蒙公演标志着古德曼和他的乐队将会赢得享誉全美和西方世界的名声,摇摆舞和他们演奏的爵士乐一样迅速走红。摇摆舞以强有力的即兴反复为特色,把20世纪20年代经典“热辣”风格令人兴奋的自发性与一个大乐队令人激动的感召力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鼓手基尼·克鲁帕(Gene Krupa)用他那强有力的击鼓,让《唱、唱、唱》(“Sing Sing Sing”)吸引了30年代中期的青少年们。

摇摆舞的走红还得益于当时发展最快的媒介——广播。1937年,古德曼的乐队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播出的节目“骆驼商队”(Camel Caravan)的常

驻嘉宾,这是一个由香烟公司赞助的每周一播的节目。利用预录和定期播出相结合的方式,“骆驼商队”和美国广播公司(NBC)播出的“让我们跳舞吧”(Let's Dance)之类的节目直接把摇摆乐传播到全美每一个家庭。对于年轻的乐迷们来说,这些“想象中的舞厅”是“如此真实,同时又像梦想世界那样神奇”。



纽约的世博会上,乐迷们和本尼古德曼乐队在一起,1939年

美国的青少年在卧室里收听或者通过投币式自动点唱机点唱,他们发现这种接触摇摆乐的方法简单而快捷。摇摆乐通常都是由顶级音乐家组成的大型乐队来演奏,1937年3月,古德曼乐队里有里奥尼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哈里·詹姆斯(Harry James)和基尼·克鲁帕(Gene Krupa)这些人。摇滚乐从一开始就要发展成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的欢快音乐。古德曼乐队的颤音师莱德·诺瓦(Red Norvo)在接受《综艺》杂志采访时总结说摇摆乐是“引导听众赶上超现实摆动节奏的一种节拍。你知道的,他们跟着你摆动。”

30年代早期的流行乐坛由鲁迪·瓦利(Rudy Vallee)和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之类的“甜美”的低吟者占领着。尽管他们的女性追随者都很疯狂,他们

本身却是安静而优雅的表演者。而摇摆乐则加快了生活的节拍,从1937年开始,它迎来了一个拥有自己的俚语、杂志、时尚和英雄的青少年世界。这个世界是由乐迷们自己创造的。“现在的爵士乐是一个依托大众消费而存在的大产业”,《吉特巴舞》(*Jitterbug*)的编辑这么说,“如果爵士乐想走得更远,它就必须认识到吉特巴舞的重要性。”

摇摆乐揭开了大众交流和青年历史上的新篇章。很多成年记者在面对大型摇摆舞集会时表现出惊讶和谴责,“音乐希特勒主义”是对他们的评价〔1〕,但这只不过更说明了美国青少年正选择一条与成年人不同的道路。摇摆乐不仅仅代表了音乐和身体自由,也代表着各种形式的更广大的自由:真正的解放,不仅仅是首创这一音乐风格的黑人音乐家的解放,也是在这种音乐中成年的青少年的解放。

\* \* \*

由于政府政策的原因而延迟进入成年人社会的一些美国年轻人开始提出自己的要求。1936年7月,美国青年代表大会发表了《美国青年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American Youth*):“我们渴望工作、生产、建造,但我们中的上百万人被迫无所事事。我们从中学或者大学毕业,掌握了专业和职业技能,但是我们没有工作。我们似乎看到自己游荡在高速公路旁,或者军队监管的营地里,与家人和朋友隔离。我们拒绝成为迷惘的一代。”

由于不愿成为20年代大学生消费者那样的人,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中的一些学生积极分子提出了一项新的“权利法案”,宣布他们团结“黑人”、罢工工人以及各地的进步力量。尽管还没有走得宣布年轻人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那么远,他们还是宣称“我们的问题和抱负与所有人民的问题和抱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宣称自己有超过100万的潜在支持者,继续要求实质性的权利。

1937年2月,一个叫“要求工作和教育的青年朝圣者”(Youth Pilgrimage on Jobs and Education)的组织在华盛顿举行游行,抗议对酝酿中的美国青年法案(American Youth Act)进行镇压的行为。可能就是这一举动迫使全国青年事务局

---

〔1〕 哥伦比亚大学哈里·D·吉迪戎斯(Harry D. Gideonse)教授的评价,见1938年11月2日的《纽约时报》。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通过对高中生进行义务制公共教育的条款。但是这一政府性的青年机构被反对力量和敌意的右翼势力削弱了力量。尽管它所作的承诺和出发点都很好,全国青年事务局还是没能成功地解决经济萧条期中青年人的问题。

全国青年事务局的很多条款都很具实践性和启发性。它为青年人提供了与成年教育项目以及旨在指导年轻人适应全职工作的实用课程相关的帮助。

它还为超过16岁的高中生提供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辅助项目,最高的月工资定为6美元。它的另外一个贡献是在30个州内建立起居住项目机构;在这些营地里年轻人最多可以住6个月,他们在那里工作、自理,和同龄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全国青年事务局推广的这些项目只能惠及“一部分处于极端抑郁境地的青年人”身上。尽管在它成立后的两年半里有50万年轻人通过它解决了问题,但是这些人相对于1937年末仍然处于无业状态的400万16到24岁的青年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就像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主席威廉·W·海克里(William. W. Hinckley)所抱怨的那样,“对美国的年轻人来说,生活在生命的全盛时期,黄金的青年期,只不过意味着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的第七个年头获得了为糖果和香烟制造业工作的权利。”

撇开其社会主义倾向,这个政府的青年组织并没能削弱美国生活中基本的功利主义。人们可以从这个组织自身的文件中找到证据。衣着被认为是学校的一项“基本支出”。正如一个管理者注意到的,“通常领了第二份工资以后,男孩会去买一条新裤子。这条裤子可能花了他两三美元,但这些钱是他自己的,他用自己的钱买裤子。可能他领到下一份工资以后会买一双鞋。女孩子穿一身2.95美元的衣服就能漂亮得像朵花。你不可能了解这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尽管经济萧条,一个美国公民是否成功仍然取决于其占有商品的多少。虽然美国的青少年在前20年间拥有相当可观的购买力,但是这种购买力中的一大部分,尤其是没够上大学年龄的那些孩子的购买力,还是取决于成年人的批准和控制。在1920年到1921年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孩子们——现在刚刚十六七岁——获得了政府赞助的工作,决心一旦拥有自己的权利,就要以自己选择的方式行使这些权利。

第一个青年市场把目光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丰富的大学文化上。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上高中,青少年消费的潜在市场在年

龄和阶级跨度上都有所增大。林德夫妇回到芒赛以后,观察到潮流仍然是由“商业阶层女孩”所引领的。1935年开始,美国的年轻女性中开始流行起一种新的大学女生类型,她们有一个商业化的名字叫“社交界新人”,显示出她们富裕的身世,就算这不是事实,也代表着一种追求。

青年经济蓬勃发展,为了迎合这种发展做些尝试完全合情合理。1936年5月,《时尚》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15岁是多大?》(“How Old Is Fifteen?”)的文章,探讨了美国青年人的问题,作者鲁斯·匹克林(Ruth Pickering)认为:“在1936年的纽约,常规已经非常罕见,喜欢探索的年轻人与监管他们的成年人之间仍然斗争不已。所谓的‘社交界新人’上的是私立学校,她们的母亲穿梭在无聊的舞会之间,因此她们虽然已经迈入青春期,但还都像是小孩。”

但是通过一些图片和引用白布斯·塔金顿的一篇文章,《时尚》杂志还是在它的读者中发现了年轻人的早熟现象:“如果有可能的话,年轻人渴望更早的独立。他们想象中的绝对自由就是冲入‘哈莱姆丛林’和‘乡村海盗巢穴’。他们渴望去纽约的时髦地方,因为据说比他们年长一点的行动完全自由的大学生们常在那里碰头。闯入这些所谓的禁区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成年。变得老练是他们的抱负,老练也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词语。”

一种准成人的独立就是这个“不安分”群体的目标,也是他们“对更高年龄层的追求”。和以往一样,早熟现象中难以启齿的是性,而这也是旨在塑造青少年性格的媒体继续关注的。“社交界新人”这个词第一次在媒体上的使用是在《妇女家庭杂志》1935年始创的读者问答专栏,而《学生》杂志则在1936年创办了一个新专栏,也就是盖伊·海德(Gay Head)长期负责的“男孩约会女孩”(“Boy Dates Girl”),这是第一个教授礼仪的栏目。

对年轻女孩来说,保持贞洁仍然是一个理想。处女仍然是“高级商品”。社会还要求她们根据男朋友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个性:“男孩子喜欢处于操控地位。”但是蓬勃发展的问答专栏发展到了几乎荒谬的程度,因此限制了青少年的自主性,这反映了美国具有高度规范性和约束性的一面。1937年教会背景的家庭协会(Home Institute)发表了《少年礼仪》(*Etiquette for the Teens*),这些“以适合青少年的语言写成的友好的、切合实际的、紧跟时代的建议”加起来有40页之厚,都是些严格的规矩。

这些礼仪手册很明显是成年人对青少年的行为举止所作的规定,它们因此突

显出一个事实：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父母和权威们都担心会失去对美国青少年的控制。与此同时，保守的家庭协会采用了“青少年”这个词，这说明一个独立的青少年世界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力量，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名称了。尽管成年人竭力阻止，摇摆乐青少年们还是齐心协力地把所有不同元素融合成一个连贯的亚文化群。

\* \* \*

1938年1月，古德曼乐队在代表经典文化中心的圣殿卡内基音乐厅(Carnegie Hall)表演，由此声名达到了顶峰。那时候观众观看演出时激动的举止几乎已经程式化了。《节拍器》(*Metronome*)杂志观察到年轻人在乐队演出《唱、唱、唱》时几乎陷入疯狂：“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开始创造一种新舞蹈，坐着摇摆着，用脚踏着舞步。在边侧传统包厢里年长一点的像企鹅一样笨重的男人也没了禁忌，开始站起来摇摆。”终场时，围聚的观众们“开始鼓掌、跺脚、欢呼、咆哮”。

年轻的女孩子们站在前列。很多乐迷俱乐部的主席都是还在上高中或者大学的女孩。女性的摇摆乐迷比男性摇摆乐迷更好辨认，她们总是穿着宽松的衬衫和毛衣、平底鞋、白色短袜以及跳舞时会向上展开的带褶短裙。这种装扮舒适、实用、方便行动。古德曼乐队的主唱海伦·华德(Helen Ward)注意到，在最初的时候，女孩们“都盛装打扮，但是当摇摆舞真正流行起来以后，她们都开始穿平底鞋了”。

这是从被严格监管的“社交界新人”群中发出的一声呐喊。对年轻的摇摆乐迷里奥纳多·普拉特(Leonard Pratt)来说，穿着“高跟鞋、丝袜、漂亮蓝礼服”的保守女孩已经“不合时宜了”。女性的摇摆乐迷们共同享有的自由似乎把所有的礼仪约束都扔到垃圾堆里，其中自然也就包括性自由。“女孩们会向我们挥手，乐队的很多单身男孩向她们打手势，然后和她们在后台入口相会”，古德曼乐队的萨克斯管吹奏者阿瑟·罗利尼(Art Rollini)回忆道，“乐迷来信像潮水般涌到乐队成员的手中，给他们电话号码。”

男性摇摆乐迷则穿松垮垮的裤子和长夹克，长长的链子连接着腰带和口袋，或者绕在手指上，同样流行的还有猪肉馅饼帽以及仿毛外套和波莱罗袖〔2〕。这

---

〔2〕 还有梅西百货卖的吉特巴舞饰物：做成不同乐器形状的胸针。

些装扮中的大部分风格属于黑人城市风格,吉特巴舞也不例外。本尼·古德曼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见吉特巴舞是在1934年,一个男舞者开始“变得兴奋起来,他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四肢开始像飓风中的风力发动机一样旋转,他被节奏迷住了,似乎变成了狂舞的托钵僧。”

这些“新非洲式的”即兴创作开始之后,哈莱姆的一个“先锋派”也开始了查尔斯顿快步舞的即兴创作。卡尔·范·维克腾在小说《聚会》(*Parties*)中写到了摇摆舞的“第一次正式露面”,发生于“1928年某个时候曼哈顿俱乐部举办的一场黑人舞蹈马拉松上”。这种舞蹈最不同寻常的特征在于可以脱离你的舞伴,尝试“你梦想的一切”。随着摇摆舞在白人中的流行,摇摆舞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吉特巴舞。

30年代末的这一代跳的这些舞蹈强调严格的节奏,以豪放、时断时续的动作取代了以前舞蹈那种优雅而又一气呵成的感觉。正如《纽约时报》观察到的那样,“白人跳的吉特巴舞大部分时间是粗野的,但是黑人最初发明这种舞蹈的时候完全不是这副光景。那时候的动作从来不会夸张到失去控制,而且即使是最狂野的动作中也会有种最明白不过的体面感。”摇摆乐迷们很羡慕这种狂野中的优雅,正如布朗克斯高中的一名学生所说,他们“都希望自己够得上去萨瓦舞厅的年龄,因为那里有真正顶尖的吉特巴舞者展示自己的舞技。”

和摇摆舞一样,谈论爵士乐也一下子变成了时尚潮流,对于外行人来说,谈论爵士乐成为摇摆乐文化最明显的标志。卡伯·卡洛维(Cab Calloway)在其首版发表于1938年的《爵士乐迷字典》(*Hepster's Dictionary*)一书中帮助诠释了这一潮流。从被称为“猫”的乐队演奏者开始,这本爵士乐术语汇编覆盖了爵士乐的每个方面。乐迷们被称作“鳄鱼”、“吉特巴舞者”、“摇滚舞者”,他们跳摇摆舞或者跟着“夜店”里的“鼓手”和“节奏强的爵士乐”“疯狂”。“拘谨者”又称“傻人”,用来指不会跳爵士舞的人,“不时髦”的人。

这些新词就如野火一样在瞄准摇摆乐市场的新杂志上迅速流传开来:不仅仅是《跳跃》(*Down Beat*)和《节拍器》,还包括如《摇摆乐》(*Swing*)、《猫咪喵》(*Cats Meow*)、《爵士演奏会》(*Jam Session*)和《吉特巴》(*Jitterbug*)之类的乐迷刊物。这是一个白行其道的世界。在《一个吉特巴舞者的日记》(“*The Diary of a Jitterbug*”)一文中,无名的男性叙事者回忆了自己和“来自‘猫咪喵’的吉特巴舞者们”一起去“在管弦乐团音乐厅召开的大型爵士音乐节”的情景:“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 也在那里,温和而老练,他的乐队自然震撼了我们。”20世纪20年代晚期令外人难以参透的密码已经被大部分的美国青年破译了。

爵士乐成为了一种潮流,而其根源也开始得到关注。本尼·古德曼认为,其乐队的多种族结构及摇摆风格都与“我们的管理风格”相关。英国批评家弗兰西斯·牛顿(Francis Newton)〔3〕认为爵士乐是“抗议和反叛的音乐”。新政的渐进政治对爵士乐影响深重。这两者之间联系的核心人物是音乐界专家约翰·哈蒙特(John Hammond),他把政治激进主义和发掘、宣传以及记录如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贝西·史密斯(Bessie Smith)、弗莱切·汉德森(Fletcher Henderson)以及贝西伯爵这些爵士音乐家联系起来。

哈蒙特的影响力拨动着成长于贫困犹太家庭的古德曼的心弦:1937年,古德曼为支持西班牙民主委员会捐了1000美元,并且组织建立了名为“群星援助西班牙”(“Stars for Spain”)的救济金。这种摇摆音乐和左翼政治之间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纽约成立了第一家无种族界限的人民战线夜总会“格林威治村上流社会”(Café Society in Greenwich Village)。夜总会的海报宣传语为“名人、少女和平民之间的约会”,吸引了类似拳王乔·路易斯(Joe Louis)、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甚至埃莉诺·罗斯福之类的明星和政要来光临。

艾灵顿公爵和贝西伯爵之类的黑人音乐家为年轻的黑人们提供了“榜样和目标”。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认为,在这个运动员成了唯一英雄的时代里——比如重量级世界拳王乔·路易斯和奥运会金牌得主杰西·欧文斯(Jesse Owens),黑人音乐家得到的关注非常有限。他呼吁“那些认为黑人少年缺乏具有男子气概的榜样可以学习的人,应该想想艾灵顿及其乐队长期的国际性职业生涯。”

尽管摇摆乐流行开来,但所有这些派别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种族混杂的乐队里的很多黑人在台上时得到尊重,但是一离开聚光灯的追逐就变得微不足道。广播电台害怕遭到南部观众和潜在赞助商的联合抵制,因此只把播放时间用在摇摆乐的先驱者身上,如贝西伯爵和切克·韦伯(Chick Webb)。由于曝光不够,黑人乐队得到的好评少了,他们的收入也不可能像他们的白人同行那么多。哈姆莱复兴时的状况又一次出现了。

〔3〕 实际上是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以假名写成的。

左翼和摇摆乐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总是轻松的。摇摆少年和比他们年长一点青年之间存在着代沟。《综艺》杂志注意到“由于摇摆乐和吉特巴舞的传播,1938年的青少年们与30年代早期严肃而情绪消沉的年轻人相比完全是另一种生物。30年代早期的年轻人通过加入组织,参加‘进步’运动等等方式来反抗长辈,他们现在已经25岁以上了,一点也不掩饰他们对后继者的鄙视。”

但是,摇摆乐的传播势不可挡。1938年8月下旬,多达10万名的乐迷们聚集在芝加哥军人球场(Chicago's Soldier Field)举办一场名为“芝加哥摇摆乐聚会”(Chicago Swing Jamboree)的盛大活动。许多人挤在外面,推着挤着直到门“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打开。里面的气氛类似“爵士乐里布吉伍吉舞的狂欢”：“就好像这个城市的整个年轻一代——生于世界大战在经济萧条中伤痕累累的一代——披散头发,脱下帽子,在任何可以跳舞的空间里随着爵士乐的强烈节奏起舞。”

随着吉米·多西(Jimmy Dorsey)乐队演奏起《平足弗鲁杰》(“Flat Foot Floogie”),原本就疯狂的人群爆炸了,他们冲上舞台、爬上看台、冲击乐队、毁坏舞台用具。秩序得以控制以后,乐迷们按照自己的节奏和在人群中蛇舞的一队年轻黑人男女一起舞蹈。芝加哥媒体被这一次“吉特巴舞狂热”的大规模展示所震撼:一家报纸称之为“可能是自中世纪儿童十字军后表现年轻人充沛精力的最奇怪展示”。

但最令人担忧的还是人群里种族混杂的事实,就像这种音乐本身所提倡的理想一样。摇摆乐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种族隔离,大型的管弦乐团比任何运动或者军事组织早10年冲破了种族界限。对于成年批评家来说,这种“大熔炉”的迹象令人震惊。迪比克的天主教主教谴责摇摆乐“邪恶”,“有共产主义倾向”：“我们任由爵士演奏会、吉特巴舞以及它们食人的音乐狂欢在我们的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把我们的年轻人引上了一条通往地狱的道路。”

\* \* \*

摇滚乐的日益走红和在公众中的盛名标志着美国的青年人在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带来的几乎长达10年的迷惘和劣势以后,开始重新找回自己的优势,这从好莱坞所拍的电影上就可以反映出来。《国民公敌》和《这些是我们的孩子吗?》(Are These Our Children?)之类的电影中残忍的贱民形象被《孤儿乐园》(Boys

Town)中的街头孩子形象所取代,他们希望被公平对待,希望获得别人的同情。他们本质并不坏,只不过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部片子是1938年较为成功的一部,由史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和当时还很稚嫩的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担纲主角。

这种现象表明自从30年代中期以后对青少年犯罪的野蛮刻画变得越来越少。除了死角小孩——《死角》(*Dead End*)里刻画的时而傲慢时而危险的“被遗弃的坏小孩”外,好莱坞刻画的青少年形象主要是亨利·奥尔德里奇(Henry Aldrich)和安迪·哈蒂(Andy Hardy)系列。这些电影把场景设在儿童读物中的经典场所——美国小镇上,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安迪·哈蒂系列的主演米基·鲁尼成了1939年美国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和好莱坞不同的是,音乐行业没有外界强加的行动守则。由于牵涉面太广,音乐传播不可能被明令禁止。但是,当局者们开始更密切地关注音乐家们吸食毒品的问题,这种现象在1931年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由于吸食大麻被捕后引起广泛关注,哈里·安史林格(Harry Anslinger)被任命为美国麻醉性药物委员会会长后几个月就发生了这一事件。执法者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创造就业机会的任务:禁酒法案已经死亡并被埋葬,是新恶魔诞生的时候了。

安史林格特别关注大麻和爵士乐界之间的联系,而他的举措也由于广泛传播的恐怖故事而加大了力度。其中最有名的是1937年7月他和J.埃德加·胡佛的助手科特尼·赖利·库珀(Courtney Ryley Cooper)合作的文章《大麻:青年人的杀手》(“Marijuana: Assassin of Youth”)。他们开始着手宣传毒品的害处,称之为和“响尾蛇”一样危险。在忏悔作品例如《我是一个有毒瘾的人》(“I Was a Dope Fiend”)以及《君为毒狂》(*Reefer Madness*)之类的电影中,大麻总是和新增的青少年犯罪、自杀以及冷血谋杀脱不开干系。

安史林格把毒品列为头号人民公敌的行为是相当成功的。1937年,大麻税法案(Marijuana Tax Act)通过,非医用占有大麻被确定为非法行为。他还试图强化音乐家和毒品之间的关联:20世纪30年代,几乎所有大型的摇摆乐队里都至少有一名毒品吸食者记录在案。但是,大麻事实上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白人观众。就连科特尼·赖利·库珀对30年代末青少年犯罪所做的调查作品《猩红的设计》(*Designs in Scarlet*)中也很难发现吸食大麻的铁证。

这些行为并没有阻止摇摆乐成为美国青少年主流的一部分。《人生》杂志所

做的调查《青年人问题:1938》(“Youth Problem: 1938”)仔细挑选了一些代表性类型,其中特别报道了一名来自马里兰州的18岁“白领男孩”肯尼思·琼斯(Kenneth Jones),他不抽烟不喝酒,并且希望成为“一名共和党政客”。但是,这名完美的孩子却在保险公司的工作之余在一个摇摆乐队里担任鼓手,和“他的女孩”一起演奏吉米·路瑟福特(Jimmie Lunceford)的唱片音乐。

对一些事实评论员来说,这些年轻爵士乐迷们的热情代表了一种可贵的乐观和活力,这对一个疲惫不堪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摇摆乐是青年人为了让这个快速前进的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发出的呐喊,”《纽约时报》1939年初如是说。“摇摆乐是我们时代的节拍。摇摆乐是真实的。摇摆乐充满了活力。”随着美国文化继续传播到大西洋彼岸,摇摆乐令人兴奋的节奏以及它对自由的呼唤打动了欧洲的年轻人们,让他们在法西斯专制和失业带来的悲惨境界中有了新的梦想。

\* \* \*

摇摆乐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开始进入欧洲。英法两国对热辣爵士乐的品味早在20年代就已经培养起来,这一火种在铁杆乐迷的努力下得以保存,他们为了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和艾灵顿公爵这些外国明星的表演蜂拥而至。卡伯·卡洛维1935年访问英国在曼彻斯特作短期表演时,“人们爬上舞台,到处都是,当我们离开剧院的时候他们试图撕扯我们的衣服”。到30年代中期,出现了相关杂志《热辣音乐》(*Hot Music*)和《摇摆乐》(*Swing*),法国批评家查尔斯·狄隆内(Charles Delaunay)也发表了其极具开创性的《热辣音乐唱片分类学》(*Hot Discography*)。

1938年,《画报》在一篇名为《美国的舞蹈狂》(“Dance Madness in U. S. A.”)的文章中宣传了摇摆乐:“美国已经陷入了对摇摆乐的痴狂中,但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痴狂。心理学家们自作聪明,咕哝几句话就要10美元,其实这种痴狂完全是因为快乐——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快乐,在那里娱乐不是重罪,非常人物是热辣摇摆乐艺术家而非毒气专家。”对英国的乐迷来说,由于音乐家联盟(Musicians' Union)1935年开始禁止美国乐队来访,这些文字就是他们能得到的最接近摇摆乐的东西了。那个时代最盛行的是节拍严格的舞蹈,吉特巴舞被大部分去舞厅的人视为一种异族的干扰。

英法两国小部分喜欢摇摆乐的人并不被视为异类。但是在德国,作为一名摇摆乐迷则要危险得多。希特勒政权从一开始就唾弃爵士乐。一名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人物 1936 年夏总结了他们的观点:“黑鬼有着非常强烈的节奏感,他们的‘艺术’可能是天生的,但是却冒犯了我们的情绪。他们的这些名堂只能在黑鬼中传播,而不可能属于德国舞厅。另一方面,犹太人却有意在学这些越轨行为。”

纳粹德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监管严格的国家。1933 年 9 月,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建立了帝国文化协会(Reichskulturkammer),这个协会包括 6 个独立的部门:广播、戏剧、电影、写作、新闻和音乐。帝国文化协会开始控制德国每个独立音乐家的活动,颁发会员卡,没有这张卡就不能公开表演。1937 年 12 月,“外国的”音乐被官方禁止。

协会还监管广播。这一媒介是戈培尔进行宣传的必需品,除了纳粹言论和歌曲,还播放轻度娱乐性质的贵族音乐。爵士乐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外国明星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和西德尼·贝彻等人以及“斯特芬·温特劳布的爵士人”(Stefan Weintraub's Syncopators)之类的本土乐队曾经让爵士乐深入人心。尽管很多纳粹分子视之为“一个腐朽社会的腐朽物”,热辣爵士乐还是成为 30 年代晚期之前纳粹政权大力推广的技术性消费主义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要控制大众媒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残留的爵士乐俱乐部在这个极权主义国家里无孔不入。一直到 1937 年末之前,在杜塞尔多夫(国际节奏俱乐部)、柏林(旋律俱乐部)以及其他像莱比锡这类城市中的一些人还是能买到德国产的爵士乐唱片。与此同时,他们能在德国国内四处游历,观看乐队表演。并且由于卢森堡公国广播发射器强大的功能,他们能够收听到不受监管的演出,1938 年以前,国际旅游业不受限制,他们甚至能够出国看偶像。

爵士乐的地位仍然难以界定。1936 年法律颁布以后,希特勒青年团的警察组织就盯上了爵士乐。经常会有这样的情景发生:当纳粹冲锋队员们发现一群年轻人在波罗的海海边上听爵士乐的时候,他们会冲上去毁掉唱片。帝国文化协会的间谍会定期查看夜总会和舞厅,这些人衣衫褴褛的样子就很容易暴露他们的身份。同时,戈培尔也不得不在德国人对爵士乐的爱好的面前低头,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在德国广播里播放少量不温不火的德国产品。

爵士乐迷们心甘情愿地承受着各种困难,因为这种音乐代表着另一世界的承

诺。出生于1920到1925年之间的孩子迫于压力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一部分数量虽少却很顽强的爵士乐俱乐部仍然尽可能地保留着他们的爵士乐生活。沃纳·丹尼尔斯(Werner Daniels)的国际节奏俱乐部(International Rhythm Club)的成员以杜塞尔多夫为大本营,全部改用美国盎格鲁式的名字,用“尽情摇摆”来互相打招呼。他们认同哈莱姆黑人而非希特勒青年,因此组成了一个业余爵士乐队,直到不得不服兵役的时候。

最大的组织是汉堡摇摆乐青年团(the Hamburg Swing Youth),这个组织的中心力量是来自国际大都市的青少年,如拥有一半塞浦路斯血统的德米特里厄斯·基奥基迪斯(Demetrius “Kaki” Georgiadis)和生于荷兰的希腊人安德雷斯·潘那高普罗斯(Andreas Panagopoulous),他们于1937年冬组成了一个“溜冰场小群体”。他们最初是在有钱的父母家里碰头,穿着奇装异服显示对英国音乐的偏好。在这一阶段,他们不过是找找乐子。但是,当他们开始走向公众,在这个城市最时尚的街道上上窜下跳地用口哨吹奏摇摆乐曲时,麻烦来了。

1937年下半年名为“摇摆舞”的“社会舞蹈”的引进使得爵士乐迷和当局的冲突公开化。这种摇摆舞模仿美国影片《红伶秘史》(*Broadway Melody of 1936*)中的摇摆舞,强调四肢放松的双人动作。这种舞蹈中有贴面舞的动作,但是据历史学家迈克尔·卡特尔(Michael Kater)所说,舞伴“通常跟着乐队强劲的节奏,一会儿跳到对方面前,一会儿又跳开,散发出性诱惑。”与纳粹版本的舞蹈相比,这种狂野的舞蹈对“摇摆佬”或者“摇摆宝贝”之类的练习者来说更让他们激动。

但是,这种舞蹈和纳粹试图强加在所有德国青年身上的严格的军事化纪律水火不容。1937年,党卫队明确谴责了本尼·古德曼和乔治·格什温,随之而来的就是地方性地禁止公开的爵士舞蹈。汉堡的地方长官斥责摇摆舞是“黑人舞蹈时期最可怕的派生物之一”。柏林的莫卡埃菲舞厅(Moka Efti ballroom)也张贴了“禁止”标志。但是,这些压制手段完全被“摇摆佬”们忽视了。戈培尔的监视系统也并不是全知全能的。

\* \* \*

与此同时,纳粹病毒也跨过了大西洋。1939年2月,德美协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 Square Garden)召开了一次最大规模的集会。“大厅里挤满了2000名男男女女,还有很多小孩,”秘密调查人约翰·罗伊·卡尔森(Jone Roy Carlson)

写道，“讲话者所站的平台上面高高地矗立着乔治·华盛顿的大型塑像，其侧面是巨大的纳粹卐字标志。从大厅后面的某个地方传出压抑的鼓声，这时 1200 名强壮的、穿着制服的纳粹分子组成的军团行进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卐字旗和徽章后面！”

尽管法西斯组织明确表明自己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建立青年团体的意图，他们的这些行为吸引的年轻人大多数还是“来自于破裂或者贫困的家庭，有犯罪、屡教不改、小偷小摸或者其他不良行为的记录。”卡尔森注意到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的一个“典型”追随者的对话：“‘读读社会公义，想想怎么解决犹太人问题。’‘怎么解决？’我转过去问一个刚刚 10 来岁长着青春痘的年轻人。‘让他们靠墙排好，然后砰砰砰几枪把他们解决掉。’”

詹姆斯·T. 法雷尔描写一个年轻的库格林追随者的小说《汤米·盖拉格的圣战》(*Tommy Gallagher's Crusade*)中的场景就来源于激烈的巷战。年轻的法西斯主人公可能仅仅是个讨厌的人，但德美协会则是一个严重得多的政治威胁。协会由参与慕尼黑叛变的老兵弗里茨·朱利叶斯·库恩(Fritz Julius Kuhn)创办〔4〕，目的在于在美国给希特勒以支持，并且为在一战中受到歧视的德裔美国人提供学习他们传统的机会。其中的青少年项目教授孩子们德语以及怎样向纳粹的卐字党徽敬礼。

卡尔森潜入位于长岛的协会的一个营地以后——美国 24 个营地中的一个——他发现这就是一个小型的纳粹社会：“3 点钟，一辆车开来，12 名穿着制服的青年团(*Jugendenschaft*)成员下来了。青年团(协会的男性青年分支)直接以希特勒青年团为参照。他们衣服上的纽扣是纳粹的卐字标志，还别着徽章——黑色背景上一道短短的呈锯齿状的闪电。他们随身携带的短匕首上刻着‘鲜血和荣耀’的字样，象征着对祖国的永远忠诚。”

这些邪恶现象是在国际形势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到那年夏天，美国的形势和潮湿的天气一样让人难受：日报报道的都是但泽危机(Danzig crisis)，专栏则建议美国持孤立主义立场。8 月，《纽约每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头版刊登了一名 19 岁的布鲁克林协会(Brooklyn Bund)成员海伦·瓦罗斯(Helen

〔4〕 他迁到底特律，在福特公司工作，受到亨利·福特在《德宝独立报》(*Dearborn Independent*)中表达的反犹太人思想的鼓舞。

Vooros)行纳粹军礼的照片。她给反美行动调查委员会(Dies un-American Investigating Committee)的供词很坦率,她说,“德国希望在未来征服美国。”

这种威胁引起了共鸣,因为在经济萧条的10年后,超过四分之一离开学校的人都没能找到工作。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生育高峰的人危险地四处游荡。美国青年委员会(American Youth Commission)所作的调查《青年讲述自己的故事》(*Youth Tell Their Story*)报道说美国的青少年“经常无所事事,更希望做其他一些事情”。科特尼·赖利·库珀估计“四五百万16到25岁之间的年轻人不上学也没工作,整天在他们街区附近没有目的地游荡,为他们无处发泄的精力寻找出口。”

美国青年显然已经为一切做好了准备——谋杀、骚乱或者革命,但是评论作家、记者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有确定的信仰”来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李普曼给《人生》杂志1939年6月刊写的关于“美国的未来”的封面故事中,援引了约翰·菲斯克关于“美国的天定命运”的观点。“我们个人的好恶在历史的伟大运动中不值一提,”他总结道。“罗马对古代世界意味着什么,大不列颠对现代世界意味着什么,美国就将对未来世界意味着什么。”

1939年在纽约法拉盛草地(Flushing Meadows)召开的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成为这种狂妄言论的强大支持。从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开始,美国举办的这类大型活动都很成功。以“明日世界”为名,1939年的世界博览会确实是一场全球性的展览会,超过60个国家(除了德国)参加了展览。与此同时,展馆简约的形状设计以及博览会会标三角尖塔和圆球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成为即将到来的技术乌托邦的理想标志。

世界博览会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宣传。“一旦你看一眼明日世界,”《时尚芭莎》表示出极大的热情,“你再也不会往回看。”这种宣传为博览会赢得了一大批的青少年观众:“1939年4月30日,我们将开始眺望未来。不是占卜赛茶室里老女人预言的那种未来,而是真实的未来,由科学家、建筑家、艺术家、发明家还有照明专家们设计的从法拉盛草地的堆积物里升起的一个奇妙新世界。你以现代的身份进去,出来的时候就属于未来了。”

\* \* \*

就在这个酷热难耐令人倦怠的盛夏,米高梅公司在纽约首映了《绿野仙踪》。

鲍姆的这本经典著作耗时两年才搬上银幕,这时距其第一版发行已有40年。公司希望能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史诗般的作品,与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一较高下,邓波儿在1936、1937、1938年连续称霸票房。拍摄这部电影的目的还在于迎合当代好莱坞的风尚,也就是编剧佛罗伦萨·瑞尔森(Florence Ryerson)和埃德加·爱伦·伍尔夫(Edgar Allan Woolf)所说的“回到简单、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为了表现这种田园诗般的简单质朴,《绿野仙踪》的拍摄过程尤其复杂。繁多的场景、庞大的临时演员阵容以及全面的技术革新使这部作品拍摄了6个月,并且远远超出预算,几乎是米高梅公司一般影片投资的两倍。公司还有一些重要的后续工作要做,1939年5月开始发动了大范围的宣传攻势,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在全国范围进行预订活动。

所有的媒介都被利用起来,不管是免费明信片、散发的传单、电影院门廊上的横幅、海报、搭卖的产品,还是精美的宣传手册,又或者是瞄准主流杂志和报纸的各种不同的照片和故事。电影的主题曲《飞过彩虹》(“Over the Rainbow”)由作家伊普·哈伯格(Yip Harburg)和哈罗德·阿伦(Harold Arlen)作词,被创作成了“一首思念的歌”。这首歌由影片16岁的女主角朱蒂·加兰(Judy Garland)演唱,到8月份已经变成美国最广为传唱的歌曲。

米高梅公司决定让朱蒂·加兰配合影片在每个城市的首映进行宣传巡演。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得到美国最顶尖青年米基·鲁尼的陪伴:他们两人在1938年的影片《爱情撞上了哈蒂》(*Love Finds Andy Hardy*)中就已经是一对,公司还希望宣传他们即将拍摄的音乐剧《娃娃从军记》(*Babes in Arms*)。这两人都多才多艺并且很受欢迎,但是没人能预料到他们8月9日在华盛顿的首次露面就引起极大的反响,并且在康涅狄格州接下来的3天里持续火热。

这种前期的宣传造势在纽约达到了顶峰,为争夺“官方欢迎团”150名的成员资格而展开的竞赛吸引了25万参赛者。当加兰和鲁尼于8月14日那个星期一中午抵达曼哈顿的时候,这些被挑选出的小部分人被挤满中央车站的“被绳子隔开发狂尖叫并且浑身冒汗的”1万名影迷所淹没。《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拍到了朱蒂·加兰被2名保安拉扯的姿势,她的脸由于痛苦和震惊而扭曲了。

等到影片在国会剧院正式上演的那一天,也就是8月17日星期四,人群从早

上5:30就开始在百老汇排队。到早上8点5000张票开始起售的时候,警察估计剧院外有1.5万人,在百老汇和第八大道、第50街和51街之间的街区排了五、六层。这时,记者们凑近看了一下以女性为主的队伍,观察到“队伍中60%的年龄都很小”。

被这种架势吓晕了的加兰和鲁尼很快就恢复过来,开始在电影表演之外的舞蹈和演唱中展示他们最专业最好的一面。到这天结束,他们总共为3.7万名观众表演了7场,《好莱坞记者》(*Hollywood Reporter*)报道说“人潮几乎挤满了百老汇的其他建筑物,他们涌进饭店、饮料店还有糖果店”。在过度的关注下,这种现象持续了近2周,直到鲁尼8月30日的最后一次露面:挤满人的演出、挤满人的街道、被包围的明星。

这是自鲁道夫·范伦铁诺1926年8月的葬礼之后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大众对电影明星的追捧。但是在这次对曼哈顿街道的占领中,群众表现得既不残忍也不暴力,明星也表现得非常真实生动。它让好莱坞喜出望外,在这之前好莱坞对青少年市场毫无概念。尽管宣传得天花乱坠,《绿野仙踪》并不是作为一部青少年电影推广的,而是两个人气不断上升的明星演绎的一部童话。

这两个明星也不是典型的青少年。朱蒂·加兰和米基·鲁尼是在不安全的巡回演出中培养出来的特殊产物,他们不是那种亲切的邻家小孩。在他们身上还体现了青少年明星的年龄模糊现象。尽管被好莱坞尊为“青少年的精神代表”,鲁尼只有5英尺3英寸高,相对他的年龄来说矮了点。他17岁了,看上去还像12岁,就像他在《孤儿乐园》中饰演的角色一样。“大部分男演员到了一定年龄就开始生长发育,到了他们长得又瘦又高的年龄,他们就不得不退出。我不是这样发育的。”

他的合演者则是另一种情况。1935年签给米高梅公司的时候,朱蒂·加兰只有13岁。她的身体用好莱坞的眼光来看不够完美,所以必须进行无情的重塑:腰上围着束腹,牙齿也得重整,1937年体重太重的时候还得服用苯丙胺。《绿野仙踪》期间她16岁,但是她把胸脯包裹得很严实,看上去只有12岁——介于书中的小孩桃乐茜和1902年舞台剧《绿野仙踪》中那个青春期少年之间的状态。但是这种把人变成明星的产业化过程对影迷们来说毫无意义。

年轻人的饥渴——渴望属于他们自己的某些东西,渴望找一个行动的理由——造就了这一事件。他们进入国会剧院以后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令人眼花

缭乱的新技术赋予了彩色画面“一种奇特的品质”，也给他们自己的处境提供了一个比喻。随着电影从单调的黑白色发展为极其生动的彩色，他们看到桃乐茜单调的生活向外打开，变成了对自由、友谊和转变的追求，在那里你可以找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变成你想变成的人。

8月27日，朱蒂·加兰和米基·鲁尼一起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博览会为新青年文化的新贵们特别开放。在几个小时里，他们乘坐了高空飞船、空中汽车，徜徉了福特大楼周围的“明日之道”。他们参观了时空剧院，还有博览会的主题展品，在那里你可以俯身凝视“民主之城”，也就是“未来经过规划的综合的花园城市”。加兰后来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妙的夜晚”。

8月29日，纽约的梅西百货(Macy's)重金为“朱蒂·加兰女装”作了整页的广告，而这种女装在它们的“青年中心”专柜有售。同时出售的还有国会剧院演出的相关产品，以及展示“绿野仙踪帽”的侧柜。这些绉布和羊毛产品“由朱蒂·加兰亲自设计挑选”，针对“正好是朱蒂年龄段的10来岁的女孩……拥有成年人思想的正在成长的女孩。她们坚信虽然她们年纪很轻，但同样可以拥有某种魅力。”3天以后，欧洲就爆发了战争。

第六部分

1939—1943



## 征服者与统治者

战争时期的希特勒青年

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一条不变的定律贯穿始终:在时代中取胜的必定是青年。新时期到来了,守旧的民族定会消失。有的国家已经意识到了青年的力量,而另一个国家一群失去人民威信的老人还在喋喋不休地争吵,那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换句话说,我们的军队胜利的秘密就在于我们把握了时代的特征。

——《黑色军团》,1940年8月党卫军出版



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消防员,20世纪40年代

如果说极权主义是 20 世纪政治生活最为关键的新思想之一的话,那么纳粹德国便是这一思想的有力印证。这是一个建立在战争、牺牲、死亡和极权基础之上的神秘国度。正如其政府领导人之一,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博士所说:“在纳粹德国,个人根本不存在。”在纳粹的世界里,没有模棱两可,没有中间道路。一切都黑白分明,非此即彼。这便是纳粹的选择——胜利,或者灭亡。而德国的年轻人正是这种思想的先驱。

1939 年 9 月,绝大部分德国青年都已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是这还不够。战争开始后不久,出现了至少四个负责青年警务、惩治反战者或是立场不坚定者的机构:周末逮捕组织、劳工营、集中营以及行刑机构。这些机构中的伤亡数量不断扩大。勃兰登堡监狱(Zuckthaus Brandenburg)里因政治原因丧生的约 800 人中,有 75 人不满 20 岁,22 个是学生,有一个人甚至才刚满 16 岁。

想要在全民战争到来之际继续鼓动青年,就需要进一步的极权控制,需要制造更为狂热的情绪。于是,纳粹对教育的强行干涉上升到了新的高度。1940 年 12 月,阿道夫·希特勒描述了他眼中的纳粹德国新精英学校,这些学校允许本不能上大学的工人和农民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国家:未来,每一个职位都由我们最有能力的人民之子来担任,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出身并不代表什么,只有成就和能力才能说明一切问题。这是一个伟大的设想。”

但是,这一设想仍有一个宿敌。在同一篇演讲中,希特勒对民主政治颇有微词:“今天,这两个世界遭遇了。在他们那边,我们看到了一个被上层阶级所统治的国家,他们总是把孩子送到伊顿公学(Eton College)这种学校中去。在我们一边,我们可以看到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国家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 Political Education Institutes)。两个世界,一边是人民之子的世界,而另一边只考虑阔绰贵族的孩子。我相信这两个世界中有一个会被打破。”

1939 年后,法西斯德国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展开斗争。在此之前,他们的元首已经谴责了存在于世界上的第三种力量——苏联。的确,苏联势力的存在与他

们政党强烈的反共产主义观念背道而驰。然而,1939年8月的苏德华沙条约签订以后,纳粹战争的铁蹄可以在西欧自由驰骋。同时,斯大林政权也在瓜分波兰的活动中参与了战争。欧洲青年就处在这三种对立的巨大社会力量的夹缝之中。

\* \* \*

1939年9月,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青年相比,德国青年显然更有参加战争的准备。全面的军事训练和海陆空全方位的专门技术培训,使希特勒青年轻松成为了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不过多时,他们便所向无敌。一个个国家纷纷沦陷:1939年10月波兰沦陷,1940年5月是荷兰,两周以后是比利时,法国也只多坚持了四个星期。在挪威、丹麦、芬兰、北非以及西部俄国,战争也获得了胜利。

战争开始时,希特勒男女青年的总数量达到887万。其中最年轻的生于1929年,最大的生于1921年,而且当时的他们都已经过了许多年的艰苦训练。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表明,从一开始,军国主义和扩张就是纳粹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征服的国家不会因为热情的言论投入德意志帝国的怀抱,能让他们屈服的只有强大的武力。”

事实上大部分德国青年没有经历过民主、言论自由或者行动自由。他们的政权对青年的行动动机有着深刻的认识,青年人需要的是行动和独立性,而这种需要正好可以在一个强调国家的传奇历史、推崇运动和准军事化活动、宣扬极端民族意识的教育体系中得到满足。正如阿道夫·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说的:“想要生存的人必须战斗。在这个世界上,不想战斗的人没有生存的权利。”

从德国青年运动早期开始,忘我的热情和不切实际的幻想就是德国青年文化的一部分。希特勒青年组织和军事组织之间关系紧密,无法分割,大部分德国青年毫不迟疑地完成了这一转型。许多年轻人都参与冒险,就像一位德国空军话务员所回忆的那样:“那时我只有17岁,思想还没有定型——决定我的选择的并不是政治上的考虑。我们总爱制造麻烦,很难管教,我们想要的只是更多的经历和冒险。”

即使是像梅丽塔·玛舒曼这样年龄相对大一些、对上一次战争的后果还记忆犹新的迟疑者,也被战争的狂热动摇了。她一路乘火车东行,在路过被占领区时突然意识到:“我的心里有一个声音突然说,‘这是战争:现在你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是什么意思?’我问,‘我不明白。’我的心里一阵寂静,然后那个声音回

答：“当你死了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吗？”“是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怕的。”“那么，对于你自己来说你现在已经死了。”所有属于自我的东西都已经融入了整体之中。”

持续不断的民族主义热潮似乎已经席卷了德国青年。1939年和1940年振奋人心的胜利，已使纳粹思想为大部分德国人所接受。不仅1918年的耻辱已经逆转，希特勒的狂言也得到了具体的证实。建立一个千年不败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似乎迫在眉睫——不仅是在欧洲，而且要覆盖整个世界——这将是一个德国青年的帝国。20世纪40年代伊始，他们认为自己战无不胜，是势不可挡的世界主宰。

\* \* \*

战争爆发后，所有试图掩饰希特勒青年团是一个军事组织的言论都不复存在。巴尔杜·冯·席腊赫马上着手指导约900万的德国青年来适应各种闪击战的需要。1939年的最后几个月间，超过100万希特勒青年积极投身战事，他们的领导者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马上应招入伍。因此，要管理五六百个男孩子的初级禁令长官(Unterbannführer)的职位就委派十六七岁的青年来担任：这是真正意义上的“青年领导青年”。

战前的狂热情绪现在都转向为祖国的事业而奋斗。所有十六七岁的学生立即应招入伍成为陆军部队的一部分，帮助国家取得战争的胜利。在城市里，希特勒青年团分发征兵令和粮票。德意志少女联合会和少女团的女孩子们帮助疏散德国东部战区的孩子，一些还在野战医院和国立幼儿园任职，或在火车站做接待，为入境的军队提供食物和饮料。

所有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积极走访居民，收集战争所需的原料：铜、保安刀片、废金属、纸、草和瓶子，他们完成这些平凡任务的热情毫不亚于体育比赛。一个原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回忆起一位热情高涨的同事时说：“他背上是个塞满瓶子的小包，左手拎着一篮瓶子，右手拎一个网兜，里面也装满了瓶子。他的表情像是相信通过他和他的瓶子战争就会取得胜利。”

1940年被命名为希特勒青年团的“磨炼之年”，这一年，巴尔杜·冯·席腊赫被帝国青年团领袖(Reichsjugendführer)阿图尔·阿克斯曼(Artur Axmann)所取代。阿克斯曼提高了这个组织的工作效率，使希特勒青年团更适合军事需要。新的训练时间表要求少年队(Jungvolk)每周进行两个小时的体能训练，每个星期天

早上进行4个小时的团队运动训练。那些接近参战年龄的青年,每周有4个小时的枪术练习和战地练习。

委任给希特勒青年团的首要任务是迅速扩张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区域。在西欧,征服者们建立起了傀儡政府,只要遵守纳粹的规则,就允许他们拥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其中很多职位长期由法西斯团体成员担任,就像荷兰的安东·马瑟特(Anton Mussert)的中央联邦管区(Nationaal-Socialistische Beweging)。法国被瓜分以后,南部地区由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管理,北部被占区由纳粹党将军奥图·冯·司徒普纳格(Otto von Stulpnagel)管理。

在这些国家,被占领后的生活依然如故,而犹太人则另当别论。在荷兰和法国,犹太人的行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到1942年夏天犹太人普遍佩戴上了黄星袖章〔1〕。而在东部,纳粹的恐怖本质立刻暴露无疑。波兰大捷的标志就是行动突击队(Einsatzkommandos)的残忍屠戮:其目的是扫除波兰的统治阶级和上层阶级。因此牧师、知识分子、教师——所有的地方名流——都会被带走枪毙。

纳粹的计划是以他们选择的种族重构欧洲的人口,这些种族包括中东部欧洲的少数德国人、长期处于争端的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但泽(Danzig)和西普鲁士(West Prussia)的“走廊”地区以及东普鲁士的德意志族人。把波兰西部地区重新命名为华尔斯高(Warthegau)是希特勒特地为其打上的印记。他把这里作为建立一个纯德意志种族星球的试验田。他让西姆莱和阿克苏曼来协同贯彻这些政策。这是一块处女地,希特勒青年团正是开拓的先驱。

1939年10月,作为首席新闻发布官,梅丽塔·玛舒曼抵达波兹南(Posnan)。她发现这里气候寒冷,四处充满敌意,城镇腐臭陈旧,居民愚笨粗鄙。但是,她支持德意志民族开拓波兰的任务。与那些她觉得“在通过政治活动消除个人神经机能障碍”的“德意志帝国”伙伴相反,她相信自己的任务“艰难而高尚”。正如之后她所写的:“通过这样的服务,我们履行了对德意志帝国的义务,对个人来说这不仅仅是自尊的提升。”

尽管四周充满敌意,“开拓工作”还是治愈了“我们儿时和青年时代尊严感所受的创伤”。玛舒曼作为“文化传教士”游经华尔斯高(Warthegau)时,她在困境

---

〔1〕黄星袖章:为了标明犹太人的身份,纳粹德国命令犹太人佩戴黄星袖章,以方便限制他们的自由。——译者注

中得到了欣慰：“那儿没有官僚主义：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主宰。那里允许鲁莽、想象和创业。”几个月过去，她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一个证明德国妇女平等地位的机会。

但是，眼下的任务还没有完成。1941年夏天，被送到遥远的“东部冒险”训练营的玛舒曼服从元首的指示：“我们必须时刻不遗余力”。她发觉自己被成年人的责任包围着：“我们一直得到各种各样的命令。我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做出样子，不管我们的内心是否足够成熟来应对这些事情。这样，我们会觉得曾经试图做的事情逐步‘实现’了。”

当战场从“文明”的西部转移到未开化的东部后，在闪电战中度过的艰难岁月接近尾声。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纳粹—苏联条约，调集了300万德国军队到东部的波兰和罗马尼亚边界。这将会是一场全面破坏的战争。一个在行进中被捕的16岁德国犹太青年所罗门·帕瑞尔(Solomon Perel)说：“只要那些士兵对哪个人有一丁点的怀疑，他们就会命令他脱掉裤子，如果他行过割礼，他们就会辱骂他，让他加入到去森林的队伍。在那里，他会被击毙。”

\* \* \*

第二战场的开辟进一步加深了党卫军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影响。加入党卫军是有志青年的上选。1940年末，武装党卫军(Waffen-SS)的军力达到15万人——这是一支专为东部战争选拔的独立军队。1941年期间，党卫军的征兵统帅戈特洛布·伯格(Gottlob Berger)把目标锁定在1923年前后出生的十七八岁的青年身上。1942年2月，希姆莱(Himmler)秘密指示武装党卫军可以不经监护人或父母的允许征收未满军龄的青年。

在被占区，进行管理的是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和德意志少女联合会只能做些基础工作。但是1940年以后，由阿塔曼嫩(Artamanen)颁布的“回归土地”的政策占据了主导地位。阿塔曼嫩是一个青年农民种族组织(agrarian-racist youth group)，希姆莱曾经也属于这个组织。自1938年以来一直和党卫军关系密切的国家援助局(Landdienst)成为关注的焦点。希姆莱想要的是“优秀的防御农民”：1940年10月，阿图尔·阿克斯曼授权国家援助局把阿塔曼嫩“向自由世界的宣战”置于“更宽更广的基础上”。

这一政策的重要性在1942年得到印证。这一年被命名为“东部战场和国内

农耕的服务年”：阿克斯曼曾说“青年必须看紧这块被占的土地。东部战场将决定德国人的命运。”那一年 1.8 万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在乌克兰和波兰服务。与此同时,3 万名男女青年开始了在东部的服务工作。和玛舒曼一样,他们是殖民者、教师和农民,要在这个被摧毁的无人区域建立一个永久性的防御基地。这项陆地服务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教化被占区的德国青年。

大部分人听从他们新统治者的指示是为了生存。但是,西北部欧洲的少数群体积极支持纳粹的目的和行动:一小部分人是因为忠于法西斯主义,但更多的人是相信纳粹关于新欧洲的设想。因此,和他们痛恨的布尔什维主义者作斗争成为吸引他们的重要原因,丹麦、荷兰、比利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挪威和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青年不断涌向扩张后的新德意志帝国。一旦通过了种族审查这一关,他们就在德意志民族政治教育学院(Nationalpolitische Erziehungsanstalten)接受全面的教化。

1940 年 12 月希特勒的演讲为这些精英学校的扩张打开了绿灯。由于党卫军控制的深入,他们的教育理念越发具有侵略性。随着战争的继续,许多有经验的德意志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的老师被党卫军任命的人取代。这些学校在东部领地蔓延,向从整个西欧地区选拔出来的青年灌输种族优越感和极度暴力的信念,他们最终的选择就是为武装党卫军服务。

虽然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在数量上要少些,但那里的教育更加疯狂。他们课程的中心任务就是让学生无条件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信条和神话,这损害了学校宣称的让学生们“自治”的原则。他们的首要目的是创造一个新阶级来统治迅速扩张的纳粹王国,这和 19 世纪中期迅速发展的英国公学体系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这种官僚主义里没有任何基督教义的痕迹,而是残忍的种族镇压。

后来改名为乔瑟夫·珀杰尔(Josef Perjell)的所罗门·帕瑞尔(Solomon Perel)于 1942 年来到其中一所精英学校。他使那些抓他的德国人确信他是一位德国种族主义者,因此也是纳粹首先要培养的人。据他回忆,“庭院被双层的居民楼围绕着。那儿有一个符合奥运会比赛规格的游泳池,一个煤渣跑道,还有各种体操运动和团队运动的场地。庭院的最末端,在一个很高的新哥特式建筑的山墙上,是‘从欢乐中获取力量(Kraft durch Freude)’的题字。楼里还有餐厅。”

来自新德意志帝国各个地方的青年聚集到这些学校里。这些学校旨在“为各种政党组织培养新一代的领导人。”学生们被分到不同家庭里,每个家庭都有特定

的训练范围：海军、空军、交际、希特勒青年团机动部队以及党卫军。家具和摆设也有意识形态的特色：卧室里贴着“怎样首先在农牧区保持‘纯正德意志血液’”的格言。另一张海报展现了希特勒希望德国青年“坚如钢铁”的训诫。

珀杰尔拿着象征“鲜血和荣誉”的希特勒青年团匕首进入了这个体制，他学习《我的奋斗》和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的《20世纪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还上了教授“犹太人的个性与特点”的种族研究课。这个17岁的青年害怕成为“卐字海洋中孤独的战士”：“我意识到我进入了狮子的洞穴。如果——上帝啊，不会的！——他们发现我是犹太人，他们肯定会像对待捕获的野兽那样把我撕成碎片。一旦这种恐惧占据了我的心，我就很难平复。”

珀杰尔必须反复唱着“当犹太人的血液从我们的刀下喷溅，我们会过得更好”的歌词：“这首歌所唱的是可怕而野蛮的非人道恶行。远远的就能听到德国平头钉靴四处踩踏的声音。成百上千万恐惧的人民在他们面前四散而逃。他们另一首歌曲的歌词预示了占领和摧毁：我们会继续前进，直到一切都被摧毁/今天德国是我们的，明天属于我们的会是整个世界。”

青年们行进到悬挂着卐字标志的饭厅：“没有人直接坐下。他们都像着了魔一样站得笔直，眼睛盯着大厅前面屋顶下的小走廊。那里，麦克风后坐着正准备讲话的领导。他庄严地等待着，直到最后的耳语停下。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大厅。领导讲话了：大厅的音效堪比大教堂，他的声音被放大……我捕捉到了几个词：‘保持种族的纯净……强大。’”

在这所精英学校中，武装党卫军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正如其中的成员所回忆的，这支特权军队“是第一批领到迷彩服的；他们有精良的装备；而且他们知道只要战争需要他们要随时献身。每个人心中的至高理想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前线？下一个任务在哪？下一次接受前线考验的机会在哪？’”这就是令人吃惊的纳粹军队，他们随时听从政权的命令牺牲自己。他们为战死而生。

1942年9月，全欧洲的法西斯运动团体在维也纳大集合，为建立“欧洲青年团(European Youth League)”重整队伍，其目的是巩固新的德国秩序。参加者包括意大利法西斯青年运动团、西班牙长枪会〔2〕(Spanish Falange)、瓦龙青年〔3〕

〔2〕 西班牙佛朗哥时代的法西斯政党。——译者注

〔3〕 比利时法西斯团体。——译者注

(Walloon Rexist Youth)、佛兰德国家社会主义青年(Flemish National Socialist Youth)、挪威国家社会主义民族联盟党(Norwegian Nasjonal-Samling Youth)、芬兰青年运动团、罗马国家青年组织、匈牙利莱凡特青年团(Levente Youth)、荷兰和丹麦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还有来自日本、保加利亚和法国的代表。

法西斯青年新世界秩序的建立似乎近在眼前。然而,梅丽塔·玛舒曼在华尔斯高的战场渐渐发现,每天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首先,官僚主义者来到这里,随他们而来的是她所担心的腐败。与高层官员的频繁接触更加激发了她的完美主义信念:“我相信有一天,这些三流政客会消失。然后,作为青年领袖已经学会自觉自律的一代人将会接管我们的政党。”

她也无奈地意识到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伙伴都和她有同样热忱的信仰。她手下的工人阶级孩子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让玛舒曼受到了打击:“这些女孩对于被送到离家如此之远的地方感到愤怒。她们在军械工业中赚了不少钱,可现在她们必须做自己毫不情愿的工作。回报给她们的只有每天30分尼的零花钱。此外,她们必须忍受每晚结束工作以后也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有周末才偶尔有机会。”

这是阶级冲突的真实体现:“他们对各种指令感到厌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我们的民间舞蹈和民歌荒唐可笑。他们想要的是流行歌曲和美国劲舞。他们的话题围绕着性,而且虽然他们还很年轻,一些人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不少经验。”对玛舒曼来说,这的确是一场失败。她承认:“我心灰意冷,因为当我第一次在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中成为青年领袖的时候,我满心希望能和工人阶级建立伙伴关系。”

即使是这个纳粹的狂热门徒也无法忽视犹太人贫民区的存在。但是她坚持了置若罔闻的态度,“如果我再多打听一些,我可能已经卷入一场难以脱身的冲突,那将会摧毁我的整个‘世界’。我相信其他人也和我一样,我们潜意识中的能量都完全用在怎样让我们远离危机上。正是通过这样的经历,一个人才能体会出所谓的意识形态对青年人的可怕影响。一旦他们臣服于这种意识形态,他们的眼睛和耳朵都会失去判断能力。”

1942年末,这个纳粹国家达到了顶峰。他们的战争机器实现了希特勒几乎所有的狂妄诺言。而且,虽然有莫斯科的抗衡,他们还是收获了最为丰富的战利品。然而,虽然他们的政府大面积地征服了欧洲的领地,也征服了他们自己的民众,他们的中心却有一个空洞。一旦战争的潮水从纳粹德国退去,德国青年坚不可摧的自我感觉将会被害怕、愤怒或者无谓牺牲的感觉所取代。

## 23

# 无奈的应征兵和社会主义英雄

战争中的英国青年

等现在的孩子都长大了,另一场战争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

——《大众观察每周报道》：“19岁的车间女工”（选自“美国12”），1940年4月19日



女工在滚一颗炸弹,英国,20世纪40年代

英国的战争动员要晚些。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机之后,纳粹的威胁才显现出来。成千上万人蜂拥而至,参加本土防卫自卫队(Territorial Army)。1939年4月,政府开始征兵,这是英国历史上首次在和平时期征兵。征兵主要面向20到21岁的年轻人,要求他们入伍6个月。战争爆发时,常规军和本土防卫自卫队共召集40万人,所有年龄在18岁至40岁之间的男性都可能服兵役。

当年末,军队人数庞大,约有150万兵力。与德国不同,他们的情绪既不过于狂热,也不带侵略性。英国青年报名入伍有很多原因:一是责任感,他们意识到必须制止纳粹的行为;另外还有冒险精神。其中一个叫理查德·希拉瑞(Richard Hillary)的写道,“对我自己来说,我完全出于自私的原因而感到高兴。战争解决了所有就业问题,提供了一个通常需要很多年才能得到的自我实现的机会。”

20岁的希拉瑞来自中上阶层,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他在1938年夏天的欧洲旅行时亲历过纳粹的傲慢。在参加赛船会的时候,他那些“没有受过训练”,“自由散漫”的伙伴被对手中一个“看起来很愚蠢的大家伙”奚落了一番。“他一直看着我们,说他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我们根本就是没落民族的代表。对德国人来说,假如是在英国比赛,他们决不会这么懒散地去参加:他们会训练,并且取胜。”

希拉瑞把自己归为“牛津一代”,据他描述,他们的特点是“自私、自我、缺乏奋斗目标。战争提供了一个他们想要的机会。它不需要英雄主义,但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告诉人们:我们讨厌受人摆布的爱国;我们不喜欢受人干预。我们还可以证明虽然我们看似缺乏纪律性,但我们能够与教条主义的希特勒青年们相抗衡。”

总的来说,中上层和上层阶级的青年动员做得很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成为军事力量。正如一位文法学校校长1942年所写的那样:“那些男孩会从战争中受益的。我相信战争能使他们勇敢地面对现状和困难。战争强调的是责任而不是特权,战争还使他们对于自己未来的责任有了更深远的认识。就像一个男孩子几个星期前对我说的,“我们‘安全第一’的生活结束了。接下来的生活很危险……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许多和希拉瑞同龄的人 20 岁时都还在接受全日制教育,而那些没有受教育权利的,已经工作 5 年了。很多这样的应征兵都“有些厌世情绪,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下应该具备的战争热情。他们不是和平主义者,也不是不忠诚,而是‘十分厌烦。’”他们“对这种荒唐可恶的使命保持沉默”是有原因的——20 世纪 30 年代的生活状况一塌糊涂,政府违背了一战时的诺言。

“大众观察”对于战时青年问题的定期报道揭示了英国被征士兵对战争的怀疑态度。1940 年接到信息部长要求调查士气的任务指示后,“大众观察”的观察员们在国内前线做了民意测验。这些问卷和战地报道按照《勇敢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的方式,把社会阶层分成从“A”到“E”五个等级。大多数被访者属于“C”级和“D”级,这种情况反映了愿意受访者的范围以及编者的左翼思想。

在 1939 年 11 月走访伦敦北部的士兵注册点时,他们发现了各种不同的反映,从“这不过是签下让我流血牺牲的授权书”到“我真希望自己有胆量站出来反对。”但是,适龄的应征青年几乎没人选择去做反对者;虽然和平誓言协会(*Peace Pledge Union*)战前很受欢迎,迫近的侵略威胁和对希特勒的强烈憎恶足以使他们消除大多疑虑。不管是否情愿,英国青年穿上了制服,任务在等待着他们去完成。

\* \* \*

1940 年春末,美国记者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应纳粹邀请观摩比利时闪电战。他在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附近遇到一群英国囚犯,便走过去与他们攀谈。看到他们瘦弱的体格,他非常震惊:“他们胸膛凹陷,瘦得皮包骨头,拱背曲肩。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视力不好,带着眼镜。我总结出,这是一战后 22 年间英国忽视青年成长的结果。而在此期间,尽管德国战败,面临着通货膨胀和 600 万人的失业问题,他们却为青年创造了健康良好的成长环境。”

夏伊勒的观察证明了 W. F. 莱斯特兰奇在《废弃的生灵》中描写的事实。和在军国主义政权下生活了许多年的德国人相比,年轻的英国应征士兵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为战争做准备。这些青少年饮食不合理,而且缺乏锻炼。德国人“皮肤黝黑,仪态整洁,看起来如雄狮般健壮,胸肌发达。这样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我知道英国的年轻人能和成年人一样勇敢战斗。但是现在需要的不仅是勇气,这在机器时代的战争中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在名义上保持中立,但是夏伊勒在柏林待了 6 年之后,对纳粹政权厌恶透

顶。他喜欢英国士兵：“虽然遭受了炮火的轰炸，虽然沦为囚犯的他们前途黯淡，但他们似乎生活得更开心。一个从利物浦来的小家伙戴着厚厚的眼镜，咧着嘴朝我笑：‘你知道吗，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美国人。在这地方见到第一个美国人很有趣，不是吗？’大家想想的确如此，于是我们一起大笑。但是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30年代中期，莱斯特兰奇呼吁为了英国青年未来的安全考虑，应该进行一场社会态度的变革。他惊奇地发现很大一部分征兵并不适合，也毫无准备去对付德国的精锐部队，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想法。军队对青年的需要使得国家粮食供应上的危机很快暴露出来。对上一次战争的青年犯罪问题还记忆犹新的儿童问题专家、青年工人以及左翼运动者罗列了一系列的数据，这些数据很可能在战争中影响政府的决策。

“大众观察”的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on)是个人类学家，曾经和“世界上仅存的食人族”一起生活过，他正适合做这项工作。1940年，他对“食人族”和“伦敦佬”养育青年的方式进行了比较，结果并不乐观：“我们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在14岁左右离开学校。14岁以后，年轻人多数自己照顾自己。这个阶段的孩子是很叛逆的，因为他们将会经历从孩童到成人的转变。‘食人族’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在那几年间会对他们的孩子特别照顾，但我们没有。”

战争促成巨大的社会变化。随着被遗忘的英国青年重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合理的社会等级制度逐渐被消除。英国青年在战争早期的好战情绪主要缘于对阶级的憎恨：那种“他们”和“我们”的感觉。哈里森觉得“要不是社会给这些青年人造成他们一无是处的感觉”，现在“军队里的战士会更积极、更热情。”

1940年10月的问卷调查突出了“18-20岁年龄组”的问题。这些年轻人觉得不管是选择工作还是参军都是个死胡同。问卷一共有10个问题，包括“你接下来的12个月里有什么计划？”、“你认为现在的政府怎么样？”、还有“战争对你的性生活有什么影响吗？”回答并不尽如人意。一个C级的20岁男生在被问及战后的期望时，他回答“会和其他同伴一起去死。”

一位18岁的男性白领反驳道：“制定计划有什么用？眼前只要海陆空三军。”当被问及战争期间他是否存钱时，另一位“M18C”〔1〕说这么做毫无意义：“即使

---

〔1〕 M代表男性，F代表女性，数字代表被访者年龄，后面跟的字母代表被访者社会等级，下同。——译者注

战争结束时你还活着,政府也会夺走你的一切。”一位“M20C”的话更简练:“我被干掉的那个时刻”战争就结束了。而且,在回答“战争是否影响到你的性生活”时,他的回答极为直接:“以前我一个月换一个女人,现在是每晚都跟不同的女人上床。”

编者从民意测验中发现,被调查的青年“自律性越来越差”,他们总结道“青年人有种根深蒂固的印象,士兵永远不会再回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变成热议的话题:1940年哈里森观察到,“很可能战争结束后,年轻人会认为成年人应该为战争负责。当时这种抵触的情绪已经在萌芽了,成年人应该想想年轻人的立场。”

30年代晚期,没有谋生手段的英国青年生活得艰辛而且乏味。生活贫穷单调,工作没有前途,工资少得可怜。莱斯特兰奇描绘的这幅图景对于很大一部分民众来说并没有改变过。很少有组织或是服务机构关注除了青年的经济出路以外的事情:就如哈里森所说:“在我们国家,大约有三分之二的青年对社会文化生活不感兴趣。除了赌球,他们不参加任何俱乐部或组织。”青年人“大都自寻出路”。

英美的流行文化都十分无趣。由于没办法直接经历,美国的电影、杂志、音乐就像是遥不可及的梦,而且和战争早期的英国日常生活显得毫不相干。例如,尽管跳舞仍是主要的娱乐方式,在街上跳吉特巴舞的人寥寥无几〔2〕。然而,舞厅里却前所未有地热闹,年轻人跳着狐步舞和英国的“聚会舞蹈”,如康茄舞和兰贝斯步。

英国并没有去迎合青年的需要,而是召集他们支援战争,“甚至去死”。青年工作者珀尔·杰夫科特(Pearl Jephcott)观察到“大不列颠有超过200万不到18岁的男女工人,从人力的角度考虑,这么充足的人力资源很是宝贵。”她认为“有必要通过交流、教育或者青年报纸杂志的宣传让这些男孩女孩们认识到,战争形势的走向将会直接而且迅速地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

然而,获得他们的支援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青少年参与战争算是和政府做了笔交易。他们要求政府保证这项工作结束之后,英国青年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社会

---

〔2〕 1941年5月伦敦斯特里汉姆举行的一场“吉特巴舞”比赛参赛者只有预期的四分之一。

生活中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来说应该是一场社会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是为了获得解放而不是被奴役。青年的价值并没有得到肯定,所以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改变这种局面。正如杰夫科特总结的,“如果我们能跟青年说明年轻丝毫不影响他们的重要社会地位,那么他们就会明白当前的形势,而不是一味地厌烦战争。”

\* \* \*

为社会民主而战的第一役是 1939 年 9 月的大撤离。由于害怕德国的战机全面摧毁英国的主要城市,政府实行长远计划,将 150 万妇女、儿童和学龄青年移出城市,疏散到郊区、集镇和最偏远的农村。加上另外 200 万由于个人生活安排搬迁的人,那个月有 350 万人口在英伦岛上迁徙。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迁移运动。

然而,尽管计划执行得很顺利,一些最基本的决策失误很快暴露出来。第一个失误表现在接待区域上,士兵住宿处的官员和接收家庭的父母只挑选他们愿意接受的青年。一个 21 岁的幼儿园老师说“把这里比喻成牲口和奴隶交易市场最为贴切”。那些未来的养母“只是闯到我们中间,四处看看,然后选出他们认为最拿得出手的家伙。”结果场面一片混乱,“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把所有的孩子安置好。”

这片景象在全国各处不断重演。出现这样的问题,一个原因是由于第一次疏散正是发生在暑假结束的时候,当时小学生们还没有进行学期初的常规灭虱活动。在苏格兰的高地上,富裕的接收家庭看到这些从爱丁堡贫民窟来的满身虱子和寄生虫的孩子和青年时,他们觉得是在“自找麻烦”：“看到别人不得不领走他们不愿意接收的孩子,他们很高兴:这些孩子不会因为不讨人喜欢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有很大的隔阂。一个两鬓斑白的女房东抱怨她接收的贫民道：“你和他谈上两句,他就转过来骂你。我见过的许多狗都比他有礼貌。”一个从北部伦敦移居来的 17 岁女孩写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被疏散者和主人似乎很难适应彼此。只有很少一部分主人像对待客人或是他们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被疏散者,大多数人都把女孩子们当成不花钱的女佣。”

不同阶层的人互相审视,发觉对彼此并无好感。尽管一位父亲是医生的 18

岁女孩观察到,不同阶层的人现在“意识到了彼此的存在”,但是疏散政策并不成功。在这场“虚假战争”时期,预期的空袭并没有发生,100万被疏散者又回到了城市。而英国最终于1940年夏末遭到突袭的时候,许多父母拒绝再次离开,结果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不幸被抓。

战争的前几年,伦敦是德国轰炸机的重点目标:1940年9月到10月间,这座城市经常遭到夜袭。到1941年5月,大约200万伦敦人——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变得无家可归。无人在这场巨大灾难中幸免,在战争造成的心理阴影下,表现得最脆弱的是城市青年。1940年冬一篇来自伦敦市内部的报道描述了一场猖狂的劫掠,随之而来的是小规模公物损坏和打架斗殴。

帕丁顿(Paddington)和博蒙德西(Bermondsey)的一项调查发现“青年问题从俱乐部移向了喧嚣的街道。”自从突袭开始,就有“无家可归的青年”聚在一起,拉帮结伙。有些放纵的青年常疯狂地四处寻找做爱、喝酒、赌博的机会,多数情况下他们找到了。另一个东部的观察员记录到:“青年道德感淡薄,这要归咎于一片混乱的生活。”

战期间的少年犯罪问题又回来了,但是这一次当局已经作好了描述、解释和治愈这些城市症候的准备。造成这种问题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许多学校停课、被摧毁或者被征用了。在伦敦的一些区域每五个学校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学校。俱乐部、夜校和其他的青年聚会地点也被关闭了。对于处在上学和参军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除了公共避难所几乎没有什么社会福利设施。对于这些地方,青少年们尽量避而不入,因为里面都是老人。

1939到1941年间,17岁以下的青少年犯罪增加了33%:大部分是恶意破坏,大约20%是情节轻微的盗窃。当时的分析家认为,这种情况其实早就预料到了,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他们提出“造成比例上升的是恶作剧,不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但是调查发现了青少年设施建设的严重不足:“青年无处可去,无事可做。”

20世纪40年代早期,英国未滿军龄的青少年似乎做什么都不对。就像在一战中,任何会引起关注的青年人行为都会遭到非议。如果他们不为战争效力,就会遭到谴责,如果他们做了也会遭到批评。一位治安庭法官1941年写到:“自从战争爆发以来,男孩子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们,也无需什么技巧。但他们的工资却很高,这导致了赌博,进而引发了青少年犯罪。青年法庭的案例表明十五六岁

的少年一星期可以赚4英镑,甚至更多。”

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总是将高薪和青少年犯罪联系起来,它称年轻工人一周可以赚5到7英镑。但是1941年夏天的一项调查说明,实际上21岁的青年平均每周只赚2英镑,工作条件也很艰苦:尽管最新法律规定周工时不得超过48小时,许多从事危险工作的男孩女孩一周工作超过70小时。高收入和青少年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站住脚”。

然而,英国青少年仍然有足够的钱花。1941年1月,“大众观察”以14岁到20岁的男孩和14岁到19岁的女孩为调查对象,在帕丁顿和博蒙德西进行了一项“青年调查”,结果发现,一半被调查的年轻人把他们的业余时间花在正经事上,例如阅读、缝纫还有防空训练。其他人则把他们辛苦赚来的钱用于舞蹈唱片、娱乐活动、书、香烟、绘画和衣服上。观察者的口吻暗示这种行为是非常浅薄和自私的。

公共聚会的场所越来越多,以满足“在休闲娱乐上增加花销的需要”。年轻人喜欢小吃店和台球室。观察者发现他们不举行公共舞会,但是有一些非正式的跳舞俱乐部还在运作,私人聚会也常有。露天游乐场也很流行。许多电影院被炸毁,但是电影“得到青年的有力支持。他们和同性朋友,而不是他们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一起去看。总的来说,家庭喜剧和侦探片比爱情片更受青睐。”

衣着同样也很重要。因为“年轻人一般更加关注个人仪表。”“17到20岁之间的人对衣服特别在意。”年轻人喜欢穿黑色、蓝色、棕色和灰色的翻领毛衣。他们的头发打理得油光锃亮。“大众观察”看到了一个17岁华服少年,他正在展示他的棕色条纹夹克和裤子,还有一双棕色的皮鞋,走起路来“手插在口袋里,步伐轻快。”

年轻女孩子们的打扮更加时尚。博蒙西德的一个调查对象“F18C”穿着“半长的黑色外套,有腰身,没有领子。一件素色黑上衣,领口装饰有金属别针,领子带有图案。黑色超高跟漆皮鞋,全黑的袜子。一个很大的黑色亮皮包。没戴帽子,赤褐色的头发扎成低马尾。一个17岁的女孩穿着一件全黑外套,肩膀上有金丝花边装饰,里面是一件棕色的小方格上衣。金色头发上戴着金色鸭舌帽。脚上穿着短筒皮靴。”报道指出“女孩子们将购买化妆品视为一种爱好”。

和美国的情况一样,女孩子站在英国青年消费的前沿。几乎所有18岁以上的男青年都去参军了的时候,年轻女性当起了白领,或者在重工业部门工作,以弥

补男性劳动力的不足。在严酷战争面前,1943年英国实现了充分就业——总共有2200万劳动人口〔3〕。因此,年轻女性的问题不是“什么时候我能得到一份工作”而是“在这么多让人讨厌又不适合我的工作中,我应该选哪一个?”

尽管1940年接受民意测验的女性对这些工作表现出厌倦,“那儿的气氛乏味,而且我们有点受轻视”。但是,各种各样的新工作使很多人得以逃脱家务活,去从事洗衣工、文件归档、文员和工厂工作。有这么多可选的职位,所以短暂的失业也成了好事,被称为“愉快的插曲”。更年轻些的女性在这次雇工大潮中占据优势:“十四五岁的女孩子在工厂里很受欢迎,因为她们视力好,而且很细心。”

这是珀尔·杰夫科特在她1941年关于年轻女性社会习惯的调查《成长中的女孩》(*Girls Growing Up*)中所关注的群体:“男女青年们在他们的自由时间里不想费力,也不负责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做这些工作绰绰有余。自从离开学校以后,就没有事情需要他们动脑筋了。很多人做的只是常规工作,包装糖果、装配电池部件、用缝纫机缝裤兜,或者钉箱子。从14岁开始一直干到现在。”

《成长中的女孩》捕捉到了处于萌芽期的英国青少年市场。一个典型的17岁工厂女孩拥有“一个公文包、一个刷子和一套梳子、一块手表(坏的)、七本小孩书和一些杂志、一把剪刀、三盒粉和一盒乳霜。”化妆品是他们最钟爱的消费品,还有像《神谕》(*Oracle*)、《传奇》(*Miracle*)、《女孩的水晶》(*Girl's Crystal*)和《魅力》(*Glamour*)这样的“浪漫杂志”。这些杂志以及其他一些“色情刊物”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标准的灰姑娘情结。

1941年秋调查的27个城市的女孩中,几乎没有人读书和上夜校。她们最喜欢的活动就是去看电影。她们最不喜欢新闻片,最爱看历史影片。许多女孩很欣赏朱蒂·加兰和米基·鲁尼这样的年轻影星,“他们就像我们自己。”他们只听各种舞蹈伴奏乐队演出的广播节目:“舞蹈在年轻人中特别受欢迎,他们在这上面投入了惊人的精力。”

战争的第二年,热情的爵士乐越来越流行。杰夫科特认为这是因为“热情的节奏和音乐的节拍跟工厂里噪音的节奏和速度很像,很容易迎合一直生活在噪音中的人。舞蹈伴奏音乐本质上是‘今天’的音乐,而年轻人关注的就是‘今天’,不是‘昨天或明天’。”她观察到“如果能让五十几个吵吵闹闹的男孩女孩安静一个

---

〔3〕总人口是4700万。

小时,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听介绍爵士乐或摇摆乐的广播。”

杰夫科特对 1939 年到 1941 年间女性青年犯罪 100% 的增长率和性病 70% 的增长率作出回应。“营妓;16 到 18 岁的女孩放肆起来”等轰动性的大标题使当局警醒,他们试图了解成千上万的女孩出现“道德危机”的原因在哪。根据一位当局人士的说法,这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由“早熟”以及“从早到晚听从林乐”引起的,“言情片也应该对青年性行为犯罪的增加负一定责任。”

然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人口疏散造成的混乱、缺乏适当的性教育、以及战争对性欲的激发。由于战争,父母的约束减少,女孩们普遍抱着“为今天而活”的生活态度,很多年轻女性早早发生了性行为。15 岁的女孩们“是被催熟而不是长大的”,她们遭受了战争带来的影响。战争带走了她们周围大量的同龄男性,使得她们除了在舞厅里偶然认识异性外,几乎没有与他们接触的机会。

基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可能也要对这股青少年犯罪热潮负一定责任。但与此同时,很多年轻女性认为她们和社会之间有一个契约:她们还没有成熟就开始工作,因此有权利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作为“上一代”的父母把这种期望误解为早熟的反叛。大多数女孩子希望自己被当成大人看待,但是如果她们在这样年轻的年纪真的被认为是“社会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分不清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紧张的状态突显出青少年地位的两难境地。战争时代的生活现实无法确保“女孩”这个词本身所蕴含的孩童时代的含义。一个“16 岁女孩”向杰夫科特抱怨道她的生活“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现实版,她的身高一会是 10 英尺,过会又变成‘9 英尺多’。如果你想要张火车票的话,那么你就是 14 岁了,如果你想进电影院看 A 片那就是 16 岁。在家里,如果他们觉得把你当孩子方便,那你就是个孩子,但是如果他们想让你承担什么事情,他们就说你长大了。”

就像 29 年前一样,战争的需要无意间大大促进了女性的自由解放。英国当局不像纳粹那样仅仅把女人当成育儿机器,而是让她们参加工作。而这些工作在 20 世纪 30 年代是无法想象也不可能让她们来做的。1941 年 3 月,劳动部部长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要求“我们国家的女性应该在工业机器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女性为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了突出的贡献,在这场战斗中她们和男人一样有战斗力。”

到 1943 年,有 700 万女性为战争生产工作,其中有 40% 在一些工业领域,或

者是为军队服务。这对于一个女孩子“在家里仍然是低等生物”的社会来说是一个巨变。刚刚获得自由的这个群体所作的反应也很复杂。工作时间很长,每周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而且任务非常危险。一个18岁的女孩一星期赚10英镑,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她所做的工作是装配雷管,但是“火药到处乱飞,会飞到你的脸上。它会引发疹子、脓胞病,可能还会进一步引发大的肿块。”

离开家以后,年轻女性的情感变得异常脆弱,重工业需要的男性品格和任务的重复单调磨光了她们的情。与此相对的是口袋里有足够的钱带来的美好感觉和从家庭的责任和束缚中解脱出来的放松感。一个年轻的飞机制造工人回忆起她能在一栋专为女性造的招待所里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愉悦心情:“不远处有个街区,那儿有各种社会活动。真像是个乐园,战争期间我们的娱乐就是从那儿开始的。”

\* \* \*

1939年和1940年的青年问题一直持续到战争的第三、第四年。1941到1942年冬季的报道指出有许多孩子“变得阴郁放肆。由于害怕他们的正常生活会被打乱,他们结成一伙,选出一个强大的领袖。这个人可能道德上很有问题,但是他的存在会让人觉得有安全感。青少年犯罪在增加。就是在这样一块恐惧和不安全感的孳生地,希特勒播下了纳粹的种子。纳粹,是一门为恐惧的、被压制和被忽略的人民准备的哲学。”

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有关部门努力革新整个英国的青年服务体制。战争之前,在英国只有三分之一辍学的人联络了志愿者组织。尽管1939年建立的国家青年委员会(National Youth Committee)比以往任何一个青少年组织委员会的职权都要强大,情况仍然无法令人满意。很多公共建筑遭到破坏,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工作能做。

1940年10月,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青年娱乐服务”的通知,解释说青年服务已经变成了服务青年,换句话说“帮助青年是为了得到青年的帮助”。反复灌输责任感和“合作生存”思想的青年俱乐部和青年组织变成了战争时期青少年犯罪的解决方案,志愿的民间城市青年组织的数量1941到1942年间开始增加。

最受欢迎的是男女童子军,这两个组织都有丰富的户外活动计划。他们的训练项目是为战争需要量身定制的:例如,女童子军训练急救和看地图。准军事部

队由海军培训生、军队训练团、女子训练、通信团和空军训练团组成。空军训练团是英国皇家空军(RAF)的低级部门,是准军事部队里最受欢迎的。每一个军事力量分支都要进行这些综合的特殊技能练习、训练和指导。

男女青年的俱乐部类型基本取决于组织者和协作者的个性特点。在一个典型的北部小镇上,每一个市立学校都有一个城市青年俱乐部,可以提供丰富的活动,如辩论、演讲、急救课、跳舞、自行车、足球和用餐。这些组织平均拥有成员170人左右,它们并没有覆盖到大部分当地青年,但是都很受欢迎。一个17岁的男孩觉得“很有趣。可以结交很多伙伴。另外,我已经受够了坐成一圈听老人讲述战争。”

1941年12月,政府强制所有16到18岁之间的男女生登记入伍,但随后并没有进一步的强制措施。几个月后,政府仍然“有意”让青年应征进入准军事团体,但是它的实施遇到了麻烦。志愿团体“强烈反对‘国家’以管理者姿态占用青年的业余时间”。一些成年人也不赞赏这种纳粹风格的国家政权:“我称它为真正的暴君品质”。这项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但是,政府干预行为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到1941年,英国生活所能想到的方方面面都得到集中规范,从食品、媒体、工作、工资、军事服务、住房、交通到国家供应的服装和家具等公用物品上的CC<sub>41</sub>标志。国家认识到为了最大限度获得劳动力,增强大战中的战斗能力,必须制订一个全面的计划。然而,对这个史无前例的组织来说还有另外一面:实行社会主义。

大萧条时期的阴影始终困扰着政府。作为战争决定因素的社会大众在开战后的第三年决定参与战事。这种参与是双向的。人民对未来的计划刊登在各种关于社会状况、战事问题讨论小组的小册子和《画报》特刊上,例如1941年1月《画报》上的“英国的蓝图”,它对20世纪30年代的贫民窟和理想中的未来社会主义国家做了鲜明的对比,他们的口号是“全民有工作”,“全民都健康”,“全民受教育”。“新英国是我们战斗的目标。”〔4〕

英国公立学校中的男孩子们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一群14到16岁的孩

---

〔4〕 1942年12月出版的贝弗里奇报告对此有详细描述。这给曾经的左翼乌托邦们关于儿童福利、全民免费医疗和无失业的设想提供了基础,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不过有三分之二的人乐于接受。

子写道“像伊顿和哈罗这样的学校应该被废除，它们让人变得很势利。”他们对于战后生活的建议包括清理贫民窟和改善贫困阶级的生活条件。就如一位年轻的散文家所总结的：“工人阶层的人，只要适合那些职位，也应有权利进入政府工作。因为现在政府里的大多数人要么太老了，不带个护士都没法出门，要么就是缺乏责任感。”

继承鲁珀特·布鲁克衣钵的23岁青年理查德·希拉瑞是新秩序的热情拥护者之一。他是一开始就参与了战争，最后以牺牲告终的社会精英之一。作为一名为英国而战的飞行员，他是温斯顿·丘吉尔所描述的新圆桌骑士中的一员。和其他战场不同，空战仍然是一对一的较量，最能体现过去的骑士风格。1942年出版的希拉瑞回忆录触动了很多人的心。

战争飞行员都很年轻，超过26岁就不能领导飞行中队了，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虽然都是一流的战士，但在“鼓励黑色幽默和团队精神”的氛围中，他们抑制着自己的骄傲情绪。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他们的自律不是因为情感麻痹，而是为了生存必须采取的策略。但是，青年人不可能长时间压抑他们的情绪。一位飞行员回忆：“就是想要啤酒和女人，能像约翰·韦恩一样四处跑。到了19岁，你不可能不想这些。”

希拉瑞和他的同伴们不同，同时也因这种不同而痛苦。当英国战场的胜利使得英国皇家空军的战争飞行员们成为国家英雄的时候〔5〕，他不想扮演这种角色。在解释他为什么写回忆录时，他写道：“我讨厌‘我们岛屿的堡垒’和‘空中骑士’这样的称号，我决定把它记录下来，希望下一代人能够意识到，尽管我们很愚蠢，但也没有蠢到那样的地步。上一场战争中所看到的景象我们还记忆犹新，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认为这场仗值得打。”

《最后的敌人》(*The Last Enemy*)以精神旅程的方式进行描述：一个精英青年向社会认同感屈服，这在一个真正的大众社会里不可避免。这种感觉贯穿全书，从宣战时希拉瑞有私心的兴奋，到意识到他其实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的转变发生在1940年9月，当时他被枪击倒，伤得很重：“你应该高兴这事发生在了你身上，”母亲对他说，“有太多人告诉你你……而你信以为真。你已经越来越

〔5〕丘吉尔在1940年8月20日的演讲中说：“在人类的冲突中，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的情况，这么多人应该感谢一个这么小的群体。”

放纵自己了。”

遭受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希拉瑞仍然不能忘掉自我。然而，和工人的尸体一起被困在炸毁的公房里后，他最终意识到“人不可能只看到自己，不能只从生命中获取而却从不给予。也不可能审视了人性之后还能从别人身边默然走过。”他的解决办法是写《最后的敌人》，以赞扬他那些跨越了阶级界限、水平高超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同伴以及他曾经轻视和嘲讽的“人性”。那之后他才觉得自己配得上“作为死者伙伴的权利”。

1942年6月出版以后，《最后的敌人》变成了永恒的经典。希拉瑞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证明了英国社会不可阻挡的左倾发展，这也使得读者能够解读这场无意义的战争。在证明了自己的这种转变之后，他接着试图解除自己作为英国战场老兵和成功作者的特权。由于受到威尔弗雷德·欧文和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的《薄荷》(*The Mint*)的鼓舞——这部作品中的一战传奇人物描述了他回归英国皇家空军的心理——希拉瑞过早地回到战争中，并于1943年撞机身亡。

和鲁珀特·布鲁克一样，希拉瑞是个风华少年，二十四五岁就死了，正是青少年向成年人转变的时候。和他一战中的偶像一样，希拉瑞通过讲述自己的生活奇遇和同龄人对战争的态度描绘了战争的残酷性。希拉瑞符合任何一个可能创造英雄的条件，但是28年间英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他并不是一个遥远孤立的寡头政权的牺牲品，而是一个为平等而战的民主主义者，是创建战后生活的先驱。

## 24

### 社交界新人和美国兵

学校和军队中的美国青年

那晚,我躺在床上,不禁想着如果成长中没有那么多悲伤该有多好。我的脑中一片混乱。

——“莫琳·戴利”,《第十七个夏天》(1942)



加利福尼亚维萨利亚的高中生,1940年

欧洲爆发战争的时候,很多美国青年并不想卷入其中。正如一位高校报纸编辑所写的:“War(战争)!!——3个简单的字母,却可能摧毁人类文明……我们不希望有战争。”“年轻人应该叩开天堂的门,愉快地生活,创造未来。”另一位写道,“伟大的绘画、伟大的音乐以及伟大的文学作品,没有哪一样是青年人忍饥挨饿地在满是泥沼的战壕中创造出来的。自由、和平或者快乐都不可能源自战争。”

欧洲似乎很遥远。受到20世纪30年代和平主义宣传和大萧条遗留问题的影响,许多美国青年保持着不干涉的姿态。一些人为他们国家的中立态度感到高兴,比如那些“看到海外战争”的高中生,他们认为“美国人从未像现在这样为自己的好运而高兴过”。另一些人则认为国家的“繁荣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活标准”,“受到了欧洲战争的威胁”。

但是攻心战还在继续,一些专家试图证明青年的和平主义是挑唆和颠覆的结果。1940年10月,《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在一篇叫做《是的,我们有内奸》的文章中披露了一系列叛国行为,划分了分裂分子的六种类型:“无政府主义者”、“恐怖主义者”、“战败鼓吹者”、“新和平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绥靖宣传者”。文章中鼓励读者向“距离最近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报告任何可疑行为。

尽管约翰·罗伊·卡尔森生动描绘了很多同盟成员和三K党组织1939和1940年在美国工作的情况,纳粹意识其实仍然限于德裔之中,只影响到了很少一部分美国青年。另一方面,1939年8月的纳粹-苏联条约触动了拥护共产主义的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一旦战争无法避免,大会便从反战的立场转向鼓动青少年争取他们的社会权利。

然而,欧洲的战事却无法忽视。在反对美国卷入战争的同时,1940年9月国会签署了选拔征兵提案(*Selective Service Bill*):它允许最多100万在22到35岁之间的年轻人在军队中服役一年。这是第一个被称为“草案”的提案。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征兵登记是在1940年10月,当时拒绝参军的人很少。与此同时,重整军备的过程开始了:这将会极大促进经济发展,并最终把美国带出大萧条。

1940年秋天也是美国青年对战争看法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媒体报道、选拔征兵的宣传、与欧洲人的私下接触以及势不可挡的闪电战改变了不干涉者的态度。美国突然之间危机四伏,因此眼下的生活更加珍贵:正如一名高中生在法国沦陷之后写的,“今天‘民主’这个词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在这样的战争时期,它突然变得非常重要。”

1940年10月,乔治·盖洛普博士印制了一份叫做“美国青年的看法”(American Youth Speaks Up)的调查问卷。他的任务是让焦虑的美国成年人感觉到他们可以“对年轻一代放心”。他挑选了一个能够代表“16到24岁之间的2100万美国人”的被测群体。采样的地域和阶级范围都很广:大学青年、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失业人员和“领救济金的人”。它是“关注未满选举年龄个体的第一个盖洛普民意测验”。

被调查的人要回答10个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精心设计的,为的是了解青年对于生活和我们的民主社会的态度,反映他们对美国主要的对外对内政策的看法。”结果令人鼓舞,和设想的一样:87%的人支持美国的生活方式,相信他们将来能有像父辈一样好的生活机遇,甚至可以过得更好。他们没有受到极权政策的影响:“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三个人是同类。”

民意测验的目的是了解青年对战争的态度。50%的人认为如果英国被打败了,美国应该和德国作战。被问及是否“每一位四肢健全的年满20岁的青年应该在军队中服务一年”时,68%的男女生表示同意。75%以上被调查年轻人表示他们不会反对选拔征兵提案提出的“在军队中服务一年”的说法,一个有代表性的回答是:“如果我被叫去打仗了,我只是想知道这仗怎么打。”

盖洛普民意测验是在欧洲战争爆发以后,珍珠岛海战发生之前进行的,揭示了一代人试图让自己适应军事服务需要的一代人的心理。除了表达他们不想让美国卷入战争的愿望,很多被调查的年轻人还表现出对新经济政策的坚定态度。当被问到如果他们是总统他们会怎么做时,年轻人们的回答是“减少失业;加强政府财政;帮助穷人;制止非民主政策的潮流。”

民主是美国人的奋斗目标。作为政府的执政理想,接下来的几年间美国民众还要对其进行仔细审查。争论中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如1940年夏天美国青年委员会所说的:“我们必须面对现在的形势,也必须面对所有现实,包括那个特别紧迫的问题,也就是民主是否真的能实现,能实现到什么样的程度。”

美国青年委员会总结说,“现在正是国家最需要年轻人充满希望和信念的时候,而他们的希望和信念却面临危机。因此,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采取义务军事训练和服务的举措,那么我们在处理青年人的需要时就再也不能抱有任何偏见和迟疑态度。”条件非常明确:对于入伍的年轻人要给予关注和尊重,最重要的是,要把他们当作成年人。

\* \* \*

到1940年,美国中学的青年数量统计显示:14到17岁的总共约1000万的青年中,差不多有75%在读书。这是1930年学生数量的两倍。上中学变成常规生活,而不是特例。让·雅克·卢梭(Jean - Jacques Rousseau)和G.斯坦利·霍尔预言,青少年时期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虽然在经济上还依靠父母,高中生们已经开始创造一个新的青年阶层。他们的行动不再是听从父母的安排,而是跟随同龄人的脚步。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已经长成青少年。当400万十八九岁的美国青年处于失业状态,寻找工作时,14到17岁的青年们仍然待在学校中,逃避残酷的工作竞争。考虑到失业问题,几年来中央政府制定政策和计划来鼓励十八九岁的青年接受全日制教育。同时,由于摇摆乐的成功,青年商业文化开始出现,这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同于其他群体。

美国的教育体系塑造了这种青年阶层。英国人类学家贾菲尔·哥尔(Geoffrey Gorcer)20世纪40年代写道,中学“首先是一个社会工具,而且是个十分成功的社会工具,它给青年打上了美国特征的烙印,不管他们的背景和出身如何。”在这样一个追求成功的国家,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混杂在一起必然会有竞争,这使得“大部分美国人在理解青少年境况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混淆两个概念:成功就是被爱,被爱就是成功。”

青年文化是围绕着青年团体发展起来的。1940到1941年间奥古斯特·霍林斯黑德(August Hollingshead)在“中西部玉米产业区协会”中研究青年的社会行为时,发现这些组织“是自发的非正式团体,如果大家一致同意,青年可以被吸收入一些之前已经存在的小团体,也可能被开除。虽然对于成员资格没有明确的规定,小团体或多或少有一些常规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谁能被吸收进来,这个团体做什么,成员不遵守其规则时应怎样惩罚。”

学生们每年三分之二的日子里每天7个小时待在学校,这些团体对青年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当他们的团体“和家庭、学校或者邻居发生冲突”时,他们把对所在团体的忠诚放在首位。这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同龄人世界,能创造也能摧毁青年的名誉,几乎控制着青年生活的方方面面:朋友、俚语、服饰、业余活动。艾姆城的青年基本上都参与了。

一个名叫乔伊斯·杰森(Joyce Jenson)的艾姆城“白领”女孩向霍林斯黑德讲述了她最好的朋友:“她对我的影响几乎和我父母一样大。我很听她的话,特别是在选择朋友的时候。但也并不是她说的一切我都赞同。不过她使我能交到想交的朋友。”但是,她承认“如果我的父母要阻止我,我也会听。我知道父母的建议是好的,但是有时他们就是不明白孩子想做什么,而且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像他们20年前做的那样去做。”

媒体已经注意到这个新生阶层的消费能力,他们把这个团体的风格传达到在校学生那里。1941年1月,《生活》杂志,一本以照片为主在青年中很受欢迎的杂志,刊登了一篇特稿,标题是“社交界新人——他们生活在一个团伙、游戏、刺激、电影和音乐组成的快乐世界里。”这篇报道宣扬了一种新的风格:“说着奇特的隐语……喜欢巧克力牛奶混合饮料……到哪都穿着软帮鞋……开起车来像逃出地狱的蝙蝠一样快。”

20世纪40年代早期,青年研究者理查德·马琳·乌格兰德(Richard Maring Uglan)写道,现在是“测验”特定年龄青年消费观的好时期。中学生仍然从父母那里拿钱,力所能及的兼职工作也可以贴补一些开销,这些都把他们推向商店,寻找衣服和化妆品。尽管他们的个人购买力并不出众,但是如果把他们的数量加起来的话,则比那些年龄稍长,还未工作的大学生们具有更重要的经济地位。广告商和生产商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那一年2月,《父母》杂志开辟了“青年策略”专栏,探索社交界新人服装饰品的时尚品味。正如编者所写:“中学女生有完全属于她们自己的时尚语言,这种语言妈妈们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他们的衣服对你来说可能很奇怪,但是这些是一波一波席卷中学校园的潮流。所以对它们宽容些吧!这些使你的女儿对自己的外貌感兴趣,使上学变得更有兴趣,而且让孩子感到自己是‘群体中的一员’。”

1941年末,《父母》杂志的发行者开始出版一本面向青年的刊物——《呼唤所有女孩》(Calling All Girls),副标题是“为女孩子和社交界新人打造的现代杂志”,

这本刊物定价为10美分,并且是第一本以流行文化为主打的杂志。秀兰·邓波儿和朱蒂·加兰是“少年顾问团”成员,本尼·古德曼写了一篇题为“你喜欢的音乐”的文章。它主要的创新在于每月报道中学的时尚潮流。同时,报纸也开始刊登面向青年的喜剧漫画连载,如《亚奇·安德鲁斯》(*Archie Andrews*),或者是不讨男孩子气喜欢短袜少女(*bobby-soxers*)。

青少年市场的这些早期刊物把目标定在郊区和小镇,他们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反映了全美淘气但向上的青年想要成年的幻想。这些在《爱恋安迪·哈迪》(*Love Finds Andy Hardy*)和《绿野仙踪》之后的青年电影,以及仍然在美国流行音乐中占重要地位的摇摆乐中都有所体现。1939年夏天以后,格伦·米尔斯(*Glenn Miller*)取代本尼·古德曼和阿蒂·肖(*Artie Shaw*)成为头号乐队主唱。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成熟的米尔斯成为中西部小城镇好男孩的代表。

没有初次登台演员那样的拘谨,社交界新人走进了烟酒商店。在1941年写的《第十七个夏天》中,莫琳·戴利描述了她的女主角安吉·马罗(*Angie Morrow*)第一次去比提舞厅时的担心:“在我们镇上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考验,每个人都在那里看着你。我知道有个女孩有一次和表妹一起去了比提舞厅,没人注意她,也没人邀请她跳舞,秋天她去上了大学。后来圣诞或复活节回家也没人邀请她跳舞了。如果你不在比提舞厅做出点成绩,那你就完蛋了。”

“有一次有两个女孩进来,犹豫不决的样子。她们和我年纪差不多,脸色苍白,头发梳得很仔细,整齐的卷发,稍微涂了点口红。其中一个穿着平底牛津鞋——谁都知道中学女生只能穿鞍脊鞋〔1〕或者大学里流行的软帮鞋!舞厅里挤满了人,她们走过中间的过道,四周扫视一下,找地方坐下。没人打招呼或者挪出地方,这两个女孩子只好转过身,两个人自己聊了一会,傻傻地笑着然后走了出去。她们脸上露出僵硬受伤的表情。”

由于穿鞋的风格可以决定是被社会排斥还是被接纳,青年对于钱的需要极为迫切。霍林斯黑德观察到,“早在艾姆城青年能赚钱之前,他就明白自己需要钱来购买如果想‘成功’必须拥有的东西。”这是新的跨阶层青年文化的矛盾之处。社交界新人的世界看似民主,却趋炎附势,把中上阶层青年的生活图景奉为经典,炫耀似地大肆购买。如果你没有购买能力会怎么样?

〔1〕一种鞋帮中段用黄色或褐色皮的浅口系带白便鞋。——译者注

这是霍林斯黑德主要的调查范围之一,这个调查结果后来以《艾姆城的年轻人》(*Elmtown's Youth*)出版。它和林德的《米德尔镇》具有同样的深度,但是更专注于中学年龄的青年,他的目标是检验“青少年的社会行为”可以反映他们父母的社会背景的假设是否成立。他发现,尽管霍尔认为青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阶段,尽管他们表现出热衷于消费,这个中西部小镇的青年们和旧世界的青年人一样深受阶级意识的影响。

对五个社会阶层进行分类以后〔2〕,霍林斯黑德发现中学生活受前三种阶级主导。一个第五阶层女孩描述“有一群女孩认为她们高出我们一等,她们看不起我们。我不会提及任何名字,但是她们是一群从上层家庭来的女孩。她们本该有校外俱乐部活动,但实际上俱乐部就在校内。她们活跃于各种俱乐部间,参与各种活动。她们谈论她们的活动和计划,一点也不会注意到我们。她们冷落我们,也不会和我们说话。”

虽然每个阶层都会排外,但现在这种情况尤为严重。几乎没有学生可以同时参加两个阶层的活动。如果不明白这一点的话就会遭到排斥,例如一个第三阶层的叫琼·梅尔斯(*Joan Meyers*)的女孩,她跻身一个叫做GWG的第二阶层社团,却和一个第四阶层的男孩约会。她被以前的朋友“抛弃”了:一个女孩解释说:“我们现在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了!”这是一种阶级控制的办法,“几乎像是一个秘密的警察体系——没有一个人能逃过检查,至少是那些他们还在意的人。”

艾姆城的青年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规矩:“大多数男孩子穿‘西裤’,白衬衫,打领带,外面穿上夹克或西装,但是很少戴帽子。标准的帽子是戴鸭舌帽沿的布帽子,装饰以很多金属纽扣、小型玩偶画和动物尾巴图案。这样一顶帽子标志着一个男孩在艾姆城的阶级低下,但是戴它的人却认为它是最高的时尚。上层阶级的男孩子们或者不戴帽子,或者戴礼帽。”很多人把钱花在车上,或者一些不良嗜好上,例如赌博、抽烟和喝酒。

这个紧张、喧闹的社会现状是对美国流行文化所宣扬的自由和改革美好图景的嘲讽。霍林斯黑德认为这样的文化氛围不能给青年以适当的引导。这是社会大众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他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不确定的无人关注的地带”。

---

〔2〕 1. 资产雄厚的“上流社会”;2. 中上阶层;3. 中下阶层——中极阶层;4. 工人阶级,蓝领;5. 无技术或技术不熟练的,或者靠政府救济的:“真正的底层阶级”。

例如,青少年 14 岁就可以获得一份工作,但是 18 岁才有选举权。女孩子 18 岁,男孩子 21 岁之前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才能结婚。各个洲的法律甚至还不同程度地对酒的消费年龄做了规定。

这个互相推脱责任的国家缺乏成年人和青年的交流:这是美国的“隐私情节”。不同阶级之间的婚前性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频繁,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四分之一的 18 岁青年沉溺于此。成年人和青年都对这个话题保持沉默,这使得事态更加严重:“早在社会允许青年们结婚的几年之前他们就已经具备成熟的性能力了,这把青年们推向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他们或者必须压抑自己的性需求,或者要去违反社会道德。”

因为几乎一无所有,一些第四阶层的青年和几乎所有第五阶层的青年毫无顾忌地沉溺于那些禁忌的娱乐活动之中。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早开始工作,对于他们来说,“独立”完全是一个跟经济挂钩的词。他们无法选择留在学校里,因为他们“觉得在教室、操场、俱乐部和课外活动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中学的辍学率凸显了这种现象;前两个阶层中没有辍学的学生,第四阶层比例是 41.3%,第五阶层是 88.7%。第五阶层的青年还没有成熟就被丢进了成年人的世界里,他们体会着作为成年人的感觉。

正是这些青年最受“灰姑娘情结”的影响。一个女孩梦想可以成为“琼·克劳馥”那样的电影明星。霍林斯黑德还引用了另一个女孩的例子,那是一个“艾姆城底层社会家庭出身的 17 岁斗鸡眼女孩”,她“有狐臭,衣衫褴褛,一身污垢,工作时唱着歌。她至少已经丢了 3 份工作,因为她‘一直’都在唱歌。为了实现她在夜总会里成为感伤恋歌歌手的愿望,她说:‘我一直在练习最新的歌。’”

虽然霍林斯黑德的统计数据〔3〕批评了美国社会缺乏对青少年从童年向成年过渡的指导,它也对小城镇的青年消费文化做了详尽调查,小城镇是青年消费文化的主要阵地。当时,青年消费文化正慢慢变成一种能够席卷全国的力量。同样,莫琳·戴利的畅销书《第十七个夏天》一出版就吸引了美国中学生,因为它营造了与布斯·塔金顿具有田园风格的经典青年作品相同的意境。然而仅仅几个月后,战争的经历将他们的单纯思想染成了黑色。

---

〔3〕 最终于 1949 年作为对美国“阶级体制”的揭露而出版。



1941年的秋天,美国卷入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动员活动冲击着中学校园。一些青年意识到了他们未来的责任,相信“正是为了美国的青年,为了你和我,我们政府的领导才试图保护民主。”其他人对事态仍然漠不关心。当被一位心理学家问到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否会受到战争的影响时,一个年轻的中学女生说到“我从没想过这个,而且我也怀疑其他学生中有多少人会去想。”

是保持安全的现状,还是迎接未来无法预知的危险,美国青年对此犹豫不决。“学生们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来做出决定,”常春藤联盟的一位教授观察到,“不论将要发生什么,不论是战争还是别的什么,总之马上有事情要发生了。”尽管有这样的等待,12月7号袭击珍珠港的新闻还是引起了巨大的震动。美国的独立和安全遭到严重破坏。据一位中学生说:“战争来到了美国,来到了坚不可摧的美国,来到了中立和值得信赖的美国。”

珍珠港事件之后,德国在12月12号向美国宣战,征兵办公室人满为患。美国的军事力量像一台笨重的机器,需要一点时间来加速:1942年征收的士兵需要经过一年才能训练完备,适应军队生活的压力不容忽视:到1942年夏天,每天约1万4千人涌向新兵接待站和训练营。征兵年龄降到18岁之后,有很多刚离开中学校园的学生也报名入伍。

美国的青年有了新的价值。新政研究员霍华德·麦克鲁斯基(Howard McCluskey)认为“青年仍是国家的一流资源。他们是防务的先驱。他们能屈能伸,在所有的年龄层中,他们进入军队对正常社会生活的影响最小。”为了帮助他们完成从“爱玩的18岁男孩”到“在东京上空操纵导弹”的飞行员的转变,美国军龄男性的人伍规则也发生了转变。

参军意味着青年生活的终结。正如一位应征的社会学家所写的:“入伍、新兵接待和基本训练的实质就是切断与过去生活经历的联系。”为了让应征的新兵适应新的团体——军队伙伴们的团体——军队通过几个月的体能消耗和军事教育重新塑造了这些青年。他们之前的身份没有任何意义,不再是大学生、农场里长大的孩子、办公室职员,他变成了一个编号,受着“残暴的中士军官”的折磨,和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人一起组成一个新的群体。

军事训练的本质没有改变过,但是一战以来美国的青年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应征的士兵受教育程度更好:30%高中毕业,而1917年时只有4%。很多是大学

生或大学毕业生,非常独立,不愿意受那些教育程度不高的陆军官员的伤害。虽然很多人意识到要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经历磨难,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军队传统狭隘过时,和我们民主的理想格格不入。”

美国兵和他们的欧洲伙伴截然不同。据剧作家阿瑟·米尔斯(Arthur Miller)所说,他们“的性格比想象的复杂得多。剧本里不能把他们写成平民,尽管他们曾经是身穿金属纽扣的棕色套装的平民。他们也不能被认为是‘士兵’,因为士兵的反应本该和平民的情感划清界限。”美国兵的内心仍是平民,他们松散的行军作风表达了他们坚定的民主信念,这种信念像自由灯塔一样传播到全世界。

社会期望美国青年能参与到这个集体事业中来,即使是那些还没到军龄(男生18岁,女生20岁)的青年。“战争迫使男孩女孩们一夜之间长大”,卡罗琳娜·B.扎迦利(Caroline B. Zachry)在《战争世界中的家庭》(*Family in a World at War*)中写道,“他们所能承担的责任越大,他们自己和家人就越能自然地接受他们突然的成长。那些还在上学的孩子必须接受跟战争直接相关的课程和救援训练,并且要在社区和家里担任一些工作,以此来满足他们迫切想服务于国家的愿望和获得成年人责任感的需要。”

1942年出版的《战争世界中的家庭》记录了美国政府赋予青年新的重要地位的努力。他们并没有忘记30年代的教训:“关于上一场战争和这一场战争的区别,关于美国的青年,美国社会都思考了很多。政府和私人机构花费了上百万元经费研究青年问题,我们不可能不顾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就继续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开展我们的工作。”

1942年春天开始的配给制是影响到家庭生活的第一个变化——汽油、白糖、糖果、口香糖甚至可口可乐都要配给。正如一位中学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当地的报纸上所写的:“几乎每一位学生都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白糖和橡胶这些商品短缺,政府开始出售债券和邮票,生活成本提高,我们的父亲和兄长参军或者进入军工厂,还有每天的报纸,都在不断提醒我们处在战争中。”

中学提出了“学习、牺牲、拯救和服务”的口号,也开始开展一系列活动为战争努力。它们不断进行空袭演习,以保持对战争危险的警惕性。战争的第一年间,学生们通过回收废金属和废物品为战争收集了无数可以循环利用的材料:书、扁平发夹、铁和留声机唱片。1942年学校里增加了新的课程:更多的科学课、数学和体育课,这些是针对第一批选拔应征入伍士兵表现差强人意开设的课程。

像安娜·沃夫(Anna Wolf)这样的青年道德专家认为“软弱”的享有过多特权的美国青少年应该遵守“严格的纪律”。为了让他们拥有“铁一样的毅力”,1942年2月国民防卫办公室建议在公共学校中实施10点计划,包括每天一个小时的体能训练和急救的练习课程。其中很多课程都带有准军事性质,体操老师要求学生完成包括障碍课程、攀绳索和引体向上在内的“突击队训练”。他们还鼓励学生参加拳击、摔跤和其他一些团队运动。

曾经困扰美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后备军官训练队地位突出。据一位应征士兵说,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唤醒青年对于公民义务的重视,准备好履行公民的义务,并且使之成为合格的军事领袖。”在“艰苦”的3年训练期间,军校学员们接受射击、军事礼仪、站岗、保健学、急救、美国公民身份和步枪训练课程,这些都有一定的训练规则。这种残酷的活动最终导致了高达90%的退出率。

教育办公室推动的另一项计划旨在加速青少年的学习进程,以便让他们尽快满足征兵或者其他重要战争相关工作的需要。与以往至少三年半的中学学习课程不同,如果他们参加暑期补习班的话,就可以在3年之内毕业。1942年,最受欢迎的课程是历史、数学和英语,但是也提供了其他一些更适于军事服务的付费课程,如航海学、军事数学、物理学、航空学和广播学,一节课的费用达10美元。

学生刊物也增加了爱国主题的文章。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杂志的目的在于让广大社会民众解读学校生活:“只有学生出版物”,一位学生记者顾问建议说,“还保持着学生和成年人的交流。”虽然这些杂志得先经过审查,它们还是给学生们提供了关于战争情况的必要信息,这些文章大多与征兵法、课程变更和夏季课程有关,有时还会有些校园闲话。

1942年11月,《生活》杂志以一篇题为“18岁”的封面故事庆祝征兵年龄的降低。封面摄影拍摄的是一位内布拉斯加大学(University of Nebraska)的在校生鲍勃·伯格(Bob Berger),一个整洁、严肃的年轻人。他穿着羊毛衫,戴着领圈和领带,抱着一摞教科书,站在立柱旁。里面的文章把鲍勃和他的室友乔治·舒梅尔泽(George Schmelzer)描述为刚入伍的250万青年的典型代表。他们徘徊在“参战的前途”和“大学校园里的可爱女孩”之间。

《生活》杂志的封面男孩符合像厄尼·派尔(Ernie Pyle)这样有影响力的战地记者所推崇的美国兵的理想形象:真实的士兵,“男孩子们”。在他关于1942年末的北非战争胜利的报道《这是你们的战争》(*Here Is Your War*)中,派尔对一些“男

孩子们”做了简要的描述：“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派恩大道 631 号的士兵弗兰克·T. 鲍宗(Frank T. Borezon)说待在非洲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找不到一个保龄球馆。”《生活》对鲍勃·伯格爾的描述更加凸显了普通人的特征：“如果你问他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他会不停在地板上搓着脚,嘀咕说是为了所有人的自由权利之类的话。”

虽然这种原则并不十分明确,但在 1942 年的美国仍然很有影响力。全国基督教与犹太教协会会长埃弗雷特·R. 克林奇(Everett R. Clinchy)认为美国青年面临的目标是“他们应该有作为传教士的意识,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分享美国理念。美国青年会为美国的这场伟大试验自豪。这场试验是什么?它是一场冒险,让所有旧世界的儿女们住在同一个大洲上,创造一个有着许多民族的国家,包括所有种族血统,所有的宗教观念。”

这个美国计划隐藏于宪法和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之中。青年接受了宣传民主思想的任务,因为民主本来就是这个国家给自己的定义。就像 1942 年马克·麦克克洛茨基(Mark McCloskey)说的:“美国是希望的土地,因此也是年轻人的土地。”但是还有其他的理想存在:“对于在战争结束之后还想让这个国家继续存在下去的男孩女孩来说,如果不能给‘美国式的生活’这个词组提供一个具体的定义,再怎么说明它也是没有用的。”

美国青年代表大会认为“征召下层阶级的和没有希望的人入伍,救赎这个国家的步伐不会前进。保卫这个国家,只能依靠希望国家能够变好的人们的热情。”事情就摆在台面上。更大的期望意味着更广泛的包容范围。这不仅包括青年,也包括那些在全民动员中被重新发现价值,曾经被遗忘的美国社会群体。宣扬自由的言论和饱受压迫的现实之间出现了矛盾,这将会成为战争时期不变的主题。

\* \* \*

黑人开始躁动不安,因为他们希望在民主的大蛋糕上分得更大的一块。1941 年 12 月初,一个黑人写信给总统:“如果真的有上帝这个东西,那他一定是白人,这从我们有色人种的境遇就能推断出来。希特勒都没有对有色人种做什么,反倒是在这里,是美国的人权使我们失业,使我们受到压迫。”安娜·沃夫理解这种矛盾:“虽然我们正进行一场反对希特勒和自私的种族优越论的战争,我们自己也陷在种族歧视和宗教偏见的谜团中。”

这股怨气从20世纪30年代就积累起来了。当时新政政策几乎丝毫未涉及黑人。一向以民主著称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没能通过反对私刑法,使得这种被歧视的感觉变得更加严重。之后斯哥兹堡孩子们的命运进一步揭示了南部黑人的绝望处境。1940到1941年期间重整军备的活动开始为白人失业者提供工作时,黑人还是没有工作。即使他们都跑去应征入伍,军队也是把他们放在隔离的部门,交给他们一些卑微的任务。

军队如此,社会亦如此。E. 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in Frazier)出版了《十字路口的黑人青年》(*Negro Youth at the Crossways*)一书,这是一本为美国青年委员会编写的书,其中收集到的来自年轻人的声音也同样表现了这种攻击性情绪。在布克·T. 华盛顿和乔·路易斯成功事例的激励下,受访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发现自己的疏离感开始被好战情绪所取代。然而,很多人发现自己的第一反应是,由于受歧视,他们开始变得缺乏自信:“我不相信我或者其他的黑人能够不感觉到自卑”,一个17岁的大学新生说:“我觉得我身上有印第安人的印记。”

很多被访的青年强烈感觉社会制度对黑人不利。一个21岁的“工人之子”说:“白人没有平等地对待我们,白人警察甚至像是能从殴打黑人中获得乐趣。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仅仅因为他们是黑人,而且没有办法反击。”一个叫沃伦·沃尔(Warren Wall)的16岁男孩认为“黑人不像白人那样有那么多好机会。”一些被访者只能在酒精的麻醉和“性爱”中得到解脱。

另外一些人遵循着一位21岁“底层”青年所说的那种原则,“对白人能多有礼貌就多礼貌,别对他们回嘴,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另一个技巧被定义为“装小丑”或“像猴那样做”。然而,在这些生存技巧之下,隐藏着“不甘低于白人地位的怨恨”以及“愠怒和‘残忍’的情绪”。甚至是在黑人的中层阶级,这个一直努力和低等阶级划清界限的群体,也有“萌生的种族意识”。

“我希望能解除所有的隔离,”一个18岁的高中生说,“我希望能去任何我愿意去的地方,做我想做的事情。”然而,情况越来越明显,他不可能获得这些权利,除非他们为之战斗。但是,虽然受到歧视,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希望能融入美国社会。17岁的迪克是中学学生训练军的军官,他认为“军队是黑人能去的最好的地方。那是一个黑人能够像白人一样得到尊重的地方。”实际上,在被隔离的军队,情况并非如此。

1941年夏天,“黑人游行华盛顿委员会”计划在首都发动一场10万人的示

威。最终的谈判结果是游行取消,总统下达了政府的指示:“在国防工业和政府部门的雇佣过程中不得因为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民族血统而存在歧视。”接下来军队开始骚动起来,就像有色人种进化国民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日志中所说的:“一个推行种族歧视的军队无法为自由世界而战。”

但是紧接着,一些黑人发现他们已经处在战争中了,只是不在轴心的位置。在《两百万黑人的声音》(*Twelve Million Black Voices*)中,1940年因为发表了批判性畅销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而出名的小说家理查德·怀特(Richard Wright)发表了对黑人生活的思考。他观察到“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我们的邻里关系也像是空中有颗炸弹那样紧张。”他以警告的口吻对新一代表达了这种苦涩的情绪:“看着这种奇怪的情绪控制着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心里充满痛苦。”

然而,在他的书中,有一页上登着一个年轻人的照片。他沐浴在灯光下,穿着样子奇怪,扣得很严实的长外套和铆钉裤。他走出萨瓦舞厅,脸上闪烁着看到未来希望似的微笑。怀特登这幅图是为了庆祝爵士乐广泛受到喜爱:“我们弹着我们的吉他和钢琴,吹着喇叭,敲打出全世界的人都喜欢的动人旋律。”他以炫耀似的口吻总结道:“我们的音乐使整个世界起舞。”



1940年早期,在哈莱姆的萨瓦舞厅

## 25

### 德国的摇摆青年和法国扎祖一族

纳粹欧洲的摇摆乐

我不希望你感觉政见的分歧拉大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因为我真的觉得像我们这样有着摇摆乐这种高尚爱好的两个灵魂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艺术是没有界限的,而摇摆乐就是一种艺术。

——1939年8月纽约的亨利·斯克罗写给德国笔友库尔特“热情的盖尔”米夏埃利斯的信



法国扎祖一族 1943年

20世纪40年代早期,摇摆乐风潮席卷欧洲。最为热情的拥护者是德国和纳粹占领区的青年。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深远的隐含意义,他们只是本能地回应从被禁的唱片中听到的自由的声音。摇摆乐说出了年轻人的心声,他们想要的不是血腥和领土。正如法国热门俱乐部的创始人查尔斯·狄隆内所说的,它是“我们对压迫”的回应,“爵士乐有禁果的味道。”

这种热情在战争时代的欧洲是很危险的,因为纳粹想要的是他们国民的完全顺从。同时,全面战争的爆发让青年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军队动员引起的混乱、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战争本身带来的心理问题使得1940到1941年间纳粹德国的青年犯罪增加了一倍。在纳粹政权的自信心达到顶峰的时候,有1.7万的青年犯罪纪录,其中三分之二是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犯下的。

纳粹国家的强大实力并没能铲除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顽固分子。直到1943年,高达95%的德国青年仍将继续在军队中忍受奴役,这些拒绝者在数量上很少,但是他们却是个大麻烦,因为军队要求的是完全的屈服和顺从。在这样一个警察国家,任何反常行为的蛛丝马迹都会被冠以“恐怖行为”的名号。由于德国正处在战争时期,青年的行为和态度变得更为重要,异议和镇压的循环在整个战争期间逐步升级。

战前问题大量出现。纳粹一直没能完全掌控德国主要的城市和城镇,而且战争早期一些追随希特勒的人开始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对组织。出身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这些邻里帮派稍稍在华丽男孩风格里加入了反纳粹的风格,他们穿着鲜艳的格子衬衫,戴着扁扁的帽子,配上金属火绒草徽章或戴在领子上的彩色别针,手上戴着骷髅图案的“可怕图章戒指”。

14岁到18岁的青年组织是由于想要逃避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义务而自发组成的。他们中很多人14岁就离开了学校,因此没有马上受到国家青年组织的影响。被强制入伍几年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工作,而且在腾飞的战时经济中得到了很高的工资,获得经济独立。已经开始扮演成年人角色的他们不会像孩子一

样任人随意差遣：“这是希特勒青年团自己的责任”，一个杜塞尔多夫团伙的成员说：“他们给我的每一个指令都带着威胁的意味。”

作为像火绒草海盗(Edelweiss Pirates)这类战前组织的延续,这些组织遍布工业德国:杜塞尔多夫有“塞姆柏克乐队”和“尼禄泰拉海盗团”〔1〕,埃森有“旅行者”,科隆有“纳瓦霍”,艾尔伯格有“蛇形俱乐部”。组织名字暗示了他们所想要的生活:脱离希特勒青年团和警察的不断折磨,获得自由。这些“野蛮团伙”中的男孩女孩们在全国各处游荡,搭乘免费车或者步行,最远到达了德国西南部的黑森林、柏林和维也纳,全然不顾警察的控制和旅游限制。

公然的政见分歧很快就被第三帝国察觉到了。严酷的惩罚使得大部分人退却了,只有那些最为勇敢的还在坚持。火绒草海盗以讽刺和幽默予以回击。他们最喜欢用的手法之一是改流行歌的歌词:“听那热情的歌唱! / 弹起吉他,拨弄琴弦! / 姑娘们都来加入吧/我们来对付希特勒,/让他什么都不能做。”另一个例子是:“我们行进在鲁尔和莱茵河畔/打得希特勒青年团四处逃窜/我们的歌是自由、爱 and 生活的写照/我们就是火绒草海盗。”

海盗们经常会遇到希特勒青年团无处不在的“飞腿巡逻”。这些粗野的团伙会“痛打”军队的年轻特工。1941年,一个采矿指导发现,在他的受训者中,“每个孩子都知道尼禄泰拉海盗是谁。他们无处不在,甚至比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还多。而且他们彼此认识,紧紧团结在一起。四处都是巡逻员,他们遇到就打,从无二话。”

希特勒青年团内外犯罪率的上升是对当局的直接挑战。1940年6月,海因里希·希姆莱制定了警察保护青年的相关命令:实行宵禁,晚上9点钟以后,18岁以下的孩子不准上街,不准进入餐厅和酒吧;16岁以下的孩子不准进电影院,观看各种演出和夜间表演;16岁以下的年轻人不准饮酒和吸烟,否则将被监禁3个星期或处以50马克的罚款。

这项新命令是由希特勒青年团的警察部门——不断扩大的巡逻队实施的。他们派出5万名成员协助警察以及党卫队,在咖啡馆、酒吧和电影院巡逻。许多人在警察所工作,他们负责报道野蛮团伙的行为以及性行为犯罪和政治犯罪。由于已经在党卫队的训练营里被洗过脑了,这些年轻的巡逻队机器人积极地参与了

〔1〕 以流经杜塞尔多夫和杜伊斯堡的一条小河命名。

1940年以后对野蛮团伙的大清除,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喜爱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3个月后,希姆莱和希特勒青年团领导阿图尔·阿克斯曼又引入了一项新的惩罚措施。青年服务逮捕机构给希特勒青年团领袖以拘留14岁到18岁之间的青年10天的权利。这些“逮捕”须在犯罪行为被确认的20天以内完成,而且要快速审讯。他们不采取驱逐的方法来惩罚罪犯,因为那样可能正合顽固反叛分子的心意。青年服务逮捕机构是确保绝对服从的有效手段:这样在战争期间就不会发生严重的希特勒青年团叛乱行为了。

1940年后,任何想要反叛的青年都必须与复杂的监管机构抗衡。纳粹德国的日常生活受到高度控制,在自由国家里不会被注意的行为在这里也变成反对国家的犯罪。经常有警察突击检查:1940年春天1715名反对者在德累斯顿被捕,1941年美因兹有400人,科隆的纳瓦霍有600人被捕。同时,黑森州的一个救世军组织要求“警察确保彻底了结这些流氓。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感觉自己是提着脑袋上街。”

火绒草海盗团之所以成为眼中钉,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自由开放的性行为触犯了当局尤其是希姆莱的清教主义。这种行为在希特勒青年团的体系里从10岁开始就是通过性别隔离严格避免的。由于火绒草海盗团和其他一些野蛮团伙没有受到国家监管,这些自发形成团伙的男孩女孩们在性行为方面不受任何拘束,这让当局非常恼火。

摇摆青年在性行为方面也引起争议:关于他们的报道里充满了“未成年人性交”、“集体性行为”、“同性恋”之类的词语。虽然摇摆青年行为比较随便,但要说他们堕落却是冤枉他们了。一个名叫普鲁拖克莱特的基尔摇摆俱乐部成员在给一位在外旅游的朋友的信中写道:“你想做基尔合格的代言人吗?那你就得非常随便,一直唱着英国流行歌,或吹着这样的口哨,喝得酩酊大醉,身边围满漂亮女人。”

\* \* \*

战争早期,在德国一些大城市,如布莱斯劳、基尔、柏林、法兰克福、德累斯顿、斯图加特和汉堡,摇摆俱乐部仍然存在。组成这些俱乐部的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渴望获得自由的男孩女孩们。他们保存着珍贵的被禁摇摆乐唱片,在各种演出中兜售这些唱片的仿制品,努力维持着爵士的生活方式。在纳粹德国,他



汉堡的摇摆乐青少年,1939年

们把头发留的特别长,形成了一种叛逆的个人主义风气。

当他们的同伴们还穿着军队制服的时候,汉堡的摇摆青年展示了叛逆的时尚:格子英国运动夹克、厚底鞋,安东尼·艾登式的帽子、“不管什么天气”胳膊上挂把伞。女孩子把头发留长,用着奢侈的化妆品。她们和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女孩截然相反,穿着有挑逗意味的衣服。一个年轻的莱比锡摇摆青年朱塔·西普(Jutta Hipp)回忆道,她出门“穿着一双蓝色丝袜,膝盖上有红心图案”,只是为了看起来和别人不同。如果有人看不顺眼,她就会走回去,“对他微笑”。

这种叛逆行为很具诱惑力,但也很危险。在法兰克福,一伙年轻乐迷组成了哈莱姆俱乐部:他们穿着英国式的衣服,留着长头发,甚至还制作了两张唱片。他们继续听BBC广播,这在1939年9月之后是严重犯罪,他们在街上彼此打招呼的方式是用口哨吹艾迪·卡罗尔(Eddie Carroll)的成名曲——“哈莱姆”。这个习惯很快传给了法兰克福俱乐部成员以外的年轻人,成为盖世太保监控之下的一种反叛行为。

法兰克福的团伙有他们自己的敌人,一个绰号叫“甘乔”的盖世太保间谍,这个人追捕了他们一些暴露的成员。战争的前两年间,没有大规模的逮捕。警察的

一些举动十分可笑,例如他们用快艇来追赶在缅因河上坐着小船播放被禁唱片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的行为表明纳粹要铲除摇摆乐生活方式的决心在不断加强。在汉堡,摇摆乐迷和当局之间频发的小冲突最终升级为一场由这座城市的“摇摆之王”汉斯·莱因哈特(Hans Reinhardt)发起的全面战争。

有父母的财富和自己的勇气护航,汉堡的摇摆青年继续不顾当局的反对组织聚会。在偷偷参加了1940年2月在一个阿尔托纳旅馆举行的舞会后,盖世太保间谍吓坏了:“那儿只有最下流的摇摆乐。有时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跳舞;有时几对舞者形成一个圆圈,挽起胳膊来跳舞、拍手、甚至还把头靠在一起;之后,弯下身子,上半身整个耷拉下来,长头发拍打在脸上,跪在地上拖着身体转圈。”

情况越来越严重:“乐队演奏的音乐越来越狂野,演奏者们都不再坐着,他们都疯狂摇摆着站在台上,像是野兽一般。可以看到有几个男孩在一起跳舞,嘴里一直叼着两支烟,左右嘴角各一只。”这种狂热不但堕落,而且还极富煽动性。正如报告总结的:“摇摆舞完全是一种可怕的潮流。他们演奏英国的音乐,而我们的士兵正在战场上和英国人搏斗。”

盖世太保的报告详尽列出了让当局感到震惊的有关摇摆乐的事实:他们表露无遗的英国崇拜,他们堕落的性行为,最为严重的是,他们的“狂野热情”与纳粹所热衷的武装运动格格不入。摇摆青年们的生活方式完全与纳粹的原则背道而驰。他们宣扬的不是共性,而是个性;不是侵略,而是公开的性行为。他们拒绝把战争当回事:他们在公共场所放他们的爵士乐,听BBC广播,而且把公共场所“元首”〔2〕的肖像盖起来。

战争还在继续,但是摇摆青年们并不理解战争的规则:他们没有意识到娱乐活动或者讨厌战争的情绪都是被禁止的。1940年春另一个大型的公共舞会被迫停止。参加者都持有印好的请柬,在门口经过检查才能进去。但是,下午两点,正当音乐达到高潮的时候,警察冲了进来。他们封锁了所有出口,对在场的400多名摇摆青年进行了几个钟头的搜查。几乎所有被捕的青年都不到21岁,不过大部分很快被放了。计划在两周后举行的聚会被立刻取消。

同时,汉堡的摇摆乐青年还在继续试探纳粹的极限。托米·谢尔(Tommie Scheel)和两个朋友穿成歹徒的样子,在一个朋友的公寓制造了一起假的抢劫案,

〔2〕 fuhrer,对希特勒的称呼。——译者注

并拍下了全过程。谢尔和他的朋友们把录像插播在当地电影院正在放映的新闻片中,还加以讽刺意味的评论。他们在盖世太保在场的情况下,故意在咖啡厅里发表批评言论。他记得,“我们要告诉这些蠢杂种我们是不同的,仅此而已。”以这样的态度,他成为1940年秋被盖世太保逮捕的头一批摇摆领袖中的一个。

在汉堡的市政大楼里,谢尔不断遭到殴打。在殴打的间歇,他必须面壁坐几个小时。如果他动了,盖世太保的一个成员就会不停把他的头撞向墙壁。年仅17岁的他被控告是摇摆青年的领袖,而且,在盖世太保找到了假抢劫和盗窃的照片之后,他被控为“狂欢”的组织者。之后他被送往汉堡臭名昭著的富赫尔斯布特尔(Fuhlsbüttel)监狱,在那里服苦役。那年秋天盖世太保逮捕的其他一些摇摆青年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一些超过18岁的不幸者还被送到了前线。

公共聚会点都被关闭了,于是摇摆青年们在俱乐部和私人聚会上继续他们的活动。欧洲的乐队表演会经过仍然是国际都市的汉堡。1941年早期,摇摆青年们聚集到汉堡中心河畔一个大型的玻璃顶夜总会里,约翰·克里斯泰尔(John Kristel)的荷兰摇摆乐队在那里表演。一个情绪“高涨”的参与者回忆说,“热情持续上升。人们激动得要疯了。太难以置信了。约翰·克里斯泰尔的乐队有一个这么绝顶的喇叭手。每次他站起来独奏,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

但是,盖世太保很快听到了风声。2月底举行另一场演出的时候,他们大规模出动。约翰·克里斯泰尔和他的乐师们被锁在一间地下室里,然后从后门被带走了。聚集起来的摇摆青年被告知乐队必须突然离开汉堡,这显然是谎言。虽然几个月后克里斯泰尔回到了阿尔斯特帕维伦,他们是去为休假的部队表演的,但魔力已经不再:当局警告乐师们把音调降低。这样的音乐“一点也不震撼人心了。”

之后盖世太保有了新的力量来对付这种“靡靡之音”。他们主要的武器是禁止公共舞会。然而随着战争局势变动,禁令难以执行。1941年8月间,帝国音乐局(Reichsmusikkammer)发布了“原创和复制热门摇摆乐唱片”禁令。这之后,现场音乐演奏和公共事件都受到帝国音乐局职能机构和盖世太保的巡查,他们在汉堡和法兰克福都安插了间谍。

这一禁令之后,汉堡的摇摆乐运动转向地下,转移到了他们父母昂贵的别墅的地下室里,这里暂时还是盖世太保无法进入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可以在“墙上贴着壁画,铺着地毯和亮红色羽毛坐垫”的房间里喝白兰地,听摇摆乐。这种“温

暖、动人”的环境是他们的天堂。然而,1941年秋天又掀起了另一波清除摇摆乐的热潮,这次作为领袖人物之一的卡奇·吉尔迪阿斯(Kaki Georgiadis)被捕,而且被单独监禁了几个礼拜。

对于那些对这种残酷做法毫无思想准备的青年来说,盖世太保的行动非常有效。他们让密探给心灵脆弱的摇摆青年施压,让他们通知他们的朋友。希特勒青年团负责通知当地学校热爱摇摆乐的学生,并且和指导员一起清除叛乱者。然而,亚文化群立场坚定,以至于1941年的夏天,中央安全局的首领莱茵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接到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求助。1942年1月,控制更加严格,盖世太保制定了一项新的禁令,规定禁止在像体育俱乐部这样的半私人场所跳舞。

当月,希姆莱介入此事。他坚信对付这种败坏的风气没有“折中”的办法:“所有带头的,不论男女,还有那些怀着敌对态度鼓励摇摆青年的老师,都将被送到集中营。在那里,这些年轻人首先会被痛打,然后经过严酷的训练,再送去干活。我认为对这些青年和无用的女孩子们来说任何劳工营和青年营都不合适。这些女孩应该去做纺织工,夏天在地里干农活。”

希姆莱觉得让这些反抗者在集中营里待“2到3年时间”就会老实了。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的上学时间和青春岁月都减少了。同时,他建议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要了解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了多大的鼓励。如果他们鼓励了孩子,那么他们也应该被送入集中营,并且要没收财产。只有强行干涉,我们才能在德国为生存在战的时候阻止这种追随英国风(anglophyle〔3〕)的危险趋势蔓延。”

一个高潮事件扭转了汉堡摇摆乐青年的命运。1942年6月在汉堡郊外的私人舞会上,在奢华的大餐之后是模仿希特勒和盖世太保的歌舞表演。负责人卡奇·吉尔迪阿斯被人告密落到盖世太保手上。汉堡摇摆青年的领头人们被当成叛国者,纷纷被捕,经历了严刑拷打。之后不是被送到乌克马克、诺因加默和莫宁根的集中营就是被送到东部前线,他们被称为“颓废的懦夫”,安排在最危险的位置。

但是,纳粹并没能成功铲除摇摆乐迷。夏末,党卫队参加了威利·阿特尔特(Willi Artelt)乐队举行的汉堡音乐会,“队长表演得如痴如醉。他表演的时候弓着背,眼睛左顾右盼;观众们也跟着一起狂吼。”这种亚文化传到柏林、汉诺威和德

---

〔3〕 按照原始文件拼写。

累斯顿,年轻的观众们要求乐队演奏真正的爵士乐,“他们弹奏的音乐越狂野,越热情,越爵士化,他们获得的掌声就越多。”

当局的行为使摇摆青年们更加公然地反对政权。1942年夏天,一篇关于汉堡一场爵士乐演奏的报道中写道,为英国曲调的喝彩“和德国音乐所获的掌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演奏的其他曲目还有英国的热门歌曲‘可爱的苏’,里面有‘读午报,读日报’的歌词。‘摇摆青年’经常演唱改编版的歌曲,‘读午报,读日报,都是谎言,都是垃圾’,观众熟知这样的歌词,结果这首歌获得了特别多的掌声。”

\* \* \*

法国北部的纳粹占领区也出现了同样的压迫和反抗。1941年春,媒体报道了爵士音乐会上的不当行为,他们指责“小摇摆迷”的狂舞有失体统,指责他们嘲讽国家的严峻形势。同年晚些时候,法西斯青年报《年轻人》(*La Jeunesse*)详细描述了“1941年摇摆狂潮”：“他们故意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留到肩膀,留着克拉克·盖博式的小胡子,穿无领夹克,条纹裤子,厚底鞋,走起路来一边颠来颠去,一边还喊着口号。”

法国摇摆乐的发展和国家被占领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学家简·克洛德·路易斯(Jean-Claude Loiseau)说:“每一场音乐会都会产生支持和反对的狂热情绪,并且随着被占领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而逐步升级。”法国沦陷的一年之内,摇摆乐成为流行时尚。一个叫约翰尼·赫斯(Johnny Hess)的歌手以一首“我是摇摆歌手(*Je Suis Swing*)”开始了摇摆乐演奏,另外一些歌手创作了“你是摇摆乐青年吗?(*Etes-vous Swing?*)”和“无处不在的摇摆乐(*Swing Partout*)”这些旋律,投身这个领域。这股潮流得以兴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让人们得以发泄被占领带来的情绪:“如果你无法忍受这样的现实,那你能做些什么呢?”

被占法国的新政权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命令强加给青年。1940年夏天的溃败之后,德国把这个国家分成了8个区域,包括南区和北部被占区,这个区域从兰斯延伸到波尔多,包括巴黎。由于战前投机分子进行了很多法西斯运动,法国很快采用了德国的标准——标志是德国在巴黎沦陷后挂在埃菲尔铁塔上的鲜血旗帜。

南部区域交由维希政权(*Vichy regime*)来控制。政府首脑是一战英雄、84岁的贝当元帅,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担任副总理,维希开始进行“全国改

革”，旨在清除旧的法国革命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取而代之的是新的三位一体的口号“工作、家庭、祖国”。以贞德作为标志形象，这场革命的目标是重新贯彻贝当心目中的永恒真理：家庭是社会秩序的“基本细胞”，田地劳动是人类事业的最高形式。

青年在这个农耕国乌托邦中——和纳粹的华尔斯高计划没有什么不同——处于从属地位。贝当掌权不久后指出：“青年的精神已经被牺牲精神占据了。”青年不再有权利，只有义务。对维希的空想家来说，法国的溃败是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知识分子所造成的道德败坏的必然结果。为了与道德败坏作斗争，维希通过了新的反酒精、性病和流产的法律：出生率的下降被认为是“国民的集体自杀”。

维希的教育政策是以牺牲文学方面的教育为代价的，强调体育教学。新国家精神世界的基石不是现实的个人主义，而是责任、纪律和信念。有两个青年团体推动了理想。法国工友协会(Compagnons de France)是由15到20岁的青年组成的类似于童子军的自发组织：新成员从学徒开始，逐渐通过完成严格的营地训练成为“工匠”。在合唱和戏剧之外，他们还安排林业之类的活动。

通过“青年工地”组织，维希青年将被重塑成农民。作为一项替代军事服务的工作，所有南部区域年满20岁的青年都必须义务参加农活。这是培养新国民性格的最好方法：“以前青年们总是想方设法逃避义务，他们虐待动物，一切按自己的想法行动。现在，青年们声音整齐划一，他们热爱法国的一切，对他们的领导充满信心，他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都变得纯净。”

为数不多的从被占区来到南部的人发现“这是块奇怪的土地，从孩子到60多岁的老人，所有人都被编入从青年团到老年战士的团队中，戴着法国国徽或者他们团队的标志。”宗教热情巩固了维希的青年政策。人们希望新骑士精神能够拯救欧洲文明，这种愿望在1942年8月天主教教员在勒皮(Le Puy)庆祝黑色贞女组织的朝圣活动中达到顶峰。

对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来说，从巴黎的情况来看，元首所说的家庭、上帝和“美德之治”是“使我的童年变得黑暗的偏见和愚蠢思想，现在它像一块压制民众的毯子，覆盖了整个国家。”维希想要倒退回到并不存在的宗教农业时期，而被占区的形势完全不同，这里更加现代，情况也更严重。虽然维希是新法国的首都，但是巴黎才是权力的所在地，直接在纳粹的控制之下。

法国最为积极的纳粹合作者是战前的法西斯主义者，如作家亨利·蒙泰朗

(Henri de Montherlant)、德里厄·拉罗歇尔(Drieu La Rochelle)和罗贝尔·布拉希拉奇(Robert Brasillach)以及更年轻的空想家,如吕西安·勒巴泰(Lucien Rebatet)和阿兰·劳伯鲁克斯(Alain Laubreaux)。他们通过一系列由德国出资创办的小杂志和纳粹合作,开始是1940年7月的《花环》(*La Gerbe*),继而是1940年12月间的青年周刊《年轻人》,还有1941年2月重新发行的《我无处不在》(*je suis partout*)。

才能出众却居心险恶的罗伯特·布拉希拉奇(Robert Brasillach)负责创办的《我无处不在》推动了对青年法西斯思想的宣传:“我们应该传达给青年英雄崇拜的思想,给他们力量、勇气、热情、责任、牺牲、残忍和能量。”它迅速成为最受欢迎的通敌杂志〔4〕:这是他们的机关刊物,而谴责者也无处不在。“处处还是他处(*partout et ailleurs*)”的专栏里刊登了纳粹所要追捕的人名和地址,这有效帮助他们进行逮捕,甚至是谋杀。

这些尖锐的声音代表了对纳粹占领的极端反应,但是纳粹规则在被占区的冲击漫布各处。几乎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是一个道德难题。就像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之后所写的:“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模棱两可,我们从不知道我们做的是对是错;最正确的行为也可能因为一点过失变成错的。”一个巴黎女学生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表达她的反对态度:“我讨厌而且会一直讨厌德国佬,”她解释说,“但是德国人作为个体看待还是好的,他们的培养方式是正确的。”

抵制活动很难开展,而且会马上被处以死刑。政治活动几乎不可能,于是一些法国青年在波德莱尔的讽刺作品中找到了反击的方法。1940年以后,一群“小摇摆迷”开始故意向当局挑衅。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之后在《叛变者》(*L'homme révolté*)中称这是愚蠢的反抗:“这些纨绔子弟只懂得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对立面上,认为这样就能起作用。他只能从别人脸上的表情来确定自己的存在。其他人是他的镜子。”

“小摇摆迷”从美国得到了启发之后,变成了“超级迷”。之后,在1941年冬他们变成扎祖一族(Zazous)。那时,占领区的压制变得更严重。美国参战以后,爵士和摇摆乐受到严格审查。巴黎大学书店因展出了亨利·蒙泰朗的作品被炸。之后,米歇尔大道的咖啡厅被关闭:这是当局对拉丁区“腐坏精神”的回应,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就是“在火山边上跳舞,用扬起的拇指打节拍”的扎祖一族。

〔4〕 人们嘲笑它是 *Je Chie Partout*:我四处放屁。

扎祖一族主要来自中层和中上层阶级,是J3年龄层(13到21岁的青年)中年龄偏大的那些人。J3是占领者为了配给和身份证的需要确定的一个名称。服饰和社会态度是他们区别于其他人之处。和加缪的华服少年一样,他们发起挑衅,当局回击之后,他们再次挑衅,一直保持着平和却讽刺的态度。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和德国冲突,但他们嘲笑了“伟大的盖世太保”。当《年轻人》号召所有青年“献给我们你的20年”时,他们回答:“凭什么呢?”

“扎祖”这个词来源于爵士俚语。引领手表链和格子夹克潮流的卡伯·卡洛维在1933年录制了“扎,祖,扎”,并且在这首歌里加了“扎祖扎祖——嘿!”的饰音。即兴演唱歌手史林·盖拉德(Slim Gaillard)在“Tutti Frutti(全体齐唱)”和“Flat Foot Floogie(扁平足的问题)”中发展了这种超现实主义的铿锵节奏。其他一些人引用了被逐出国的美国鼓手弗莱蒂·泰勒(Freddy Taylor)的节奏,他在战前录制了一首“吸毒者的梦想”。不管它是怎么开始的,扎祖一词在被占区通敌者眼中很快变成贬义词,他们把扎祖看作“白痴”甚至更差的人。

1942年3月,《阐释》(Illustration)杂志对这个新兴群体做了详细的调查。男性扎祖青年穿着满是口袋和饰带的格子夹克。他们的衬衫领子很高,长袖子盖过认真修剪过指甲的手。他们常以细的羊毛带子做装饰。直筒裤,袜子是浅浅的原色。布底鞋和“像色拉一样油乎乎”垂到领子上的头发非常引人注目。最后,为了凸显浮夸的格调,他们把手绢放在纽扣眼里。

女性则穿着羊毛外套、圆领毛衣和窄肩夹克。她们的头发在头顶上挽成圆髻,涂着鲜红的口红和指甲。她们的褶裙很短,露着大腿,脚上穿着米妮鞋:叠层的平跟,“大得像船。”另外修饰以项链、耳环、手镯和四方大背包。直到晚上还带着的雨伞和墨镜是她们的标志。拉丁区的扎祖一族融合了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时尚元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年轻人》认为这个运动起源于资产阶级青年群体,他们是在“左岸”闲逛的“愚蠢的一代”,“世界对于自恋的他们来说平凡得像块帆布。”他们的总部是两个咖啡馆,“卡布罗德”和“拉丁的杜邦”,他们在那儿招摇地抽着英国雪茄。还有另外一个扎祖区在香榭丽舍,其总部是一个叫“潘潘”的咖啡馆。这些扎祖中心非常时尚:对奢侈品的追求使他们得到了“被宠坏的小家伙”的绰号。

由于生活在一个有着宵禁令和监视的社会中,扎祖一族把他们的文化转移到地下,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惊喜聚会”重新出现,这是一种非法的、未经许可的

集会。厚厚的百叶窗低垂,在柔和的灯光下,他们可以听新奥尔良的爵士和摇摆乐,而不用担心被打扰。在这种令人兴奋的自由气氛中,他们的行为像是淘气的孩子,而不是身担重任的纳粹奴隶:有时他们会摔毁所有的东西结束聚会,在鼓吹忏悔和禁欲的政权下他们故意表现这种破坏行为。

他们还崇拜美国文化。德国禁止播放 1937 年以后的英美影片后,扎祖一族感觉像是失去了点什么。“米高梅(M. G. M.)公司的狮子标志消失了,我们就像哀悼朋友一样哀伤”,其中一个回忆道,“所有美国电影的神话已经在我们心里扎根,那是我们的世界,是我们通向神秘的生存方式的钥匙。”美国文化成为他们的失乐园,有点像黄金城。表面平淡的话似乎也成了某种信条,比如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在《去华盛顿的史密斯先生》(*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中所说的:“我自由了,想到什么就能说什么。”

德国没办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扎祖一族随意发表言论,来发泄被禁止的情绪。据扎祖青年让·路易斯·波利(Jean-Louis Bory)说,“即使是对电影言外之意进行解读,也是个态度的问题。”扎祖青年看透了维希政权,他们认为一个由 80 多岁的人领导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对青年说的,他们只会像猪拱食一样追求贝当主义。

维希教育部长阿拜尔·伯纳德(Abel Bonnard)谴责扎祖一族是“个人主义社会最后的残渣”,扎祖一族则对他把圣女贞德当作全法国青年榜样的说法嗤之以鼻。“我们的反叛精神不能忍受他们强加给法国的‘工作-家庭-祖国’三位一体的思想。我们从荒谬的形势中获得了力量。”

扎祖一族不仅完善了这种消极的审美,还从他们的敌人那里获取能量。通敌者一开始采取遣散的做法,但很快就变成更加严格的禁止了。吕西安·勒巴泰把摇摆乐和戴高乐主义以及犹太主义联系起来。罗伯特·布拉希拉奇斥责他们“没有法西斯精神,只有玩乐精神。”1942 年 4 月,《年轻人》认为扎祖“同时结合了爵士、伦巴和伦贝斯之路的疯狂,他们玩着溜溜球,露着大腿,彼此调情,就像没有明天一样。”《花环》评论,“他们根本不是法国人。”

最重要的是,扎祖一族的嘲讽态度表明了他们对被占领状况的无声抗议〔5〕。

---

〔5〕 被占期间很多法国作家都喜欢选择沉默。阿尔贝·加缪的《陌生人》(*L'étranger*)中的无名英雄断然拒绝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这看似无意义,其实可以被看作是战争期间法国生活的缩影。

《花环》总结到：“这些年轻的白痴在玩火。”扎祖一族用了很多方式来激怒当局泼妇一般的发言人。他们奢华的衣服和让人难忍的抽烟习惯违背了配给原则，暴露了黑市在其中的作用。和汉堡的摇摆青年一样，他们嘲笑让他们觉得滑稽的国家言论：他们不是输掉战争的一代，那么为什么要他们牺牲和补偿呢？

这伙年轻摇摆乐迷深深困扰着通敌者，他们认为扎祖一族象征着颓废，丢尽了法国的国家荣誉。7月，《年轻人》控诉“这些自由法国的年轻公民”在等待“戴高乐的胜利和可口可乐的回归”。最让法西斯记者受不了的是，他们把这些记者放在一边，一点也不想跟他们扯上关系，这虽然不违法，但是被认为是一种顽固的挑衅。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指出，扎祖一族的“亲英立场和无政府主义态度的确与政府政策背道而驰。”

1942年春情况加剧。《花环》支持公开打击扎祖一族之后，“法国人民青年”——一个全新的青年通敌团体拿起了棍棒。创建者雅克·多里奥特(Jacques Doriot)认为，服装是“种族的标志”，他告诉他的跟随者，“你会很艰苦、你会很强大、你会很暴力，但是你会穿着得体的衣服。”5月底，成百上千的“法国青年”穿着蓝衬衫黑领带的制服，穿过波尔米奇大街(Boul' Mich')，一直喊着“贝当万岁，多里奥特万岁”，看见扎祖青年或者犹太人就打。

这还只是序曲。6月中旬警察的大清洗中大约100名扎祖青年被捕。7月，《年轻人》当周的大标题是“摧毁扎祖，摧毁扎祖，摧毁坏风气，拥抱新政府”，改变颓废者的办法是剃光他们的头发。虽然忙于帮助纳粹进行对犹太人的第一轮围捕，“法国人民青年”还是欣然接受了“理发师”的任务。很短的时间内，任何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扎祖，头皮都会被剥下来，毫不留情。

扎祖一族也是法西斯打手的目标，他们在常规的警察清洗中被抓起来，然后被遣送去收割庄稼。那年夏天，一些扎祖青年模仿犹太人的黄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星，来“表示对犹太人的同情”，这更加使他们成为社会头号公敌。他们的星“几乎跟官方的黄星那个一模一样，除了一个细节：中间有一个5个字母组成的单词：Swing(摇摆)。”犹太人由于种族原因而被驱逐，现在扎祖因为着装遭到驱逐：一旦被发现，他们会迅速被捕，送去强制劳动。

发生这一切的同时，摇摆乐成为全国性的热潮。1942年夏天的电影《摇摆小姐》使这种风格流行起来，一切都成了摇摆：鸡尾酒、开胃酒、服装样式。然而到秋天，扎祖一族逐渐消失：最大胆的那些人还是常去他们的老地方，但是很多曾经穿

着夸张的人都开始变得低调了。“为了不丢我们的脸，”让·路易斯·波利回忆，“我们自己需要重组。”如果服装的确是个麻烦，那就换掉它。他们不再进行挑衅的行为，谨慎行事变成他们的准则。

1942年10月，强制劳动草案正式开始实施。18岁以上的青年有义务劳动的责任，白天在公共场所闲逛的青年可以被逮捕，直接送到德国。这种时候绝不是做出头鸟的时候。11月，《花环》描述了一种新的“扎祖忧郁风”，穿着灰暗的衣服，戴着金属框眼镜，但是很多以前的扎祖青年为了逃避强制劳动转向地下活动，成了“逃兵”。一些比较顽固的成员加入了游击的武装自由运动。

扎祖一族出现在法国历史舞台上，又消失了，像一阵烟云。虽然他们没有成什么气候，却无疑向当局展示了他们对于“国家改革”的轻蔑态度。他们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洋洋得意。他们把青年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他们反对被占带来的“无处不在的恐惧”。但是，他们也得到了教训，在纳粹的国家里，一切都被政治化了，挑衅换来的只能是暴力、监禁和死亡。

## 26

### 阻特装青年和“胜利女孩”

动荡的美国 1943

战争的残酷对参战国青年的情感造成多大的伤害,关于这一点没有哪个美国人能够给出答案。家园一次次被摧毁,死亡和毁坏成为游戏的规则。在这样的国家里,青年们是怎么想怎么做的;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怎样一步步迈向成熟的,或者,是怎样退回野蛮或消极的状态的。所有的这些故事,我们都应该认真倾听。

——安娜·沃夫,《我们的孩子面对战争》(1942)



游行中的阻特装青年,1943年

美国参战了：可是敌人在哪？远在千里之外，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彼岸。战争的前两年间，很少有美国人真正参与战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敌人只不过是他们在新闻和照片上看到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战争而产生的敌对情绪——弗洛伊德所定义的“自私和残忍”的冲动——都被压抑着，无处发泄。

在和平时期通常能够克制的敌对心理此时汇聚起来，聚焦在国家敌人的身上。然而，这个过程无法完全掌控。1942年间，美国就是个压力制造器，契斯特·赫姆斯(Chester Himes)写道：“我走过街道，我注意到了白人脸上的表情，那是日本在珍珠港投下的第一颗炸弹激发的如洪水般的憎恨。整晚，街上狂热的种族敌对情绪像浓烟般强烈。”这种紧张状态很快爆发了。

首先遭殃的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他们生在美国，父母是日本人。“当消息通过几百万台收音机传遍全美国时”，约翰·冈田(John Okada)在《别，别，孩子》(*No-No Boy*)中写道，“所有日本的东西，所有日本人，都成为人们痛恨的目标。”《别，别，孩子》探索了10万日裔美国人的状况，他们被强行驱逐或者被赶到特别集中营：一夜之间，他们成了美国最受歧视的群体，他们被称为“日本犹太人”。

1942年2月底特律发生了一场大骚动。当局试图把黑人家庭迁移到紧挨着波兰裔美国人区的新家，骚乱紧接着发生了。“旅居者真理之家”并没有热烈欢迎他们的第一批房客。一家底特律报纸写道，“成百上千的白人封锁了道路，用石头砸汽车和卡车，残暴地殴打毫无防备的黑人。”警察就站在旁边，“默许白人聚集于此，公然实施暴力。”

在洛杉矶，战争时期的混乱问题都被归罪于17个墨西哥籍美国青年。他们涉嫌著名的“沉寂环礁湖”(“Sleepy Lagoon”)案，被控谋杀了一个年轻的帮派成员。《沉寂环礁湖》是哈里·詹姆士的热门歌曲，他的歌声让人们环礁湖充满了遐想，对于不准进入隔离游泳池的墨西哥青年来说环礁湖是游泳的好去处。霍赛·迪亚兹(José Díaz)的尸体正是在环礁湖附近找到的。媒体和警察同这些新的国内敌人周旋了一整天，他们是仅次于日裔美国人的二号国内敌人。

同时,青少年犯罪飞速增加。他们的父母或者应征入伍,或者出去寻找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他们处在战争的狂热情绪中。因此,很多青少年缺乏成年人的监管。1942年4月,《变化》(*Variety*)指出缺乏监管的年轻人正疯狂地冲向电影院。这只是表象,同年秋天《生活》发现了深层问题:“突然之间,国家明白战争对孩子们做了什么。美国青年正在经历1940年曾经席卷英国的那种狂暴的违法行为。”

战争初期的几年间,美国青年感觉自己解放了,但同时也成了战争的替罪羊。他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缺乏明确的社会角色。他们不像德国、法国和英国未滿军龄的青少年那样遭受炸弹的袭击,没有强制劳动,没有全面战争的恐惧,也没人要求他们参加准军事机构。他们要做的是在被大批移民和战争的狂热搞得天翻地覆的国家寻找自己的出路:如一位青年研究专家所写的,他们“受到的战争影响比任何群体都大。”

很多青年辍学参加工作。1942到1943年间,随着年轻人涌入工业领域,中学的入学人数明显下降。1940年14到17岁间参加工作的男女青年只有100万左右,到1944年增长到近300万,约是美国青年群体总数的30%。夏天一般来说是经济繁荣期,这时年龄在14到17岁之间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少年据估计有400到500万。其中,劳动力市场中14到15岁的青年数量是16到17岁年龄段的两倍。

青年辍学的动机各有不同。当局认为青少年劳动力群体是比较容易说服的,于是直接向他们呼吁:“战争持续期间,每个女孩都有在基础部门担任工作的爱国义务。美国男性劳动力紧缺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就像一个高中生所说的,工业部门“嚷着要雇用出色的男女青年。商店和办公室急需男生;女孩子则要在办公室里做速记员和打字员。”

战争本身也给人不确定感。“青少年感觉他们的世界一夜之间都改变了,”人格发展研究会会长写道:她感觉美国的年轻人摇摆在害怕、内疚、憎恶和焦虑之间。对男孩子来说,辍学是个很大的诱惑。整个文化都在宣扬刺激和兴奋。不论是像约翰·韦恩(John Wayne)主演的《飞虎群英》(*Flying Tigers*)这样的电影,还是《飞行冒险计划》(*Flying Wildcats*)这种青少年书籍,给他们的感受都是一样的:超级刺激,让人兴奋。

青少年的社会定义又改变了:在大萧条时期,他们被强制待在学校,不要参加工作,而现在则要鼓励他们全面就业。由于很多18到30岁之间的人暂时离开了社会生活,使得未到军龄的青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想到不工作

有可能就得去打仗,而且每周平均 10 美元的待遇也让人充满信心,美国的青年开始走上街头,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

青年的地位突显出来,这引来了成年人的批评和控制。1942 年报道的青年犯罪问题促使很多地方政府对 17 岁以下未参加工作的青年实行晚上 10 点的宵禁,这一举措反而招致青年犯罪数据的大幅上升。在 1943 年 2 月对 16 岁以下的男孩和 18 岁以下的女孩实行宵禁的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警察“特别关注成群游荡的青年,尤其是在酒馆和舞厅附近成群结伙,或者是在学校上课时间还在外面游荡的那些。”

宵禁令颇受冷遇。“我们整个生活都会受到影响,”一个高中生评论说,“不过,实行宵禁也好,由于实行鞋配给,人们连散步都取消了。那原本是在实行汽油配给、轮胎配给、糖配给和可乐短缺之后情侣们唯一的乐趣,现在马上不会有了。”“我敢打赌那些委员们 15 岁的时候也是 10 点钟之后才回家,”另一个抱怨道。“现在,他们快活过了,却剥夺我们的快乐。我知道对很多青年来说,有些事情做不了的话会被逼疯的。”

\* \* \*

珍珠港事件带来了巨变。美国从一个萧条的国家很快变成了飞速发展的工业中心。1700 万的新工作机会引发了从 19 世纪以来未曾见到过的大规模迁移。1300 万的人开始备战,另有 900 万人带着他们的家庭成员为军工业迁移到西部和西南部——加起来超过 2000 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6%。同时,20 世纪 20 年代式的大规模生产重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这一年,政府为人口迁移带来的“疯狂建设”出资 120 亿元;建设中采取所谓的“成本加利”新原则。因此,过量生产也没有关系,因为“山姆大叔〔1〕”能把所有工厂生产的产品全都吃进。以政府计划、社会规范为经济模式的新政结束了:新的工业巨头要求停止一切社会主义的“无稽之谈”。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雇主主导的繁荣市场又回来了。

新政的优点在于其提供的充足工作岗位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失业问题。缺点则是这个庞大的新工业体系毫不顾及工人的权利和乐趣,福特在密歇根的威洛伦

---

〔1〕 Uncle Sam,指美国政府。——译者注

经营的导弹实验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是新一轮的淘金风暴,全美穷人都涌到塞内卡和伊利诺斯等城市和小镇上,那里的人口几个月间增长了27个百分点。

年轻女子、青少年和孩子对这些变化特别敏感。1942年的前3个月里,婚戒的销量增加了30%,因为很多年轻情侣都希望彼此的关系更加稳定。由于丈夫们离开之后,新娘还需要生活,工作就成了她们等待丈夫时最好的选择。战争的4年间,650万妇女成为劳动力,这无疑改变了美国人对女性的看法——代表人物是著名的女子铆钉工。

记者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1943年早期写道,“女性已经跳出了我们塑造她们时所用的模具”。对于“崭露头角的美国女性”,他评价说,“当她在飞机制造厂里日复一日做着男人的工作,或者在铁路机车库里忙碌,或者在开出租车,又或者在焊接潜艇,她们的思想和行为似乎不可能再被禁锢。传统标准的贤良淑德,据我所知,已经有了瓦解的迹象。从工厂里出来的一群女孩行为举止更像是一群小伙子。”

勒纳指出当局对这样的变化有些措手不及:“我们任由妇女儿童的生活发生巨大的变革,但是却不愿对此负任何责任,因为那将是‘社会主义’。”就像马克·麦克克洛茨基在关于美国巨变的调查中所写到的,“一些生活在新防御城镇的妇女说,她们感觉自己的生活和在集中营没什么两样。她们没有团结一致的感觉,缺少与社会群体联系的纽带。”

照料孩子成了个大问题。记者阿格尼斯·梅尔(Agnes Meyer)描述了战争是怎样影响圣·佛兰多山谷的:“一个停车场里,社工数了数被关在车里的婴儿有45个。在瓦莱约,孩子们坐在电影院里,一遍又一遍看同样的电影,直到他们的妈妈下班回来接他们。一些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被锁在家里,还有一些被锁在外面。”一个社工午夜在小酒店里抓住一个12岁的女孩,问她在那干什么,她回答:“我要等到12点钟,只有到那时候我的床才能空出来。”

公共娱乐场所成了新的托儿所。一个曼西的记者描述了周六午夜当地电影院里的情景:“在入口处,睡眼朦胧、疲惫不堪的孩子正等待他们的父母。一个小男孩正在等待,通过他红扑扑的小脸蛋大约能看出年龄,过大的外套松散地挂在身上,扯破的纽扣孔里扣着各样的纽扣。他拾起一根香烟,吐出几个烟圈。”

年轻的美国兵也经历了这些突变。军队为了把士兵塑造成流氓团伙一样的集团,向他们灌输不怕死和牺牲的思想,把成千上万休假或者正在度周末的青年

送到已经挤满了各色移民的城镇接受训练。这些美国兵必须抹去个人特色,重新编整,和那些还看不到的敌人战斗,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是平民百姓,可是他们却还没有完全转换好角色。在出征之前,他们是异地的异乡人。

这种及时行乐的心理证明,这些士兵虽然承担着成年人的责任,但仍然还是孩子。美国兵的醉酒和暴力都得到宽容。《美国佬》(*Yank*)这样的军队报纸上登载的瓦格斯美女和裸女照激发了性行为。作家詹姆士·琼斯(James Jones)回忆道,“每一期都必有一整版有名气没名气的‘偶像裸照’(很多都是人们熟知的明星:宝莲·高黛,安·谢丽丹,芭芭拉·斯坦威克,简·拉塞尔,而且到处都是贝蒂·格拉布尔的照片)。”

美国兵一下班,就感觉终于可以自由“释放激情”了。成群的美军兵在主干道和临近军事基地或者登船点的市中心闲逛。在大城市里,闹市区灯火通明、霓虹闪烁。很多地方还保留着流浪生活的印记:到处是万花筒、滑稽戏剧院、还有张贴着可怕海报放映探险片的脏兮兮小影院。这里的一切都与性有关,给人一种什么事都能发生的感觉。

结果这里到处充斥着醉酒、暴力和性。军队食堂的工人唐纳德·维宁(Donald Vining)看到了在宣传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美国兵并不像宣传的那样健康向上。1942年5月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士兵整夜醉醺醺地在街上游荡,为了能在食堂里吃一顿有蛋糕和可乐的饭破坏食堂的食物,更别提那些染上性病不得不住院的人。”

大批等待乘船出国的军事力量增加了当局的压力,战争的第二年,形势更加紧张了。爱国热情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抱怨和不满。1943年5月,矿工罢工。同月,联邦调查局(FBI)首次对逃兵进行了全国性的镇压,抓获了至少638个逃亡者。几个星期后,几百名军人在洛杉矶发动了战争中的第二场大暴动。

他们的目标是阻特装〔2〕青年、年轻的墨西哥裔流氓团伙和花衣少年(*pachiquitas*),他们的服装标志着他们是敌人。政府一开始以为这是美国兵对少数墨西哥花衣少年的骚扰,但是事情很快演变成了为期10天的暴动,成千上万的军人失去了控制。一位高级巡逻官员6月8日向他的上级报告时说:“从10人到

〔2〕阻特装(zoot-suit):40年代流行于爵士音乐迷等人中的上衣过膝、宽肩、裤腿肥大而裤口狭窄的服装。——译者注



在洛杉矶洛士普利特,警官把一个  
阻特装青年送进看守所

150 人不等的团伙一看到海岸巡逻队员出现就四散而逃。被巡逻队员抓获的人都拿着硬木棍、皮带、小刀还有轮胎撬杠。”

“这伙由几百名士兵、水手和平民组成的暴徒走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街道上,看到阻特装青年就打”,记者凯里·麦克威廉姆斯(Carey McWilliams)写道,“有轨电车被迫停下来,墨西哥人、菲律宾人还有黑人从位子上被拽下来,拖到街上,遭到疯狂残暴的殴打。洛杉矶的各大报纸都出现了占据半个版面的大幅照片:墨西哥男孩的衣服被脱掉,蜷缩在地上,血流不止,周围是嘲笑他的男女暴徒。”

和扎祖一样,阻特装青年也是因为衣着显得与众不同,但是他们并不是自己想与众不同的。作为新来的移民,这些年轻的墨西哥美国人用一种新的方式重现了一直存在的“第二代问题”。很多人的父母是 20 世纪 20 年代来到加利福尼亚南部的煤矿和农场工作的,但是大萧条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在洛杉矶的城区寻找新的安身处。他们被剥夺了很多工作机会,也无法使用大多数公共设施。于是年轻的墨西哥美国人在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开始在邻里之间组成少年流氓团伙。

他们游移在两种文化之间,一种来自他们的父母,认为“男孩子到 16 岁就应该承担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而另一种来自美国社会,努力延长青少年时代。据一位观察员说,被逼到边角的这些青年所反对的“不是其中一种,而是两种文化。他们既不理解也不想要任何一种。他们感觉迷失了方向,想要寻找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群体感。他们敌视已经建立的秩序,以动摇社会观念为乐,他们认为这

就是表达自己的方式。”

夸张的服饰是他们身份的标志。这种风格的源头和扎祖的服装一样，来源于30年代中期的黑人时尚。那时，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在波士顿的黑人区洛士百利买到了他的第一套阻特装，他马上开始寻找更多现成的衣服。它“风格粗犷：天蓝色的裤子在膝盖这里是30英寸，然后逐渐变窄，裤脚只有12英寸。长长的外套在腰部收紧，一直长至膝盖。”

和其他的街头时尚一样，阻特装的发源也充满了神秘色彩。它或许起源于1935年像萨瓦音乐厅这样的哈莱姆夜总会，后来由于1939年末上映的《飘》(*Gone with the Wind*)中克拉克·盖博所穿的褶皱夹克流行起来。媒体第一次提及这种服装是在40年代早期，一个叫克莱德·邓肯(Clyde Duncan)的年轻餐馆工定做了一套《男士服饰报道》上报道的“最新的款式，在南乔治亚被称为杀手乐队风格”的衣服。

和扎祖一样，“阻特”(zoot)这个词也来源于摇摆迷的俚语：新奥尔良方言中的“可爱”(cute)经过卡伯·卡洛维和史林·盖拉德受人喜爱的铿锵有力的节奏加工就成了阻特。就像1942年的歌里唱的：“我想要有褶皱的阻特装，我想要褶皱和绒袖口。看起来要够抢眼才能去约会。”那年初，现成的阻特装以“极品”的名义出售。他们主要的目标是爵士乐迷：松散的夹克和裤子正好适应了摇摆舞跳动的需要。

虽然1942年服装配给之后合法生产的阻特装大幅缩减，在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和洛杉矶，非法生产的服装仍然大受欢迎。1943年《纽约时报》报道高中生都涌到哈莱姆去买18美元到75美元不等的阻特装。那些买不起的就买特大号的套装再把它改小。阻特装也出现在了电影里，比如《暴风雪》(*Stormy Weather*)，卡伯·卡洛维在里面穿着淡黄色的阻特装。

墨西哥裔少年流氓一下子就爱上了这种风格。据1942年9月《新闻周刊》(*Newsweek*)的报道，他们穿着圆点花衬衫，黄紫色的怪裤子和夹克，还有“细条领带、大如银币的珍珠纽扣和紧得需要拉链的裤子。”正是此时，“沉寂环礁湖”的案子给所有墨西哥人打上杀人犯的标签。流氓少年和警察互相憎恶，警察反对他们上街游荡，也反对他们怪异的着装和轻浮的举止。

洛杉矶是个充满敌意的地方。除了要对付洛杉矶警察局，墨西哥流氓少年团伙也得应付地方媒体，因为这些媒体对他们的“午夜激战”特别感兴趣。20世纪

40年代早期洛杉矶至少有35个流氓少年团伙,他们都不是天使。一个成员回忆道:“我们都是孩子,希望别人需要我们,但是我们怎么都无法成功。我们在公共游泳池被公然歧视,更别说有什么属于我们的娱乐设施了。所以我们只能在街头闹事。”

这些团伙被卷入“沉寂环礁湖”的案子,因为受害者霍赛·迪亚兹在死前的晚上参与了一起斗殴。38街俱乐部的成员全部卷入其中,24人被捕:其中19人被控以同谋、杀人和斗殴罪。谋杀发生10天后,洛杉矶警察局对墨西哥美国青年的行为提出指控:“大约有600人参与,约有175人因持有刀、枪、铁链、匕首、短刀和其他可以在斗殴中使用的工具被捕。”

1943年1月宣布了最终判决,17名被告谋杀罪成立。毫无疑问,判决是不公平的。凯里·麦克威廉姆斯抗议道,审判更像是“为动私刑走个形式”。被告被警察归为低人一等的种族,墨西哥阿兹特克的“野猫”又回到了“印第安人”的“原始本性,尤其是他们如此无视生命的价值。”奇异的服装和种族特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内部敌人的图画。

虽然很多墨西哥美国人都已经在军队里服务了,他们还是被确定为内部敌人,并需要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办法以绘图的方式展现在连环漫画里。保守党人艾尔·凯普(Al Capp)创作的《莱尔·阿布纳》(*Li'l Abner*)每天阅读人数超过5千万。1943年春的一个月间,这些连环画描述了阻特装青年不久将接管美国的奇怪故事。5月的最后一期上,报纸大标题赫然写着:“讨厌阻特装的暴徒席卷阻特装商店。”

1943年6月3号,矛盾终于爆发了。警察认为这是性泛滥的结果,海军觉得这是对偷盗他们醉酒水手钱财的阻特青年报复的机会,而墨西哥美国人认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袭击。如比特里斯·格里菲斯(Beatrice Griffith)所写的:“水手们走出‘飞地〔3〕’,带着石头、棍、棒、皮带,手绢里也包着重物,还有警棍。他们走出来,上了车,开往阿尔卑斯村。一个海军官员之后说:‘我们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但是保卫装作没看见。大多数人认为现在是该干点什么的时候了’。”

第二天晚上,200名水手在城镇间乱逛,随意殴打阻特装青年。警察抓走受害者,暴力继续。媒体直到6号才介入,而报道的指导方针是如何定位和处理他

〔3〕 洛杉矶境内一个西班牙语区。——译者注

们的猎物：“抓住一个阻特青年。脱掉他的裤子和长外套，不仅要脱下来，还要烧掉。剃掉他们和这些怪异服装配套的‘阿根廷鸭尾巴头’。”受到这样的鼓励后，成千上万美国白人6月7号晚集结到洛杉矶市中心，向所有他们发现的阻特装青年发起了即时裁决。

这个群体中既有军人也有平民。7辆卡车的水手从拉斯维加斯赶来，出租车为这场“大规模私刑”提供免费交通工具。正常的法律规范和秩序都崩溃了。这些团伙追赶并残忍攻击阻特青年、黑人，还有墨西哥人。洛杉矶警察认为这是武警的事情，并没有试图出来控制这些暴徒。人们用军事术语描述这整个事件，称之为“闪电战”，或者“讨伐任务”。

对于军人、媒体还有平民来说，阻特青年是他们军事侵略的最好目标。〔4〕然而，骚乱反映了军队纪律的混乱。在另一个骚乱的夜晚之后，当局开始处理这个问题。政府宣布军人禁止进入洛杉矶市内，发动和参与暴动的人被捕。然而，一切并不公平，由于军人有当局的庇护，他们中只有20人被抓。

受害者被贬低为“为了邪恶目标聚集起来的孩子们”；他们喜欢大麻、“让人激动的麻醉药”；他们的穿着证明了他们“脑子不正常”。据一位心理学家说，“阻特青年不能参军可能是因为不够军龄，或者他属于4-F组，又或者他曾有犯罪纪录。”6月9日，洛杉矶委员会把阻特作为“流氓的标志”予以禁止。一个官员说：“我们明文禁止裸露，如果我们能因人们穿得太暴露把他们抓起来，那同样也能因为他们衣着过度把他们抓起来。”

之后，暴乱平息了。虽然他们没有公开承认这是一场暴乱，但是高级官员发布了加强纪律的特别指令。被击倒的阻特青年们舔舐着自己的伤口。有一次，几辆载着少年流氓的车插着美国国旗和白色投降旗驶过洛杉矶警察局总部，叫着“我们是美国好公民。”阻特青年并没有像精灵那样消失，在芝加哥、底特律、巴尔的摩和纽约，媒体报道把他们的服装与暴力相联系予以报道。由于他们的服装不

---

〔4〕 注意《洛杉矶时报》逐步升级的大标题：“阻特青年在与军人的交战中学习”（6月7日）；“暴乱给阻特战争敲响警钟”（6月8日）；“阻特迷们发现生活变得艰难”（6月8日）；“阻特战事中的城市、海军和钳子”（6月9日）；“法律要求盘问阻特青年；暴动后的和平统治”（6月10日）；“女式阻特装上的指节铜套”（6月10日）；“议员研究决定禁止奇装异服”（6月10日）；“阻特青年逃出圣地亚哥暴动”（6月10日）；“惩罚所有企图破坏阻特装战争的”（6月13日）

符合法律规定,他们还是受到了适当的处罚。

\* \* \*

洛杉矶骚乱的两个星期以后,一场更为严重的暴乱发生了。整整7天时间里,种族暴乱中相对抗的黑人和白人占据了底特律的街道,34名美国人死亡,国家名誉扫地。就像阿尔弗莱德·李(Alfred Lee)观察到的:“1943年6月21日星期一,在这块所谓的自由土地上,这一切发生在全球都在为罗斯福提出的四个自由而战的时候:枪击、殴打、掠夺、财产破坏、汽车焚烧、无辜者严重受伤、民众深感惊慌。受害者是一个被围困在城市中,未能得到合理保护的少数群体。”

“旅居者真理之家”骚乱已经使底特律受过一次侵扰。1943年,这座城市的人口在3年之内增长了三分之一。其中,6万人是黑人,还有40多万来自南方腹地的白人,他们觉得黑人“太盛气凌人”了。这些移民在战争区发生摩擦。他们的孩子增加了青少年犯罪率。由于工厂和军队都不接受这些孩子,他们自己组成团伙,反对他们的长辈:100名黑人和白人青年在一个城市操场上展开激战。

“自发的骚乱”发生在6月20号周日。两个敌对的女子团伙在底特律河畔的美丽小岛对峙之后,成千上万黑人和白人互相打斗,同时还攻击警察。他们谁也不让谁,整场暴乱没有一点爱国情绪。底特律市长观察到动乱中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纳粹和日本人。”几个星期后,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底特律做了演讲,他承认我们“不能摧毁国外纳粹的铁蹄,却在宽容国内的种族暴动。”

青年在暴力事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底特律,大量移民无法享受应有的公用设施:没有他们的学校,娱乐设施根本不存在。青年们只能自己寻找乐趣:他们感到无聊,这正好是法西斯组织对他们进行教化的好时机。一个地方报纸记者观察到孩子们是怎么“对酒吧和饭馆感到厌烦的。你随便哪天晚上去那些地方都会发现他们面无表情地围坐在那里。他们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他们甚至不说话……他们是不是希望体验什么刺激?”

参与暴动的青少年把这当成他们自己的战争。一个“19岁阿飞”炫耀地说他从工厂请了假,“以便赶上最激烈的时刻。天哪,多么壮观啊!我们把黑鬼从车里拖出来,使劲儿打他们,烧了那些狗娘养的车。我真高兴自己参与了!”4个16到20岁的白人青年枪击了一个正安安静静地等公交车的58岁黑人:他们谋杀他“只是为了好玩。”就如他们中的一个之后承认的:“我们不认识他。他也没打扰

我们。但是其他人都在战斗,在杀人,我们也喜欢这样。”

7月14日,总统谴责了最近的动荡:“我和你们一样,所有的美国人都应该受暴力事件的谴责,不管它是怎么引起的,受害者是谁。”夏天,憎恨还在延续。8月1日,在黑人士兵被白人警察杀害的谣言四散后,哈莱姆爆发了。自从6月萨瓦音乐厅关闭以来,紧张的形势就在酝酿之中。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那里是卖淫场所,但是警察讨厌它是因为那里是个混杂的犯罪场所。在6人死亡,几百人受伤之后,暴动很快被平息了。

媒体披露美国青年的行为像是法西斯暴徒,这引发了这个夏天其他的丑闻报道。一直潜在的“青少年犯罪”问题终于在1943年夏天爆发了。“每天都能在报纸上看到,”《观察》在“这些是我们的孩子吗”中指出,“5个男孩因偷车被抓;一个15岁的女孩因为30起性行为事件被起诉;在底特律,一个青年暴徒闯进夜总会、酒吧和电影院,砸坏了窗户和家具;一位父亲责备了他17岁的儿子,结果第二天人们在铁轨旁发现了这位父亲尸体的残肢。”

“战争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和心理力量”,画册杂志《契合》(Click)1943年春的文章中指出:“与1942年前9个月联邦调查局一位负责人J.埃德加·胡佛报道的全国青少年犯罪率相比,现在增长了21%。但是直到最近青少年犯罪才被看做严重的国内问题……父亲不停更换工作,母亲或者也出去工作,或者为维持被无法预计的工作时间完全打乱的正常家庭生活而发疯,孩子们只能在街上闲逛。”

1943年间,美国的青少年似乎都疯狂了。少年阿飞团伙使纽约城感到惊慌。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街道上,叫做“北部爵士”和“林奇丁克斯”的团伙在街上展开激战,并且破坏电影院和有轨电车。马萨诸塞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为了48美分杀人。中产阶级的孩子扰乱高中教学,蔑视老师,在食堂和露天电影院里大声喧哗。有一个极端的事例,一个13岁的男孩在竞选地方“独裁者”的时候企图炸毁铁轨。

\* \* \*

然而,真正震撼美国的还是女青年的放纵行为。1943年4月在纽约百乐门举行的一场哈里·詹姆斯的演出堪比战斗场面,十四五岁的观众演绎着她们自己的酒神部落仪式:“孩子们在座位上疯狂摇动,哈里·詹姆斯一朝她们‘飞吻’,她们就疯狂地朝前涌,离开自己的位子,推开维持秩序的引座员,在走廊上跳起舞

来。几个小时后,当成百上千的摩登少女离开的时候,她们把唇印留在走廊上用于保护乐队领队照片的玻璃上。”

在摇摆乐之后,美国的流行乐就改变了,但是群体行为则变得更为极端。潮流倒退回到了浪漫风格,这更适合更加保守的人表达感情。民歌很受女孩子们欢迎,因为这些歌曲表达了一种无望的期盼,这已经成为她们生命的一部分。哈里·詹姆斯的歌曲描述了每个有上兵男友的17岁女孩的典型状况:“明天他就要回到部队,留给你的是无尽阴霾,没有他的日子孤单无聊——等待、等待、等待他的归来。”

女性问题在美国社会生活中越发凸显,随着上班族母亲工作不认真的谣言四散,这个问题已经受到关注:更为年轻的女工也受到牵连。这不仅仅是因为哈里·詹姆斯演唱会上的骚乱问题,而是因为更加棘手的女青年“非经济性性行为犯罪”问题。1943年7月,国家战争事务联邦办公室负责人称“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全国性问题,而且随着战争的进行其紧迫程度一日胜过一日。”

对这些违法者的流行称谓是“胜利女孩”,“穿卡其布的怪女孩”。1943年国家娱乐联合会的宣传册《青年问题》(*Teen Trouble*)总结了她们的行动特征:“她们六七个人肩并着肩在街上走,遇到平民就分开,靠近士兵或水手时就挽起胳膊,把他围起来,挑逗他。随着她们的行进,这个队伍会越来越小,因为男女生一旦配成一对就离开这个群体了。这是十四五岁的女孩子们的幼稚却非常高效的‘得到你的男人’的计划。”

据历史学家理查德·林格曼(Richard Lingeman)说,有些“胜利女孩”只有13岁,她们“很容易辨认,穿着宽松的乔氏羊毛衫,头发束起来,穿着短袜和鞍脊鞋,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大一些妆化得很浓,口红也很艳。”很多人为了有机会接近军人去找了工作,比如酒吧招待或者服务员。在美国各个城市,她们锲而不舍,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由于她们都没有经验,性病成了个大问题:在东南部的海军区,估计有80%的性病是由于缺乏经验造成的。

“胜利女孩”以自己的方式回应战争形势。其中一个人解释道,她们搭识军人“是因为她们想重新找回被战争夺走的乐趣。”生活对于不满20岁入伍年龄的女性来说非常艰难:就如一个女孩抱怨的,“作为十六七岁的女孩,因为太年轻我们不能参军也不能去战时工厂工作。”没有地方可以玩,身边的同龄男性也越来越少,结果剩下的只是“挥之不去的挫败感。”

据战时评论员说,这些都是早熟的孩子:“女孩子在正常情况下对同龄男孩子表现出好感是合理的,但这些女孩似乎一夜之间就成熟了,以致成为不知害臊的追求者。”随着对这个问题的关注,1942年到1943年间女孩子中的犯罪数据也呈现出惊人的增长: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青年法庭受理的案件增长了27%。然而,整体数据并不能证实人们的恐慌:就全美青少年来看,参与性行为犯罪的只有1%到2%。

这些暴行多是由于童真的缺失引起的。“我面前的都是十七八岁的男孩,”一个“胜利女孩”告诉斯特兹·特克尔(Studs Terkel),“如果没有战争,我还会跟我那些十二三岁的同学呆在一起。战争着实毁了我。我得到的男人越多,自我就越满足。我完全没有归属感。”她承认战争偷走了她的青春:“1941年12月6日,我还在玩纸人玩偶:戴安娜·杜宾和索尼娅·海妮。还有一个秀兰·邓波儿的玩偶是我最喜欢的。珍珠港事件后,我再也没玩过。”

1943年4月,约瑟芬·坦克泽(Josephine Tencza)的案子凸显了这种“表象成熟”的痛苦。17岁的她被控逼迫12到15岁间的女孩“强制卖淫”。这个案子是由于学校老师对女孩们的开销表示怀疑才曝光的。麦凯斯·勒纳把坦克泽的实际年龄和叙事小说《17岁》以及《第十七个夏天》中的人物做了对比。“塔金顿笔下的威利·巴克斯特的含混不清的儿语和里文顿街上这个‘女士’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写道,“它饱含了美国一个阶段生活的苦楚和堕落。”

未成年女孩的性行为给青少年犯罪恐慌增加了新的猛料。7月,《画报》(Pic)杂志刊载了约瑟芬·坦克泽的故事,标题是“少年罪行”:“我们面临的最为棘手、最糟糕的社会问题之一。”第二个月,它又刊登了一篇关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文章“波士顿的道德问题”,其中描述了“胜利女孩”们的行为。从之前一年开始,杂志宣称,涉及未成年女孩的性犯罪增加了200%:“平均犯罪年龄是15岁,1942年逃跑的女孩达到48%,逃学率上升了400%。”

美国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迅速挖掘社会问题的利用价值,尤其是涉及性和青年的问题,好莱坞工作室很快制作了一堆低成本电影。雷电华(RKO)公司购买了《展望》(Look)上一个故事的版权,很快制作了电影《青年肆虐》(Youth Runs Wild),电影的宣传标语是“现代年轻人的真相!”摩根制作了两部耸人听闻的电影《这些是我们的父母吗?》(Are These Our Parents?)和《你们的孩子呢?》(Where Are Your Children?),一些假标题,如“增长的青少年犯罪给国家敲响警钟”和“寻求刺

激的青年陷国家于危机”扩大了后一部电影的影响。

成年人的种种行为推动了美国青年的错误做法。印第安纳波利斯报的一位通讯员认为“最大的问题是现在的孩子不是按照他们父母告诉他们的去做,而是他们告诉父母该做什么,父母就去做了。”另一个作家写道,他们“拿的钱太多,空余时间太多,获得的溺爱太多,而且也没人要求他们凡事靠自己。结果是很多时候我们的青年感觉日常生活让人厌烦。他们必须寻求刺激、速度和快感。”

美国青少年被社会利用,还要受谴责,因此他们感到委屈也很正常。他们并没有引起战争,但是他们却被当成美国所有社会问题的试纸。J.埃德加·胡佛警告说,“逐步蔓延的道德瓦解”将置美国于致命危险的境地。造成青少年犯罪爆发的原因有家庭生活的瓦解,有由于战争的暴力文化引发的精神紧张,还有所有青年媒体——连环画册、自动唱机、电影和“吸引赶时髦的人的布吉乌吉风格〔5〕。”

1943年间,青少年犯罪的数字飙升,有些城市增加了三分之一。这反映了越来越无法无天的社会现实,但同时也反映了越来越多的警察介入和媒体关注,不过这些干涉大多是摇摆在追求刺激和过分指责之间。的确,J.埃德加·胡佛介入之后,情况更加可疑了。胡佛觊觎青少年市场很久了,1939年《猩红的设计》中的预言显然已经成为现实,洛杉矶吸食大麻的团伙和布鲁克林弑师者的故事更是有力的证据。

联邦调查局1943年上半年的数据显示,虽然总体犯罪率只增长了1.5%,但是18岁以下的男女青年犯罪率增长了40%。儿童局对此提出异议。“因为缺少几年来全面可靠的数据,我们不能确定全国范围内青少年犯罪是增长了还是减少了,”一位发言人说,“报纸一直在说青少年犯罪在急剧增长,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数字并不能证明这一点。”

争论一直持续到1943年秋评论委员会(Pepper Committee)举行的“战争时期健康和教育见闻”讨论会上,会议的焦点是青少年犯罪问题。联邦调查局的议事日程目标非常明确:探明问题所在,如果问题不够严重就夸大事实,然后以更大的力量铲除它。儿童局试图了解其中的基本问题,和同行一起铲除青少年犯罪的根源。但是,虽然经过很多天的详细论证,委员会还是没有能够达成任何共识。

委员会唯一得出的结论是:“轰动性的报道不但不能挫败青少年犯罪,反而赞

---

〔5〕 一种以蓝调乐曲为基础的爵士乐钢琴演奏风格。——译者注

美和鼓励了这种行为。”如果那些令人激动的媒体故事使成年人警醒,那么他们同时也让青少年高兴,而且鼓励了模仿行为。1943年的谣言是战争时代情绪爆发的又一事例,这次涉及的是代表着美国未来的年轻人。美国青年的形象已经从理想化的脸色红润的中西部人变成了扰人的幽灵——“精神病患者。”

1944年早期出版的一本书用近300页的篇幅试图揭开这个谜。心理学家罗伯特·M·林德纳(Robert M. Lindner)写的《无敌的叛逆》(*Rebel Without a Cause*)〔6〕再现了对一个因严重暴力犯罪入狱的青年哈罗德长达45个小时的催眠精神分析过程。林德纳忠实记录下了这个青年说的话,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童年时受过心灵创伤、对性行为有心理障碍、暴力行为不断升级以至于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暴力事件。

林德纳把这种心理疾病患者定义为“无诱因的叛逆,没有口号的煽动者,无计划的革命者。”这种患者,“就像小孩子,他们想要得到的满足感一刻也不能耽误”;处于一种“身体进入成人阶段,但行为模式和习惯仍然是幼儿期行为的延续。”由于“满足阈限〔7〕”很低,他无法遵守“传统社会生活要求的基本条件,如循序渐进、持之以恒、以及调整自己的未来目标。”一旦挫败,他就会采取暴虐的、孩子式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攻击行为。

早熟是这个范例的部分原因:“就像小孩子的游戏模式,他在游戏刚开始时注意力非常集中,能发挥他的才智,但是很快他就不再坚持了。”这个年轻的犯人遗憾地谈到他和父亲之间冷淡的关系、对于同性恋的模糊感觉以及如何利用暴力来解决这些不足:“‘当我携带枪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比其他人更好。’他继续说,‘或许这就是我犯了那么多罪的原因——强奸、手淫。我不知道。我根本不在乎。’”

哈罗德体现了战争在美国所引发的冲动情绪。他对现实的关注和暴力倾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一位军队精神病医生发现很多出色的战士“都充满敌意,缺乏安全感,性情不稳定。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应被诊断为‘精神疾病患者’,他们享受战事中可以公然发泄敌对情绪的机会,而且如果他们有机会这样发泄,很可能最终也得进监狱。”

1943年的暴力事件改变了美国对青年的态度。美国兵暴露了自己邪恶的暴

〔6〕 林德纳的书是詹姆斯·迪安经典电影题目的来源,也为其电影剧本提供了素材。

〔7〕 阈限:指引起感觉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神经刺激。——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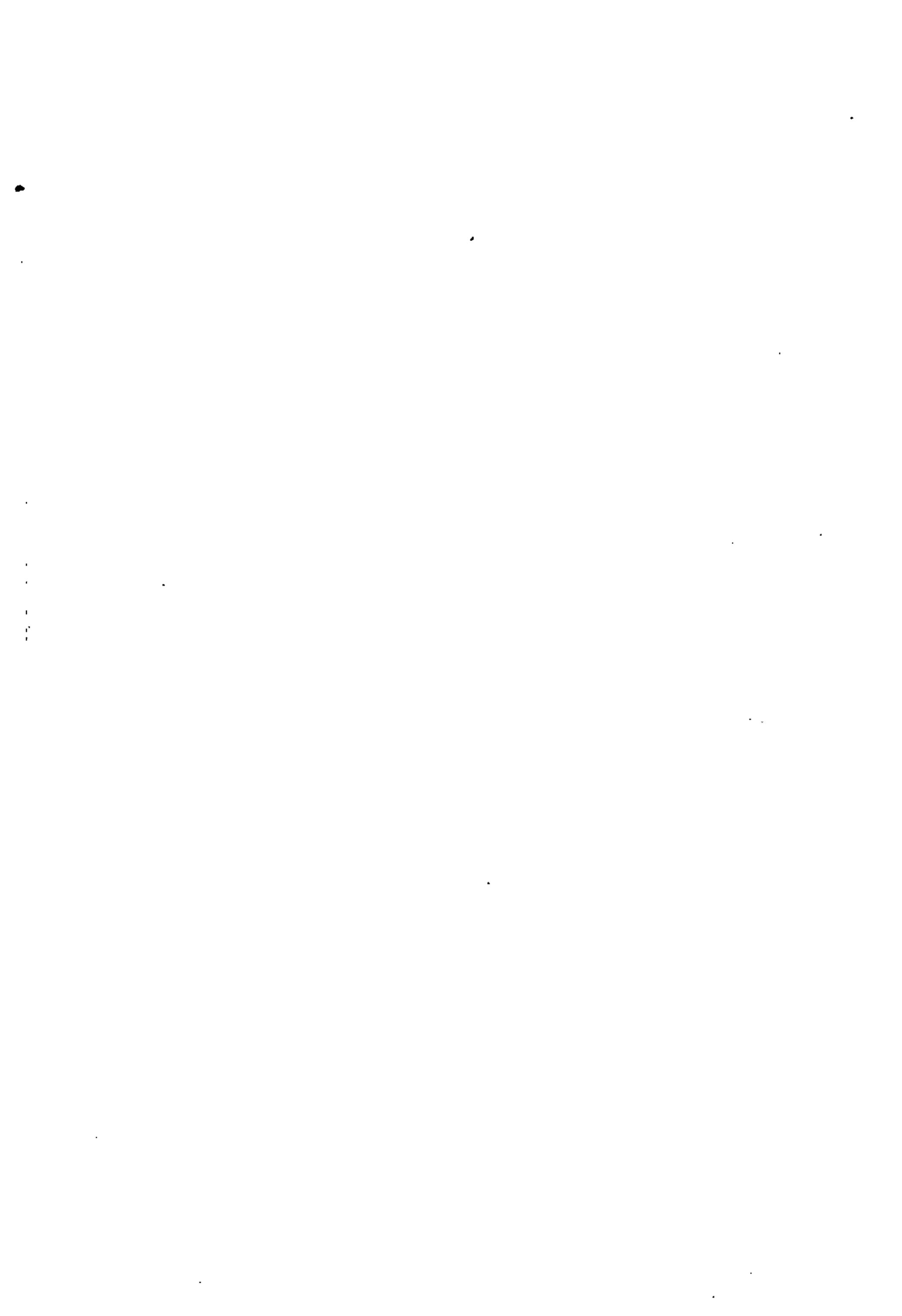
徒本质,美国青年有变成“萌芽中的风暴战士”的危险,而不是承担未来民主建设的人。这一年的丑闻使社会和政府开始关注青少年的权利,暂时被遗弃的新政理念又重新得到重视。为了阻止更多的怪胎产生,改革者、青年专家和商人都试图对青少年进行引导,希望青少年的独立思想如果不能为社会所用的话,至少也要以社会能接受的方式体现出来。



第七部分

---

1943—1945



27

## 和平入侵者

美国士兵和英国青年

虽然我还说不上电影让我对生活很不满意，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它的确让我对邻居和我所居住的城镇不满。因为我所看到的根本不是现代化的城镇，街角连个可以带女朋友吃冰淇淋和奶昔的商店都没有。我们的城镇没有摩天大楼，可以说连算得上高楼的都没有。而且楼房的数量连百老汇的一半都不及。

——“一个焊工的儿子”，英国电影杂志调查，1945



在萨福克郡跳舞的美国红十字会成员

1942年7月间，“大众观察”报道了一个特别的青年俱乐部，叫末路青年协会（Dead End Kids' Institute）。它位于英国西北部的工人阶级住宅区，而且有全职的住房管理员。每晚（星期天除外）7点到10点它面向14到20岁的青年男女开放。16岁以上门票费用是1先令〔1〕，年纪更小的是6便士。它不像其他志愿组织经营的俱乐部那样，而是拥有“全市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设施。

这座楼由当地慈善家捐资兴建，里面有一个舞台“设施完备”的礼堂，一个带淋浴间的体育馆，里面可以打台球和乒乓球，一个“有玻璃台面，椅子舒适”的餐厅，一个洗手间，还有一个图书馆。当然也有些小瑕疵，比如“没有衣帽间，还有淋浴高度不够，”但是总而言之，这种个人和大众需要兼顾的设施体现了“一个青年看门人的梦想”。只是这个计划周全的青年乌托邦遇到了始料未及的障碍。

英国青少年在一战中的疯狂表现还令人记忆犹新，这影响了20世纪40年代初英国的青少年政策。官方所偏爱的办法是建立“理想学校”，一个满足不同兴趣的青年俱乐部，“那儿的社会活动能把不同兴趣爱好的人联系起来。”但是，观察者发现在末路青年协会，“所有试图引起成员兴趣的文化活动——讲座、辩论和小组讨论都是徒劳。”

青少年们对娱乐提不起太大的兴趣，这并不奇怪：“吸引他们的主要是交际舞，而且成员们都很老练。15岁的女孩化妆成琴吉·罗杰斯的样子，男孩子们模仿贾克奈和鲁尼最酷的扮相。这些男孩子和《孤儿乐园》（Boys' Town）中的那些孩子非常相似，在这部电影中斯宾塞·屈塞（Spencer Tracy）扮演了创建‘孤儿乐园’的佛纳甘神父的角色。观察者们在这座漂亮的建筑中仔细搜寻骨瘦如柴的爱尔兰牧师的身影，但不幸的是他并不在那里。他本应该在那里。”

观察者发现了问题所在：这些年轻人，包括年龄最小的，都是工人。城市青年俱乐部的成员也是这样，不过这些年轻人做的都是最艰巨的工作，男孩子在机械

〔1〕 旧时英国货币单位，一镑的二十分之一，12便士为1先令。——译者注

加工车间工作,女孩在服装厂工作。因此,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给士兵缝袜子的工作吸引不了这些女孩,学习飞机构造也勾不起男孩的兴趣了。他们想要的是放松,不是精神上的兴奋而是身体的放松。跳康茄舞就是一种放松方式。

在青年问题上,是该采取家长式统治还是奉行行乐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有过激烈的争论。中产阶级的专家认为贫民窟的青少年应该得到“特别的调查、关心和照顾,”这些青年工人们则认为他们完全不必履行参与战争工作这类公民义务,也不愿参加文化活动,那样会让他们觉得是回到了学校。双方都认为青年应该获得更多关注和更多尊重,但是,他们的解决办法却大相径庭。

当时存在着两大思潮。第一种是左翼评论家和规划者推崇的包容和平等的社会民主理想。具体的实现形式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的“福利国家”计划。另一派是美国流行文化。它是一种消费者至上的民主思想,将会提供一整套新的自由制度,至少能够摆脱英国一成不变的等级制度。社会民主主义者对美国文化极度怀疑,这反而使它更能吸引热情澎湃的青年。

虽然末路青年协会的男女青年接受了经过精心设计的教育和“合作生存”的理想模式,他们却没有接受改革者们反唯物主义的乌托邦。他们想要的不是“永久的安宁感”,而是“片刻的欢愉”:刺激、发泄、还有即刻获得的快乐。由于参加了工作,他们已经越进了成年人的门槛。如果这意味着他们想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解读他们向往的自由,那一点也不奇怪。既然每个人都有民主权利,那么是不是要参与也该由自己决定。

\* \* \*

1942年夏天,英国青年都很有自决意识。根据“大众观察”的抽样调查,61%的人认为“应该让更多年轻人担任战争中一些最为重要的职位”,同时有71%的人认为现在指挥战争的人年龄太大了。“我们的政府里有些老年人,”一个“F20C”说,“其实我们可以让更多人来做这事。”丘吉尔甚至也遭到批评:“总之找个更年轻的人坐那个位子吧。”

全国政府成功地将预备役青年调动起来了。1943年“大众观察”重新开始关注青少年话题时发现,他们比1941年时“忙多了。”当年炸弹袭击处在高潮的时候,青年们狂暴易怒。但是“现在根本没有什么无聊的问题”了,他们都开始认真做夜工,母亲外出工作时,女青年负责家务和看孩子。但是这些模范青年对没完

没了的职责厌烦透了。

1943年的另一篇报道详细调查了14到16岁女孩的态度。一个14岁的波尔顿女孩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6点在百货商店工作,然后回家做家务。很多被调查的女孩都想要一个“可以跳舞的混合俱乐部。”“现在我工作了”,一个14岁女孩抱怨,“晚上我想要找点乐子,而不是去上学。”报道总结说,“年轻女工并不介意做兼职或学点东西,但是她们也想和年龄稍长些的男孩跳舞,也想化妆,不愿意受到过多的监管和约束。”

1943年夏,约有三分之一的英国青少年把他们的辛苦钱花在“娱乐”上。四分之一的人花在衣服和香烟上——这个问题在1941年并不突出。电影、舞曲、热门杂志这些都是来自美国的有趣玩意,英国青年像欧洲被占区的扎祖一族和汉堡摇摆乐青年一样对这些东西几乎着迷。每周电影院可以接纳3千万人,它成了最受欢迎的地方,也是逃避其他地方的最直接的方式。

好莱坞对青年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珀尔·杰夫科特从她遇到的一个卡门·米兰达(Carmen Miranda)的影迷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在1941年9月20日的《影迷》杂志上,她进一步受到了偶像的鼓舞,这个孩子想的都是这些:‘露脐装,漩涡裙……火辣吗……中间镂空的外套……米兰达有趣吗?迷人吗?傲慢吗?讨厌吗?答案全在个人的品味。’”这个14岁的女孩觉得卡门“很漂亮”,希望自己哪怕能有一点像她。

杰夫科特认为这些青少年“对于娱乐和生活的想法都来自于电影公司确定的标准。总的来说,这个标准鼓励暴力、粗野、感伤和错误的心理。维罗妮卡·莱克(Veronica Lake)和拉娜·透纳(Lana Turner)对14岁女孩的影响远不止改变了她们的发型。”电影和跳舞意味着“在这个年龄本应该避免的性本能被过分地激发出来了。”

美国文化的涓涓细流不断涌入英国,这验证了30年代左派分子的担心。整个40年代英国知识分子阶层掀起了一场反对美国的风潮。“苏联政府对电影放映的规范很值得一提,”杰夫科特观察到,“它不允许16岁以下的孩子观看电影和剧院晚上的演出,但是它试图为孩子们专门设计电影院和剧院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低俗的“美国佬杂志”被引进到英国,并在工人阶层迅速流行,这使左派分子对美国文化产生了片面的看法。他们发现美国的暴力穿越大西洋而来是件很烦

人的事。他们把厌恶之情集中在一部英国作家詹姆斯·哈德利·杰兹(James Hadley Chase)写的畅销书《布兰迪斯小姐的兰花》(*No Orchids for Miss Blandish*)上。杰夫科特认为这本书“是最暴虐、最粗俗的美国故事,每10页就有一起强奸或谋杀事件,对于没有文学评价标准的女孩子来说,读到它是件很不幸的事。”

哈德利·杰兹的书也遭到了乔治·奥威尔的批评,他不喜欢美国。1942年初,他发现“直到1930年几乎所有的‘文明人’都不喜欢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把英国和欧洲的文化粗俗化了。”然而,“年轻的知识分子并不讨厌美国。他们认为美国更富有,也比英国实力雄厚。当然,正是这种态度激起了普通中产阶级爱国者的嫉妒情绪。”

另一方面,他觉得“英国的工人阶层在现实生活中与美国人交往时总是不喜欢他们,但是他们并没有固有的文化敌意。在大城镇,通过电影院这个媒介,他们的说话方式越来越美国化了。”然而,他不可否认美国的影响其实更加深入,殖民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了:“相当数量的英国人在说话方式方面已经美国化,而且,还有一点必须要说的是,他们的道德观也是如此。”

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1776年革命以及使用同种语言这个事实的影响。“他们认为美国人是自负、无礼、拜金的代名词”,奥威尔写道,“而且有谋划继承大英帝国的嫌疑。”另一方面,著名广播通讯员爱德华·莫罗(Ed Murrow)承认,战争之前,他认为英国“只是欧洲海岸上不甚重要的一个小岛……像个老古董。”

美国的参战使英国颇为感激。“大众观察”1943年早期指出“战争早期普遍认为美国应该帮助我们的感觉”已经变成了深深的感激。一个通讯员说,“今天星条旗象征着我们的兄弟国”。另一个则认为“美国人热情、真诚、高尚。”英国人期待着“与美国建立比其他欧洲国家更亲密的关系”:“如果法国人可以看成是碰巧认识的熟人的话,那美国人就可以看成是亲戚。”

美国兵的到来对英国来说是个转折点。新加坡、仰光和托布鲁克刚刚沦陷,但是,正当轴心国看似不会东山再起时,风水轮转了。1942年,随着一等兵米尔本·H.汉克(Milburn H. Henke)的到来,和平侵略开始了。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年轻帅小伙收到的青睐者寄来的邮件有一麻袋那么多。把美国兵送到英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一个新的希望:他们在那里做好和纳粹作战的准备。

由于动员和训练都需要时间,以及不可避免的后勤问题,150万军队全数到

达需要花两年时间：这支军队的人数占到了英国人口的3%。英国人适应这种巨大变化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总而言之，他们对美国军人的接待还是积极的。在两年半的战争之后，美国军人给这个萎靡不振的民族带来了新鲜的空气，让他们了解了外面的世界，为他们注入了新的能量——未来似乎触手可及。

美国军务部颁发的手册〔2〕已经事先提醒美国兵他们可能遇到的困难。最主要的障碍是语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可能也听不懂你说的话。”就像一个英国记者写的：“当美国士兵登陆英国的时候，我们误以为他们也说英语，跟我们是一样的。美国士兵也是这么想的，他们希望离家之后还能找到家的感觉，但是他们发现，他们还是到了外国。”

外来者和本地人经常在公共场所相遇：酒馆、电影院、舞厅、俱乐部还有火车站。这一群群年轻人都燃烧着战争的怒火，冲突自然是难免的。大部分冲突都是因为英国人不喜欢美国人喜欢吹嘘炫耀的性格。然而，也有很多成功交往的例子。首先被美国兵拉拢的是小孩，他们是通过交换口香糖、巧克力、香烟和陆军消费合作社食堂拿来的剩菜建立起友好关系的。

美国流行乐的冲击最大。苏塞克斯郡的一个14岁女孩认为“英国真是无聊，老土；美国佬给我们香烟和口香糖，还有迷人的音乐，我喜欢跳吉特巴，我还赢了场比赛呢。我们穿着短百褶裙，跳舞的时候它就飘起来了，在我们的膝盖处翩翩跃动。可以和美国佬跳舞，年轻人谁还愿意听那些感伤乐曲呢？”

\* \* \*

1943年12月，《画报》展示了“丰富多彩的”摇摆风，上面有很多行话，例如“忠实的摇摆迷”被称为“热情小野猫”，这期杂志还介绍了这种风格的发展历史。文章指出，“达到高潮靠的不是技巧，而是激情，这是无论多优秀的白人舞者也无法达到的，因为他们看不起摇摆舞这个如此具有种族色彩的词。”文章也指出，表演“苏瑞Q舞、派金舞、摇摆舞、骑士舞和捷格舞”其实也没有什么坏处，文中的照片对舞步进行了说明。

由于美国兵的到来，原本只有少数人喜爱的吉特巴舞让英国青年痴迷。它极具个人特色，自由灵活的空中飞舞动作和当时流行的“聚会舞蹈”以及缓慢的狐

---

〔2〕 叫做《1942年驻英美国军人指导》。

步舞形成鲜明对比。总而言之,这种舞蹈很有趣,就像一个利物浦女孩回忆的:“一旦你学会怎么跳吉特巴舞,唯一的感受就是太棒了!他们把你抛起来,高过肩膀,或者从胯下扔过去,太棒了,真好玩!”

一位皇家空军军人回忆起在飞机仓库里举行的一场音乐会:“身穿制服的男女青年们随着乐队和歌手的节奏或轻轻摇晃,或激情摇摆。歌手的脸几乎被巨大的话筒挡住,他/她歌唱的不是战争,而是爱情。舞蹈在继续,我们所关注的只是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令人激动的节奏,当然还有我们怀中的女孩。她们可能是军队的厨师,或者是空军接待处的勤务兵,但是音乐的魔力把她们变成了艾丽丝·费伊(Alice Faye)、贝蒂·格拉布尔(Betty Grable)、丽塔·海华斯(Rita Hayworth)。”

1944年,格伦·米尔斯(Glenn Miller)少校带着他的美国空军管弦乐队在英国巡演71场,听众约25万人。乐队还通过广播把他们的音乐传递给了成千上万人。一个12岁的女孩混进当地的演出场地:“我一定要听到他的演奏。因此我站在门外,盛装打扮,等着一个比我大的女孩的男朋友把她送进去之后再出来护送我进去。当然,我妈妈一直都不知道……现在每当我听到《派非迪亚》(*Perfidia*)这首歌,我都会想起那天晚上。真是太精彩了!”

虽然摇摆乐热潮席卷全国,美国文化最为集中的地方还是伦敦。格伦·米尔斯在首都的沙夫茨伯里大街和皮卡迪里广场交界处的彩虹角俱乐部(Rainbow Corner)连演4天。哈默史密斯宫成了美国兵最爱的地方,那里每天进行吉特巴舞和摇摆舞比赛。一个官员回忆:“每个月有两天可以乘特别列车到伦敦休假,这让人期待,它给了被压抑的人社交机会和动力——这么说一点不过分,能够让健康的年轻人释放用不完的能量。”

如果说伦敦是美国人的据点的话,那么彩虹角就是其总部。这个美国兵的机构1942年11月成立于伦敦市中心,它象征着美国在英国的影响力,象征着美国向一个“时间过得很慢”的国家不断渗透的步伐。它每天24小时营业,提供娱乐、急救和包括伦敦观光在内的其他项目。在门厅里,美国兵的旗杆上有3个标志性的箭头:一个指向几米外的莱斯特广场,另一个指向600英里外的柏林,第三个指向3271英里之外的纽约。

彩虹角旨在复制美国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形式——街角杂货铺。在娱乐室里,美国兵可以打撞球、玩弹子机、或者听存满了最新乐曲的自动点唱机。2个饭厅

可以容纳 2000 人。底层的点心屋在英国人经营的店晚上 9 点钟关门以后还继续营业,而且提供奶蛋饼、汉堡、炸面包圈、咖啡和无限量的可乐。这个俱乐部在当地青年间极受欢迎,以至于当局不得不阻止成群的女孩子出门。

对年轻的英国女人来说,美国兵简直无法抗拒。一个 17 岁的伦敦女孩回忆说:“这些漂亮的男人走进来。他们的制服也很漂亮,使得他们看起来就像军官。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起来像电影明星。美国有巨大的魔力。我们这种感觉和电影有关——我们以前一个星期要看 3 场电影。我们的生活很无聊,而电影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干净明亮,那儿有尖桩篱栅、漂亮的白房子,还有贝蒂·格拉布尔这样的影星,而且他们的衣服也都很好看。”

美国象征着无限的自由和广阔的空间。一个叫奥杰塔·乐思(Odette Leslie)的伦敦女孩发现“有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广阔世界。我所知道的不过是我生长的北部伦敦那一小块地方,当地的街道、我的邻居和当地的舞厅。但是我听到了一些奇幻的故事,它们大大开阔了我的眼界,让我感觉有一天可以去那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作为女孩的独立感。这真是振奋人心,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虽然美国兵在追求英国女孩时“有些盛气凌人,觉得英国女孩都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就像一个红十字协会的工作者回忆的:“他们给我们黑暗阴郁的小岛带来了色彩、浪漫、温暖和极大的热情。”这些美国兵更有钱,也更健康,给年轻的英国兵以很大的竞争压力。一个英国士兵很不情愿地承认,美国兵“比我们更高大,更帅气。作战兵团里很多人都是把头发剪得短短的白肤金发巨人。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们比起一般英国军人来高出一等。”

然而,最终的结果不可避免,而受打击最大的是 19 到 23 岁的女孩。战争期间,三分之一的新生儿是私生子。驻欧洲期间 80% 的美国军队士兵性生活十分活跃,而美国兵的到来对这个数字有很大影响。很多 20 多岁的女孩儿怀孕了,却没有结婚的希望,有五分之一以流产告终。然而,那些在没有婚姻保障的情况下决定把孩子生下来的女孩没有战前那样被人瞧不起,她们没有受到谴责,而是获得了最低育儿保障和做母亲的权利。

就如他们吸引女孩一样,美国兵也勾起了一些人的犯罪欲望。美国军队带来了大批紧缺的配给商品,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就像个钱袋。就像一位经理告诉斯特兹·特克尔的:“每个月我在啤酒销售上可以赚 4 万美元,从陆军消费合作社提

供的商品上可以赚 12.5 万美元,而且仅仅只是香烟和糖果。”那些想利用过剩配给物的人很有油水可捞,他们每周通过卖巧克力、香烟、尼龙或者汽油,可以得到几千美元的收入。这使得本已繁荣的地方黑市更加兴旺。

由于缺乏警察的监管,伦敦的犯罪数据直线上升:1944 年的数据比 1938 年增长了 50%。约翰·韦恩这样描述战时的伦敦,“每个人都抓住时机,每个人都出去找乐子了。很多人悄悄地想置身于战争之外,结果没有身份证明,也没有固定住所,这种情况对于他们来说正合心意。逃避责任的人,厌倦了自己的生活决定悄悄消失的人,或者干脆就是罪犯,他们都没有什么差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身之处,谁也不会盘问他们。”

苏豪(Soho)是这 2000 多难民聚集的地点:这是由作家、艺术家、酒鬼、音乐家、妓女、吸毒者、还有像韦恩小说《打死父亲》(*Strike the Father Dead*)里的主人公一样逃跑的青少年组成的“临时单向流动人口”。支撑这个流浪群体的是犯罪,因为几乎没有人有合法的谋生手段。由于有成千上万心甘情愿的消费者,一种新的联络人出现了:“这种人很容易辨认,可以像靠近妓女那样靠近他们,你可以尽管放心,任何违法要求他们都不会拒绝。”

这种人就是“混混”(spiv)。这个用于窃贼行话的词出自何处,已经无人知道了。他们的风格并不神秘,鸭屁股发型、克拉克·盖博式的胡子、时髦的软毡帽、悬垂型夹克衫,还有一条像“猛然伸出的大舌头”一样的恶俗领带——这些都代表了对严酷战争的有意蔑视。随着这些美国风格的服饰开始影响 30 年代小太保的华丽装束,“混混”代表了新世界的价值取向。他们与禁忌活动和异国风情紧密联系,加速了即时行乐思想的传播,而这正是英国政府想要阻止的。

“混混”们的服装和他们在《喧嚣》(*Hellzapoppin'*)这类电影里看到的阻特装青年以及伦敦市中心的黑人美国兵的服装几乎一样。但是服饰特征也凸显了美国占领带来的一个很棘手的社会问题。“在英国很多城镇黑人军队已经成了一道熟悉的风景,”《画报》1941 年 10 月指出,“他们很自然地融入了我们色彩暗淡的背景。”然而,在正面的宣传藻饰背后,事实并非如此:偏见和种族暴力行为达到了英国从未有过的水平。

黑人军队仍然是军队中被严重隔离的一个部分,他们无权参与战斗,只能做苦力、运输员,还有厨房的工作。美国的军队政策是要使两个种族完全隔离。然而,潜在的麻烦一直存在。性往往是问题的燃点,很多当地女性发觉“和有色人种

的男性发生关系让人销魂。”曼彻斯特的骚动非常严重，康沃尔、布里斯托、纽伯里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个酒吧外面出现了枪战，结果两个黑人美国兵被打死。

英国人的态度各不相同。由于长时期的殖民历史，很多人持有马尔博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偏见，认为在黑人基地附近“天黑之后还出门，在路上或者乡间小道上行走很不明智也很危险。”然而，也有很多人觉得黑人美国兵品行端正，而且不像他们的白人同伴那么爱炫耀。还有人提出了更有勇气的主张，他们认为在新的民主理想下，黑人应该受到公平的待遇。1943年“大众观察”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英国人“极端反对种族歧视。”

种族隔离受到批评。一个布里斯托女孩回忆起当黑人美国兵到他爸爸开的酒吧来的时候，白人美国兵不许他们招待他。她父亲很生气，他“告诉这些有色士兵欢迎他们留下来，但是他们喝了酒马上离开了。我追出去告诉他们不必这样。他们告诉我，他们离开是因为我父亲对他们真的很好，但是如果他们留下来，接下来酒吧就可能被砸坏。他们离开时留下一句话，‘在美国情况也是这样，不过战争结束后就会不一样了。’”

英美两国都曾向他们国家的青年承诺，自由是对他们在战争中所做努力的回报。但是对于美国军队当局来说，他们面临一个问题，他们无法兑现这样的承诺。在英国，1944年《教育法案》这样的新社会民主立法算是履行了约定，落实了《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提出的规定，学校中等教育的免费年龄上调至15岁，通过初中入学考试，特别优秀的学生有进入语法学校学习的机会。

同时，美国兵的到来加速了美国理想的传播。美国的消费品第一次在英国自由流通，在丑恶的战争中极大地提升了士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临近1944年，而且像是永远不会停止。在所有的进口商品中，舞曲在英国青年中传播范围最广，最受欢迎，它真正代表了自由的声音，它具有不可抵挡的魅力，以至于一些曾经充满敌意的社会改革者和青年工人也开始关心美国模式。

战争晚期，《画报》登了一篇关于彩虹角的文章：“年轻人俱乐部的完美例证。”这个美国人的娱乐场所让英国在战争期间为迎合青年所作的大部分努力都白费了：“美国人来了，为他们的人民创造了很好的娱乐中心。战后他们会怎么样呢？”回答很简单：彩虹角应该成为满足“和平时代英国青年”需要的典范。

之后，在对英国青少年的心理战中，美国赢了。在美国“用户至上”的梦幻世界面前，英国的社会决策者几乎无能为力。对很多英国青年来说，讨论和演讲就

是他们的学校,教会了他们很多东西。战争经历加速了他们的成长,在尝试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兵带来的乐趣之后,他们想得到更多。1945年,英国青年已经不是部分,而是完全“美国化”了。就像一个18岁女孩给电影杂志写的信里说的:“我用美国口音跟自己说话,思维方式也是美国式的。”

## 赫尔姆斯·休博内、白玫瑰组织和安妮·弗兰克

纳粹欧洲的抵抗运动

德国人正处在骚动中。我们还要继续把我们军队的命运托付给一个浅薄者吗？我们想让剩下的德国青年为了一个政党集团的卑鄙野心牺牲吗？不，决不！是时候该算算账了——德国青年该好好和一直以来压迫人民的可恶暴君算算账了。

——白玫瑰，《抵抗运动中的战斗伙伴们！》1943年2月



汉斯·绍尔, 索菲·绍尔和克里斯托福·普罗普斯特

1942年10月2日,布尔米奇大街上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排起了长队,他们在等待创作了《我无处不在》的著名作家吕西安·勒巴泰的自传发行。由于作者声名在外,《碎石》(*Les décombres*)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吕西安是个狂热的通敌分子:他的哲学是“憎恨至死”。当年早些时候的采访中,他表达了“在德国看到第一批戴着黄星标记的犹太人时的喜悦。在我们的巴黎看到这个黄星会更让人愉快。因为3年之前那个可恶的民族曾把我们踩在脚底下。”

躲在阿姆斯特丹一间阁楼里的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一周后指出“很多犹太朋友和熟人被成批带走。盖世太保对他们很粗鲁,用运牛的卡车把他们运到威斯特伯克,送进德伦斯集中营。他们想把所有犹太人都送到那里。密普(*Miep*)告诉我们有人试图逃走。威斯特伯克的生活肯定很糟糕。人们几乎没有东西吃,更没有水喝,因为每天只有一个钟头供水,而且几千个人共用一个盥洗室和水槽。”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男女都睡在同一间屋子里,”她继续说,“妇女和孩子的头发都被剃光。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很多人一看就是犹太人,他们被剃光的头就是标志。荷兰的情况都这么糟,更何况那些被德国人送到偏远落后地区的人呢?我们猜大多数人都被谋杀了。英国广播说他们是被毒气毒死的,可能这是最快的死法了。我觉得很可怕。”

1942年的夏天迎来了第三帝国的顶峰时刻。到了秋天,第三帝国的潮水开始慢慢退去。10月,在北非沙漠阿拉曼地区,德国军队败在英国人手上,遭遇了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失败。在对俄战争中,冯·保卢斯(*von Paulus*)将军的军队被困在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德国主要城市受到越来越频繁有力的爆炸袭击。然而,怀着“不是胜利就是毁灭”哲学的纳粹并不打算放弃他们的控制权。欧洲纳粹占领区的大部分居民生活痛苦不堪。

1942年1月万塞会议上通过了“最后决议”之后,全面消灭犹太人的战役加快了步伐。在这些被遣送到异乡的人中,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将面临的是什么。一

到那里他们就被分到左边或者右边。左边的表示立即消灭,右面的则意味着义务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分开了。他们的命运毋庸置疑:“我们没有权利”,一个15岁的波兰犹太男孩杰克·曼德尔伯姆(Jack Mandelbaum)回忆道,“我们唯一的权利就是死。”

被关进监狱的都穿上带编号的条纹制服。他们不再有名字,只有一个编号。他们完全失去了人格。他们经常遭到殴打,而且非常残忍:“他们想吓住我们,这样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会做什么了。这种方法果然奏效。从那时起,我一直很害怕。”波兰德国边境上的曼德尔伯姆集中营的情况很恶劣:只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设施,几乎没有食物,艰苦的体力劳动超出常人的耐受力,而且完不成工作就意味着死亡。

被占区的青年无人幸免于难。1942年10月,希姆莱发布“强化青年责任”的公告后,1939年的青年服务秩序进一步加强:劳动力缺乏的形势越发严峻,当局强迫所有人参加军队服务的举措也加大了力度。很多在新一轮扫荡中被抓来的青年被送到了征兵训练营。这里由党卫军控制,16到18岁的男孩要在这里接受为期21天的集中训练。这些训练营都藏在很偏僻的地方,就像是大批生产充满仇恨的机器人的流水线。

一个科隆的受训者给他的指挥官回信时说:“这三个星期里我们所有人都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如果让我在晚上看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我非把你们打得屁滚尿流,这样你们才不敢再虐待热爱和平的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你们这些党卫军的下三滥平等对决。到那时党卫军的首领都别想活着离开。你们都待在东部前线的话可能还会好点。但是通常情况下,大群的猪啊狗啊只会躲在后方闲逛,奴役人民。”

这封信是匿名寄出的,这说明反对的声音还很微弱。大部分科隆受训者表达了他们的赞誉,他们认为自己从“软弱和空想”中被解救出来,变得“更加坚强、更加自信、更加勇敢”。纳粹是教化的专家:训练营里的士气比一般平民要高。这些纳粹“死亡艺术家”推行极权统治,反对者发现消极避让才是最安全的选择。

希姆莱的最新青年指示公告发布后一个星期,一个年轻人在汉堡波洛成斯监狱被斩首。过程持续了20秒钟。这个青年只有17岁半,还很小,但是由于他的过错严重被判以死刑。惩罚他的方式之一是不告诉他行刑的日期和时间:10月27日下午1点他才知道当晚他要上断头台了。在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封信中,



鲁迪·沃博、赫尔姆斯·休博内  
和卡尔·亨兹·史尼布,1941年

他写道：“我感谢上帝，这痛苦的生活今晚就要结束了。我再也无法继续忍受了！”

赫尔姆斯·休博内(Helmuth Hübener)和他的小叛乱团伙的故事说明了在第三帝国内部公然抵抗的极度危险，同时也展示了那些反抗者的勇气。第三帝国统治的12年间有80万市民因为抵抗被送进监狱，其中很多人是试图继续持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然而，由于不同政见者的行动高度保密，相关文件被破坏，有关人员已经死亡，他们的活动外人知之甚少。

事实上大部分德国人支持他们的政权，这使得反对者的行动更为艰难，那些除了纳粹规则外一无所知的青少年更不可能有任何抵抗行为。大部分的抵抗小组都是成年人成立的，如策划1944年7月密谋的史陶芬伯格(Stauffenberg)组织。不过，也还有一些青年的抵抗集团：1942年间，火绒草海盗和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在多塞尔多夫、斯德丁、多特蒙德等地方散发了50多份宣传单。在这些组织中，赫尔姆斯·休博内的团队和白玫瑰组织比较广为人知，原因是存活下来的成员和他们的亲戚提供了证言。

在《当真相是背叛》(*When Truth Was Treason*)这本书中，卡尔·亨兹·史尼布(Karl-Heinz Schnibbe)回忆他和他的朋友鲁迪·沃博(Rudi Wobbe)和赫尔姆斯·

休博内在战争开始时都只有十四五岁。他们很讨厌纳粹：“我再也不喜欢它了。那种压力和威胁一点也不吸引我。”他对纳粹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也感到失望。他父亲早就认清了纳粹是穷凶极恶之徒，而且一直在为基督教“竞争宗教地位”。得到父亲支持的史尼布打了他的希特勒青年团领导，完全和这个组织断了联系。

这三个孩子在当地的摩门教教堂相遇的时候，史尼布在一间印刷公司当学徒，休博内是一个白领实习生。因为不愿意和纳粹党派的继父一起生活而跟随祖父长大的休博内是“一伙人中最聪明的”，他是个自学成才的工人阶级孩子，顽强、安静、坚韧，有着坚定的基督教信念。和他的朋友们一样，他已经被希特勒青年团的野蛮强制行为和当局对待犹太人的方式激怒了。

战争的第三年，休博内决定采取行动。当时他在地方政府工作，有机会接触很多机密文件。“他读了很多关于对外、对内政策以及经济形势的书”，史尼布回忆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政府本来就觉得我们不该知道。”休博内确信德国不会赢得战争。“只要想想”，他对他的伙伴们说，“要想战胜英国和法国，战略上就不可能！根本胜不了。德国被隔绝了，没有原材料，一切都会土崩瓦解。”

休博内决定推动德国瓦解的进程。他的哥哥从被占的法国带回能收到 BBC 广播的收音机后，他开始比较纳粹和同盟国的宣传，很快发现纳粹的报道充满谎言。对史尼布和他年轻的朋友们来说，真相让他们震惊：“德国人被骗了。任何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还没有瞎的人经历过这样一个辉煌的时期之后，都应该注意到。‘同志们，我们在把自己推向死亡。’”

这个小团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沉溺于收听 BBC 的行为是违法的。然而，据史尼布说：“我们认为自己在干坏事或者在犯罪的焦虑感逐渐减退了。相反，这着实让人激动。”1941 年夏天，休博内制作了小传单，印在有纳粹党党徽卐字标志的红纸上，还有标语“打倒希特勒”和“希特勒是杀手”，以及对东部战争的简要报道。这些传单的数量并不多，他们把传单放在电话亭里，上面写着“这是一封连环信，把它传递下去。”

被苏德战争的残酷激怒的休博内让他的朋友们把传单发到电话亭、信箱和公寓的台阶上。史尼布发愁说：“这些小传单在我的手里就像块烫手的铁。我对赫尔姆斯说，‘如果他们抓住我们，我们就有大麻烦了。’每天都能在报纸上读到因为密谋叛国而被抓进监狱或者被判死刑的事。我试图对赫尔姆斯说看看是否还有别的方式，但是他非常坚持自己的信念，完全听不进任何异议。”

从夏天到了秋天,传单变得更长、更大,也越来越频繁了:从一个月一次到一星期两次。传单提供大部分德国人得不到的时事信息,如鲁道夫·赫斯的逃跑,并且以惊人的详尽战略和经济报道对抗德国的宣传。休博内慢慢转向更加直接、更具煽动性的控诉方式。“你能忍受生活中的快乐被夺去吗,”他写道,“你能忍受孩子在他们最好的年华里遭受欺骗吗?你愿意忍受这些吗?”

休博内直面那些被征服的同龄人的问题,他坚持认为希特勒青年团是“一个征收纳粹奴役的强制性机构。希特勒和他的同谋知道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剥夺你的自由,为的是把你改造成只知顺从,没有骨气的家伙。因为希特勒知道他同时代的人都开始看穿他了,知道他是自由的镇压者,百万人的谋杀犯。因此,我们在召唤你:不要让你最为宝贵的东西——你的自由意志被夺走。”

这个青年团体躲避空袭聚集在一间小咖啡馆里计划下一步的行动,对于他们散发的煽动性传单不再那么恐惧和焦虑。虽然仍然确信“可能有人从旁边的房子出来把我抓住”,史尼布却变得“更大胆,我甚至抓紧在衣帽间里的机会把一些传单塞到那里的外套口袋里。那些有政党功能的衣服很容易辨认,因为它们上面有金鸡标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一点也不害怕了,虽然我们的确像是在拿自己的性命赌博。”

虽然这个团伙得特别小心“我们说了什么,是对谁说的”,但是能够拿到他们传单的人太少了。他们需要额外的帮助,而这导致了他们的失败。1942年2月初,休博内让他的同事把传单翻译成法语以便在汉堡的战犯中分发。译者向监工告密,监工之后又告诉了盖世太保。休博内第二天被抓了,还查到了他最后的传单复印本,上面有一篇“谁在煽动谁?”的文章。盖世太保完全蒙在鼓里:如果不是休博内的草率,他是不会被发现的。

5天后,史尼布和沃博也被逮捕,这3个人进入了纳粹“绝对推断有罪”的罪犯审判体系。他们3个被分开,遭受了难以承受的严刑拷打。“如果你不是在盖世太保总部接受询问,就是在监狱里忍受折磨。他们只会让你选其中之一,决不会让我们安宁一会。”然而,这个小团体并没有解散:休博内把所有的罪揽在自己身上,使他的朋友受到的惩罚减到最低:史尼布和沃博分别被判了5年和10年监禁。

盖世太保不敢相信一个仅仅17岁的男孩能为整个传单事件负责。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其他同谋者,于是把这些青年移交给了调查监狱。5月起诉书来的时

候,这三个年轻人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长期监禁甚至死刑:他们被控收听外国广播和密谋叛国。他们都没有想过事情会走到这一步,但是他们都意识到了“说真话”在那个年代“是致命的奢侈”。

1942年8月审判在柏林举行。他们的罪行早已预先定好了,因此这三个人没有得到任何法律援助。面对九名愤怒的纳粹高官,休博内在和法官交流时泰然自若:

法官:“你能让我们相信英国人在对我们说真话吗?你真的相信那些?”

休博内:“是,当然,你不相信吗?”

法官:“你不怀疑德国会取得最终胜利,对吧?”

休博内:“你真的认为德国能赢得战争吗?”

已经感觉到自己会被判死刑了,这个年轻人无所顾忌地说出了事实。判决宣布后,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

“虽然我没有犯任何罪。我也必须死了。现在轮到我了,但是轮到你们的时候也不远了。”

休博内最后两个月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死刑犯的房间没有取暖设施,只有一把小凳子、一张桌子和一张木板床。每隔10分钟,卫兵就会从监视孔窥视。虽然时刻面临死亡,休博内仍然坚守着基督教的信念。在他写给父母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我还有两个小时,然后我就会出现在上帝面前了。”第二天,血红色的告示牌公示了判决。第二年夏天,他的母亲和祖母在汉堡死于同盟军的炸弹袭击。

几乎是在同时,另一个抵抗组织也对纳粹表示了强烈的憎恶,他们也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他们对休博内的被捕和审判一无所知,可见纳粹的控制非常森严。他们写道:“德国的人们,你和你的孩子们愿意忍受和犹太人同样的命运吗?你愿意和那些伤害你的人同流合污吗?我们要永远做被全人类憎恶和排斥的国家吗?不!先让自己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强盗行为断绝关系。以你的行为证明你的思想和那些人不一样。一场新的自由之争马上就要开始了。”

“白玫瑰”组织是一群中产阶层的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学生于1942年早期成立的。汉斯·绍尔(Hans Scholl)、亚历山大·施莫雷尔(Alexander Schmorell)、克里斯托福·普罗普斯特(Christl Probst)、威利·格拉夫(Willi Graf)都才20出头,而且都正在东部前线义务服兵役。他们信奉宗教,而且都有反希特勒的背景。绍尔的父亲咒骂希特勒,称他是“哈姆林的狗杂种”,他的言论被工友听到了,随即被

投进监狱。格拉夫原本属于一个幸免的天主教青年团体,但是在1938年的取缔活动中他被捕了。

汉斯·绍尔是最早的煽动者,1942年的时候他24岁。其他人也差不多是同样的年龄,除了汉斯的妹妹索菲(Sophie)。在学校里,他们有机会接触到和他们产生共鸣的长者,比如库特·胡伯(Kurt Huber),他是慕尼黑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Munich's Ludwigs Maximilian University)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纳粹的暴行以及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激起了他们的反抗:“今天还怀疑现状、还对魔鬼统治抱有幻想的任何人,”他们在1942年夏天的传单中写道,“都远远没有了解战争的政治背景。”

一开始汉斯和他的姐姐英格(Inge)一起,也满怀热情地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都在那里找到了“归属感,这种归属感把他们安然带出了青少年期的困难和孤独。”当他们听说了集中营之后,疑惑蔓延开来:“我们的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自由,没有欣欣向荣的生活,住在这里的人都感觉不到繁荣或者快乐。”汉斯加入了一个非法团伙,当他和英格被抓的时候,他的疑惑变成了愤怒。在他所写的一本禁书中他说:“撕开我们的心脏——它们会烧死你。”

虽然英格被吓怕了,但汉斯还继续着他的反抗行动。他受到了父亲的鼓励,他父亲认为,一个践踏自由的政权“对人没有一丝尊重”。汉斯在战争早期已经慢慢聚集了一群想法相似的医学生,他们中有乐观幽默的亚历山大·施莫雷尔,有唯一已婚的克里斯托福·普罗普斯特,还有思想深刻、头脑冷静的威利·格拉夫。和很多学生一样,他们喜欢在深夜进行讨论,但是他们讨论的是强制军事服务以及这个恐怖国家越发森严的控制。

两个孤立的事件给了他们灵感。1942年早期,慕尼黑的邮箱里出现了一些有关明斯特主教加仑伯爵(Count Galen)抗议对精神病人实行安乐死的宣传单。据英格说,汉斯·绍尔震惊了:“我似乎还能看到汉斯站在那里,拿着传单说:‘只要我有个油印机。’”49岁的教授胡伯的神学讲座使学生们的愤怒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他的讲座让他们意识到“人类不但在践踏神的旨意,而且连神本身都试图消灭。”

1942年春,第一份“白玫瑰”传单出现了。虽然只印了100份,但却在慕尼黑大学引起了异乎寻常的轰动。他们在表达对政权的敌对情绪之外还提出了实际的建议:“消极抵抗,抵抗,不管你在哪里,趁还来得及阻止这蔑视神明的战争机器

继续蔓延,在最后一个城市,比如科隆(Koln)被碾成碎石之前,在最后一个青年为了傲慢的次人类生物在战场上洒下鲜血之前。别忘了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一个他愿意接受的政权。”

“白玫瑰”的名字来源于一部西班牙小说,1942年夏初他们又制作了其他三种传单。在这些非同寻常的文件中,他们的愤怒因为智慧更显得深刻。他们引用圣经、老子、弗里德里希·席勒和亚里士多德的话,他们抗议对30万波兰犹太人的屠杀、苏德战争的惨痛代价、“恶魔的独裁政治”中自由的丧失。他们总结道,“总之,有尽头的恐惧总比无尽的恐惧要好。”

盛夏,4个学生回到了苏联前线:离开之前,他们决定将他们的斗争升华为一种义务。就如克里斯托福·普罗普斯特宣称的:“我们必须和这傲慢的把自己置于人类基本价值之上,并且决意根除所有抗议的政权抗争。为了生命本身我们也要抗争,没人能免除我们的这项义务。国家社会主义是降临在我们人民头上的恶性精神疾病。我们无法坐视它的发展,因为德国人民都遭受着它的摧残。”

1942年初冬从前线回来之后,汉斯·绍尔到了柏林和另外一个反抗战士福克·哈内克(Falk Harnack)接上了头。正是在那之后他酝酿了“在每一个大学里建立非法学生团体”的计划。此时汉斯的妹妹索菲·绍尔(Sophie Scholl)参与进来,索菲21岁,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漂亮女孩。她当时已经是一个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领袖,但是当她开始在慕尼黑的学习之后她对政权的憎恶更加深了。一方面她感觉他们已经输掉了战争,另一方面她受到宗教信念的激发,于是索菲参与了组织的斗争。

“白玫瑰”成员在一个隐蔽的花园工作室里聚会,他们策划着印制更多的传单和公然反纳粹的涂鸦。慕尼黑有着肥沃的斗争土壤。纳粹的地方长官曾出现在大学里批评学生的道德水平低,并且宣称大学里没有女人的事,她们更适合给帝国繁衍后代。他的声音被学生们压倒,并且被当众羞辱。1943年初,“打倒希特勒”和“自由”的涂鸦出现在大学附近的墙上,当局紧张起来,并且非常恼火。

当1943年2月2号德国第六军队被包围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白玫瑰”的下一份传单——“抵抗运动中的战斗伙伴们!”直指问题的核心。纳粹国家一直以来都拿他们对德国青年的感召力做赌注,但是“白玫瑰”已经看穿了政权所许诺的自主:“以德国青年的名义,我们要求阿道夫·希特勒的政府归还我们的自由,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他用最可鄙的方式骗走了我们的自由。”

2月18日,汉斯和索菲到大学礼堂散发他们最新的公告。这一次,他们有不祥的预兆:索菲前一个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她和汉斯都被抓了。完成任务以后,两个人回到楼内把剩下的传单从采光井撒下去。他们被学校的舍监发现了,他马上锁住所有的门,没多久两个人就被捕了,他们的命运凶多吉少。

等待行刑的日子里,汉斯和索菲保持着他们的尊严,非常平静。他们和克里斯托福·普罗普斯特都没有遭受赫尔姆斯·休博内集团所遭受的酷刑。当索菲被问及如果她知道会有此后果是否还会这么做时,她回答:“下次我还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是你,而不是我的世界观有问题。”他们留下了两封遗嘱:在起诉状的背面,索菲潦草地写下了“自由”;在被关押的小房间里,汉斯写下了引自歌德的一句话:“坚决反对一切专制。”

为了不让这种抗议之声传播,当局加速了审讯。被捕三天以后,他们的审讯由臭名昭著的人民法院院长罗兰德·弗莱斯勒(Roland Freisler)主持。汉斯和索菲无所畏惧,他们毫不妥协。他们的姐姐英格之后写道:“他们似乎把即将失去的岁月都浓缩在这几天里了。”三个被告故意直言不讳地回答法庭提问,索菲说,“我们所说和所写的是很多人所想的,只是他们不敢说罢了。”

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被执行了死刑,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仍在反抗。索菲死前的一天晚上做了另一个梦:“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穿着白色的长裙,抱着一个婴儿正准备接受洗礼。通往教堂的路是个陡峭的斜坡,但是我紧紧把孩子搂在怀里,没有一点犹豫。突然之间脚下的路裂开了,冰川中间有条大大的裂缝。跳进深渊之前我赶紧把孩子放在了一边。那个孩子就是我们的信念,虽然会遭遇艰难险阻,它还是会获胜。我们有机会成为了先驱者,现在因为这个要过早地死去。”

当局还没有罢休。不久之后,格拉夫、施莫雷尔和胡伯连同另外11个帮忙发传单的人一同被捕。1943年4月中旬的审判结果是判剩下的3个主犯死刑。由于胡伯的年龄和立场,弗莱斯勒对他十分鄙夷,他当时对教授喊叫:“每个人都能抒发自己的政治‘信仰’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对我们来说只有唯一的标准:国家社会主义。”这3个人都“丢了德国青年,尤其是在兰格马克战役中牺牲的青年的脸。”

死刑的新闻传遍国内外。1943年晚期,纽约举行了一次大会,与会的都是像埃莉诺·罗斯福这样的杰出人物。一个目击者之后回忆道“成百上千的纽约人来为这‘另一个德国’的6个被害英雄追思。他们的名字并不重要,但是他们的行为

却很重要。他们的牺牲证明了希特勒并不是所有德国人和德国人良知的主宰；德国不乏反抗者，他们牺牲的悲剧代表了未来希望的曙光。”

虽然“白玫瑰”组织非常英勇，他们并没能马上对当时的纳粹德国产生影响：对异议者的惩罚实在太残酷了。然而，他们对当局的批评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他们看出希特勒的威信非常依赖于大众的情绪，因此大众情绪的大逆转将会使其受到威胁。他们也看穿了纳粹青年政策中对良知的扭曲：“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择手段地镇压所有自由表达的国度。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党卫队试图在我们最有前途的年轻岁月中毒害我们、改变我们、控制我们。”

\* \* \*

“白玫瑰”出现的时候正是战争的关键点。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一场灾难。消息从前线传来，当局更加强烈地希望将所有人控制在他们手中。1943年2月，戈培尔暂时关闭了所有流行的娱乐场所，宣称在全民团体面前个人的自由并不重要。盖世太保的网越撒越广。如果“白玫瑰”的成员是作为“典型局外人”被执行死刑的，那么作为局外人中的局外人，犹太人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

1943年2月，戈培尔发起“工厂计划”要在希特勒生日到来之前彻底清除柏林剩余的2.7万犹太人。这一计划开始的那天，安妮·弗兰克记录了一封由当地主教发出的信：“荷兰的工人们，站起来，采取行动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自己的武器来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和我们宗教的自由而战！伸出你的援助之手，现在就行动吧！”虽然她发现这种方式很鼓舞人心，但是她觉得“以此来拯救我们的犹太同胞实在是太晚了。”

在那之前，安妮·弗兰克已经躲藏了6个月。前一年夏天，她的家人接到党卫军的通知，要求她姐姐玛格(Margot)为德国的强制劳动做报道。奥图·弗兰克(Otto Frank)对德国针对荷兰犹太人的计划有所警觉，他决定采取唯一可行的抵制策略：加入“潜水者”的队伍，转入地下。1942年7月5日，奥图把他的家人和朋友范·派尔斯(van Pelses)转移到了他做生意的地方，这里叫做安妮克斯，位于阿姆斯特丹的王子运河。他把他们安排在二层楼的阁楼里，然后把门封了起来。

加上后来加入的中年人弗里兹·派弗尔(Fritz Pfeffer)(日记中的艾伯特·杜塞尔 Albert Dussell)，在安妮克斯一共有8个大人和孩子：奥图·弗兰克、伊迪斯·弗兰克(Edith Frank)以及他们的女儿玛格和安妮；赫曼、奥格斯特·范·派

尔斯(Hermann and Auguste van Pels)(日记中是范·德安, van Daan)以及他们的儿子彼得(Peter)。除了怕被发现或者被告发的恐惧,这个狭小空间里的日常生活对于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也是艰难的,对于好奇心强,安定不下来的青少年来说尤为如此。安妮难以忍受这种被关禁闭的生活,她在日记中发泄:“让我出去,让我去有新鲜空气和欢笑的地方!”

作为8个人中年龄最小的,而且是家里的“惹事精”,安妮难以忍受这种生活。据另一个名叫伊娃·施罗斯(Eva Schloss)的“潜水者”回忆:“我当时13岁,正是精力充沛的时候,但是我什么也做不了。我非常害怕和失望。我曾经和妈妈摔跤来释放我的能量。”比愤怒更糟糕的是孤独感,1942年11月安妮写道,“我周围是完全的真空,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个,因为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我的朋友和我们的美好时光。现在我只能是想不高兴的事或者是想我自己。”

小小年纪就不得不自我排遣,安妮把她的感情都倾诉给了她的知心朋友——日记。她把日记比作凯蒂(Kitty),这是小说家西西·范·马克斯维尔特(Cissy

安妮·弗兰克最后的照片,1942年



van Marxveldt)写的畅销系列小说《乔普日记》(*Joop ter Heul*)里的人物。找一个能够独处的地方,在她称为“真正的朋友”的日记本里写下心里话,就像一条救命索。禁闭使她的写作风格具有超出年龄的犀利和直言不讳,她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一个聪明的女孩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下度过自己的青春期。

然而,很多日记都是你能想象到的内容。在她被迫关禁闭之前,安妮是个认真的学生,非常好学,虽然稍稍有点娇生惯养和淘气。她喜欢交际,在同龄人中很受欢迎,只要有机会她就会在班上逗乐。她的性情像水银一样易变,但是她已经清楚知道了这一点,而且有意识地想改变。虽然很年轻,她的视野已经移到了家庭和她所处的环境之外,她想“变得和现在的我不一样。”

她的抱负是成为一名记者,“在巴黎和伦敦花上一年来学习语言和艺术史”:如她自己所写的,“我能够想象华丽的服饰和迷人的人们。”她融入了当时最为流行的青年文化,在墙上贴着好莱坞明星戴安娜·杜宾的图片。她继续阅读和模仿一系列流行少女书籍中的年轻英雄。她幻想着去瑞士购物,在那儿她可以买到粉底霜、洁面乳、浴盐、科隆香水,还有迷人的学生装。

同时,作为青春期少女的安妮也到了叛逆的年纪了:“每天我都变得更冷酷,越来越轻视母亲,冷淡父亲,也越来越不愿意告诉玛格我的想法。我完完全全封闭了自己。”在另一篇日记里,她宣称说她“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他们不在身边,自己待一会,他们却并不理解这一点。”更糟的是,她和姐姐都感觉到“他们总是被当成孩子对待,可是从内心来说我们比其他同龄的女孩子成熟多了。”

然而,虽然安妮反过来抱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安妮克斯的5个成年人都在帮助她成长和“认识自己”:“我像陌生人一样观察我自己,我可以站在安妮的对立面,没有偏见,也不需要借口,我看着她在做什么,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1944年安妮修改了她的日记,在那年3月一篇重要的日记中,她回顾了自己过去“不真实”的生活和之后的18个月:“那个享受着天堂般生活的安妮和这个在四壁高墙中长大的人完全不同。”

“在家的時候,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可是,1942年的六七月,一切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争吵、责备——我没办法完全接受。我对这一切完全措手不及,而我所知的能够使自己支撑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嘴。1943年上半年带来的是哭泣和孤独,我逐渐意识到的我的错误和不足,这些似乎多到数不完。我每日以聊天度日,试图和皮姆(她父亲)走得更近但是失败了。于是我只好独自面对改正自

己缺点的艰巨任务。”

14岁意味着一个转折点。15岁生日的几个个月前,安妮开始对自己的青春期有了概念:“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很没有安全感,而且刚刚开始发现她们是有自己的观点、思想和习惯的独立个体。我来这里的时候才刚满13岁,于是我开始审视自己,并且意识到我比大多数女孩更早地变成了‘独立人’。有时我晚上躺在床上时,我感到一种可怕的欲望想抚摸自己的乳房,聆听节奏稳定的心跳。”

安妮到了发育期的关键时期。摆脱了父母后,她渐渐被安妮克斯唯一的男性青年——害羞但是友善的彼得·范·派尔斯(Peter van Pels)吸引:“新年过后第二个大变化来临了,通过我的梦我发现我一直渴望的……是一个男生,不是女性朋友,而是一个男朋友。我发现在我肤浅快乐的外表下隐藏着内心的快乐。我时常很安静。现在我只为彼得而活,我的未来将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

在被占的荷兰,外面的情况越来越糟。还没有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生命甚至更加危险:随着找到犹太人的赏金逐步增加,越来越多的“潜水者”被发现了。安妮很清楚被发现和被捕都近在眉梢,但是她也为刚刚到来的青春期着迷。她摸索着自己的阴道:“你很难找到它,因为皮肤的合拢挡住了它的入口。那个洞这么小,我很难想象男人是怎么进入的,更难想象婴儿怎么从那里出来。”

她对彼得的迷恋导致了1944年春的一场家庭危机。当她的父亲阻止他们搂在一起接吻的时候,安妮给他写了封信:“别把我想成14岁的孩子,因为所有这些麻烦已经使我长大了;我并不后悔自己的行为,我将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第二天她的父亲却心平气和地和她交谈。安妮感到震惊,并且悔悟了:“是的,安妮,你很清楚你的信很不友好也不正确,但是你很为它骄傲!我将再次以父亲为榜样,我会改进自己的。”

渴望自由,却生活在奴役之中,安妮和成年人一样,处在一种难以忍受的状态中,她的日记反映了她的情绪波动。1944年5月3日,她指责了“人们心中毁灭性的欲望,发怒、谋杀和屠戮的欲望。除非全人类,无一例外地经历质的飞跃,战争才会不再继续。”隔了两段,她又想通了:“每一天我感到自己在变得成熟,我感到自由近了,我感到了自然之美和我周围人的善良。每天,我想这是一种多么迷人和使人愉快的经历啊!”

1944年的春夏间,安妮也思考了青少年在社会中的地位。她开始构想战后可能的生活:“我终于意识到,为了不变成一个无知的人,我必须完成家庭作业。

我要出人头地,成为记者,因为那是我想要的。我知道我擅长写作。”她受到伦敦的广播征集“关于战争的日记和信件”的鼓舞:“想象一下如果我发表了一部关于秘密安妮克斯的小说该多有趣,光是题目就会让人们认为这是个侦探故事。”

6月,发动进攻月。当时她15岁了,收到了“相当多的礼物”,包括一套五卷本的艺术史书、一条金手链和彼得送的一束牡丹花。她继续写关于女性主义、自由的急迫性和青年的社会地位的文章。7月,她讨论了一本叫做《你怎么看当今的年轻女孩》(*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odern Young Girl?*)的青年书籍,这本书把“当今青年从头到脚批评一通”。“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作者就是在直接针对我,这就是为什么我最终决定向你袒露心声,为自己辩护。”

安妮觉得战争使他们这一代承载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我们太年轻了,没法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却坚持把他们自己的事情委托给我们,以致最终,我们被迫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虽然大多数时候一旦面对现实我们的解决办法就破灭了。这种时候很艰难:思想、梦想和宝贵的希望在我们心中升起,但最终只能被残酷的现实摧毁。我没有抛弃所有的理想,这真是个奇迹,它们似乎这么荒谬,不切实际。但是我依然坚守这些,因为我相信,不管怎样,人们的内心深处是善良的。”

\* \* \*

1944年6月和7月第二战场的开辟把纳粹的镇压推向难以忍受的高峰,希特勒政权暴露出其死亡教义的本质。那个夏天发生了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中的“疯狂屠戮”:“焚化炉的炉温如此之高以至于耐火砖都烧裂了,还得挖新的焚烧坑。一旦开始,熊熊火光淹没了被烧的尸体。”在杰克曼德鲍姆(Jack Mandelbaum)集中营,“死于疾病和饥饿的囚犯更多。”

德国青年做好了全面战争的准备。对军龄以下青少年进行的强制征兵1943年还在继续,这一年被称为“德国青年的战争服务年”。1926和1927年出生的那些孩子现在是十六七岁的青年,他们和各国志愿者一起被匆匆送进武装党卫军部门。似乎纳粹德国逐渐变成了一个大营地,“白玫瑰”的预言就要实现了:“渐渐的,德国被一层一层地包围起来,最后陷入一个巨大的地牢中。”然而,纳粹的青年组织体系依然牢固。

大部分德国青年仍然相信德意志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理念,相信德国的事业绝对正确,最为重要的是相信他们崇拜的首领——希特勒本人。教

化变得更加极端。1943年夏天,同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逐步升级,以至于当局开始了系统作战,将50万西部和北部工业心脏地带的青少年撤出来。他们被送到东普鲁士、上西里西亚和哈尔斯高的儿童下乡营(Kinderlandverschickung camps)。这些不是学校,而是希特勒青年团工厂。

这些被撤离出来的青少年面对纳粹的极端行为非常脆弱:他们远离家乡,刚刚受到惊吓,因此纳粹不必担心外部的影响和干扰,可以随意教化他们。许多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已经为教化这些青少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很多和正常生活相关的事情都消失了。学业中断,他们所爱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受到严重威胁,很多德国青年把同盟军的炸弹造成的心灵创伤演变为对人类生命的漠视,甚至是他们自己的生命。

战争的最后两年间,大多数德国青年跟随希特勒,已经全面认识了自我。如果没有胜利,一切都会毁灭。他们的家就是征兵训练营(Wehrtuchtingungslager),1943年末这里变成了纳粹青年组织的主要单位。这些集中营进行了为期三周的洗脑。首先是,“我们战斗”,促使战争成为一条自然的法则;第二,称作“我们牺牲”,增加了兰格马克战役的神秘;最后一周,“我们胜利”,鼓吹东部战场上德国终将胜利。

1944年被阿图尔·阿克斯曼称为“战争志愿者年”。当时,十四五岁的德国青年进入了党卫军体系。这支不满法定年龄的部队成为国际性新闻。一个美国记者1944年指出“很多13到15岁间的少男少女在军工厂工作。纳粹党派坚持以它们自己的目的规划德国青年的生活。这些年轻人的个人生活被吞没在他们所属组织的共同生活中。”

这个体系中的精英分子被集中编入武装党卫军的一个特殊部门中,叫做党卫军第十二“希特勒青年”装甲师。大约一万名16到18岁间的男女青年于1943年夏天开始了他们的集中训练。他们被一个特别强调官员和士兵之间随意关系的政权绑在了一起:青年运动的原则最终应用于整个战争。这个部门把战争经验的缺乏和对死亡的蔑视结合在一起,后者代表了纳粹青年教育中的虚无主义。

党卫军第十二“希特勒青年”装甲师于1944年6月这个所谓的发动进攻月后有了第一次行动。在卡昂,他们“像狼一样”战斗。到9月,最初的1万人中只剩下600。这支装甲师的命运突显出纳粹政权最令人震惊的地方之一:它完全不关心青少年的利益。就如梅丽塔·玛舒曼对她同伴的描述:“他们从来都不遗余力:

不论何时他们被要求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立场坚定地去做,但是这些要求也应该是合理的。”

然而,到1944年,即使是像玛舒曼这样的顽固分子也意识到了纳粹领导“没有采取丝毫措施保护”他们的青年。正当他们相信他们解放了自己的时候,德国青年开始“屈从于科技时代的掌控。”她意识到“科技战胜了灵魂——如果我可以不用这个过时的词汇的话,这种去人性化的现象在集中营大屠杀的组织机制可以表现出来,在国家社会主义对其青年的过度干涉中也可以看出来。”

由于党卫军的破坏和东部撤离,希特勒青年团的巨塔坍塌了,这产生了不可预见的影响。大部分年轻警察都加入党卫军的战斗装甲师,青年犯罪率在德国中西部的封闭城市中明显上升。混乱的局面给他们壮了胆,野蛮团伙的成员数量更多了,他们继续着“白玫瑰”倡导的蓄意破坏和非暴力反抗斗争。当局以更为严厉的惩罚回应了他们的行为。

这些晚期的青年反抗集团一般通称为“火绒草海盗”,这是一个早期的野蛮团伙。“这些年轻人,年龄在12到17岁,带着乐器和年轻女性闲逛到深夜。”1943年7月的监督报道观察到,“这些地痞流氓基本上都不属于希特勒青年团,而且对这个组织怀着敌视态度,他们的存在对其他年轻人造成威胁。最近确定他们中间也有军队里的成员。”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火绒草海盗”合并了“尼禄泰拉海盗”,这是一个由希特勒青年团叛离分子、工人阶层青年和其他青年团伙成员组成的组织。他们的行动包括在墙上写“打倒希特勒”的标语,聚众打架和集体上街闲逛。当局被这帮团伙的行为惹恼,发起了更为严厉的打击行动。1943年的青年刑法特别要求青年法庭的法官把罪犯移交到加护监管营进行无期拘禁——比如莫琳根(Moringen)监管营,那里有着让人无法忍受的可怕惩罚制度。

1944年4月,希姆莱命令反间谍警察下属的犯罪生物学研究所对青年加护监管营的犯人进行分类。到达诸如莫琳根这样的监管营后,这些犯人会被放在观察室里6个月。那些能改造好的会被送去参加农业劳动或者当兵,那些不悔改的就送进救济所或集中营。那年晚些时候,希姆莱、阿图尔·阿克斯曼和司法部部长一起决定展开进一步抵制“不断增加的小团伙”的行动。

反对者被押送到加护监管营或集中营。小团伙被中央安全局定义为“希特勒青年团之外的青年团体”,他们“对战争的需要尤其冷漠。”他们确定了三类主要

的反对者：城市街道团伙，持不同政见者，和最后一类，摇摆乐反叛者，这些人继续以快节奏的音乐和性体验实践他们的亲英狂热。

掌权的最后几年间，政权的报复性达到新高度。1944年10月，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白玫瑰”审判开始了。这次涉及一个慕尼黑组织，领导者是医学生汉斯·雷派尔特(Hans Leipelt)，他们试图蓄意破坏公共财产，而且和第二代更加政治化的汉堡摇摆乐青年有联系。他们中的一个，15岁的托斯顿·穆勒(Thorsten Muller)在审讯时被告知：“所有起于艾灵顿的事情最后都会发展成试图暗杀元首！”雷派尔特被判死刑。

同月，希姆莱发布了他最后的青年指令，这是另一个“和青年小团伙作战”的法令，这条法令尤其针对转为武装反抗的“火绒草海盗”。在科隆，他们联络战犯、逃兵、苦工，并且释放集中营的犯人。他们逐步升级的党派斗争的高潮是谋杀科隆盖世太保首领。当局在市中心当众吊死13名“火绒草海盗”，对他们进行报复，其中包括16岁的巴特尔·辛克(Bartel Schink)，他是一个叫“纳瓦霍”(“The Navajos”)的地方组织的领导人。

29

## 青少年时代的到来

《17岁》创刊

你们是世界的主宰。

——“17岁登上历史舞台”，《17岁》第一期，1944年9月



《17岁》第一期，1944年9月

“白玫瑰”第四次审判开始的前一天,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在纽约派拉蒙剧院开始了他第三季的演出。当时是10月12号,恰逢哥伦布纪念日,首场开演之前已经是一片轰动。维加(Weegee)拿着相机和笔记本,为《纽约每日新闻》拍照:“噢!噢!弗兰克……派拉蒙剧院前的百老汇大街上午夜开始就排起了长队。凌晨4点已经有500多女孩……她们穿着短袜(这是当然的),戴着蝶形领结(和弗兰克戴的一样),衣服上别着辛纳屈的照片。”

早上8点不到剧院前就聚集了一大群人,剧院前辛纳屈的大幅照片上满是口红画的唇印、抒发爱慕之情的话语、甚至还有电话号码。剧院很快坐满了人。演出以电影《我们有颗年轻愉快的心》(*Our Hearts Were Young and Gay*)开始。这部电影一直受到争议……不是因为这部电影不好……而是正相反……但是那些女孩们完全不是为了看这个而来的……她们完全可以自己放幻灯片。

“接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辛纳屈出现在舞台上……女孩们歇斯底里地叫着弗兰克……弗兰克……你已经在收音机里听到过他唱歌时女孩子们的尖叫声……以那样的声音乘以1000倍你就能想像一下那震耳欲聋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了……因为那里没有音响师可以把声音控制在耳朵能承受的范围內。辛纳屈唱了几首,匆匆离开舞台。”但是事情还没结束:“一大群人等在舞台出口处……他不敢离开……所以只能躲在剧院里……”

“凌晨两点剧院关门了……清洁工进来清场……一些女孩,从早到晚看了全部的5场演出,她们不肯离开……试图躲在女厕所里……但是管理员把她们赶了出来……所以那些影片放完,她们睡了会觉又出来排队等。”对维加来说,这是他凭准确的直觉记录的纽约生活的高潮时刻,是人们极端行为的又一事例:他没有提及的是,每一场演出结束后,派拉蒙到处都是小便。

就像1926年范伦铁诺的葬礼和1939年《绿野仙踪》的开演,哥伦布纪念日的骚乱是曼哈顿大街上上演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3万名疯狂的女孩占领了时代广场。作家布鲁斯·布利文称它为“一个世纪里只可能出现

两三次的群体歇斯底里。想要理解这种现象不但要回到林德伯格和范伦铁诺时代,还要回到中世纪席卷德国许多城镇的疯狂舞蹈,或者儿童十字军时代。”

辛纳屈出名已经有三年多了。他第一次大获成功是1942年12月派拉蒙的首季演出,当时的宣传称他为本尼·古德曼乐队演出的“锦上添花”:介绍他的那一刻,剧院里突然爆发出了“5000名孩子的跺脚声、大喊声、尖叫声和掌声。”1943年5月辛纳屈回到派拉蒙时这种场面进一步升级:“这一次,她们扔来的不仅是玫瑰花”,勤杂工尼克·斯瓦诺(Nick Sevano)回忆说,“她们扔的还有内裤和文胸。”

追随者的狂热胜过了媒体的炒作。媒体本来把辛纳屈称为“尖叫先生”,但是他的观众们所作的更甚于此。他的新闻发言人回忆,“我们雇来的女孩们在他性感地发出一个音符时尖叫。但是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做。我们雇来的十多个女孩严格按照我们告诉她们的方式尖叫。但是成百上千我们没有雇佣的女孩叫的声音甚至更大。另外一些女孩尖叫、嚎叫,用涂着口红的嘴唇亲吻他的照片,在纽约派拉蒙剧院的演出间隙把他堵在他的休息室里。真是疯狂,完全失去控制。”

整个1943和1944年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在持续,像《高些,再高些》(*Higher and Higher*)这类电影里的精彩片段更是刺激了这种狂热情绪。辛纳屈的走红势不可挡,因为他满足了工业和情感的需要。在演唱会上,他仅仅用眼睛的注视就引诱了情绪激动的年轻观众。他明亮的蓝眼睛扫过人群,落在某些人身上,这样就像是在为他们单独歌唱,仅仅是成千上万人中的一个。和《可以拥抱你》(*Embraceable You*)和《飞过彩虹》(*Over the Rainbow*)这种迎合大众趣味的节奏缓慢的民歌相比,辛纳屈的代表作《声音》(*The Voice*)产生的魔力几乎可以让时间静止。

歇斯底里填补了人们心里的真空。布鲁斯·布利文在派拉蒙观察了辛纳屈的演出:“当他忧伤地唱着,‘我独自行走’,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孩子似乎真的很痛苦地喊着,‘我会和你一起走的,弗兰克。’诸如此类,其他几百名观众各自喊着不同的话。当唱到没有人爱他时,我右边的一个忠实歌迷呻吟道,‘你在开玩笑吗,弗兰克?’接着所有观众开始跟他轮唱,弗兰克大叫一声‘不’,观众们会叫五六次‘是’。”

虽然1944年10月辛纳屈已经快29岁了,但他体格瘦小,精力充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虽然结了婚,有了一个孩子,但是他仍然是彼得·潘式的人物。据他自己后来说,“那是战争年代,有着巨大的孤独感。我是每个街角杂货店

都能看到的那种男孩,那种离开社会去战场的男孩。”布利文认为那些派拉蒙的短袜少女“在他身上找到了一种父亲的形象,尽管他很年轻。更甚于此的是,他代表了他们希望实现的梦想。”

辛纳屈和他的观众既是一体的,又是可望不可及的:“他每年赚100万,但是他说着跟他们一样的语言;他只是一个来自霍博肯的好运男孩。他所说的和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和年轻人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成年人的世界。他总是用‘我们’而不是‘你们’。”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理解。《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认为他的演唱会根本不是“艺术表现。”纽约的教育部长指责辛纳屈使得年轻人“情感失控。”

更具争议的是辛纳屈的征兵状况:因为生来耳朵就有伤,他1943年被归为4F类不能入伍。对爱国的美国人来说,这就像是公牛看见了红布。辛纳屈因为没有入伍一直遭到媒体的攻击。美国兵憎恨任何没有入伍的人,他们讨厌被“那些热情的女孩们”追逐的歌手照片。一个年轻人向辛纳屈扔鸡蛋,这个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后,一群水手向剧院外的辛纳屈巨幅照片扔番茄,这种轻蔑行为很快得到媒体的关注。

辛纳屈受到攻击还有一个原因。就像范伦铁诺一样,这位歌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阳刚之气,他的形象是为吸引年轻女性而设计的。这一点不仅激起了嫉妒,而且更加突显了美国兵对家庭生活的期盼和现实之间的差别。他们离开的那块土地已经不一样了。新一代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在1944年200万男青年征兵后形成的真空中填入了一个他们的时代。短袜少女想要的不是战争磨炼过的美国兵而是似乎有些女气的“皮草商”,这标志着时代的转变。

不管别人喜不喜欢,辛纳屈成了全国性的人物。他的地位在1944年9月去白宫见了总统之后得到巩固:“当我站在他身边的时候有点吃惊。我只是在想,这个是当今最厉害的人物,而我这个霍博肯来的小人物在和他握手。”罗斯福早就发表过公共声明把美国的政治和它的流行乐联系在一起,但是这次会面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它向公众再次明确了青少年是美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 \* \*

美国女性一直站在这个国家消费文化的前沿,但在战争的后期,她们的重要性由于各种事件的发生更加明显。大多数18岁以上的年轻男性都加入了大约

700 万的应征兵队伍中,由于 18 到 30 岁年龄组离开了公共生活,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青少年中大多数是女性,接受全日制雇佣,1944 年大约有 300 万 14 到 17 岁这样的青年:他们的工作乏味,而且要负责任,工作时间还很长。

这个群体过早地跨过了从青少年到成年人的门槛,但是在为战争效力中他们还没有明确的定位。另外,很多年轻的职业女性并没有得到家庭的支持,而且使得她们走向成年的传统道路被堵住了,所谓的传统道路指的就是婚姻。关于女性青年犯罪的轰动性文章夸大了成年人对 14 到 18 岁的年轻一代的恐慌。他们虽然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富有的青年,但是似乎行为疯狂,放任自流。

1943 年的事件促使很多美国人对青年感到恐慌。他们像是一块空白帆布,成年人把自己对战争以及战争对美国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的恐惧肆意泼洒在上面。一部名为《青年变得狂野》的电影让人们更加意识到媒体的狂热与平淡现实之间的差距。它把年轻的罪犯表现为迷茫的受害者而不是冷酷的犯罪者,这部冷静的影片(虽然电影宣传非常热闹)在结尾处直接向观众呼吁:“我们不能再浪费他们了,我们需要他们,毕竟,我们是为他们而战斗的。”

这种包容性的态度符合很多美国青年的感受: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阻特装青年、短袜少女或者胜利女孩。就像一个年轻女性在《纽约时报》论坛讲述青年犯罪时所说的:“我们想工作,我们不想只对自动唱机和可卡因感兴趣。国家有一股强大的青年力量可以弥补人力的不足。成年人必须帮助我们组成一支志愿队。年轻人希望有机会做些事情,有一份需要认真负责的工作。”

然而,繁荣发展的美国经济只允许最低的社会福利:做任何事情都有点新政国家社会主义的味道,会妨碍企业利润的增加。的确,作为大萧条时期主要的青年机构,交流与协调委员会和全国青年机构在 1944 年已经停止运作了。要想改变现状必须采取一些行动,但是 30 年代风格的家长式统治和公共慈善事业既不吸引大企业,也不吸引想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的青年。

1944 年 5 月《展望》杂志的特稿展示了前进的道路,它描述了伊利诺斯州莫林高中校报编辑鲁斯·克利夫顿(Ruth Clifton)为建立青年中心所做的成功之举。她关心大量在沙龙里喝酒的青少年,于是向城市委员会提出申请,修缮了一间空置的仓库。杂志上刊登了一张这个新中心的照片,里面有很多在喝可乐的青少年,杂志指出“如何通过调动青年的能量和创造性来减少青少年犯罪。年轻的美国了解自己的难处;只要有机会,它一定会解决的。”

青少年餐厅是美国解决战时青少年犯罪问题的一个创造性措施,莫林俱乐部是其中的一部分。从一开始,它们就被设计成更为开明的青年工作方式,如计划发起人马克·麦克克洛茨基(Mark McCloskey)1944年3月说的:“这个世界一直试图做所有孩子不愿意做的事情。”麦克克洛茨基认为大多数机构都没有更新它们的计划,他向美国青年征求了他们愿意做的事情,这是之前的每一个青年服务组织都没有做成的事情。

麦克克洛茨基和G.斯坦利·霍尔一样,是个坚定的生机论者,他拒绝对1943年的事件进行谴责。“我完全能够理解亨利·詹姆士吹起小号时那些孩子为什么要在派拉蒙剧院的走廊上跳舞。”他又一次说道,“我把它叫做新狄奥尼修斯狂欢。”当青年问题国会听证会发现缺乏娱乐设施是青年犯罪的主因之后,作为社区战争服务办公室娱乐项目指导的麦克克洛茨基被授权采取行动。

麦克克洛茨基认为传统的青年组织并没有直面当下的青年现实:“童子军、女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从来都没有涉及过犯罪的孩子。”其他一些战时项目例如高级服务童子军(Senior Service Scouts)和初级警察组织(Junior Police Organization)都太独裁主义了。社区战争服务办公室认为“很大一批年龄在14到18岁之间的孩子很长时间都和社会,通常是和教育体系脱轨,而且根据警局记事簿上记载的,这些孩子跟社会道德标准也脱轨了。”

青少年餐厅在1944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他们刚好在青少年独立和成年人监管之间提供了一个平衡。如果天平稍稍偏离,这些青少年中心都不会那么成功:要么太放松,要么又会控制得太紧。它们通常设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场地、教堂、空置的商店和社区中心,他们的名字反映了当时的青少年文化:摇摆舞会(Jive Hive)、嗡鸣桶、摇摆天堂、热情小猫、韵律摇摆乐、布吉舞、昂首小屋。

像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摇摆舞会这样的俱乐部需要几个月的筹划,需要成年人和当地委员会的参与。有200名青少年参加了它的开业仪式,还有他们的父母和市长。这些俱乐部通常建在社区里,有严格的年龄和行政区要求,一个星期开放几个晚上:平时工作日开放到9:30,周五周六开放到11点。他们的主要特色是自动唱机、乒乓球桌、舞池和可乐机。可口可乐公司察觉到了这个运动的市场潜力,开始分发怎样建立青少年中心的小册子。

青少年餐厅吸引的人群通常在13到19岁之间:21岁的顾客已经到了去沙龙的年纪,不太可能被软饮料和成年女伴吸引。光顾这些青少年餐厅的主要是高中

生,他们是未来的应征入伍者,将过着热情小猫俱乐部章程设想的生活:“以美国共和制政府为基础,提供干净、有益于健康的娱乐设施和娱乐活动。”青少年餐厅反映了政府试图将战争时期有关自由和民主的论调应用于青少年生活中。

这项举措在种族纷争的底特律开花结果,1944年黑人和白人青少年加入了同一家俱乐部,并且支撑起一个全市范围的由黑人和白人共同组成的青年委员会。其他一些青少年餐厅没有那么和谐。高中生活常受小团体主导,常常发生种族分歧。麻烦通常是因为这些原因引起的:外来者可能无法觉察跨越社区界线,但对于当地人来说,每个街角都像是用白色油漆标记过一样,每个社区都界线分明。

这种自我封闭的青少年世界往往很让父母烦恼,很多家长抱怨他们的孩子呆在家里的时间太少。传统的青年工人也常哀叹他们的“户外娱乐”要付出太多代价。然而,家长式统治已经失去了力量。在青年服务宣传册中,社区战争服务办公室欣喜地写道,成年人已经被迫成为“青少年运动”的领导者,政府承认青少年的独立性已经成为生活现实。

\* \* \*

1944年9月,一本杂志的发行把民主、国民认知、同龄文化、目标市场和青年消费不可抗拒地拉到了一起。毕竟,在其发行前的广告里已经指出,据估计,美国青年有7.5亿美元的购买力,无限的财富正等待着那些进入这个尚未开发的市场中的人来创造。如果说哥伦布纪念日凸显了年轻女性的热情的话,那么这本名为《17岁》的杂志则以它“青春时尚和美丽、电影和音乐、理想和人民”的融合宣告了年轻女性重要的经济地位。

这本杂志回顾了布斯·塔金顿和莫琳·戴利的理想化时代,继续探讨青少年俱乐部的影响。一方面,它把青少年当成准成年人,深知他们未来的责任,渴望了解当下时事信息。如杂志的创刊社论所说的:“你将主宰这个世界,所以越早开始考虑越好。在这样翻天覆地发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希望为你的思想提供一块纯净的地方。”

但是它同时也是一本商业刊物,目标群体明确指向最广大的青年一代:“《17岁》是你们的杂志,美国的中学女孩们,它属于你们所有人!它只关心你们的事情,所有让你们关心、兴奋、烦恼、开心或者困扰的事情。”在一个新的民主和自由

的时代,它明确地鼓励读者的参与:“给我们写任何事情,所有事情。告诉我们你不同意《17岁》的观点,甚至强烈反对,说我们是最好的,说我们很糟糕,说任何你想说的话——但是一定要说出来!”

编辑海伦·瓦伦丁(Helen Valentine)确信中学女生的确需要她们自己的杂志。以这种理念发行的《17岁》将成年人排除在外,直指它的目标市场。第一期的内容包括亨利·詹姆士的名人特写、弗兰克·辛纳屈的合成照片、好莱坞绯闻专栏以及有关电影、书和唱片的评论、“初次约会测验”以及其他一些礼仪专栏。另一个固定栏目,“为什么父母长不大”提供了怎样跨越代沟的常识性建议。

《17岁》旨在将其青年读者打造成令人满意的成年人。“长大,自己谋生是有补偿的”,还在读大学的艾丽丝·比顿(Alice Beaton)在“致高中生”专栏中写道:“这很像跳吉特巴舞,它使你非常繁忙,让你上气不接下气,似乎并没有把你带得很远,但是很有趣、让人激动、富有挑战性。”像“你为战争做了什么?”这样的文章也灌输了责任感的重要性,而且明确提出应该完成中学教育:“记住一点……你是一个正接受训练的成年人。”

但是杂志的主要吸引手段是时尚。关于廉价商品的文章会配上家庭服装制作窍门以及标有详细价格的时装广告。广告更具有诱惑力:百隆商店为他们名为“青少年餐厅”的青少年服饰登了大幅广告,萨克斯第五大道以“青年人爱这平滑的小羊毛,纯净而简洁”的广告语促销他们的“青年系列”。青少年岁月有限公司以铿锵有力的广告语“打造整洁青年(Recit For Neet Teens)”预告了他们校园女装的面世,同时还提供了全国各地的青年服装门店的详细地址。

《17岁》是一种强烈冲击,因为它同时形成和影响了读者群的需求:发行量从首期的53万在6个月内升到65万。“我们为《17岁》骄傲,因为它没有扭曲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没有把我们当小孩子,或者把我们的习惯描述得让成年人觉得荒谬。”坦克萨斯的F.M.C.写道。另一个年龄更小的密歇根读者表达了她得到“精美的”订书卡时的快乐:“我感觉我必须用妈妈的信笺信封来告诉你们,一个13岁的人在圣诞节得到《17岁》时,感觉自己长大了。”

和很多一夜成功的杂志一样,《17岁》综合了各种时代潮流。1941年,《父母》杂志发行了《呼唤所有女孩》,由于过分依赖幼稚的喜剧,这本杂志并不成功:青春期的女孩希望自己被当成比实际年龄更大的人对待。第二年,《时尚好管家》开辟了一个叫“我们时代的青少年”的专栏,更新青少年的俚语和约会礼节。



《17岁》第一期中百隆商店的青少年餐厅广告

1944年还发行了《美国小姐》(*Miss America*)。同时,报纸也开始开辟像“社交界新人和绅士”及“摇摆乐日记”这样的专栏,娱乐板块涵盖了青年音乐。

大众媒体对青年群体报道的上升趋势可以在流行新闻杂志月刊中看出。《生活》杂志的报道反映了这个市场的迅速发展。《生活》1944年发表了两篇关于“社交界新人”的文章,其中一篇细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近700家俱乐部:很多都是用首字母缩写的名字,如WITCH(这个俱乐部里的我们都是热情小猫)和JERKS(年轻精英接受温柔军人)。如果你不在这个奇妙的圈子内,就会被称为“老古板”。这些文章很受年轻读者欢迎,他们觉得很“时髦。”

1944年5月《生活》杂志关于“高中流行时尚”的文章描述了新的风尚,包括在劳动布衬衫和夹克的背上缝“Alcatraz(亚卡拉)’44”和“Sing-Sing(歌唱)’45”的字样。为了和在高中里人数不断上升的摇摆乐迷保持一致,很多时尚杂志都是以音乐为基础的:在听了一首叫《我想要个纸玩偶》(*I'd Rather Have a Paper Doll to Call My Own*)的流行歌后,高中男孩在他们的衣服上别上纸玩偶。弗兰克·辛

纳屈的走红让蝶形领结在年轻男士中风行一时,女生们学校里的物品柜中常常出现被口红涂抹过的辛纳屈照片。

这些同时兴起的时尚是美国青年要求创新、激情和自我认同的最纯粹的表现。时尚潮流也体现了这些表面上无规律的新颖风格之下存在着团体一致性。1944年11月,《17岁》积极建议它的读者:“你买平跟软鞋是因为你的朋友买……你去乔家烧烤店……或者到多克喝可乐,不是因为这些地方令人着迷,或者东西好吃……而是因为大家都去。很多你表面上的习惯都是从你的同龄人身上学来的。”

时尚也给了制作商、零售商和媒体一条进入青年市场的捷径。如《父母》杂志在它的“青年策略”专栏写的,中学时尚“使你的女儿注重她的外表;它们使上学变得更有兴趣;它们让她感觉她是‘群体中的一员’。”到1944年杂志每周从高中女生那里收到约2000封来信。“青年策略”专栏传遍全国,产生了自己的俱乐部,俱乐部里的青少年在百货商店上演小型珠宝秀。

一个服装制造商把市场、媒介、制造商和零售商完美地联合起来,因此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家纽约公司的“少儿”装有25%放在百货商店的青年专柜里,并在1943年改名为“青少年岁月有限公司”。它最初采取的策略被称为“原创策略”,是跨越市场的。青年岁月零售商形成了俱乐部,为高中女生进行时装秀,给时下的青年流行服饰提出建议。公司的月销售额在接下来的3年间翻了4倍。

这个新的青年竞技场“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初次登台的演员和大学女生”引向中学生群体。海伦·华伦天奴积极追逐着这个巨大的市场,委托一家知名公司“本森 & 本森”,率先进行人数调查统计。在《与女青年一起生活的日子》(*Life with Teena*)的册子上登出来的调查结论清晰明了:“女青年……有她们自己的钱可以花……如果她们不愿用零花钱买,她们的父母会帮她们买。对我们的女孩来说,她们在《17岁》上看到想要的东西时绝不会说不买。”

通过这个结论,华伦天奴和她的推广经理埃斯特尔·艾利斯(Estelle Ellis)大肆吹捧青少年的购买力。如册子中所宣告的,女孩们“会让父母相信在家里所有人中,她们是最需要新帽子和新衣服的人。看看她在朋友们的簇拥下走进商店……听听她准确地告诉售货小姐她想买什么。父亲说她已经长大了,妈妈说她可以自己购物了,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下她的影响力。”

《17岁》发现女孩们对样式非常讲究,于是便和制造商一起设计了能够体现

她们“时代生活”的流行服饰。时髦漂亮的青少年帽子和活泼的校园毛衣在百货商店的青年专柜搭配出售,那里还有青年女生做服装顾问。同时,华伦天奴和艾利斯认为同龄人之间具有仿效的倾向,认为这是刺激市场的一个强大动力:“十几岁的女孩子们总是成群结伴,就像一串香蕉……卖了一个,你就有把它们全卖掉的机会。”几个月内,杂志上便登满了广告〔1〕。

青年的自觉意识逐步提高。《17岁》毕竟是大众市场刊物。它在“丑小鸭——不要绝望”这样的专题报道中发表对日常问题的思考。但是,它所传递的青年人充满机会和希望的信息让目标市场群体充满了自尊和自信。如一位来信者说的:“我愿意停留在17岁,希望我能在这个年纪多呆一会。17岁处在青少年期和成年期的中间,前者说明你将前进,后者则意味着你开始走下坡路。”

\* \* \*

在《17岁》发行时,辛纳屈成为全国偶像,这些都让人们意识应该重新定义这个日益受到关注的年龄,这个年龄需要一个新的名称。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已经发现美国在组织青年方面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1942年10月的一篇名为“美国社会结构的年龄与性别”的文章中,他创造了“青年文化”这个表达方式描述美国社会特有的“一系列方式和行为现象。”

帕森斯承认“把青年浪漫化理想化的这一趋势似乎和西方社会的整体特征不相符合”,他对比了德国和美国的青年。在和“候鸟运动”的“伙伴关系”做了对比后,他发现“美国的青年文化和成年人的浪漫化更加强调两性关系。这个事实似乎和青年文化不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获得任何地位有关。”

然而,“候鸟运动”的“伙伴关系”为他们受希特勒青年团的奴役做好了准备。帕森斯观察到,在美国,“在从童年到青春期的过程中,‘长大’意味着是否有能力按照青年文化的特征行事,这种文化并不针对某一个性别。这一点和父辈的成年人行为方式一样。”他感觉美国的青年文化“不负责任,它最强调的是在社会活动中和异性‘相处愉快’。”

---

〔1〕 1945年春天的一期里,登载的广告有有奈曼马科斯公司的“二八商店”;埃尔金的美国香烟盒;七喜;彻拉米的“青年的芳香”香水;波士顿菲伦店的活泼少女装;青年团体装;弗莱克斯尼特公司的腰带、衬裤和胸衣;詹特森泳装;天鹅牌香皂;可口可乐;夏帕瑞丽指甲油;“纪念牌”订婚戒指;还有针对“皮肤问题”的诺克斯玛药物护肤品。

帕森斯造的新词确定了一个事实。20世纪40年代早期,美国青少年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不同于成年人和孩子的世界。虽然它看似无关政治,但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战争动乱和自由言论的影响。被当作社会典范和巨大市场的青少年开始公开宣扬他们的独立,这个变化让政府和工业界感到吃惊。同时,他们生气勃勃的文化开始席卷被战争摧毁的英国和北欧的青年。

1944年间,把“青少年的”(teenage)和“青少年”(teenager)这些词用来定义一个独立群体的做法逐渐被接受。青少年既不是青春期少年也不是少年犯。消费成为化解骚动和叛乱的最好方式:这是调节青年旺盛精力的美国方式。在已有的词条中,“青春期少年”(adolescent)已经用了四十年了,“社交界新人”(sub-deb)有明显的阶级意味,很快被废弃了,而“短袜少女”(bobby-soxer)几乎等同于摇摆乐这种音乐风格,也已经过时了。

这个词条的起源是“十”(ten),据《简明牛津词典》解释,“十”被“加在3到9这些阿拉伯数字前变成13到19岁的数字。”从塔金顿到戴利到杂志本身,《17岁》一直被奉为青少年时代的理想:他们已经足够大了,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还不是成年人。词缀“十”(teen)也有很长的历史,源于“青春期”(Adolescence)和20世纪20年代的“少年哈罗德”(Harold Teen)。“青少年”(Teenage)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就被自由使用了,经常用连字号写为“teen-age,”同时试图推广替换词“teener”和“teenster”的尝试都失败了。

于是后来就有了“青少年”(Teenage)。这一词条的广泛采用标志着一种和斯坦利·霍尔的“青春期少年”(adolescence)一样的乌托邦理想已经出现。美国的变化证实了霍尔关于童年和成年人之间有一个断层的预言:1943到1944年间,这种分界从制度上得到认同,并最终被广泛应用。给一种东西命名可以帮助它形成,不论是以这个群体为目标的商人还是年轻人自己都觉得,“青少年”(Teenage)这个说法既明了又简单,名副其实。这是青少年的时代——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时期。

# 30 元年

胜利的青少年

我们是没有约束,也没有深度的一代。我们的深度就是深渊。我们是没有快乐、没有家、也没有别离的一代。我们的阳光只有窄窄的一道,我们的爱是残酷的,我们的青春年华从未年轻过。

——沃尔夫冈·博尔歇特(Wolfgang Borchert),《漂泊不定:没有别离的一代》(1945)



唱片店里的美国青年,20世纪40年代

1945年1月的第一周,《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刊登了“青少年权利法案”(“A Teen-Age Bill of Rights”),这是纽约犹太监护人委员会提议研究的结果。提议人艾略特·E.科恩(Elliot E. Cohen)认为“在当下关于青少年的争论中,我们总是摇摆在‘我们的孩子怎么了?’和‘我们怎么了?’之间。”他的“应对青少年问题的十点纲要”旨在启发迷惑的父母,故意引用了美国宪法以黑体作为标题的方式,宣告了一个崭新的青少年时代的到来:

1. 忘记童年的权利
2. 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
3. 犯错误的权利,自己发现错误的权利
4. 得到规则的解释,而不是被强制执行的权利
5. 获得乐趣和伙伴的权利
6. 对社会观点提出质疑的权利
7. 停留在浪漫年龄的权利
8. 获得平等机会的权利
9. 为自己的人生哲学而奋斗的权利
10. 任何需要的时候都能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

以上青少年十诫是宣告一个崭新时代到来的宣言。他们直截了当地要求父母重视孩子的观点。一些人坚持青少年和成年人是平等的: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对社会观点提出质疑的权利。”但最主要的是,青少年时代被看作是通往“人生哲学”的必经之道:“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代表未来,”文章总结道,“对青少年来说,没有什么比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更重要的了。这是认真的寻求,同时也是痛苦的。”

这项权利法案把青少年看作美国人生活主流的一部分。他们得到这样的地位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权力的追求,而是因为他们是美国民主理念的缩影:“青少年

想要机会,教育机会和工作机会。他们希望有竞争的能力,不论性别、种族、肤色或宗教信仰。”这种热情在其他群体——职业女性、黑人和墨西哥美国人身上同样表现出来,战争开启了他们曾经紧闭的心扉。

这就是战争的明确目标。虽然美国青少年除了处于相同年龄之外没有任何阶级意识,社会鼓励他们把自己当成这场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如芭芭拉·盖尔(Barbara Gair)在《17岁》1945年2月一期中所写的,宣布独立“表达了所有人民——不仅仅是富人,或者知识修养高的人,抑或贵族阶级——而是所有人都有‘享受生活和自由、追求快乐’的权利”,美国士兵已经如此接近胜利,未来发展民主的可能是“无限的。”

兴起的青少年一代将目标对准了种族歧视。青少年权利法案中警告,如果继续坚持种族歧视,将会导致1943年爆发的受挫感再度出现。读了岗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揭露美国种族主义的《美国的两难》(*An American Dilemma*)后,弗兰克·辛纳屈拍了一部推动种族包容的短片《我住的房子》(*The House I Live In*)。“我永远不会忘记小时候别的孩子叫我‘外国佬’时对我造成的伤害,”他说,“这个伤疤留了很久,我永远也不能忘怀。”

1945年的另一部短片,华纳兄弟的《这发生在斯普林菲尔德》(*It Happened in Springfield*)改编自早期马萨诸塞尝试混合学校的事例。《17岁》报道“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和反黑人主义(anti-Negroism)已经打上了属于它们自己的标签——它们是对美国和美国精神的威胁。斯普林菲尔德计划的秘诀在于它认识到了学习友好共处应该尽早开始。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学校里,甚至最小的孩子也会明白,如果怀疑和不信任他们的邻居就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民主。”

《17岁》也刊登了一则反犹太歧视的故事,安妮·克拉克(Anne Clark)的《世界结束的方式》(“The Way the World Ends”)得到了读者的热情响应。“我读过的和可能将要读的故事都没有这一则这么适合我,而且这么让我受益。”辛辛那提的“J. K.”写道。对纽约的“C. H. P.”来说,“那些自称是百分百美国人的人却学会了希特勒的那种荒谬的种族歧视,这种种族歧视还被本土的法西斯者发扬光大,这真是很不幸。”

很多这种言论可以直接从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中找到。但是,虽然新世界充满乐观,战争还没有结束。大洋把安妮·弗兰克同提议青少年权利法案的犹太青

少年隔开,仿佛相隔了几千年。这个有远见的少年仅仅几个月前写下“我害怕监狱和集中营”,现在却不得不生活在野蛮残忍的条件之下,体味着深深的恐惧。

青少年权利法案刊登的那个礼拜,弗兰克被监禁在卑尔根-拜尔森(Bergen-Belsen)的集中营里,在那里,她没有名字、没有衣服、没有食物、没有青春,也没有希望。拜尔森成了安置其他纳粹集中营中生病犯人的场所,这里到处是那些垂死的斑疹伤寒、肺结核和痢疾病人的排泄物。安妮·弗兰克在寒冷的11月来到这个“混乱的地狱”,她唯一拥有的只有她的姐姐玛格:“这两个人没法分开,”另一个同牢房的人回忆道,“她们像两只冻僵的小鸟。”

灾难降临在8月4号,盖世太保接到告密后冲进安妮克斯。在逮捕的混乱中,安妮日记本里的纸散落了一地:在他们家帮工的荷兰人密普·吉斯(Miep Gies)挽救了她的笔记本和一小部分她的东西。这八个人很快被送到威斯特伯克的关押营中,一路上他们感觉像是出了牢笼。奥图后来回忆道,“那是个夏天,草地、庄稼地和村落从眼前飞驰而过。电话线在路的右边,沿着窗户起伏跳跃。这就是自由的感觉。”

他们在威斯特伯克能过上稍微正常的生活。一个叫卢杰·德·文特(Rootje de Winter)的人认出了这个家庭:“我的确和安妮还有玛格说过话,但是我不想和她们成为真正的朋友。那是我学到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虽然很焦虑,这八个人还是待在一起,一直坚持到最后上了到奥斯威辛的火车。这一路上,在露天的运牲口的卡车上,并不是那么舒服:弗兰克一家和得了痢疾的狱友们挤在一起。

三天之后,火车到达奥斯威辛。据一位狱友之后回忆,“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那一刻让人害怕,‘是的,这就是集中营。’很可怕……看起来很脏的霓虹灯发出刺眼的光,蓝兮兮的光和头顶灰色的天空都让人恐怖。”他们进入了一个“完全由魔鬼的规则创造和掌管的世界。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死亡。”囚犯很快被分开,奥图·弗兰克之后说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玛格当时的眼神。”

妇女们为了生存相依为命。一位狱友说“她们给了彼此很大的支持,妈妈在不在不再重要。”安妮自己“很平静,很安静,有些孤僻。来到这个地方对她影响很大,这是显然的。”到了这里几个月后,他们得到了去劳工厂工作的机会,但是伊迪斯和玛格拒绝离开得了疥疮的安妮。

之后不久,姐妹两人被送到臭名昭著的门格尔(Mengele)博士面前接受挑选:

“她们一个 15 岁，一个 18 岁，赤裸着身体，但是很骄傲。她们慢慢走近党卫队的挑选桌……安妮鼓励着玛格，玛格挺直身子走到灯光下。她们在那里站了一会，赤裸着，头发被剃掉了，安妮冷静地看着我们，目光毫不躲闪，笔直地站着。”第二天她们被送到卑尔根 - 拜尔森，极度沮丧的伊迪斯几个星期后死了。1 月份奥图·弗兰克被释放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正在几百里之外等待死亡。

姐妹两人确信父母已经死了，于是放弃了求生。玛格得痢疾死了以后，安妮患上了斑疹伤寒，这种病在卑尔根 - 拜尔森很普遍。另一个最后见到安妮的狱友说她裹在毯子里，“她告诉我她太害怕衣服里的虱子和跳蚤了，所以她把衣服都扔了。”安妮仍然不知道她的父亲还活着，她感受到了彻底的孤独。1945 年 3 月末，她孤独地死去，被埋葬在一块没有墓碑的墓地。

当时，德国显然已经输了战争。纳粹力量的中心柏林遭受了接连的炸弹袭击，一切都无法运作了。梅丽塔·玛舒曼的父母在突袭中死去后，她失去了希望。“我知道，虽然并不是特别清楚，这种可怕的大规模死亡根本不能被看成是有意义的牺牲。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正在发生，而且不仅仅如此，这些事简直是疯狂的。的确现在最坏的事情即将发生，而且无法挽回。但是这个最坏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

一度覆盖整个大洲的大德意志帝国缩小成了莱茵河和奥得河之间的一小块地方。俄国在快速进攻中抓到了 50 万青少年，被疏散到“安全”的东部。在这个“灾难的漩涡”中，阿克斯曼和希姆莱把“第三批”17 岁青少年作为“坚强后盾”。他们面对的是对残忍的侵略者充满仇恨的红军。东部前线一直是战争最艰苦的地方，但是 1944 到 1945 年发生的群奸和谋杀使 850 万德国人逃到了西部。

到这个阶段，希特勒青年团的基础结构已经不存在了。1945 年早期，党卫军征兵将领戈特洛布·伯格接受授权召集年龄在 17 到 18 岁的青少年，这些人占了军团的五分之一。接下来的几个月间，15 万青少年被迫加入党卫军服务，剩下的人都被征收到冲锋队里，德国青少年的正常生活中断了，他们穿着不合身的制服，拿着他们粗糙的“反坦克火箭”被送上了战场。有些被征入伍的孩子只有 12 岁，这场儿童战争标志着纳粹政权极度“野蛮的战事。”

3 月的第一个星期，莱茵河在雷玛根被攻破，试图控制这座桥的纳粹兵力中，有至少 20% 是青少年。28 日，希特勒青年团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宣布“希特勒青年团已经开始了坦克破坏运动。”他告诉他管辖的那些青少年“只有胜利或者

毁灭。你对人民的爱是无限的。同样，对敌人的憎恨也是无限的。当别人累的时候你盯着，别人虚弱的时候你站着，这是你的职责。然而，你最高的荣誉是对阿道夫·希特勒不可动摇的信念。”

这些儿童兵十分狂热。梅丽塔·玛舒曼回忆道，“对他们来说‘直到牺牲’的号召不是空话。这句话深入他们内心，他们感觉他们的时刻到了。社会依赖他们，他们不会再因为太小而被解雇。他们夜以继日地铲除东部或西部的墙，这些是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间在前线建起来的土木工事和坦克陷阱。他们照顾难民，帮助伤者。最终他们参与进来了。”

战争一刻不停地继续。3月末，19岁的坦克炮兵约翰·P. 埃尔文(John P. Irwin)在穿过鲁尔山谷的时候遭遇了手持“反坦克火箭”朝他的坦克跑来的12岁士兵。在被迫打死这个孩子后，他感到的只有“解脱”。1945年4月初进入德国的一位“自由法国”组织的医生对一个身上有多处炮弹碎片伤口的14岁男孩进行护理，“我身子倾向他，用德语跟他说，‘你这个笨蛋！看看战争都给了你什么！’那个男孩突然用力撑起身子，朝我脸上吐了口唾沫，喊着‘元首万岁！’”

行进的同盟军发现了这个政权可怕的秘密。约翰·埃尔文所在的军团解放了鲁尔区诺德豪森的一个劳工营，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垂死于结核病、痢疾和饥饿的14岁的孩子和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的男人。”那些卫兵让埃尔文感到很惊奇，他以为“会看到精神混乱、丑陋、邪恶的面孔，结果他看到的是英俊顽固的年轻人。”他的世界天翻地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黑有白还有隐蔽处的灰色地带，但没有能把桃乐茜的堪萨斯变成仙境的彩色魔力。”

4月初，阿图尔·阿克斯曼任命4000名男孩组成坦克摧毁部队，这被视为柏林最后的抵抗，这个行为震惊了久经沙场的德国国防军将军维德琳。在柏林最后一场爱乐乐团表演结束之后，年轻的引座员向观众提供了氰化物胶囊。一周以后，梅丽塔·玛舒曼做了最后的号召，让10岁的男孩女孩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当东部的郊区也能听到远处战场的爆破声时，”她写道，阿克斯曼“号召他‘最年轻的同志们’为伟大德国的胜利而战。”

第二天是希特勒的56岁生日。同盟军包围柏林的时候，跛脚的元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检阅装备好攻击苏联坦克的希特勒青年团。许多12岁的少年被相继扔进火中，但是希特勒并没有停止牺牲他的臣民。他的疯狂源自他的自我膨胀，把自己等同于人民。如果他要死了，德国也要去死，首当其冲的就是构成了他

力量基础的年轻人。

“我确信我们在战斗中必将胜利，因为有德国青年，特别是因为有你们，我的孩子们”，在希特勒的这些话中，最后几千名希特勒青年誓死保卫柏林。“他们渴望证明自己是士兵”，玛舒曼写到，“他们想遵守他们在歌中许下的诺言。但是我担心，他们如果看到自己的战友在身边流血而死，清醒的意识就会取代他们的疯狂陶醉，绝望和痛苦会压倒他们。”

纳粹青年领导层非常愤世嫉俗。5月1日阿图尔·阿克斯曼逃到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前一天，希特勒自杀了。但是，被他们洗脑的青年战斗到5月7日德国最终投降。一个西里西亚希特勒青年领袖回忆他的一群孩子“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他们信任自己的祖国，对他们称为元首的那个人保持着信念；他们把他的名字放在心里……那个他们尊重的人，那个向他们保证未来是他们的人，早就背叛了他们。”

纳粹迷惑、训练、并且最终牺牲了他们的青年。如一个德国女孩之后解释的：“我们信任希特勒。我们信任整个体制，整个领导集团。我们快死的时候，仍然相信会胜利。我们没法做别的任何事情。那就是我们这代人，而他是我们的偶像。”最后的希特勒青年团队“外表坚强，内心和思想也一样顽固。”“留给他们的只有物资短缺的现实，食物配给，服装配给，所有孩子们喜欢的一切小东西都要配给。”

对许多希特勒青年来说，元首的自杀和纳粹种族灭绝本质的暴露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个年轻囚犯被带到达豪解放了的集中营：“我们进入一个大厅，我们以为我们是在一间有不少大炉子的锅炉间里。但是当我们看到每个炉子前都有一个带铁夹钳的金属担架时，这种想法很快消失了。有些担架一半仍露在外面，上面是烧焦的残余的尸体。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们看到的一切太可怕了，一时难以接受。我不能自己地哭了起来。”

然而，纳粹还有最后一招。1944年末，党卫军建立了一个人数很少但都是精英分子的希特勒青年团，叫狼人青年团(Werewolves)，他们一共约200人，德国战败时将作为游击队力量继续战斗。梅丽塔·玛舒曼无法面对眼前崩溃的世界，她于4月末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想现在一个新的非法活动时代开始了，我通过这种想法寻找救赎，虽然没人知道它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调整自己的状态继续战斗，我们故意无视一切都已经失去了的事实。”

5月中旬，她离开狼人青年团，独自在塔罗琳阿尔卑斯游荡。一天她发现自

己“看着在村边玩耍的孩子,他们正在像扔球一样互相扔萝卜,笑得前仰后合。突然,他们身后的一扇窗打开,我隐隐听到电台里传来的音乐声。我沉浸在音乐里,忘怀于花草的芬芳以及孩子们的笑声中,我发现自己好像从邪恶的魔法中醒来,在这魔法中我受尽了可怕的幽灵和地狱中恶魔的折磨。”

\* \* \*

1945年5月8日下午,德国正式投降。在伦敦,大批群众在特拉法加广场、莱斯特广场和皮卡迪里广场疯狂起来。然而,接下来的几天,兴奋逐渐被残酷现实所取代。首先,战争还没有结束。虽然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国的炸弹袭击摧毁,日本人还没有投降。战争摧毁了英国城市的大片地方,导致了50多万人的伤亡,实际上已经使这个国家破产。

但是最重要的是,美国成为了真正的赢家,它的文化和巨大的消费经济开始席卷纳粹垮台后处在真空状态的欧洲。已经征服了英国青年的美国兵在欧洲其他地方用的也是同样的伎俩。“美国兵发现,和与他们年龄相当的人建立友好关系比较容易”,美国历史学家李·肯尼特(Lee Kennett)写道,“尤其是和女孩子们,因为好莱坞电影和美国音乐在他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充当了使者。”

这种“大众的人道主义”给了生活在“诸神的黄昏”之下的德国青年未来的希望。青年文化是具有包容性的:那年春天,作为青年文化王牌杂志的《17岁》在澳大利亚广受欢迎后,该杂志的编辑宣布,他们“很高兴地发现《17岁》具有国际性的吸引力,它证明全世界的青少年都有很多共同点。”美国随军摄影师托尼·瓦卡罗(Tony Vaccaro)在被占德国抓拍的照片抓住了可口可乐取代卐字标志的瞬间,同时德国人放下“反坦克火箭”,戴上了棒球手套。

再回到美国本土,新的青少年时代正在得到认可。1945年6月《纽约时报》上一篇题为《青年时代是美国的创造》的文章指出“把年轻人定义为‘青少年’,也就是说,既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严肃的成人世界,那么就让他们专注于轻松的‘青少年文化’。青年人的悠闲和前所未有的富裕使他们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生活》杂志“青年男孩”的封面展示了青少年的各种服装还有令人惊奇的日常饮食,包括“苏打、冰淇淋、糖果、两瓶汽水、薄脆饼干、谷类食品、水果、果酱和黄油。”

7月1日,格伦·米尔斯的管弦乐队在纽伦堡体育场(Nuremberg Stadium)为

4万同盟军军人演奏。这个象征性的时刻是为了纪念一位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音乐家，他一度失踪，据估计死在了1944年12月飞往巴黎的飞机上。在他死前，他在同盟军远征部队广播中公然把目标指向纳粹青年，把他的音乐和美国民主的理想联系起来。他的乐队无视希特勒的强权仍然存在，标志着摇摆乐面对纳粹敌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纽伦堡演出的四天之后，英国举行了大选。这是1939年以来英国人第一次有了选举的权利。他们抛弃了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人。7月26日选举结果宣布，工党以393对213坐席打败了丘吉尔的保守党。之前6年深入的民主宣传有了成果：“在军人中间，他们感觉自己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出色，他们希望战争结束的时候有斥责长官的权利。”

美国兵在这场平静的变革中扮演着他们自己的角色。“美国人对英国的改变远超过英国人愿意认识和承认的范围”，一个女性回忆道。当美国军队离开欧洲大陆的时候，最想念他们的就是年轻人了。对被疏散的伦敦青年阿维里尔·洛根(Averil Logan)来说，“他们走了生活变得如此单调。整个世界对我敞开了大门，然后又一次关上了……我们意识到英国多么压抑，这里的天气多么阴郁……似乎我的头上还有乌云……而那些男人……基因库真是小啊！”

7月末，美国《时尚》杂志的封面故事“美貌和年轻一代”称“这个国家的青少年革命早该开始了。在美国，这一代人应该受到重视。整本杂志都是为它的青少年读者而刊登的；所有的商店都在寻找青少年顾客。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中青少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近乎完美的存在，它成功地避免了幼稚和世故的双重陷阱。”最重要的是，它把“青春当作一面旗帜。”

8月2日，美国决定对日本使用第一颗原子弹。虽然日本人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但他们的国家领导人拒绝投降：他们还有200万军队和9万神风队飞机可以进行拼死一搏。由于害怕再出现纳粹德国最后时期出现的自杀式恐怖行为，杜鲁门(Truman)总统命令投射“小男孩”，这是一种能够制造“大规模爆炸”的武器。美国也曾把德国炸得四分五裂，他们是最强大武器的唯一持有者。

8月6日早上8:15，广岛(Hiroshima)人看到一个物体从高高飞行着的“银色鱼雷”中飞出降落到他们城市的中心。它的冲击力迅速而且具有摧毁性，超出人类的想象，如一个日本记者之后证实的：“突然一簇耀眼的红白色光出现在天空上，随之而来的是非自然力的颤抖，紧接着便是令人窒息的热气和风席卷了一切。

几秒钟之内,街上成千上万的人和城市中心的花园就被一股灼人的热气烧焦了。”

三天后,长崎(Nagasaki)遭到了同样的待遇。接下来的一周,《时代》(Time)杂志的封面上刊登了空军的建筑师——战略家柯蒂斯·拉梅(Curtis LeMay)少将的照片,并配以专题报道。他的好战反映在了广岛的大屠杀中:“又一次,杜鲁门总统对日本采用了心理压迫:‘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准备迅速消灭日本的所有生产企业……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我们的条款,他们可能等来一场从天而降的毁灭之雨,这将是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毁灭。’”

同一期杂志后面的“商业和财政”版块里,一篇小专稿谈到了一种新的市场研究员的产生。和《17岁》的编辑不同,这个白手起家的人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在芝加哥,一些零售商认为他们现在知道了高中生喜欢彩条牙膏,吃的糖是他们父母的3倍,相对于原来可以浮在水上的肥皂,他们更关注可以去除体味的肥皂。这些以及其他一些刺激销售的信息是他们从芝加哥的最新民意调查者那里买来的商品:他就是19岁的摇摆舞者尤金·吉尔伯特(Eugene Gilbert),吉尔伯特青年服务机构的主席。”

芝加哥的百货商店马歇尔·菲尔德公司雇佣吉尔伯特调查7700名高中生的服饰偏好(华达呢和劳动布、单排纽扣的套装、双色运动外套)。之后,曾经雇佣过尤金做兼职售货员的约瑟夫鞋业沙龙支付他500美金。他能发现短袜少女在哪里买鞋,为什么去那里买鞋。其他一些公司还让他调查口香糖、化妆品和香皂。尤金身材高大(6英尺),黝黑健壮(1921年生),曾在塞恩高中学习组织和推销,经营俱乐部和聚会。

“跟随青年思维和商业步伐”的吉尔伯特认为“如果广告商想在青少年市场上花钱,他们必须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时代》杂志报道“他任命芝加哥高中的‘乔之团’(最受欢迎的学生)为‘调查督导,’给他们75美分一小时让他们调查学生。他现在拥有350名青少年员工和一位时髦的金发经理,18岁的雪莉·拉派尔特(Shirley Rappelt)。”刚刚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纽约任命了员工的吉尔伯特又有了开发“其他28个城市”的计划。

8月14日,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约2000万战士和3800万市民丧生,其中有1100万死在德国的集中营里,包括600万欧洲的犹太人。刘易斯·H.拉帕姆(Lewis H. Lapham)写道,欧洲留下的文明,“都转到了美国的账户上。战争促使这个国家发明了一种神奇的经济机器,能够满足任何需要。北美大

陆上的美国避开了战争的灾难,因此后代很容易相信他们是上帝选定的宠儿。”

\* \* \*

1945年是元年,是以揭露纳粹的残酷和使用恐怖武器为起点的新纪元。大量生产的武器和商品导致了生活节奏的加速。原子弹的重大发现预示了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和新的心理的产生。由于现在稍纵即逝,很多人开始关注当下,甚至是眼前的一瞬间。这并不意味着生活的结构一夜间改变了,而是人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东西开始改变了。

新的社会心理此刻占据主导,它是以物质为导向的,这种心理从文化上很快被解释为存在主义。旧世界消失了,在战后时代最适合发展的群体是年轻人,他们代表着繁荣的未来。“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处在希望中,”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曾写道,而对斯坦利·霍尔来说,青少年几乎就是“新生”。西方世界如果要继续发展,就必须遗忘。在这个过程中,青年又一次被置于“心灵的白板状态”,这种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样。

自从玛丽·巴什基尔森和杰西·波默罗伊震惊了19世纪的世界后,对青年的定义几经波折。欧洲国家和政权曾经试图以自己的目标来组织他们的青少年,这样的努力总是以军事化和军国主义告终,这种症状的极端后果是导致希特勒青年陷入致命的狂热。很多艺术家和作家试图想象青年独立应该是怎样的,而心理学家则不遗余力地设想和控制这种多变紧张的状态。

多亏有斯坦利·霍尔在世纪之交做的超前研究,美国引领了青年文化,并且开辟了把青年纳入社会的途径。20世纪20年代见证了第一次青少年消费文化的高潮,30年代,政府第一次尝试以人道而非强制的方式对待青少年。二战中,青年市场蓬勃发展,社会政策赋予青年一定程度的自由,这两种方式完美地结合到一起。

这个新的综合体称为“青少年”。许多可以用来阐释青年的词都浓缩成一个:青少年消费者。青少年通过竞争、个人需求和市场营销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关系突显了自己的地位,并解决了战争提出的问题:我们要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大众社会中?美国人的未来应该和法西斯完全不同,应该充满快乐和收获:利用大生产获得他们的休闲品,如杂志、化妆品、衣服,还有战争硬件。

同盟军赢得战争胜利的时刻刚好是美国最新一批产品下流水线的时候。在

经历了整整 50 年的研究和发展之后,青少年的定义终于在 1944 年到 1945 年期间被确定下来,这段时间也是美国逐步掌握全球霸权的时期。美国价值观战后在全球迅速蔓延,而青少年的理念正是潮流的先驱。这种新理念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活在当下、寻找乐趣、追求物质,新的全球社会中,只有获得权力才能被社会认同。未来是青少年的。



格拉迪斯·珀尔·格兰特,1926年

# 谢 辞

虽然我是作者,负责全书的写作,但是这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很多人的帮助。在此我想感谢以下为我提供意见、信息、评论和珍稀材料的人(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文斯·阿雷提(Vince Aletti)、阿兰·彼特洛克(Alan Betrock)、阿戴尔·布劳威尔(Adair Brouwer)、马丁·查尔姆斯(Martin Chalmers)、史蒂夫·言布纳尔(Steve Chibnall)、科林·法洛斯(Colin Fallows)、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盖莱格收藏馆的迈克·盖莱格(Mike Gallagher)、保尔·吉尔罗伊(Paul Gilroy)、菲利浦·霍尔(Philip Hoare)、史蒂芬·汉弗里斯(Stephen Humphries)、伊安·辛克莱尔(Ian Sinclair)和尼尔·斯宾塞(Neil Spencer)。同时感谢提供有关莱曼·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和《仙踪世界》资料的迈克尔·哈恩(Michael-Hearn);帮助查找了一些稀有书籍的毕欧马利斯图书馆的希拉·琼斯(Sheila Jones);克拉克大学罗伯特·哈金斯·戈达德图书馆的档案及特殊藏品协调员莫特·R.琳(Mott R. Linn);(苏塞克斯大学)大众观察档案馆的多罗茜·谢里登(Dorothy Sheridan)和乔伊·艾尔德里奇(Joy Eldridge)。

以下这些人曾给予我友情、关心和实际支持,感谢(以姓氏字母排序):文斯·阿雷提(Vince Aletti)、尼科拉·巴克(Nicola Barker)、斯图亚特·巴克森德尔(Stuart Baxendale)、伊安·波奇(Ian Birch)、多罗茜·布里克利(Dorothy Bleakley)、迈克尔·布雷斯威尔(Michael Bracewell)、福吉·布拉德利(Fudge Bradley)、利兹·布拉德利(Liz Bradley)、阿曼达·布朗(Amanda Brown)、彼特·布朗(Peter Brown)、彼特·波顿(Peter Burton)、莫雷·查尔莫斯(Murray Chalmers)、卡洛琳·科威尔(Caroline Cowell)、科林·法洛斯(Colin Fallows)、斯图亚特·费拉里斯

(Stuart Ferraris)、保尔·弗莱彻(Paul Fletcher)、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劳伦斯和加百利·简(Laurence and Gabriel Gane)、保尔·吉尔罗伊(Paul Gilroy)、戴维·高汀(Dave Godin)(RIP)、潘妮·亨利(Penny Henry)、雷蒙德·休斯(Raymond Hughes)、布里安·杰克森(Brian Jackson)、哈利·琼斯(Harri Jones)、乔安娜·莱克斯顿(Joanna Laxton)、盖德·林奇(Ged Lynch)、伊安·麦克唐纳德(Ian MacDonald)、吉列·麦克欧文(Gillie McEwen)、约翰尼·玛尔(Johnny Marr)和安吉·玛尔(Angie Marr)、里斯·姆文(Rhys Mwyn)、雷纳特·诺勒(Renate Noller)、托姆·欧特曼(Thom Oatman)、帕蒂·派拉汀(Patti Palladin)、潘妮·贝汉(Penny Perrin)、露西·皮尔金顿(Lucy Pilkington)、杰奥夫·鲍威尔(Geoff Powell)、亨利·普林斯特曼(Henry Priestman)和杰齐·普林斯特曼(Jackie Priestman)、格文达夫·普理查德(Gwyndaf Pritchard)、阿瑟·罗伯兹(Arthur Roberts)、马奇·罗宾森·斯科特(Markie Robson-Scott)、彼特·罗杰斯(Peter Rogers)、克利斯·塞尔维克(Chris Salewicz)、崔希·斯科菲尔德(Tracey Scoffield)、尼尔·斯宾塞(Neil Spencer)、尼尔·泰南特(Neil Tennant)、珍妮·托马斯(Jenny Thomas)、本·汤普森(Ben Thompson)、保尔·提克尔(Paul Tickell)、纳斯特·托莫斯(Nest Tomos)、克洛埃(Chloe)、迈克(Mike)和沙拉·瓦尔恰克(Sarah Walczak)、约翰·瓦德尔(John Wardle)、斯图亚特·威廉姆斯(Stuart Williams)、沙伦·威尔逊(Sharon Wilson)、乔恩·沃兹克洛福特(Jon Wozencroft)。

感谢早在20世纪就委托我写此书的乔纳森·伯恩汉姆(Jonathan Burnham)和温迪·沃夫(Wendy Wolf)。感谢马歇尔·沃克(Marshall Walker)和丽丽·理查德(Lily Richards)的图片研究,感谢卡拉·博尔特(Carla Bolte)的排版设计,感谢格莱格·莫莉卡(Greg Mollica)的封面设计,感谢沙伦·冈萨雷斯(Sharon Gonzalez)的整体统筹,感谢罗兰德·奥特维尔(Roland Ottewell)准确的文字编辑,还要感谢为我打印文稿的马克·伊舒·罗宾逊(Marc Issue Robinson)。

在此我想特别感谢以下各位给予的帮助、鼓励、批评和所做的努力:我的编辑温迪·沃夫(Wendy Wolf)和珍妮·厄格罗(Jenny Uglow),以及我的代理人托尼·皮克(Tony Peake)和伊拉·西尔弗伯格(Ira Silverberg)。你们的帮助是无价的。

最后,我想提及我的家族中生活在本书所涉及时代的人们:马尔科姆·詹姆斯·格兰特(Malcolm James Grant)、多罗茜·路易斯·格兰特(Dorothy Louise

Grant)、乔瑟夫·莱斯利·萨吉(Joseph Leslie Sage)、玛格瑞特·多罗茜·萨吉(Margaret Dorothy Sage)、多罗茜·布利克利(Dorothy Bleakly)和我从未见过的老祖母格拉迪斯·珀尔·格兰特(Gladys Pearl Grant)。这是你们的时代。



《美德与罪恶》电影剧照,20世纪20年代

# 注 释

## 序 言

G. 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对 14 到 24 岁这个年龄段的定义出自于《青春期》(*Adolescence*) (伦敦:D. 阿普利顿公司,1992)一书的前言,第 18 页。接下来对“一个法治国家”和“事实”的引用同样出自这本书的前言,第 15、16 页。

约翰·列农(John Lennon)引用的“美国曾是一个大型的年轻人聚居地”出自《披头士文选》(*The Beatles Anthology*) (伦敦:卡赛尔公司,2000 年),“约翰·列农”第 10 页;迪克·海伯蒂(Dick Hebdige)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伦敦:马谏恩,1979)。关于国王大街 430 号店铺的细节参见约翰·萨维奇(John Savage)的《英格兰的白日梦:混乱、性手枪、朋克摇滚和超越》(*England's Dreaming: Anarchy, Sex Punk Rock, and Beyond*) (伦敦:费博费博出版社,1991),第一章 5-8 页、14 页、20 页。请参见简·茂威(Jane Mulvagh)所著的《薇薇恩·韦斯特伍德:过时的一生》(*Vivienne Westwood: An Unfashionable Life*) (伦敦:哈勃·克里恩,1998),第三章,“顽皮的零售商”(“Prankster Retailing”)和第四章“侧翻事故”(“Cartwheeling to Casualty”)。

J. M. 格林伍德(J. M. Greenwood)对《青春期》一书的评论刊登在 1905 年 4 月这一期的《教育评论》(*Educational Review*) 342 页 - 364 页上,题为“霍尔主席对《青春期》的贡献”(“President Hall's Work on Adolescence”)(此文在《G. 斯坦利·霍尔文集》(*Collected Papers of G. Stanley Hall*) (马萨诸塞州渥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罗伯特·哈钦斯·高德图书馆)中被再次收录)。

## 第一章 天堂和地狱

玛丽·巴什基尔森日记里的摘要部分出自最新的英文译本:菲利斯·霍华德·科恩伯格

(Phyllis Howard Kernberger)以及凯瑟琳·科恩伯格(Katherine Kernberger)的《我是一本最有趣的书》(*I Am the Most Interesting Book of All*) (克罗尼克出版社,1997)。书中复制了玛丽母亲在原版中的所有剪影。第一卷完成于1876年5月。其他信息来自于道莫尔·克里斯顿(Dormer Creston)的《年轻人的喷泉:玛丽·巴什基尔森的一生》(*Fountains of Youth: The Life of Marie Bashirtseff*) (纽约:多顿出版社1937),包括玛丽与基德·莫泊桑通信的细节。

在最近几年里,玛丽·巴什基尔森已经变成了一个男女平等主义的象征而且许多与她相关的检索都是与这个方向相关的。<http://perso.wanadoo.fr/marie.bashkirtseff/IGREAT%20BRITAIN.htm> 提供了比较全面的生平信息,其中包括卡比·哈特曼(Kabi Hartman)的文章。这篇法语文章有两个英译本:1887年法国编辑的马斯尔德·布林德(Mathilde Blind)(1887)英文版和玛丽·J.塞拉诺(Mary J. Serrano)的英文版(1891)。该网址还提供了威廉·格兰斯通(William Gladstone)1889年的评论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玛丽·巴什基尔森的许多照片被毁坏,但是在[www.geocities.com/mbashkirtseff](http://www.geocities.com/mbashkirtseff) 上的网上美术馆中可以找到复制品,这些展品中包括《会面》(*Un meeting*),《妇女在圣墓》(*Les saintes femmes au tombeau*)。玛丽也是电影《算命人得到好报酬》(*the Fortune-teller Gets a Good Billing*)的原型,这部奥地利电影由亨利·考斯特(Henry Koster)导演在德国拍摄。1999年一部叫做《短暂的烛光》(*Brief Candle*)的英国戏剧将她的--生再现给那些漠不关心的评论界。

G.斯坦利·霍尔的《青春期》(纽约:D.阿普利顿公司,1904)一书包括玛丽日记的详细介绍。他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卢梭的《忏悔论》的女性版本,但从另一些意义上说,它是一本心理学经典,描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智慧的心灵在青春期所经历的骚动。”他在书中还引用了爱达·乃力(Ada Negri)的《命运》(*Fate*)一书(波士顿,1898),其中包含了对玛丽的哥特式的赞美诗,“在她满是蠕虫的棺木里,她的头骨露齿而笑。”

斯坦利·霍尔也将杰西·波默罗伊(Jesse Pomeroy)作为优秀青年的一种类型:一个臭名昭著的青春期杀人犯,他将幼稚的欺凌演绎到一种很深的程度。约瑟夫·M.哈维(Joseph M. Hawes)在《城市社会中的孩子》(*Children in Urban Society*)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一书中使用杰西·波默罗伊的故事来介绍整本书的主题:青少年犯罪如何对19世纪的美国社会造成威胁,以及打击青少年犯罪现象的不同方法。该书涉及霍尔,隆布罗索,狄更斯和卡彭特,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有价值的书。

哈维斯也是波默罗伊与詹姆斯·T.菲尔德之间对话内容的来源(第七章,“莱格迪克和哈克费恩:青年犯罪和儿童文学”(“Ragged Dick and Huck Finn: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其他内容来自哈罗德·雪特(Harold Schechter)详尽深刻的《魔鬼:美国最年轻的连环杀人魔王的骇人故事》(*Fiend: The Shocking Story of America's Youngest serial killer*) (纽约,口袋书出版社,2000)。雪特将这个故事延续到波默罗伊死在狱中(1932年9月)。波默罗

伊也在凯利·卡尔(Caleb Carr)1994年的畅销书《精神病学医生》(*The Alienist*)中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出现。

对19世纪70年代之前青年文学的全面讨论在这本书的主题之外,但是下面的内容是非常有用的。诺曼·凯尔(Norman Kiell)在《青年人的普遍经验》(*The Universal Experience of Adolescence*)(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4)一书中引用其他文章并罗列出所引文章的作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玛丽·巴什基尔森(Marie Bashkirsteff)、歌德(Goethe)、西蒙娜·德·比弗(Simone de Beauvoir)和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这些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青春期案例,这些案例不仅涉及生理方面,也涉及文化状况。

许多书都以年轻和浪漫为主题,但是我仅将参考范围局限在以下几本中。我参考了1911年巴巴拉·福克斯(Barbara Foxey)翻译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爱弥儿》(*Emile*)(伦敦:普通人出版社再版,1993年)以及1989年企鹅出版社出版的由迈克尔·哈尔斯(Michael Hulse)翻译的歌德的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这两本书都介绍了丰富的信息,而后者仍然是青年文化的创始性文献,其中的某些部分读起来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理查德·福尔摩斯(Richard Holmes)的《科尔里奇:早期观点》(*Coleridge: Early Vision*)(伦敦:霍德斯托顿出版社,1989)认为浪漫主义诗歌与1780年那个动乱的时期相关。科尔里奇受到美国《独立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启发,同时他又是推崇浪漫主义青春观的先锋。玛丽·雪莉(Mary Shelley)的作品《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伦敦:企鹅出版社,1985)可以被看作是一部讲述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著作,其中描述了青春期所承受的压力。

《年轻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Young People*)(共两卷)由乔万尼·李维(Giovanni Levi)和简-克劳德·施密特(Jean-Claude Schmitt)编辑(波士顿:哈佛大学出版社,1997),包括了大量的信息。在第二卷中,密歇尔·佩罗特(Michelle Perrot)的“工作的青年人:来自工厂车间”(“Worker Youth: From the Workshop from the Factory”)(第十四章)在改变19世纪工作和社会方式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塞尔吉奥·鲁查托(Sergio Luzzato)写的“青年叛徒和革命者,1789—1917”(“Young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1789—1917”)(第六章)是对自法国大革命、法国宪章运动、巴黎公社运动、虚无主义运动中青年人革命活动的总结。

罗伯特·巴尔迪克(Robert Baldick)的作品《第一个波希米亚人:亨利·穆戈的一生》(*The First Bohemian: The Life of Heri Muger*)(伦敦:哈密士海密顿出版社,1961)讲述的是一个不断挣扎的法国作家的故事,他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变成20世纪中叶的畅销书。虽然经历了很多困难,这个不断抗争的作家终于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天鹅。巴尔迪克观察到在穆戈去世前10年,他开始崇尚物质,并背离了波希米亚的生活方式,轻视那些仍然保持清贫并不属于名誉的作家和艺术家。

对于那些想要继续挖掘其中深意的人,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公民:法国革命的慢

性病》(*Citizen: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伦敦: 企鹅出版社, 1989) 是一本 900 页的权威著作。副标题是《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1)时期的俄国革命者》(*Russian Radica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the Reign of Alexander II(1855—1881)*)。罗纳德·亨格力(Ronald Hingley)的《虚无主义者》(*The Nihilists*) (伦敦: 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 1967) 简短地记述了一群年轻人成功谋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于那些想要寻找虚幻的恐怖主义根源, 想要了解 19 世纪中期革命组织的研究者, 这些都能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

开罗·切斯尼(Kellow Chesney)的《维多利亚的下层社会》(*The Victorian Underworld*) (伦敦: 鹈鹕出版社, 1972) 对那些想要了解 19 世纪城市无限扩张所产生的灾难性影响的人来说可谓标准范本。如“骗子、拦路抢劫者、无知暴民”这一章讨论了狄更斯小说背后的青年现实主义。最后, 迈克尔·D·比地斯(Michael D Biddiss)的《大众时代: 自 1870 年以来欧洲的思想和社会》(*The Age of the Masses: Idea and Society in Europe Since 1870*) (纽约: 哈波克劳夫, 1977) 探讨了 19 世纪后期 20 世纪前期欧洲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

## 第二章 民族主义者和颓废派艺术家

青年人的问题在 W. L. C. 冯·格尔茨(W. L. C. von der Goltz)的《全民武装》(*The Nation in Arm*) (伦敦: 霍德斯托顿出版社, 1906) 一书中占据了一小部分的篇幅。书中的“国家的力量依托于该国的青年人”用来修饰朋克用品商店“男孩”(帝王路, 伦敦, 1997), 在这个商店里人们把这句话作为纳粹主义者的语录广泛引用。事实上, 冯·格尔茨的书在英国和德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曾经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19 世纪 90 年代出版过两次, 在英国的影响没有因为德国理论家指出英国的政策缺陷而受到任何影响。

书中介绍了大量有关 19 世纪英国公立学校的资料。布莱恩·西蒙(Brian Simon)和伊恩·布拉德利(Ian Bradley)的《维多利亚公立学校》(*The Victorian Public School*) (伦敦: 吉尔和麦克·米伦公司, 1975) 包含来自不同作者的 11 篇论文。其中特别有用的是帕特里·克斯科特(Patrick Scott)的《学校和小说: 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The school and the Novel: Tom Brown's Schooldays”)、诺曼·万斯(Norman Vance)的《男子气概》(“The Ideal of Manliness”)和杰弗里·百思特(Geoffrey Best)的《军事主义和维多利亚公立学校》(“Militarism and the Victorian Public School”)。更多关于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的教育改革, 参见 J. B. 霍普·辛普森(J. B. Hope Simpson)的《阿诺德的橄榄球》(*Rugby Since Arnold*) (伦敦: 麦克·米伦公司, 1967)。

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作品《汤姆·布朗求学记》(*Tom brown's Schooldays*) (1857) 取得成功之后, 描写公立学校的小说就变成了一类题材狭窄但影响巨大的文学作品类型, 这类作品包括迪安·法勒(Dean Farrar)的作品《埃里克, 或渐渐地》(*Eric, Or Little by Little*) (1858)、卢迪亚德·基普林斯(Rudyard Kipling)的《斯道奇公司》(*Stalky & Co.*) (1899) 和 H.

A. 瓦切尔(H. A. Vachell)1906年的作品《山》(*The Hill*)。在19和20世纪之交,像法勒一样具有牧师般虔诚态度的人被吉卜林小说中描述的那种人代替。这使得征兵变得非常必要,而不是要求建立推崇力量的基督教。

在这一时期,约翰·R. 吉利斯(John R. Gillis)的《年轻和历史:欧洲关系时代的传统和改变1770年—现在》(*Youth and History: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European Age Relations 1770-present*)一书试图定义和控制青年人(伦敦和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万诺维奇,1974)。第三章,“男孩就是男孩:青春期的发现1870—1900”(“Boys Will Be Boys: Discovery of Adolescence 1870—1900”),涵盖了公立学校体制、德国健身房和少年队。

约翰·斯普林霍尔(John Springhall)的经典作品《青年、帝国和社会:英国青年运动,1883—1940》(*Youth, Empire and Society: British Youth Movements, 1883—1940*)(伦敦:克鲁姆·海尔姆,1977)包含了少年队以及许多与童子军有关的宗教团体的详细信息。宗教与入伍前的准备工作之间的联系是很清楚的。1887年,少年队的创始人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这样讲述:“通过把基督教和男孩眼中最高贵最有男子气概的事情结合起来,他们就不会认为基督教与怯懦和软弱有关。”

兰波的形象曾出现在几代作家的作品中,每一位作家都试图重铸一个那个时代变幻无常的青年人。其中包括:《兰波:男孩和诗》(*Rimbaud: The Boy and the Poet*),作者埃杰尔·里克伍德(Edgell Rickword)(纽约/伦敦:诺普,1924);伊丽莎白·汉森(Elisabeth Hanson)的作品《我可怜的亚瑟》(*My Poor Arthur*)(伦敦:塞克尔沃伯格,1959);查尔斯·尼科尔(Charles Nichol)的作品《其他人:亚瑟·兰波在非洲1880—1891》(*Somebody Else: Arthur Rimbaud in Africa 1880—1891*)(伦敦:古典出版社,1998);以及格兰汉姆·罗布(Graham Robb)的《兰波》(*Rimbaud*)(伦敦:斗牛士出版社,2001)。虽然后来的传记里有更多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但上述这些书都是很值得推荐的。

格兰汉姆·罗布作品的目的显而易见。他要超越所有那些浪漫主义神话,在那些神话中兰波作为20世纪叛逆青年人的典范被神化了。就像他在引言中所说的,“对于许多读者,兰波诗歌的发现是有关青春期的事件中最重要”。然而,在了解了“诗人自己无情的嘲讽”后,罗布试图“允许兰波长成”。关于叙事诗,我引用了保罗·施密特(Paul Schmidt)的译本《保罗·史密特全集》(*Complete Works*)(伦敦:皮可达,1988)。

关于颓废派,由罗伯特·鲍迪克(Robert Baldick)翻译的乔利斯-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反自然》(*Against Nature*)(伦敦:企鹅书店,1959年)没有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詹姆斯·拉弗(James Laver)的自传《第一个堕落派》(*The First Decadent*)(伦敦:费博费博出版社,1954年)考察了于斯曼的灵感——艾德加·艾伦·坡(Edgar Allan Poe)、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兰波、埃德蒙·德·龚古尔(Edmond de Goncourt)以及其他颓废主义者,如第一个嬉皮士乔瑟夫·埃梅·“萨尔”·派拉登(Joseph Aimé“Sar”Péladan),他蓄着一头

长发、通晓神秘咒语,曾经“发誓交出物质主义世界的灵魂。”

正当大家关注视觉艺术时,菲利普·朱利安(Philippe Jullian)的《颓废的空想者:19世纪90年代的符号画家》(*Dreamers of Decadence: Symbolist Painters of the 1890's*)(纽约和伦敦:布莱杰尔出版社,1971)一书中包含了许多重要资料,展示了19世纪晚期的美学。它复制了许多画家笔下难忘的形象,比如乔治·洛彻格罗斯(Georges Rochegrosse)的《巴比伦的最后几天》(*Les derniers jours de Babylone*)(原画遗失,现在只剩此副本)。同时,“来自伪兰波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稿件”正是出自此书。

由于主题的需要,朱利安的书以114句反映世纪末动荡的引语结束。其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句来自1980年的《堕落》杂志:“未来属于堕落主义。堕落主义者们生于消沉的叔本华文明之中,他们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他们的任务不是发现而是毁灭,推翻旧秩序,为20世纪伟大的民族文学做好初期的准备。”

其他提到的作品:罗杰·山图克(Roger Shattuck)的《盛宴年间:起源于1885年和一战间的法国先锋派》(*The Banquet Years: The Origins of the Avant-Garde in France Between 1885 and World I*)(纽约:文特奇出版社,1968年)。理查德·基尔曼(Richard Gilman)的《堕落派:一个译名的奇怪历程》(*Decadence: The Strange Life of ad Epithet*)(伦敦:塞克和沃伯格出版社,1979年),它指出了19世纪末美学家乐意给自己所进行的活动冠以贬义的名称;关于启示录论者,见麦克·杰和迈克尔·尼夫编辑的《1900:一个世纪末的读者》(*1900: A Fin-de-Siecle Reader*)(伦敦:企鹅书店,1999)。

和兰波一样,王尔德也成为传记作家的宠儿。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的巨著《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伦敦:哈密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87年)是名副其实的维多利亚时代信息资料的大仓库,该书虽然聚焦于同性恋,但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删除的部分后来被尼尔·麦克肯纳(Neil McKenna)详细补充在《奥斯卡·王尔德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Oscar Wilde*)中(伦敦:阿罗出版社,2004年)。

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的《百年王尔德》(*The Wilde Century*)(伦敦:卡斯尔出版社,1994年)从19世纪社会主义、性别政治和维多利亚道德的角度讨论了王尔德,而伊莱恩·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的《性别混乱》(*Sexual Anarchy*)(伦敦:维拉格出版社,1992年)扩展了这一主题,把女性主义、阴阳人和当代对性疾病的恐惧包含在内。H.蒙哥马利·海德(H. Montgomery Hyde)的《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The Trial of Oscar Wilde*)(伦敦:威廉霍奇出版社,1948年)对这三个案件作了一个极为详尽的记录,而迈克尔·S.福尔德(Michael S. Foldy)的《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The Trials of Oscar Wilde*)(纽黑文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7年)详细描述了1895年春天的危机。

“星星——孩子”(“The Star-Child”)、《道雷格林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和“年轻人的词语和哲学”(“Phra-

ses and Philosophies for the Use of the Young”)都收录在《奥斯卡·王尔德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中,由维维安·霍兰德(Vyvyan Holland)作序(伦敦:克林出版社,1990年)。奥布雷·比斯特雷(Aubrey Beardsley)“激进的清教主义”引自斯坦利·温特劳(Stanley Weintraub)的传记《比斯特雷》(*Beardsley*) (伦敦:鹈鹕出版社,1972年)。如要了解英国首都19世纪末的唯美主义,包括审判地、咖啡馆、妓院等,见安东尼·克雷顿(Antony Clayton)的《堕落的伦敦》(*Decadent London*) (伦敦:历史出版社,2005年)。

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流行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伦敦:非舍安文出版社,1896年)在当年轰动一时。它仍然具有预言性。迈克思·诺道(Max Nordau)的《退化》(*Degeneration*)选自其1895年译本的重印本(内布拉斯加:比森书局,1993年),书中有乔治·L·莫斯(George L. Mosse)所作的很有启发的序言。诺道史诗般的议论文是“对堕落风气最引人注意的抨击,这种堕落风气似乎已经吞没了几代人。”魏德金(Wedekind)的《春之觉醒》(*Spring Awakening*) (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90年,埃德华·邦德译,)就反映了这种堕落风气。

阿尔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的演讲在赛乔·陆查托(Sergio Luzzato)的“青年反叛者和革命者,1789—1917”(“Young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1789—1917”)中被提及:陆查托将它放在1789年革命的平民主义大背景中。约翰·诺依博尔(John Neubauer)的小说《青春世纪末文化》(*The Fin-de-Siecle Culture of Adolescence*) (新港口和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对于世纪之交欧洲文化对青年人具有惊人吸引力的记录非常有价值:它着重讨论了《春之觉醒》和莫里斯·巴利斯(Maurice Barrés)的《背井离乡》(*Les Déracinés*)三部曲。

《生命的火炬》(“*Vitai Lampada*”)出现在众多描写一战文化历史的著作中,例如:莫德里斯·艾克斯坦(Modris Eksteins)的《春之祭》(*The Rites of Spring*) (伦敦:和天鹅出版社,1900)——第三章,“在弗兰德斯”。在《想象出来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伦敦:博德利·黑德出版公司,1990)一书中,塞缪尔·海因斯谈到纽博尔特在英国时写下并发表了第一首关于战争的诗歌——“警戒”(The Vigil)。关于原版的苏丹对话,见《我所处时代的世界:亨利·纽博尔特的回忆录》(*My World as in My Time: Memoirs of Henry Newbolt*) (伦敦:费博和费博出版社,1932)。但是在这本三百页的书中,纽博尔特并未提及他最著名的诗歌。

### 第三章 流氓和阿帕切

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纽约和伦敦:企鹅书店,1977年)的最新再版中有鲁克·桑提(Luc Sante)写的序言。里斯对《蒙哥马利警卫》的描写出自第十九章《稗子的丰收》。赫伯特·阿斯伯里的《纽约黑帮》(Herbert Asbury, *The Gangs of New York*) (纽约:模范书屋,1990)第一版发行于1927年,那时书中所描写的那些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它的描述既详尽又直接。鲁克·桑提(Luc Sante)的《下等人生:旧纽约的诱

惑和陷阱》(*Low Life: Lure and Snares of Old New York*) (纽约:法拉尔、施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 1991)以20世纪晚期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这些丰富的材料,书中包含了许多想法和有趣的故事。

正如杰恩·安·菲利普(Jayne Ann Phillips)所写到的,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的《街头女郎梅姬》(*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是“一场无情的爆炸”:鲍威利的语言、花朵般短暂青春的毁灭、疯狂的大都市中闻所未闻的富有与残酷甚至致命的贫穷并存。这个故事让人震撼,克雷恩用了5年才以一种低调的方式将其出版。普通简装版也已经问世(纽约:勇猛出版社,1986),恢复了克雷恩1891年的手稿。

狄奥多拉·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 (纽约:勇猛出版社, 1992,由E. L.道可特罗作序)享有很好的声誉,生动而又发人深省。1889年,嘉里·米宝搬到了迅速扩张的芝加哥,她象征着一个发展中的新大陆和人民:“这个城市有着望不到尽头的街道和下水道,或许,一幢单独的房子孤零零地矗立在那里——成为某种流行的先锋。有些地区虽然是暴露在风雨中,但是仍旧彻夜灯火通明,一长串的汽灯点亮着黑夜,在风中摆动。”

布雷克·麦克凯威(Blake McKelvey)的《美国的城市化1860—1915》(*The Urbanization of America 1860 - 1915*) (新泽西州拉特格斯大学,1963年)对美国的城市发展进行了调查。迈克尔·里希(Michael Lesy)值得注意的《威斯康星州死亡之旅》(*Wisconsin Death Trip*) (潘西奥,纽约,1977)描写了这场迁徙的情形:“人们离开田地来到城市,不是为了得到工作,而是为了逃离工作;不是为了劳动,而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当主人,而是为了被奴役。人们沿着黄色砖板路走向翡翠城,期待那里有一个巫师统治者,这个巫师能使他们从此过上长生不老的快乐生活。”简·亚当斯(Jane Addams)在《青年精神和城市街道》(*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 (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12)中收录了她在赫尔大厦新建区工作时的印象以及做出的结论。更多关于19世纪90年代美国生活和政治——包括西奥多·罗斯福的掌权和西班牙—美国战役,见H. W.布兰兹(H. W. Brands)的《鲁莽的十年》(*The Reckless Decade*) (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1995)。关于美国高校体育运动的重要性,见E. 安东尼·罗图多的《美国男子汉》(*E. Anthony Rotundo, American Manhood*) (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3)的第十章,“热烈的男子汉:一个变化的男子气标准”。

W.道格拉斯·莫里森(W. Douglas Morrison)的《少年犯》(*Juvenile Offenders*) (纽约:D.阿普尔顿公司,1898)是对当时这个迫切问题所做思考的概述。杰弗里·皮尔森(Geoffrey Pearson)的开创性作品《不良少年:一段相当恐怖的历史》(*Hooligan: A History of Respectable Fears*)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3)对于那些想研究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不良少年以及政府对少年犯罪态度的人来说,是必读书目:第四章,“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第五章,“维多利亚时代男孩,我们在这儿!”皮尔森的资料注释和例证非常详尽有用。

斯蒂芬·汉弗莱斯(Stephen Humphries)的《不良少年还是反叛者?》(*Hooligans or Rebels?*) (牛津:巴兹尔·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1)包括了关于不良少年丑闻和斗殴少年的重要口述证

据和其他材料。《胡力根之夜》(*Hooligan Nights*) 70年代末再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由本尼·格林(Benny Green)作序,序言中包括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克拉伦斯·卢克的简单传记。另外一部关于19世纪末少年犯罪的经典之作,见威廉·派特·里基(William Pett Ridge)的《莫德·埃米里》(*Mord Em'ly*)(伦敦:罗宾克拉克出版社,1992),它是一个女性版阿尔夫的故事。

E. S. 特纳(E. S. Turner)的《男孩永远是男孩》(*Boys Will Be Boys*)(伦敦:迈克尔·乔瑟夫,1948)的副标题是“马病托德、朽木迪克、教堂司事布雷克、比利·巴顿等人的故事”。它还为青年杂志一个世纪来的情况做了很有意思的简介。特纳的文章在狂热爱好和娱乐评论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有关19世纪80、90年代连环画的更多细节,见《企鹅连环画书店》(*The Penguin Book of Comics*),乔治·派瑞和阿兰·奥尔德里奇(George Perry and Alan Aldridge)著,(伦敦:企鹅书店,1967),书中整版复制的《艾利·斯落泼的半个假期》(*Ally sloper's Half Holiday*)、《连环画刻板》(*Comic cuts*)、《丹·里诺的连环画日记》(*Dan Leno's Comic Journal*)和《薯条》(*Chips*)。

阿帕切的历史见克劳德·迪布瓦(Claude Dubois)的《巴黎暴徒:巴黎的流氓、皮条客和骗子》(*Paris gangster: Mecs, macs et Micmacs du milieu Parisien*)(巴黎:帕里格兰姆编辑部,2004),该书内容有趣,例证丰富。曼达和莱卡之间战斗高潮的设计——以报纸为舞台——尤为有趣。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对阿帕切细致的描述引自她收在《西方青年人历史》(*A History of Young People*)第二卷中的文章《青年工人:从作坊到工厂》(“Worker Youth: From the Workshop to the Factory”)。

#### 第四章 忽见天堂

作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1893年博览会创造了出版业。罗纳德·米尔斯(Ronald Miller)的《世纪之城:芝加哥史诗和成就美国》(*City of the Century: The Epic of Chicago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公司,1997)讲述了19世纪90年代的新型城市和它展示的博览会的故事。阿诺德·刘易斯(Arnold Lewis)的《初遇明天:欧洲国家、芝加哥市区、和世纪哥伦比亚博览会》(*An Early Encounter with Tomorrow: Europeans, Chicago's Loop, and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7)重点讨论的是作为未来大都市的芝加哥以及欧洲对此所做的反应。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资料引自她的自传:《生活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Life*)(波士顿:多佛出版社,1997)。她在书中写道:“这三周来我都在这个博览会里度过,我的兴趣从对童话和玩具的喜爱转向了对真实世界的欣赏。”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的语录出自《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自传》(*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An Autobiography*)(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61)。更多关于博览会的细节,见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提供的地图和照片,网址:<http://xroads.virginia.edu/~MA96/WCE/introduction.html>。

从女性角度来看博览会,请参阅伊达·B. 威尔斯(Ida B. Wells)、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欧文·嘉兰·佩恩(Irvine Garland Penn)和费迪南·L.巴内特(Ferdinand L. Barnett)的《混血美国人不属于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的原因》(*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9,1893初版)。对当时阴暗面的探索,见艾里克·拉森(Erik Larsen)的《白色城市里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 (纽约:兰登书屋,2003)。书中用大谋杀犯H.H.霍姆斯和童话故事进行对比,前者专门伤害成千上万飞蛾扑火般被芝加哥吸引的民众。

在那些来访者中,有斯坦利·霍尔、斯各特·乔普林和L.弗兰克·鲍姆。关于博览会如何影响鲍姆和W.W.丹斯洛的细节,见迈克尔·海恩(Michael Hearn)的权威著作《绿野仙踪的注解》(*The Annotated Wizard of Oz*) (纽约:W.W.诺顿出版社,2000)。鲍姆对通神论的兴趣发表在1890年1月25日的《阿伯丁星期六先锋报》(*Aberdeen Saturday Pioneer*)——迈克尔·海恩略作改动。我还提到了美国发行的第二版《新绿野仙踪》(*The New Wizard of Oz*) (印第安纳波利斯:伯斯梅里尔,1903)。

西蒙·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最新英国版本(伦敦:企鹅书店,1991年)中包括了弗洛伊德的生平概述、詹姆斯·斯特雷奇的阐释以及弗洛伊德自己为以前每个版本做的序。虽然很长,但是它是一个集大成的著作。默顿·亨特(Morton Hunt)的《心理学故事》(*The Story of Psychology*) (纽约:道布尔戴出版社,1993)可能会提供有用的背景资料。如果想了解更多资料,伦敦有一个很不错的弗洛伊德博物馆,可联系 [freud@gn.apc.org](mailto:freud@gn.apc.org)。

索尔斯坦·维布伦(Thorsten Veblen)最具讽刺性的作品《享乐阶级理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伦敦:企鹅书店,1989)应被奉为经典。《消费文化:美国1880—1980这段时期的批评论文》(*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1880—1980*) (纽约:帕森出版社,1983),由理查德·怀特曼(Richard Wightman)和T.J.杰克森·里尔斯(T.J. Jackson Lears)编辑。它包括两篇重要的论文:杰克森·里尔斯(Jackson Lears)的《从拯救到自我实现:广告和消费文化的根治1880—1930》(*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 Advertising and the Therapeutic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1880—1930*)和克里斯托弗·P.威尔森(Christopher P. Wilson)的《消费修辞学:大众市场杂志和有教养的读者的消亡,1880—1920》(*The Rhetoric of Consumption: Mass-Market Magazines and the Demise of the Gentle Reader, 1880—1920*)。

关于专利药品蛇油等产品,参阅杰拉尔德·卡森(Gerald Carson)有趣而且举例丰富的《一个给人,两个给马》(*One for Man, Two for horse*) (纽约:布拉霍尔豪斯出版社,1961)。由斯坦利·C.霍兰德(Stanley C. Holland)和理查德·日尔曼(Richard Germain)所著《百事可乐发明前就有百事一代了吗?》(*Was There a Pepsi Generation Before Pepsi Discovered It?*) (芝加哥:NTC商务书局,1993)。它提供了一个“以年轻人为基础的市场细分”概述。第二章“年轻人市场的历史,1880—1940”尤为有用。更多的资料,见理查德·S.特德洛(Richard S. Tedlow)的《美国大众市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Mass Marketing in America*) (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90)。

查尔斯·金对商业圈的描写非常值得一看,引自阿诺德·刘易斯:《初遇明犬:欧洲人、芝加哥商业圈和世界哥伦比亚博览会》(*An Early Encounter with Tomorrow: Europeans, Chicago's Loop, and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在《嘉莉妹妹》一书中,嘉莉·米贝去芝加哥的一家百货公司求职,百货公司的规模令她目不暇接,而“时髦女孩”和“女店员”的态度也令她晕眩了:她心里妒火中烧。她模糊地意识到这个城市拥有多少东西——财富、时尚、休闲——为女人提供所有装饰品。

有大量关于美国流行音乐的资料储备。尼科拉斯·E.塔瓦(Nicholas E. Tawa)的《锡盘街的路:1866-1910的美国流行歌曲》(*The Way to Tin Pan Alley: American Popular Song 1866—1910*)(纽约:席尔默音乐出版社,1991)。这本书是总结这种真正大众化音乐形式发展历程的重要历史文献,考察了早期美国音乐工业的体制以及这个巨大市场背后的情感、欲望和恐惧。“坚定而自信的、争强好胜的民主精神”的引言和查尔斯·K.哈里斯的营销技巧均出自《流行歌曲的出版商》的第三章。

伊恩·惠特科姆(Ian Whitcomb)的经典之作《舞会之后:从拉格泰姆爵士到摇滚乐》(*After the Ball: Pop Music from Rag to Rock*)(伦敦:企鹅书店,1973),这是一本关于流行音乐的介绍性著作,非常具有可读性。那些在看了这本书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听同名双碟装唱片专辑,该专辑1972年由EMI唱片公司发行。更多有关当时音乐工业的细节和相关软件的形式,请参见拉塞尔·桑耶克(Russell Sanjek)和大卫·桑耶克(David Sanjek)的《美国20世纪的流行音乐产业》(*American Popular Music Business in the Twentieth*)(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斯科特·乔普林作为音乐先驱,在他的时代和国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但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他受到了广泛的关注。1970年,音乐家约书亚·里夫金(Joshua Rifkin)发行了畅销加长专辑《司各特·乔普林的格泰姆钢琴曲》(*Piano Rags by Scott Joplin*)。几年以后,他举办了第一次乔普林全部作品音乐会“特莫尼莎”(Treemonisha),其中的故事情节——在美国黑人社会战胜迷信同一年在史蒂夫·旺德的排行榜歌曲《迷信》中再次得到表现。1973年,一首名为《表演者》(“The Entertainer”)的乔普林式拉格泰姆音乐被乔治·洛伊·希尔(George Roy Hill)用作他的电影《刺激》(*The Sting*)的主题曲。

这个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大获成功让乔普林式拉格泰姆爵士乐更加流行。一些学术著作,例如彼得·贾蒙(Peter Gammond)的《斯科特·乔普林和拉格泰姆爵士乐时代》(*Scott Joplin and the Ragtime Era*)(伦敦:阿巴克斯出版社,1975)和爱德华·A.柏林(Edward A. Berlin)的《拉格泰姆王:斯科特·乔普林和他的时代》(*King of Ragtime: Scott Joplin and His Er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该音乐潮流复兴的产物。关于乔普琳在白色晚会上演奏的引文出自柏林的著作(第七章,“荣誉嘉宾”)。关于对拉格泰姆异常兴奋的反应,见柏林《拉格泰姆作曲家之王,1901—1902》的第六章。

鲁迪·布莱士(Rudi Blesh)和哈里特·珍妮丝(Harriet Janis)所著的《他们都演奏拉格泰

姆》(*They All Played Ragtime*) (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50)。这本书曾经一度许多年被用作标准课文,现在仍然是人们查找相关信息的宝库。同样地,尽管鲁迪·布莱士《华丽的小号:一段爵士乐的历史》(*Shining Trumpets: The History of Jazz*) (伦敦:卡塞尔公司,1955)的重要性已取代,而且白人爵士音乐家仍然备受争议,但该书仍不失为开创性的文献。布莱士非常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他能开展这个研究,后来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都从中获益。

关于新奥尔良一些音乐家的故事,唐纳德·M. 马奎斯(Donald M. Marquis)的《巴迪·博登的研究:爵士乐第一人》(*In Search of Buddy Bolden: First Man of Jazz*) (新奥尔良:路易斯安那州大学出版社,1978)讲述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爵士乐先锋短暂而悲伤的故事,1907年他被精神病医院隔离。博登的成名曲叫《臭屁》("Funky Butt")。詹姆斯·林肯·柯里尔(James Lincoln Collier)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 (伦敦:迈克尔乔瑟夫出版社,1984)对背景作了完全出色的介绍,他称新奥尔良为“即时行乐哲学”(philosophy of carpe diem)。

两本自传:一本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的《小号手:我在新奥尔良的生活》(*Satchmo: My Life in New Orleans*) (伦敦:阿斯书局,1957),1999年牛津大学的版本中补充了更新资料,包括了他最原始的手稿。第二本是艾伦·洛马克斯(Alan Lomax)的《杰里·罗尔先生》(*Mister Jelly Roll*)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是由1938年杰里·罗尔·默顿赠给国会图书馆的许多访谈资料编辑而来的。爵士乐历史学家对默顿的一些主张表示质疑,但是这本书引人入胜,尤其是青年人的旅行部分。

有关移民的统计数据引自布雷克·迈克凯维(Blake McKelvey)的《美国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America*),亚当斯的引言出自《青年精神和城市街道》(*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阿斯伯里(Asbury)的《纽约黑帮》(*The Gangs of New York*)第十二章《黑帮王国》里有关于“哈得逊街黑帮”(Hudson Dusters)的描述。而桑迪(Sante)的《下等人生》(*Low Life*)中有关于“哭丧者威力”(Willie the Weeper)的全面介绍。理查德·达文波特-海恩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的《遗忘的追求:全球麻醉史 1500—2000》(*The Pursuit of Oblivion: A Global History of Narcotics 1500—2000*) (伦敦:威登菲特和尼克逊出版社)第六章“堕落”详细讲述了19世纪末美国毒品的使用——包括来诺的花粉热的描述。

对于美国的波西米亚风气,见菲利普·林达森(Philip Lindsay)的《疯狂的人:埃德加·艾伦·坡的肖像》(*The Haunted Man: A Portrait of Edgar Allan Poe*) (伦敦:哈钦森出版社,1953)和杰弗里·迈耶(Jeffrey Meyers)的《埃德加·艾伦·坡的人生和传奇》(*Edgar Allan Poe: His Life and Legacy*) (伦敦:约翰默里出版社,1992)。关于杰拉尔德·杜·毛瑞埃(Gerald du Maurier)《特里碧》(*Trilby*) (伦敦,每人出版社,1994)。它对美国的影响见桑迪的《下等人生》以及艾伦·丘吉尔(Allen Churchill)的《不合时宜的波西米亚风》(*The improper Bohemians*) (伦敦:卡塞尔出版社,1961)第一章。后者包括了乔治·斯特林在1904年给波西米亚下的定义:“年轻、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激进、非传统”。

## 第五章 美国世纪

乔瑟夫·霍斯(Joseph Hawes)在他的著作《城市社会的孩子:19世纪美国的少年犯》(*Children in Urban Society: Juvenile Delinquenc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中,用两章的篇幅(第10章和第12章)来描写少年犯法庭。霍斯也是后面W. T. 斯特德的引用来源,引自他1894年在风城关于堕落(心理上的、生理上的和政治上的)的小册子《如果基督来芝加哥》(*If Christ Came to Chicago*)。简·亚当斯关于“被带上少年法庭的小女孩”的评论引自《新正义感和古老魔鬼》(*A New Conscience and an Ancient Evil*)(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12)。

斯坦利·霍尔的《青春期》第一次出版于1904年,由纽约的D. 阿普尔顿公司发行,我用的是1920年的再版。他的论文被保存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博物馆。尽管他关于《青春期》的写作素材已经丢失,但是博物馆却有大量装订好的卷宗,它们包括了霍尔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几乎所有主要文章。这些很好地展示了他思想变化的进程。

我能找到的早期关于青春期的定义来自上文所提到的霍尔论文集的第七卷第118条:1898年7月5日,给美国教育机构致辞的摘要。另外一套相似的定义是童年12月底在加利福尼亚的圣罗莎做出的(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八卷,第122条),在这里他将青春期这种状态和美国这个民族进行对比。1896年2月的波士顿演讲“研究灵魂的现代方式”(“Modern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the Soul”)(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七卷,第102条)列举了这些观念的萌芽:这里霍尔把青春期描述为“一种身体再生”。

霍尔与隆布罗索以及威廉·詹姆斯的关系,见霍斯的《城市社会的孩子》和亨特的《心理学故事》。“灵魂革命的研究”(“The study of the soul evolution”)引自霍尔关于儿童研究运动的记录——1894年12月发表于《教育日报》的《实用儿童研究》(“Practical Child Study”)(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六卷,第93条)。霍尔的全部生活和思想,包括亨利·德拉蒙特对他的影响,都载于桃乐茜·罗斯(Dorothy Ross)的权威传记《G. 斯坦利·霍尔:预言家式的心理学家》(*G. Stanley Hall: The Psychologist as Prophet*)(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2)。

“每个孩子都是野人”引自《实用儿童研究》。霍尔对玛丽·巴什基尔森的看法收录于《青春期》第一卷第八章“文学、传记和历史中的青少年”(“Adolescence in Literature, Biography and History”)。“早期记忆的记录”(“Note on Early Memories”)写于1899年12月,见霍尔的论文集第8卷,第135条。“谁拥有历史”引自1895年11月的文章,名为“星期天学工教学法”(“Pedagogical Methods in Sunday School Work”)(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六卷,第100条)。青少年和美国之间的联系见《青春期》(“Adolescence”)(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八卷,第122条)。

霍尔在1898年名为“青春期启蒙”(“Initiations into Adolescence”)(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七卷,第119条)的演讲中宣布项目结束,其中也包含了“合成照片”的引言。霍尔在白城的回忆录,一个“靠近伍斯特的小型科尼岛”,引自A. E. 汉密尔顿1924年7月的《美国水星》。关

于14到24岁的年龄定义出现在《青春期》的序言中，“感情的年龄”和“性别显示权力”的引用也出自该书。

“神经病和神经衰弱症”引自《青春期》第四章“身体和精神的疾病”（“Diseases of Body and Mind”）。“我们为了生命的极点挨饿”出自《青春期》第十六章“智力的发展和教育”（“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在《青春期》的第五章“少年犯罪”（“Juvenile Crime”）中，霍尔提到杰西·波默罗伊，并引用雅各布·里斯的“在纽约东部”。他所说的“现代城市生活……对青年人来说是造作和不自然的”和“学生应该有懒惰的自由”均引自第十五章“社会本能和制度”。

霍尔对中学的评论出现在《青春期》第十四章“智力的发展和教育”中。“这是生命中最好的十年”写于序言。“客观养生法”和“文明指数”出自《青春期》第十三章“野人启蒙”（Savage Pubic Initiations）。《青春期》的销售额见1904年8月17日大卫·吉布斯的信件（G. 斯坦利·霍尔文集）。霍尔认为“青年需要休息”，他还认为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我们总有一天会吸引全世界的青年”，上述引言均出自《青春期》的序言。

## 第六章 彼得·潘和童子军

关于J. M. 巴里和李维林·戴维斯一家的关系出自安德鲁·伯金（Andrew Birkin）引人入胜的作品《J. M. 巴里和失踪的男孩》（*J. M. Barrie and the Lost Boys*）（伦敦：康斯太伯出版社，1979年）。关于彼得·李维林·戴维斯家庭历史的细节和《太平间》（*Morgue*）见第六章及注解。伯金认为《太平间》的内容太过悲伤从而促成了李维林·戴维斯1960年的自杀，那年他63岁。当时报纸上出现过一个大标题“巴里的彼得·潘死于地铁的车轮之下。”

彼得·李维林·戴维斯在1908年碰到高地士兵的记录出自《J. M. 巴里和失踪的男孩》的第十一章。我的整个彼得·潘的主要故事来源是《彼得·潘》（*Peter Pan*）或是《不愿长大的男孩》（*The Boy Who Would Not Grow Up*）（伦敦：霍德-斯图休顿公司，1928），其中包括了巴里的剧本和小说《彼得和温迪》（*Peter and Wendy*），书中配有F. D. 贝德福德（F. D. Bedford）的精彩插图。

《彼得·潘》的写作原因见《J. M. 巴里和失踪的男孩》第五章，达夫妮·杜·莫里耶和迈克尔·比尔博姆的反应包含在布鲁斯·K. 汉森（Bruce K. Hanson）的《彼得·潘编年史》中（*The Peter Pan Chronicles*）（纽约：伯奇雷恩出版社，1993），该书还包括了对原文很详细的注释。“太阳的孩子”（*Sonnenkinder*）的概念出自马丁·格林（Martin Green）的《太阳的孩子：1918年以后英国“颓废派”的故事》（*Children of the Sun: A Narrative of “Decadence” in England after 1918*）（纽约：达观出版社，1980）。

关于巴里戏剧的深远意义，参见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的《彼得·潘的个案》（*The Case of Peter Pan*）（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94）。她认为彼得·潘涉及了心理分析疗法、哑

剧和一个帝国的没落。关于潘神的神话和心理原型,见《潘神和噩梦》(*Pan and the Nightmare*) (春天出版社,1979),它包括了詹姆斯·希尔曼对威廉·亨利希·罗勒1900年关于潘的散文《厄菲阿尔特》所作的阐释。关于彼得·潘和两性人,见玛乔里·嘉宝(Marjorie Garber)的《得体的兴趣》(*Vested Interests*) (伦敦:企鹅书店,1993年)第七章“害怕飞行,或者为什么彼得·潘是女人?” (“Fear of Flying, or Why Peter Pan a Woman?”)

巴顿·鲍威尔对《彼得·潘》的崇拜在乔里·嘉宝的《得体的兴趣》第七章中有所提及。更多关于巴顿·鲍威尔的内容,参见皮尔斯·布莱顿(Piers Brendon)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名人》(*Eminent Edwardians*) (伦敦:皮姆利可出版社,1993年)。关于巴顿·鲍威尔作为一个“孩子式的男孩”的阐述,参见迈克尔·罗森塔尔(Michael Rosenthal)的《性格工厂:巴顿·鲍威尔的童子军和帝国的需要》(*The Character Factory: Baden-Powell's Boy Scouts and the Imperatives of Empire*) (纽约:潘西恩出版社,1986)的序言“濒危的岛屿”(The Imperiled Island)。巴顿·鲍威尔的军事生涯以及他在马弗京解围中的地位记录于第一章“童子军领袖”(The Chief Scout)。

关于帝国宣传和强硬外交政策示威运动,见H. E. 马歇尔(H. E. Marshall)的《我们帝国的故事:将给男孩和女孩》(*Our Empire Story: Told to Boys and Girls*) (伦敦:托马斯·纳尔逊和儿子们的公司,1908)、理查德·普里斯(Richard Price)的《一场帝国战争和英国工人阶级》(*An Imperial War and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 (伦敦:劳特利奇和开根·宝罗出版社,1972)、约翰·R. 吉利斯(John R. Gillis)的《青年和历史》(*Youth and History*)第三章“男孩永远是男孩”(Boys Will Be Boys);关于马弗京的庆祝活动和20世纪早期的公民骚乱——“马弗京”(“mafficking”),见杰弗里·皮尔森(Geoffrey Pearson)的第四章“流氓”(Hooligan)。关于入侵恐惧的细节,见E. S. 特纳的《男孩永远是男孩》第十一章“被入侵的英国”。

关于查尔斯·拉塞尔这些男孩专家以及19世纪初试图控制英国青年的资料,见约翰·R. 吉利斯《青年和历史》的第三章,以及迈克尔·罗森塔尔的《性格工厂》的第三章“工人阶级青年和公立学校典范”(“Working Class Lads and Public School Ideals”),这一章也提到了亨利·纽博尔特无处不在的“生命之光”。拉塞尔(Russell)珍贵的作品《曼彻斯特男孩:工作和玩耍中的曼彻斯特青年速写》(*Manchester Boy: Sketches of Manchester Lads at Work and Play*)第一次发行于1905年,1984年再版时原书的插图全部保留(尼尔理查森,曼彻斯特)。

1903年体力退化委员会的资料来自《性格工厂》第五章:巴顿·鲍威尔的伊顿公学声明在第二章“加固帝国的城墙”中被引用。这一章的事件一直讲到1908年“男孩的童子军活动”发表。我引用的是巴顿·鲍威尔后期的一个版本《男孩的童子军》。《磁石》(*Magnet*)杂志的创刊号在1965年由弗里特威出版社再版。关于《磁石》上的罗伯特·罗伯茨,见《典型的贫民窟》(*The Classic Slum*) (伦敦,鹈鹕出版社,1973年)第八章“文化”。

## 第七章 中学新生和工人来源

伦道夫·伯恩的引语出自玛西娅·雅各布森(Marcia Jacobson)的《再做一次男孩子:自传

和美国男孩手册》(*Being a Boy Again: Autobiography and the American Boy Book*) (塔斯卡卢萨:阿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96)第一章。该书是对青年文学的一个出色的总结,从托马斯·贝雷·奥尔德里奇到布思·塔金顿,中间还有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和斯蒂芬·克雷恩。伯恩是一个激进分子,行为放荡不羁,他反对美国参加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末,他死于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

美国的帝国野心和私有化在H. W. 布兰兹(H. W. Brands)的《不计后果的年代》(*The Reckless Decade*)第二章《我们相信摩根》和第八章《民主的帝国主义》中有所描述。弗兰克·德利普(Frank Vanderlip)引用了戴维·纳韶(David Nasaw)《学会秩序:公立学校在美国的一段社会历史》(*Schooled to Order: A Social History of Public School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的第八章。该书第六章是F. H. 布里格斯引文的来源,同时也为《年轻人的问题》一文的写作提供了资料。

斯坦利·霍尔引用的“这个问题在于”和“永远不使美国男孩”,见《尴尬的年龄》(*The Awkward Age*) (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17卷,第276条)。他还为威廉·拜伦·福布希《男孩的问题》(William Byron Forbush, *The Boy Problem*) (奥尔巴尼,纽约:安息日文学公司,1901)写了序言(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9卷,147条)。霍尔1906年的访谈吸引了伍斯特电台(Worcester Telegram)的注意(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15卷,234条)。关于《女性化的男孩们》见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16卷第260条。

关于反对童工运动,见戴维·纳韶(David Nasaw)的《学会秩序》(*Schooled to Order*)第七章“对未成年人的战争”、约翰·斯巴格(John Spargo)的《孩子们的痛哭》(*The Bitter Cry of the Children*) (纽约:四边形出版社,1968,沃尔特·I. 特拉提那作序)和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青年精神和城市街道》(*The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中学改革以及职业教育者与学者之间的冲突详见戴维·纳韶的《学会秩序》的第八章和第九章。

对欧文·金(Irving King)的引用来自《中学时代》(*The High School Age*) (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出版社,1914)。金在其序言中说,“对于家长和老师来说,没有任何年龄段的人可以比13到20岁的少男少女更加让人感兴趣同时又让人困惑。”H. 欧文·汉考克(H. Irving Hancock)的《中学新生》(*The High School Freshmen*) (费城:亨利奥特姆斯公司,1910)的副标题为《迪克和寇第一年的恶作剧和运动》(*Dick & Co.'s First Year Pranks and Sports*)。这是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

关于男孩作品更广泛的背景资料,欧尼斯特·汤普森·塞顿的《两个小野人》和约翰·T. 特罗布里奇的引文,详见玛西娅·雅各布森的《再做一次男孩》第一章。如果需要更多关于塞顿和美国童子军的资料,见迈克尔·罗森塔尔的《性格工厂》第二章。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引文,“一个参与者或合伙人”,引自他1916年的书《民主和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纳韶在《学会秩序》第六章中引述。

## 第八章 候鸟运动和新异教主义

雅克·拉维拉(Jacques Raverat)的信件出自保罗·德莱尼(Paul Delany)令人振奋的调查《新异教徒:鲁珀特·布鲁克和青年的考验》(*The Neo Pagans: Rupert Brooke and the Ordeal of Youth*)(纽约:自由出版社,1987)第五章“10岁到13岁”。卡伦·霍尔奈(Karen Horney)的日记记录见《卡伦·霍尔奈的青春日记》(*The Adolescent Diaries of Karen Horney*)(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0),如果需要更多资料,见鲁伯的《世纪末的青年文化》第七章“青春期心理分析”。

描写“候鸟运动”与其他一些德国青年运动的权威性英语专著当属沃尔特·Z.拉克(Walter Z. Laqueur)的《德国青年》(*Young Germany*)(伦敦:罗德里奇和开根·保罗出版社,1962)。虽然拥有宝贵的细节介绍,但它的内容却像其题目一样复杂和费解。鲁伯的《世纪末的青年文化》第十章“青年组织和运动”涵盖了许多有用的数据。关于腓特烈二世的故事和父子关系,以及霍尔德林的小说《许珀里翁》为什么流行的背景,见彼得·盖伊(Peter Gay)的《魏玛文化:局外人成为当事人》(*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纽约:哈伯和罗出版社,1968)。

关于阿斯科纳公社的具体情况,详见马丁·格林(Martin Green)的《真理之山:反主流文化始于阿斯科纳,1900—1920》(*Mountain of Truth: The Counterculture Begins Ascona, 1900—1920*)(汉诺威,新汉普郡:新英格兰大学出版社,1986)——一个著名的故事和一些惊人的照片,尤其是关于长发的平凡人(naturmensch)古斯特·格拉萨(Gusto Graser)。赫尔曼·鲍伯特(Hermann Popert)的《赫穆·哈陵纳》(*Helmut Harringa*)在《德国青年》和《世纪末的青年文化》中都有所提及。后者还详细地说明了汉斯·布鲁尔对“候鸟运动”这部分历史的诽谤。

关于在德国军国主义和“候鸟运动”中同性恋的回流,见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的《没有个性的少年》(*Young Torless*)(伦敦,斗牛士出版社,1987)和由哈利·奥斯特休斯(Harry Oosterhuis)和休伯特·肯尼迪(Hubert Kennedy)编辑的《前纳粹德国的同性恋和男子结合》(*Homosexuality and Male Bonding in Pre-Nazi Germany*)(宾厄姆顿,纽约:哈林顿公园出版社,1991),后者调查了先锋同性恋杂志《独特》(*Der Eigene*)。伊丽莎白·布瑟-威尔森对“候鸟运动”的评论可以参见《世纪末的青年文化》第十章,她的“平民粗鲁女孩”的引文包含在鲁伯对该章的注释中。

斯坦利·霍顿(Stanley Houghton)的《青年一代》(*The Younger Generation*)(伦敦:法国出版社,1910)的副标题是《给家长的三幕喜剧》。关于妇女参政权论者的资料,见利兹·麦奎斯顿(Liz McQuiston)的《妇女参政论者和女魔王:妇女解放及更多》(*Suffragettes and She-Devils: Women's Liberation and Beyond*)(伦敦:菲顿出版社,1997)。在巴塞尔火车站见面的邀请函出自他1909年写给雅克·拉维拉的信中,可以在克里斯托弗·哈塞尔(Christopher Hassall)的书《鲁珀特·布鲁克:一段传记》(*Rupert Brooke: A Biography*)(伦敦:费伯-费伯出版公司,1964)中找到。新异教运动的新宣言在德莱尼的《新异教运动者》第四章中也有讨论,“在格兰切斯特,河

水向哪流”。

德莱尼也详细记载了1912年布鲁克和他的团体的分裂。“年轻是最骗人的东西”引自《新异教主义》，布鲁克关于他不“特别想生活”的陈述也来源于此。关于布鲁克对性的苦恼与困惑，见其他关于他诱奸德纳姆·史密斯的记录，如凯斯·海尔(Keith Hale)编辑的《朋友和使徒：鲁珀特·布鲁克和詹姆斯·斯特雷奇1905到1914年的信件》(*Friends and Apostles: The Correspondence of Rupert Brooke and James Strachey 1905—1914*) (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1998)。

## 第九章 五分钱影院和动物舞蹈

关于布法罗·比尔和爱德华·西尔维斯特·埃利斯的详细情况，参见E. S. 特纳的《男孩永远是男孩》第十五章“狂野西部”。约翰·鲁伯在《世纪末的青年文化》第五章“文学青年：一段概览”中提到了卡尔·梅的故事。露迪·布莱希和哈里特·珍妮丝《他们都演奏拉格泰姆》的第六章“一个老唱片的速写”中引用了查尔斯·N. 丹尼尔的《海华沙》。关于布鲁尔见鲁伯的《世纪末的青年文化》。

伊恩·惠特科姆(Ian Whitcomb)的《舞会之后》(*After the Ball*)引用《你好，拉格泰姆》(*Hullo Rag-time*)的创作作为一项创举，并且讨论了J. B. 普里斯特利的反应。普里斯特利十分震惊地预言：“拉格泰姆威胁着古老的欧洲、美国的统治、非洲的兴起，结束了人们的自信和所有安全感，它代表了不安的骚动和摩登时代的狂热。”鲁珀特·布鲁克和J. M. 巴里都是《你好，拉格泰姆》的热爱者；参见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和安德鲁·伯金的《J. M. 巴里和迷惘的男孩》。

关于美国工业，见大卫·A. 豪谢尔(David A. Hounshell)的《从美国系统到批量生产1800—1932》(*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4)，尤其是它的序言和第六章“福特汽车公司和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兴起”。波特对于《火车大劫案》的评价在凯文·布朗劳(Kevin Brownlow)的早期电影史《好莱坞：先驱者们》(*Hollywood: The Pioneers*) (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79)中被引用。

20世纪早期，许多书都描写了广告业的发展和它的心理学手段：斯图亚特·艾文(Stuart Ewen)的《意识的船长：广告和消费文化的社会根基》(*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 Advertising and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Consumer Culture*) (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2001)，尤其是第二章，“动员本能”；E. S. 特纳(E. S. Turner)的《广告的惊人历史！》(*The Shocking History of Advertising!*) (伦敦：麦克·乔瑟夫出版社，1952)第六章；以及荷兰人和日耳曼人出版社出版的《在百事可乐出现之前有没有百事这一代？》(*Was There a Pepsi Generation Before Pepsi Discovered It?*)

沃尔特·迪尔·司各特(Walter Dill Scott)的《广告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 (波士顿：斯摩梅纳德公司，1912)是关于意图的奠基之作；两段引述均出自第五章“人类本能。”斯坦利·霍尔的演讲《发育中的女孩和青春期的男孩》(*The Budding Girl and the Boy in His*

Teens)出自 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 18 卷,287 条;《十几岁和二十几岁》出自《妇女家庭良友》(*Woman's Home Companion*),1908 年 10 月(G. 斯坦利·霍尔文集,第 17 卷,第 283 条)。

1909 年 9 月弗洛伊德和荣格在克拉克大学的讲座的完整故事详见索罗·罗森茨维格(Saul Rosenzweig)的《对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考察:弗洛伊德、荣格和制造国王的霍尔》(*The Historic Expedition to America: Freud, Jung and Hall the King Maker*)(圣路易斯:拉娜社,1994),也可参见威廉·A. 寇许(William A. Koelsch)的《不可置信的白日梦:弗洛伊德和荣格在克拉克,1909》(*Incredible Daydream: Freud and Jung at Clark, 1909*)(伍斯特,曼彻斯特:克拉克大学出版社,1984)。关于伯奈斯(Bernays)的情况,见他的传记《思想的传记:一段公共关系策略的记忆》(*Biography of an Idea: Memoirs of a Public Relations Counsel*)(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65)。

戴维·纳韶的两部关于 21 世纪早期美国内城区社会史的优秀作品是青少年消费主义和早期电影的主要素材。《这个城市的孩子:在工作或者在玩耍》(*Children of the City: At Work and at Play*)(纽约:兰登出版社,1985)介绍了孩子们的工作和他们怎么消费。不同年龄的团伙做着一些诸如拾破烂、倒垃圾或送报纸的工作,挣几分钱的工资。但仅仅几分钱,就让他们有权流浪街头,光顾餐厅、糖果店和五分钱影院。贝蒂·史密斯引证于第七章,“年幼的母亲”。

纳韶《外出:公共娱乐的起落》(*Going 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Public Amusements*)(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93)描述了轻歌舞剧、滑稽戏剧、当然还包括五分钱影院和早期电影院。他引用了简·亚当斯对电影的评论,尤其是对“团伙本能”和“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的引用,可以在《青年精神和城市街道》第四章“梦想剧场”中找到完整的引述。斯坦利·霍尔的“被标记”来自《青春期》第四章“身体和精神疾病”。

关于 1912 年拙劣的火车抢劫案的详细情况,参见凯文·布朗罗的(Kevin Brownlow)《好莱坞:先驱者们》(*Hollywood: The Pioneers*)。他的续集《纯真面具的背后:性、暴力、犯罪:默片时代社会伦理电影》(*Behind the Mask of Innocence: Sex, Violence, Crime: Films of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Silent Era*)(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是关于轰动一时的默片的宝贵资料,以及试图审查这些电影的情况。电影《少年法庭的救助》《又一代》和《灵魂的交易》都取材于此。至于“比沃格拉夫影片公司女郎”,参见纳韶《外出:公共娱乐的起落》第十四章“结合演出、明星和影片。”

奥斯卡·王尔德的《幸福王子》取自《奥斯卡·王尔德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Oscar Wilde*)。布斯·塔金顿、塞达·巴拉和玛丽·璧克馥的资料均取自《好莱坞:先驱者们》。如果希望读到更多关于早期好莱坞演员的资料,见亚历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的《明星地位:好莱坞现象》(*Stardom: The Hollywood Phenomenon*)一书(伦敦:企鹅书店,1974),和肯尼斯·安格尔(Kenneth Anger)的《好莱坞巴比伦》(*Hollywood Babylon*)(旧金山:正直出版社,1975);千万不要说安格尔用事实阻挡了美好神话的道路。

帕克·泰勒(Parker Tyler)是一个最看不起电影的作家。因此他的《卓别林:最后一个小丑》(*Chaplin: The Last of the Clowns*)(纽约:先锋出版社,1984)是典型的偏执却深刻的传记。肯尼斯·S.林恩(Kenneth S. Lynn)风格严谨的著作《查理·卓别林和他的时代》(*Charlie Chaplin and His Times*)(伦敦:奥兰姆出版社,1998)是詹姆斯·艾吉引证和“暴民上帝”这一说法的来源。关于《北非海岸的最后·夜》(*The Last Night of the Barbary Coast*),详见布朗劳德《纯真面具的背后:性、暴力、犯罪:默片时代社会伦理电影》(*Behind the Mask of Innocence: Sex, Violence, Crime: Films of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Silent Era*)。

爱德华·A.柏林(Edward A. Berlin)的《拉格泰姆之王:斯科特·乔普林和他的时代》(*King of Ragtime: Scott Joplin and His Era*)、伊恩·惠特科姆(Ian Whitcomb)的《欧文·柏林和美国拉格泰姆》(*Irving Berlin and Ragtime America*)(伦敦:世纪出版公司,1987)以及戴维·纳韶的《外出》中均记录了拉格泰姆爵士乐的传播。至于动物舞蹈,详见惠特科姆的《舞会之后》。在纳韶的《外出》第九章,“大笑与充分自由:20世纪初的舞池、舞厅和歌舞表演”被露丝·特鲁和朱利安·斯特利引用。霍尔的“节奏的起源”来自《青春期》第二章“马达功率和功能的增强”。

关于改革家对拉格泰姆和舞厅的反应,详见惠特科姆的《舞会之后》、纳韶的《外出》第九章和爱德华·A.柏林的《拉格泰姆之王》第五章“拉格泰姆舞”。《流行观点》中的“性爱实验地”引自纳韶的《这个城市的孩子》第十章“儿童和儿童救助者”。关于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对舞厅的评价详见《特别的少年犯》(*The Individual Delinquent*)(波士顿:小布朗公司,1915)第六章“环境因素”中的第219段“社会的诱惑。”

如果需要了解更多关于青年人的背景资料,可以参见露西·罗琳(Lucy Rollin),《20世纪每十年间的青少年文化:参考指南》(*Twentieth-Century Teen Culture by the Decades: A Reference Guide*)(康涅狄格州:格林伍德出版社,1990)第一章“最初的几十年1900—1920”——这是一本十分有用的资料读物。拉尔夫·伯恩(Ralph Bourne)在文首和文末的引用出自一篇叫《青年和生活》(“Youth and Life”)的散文,后来成了他的第一本书的标题,1913年由霍顿·米福林出版。它在《美国中产阶级青年文化》(*The Cult of Youth in Middle-Class America*)中再版,由理查德·L.拉普森编辑(曼彻斯特:D. C. 西斯公司,1971)。

## 第十章 祈祷

斯坦利·霍尔的引语来自《青少年》第十章“青少年爱情”。有关阿加松《调查》的细节,参见罗伯特·沃尔德(Robert Wohl)《1914的一代人》(*The Generation of 1914*)(剑桥市,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第一章“法国:今天的年轻人”。这本书十分精彩,却不公正地被人们遗忘了。它对20世纪最初20年里,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青年极端主义和社会学进行了纵观全局的考察。法西斯主义的种子可以在这里找到,书中还包含了有关1914年参加战争的这一代人思想和行动的重要资料。

更多有关佩吉和普西卡里的资料,可以参见提姆·克罗斯(Tim Cross)的《一战中失去的声音》(*The Lost Voices of World War I*)(伦敦:布鲁姆伯利出版社,1988)。它的副标题是《一本跨越国界的作家、诗歌和剧作的文选》(*An International Anthology of Writers, Poets and Playwrights*)。这本重要的书简要介绍的59位作家,他们分别来自塞尔维亚、匈牙利、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这些人都在一战中死去。克罗斯的精彩序言中还包括了有关“时代之争”和“政治的诱惑”的散文。至于基度克里希那穆提的相关资料,见玛丽·鲁琴斯(Mary Lutyens)的《基度克里希那穆提的生与死》(*Life and Death of Krishnamurti*)(印度:奈士玛书局,199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爱情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Love*)中创造了“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术语,此书于1910年出版。其实他在《梦的解析》的第五章“梦的材料与来源:典型梦境”中已经讨论过了俄狄浦斯的故事。若要了解更多关于弗洛伊德和俄狄浦斯情结,见莫顿·亨特的《心理学故事》第七章“探索深处的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汉斯·莱宝的宣言《大革命》出自提姆·克罗斯的《一战中失去的声音》。

斯坦利·霍尔对于宗教信仰转变的观察报告来自《青春期》第十四章“青春期转变信仰的心理”。对于把“代”作为一个关键词的讨论,参见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一个文化和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伦敦:丰塔纳出版社,1988)。关于乔凡尼·巴比尼和F. T. 马利内奇激烈的辩论,可见罗伯特·沃尔的《1914的一代人》第五章“意大利:年轻!年轻!”

桥艺术家团体的宣言出自伯纳德·S. 迈耶(Bernard S. Meyers)的《表现主义:反叛的一代》(*Expressionism: A Generation in Revolt*)(伦敦:泰晤士和哈得逊出版社,1963)第十二章“桥团体和精英”中的第3节《桥》。关于未来派,可以参考罗伯特·沃尔的《1914的一代人》第五章;辛西娅(Cinzia)、萨提尼(Sartini)和勃鲁姆(Blum)的《另一种现代主义:F. T. 马利内奇的未来派小说的影响力》(*The Other Modernism: F. T. Marinetti's Futurist Fiction of Power*)(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6)。F. T. 马利内奇的未来派宣言出自《现代派的建立和宣言》(R. W. 弗林特译),该文收录在茵宝·亚波洛尼欧(Umbro Apollonio)编辑的《未来派宣言》(*Futurist Manifestos*)(伦敦:泰晤士和哈得逊出版社,1973)中。

温德汉姆·刘易斯所叙述的关于他与F. T. 马利内奇的分歧出自《爆炸与激情》(伦敦:考尔德和博雅斯,1967)第二章“W. L. 先生作为‘伦敦大漩涡’的领袖”。刘易斯评价说马利奇内“的确弄出了不同凡响的噪音。”由温德汉姆·刘易斯编辑的《爆炸与激情》的第一版后来被重印,并且加了一个序言,由黑麻雀出版社出版(圣塔巴巴拉,1981)。要了解更多关于漩涡主义的情况,包括艺术家的作品,例如克里斯托弗·尼文森、爱德华·沃兹沃斯、威廉·罗伯茨、亨利·戈迪埃-布尔泽斯卡,见《漩涡主义及其联盟》(*Vorticism and Its Allies*)(伦敦:大英艺术委员会,1974)。

《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的细节处理,可见莫德里斯·伊斯坦的(Modris Ekstein)

《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摩登时代的诞生》(*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Age*) (伦敦：黑天鹅出版社，1989) 第一章“巴黎”中的第一部分。如果要查询更多关于达基列夫和尼金斯基的细节材料，见理查德·布克(Richard Buckle)的《尼金斯基》(*Nijinsky*) (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1971) 第六章“1912年秋—1913年九月”。布克引用了目击者瓦伦丁·格罗希的话：“关于《春之祭》这场战役的文章中，没有哪一篇文章描述出了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剧场仿佛天翻地覆，人们高声辱骂，咆哮声和口哨声淹没了音乐。”

在沃尔特·Z. 拉克尔的《年轻的德国：一段德国青年运动的历史》(*Young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第五章“抽象政治学”中详细描述了候鸟运动在霍厄麦斯纳的会议。同样可参见约翰·鲁伯的《世纪末的青年文化》第十章“青年组织和运动”。拉克尔在《年轻的德国》第八章“其他青年运动”中提到了德国青少年联盟。

## 第十一章 牺牲

关于温德汉姆·刘易斯的“毫无活力的激情”，可以参考《爆炸与激情》的第四章“战争—人群”第二部分。关于1914年8月伦敦的示威运动，详情可见理查德·范·爱登(Richard Van Emden)和史蒂夫·汉弗莱斯(Steve Humphries)所著的《祖国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Home Front*) (伦敦：海德兰出版社，2003) 的第一章“全副武装的国家”。关于德国的骚动，可以参见莫德里斯·伊斯坦的《春之祭》第二部分“柏林”第一幕。

关于维克·科尔的故事，见范·爱登和汉弗莱斯所著《祖国无战事》的第一章。其他关于战争形成的描述在马丁·吉伯特所著《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1994)，和尼尔·弗格森的修正主义作品《战争的不幸》(伦敦：企鹅书店，1998) 中可以找到。欧尼斯特·普西夏里的引述出自提姆·克罗斯的《一战中失去的声音》。罗伯特·普斯提斯的话引自迈克思·阿瑟(Max Arthur)的《一战中被遗忘的声音》(*Forgotten Voices of the Great War*) (伦敦：伊博瑞出版社，2003)。关于恩斯特·容格(Ernst Junger)，见《钢铁风暴》(*The Storm of Steel*) (伦敦：康斯特布尔出版社，1994)。

关于沃尔特·弗莱克，详情可见提姆·克罗斯的《一战中失去的声音》和约翰·鲁伯的《世纪末的青年文化》。关于乔治和彼得·李维林·戴维斯的详情，可见安德鲁·伯金所著《J. M. 巴里和迷惘的男孩》第十四章。关于英国公立学校的军国主义和他的反应，见罗伯特·格拉夫(Robert Graves)《告别这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 (伦敦：企鹅书店，1971) 第八章。理查德·霍金斯关于童子军是为从军培养适应能力的表述，见范·爱登和汉弗莱斯所著《祖国无战事》第一章。贝登堡勋爵夫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见迈克尔·罗森塔尔的《性格工厂》第七章。

早期招募新兵的事件引自迈克思·阿瑟的《一战中被遗忘的声音》与爱登和汉弗莱斯所著《祖国无战事》。罗伯特·罗伯茨关于士兵脱胎换骨回到萨尔福德的记忆在《经典的贫民窟》(*The Classic Slum*) 中有记录。关于白色羽毛，见阿瑟与爱登和汉弗莱斯。有关哈里·奥格的引

文来自理查德·福尔摩斯(Richard Holmes)的《汤米:西部战线的英国士兵 1914—1918》(*Tommy: The British Soldier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8*) (伦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4)第二部分,“血肉之躯”和“新军队”。

关于反对现代主义的情况,详见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ines)所著的《想象出来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英国文化》(*A War Imagined: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nglish Culture*) (伦敦:柏德雷领袖出版社,1990)第一部分的第一、二、三章。将鲁珀特·布鲁克树立为代表,见克里斯托弗·哈塞尔的《鲁珀特·布鲁克》第十四章“刻在石碑上的人”、罗伯特·沃尔所著《1914的一代人》第三章、“英格兰:失败的青年部队”和提姆·克罗斯的《一战中失去的声音》。H. W. 科齐(H. W. Koch)的《希特勒青年:产生和发展 1922—1945》(*The Hitler Youth: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1922—1945*) (纽约:库珀联盟出版社,2000)在前言里精彩地介绍了兰格马克神话。

沃尔特·弗莱克的《两个世界中的流浪者》在沃尔特·Z. 拉克尔的《年轻的德国》第五章“抽象政治学”、约翰·鲁伯的《世纪末的青年文化》的第十章和提姆·克罗斯的《一战中失去的声音》中都有引用。克洛斯的宝贵著作成为查尔斯·索尔里素材的重要来源。罗兰·莱顿对于前线状况的描述引自一封1915年9月11日写给维拉·布雷特的信,该信被收在艾伦·毕晓普(Alan Bishop)编辑的《来自迷惘一代的信件》(*Letters from a Lost Generation*) (伦敦:阿巴库斯出版社,1999)。

关于H. 雷克斯·弗莱斯顿的诗歌和阿瑟·格雷姆·维斯特的回应,见塞缪尔·海因斯的《想象出来的战争》第二部分第七章“世纪之交的堕落”。维斯特的诗歌也被收录在提姆·克罗斯的《一战中失去的声音》中。“一位母亲给普通士兵的回答”被收在格拉夫的《告别这一切》第二十一章中。

关于亚力克·沃(Alec Waugh),见《青春的隐现》(*The Loom of Youth*) (伦敦:卡斯尔有限公司,1928)。为回应《青春的隐现》而写的《青年的梦想》作者是马丁·布朗尼(Martin Browne) (伦敦:朗文格林公司,1918),副标题是《伊顿公学对青春隐现的作答》(*An Etonian's reply to The Loom of Youth*)。如需了解1917—1918年征募新兵政策的更多细节,见马克思·阿瑟的《一战中被遗忘的声音》和理查德·福尔摩斯的《汤米》。威廉·福尔摩斯讲述的关于逃兵的故事出自马克思·阿瑟的《一战中被遗忘的声音》第四章“1917”。查尔斯·卡灵顿的引文“救生筏上的遇难水手”也出自马克思·阿瑟的《一战中被遗忘的声音》第四章“1917”。

对哈里·奥格的引用来自福尔摩斯的著作《汤米》。关于齐格弗里德·沙宣和威尔弗雷德·欧文的故事,在塞缪尔·海因斯的《想象出来的战争》第三部分“等待破晓”和第八章“多提维拉”中有很精彩的叙述。关于雅克·瓦凯,见《四个达达主义自杀者:阿瑟·卡拉万、雅克·里果、简·托玛和雅克·瓦凯的选集》(*4 Dada Suicides: Selected Texts of Arthur Cravan, Jacques Rigault, Jean Torma & Jacques Vaché*) (伦敦:阿特拉斯出版社,1995)。弗里茨·冯·温鲁的禁书《祭司的方式》(*Way of Sacrifice*) 在罗伯特·沃尔所著《1914的一代人》第二章“德国:年轻·

代的任务”中有详细记载。

## 第十二章 1902年生人

迈尔斯·马里逊对《布莱克厄尔》的引述出自塞缪尔·海因斯的《想象出来的战争》第二部分“转折点”第七章“世纪之交的堕落”。弗朗西斯·切斯特的故事出自《全景拍摄：一个瘾君子的自传》(*Shot Full: The Autobiography of a Drug Addict*) (伦敦：梅图恩出版社，1938)第八章“为祖国而战”。斯坦利·霍尔对于这场战争的评论出自《你是否得了精神分裂症》(“Have You Got a Schizophrenia”)，这篇文章刊登在《纽约环球晚报》(*New York Evening World*)上，见1916年7月G.斯坦利·霍尔文集第22卷第353b条。关于炮火对听力和心理的影响的引述出自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所著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 (伦敦：企鹅书店，1969)。

本·谢珀德(Ben Shephard)的《神经战：士兵和精神病学家1914—1994》(*A War of Nerves: Soldiers and Psychiatrists 1914—1994*) (伦敦：乔纳森·凯普出版社，2000)是查尔斯·梅耶尔定义炮弹休克的主要资料：序言“炮弹休克”。谢泼德著作的第二章“法国的炮弹休克”，主要研究了“大规模神经衰弱症”的统计资料。关于“咬紧牙关”的描述，见冯·爱登和汉弗莱斯所著《祖国无战事》第四章“这是我的艰巨任务……”。关于战争引起的“过剩的性欲”，见曼克奈斯·希尔施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引起轰动的著作《世界大战的性历史》(*The Sexual History of the World War*) (纽约：巴汝其出版社，1934)。

关于对于教堂的态度，见冯·爱登和汉弗莱斯所著《祖国无战事》第四章“这是我的艰巨任务……”。关于唯心论者，见罗伯特·格拉夫《告别这一切》第二十一章。如需更多关于教堂和宗教之争的资料，见理查德·福尔摩斯的《汤米》第六部分“心灵和灵魂，人与神。”军事伤亡人数数据取材自通史：马丁·吉伯特所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尼尔·弗格森的修正主义作品《战争的不幸》。

厄内斯特·格拉斯(Ernst Glaeser)被不公正地忽略的作品《1902年生人》(*Class of 1902*) (纽约：威金出版社，1929)就是以一个从战争中走出来的青少年的观点，讲述了战争的故事。关于德国战争时期的青少年，见罗杰·戚克林(Roger Chickering)的《皇家德国和一战1914—1918》(*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关于《路西塔尼亚》在英国引起的社会骚动，见冯·爱登和汉弗莱斯所著《祖国无战事》第三章“心魔”。

16周岁以下犯罪的统计数据来自塞西尔·里森(Cecil Leeson)的《儿童和战争》(*The Child and the War*) (伦敦：霍华德协会，1917)，之后又由冯·爱登和汉弗莱斯在《祖国无战事》第八章“斗争和困境”中再现。后者是关于伦敦警长的引文的来源。德国青少年犯罪统计数据主要取材于戚克林的《皇家德国和一战1914—1918》第四章“战争容纳一切：老老少少。”关于塞巴斯蒂

安·哈夫纳有关战争的评论“黑暗神秘的游戏”，见《反抗希特勒：追忆录》（伦敦：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2000）序言。

安德森·莱斯金斯和曼彻斯特·纳坡的运动引自冯·爱登和汉弗莱斯《祖国无战事》第八章“斗争和困境”和史蒂芬·汉弗莱斯的《流氓还是叛党？》第七章“街头的帮派、叛乱、对抗和种族主义。”关于少年犯罪是“浪费生命”一说，以及接下来的两段，见塞西尔·里森的《儿童和战争》。关于《领土防御法》的约束，可以参见冯·爱登和汉弗莱斯的《祖国无战事》第八章“斗争和困境”。

基奇纳勋爵的引述：他“不认同妇女解放”也引自同一资料，第一章“全副武装的国家”。关于妇女在战争中的地位，见维拉·布雷特所著《青年的自白》（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出版社，1933）第三章“牛津对战争”、塞缪尔·海因斯的《想象出来的战争》第一部分第三章“大后方的战争”第四节“妇女战争”、爱登和汉弗莱斯的《祖国无战事》第五章“照料伤员”。更多关于妇女独立的内容，见罗伯特·罗伯茨所著《经典的贫民窟》第九章“大释放”、维拉·布雷特的《青年的自白》第四章“学习对生活”。

关于卖淫，见罗伯特·罗伯茨所著《经典的贫民窟》第九章“大释放”和里森的《孩子与战争》。关于女青年的行为被更为严密地监督详见马雷克·科恩（Marek Kohn）的《毒品女孩：英国毒品地下组织的诞生》（*Dope Girls: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Drug Underground*）（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社，1992）。关于1915和1916年的可卡因大恐慌，见科恩的《毒品女孩：英国毒品地下组织的诞生》第二章“靴子上的雪”。

对于1918《领土防御法》无尽的限制和义务警员的道德说教，见塞缪尔·海因斯的《想象出来的战争》第二章“最后的大后方战役”、菲利普·霍尔的《王尔德最后的抵抗：堕落的同谋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伦敦：杰瑞德·杜克沃斯公司，1997）、冯·爱登和汉弗莱斯的《祖国无战事》第九章“黎明前的黑暗”。“1919年是20世纪真正来临的一年”这句话出自罗伯特·罗伯茨的《经典的贫民窟》第九章“大释放”。

在众多关于达达主义的历史资料中，我用了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的《达达主义运动：艺术和反传统艺术》（*Dada: Art and Anti-art*）（伦敦：泰晤士和休斯顿，1978）和威利·费尔考夫（Willy Verkauf）的《达达主义运动：一个运动的专题论文集》（*Dada: Monograph of a Movement*）（伦敦：学术期刊，1975）。接下来的三篇论文出自费尔考夫的著作，它们非常有用：威利·费尔考夫的“达达主义运动：起因和影响”、理查德·许尔森贝克的“达达主义和存在主义”以及汉斯·克莱特勒的“达达主义心理学”。关于将回归童年作为一种对战争的心理反应，见本·谢泼德的《神经战：士兵和精神病学家 1914—1994》第八章“争议与奥秘，1917—1918”。“鲁莽和冷漠”引自罗伯特·罗伯茨所著《经典的贫民窟》第九章“大释放”。

### 第十三章 爵士乐队和美国大兵

“我不想过得像个老年人”出自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的著作《17岁：一个关于青

年、夏季和巴克斯特一家,尤其是威廉的故事》(*Seventeen: A Tale of Youth and Summertime and the Baxter Family, Especially William*) (纽约:阿麦隆出版公司,日期不详)第十八章“傻大个儿”。关于西奥多·罗斯福,见盖瑞·米德(Gary Mead)的《步兵: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Doughboys: America and the First World War*) (伦敦:企鹅书店,2000)第三章“安乐死”。关于更详细的美国战地服务团的经历,见杰弗里·沃尔夫(Geoffrey Wolff)的《黑色太阳:哈里·克罗斯比短暂的过度和激烈的没落》(*Black Sun: The Brief Transit And violent Eclipse of Harry Crosby*) (纽约:古典书局,1977)第四章。

阿郎·西格的“我很高兴能够成为先行者”出自盖瑞·米德的《步兵:美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关于“童话场面”引自布思·塔金顿,详见《17岁》第二十五章“青年和帕彻先生”。更多关于帕彻先生生活和工作的细节,见詹姆斯·伍德里斯(James Woodress)的《布思·塔金顿,来自印度的绅士》(*Booth Tarkington, Gentleman from Indiana*) (纽约:J. B. 利平科特出版公司,1955),以及凯斯·J. 芬尼摩尔(Keith J. Fennimore)的《布思·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 (纽约:特怀恩出版社,1974)。

“在年轻人的眼中”出自芬尼摩尔的《布思·塔金顿》第六章“青少年的世界”。关于“玫瑰色薄纱”的引述,见塔金顿的《17岁》,第十七章“简的理论”;关于《双城记》,见塔金顿的《17岁》第二十章“悉尼·卡尔顿”。修女简关于威廉的评论:“不喜欢很多事情”引自塔金顿的《17岁》第二十八章“兰尼·吉斯德”;他父亲拒绝大礼服选自第二十三章“父亲的遗忘”;塔金顿的关于青春期矛盾的学术论文出自第四章“起源和铁线莲”。

塔金顿与大企业的冲突摘自伍德里斯的《布斯·塔金顿,来自印度的绅士》第九章“主要风格”;关于“随和的旧时代”见玛西娅·雅各布森的《再做一次男孩子》第七章“布斯·塔金森”;关于男孩读物不明确的目标读者市场,见雅各布森的《男孩读物》第一章。

迪克西兰爵士乐的产生最重要的影响,可参考阿诺德·肖(Arnold Shaw)的《爵士时代:20年代的流行音乐》(*The Jazz Age: Popular Music in the Twenties*)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第四章“奥利弗国王,瑞士鼓和小号手”、伊恩·惠特科姆的《欧文·柏林和美国拉格泰姆》第八章“爵士先生”。关于更多的背景资料,见弗兰西斯·牛顿(Francis Newton)的《爵士场景》(*The Jazz Scene*) (伦敦:企鹅书店,日期不详)、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他自己的语言》。如需要了解“迪克西兰爵士乐独步舞”的解构详情,见鲁迪·布莱士(Rudie Blesh)的《华丽的小号:一段爵士乐的历史》(*Shining Trumpets: A History of Jazz*) (伦敦:卡塞尔公司,1955)第九章“黑白拉格泰姆”。

迪克西兰爵士乐队的第一张专辑已经发行CD版本,叫做《原创迪克西兰爵士乐 1917—1923》(*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 1917—1923*) (巴黎:爵士乐档案馆,1995)。关于“不和谐的和声学专家”的引述,见惠特科姆的《欧文·柏林和美国拉格泰姆》,而“对旋律的暗杀”引自 [www. redhotjazzz. com](http://www.redhotjazzz.com);关于“多样性”的引述,见惠特科姆的《欧文·柏林和美国拉格泰姆》。

美国加入一战的情况出自盖瑞·米德的《步兵》第一章“苏醒,叛徒”(“No More Sleeping Treason”)。关于征兵情况,见米德的《步兵》第四章“加入步兵”(“Enter the Doughboys”)以及H. C. 彼得森(H. C. Peterson)和吉尔伯特·C. 菲特(Gilbert C. Fite)的《战争的对手 1917—1918》(*Opponents of War 1917—1918*) (康涅狄格:格林伍德,1986)第1章和第2章。这本引人入胜的书的第九章描写了美国的媒体怎样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细节;关于反战情绪的压抑,见彼得森和菲特的《战争的对手 1917—1918》;关于马西斯“战争是丑恶的群体疯狂行为”的引述,见艾伦·丘吉尔的《不合时宜的波希米亚》第五章“考验和磨难”。关于美国在东圣路易斯种族暴动的镇压,见盖瑞·米德的《步兵》第八章“代价”。

维拉·布雷特(Vera Brittain)第一次看到步兵时的反应,记录在《青年的自白》(*Testament of Youth*)第八章“沙丘与海之间”里。关于一战期间伤亡统计数据,见尼尔·弗格森的《战争的不幸》、马丁·吉伯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帝国战争博物馆的数据。关于1918年11月11日的纪录,见格拉夫《告别这一切》第二十五章、塞缪尔·海因斯所著的《想像出来的战争》(Samuel Hines, *A War Imagined*)、菲利普·霍尔的《王尔德最后的抵抗》(Philip Hoare, *Wilde's Last Stand*)和维拉·布雷特的《青年的自白》第九章“这孤独的时刻”。

乔治·格罗兹(Georg Grosz)对日耳曼达达主义运动的纪录出自《小是大非:乔治·格罗兹的自传》(*A Little Yes and a Big No: The Autobiography of Georg Grosz*) (纽约:戴尔出版社,1964)第十三章“达达主义”。关于萨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的“注视深渊”(“stared into the abyss”),见《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的序言。关于比利·卡利顿之死,见马雷克·科恩的《毒品女孩》第六章“不洁的仪式”(“Unholy Rites”)。关于雅克·瓦凯(Jacques Vaché),见《四个达达主义自杀者》。对1910年1月《泰特勒》(*Tatler*)杂志的引述出自马雷克·科恩的《吸毒女》第八章“伦敦西区的可卡因女孩”(“Cocaine Girls in the West End”)。关于迪克西兰爵士乐来到英国,见吉姆·高波尔特(Jim Godbolt)的《英国爵士的一段历史:1919—1950》(*A History of Jazz in Britain: 1919—1950*) (伦敦:诺斯威出版社,2005)第一章“当我听到爵士乐”。

#### 第十四章 战后的震荡

章前引文来自于奥博利·福克斯(Aubrey Fowkes)的《一个18岁男孩:少年的日记》(*A Boy, Eighteen: A Diary of the Teens*) (伦敦:财富出版社,1947)。关于珀欣将军(General Pershing)和暂时和平,参见加里·米德(Gary Mead)的《步兵》(*The Doughboys*)第十八章“代价”;关于战争的直接后果,参见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26—28章。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的神格化见克里斯托弗·哈塞尔(Christopher Hassel)的《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第十四章“刻成雕像的人”。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引用的关于整个世界都在弹震症折磨之下的说法来源于本·谢珀德(Ben Shephard)写的《神经战》(*A War of Nerves*)第二章“和平能带来和平吗?”。菲利普·吉布斯(Philip Gibbs)关

于返家军人的说法也出自该处。

维拉·布雷特(Vera Brittain)关于“放肆追求享乐”的文字见《青年的自白》(*A Testament of Youth*)第十章“不受欢迎的幸存者”。关于和平中冲突的持续,参见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摆脱一切》(*Goodbye to All That*)第二十六章。对温德姆·刘易斯的引用来自于《青年的宿命》(*Doom of Youth*)(伦敦:查图与文德斯出版社,1932)第一部分第五章“消瘦和青年人的侧影”。这本描写20年代青年人的激昂演说除了惯常的呐喊,还包括一些至今仍有价值的观点,特别是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有关青年人的报纸头条和杂志文章的“展品艺术馆”。其中典型的展品包括《青年的反叛》(“The Revolt of Youth”)、《代间大战》(“Battle of the Generations”)和《真正要紧的青年人》(“Youths Who Really Matter”)这些文章。

关于战争一代用极端的享乐主义来消除战争的回忆,参见维拉·布雷特的《青年的自白》第十章。关于战争中还是儿童或者少年的那一代的地位问题,参见恩斯特·格勒泽尔(Ernst Glaeser)《1902生人》(*Class of 1902*)各处。父辈“像陌生人”也是引自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第五章“荷马和安娜”。

关于青年不再按生理划分的观点,见罗伯特·沃尔(Robert Wohl)的《1914这一代》(*Generation of 1914*)第六章“两个世界间的游离者”。莱斯利·保罗(Leslie Paul)的“现代文明将亡”详见《愤怒的年轻人》(*Angry Young Man*)(伦敦:费伯出版社,1951)第三章“啊年轻人,啊年轻的同志”。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第一次世界大战》(*The First World War*)第二十九章引用了菲利普·吉布斯著的《战争的真相》(*The Realities of War*),原文见《战争的真相》(伦敦:贺金森出版社,1923)。关于战后德国野心勃勃的青少年,见彼得·盖伊(Peter Gay)的《魏玛文化》(*Weimar Culture*)第五章“儿子的反叛:表现主义的年代”。关于弗莱斯瓦·蒙特(Francois Mentre)1920年所作的调查,见罗伯特·沃尔的《1914这一代》第一章“法国:今日的年轻人”。

关于法国几代间的冲突问题,参见霍尔同一本书。德里欧·拉罗舍尔(Drieu La Rochelle)的引言来自于《这些观点的立场》(*La suite dans les idées*)(巴黎,1927)。关于布兰顿(Breton)的食人达达主义宣言,参见汉斯·里克特(Hans Richter)的《达达:艺术和反艺术》(*Dada: Art and Anti-art*)第六章“1919到1920年的巴黎达达主义”。达达主义预言也参见里克特的同本书同一章节。关于瑞蒙德·瑞迪戈特(Raymond Radiguet),见弗兰西斯·施泰格缪勒(Francis Steegmuller)的《考克多:一本传记》(*Cocteau: A Biography*)(波士顿:无上出版社,1992)第五章“创造20年代”,以及瑞蒙德·瑞迪戈特的《肉欲之魔》(*The Devil in the Flesh*)(纽约:西格内特出版社,1959)。关于其他的D代作者的细节,见罗伯特·沃尔的《1914这一代》第一章。

关于菲利普·吉布斯,参见《年轻的无政府主义》(*Young Anarchy*)(伦敦:贺金森出版社,1926)第四章。关于战争一代和战后代之间的对抗,见维拉·布雷特的《青年的自白》第十章:这同样也是说战争已成“过去时”的出处。伊芙琳·沃(Evelyn Waugh)关于“年轻人异常繁

荣”的看法见《伊芙琳·沃的日记》(*The Diaries of Evelyn Waugh*)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76)中从1920年9月25日星期六到9月30日星期四的日记。关于“新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的说法,见《伊芙琳·沃德的随笔、文章和评论》(*Th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 of Evelyn Waugh*) (伦敦:企鹅出版社,1986)第一部分“第一步:1917—1928”和“社论:最年轻的一代”。J. M. 巴里(J. M. Barrie)关于“年龄和青年……”的注解见安德鲁·伯金(Andrew Birkin)的《J. M. 巴里和失踪的男孩》(*J. M. Barrie and the Lost Boys*)第十六章“1917—1921”。

关于《领土防御法》和战后压制,参见马雷克·科恩(Marek Kohn)的《毒品女孩》(*Dope Girls*)第八章“西区的可卡因女孩”,以及罗纳德·布莱丝(Ronald Blythe)的《幻想的时代:二三十年代的英国,1919—1940》(*The Age of Illusion: England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1919—1940*) (伦敦:企鹅出版社,1964)第二章“吉克斯有益的故事”。关于革命性政治的年轻追随者,见菲利普·吉布斯的《年轻的无政府主义》。关于国际联盟,见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ey Nichols)的《甜和20年代》(*The Sweet and Twenties*)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58)第一章。关于战后童军组织,见约翰·斯普林霍尔(John Springhall)的《青年帝国和社会》(*Youth Empire and Society*)以及迈克尔·罗森塔尔(Michael Rosenthal)的《性格工厂》(*The Character Factory*)第八章“先行者和继任者”:这同样也是欧内斯特·威斯特莱克(Ernest Westlake)组织的“森林侠义秩序”运动情况的参考书。

关于“伟大力量的证明”组织中的莱斯利·保罗,见《愤怒的年轻人》第三章“啊年轻人,啊年轻的同志”,这一章还描写了保罗对“伟大力量的证明”组织领袖约翰·哈格雷夫(John Hargrave)幻想的破灭以及建立自己的组织“森林生活知识团”。接下来的引言就来自这一章。关于战后的魏玛德国,见约翰·威利(John Willett)的《新节制 1917—1933:魏玛时期的艺术和政治》(*The New Sobriety 1917—1933: Art and Politics in the Weimar Period*) (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78)第六章“革命和艺术:德国 1918—1920”,还有乔治·格罗兹的《小是大非》(*A Little Yes and a Big No*)。关于候鸟运动的解体,见拉克尔(Laqueur)的《年轻的德国》(*Young Germany*)第二章“1919:左对抗右”。关于德国自由青年团和在霍夫盖斯马召开的会议,见拉克尔的《年轻的德国》第十二章“理想幻灭的年代”和第十三章“开始的结束”。

关于1919年科堡重组以及戴上自由团兄弟武装面具的新青年组织,见拉克尔的《年轻的德国》第二章。克劳斯·斯韦莱特(Klaus Theweleit)在其精彩的两卷版《男性幻想》(*Male Fantasies*) (剑桥,英国:国家出版社,1987和1989)中对自由团的心理作了更广的探究。关于“新探险者”和“白色骑士”,见《年轻的德国》第十四章“白色骑士”。关于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的思想和影响,同样见彼得·盖伊的《魏玛文化》第三章“秘密德国:诗歌的力量”。

关于哈夫纳(Haffner)第一次看到卐字标志的描述,见《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的第八章序言的第一部分。关于意大利的退伍老兵的情况和法西斯主义的抬头,见罗伯特·沃尔的《1914这一代》第五章“意大利:青春!青春!”,以及R. J. B. 伯斯沃兹(R. J. B. Bosworth)的

《墨索里尼》(Mussolini)(伦敦:阿诺德出版社,2002)第五、六、七章。哈夫纳对1923年严重通货膨胀的描述见《反抗希特勒》第十章序言的第一部分。保罗对“新异教主义”的论述,参见《愤怒的年轻人》第三章“啊年轻人,啊年轻的同志”。

## 第十五章 酋长和希巴

章前关于艾伦·威尔斯·巴芝(Ellen Welles Page)的引言,源自 [www.geocities.com/flapper\\_culture](http://www.geocities.com/flapper_culture), 点击链接“摇摆女郎对父母的恳求”。这一页基本介绍了什么叫做“摇摆女郎文化和风格”。F. 斯考特·菲兹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对“花花公子”和“伟大的人”所作的对比见于《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伦敦:企鹅出版社,2000)第一章“艾默利,比阿特丽斯之子”。短语“如恶魔般不安宁”也出自《人间天堂》,“幕间:1917年5月—1919年2月”。同时注意舍伍德·安德生(Sherwood Anderson)的《俄亥俄州的温尼斯博格》(Winesburg, Ohio)(明尼,纽约:多佛出版社,1995)。

关于美国的代间对抗,杰弗里·沃尔夫(Geoffrey Wolff)在《黑太阳》(Black Sun)第六章中引用了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话。关于瓦尔特·A. 哈夫纳(Walter A. Hafener),参见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的《研究论文选集》(Selected Papers)中1919年1月16日的一篇。禁酒运动介绍见于伊丽莎白·斯蒂文森(Elizabeth Stevenson)的《巴比特和波西民: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Babbitts and Bohemians: The American 1920s)(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67)第四章“未定的和平:1919—1921”;爱德华·波尔(Edward Behr)的《禁酒:改变美国的13年》(Prohibition: The Thirteen Years That Changed America)第五章“禁酒的首批受害者”和第六章“美国颁布禁酒令”;肯尼思·奥索普(Kenneth Allsop)的《酿私酒者》(The Bootleggers)(伦敦:阿罗出版社,1970)第一章。

关于介绍消费主义的国家政策,见罗伯特·S. 林德(Robert S. Lynd)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Helen Merrell Lynd)的《米德尔镇:美国文化调查》(Middletown: A Study in American Culture)(纽约:哈考特出版社,1929)第八章“为什么他们工作如此努力?”以及伊丽莎白·斯蒂文森的《巴比特和波西民: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第八章“充分的自由——1924”。对青年市场以及1922年《故事影片》杂志所作调查的引用,见斯坦利·C. 霍兰德(Stanley C. Hollander)和理查德·杰梅恩(Richard Jermain)合作的《在百事可乐出现之前有没有百事这一代?》(Was There a Pepsi Generation Before Pepsi Discovered It?)第二章“针对青年人的销售史,1880—1940”。

关于乔治·巴比特(George Babbitt)和“漂亮的孩子”,参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巴比特》(Babbitt)(伦敦:乔纳森·凯波出版社,1956)第一章。关于“你们这一代的成长太不容易了”的说法,见F. 斯考特·菲兹杰拉德的《人间天堂》“幕间:1917年5月—1919年2月”。“青年人就像拥有一大盘糖果”则出自同一本书的第五章“个人主义者变成了名人”。罗莎琳德·富勒德华(Rosalind Fuller)的话在詹姆斯·R. 马洛(James R. Mellow)的《虚拟生活:F.

斯考特和丽尔达·菲兹杰拉德》(*Invented Lives: F. Scott and Zelda Fitzgerald*) (纽约: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85)第二章“永不可能有两次相同的爱”中有引用。同一章还描写了《人间天堂》获得的成功,这个话题还可见南茜·米尔福德(Nancy Milford)的《丽尔达·菲兹杰拉德:一本自传》(*Zelda Fitzgerald: A Biography*) (伦敦:鲍利海出版社)第二部分第六章“20年代”。米尔福德还引用了丽尔达·菲兹杰拉德的小说《留住我的华尔兹》(*Save Me the Waltz*)中“只不过有大把的青春”的表述。

菲兹杰拉德也分别在其两篇随笔中提到了自己早期的成功,《爵士时代的回声》(“Echoes of the Jazz Age”)和《我失落的城市》(“My Lost City”),这两篇文章和其他的文章故事一起收录在斯考特·菲兹杰拉德的《垮掉》(*The Crack-up*) (伦敦:企鹅出版社,1965)中。值得注意的是《人间天堂》的书名得自鲁珀特·布鲁克写的一首名为《提亚雷塔希提》(“Tiare Tahiti”)的诗。米尔福德还引用了丽尔达·菲兹杰拉德写的《摇摆女郎赞歌》(“Eulogy on the Flapper”),见《丽尔达·菲兹杰拉德:一本自传》第六章,这篇文章的全版收录在《丽尔达·菲兹杰拉德文字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Zelda Fitzgerald*) (塔斯卡卢萨: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97)。

关于瞄准年轻一代女孩的广告,见斯坦利·C.霍兰德和理查德·杰梅恩合作的《在百事可乐出现之前有没有百事这一代?》第二章“针对青年人的销售史,1880—1940”。这一章同样也是引语“如果我是杂货生产商……”的出处。霍尔的文章《美国摇摆女郎汇编》(“The Flapper Americana Novissima”)发表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922年的6月刊上。关于摇摆女郎的进化,见斯蒂文森的《巴比特和波西民》第六章,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阿兰·霍吉(Alan Hodge)的《悠长周末:二三十年代的生活故事》(*The Long Week-end: The Living Story of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 (伦敦:企鹅出版社,1971)第三章“女人”。

很多传记都描写了范伦铁诺。其中信息最全的是伊尔文·斯库尔曼(Irving Schulman)的《范伦铁诺》(*Valentino*) (纽约:三叉戟出版社)。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的《范伦铁诺夫人:娜塔莎·兰波娃的多面生命》(*Madame Valentino: The Many Lives of Natasha Rambova*) (伦敦:阿比维尔出版社,1991)也很有用。还可以参见亚历山大·沃克(Alexander Walker)的《明星地位:好莱坞现象》(*Stardom: The Hollywood Phenomenon*)第十章“大众情人的加入:范伦铁诺”;诺尔曼·A.麦肯齐(Norman A. Mackenzie)的《鲁道夫·范伦铁诺的奇迹》(*The Magic of Rudolph Valentino*) (伦敦:米特芮出版社,1974);凯文·布朗罗的(Kevin Brownlow)《好莱坞:先驱者们》(*Hollywood: The Pioneers*)第十六章“银屏上的大众情人”;以及大卫·汤姆森(David Thomson)的《电影人名辞典》(*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Film*) (纽约:科诺普夫出版社,1994)。

瓦纳·法碧昂(Warner Fabian)的《烈火青年》(*Flaming Youth*) (纽约:波尼及李佛莱特出版公司,1923)在1923年出版后的头10个月里加印了14次。所谓的献给“这一时期的女性”出自这本书的绪论“作者给读者的话”;“你难道不想再一次变得年轻吗?”则出自第一章。电影版本的《烈火青年》,见 [www.geocities.com/flapper\\_culture](http://www.geocities.com/flapper_culture). 关于斯考特·菲兹杰拉德说的“我是星星

之火”，见布朗罗的《好莱坞：先驱者们》第十五章“个人崇拜”。关于布鲁斯·布利文(Bruce Bliven)的文章《摇摆女郎简》(“Flapper Jane”)，见伊丽莎白·斯蒂文森的《巴比特和波西民：美国的20世纪20年代》第九章“摇摆女郎的进化”。

关于美国梦想经济的扩张，参见布朗罗的《好莱坞：先驱者们》序言；拉塞尔·桑耶克(Russell Sanjek)和大卫·桑耶克(David Sanjek)的《美国20世纪的流行音乐产业》(*American Popular Music Business in the Twentieth*)第二章“美国作曲家、作者与出版者协会的组建以及广播录音制品业的多种经营”。关于摇摆女郎“只不过把商业手段应用到年轻这种状态中去”的表述见丽尔达·非兹杰拉德的《摇摆女郎赞歌》。要想了解连环漫画《少年哈罗德》(*Harold Teen*)，可参见露西·罗琳(Lucy Rollin)的《20世纪每10年间的青少年文化：参考指南》(*Twentieth-Century Teen Culture by the Decades: A Reference Guide*)第二章“20世纪20年代”。

高中报名人数增加见大卫·纳沙(David Nasaw)的《学会秩序》(*Schooled to Order*)第二章“世界大战之间：上学还是工作？”。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一书的第二章中描述了泰德·巴比特夸张的服饰。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米德尔镇：美国文化调查》第五章“谁养活了米德尔镇？”中包含了很多有关高中同龄人文化以及父母对青少年更多需求的态度有用材料和引用原文。这本书第十七章“发明——创造悠闲”中则介绍了“性冒险杂志”。关于高中里受欢迎的学生应具备的品质，见第十六章，“学校‘生活’”。“教育是标志”的说法也出自同一章节。

关于大学教育的普及，见保拉·S.法斯(Paula S. Fass)，《该死的和美好的：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青年》(*The Damned and the Beautiful: American Youth in the 1920s*)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第二章，“家庭再现1880—1930”。《米德尔镇》中对大学生报名量的增加体现在第十三章“谁在上学？”中。还可以参见大卫·纳沙的《定制化教育》第二章“世界大战之间：上学还是工作？”。关于米德尔镇的一位父亲抱怨大学学费的问题，详见《米德尔镇》第二章“培养孩子”。

1890年到1924年间大学生数量的四倍增长摘自霍兰德和杰梅恩的《在百事可乐出现之前有没有百事这一代？》第二章“针对青年人的销售史，1880—1940”的分段“大学生市场”。这同样也是下面两段中关于大学生市场的引用部分的出处，包括对哈佛本科生时尚需求所作的调查。更多的大学生时尚潮流问题，见法斯的《该死的和美好的：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青年》第五章“同龄人文化中的竞争和一致”。

法斯这本书的第七章“解放的标志”中详细介绍了大学生对热辣爵士的偏好，同一话题还可参见理查德·M.苏德霍尔特(Richard M. Sudhalter)和菲利普·R.埃文斯(Philip R. Evans)的《比克斯：男人和传奇》(*Bix: Man and Legend*) (伦敦：四重奏出版社，1974)第八章。詹姆斯·T.法雷尔(James T. Farrell)关于“冒牌大学生”的描述出自《斯塔兹·朗尼根的青年时代》(*The Young Manhood of Studs Lonergan*) (纽约：现代图书馆，1934)第十七章。关于“你穿衣服”的

演说出自波希·马科斯(Percy Marks)的《塑料时代》(*The Plastic Age*) (纽约:世纪出版社,1924)第十七章。关于大学校园里的高度统一性和引用部分“个人永远不可能逃脱……”,参见法斯第四章“在同龄人社会中学习和玩耍”。关于受欢迎所必备的品质,见法斯同一本书第三章“青年人的世界:同龄人社会”。

关于受辱,见法斯同一本书第四章。关于对书呆子和学习用功的学生的诋毁,见法斯这本书的第三和第四章。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英雄,见法斯的总结“变化和稳定”。关于《妇女家庭日报》掀起的反爵士乐“圣战”,见法斯同本书第一章“令我们不满的孩子”。关于男女合校中的爱抚,见法斯这本书第七章“解放的标志”。关于婚前性行为仍然是一个强大的禁忌,参见《米德尔镇》第十章“婚姻”。关于淫秽书籍和“坏蛋”,见波希·马科斯的《塑料时代》第十五章。关于禁酒法案及对青年人对它的蔑视,见法斯同一本书的第七章“解放的标志”。

关于卡本(Capone)占领西塞罗,以及“令人生畏力量的公然展示”这一说法,见伊丽莎白·斯蒂文森的《巴比特和波西民》第九章“摇摆女郎的进化,1920—1926”。关于鲍比·法兰克斯(Bobby Franks)谋杀案的细节以及里奥波德(Leopold)和娄波(Loeb)的被捕,详见海尔·西格顿(Hal Higdon)的《世纪犯罪:里奥波德和娄波一案》(*The Crime of the Century: The Leopold and Loeb Case*) (纽约:G. P. Putnam & Sons,1975)第一部分。《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关于“魔鬼似的精神”的说法被西格顿引在第二部分第二章“痛苦”里;朱基·本·林德塞(Judge Ben Lindsey)的话则引在第十五章“抗辩”里;关于这两个人像著名电影明星、聘请心理学家以及赫尔斯特(Hearst)对弗洛伊德(Freud)发出的邀请,见第十三章“定罪”;对里奥波德和娄波所作的心理评估,见第十七章“缓解”;关于这两者被年轻的女孩子当作“传奇英雄”一般包围,见第十八章“精神病学家”。

关于格莱伦斯·达洛(Clarence Darrow)的总结陈词,见西格顿这本书第十九章“一决胜负”以及第二十章“ABCD”。陈词的全文版本引在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法学院所属著名的美国案件审判网上,由道格拉斯·O. 林德(Douglas O. Linder)负责撰写(<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trials/leoploeb/leopold.htm>)。关于法官卡夫莱(Caverly)的结案陈词以及对被告年龄的考虑,见同本书第二十一章“判决”。更多的相关阅读参见莫琳·麦克南(Maureen McKernan)的《令人惊叹的犯罪以及对里奥波德和娄波的审判》(*The Amazing Crime and Trial of Leopold and Loeb*) (纽约:西格内特出版社,1957),以及内森·里奥波德的《生命+99年》(*Life + 99 Years*) (伦敦:四方形出版社,1960)。

## 第十六章 灰姑娘情结

章前引言出自罗伯特·S. 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米德尔镇》第二章“培养孩子”。关于只存在想象中的大众思想,参见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The Crowd*)第二章“大众的情绪和道德”以及第四章“大众觉悟接受的宗教表现”。

伊瑟尔罗·曼宁(Ethel Mannin)在《20年代的年轻人》(*Young in the Twenties*) (伦敦:贺金森出版社,1971)第二章“斯道尔夫妇的观点”中提到了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所写的戏剧《R. U. R》(*R. U. R.*)。叶文京奈·扎米亚京(Yevgeny Zamyatin)的小说《我们》(*We*) (伦敦:企鹅出版社,1972)先后启发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和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更多的细节可参见扎米亚京的短论集《一个苏联异教徒》(*A Soviet Heretic*) (伦敦:四重奏出版社,1991)。关于《大都市》(*Metropolis*),全文见《大都市:弗里茨·朗的电影》(*Metropolis: A Film by Fritz Lang*) (伦敦:洛里默出版社,1973):这本书里面收录了保罗·M.延森(Paul M. Jensen)写的一篇出色的评论文《大都市:电影和书》(“Metropolis: The Film and the Book”)。

关于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批量生产,见大卫·A.豪谢尔(David A. Hounshell)的《从美国系统到批量生产1800—1932》(*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1800—1932*)第八章“批量生产的风潮及其批判者”。关于爱德华·费林(Edward Filene),见《成功生活在这个机器时代》(*Successful Living in This Machine Age*) (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1931)。关于生的能力和死的愿望,见西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自我和本我》(*The Ego and the Id*) (伦敦:荷加斯出版社,1962),还可以参见默顿·亨特(Morton Hunt)的《心理学故事》(*The Story of Psychology*)第七章“深层次的探究者:西蒙德·弗洛伊德”。关于“群众心理”,见爱德华·博那伊(Edward Bernays)的《宣传》(*Propaganda*) (纽约:贺瑞斯·利沃莱特出版社,1928)第四章“公共关系心理”。

关于批量生产作为范围更广的社会革命,见爱德华·A.费林的《成功生活在这个机器时代》第二十三章“社会规划”。博那伊隐形政府的说法见《宣传》第三章“新宣传人员”;需要更多信息,也可以参见斯图亚特·伊文(Stuart Ewen)的《意识的统帅》(*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第五章“消费和社会变革”。“在市场中很激进”这一说法可见霍兰德和杰梅恩的《在百事可乐出现之前有没有百事这一代?》第二章“针对青年人的销售史”;原文则见阿尔伯特·T.坡芬伯格(Albert. T. Poffenberger)的《广告心理学》(*Psychology in Advertising*) (纽约:A. W. 肖出版公司,1925)。

林德关于赋予青年人新价值的资料——他们新的机器时代代表了一种廉价、强壮而又适应力强的劳力,出自《米德尔镇》第五章“谁养活了米德尔镇”里。费林关于解放大众的话出自他的《成功生活在这个机器时代》绪论“一个定义”。青少年罪犯关于“让你希望得到一些东西”的说法引自爱丽丝·米尔斯·米歇尔德(Alice Miller Mitchell)的《孩子和电影》(*Children and Movies*)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29)第十三章“犯罪者和电影”。

关于禁酒法案的概况,见肯尼思·奥索普的《酿私酒者》、爱德华·波尔的《禁酒:改变美国的13年》以及伊丽莎白·斯蒂文森的《巴比特和波西民》第六章“哈丁的时代——1920—1923”。关于“20世纪20年代典型罪犯”的引语出自奥索普的《酿私酒者》第二十章“城市生活

的潮漫区”。关于匪徒和生意之间的关系,见马克思·伦纳尔(Max Lerner),《作为文明社会的美国》(*America as a Civilisation*)(伦敦:乔纳森·坎普出版社,1958)。伊丽莎白·斯蒂文森在《巴比特和波西民》第六章“哈丁的时代”里引用了简·亚当斯的例子。对詹姆斯·T.法雷尔的引用来自于现代图书馆版的《斯塔兹·朗尼根》(*Studs Lonergan trilogy*)三部曲(纽约:现代图书馆,1938)的绪论部分。

G.斯坦利·霍尔的《大众能统治世界吗?》(“Can the Masses Rule The World?”)收录在他的论文集里(第455篇)。关于他对“青年、自由和新知识”的赞歌见1924年7月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埃德蒙·C.斯坦福德(Edmund C. Sanford)写的一篇文章《格兰佛·斯坦利·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更多关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和纳尔斯·安德森(Nels Anderson)“亲身经历”引用部分的细节,参见纳尔斯·安德森的《论流浪和无家可归》(*On Hobos and Homelessnes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中由拉法埃尔·罗梯(Raffaella Rauty)写的绪论。下面的“活跃男孩”这段引自纳尔斯·安德森的《论流浪和无家可归》第十章“犯罪者和流浪者”。

弗雷德里克·M.思拉舍(Frederic M. Thrasher)对城市混杂地带的思考见《团伙》(*The Gang*)(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3)。最初的绪论是现在的第一部分“团伙的自然历史”;关于美国城市和青年人不稳定现象的引语出自第二十章“攻击问题”,他的论点是“孩子们在这些地方能够享受少有的自由”;关于“青少年的幻想”,见第六章“浪漫主义的角色”;关于匪徒团伙中的暴力和性侵犯,见第九章“团伙中的性问题”;第十四章“团伙结构”则说明了电影的影响问题,而“反道德的社会模式”出自第十二章“社会模式和团伙”。

思拉舍对非法酿酒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作的总结来自第十八章“团伙和组织犯罪”;结论则在第二十章“攻击问题”和二十一章“预防犯罪和团伙”中;还可参见威廉·希利(William Healy)和奥古斯塔·F.布罗纳(Augusta F. Bronner)的《少年犯和罪犯:他们的所为所不为》(*Delinquents and Criminals: Their Making and Unmaking*)(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6)第四部分“终论”。

杰克·布莱克(Jack Black)关于犯罪的经典作品《你不可能赢》(*You Can't Win*)的第一版(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27)由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作序。引语“社会就像一台机器,把我磨成碎片”出自第十九章。《你不可能赢》最近的再版(旧金山:AK出版社,2000)由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作序。关于芝加哥匪徒团伙所犯的凶杀案,见奥索普的《酿私酒者》第四章“过时的奥东内尔斯”。关于非法造酒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见爱德华·波尔的《禁酒》第十六章“致命的胜利”。

玛格瑞特·米德(Margaret Mead)关于环境影响青少年的看法,见《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纽约:莫洛可鲁出版社,1973)第十四章“教育以供选择”。她对G.斯坦利·霍尔的批判以及去萨摩亚的原因见第一章“绪论”;她在萨摩亚关于青少年性行为 and 养

育子女的发现见第十章“普通女孩的经历和个性”以及第十三章“在萨摩亚对比之光下我们的教育问题”。关于她的书既是写萨摩亚的,也是写“1926年到1928年的美国”的描述,见1973年版序言。“一个大声呼唤选择的社会”见第十四章“教育以供选择”,美国社会“金钱至上的本质”,“教义的教化”以及“灰姑娘的故事”这些引语同样也出自这一章。

对范伦铁诺之死、曼哈顿混乱以及后续的全面描述,见伊尔文·斯库尔曼的《范伦铁诺》“第一幕:第一场”;关于他在伦敦受到追捧和围堵,见“第三幕:第十三场”;关于“粉扑”报道和范伦铁诺的回应,见“第三幕:第十六场”;还可参见亚历山大·沃克的《明星地位》、麦肯齐的《鲁道夫·范伦铁诺的奇迹》以及迈克尔·莫里斯的《范伦铁诺夫人》。关于过分渲染的报道,参见肯尼斯·安格尔(Kenneth Anger)的《好莱坞巴比伦》(*Hollywood Babylon*),这本书里也重现了1926年7月18日“粉扑”报道的全文,所在的章节叫做“鲁迪的保留剧目”。

关于美国文化中电影的影响以及对电影的攻击,见爱丽丝·米尔斯·米歇尔的《孩子和电影》、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米德尔镇》第十八章“发明——创造悠闲”、以及爱德华·博那伊的《宣传》第十一章“宣传技巧”。

关于克莱拉·宝(Clara Bow),见大卫·史丹(David Stenn)的《克莱拉·宝:狂野奔跑》(*Clara Bow: Runnin' Wild*)(纽约:库珀·斯奎尔出版社),特别注意第十五、十六、十七章;还可以参见大卫·汤普森的《电影人名辞典》。关于青年人对《它》(*It*)的反响,参见爱丽丝·米尔斯·米歇尔的《孩子和电影》第十一章“孩子喜欢电影”。阿德拉·罗杰·圣约翰(Rogers St. John)的文章引用在大卫·史丹的《克莱拉·宝:狂野奔跑》第十五章里,肯尼斯·安格尔的《好莱坞巴比伦》里对此也有记载。

对《新学生》(*New Student*)杂志的引用见保娜·法斯的《该死的和美好的》第八章“文化自由主义下的政治”;大学生对禁酒法案的态度见第七章“解放的标志”;美国学生联盟的详情见第八章“文化自由主义下的政治”,这一章节还包括学生对种族问题的态度。关于1929年6月保罗·怀特曼(Paul Whiteman)乐队演出的详情,见苏德霍尔特和埃文斯的《比克斯:男人和传奇》第十八章。关于《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和爵士乐的走红,见阿诺德·肖(Arnold Shaw)的《爵士时代:20年代的流行音乐》(*The Jazz Age: Popular Music in the Twenties*)(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

关于黑人对这种爵士乐走红的反应和民主的新思想,见艾伦·洛克(Alain Locke)编著的《新黑人》(*The New Negro*)(纽约:试金石出版社,1997)前言和艾伦·洛克所写的《新黑人》;关于哈姆莱复兴和青年人之间的联系,见《新黑人》上《黑人青年有话要说》;关于哈姆莱作为种族之都和“种族问题的大规模实验”,见《新黑人》上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所写的《文化之都哈姆莱》(“Harlem, the Culture Capital”)。如果希望获得更多基本信息、了解当时的时间表和精彩音乐,见《黑色狂想曲:哈姆莱复兴的音乐和文字》(*Rhapsodies in Black: Music and Words from the Harlem Renaissance*)(洛杉矶:犀牛唱片公司,2000)。

“献给年轻黑人艺术家的”的绝版杂志《火》(*Fire*)后来进行了再版(无出版细节)。文中引用的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对黑人复兴的看法,见《大海:一本自传》(*The Big Sea: An Autobiography*)(伦敦:冥王星出版社,1986)中《当黑人站在时尚之巅》(“When the Negro Was in Vogue”)和《哈姆莱文学界》(“Harlem Literati”)。卡尔·范·维克腾的《黑鬼天堂》(*Nigger Heaven*)最近再版(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00)。关于引语“黑人以及黑人相关的所有东西已经变成了一种潮流”,见华莱士·瑟曼(Wallace Thurman)的《黑草莓:一本黑人生活的小说》(*The Blacker the Berry: A Novel of Negro Life*)(纽约:科利埃尔出版社,1970)第五部分“比鲁斯王的胜利”。兰斯顿·休斯对棉花俱乐部的看法和他理想的幻灭,见《大海》中的《当黑人站在时尚之巅》和《恩主和朋友》(“Patron and Friend”)。

关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孩子的早熟,见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米德尔镇》第十一章“培养孩子”。“高中里受欢迎的女孩”的引语见《米德尔镇》第十八章“发明——创造悠闲”。

## 第十七章 追求享乐

章前对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的引用出自《漩涡》(*The Vortex*)第一幕,收录在《戏剧集:1》(伦敦:梅休因出版社,1999)里。关于布兰达·丹·保罗(Brenda Dean Paul)以及《黑鸟》(*The Blackbirds*),见她不同寻常的自传《我的第一次生命》(*My First Life*)(伦敦:约翰·朗出版社,1935)第六章“今天我们活着”,这一章同样也是她对派对所作评价的来源;关于她的背景,见第三章“新生命”;第六章则包含了她对“光明的年轻人”的看法。关于20世纪20年代热衷派对的人,还可以参见安·启思藜(Ann Chisholm)的《南茜·库纳德》(*Nancy Cunard*)(伦敦:西季威克和杰克逊出版社,1979)以及杰弗里·沃尔夫的《黑太阳:哈里·克罗斯比的简短飞越和极端衰落》(*Black Sun: The Brief Transit and Violent Eclipse of Harry Crosby*)第七到十章。

斯坦利·霍尔“野蛮人几乎都是伟大的舞者”的定义出自《青春期》第三章“电机动力的发展和作用”。关于巴黎的美国人,见杰弗里·沃尔夫的《黑太阳》以及威廉·怀瑟(William Wiser)的《疯狂年代:20年代的巴黎》(*The Crazy Years: Paris in the Twenties*)(纽约:雅典娜神庙出版社,1983),散见各处。关于“屋顶上的牛”,见弗兰西斯·施泰格缪勒的《考克多:一本传记》第五章“创造20年代”;关于萨丽(Sari)的引语,见怀瑟的《疯狂年代:20年代的巴黎》第十四章“屋顶上的牛”。

关于“四艺术舞会”的描述和克拉瑞奇酒店的引语,见杰弗里·沃尔夫的《黑太阳:哈里·克罗斯比的简短飞越和极端衰落》第十章,原文引用自吉米·查特斯(Jimmie Charters)的《这一定就是那地方:蒙帕那斯记忆》(*This Must Be the Place: Memories of Montparnasse*)(纽约:李·傅尔曼出版社,1937)。萨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对20世纪20年代晚期柏林的记忆,见《反抗希特勒》序言第十三章。关于柏林成为娱乐之都和对“豪斯之家”的描述,见梅尔·

戈登(Mel Gordon)的《生理惊慌:魏玛柏林的色情世界》(*Voluptuous Panic: The Erotic World of Weimar Berlin*) (洛杉矶:Feral House,2000),“女孩文化和整夜的闲逛”。关于男妓,见《生理惊慌》中“娼妓都市”。“疯狂的骑术比赛”引语则出自同一本书中“柏林意味着男孩”。约翰·亨利·麦凯(John Henry MacKay)的小说《时代浪子》(*The Hustler*) (洛杉矶:艾利森出版社,1985)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出的时代性作品。

关于战后英国流行的美国式消费主义,见诺里·布兰森(Noreen Branson)的《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Britain in the 1920s*)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77)第十四章“新的享乐”;以及约翰·蒙格马利(John Montgomery)的《20年代》(*The Twenties*) (伦敦:乔治·阿伦和昂温出版社,1970)第三章“变化着的场景”。关于战争借款的赔偿问题,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尔·霍吉的《悠长周末:二三十年代的生活故事,1918—1939》(伦敦:企鹅出版社,1971)第五章“战后政治”。关于当局对美国 and 年轻人消费主义的敌视,见罗纳德·布莱丝的《幻想的时代:二三十年代的英国》(伦敦:企鹅出版社,1964)第二章“吉克斯有益的故事”。

20世纪20年代早期广告心理学的盛行见E. S.特纳(E. S. Turner)的《广告的惊人历史!》(*The Shocking History of Advertising!*)第七章“技术转变”,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尔·霍吉的《悠长周末》第五章“战后政治”。年轻女性的重要性见诺里·布兰森(Noreen Branson)的《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Britain in the 1920s*)第十三章“女性”,以及约翰·蒙格马利的《20年代》第十二章“解放”。关于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女性搬到大城市的问题,见罗伯特·罗伯茨(Robert Roberts)的《经典的贫民窟》(*The Classic Slum*)第十章“节日及以后”。这一章也是跳舞狂潮那一段引语的出处。对青年人犯罪的恐惧见西里尔·伯特(Cyril Burt)的《青少年犯罪》(*The Young Delinquent*) (伦敦:伦敦大学出版社,1925)。

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政策,见杰弗里·皮尔森(Geoffrey Pearson)的《流氓:令人尊敬的恐惧史》(*Hooligan: A History of Respectable Fears*)第三章“过去的完美”。关于享乐之战和威廉·乔伊森·海克(William Joynson-Hicks)就任英国内政大臣的重要性,见罗纳德·布莱丝的《幻想的时代:二三十年代的英国》第二章“吉克斯有益的故事”,以及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尔·霍吉的《悠长周末》第三章“女性”。

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和布莱恩·霍华德(Brian Howard)以及《伊顿烛光》(*Eton Candle*)的故事在下述几本书中都有记载:马丁·格林(Martin Green)的《太阳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Sun*)第三章“新花花公子到来”、玛丽·杰奎琳·兰卡斯特(Marie Jaqueline Lancaster)的《布莱恩·霍华德:失败者的画像》(*Brian Howard: Portrait of a Failure*) (伦敦:安东尼·布隆德出版社,1968)第四章“1922:伟大的昙花一现,伊顿烛光”、以及汉弗雷·卡本特(Humphrey Carpenter)的《布莱希尔德的一代:伊芙琳·沃和他的朋友》(*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 Evelyn Waugh and His Friends*)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89)第一部分“伊顿烛光”第一章“……以为他们一定是外国人”。关于霍华德和艾克顿的背景和早期生活,见玛丽·杰奎琳

琳·兰卡斯特的《布莱恩·霍华德：失败者的画像》第三章“烛光旁的伊顿”、第五章“承诺的标记”；还可见马丁·格林的《太阳的孩子》第四章“1918—1922：伊顿”、第五章“1922—1925：牛津”。

关于诺艾尔·克华德和《漩涡》，见《戏剧集：1》(*Collected Plays: 1*)，以及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的《诺艾尔·克华德》(*Noel Coward*)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5)第八章“漩涡”。关于南茜·库纳德及其无尽的酗酒，见安·启斯蒙的《南茜·库纳德》第六章“特写镜头下的一年”。关于温德姆·刘易斯的画像，见南茜·库纳德《阐述》(*Illustrations*)第一部分12页，关于她“荡妇”的叙述，见第八章“阿尔多斯·赫胥黎”。她的自我评价“完美的陌生人”出自她的诗集《罪犯》(*The Outlaw*)，也在《南茜·库纳德》第九章“旅行和诗歌”中被引用。

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俱乐部生活，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兰·霍吉的《悠长周末》第八章“娱乐”。关于南茜·库纳德和迈克尔·阿伦(Michael Arlen)，见启斯蒙的《南茜·库纳德》第七章“迈克尔·阿伦”。“被无聊无聊至死”的引语和对蓝调的描述出自迈克尔·阿伦的《绿帽子》(*The Green Hat*) (萨福克，英国：博伊代尔出版社，1983)。“爱丽丝·斯多姆”(Iris Storm)的话“为了我所不知的欲望”出自《绿帽子》第一章“绿帽子”。20世纪20年代领土防御法的情况和吉克斯发起的道德教化运动，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兰·霍吉的《悠长周末》第八章“娱乐”和罗纳德·布莱丝的《幻想的时代：二三十年代的英国》第二章。

关于弗丽达·坎佩顿(Freda Kempton)吸食过量可卡因，见马雷克·科恩(Marek Kohn)的《毒品女孩》(*Dope Girls*)129页。“光明的年轻人”起源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兰·霍吉的《悠长周末》第八章“娱乐”，以及查尔斯·格雷夫斯的《以前的破日子》(*The Bad Old Days*) (伦敦：费伯出版社，1961)第五章。丹·保罗对这一运动的看法见《我的第一次生命》第六章“今天我们活着”。亚力克·沃(Alec Waugh)发明鸡尾酒派对见马丁·格林的《太阳的孩子》第六章“1925—1932：布莱恩和哈罗德在伦敦”。大卫·坦纳特(David Tennant)的《嘎高懿尔的开业》(*The Opening of the Gargoyle*)被菲利普·霍尔(Philip Hoare)的《严肃的享乐：斯蒂芬·坦纳特的生活》(*Serious Pleasures: The Life of Stephen Tennant*) (伦敦：汉密什·汉密尔顿出版社，1990)第四章“内皮尔和埃勒维兹”所引用。

伊芙琳·沃1926年9月对狂野聚会的描述出自麦克·戴维斯编的《伊芙琳·沃的日记》(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76)第三章“20年代的日记1924—1928”。哈罗德·艾克顿说的关于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的引语出自汉弗雷·卡本特(Humphrey Carpenter)的《布莱希尔德的一代》(*The Brideshead Generation*)第三部分“1924—1929：光明的年轻人”第三章“一种累积的无用”。关于伊芙琳·沃和“怪兽”演员，见《伊芙琳·沃的日记》第三章“20年代的日记1924—1928”中1925年9月19日的那篇。

关于署名专栏的兴起，见格雷夫斯的《以前的破日子》第五章；布兰达·丹·保罗的《我的第一次生命》第六章“今天我们活着”；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兰·霍吉的《悠长周末》第四章

“阅读的问题”；汉弗雷·卡本特的《布莱希尔德的一代》第三部分“1924—1929：光明的年轻人”第三章“一种累积的无用”；以及马丁·格林的《太阳的孩子》第六章“1925—1932：伦敦，新朋友和同盟”。

关于“光明的年轻人”对父母的憎恨，见安·启斯蒙的《南茜·库纳德》第十七章“与库纳德女士的绝交”；杰奎琳·兰卡斯特的《失败者的画像》第十四章“‘光明的年轻人’的起起伏伏”；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y Nichols)的《父亲形象》(*Father Figure*) (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72)。伊芙琳·沃的木刻《冷酷弑父》(*That Grim Act Parricide*)在汉弗雷·卡本特的《布莱希尔德的一代》190页到191页上有详细描述。《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对“现代女孩的兄弟”的批判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兰·霍吉的《悠长周末》第八章“娱乐”。关于詹姆斯·拉维尔(James Laver)的打油诗，见罗纳德·布莱丝《幻想的时代：二三十年代的英国》第二章“吉克斯有益的故事”。

关于“光明的年轻人”作为破坏罢工者，见《伊芙琳·沃的日记》第三章“20年代的日记1924—1928”中1926年5月11日的那一篇；诺里·布兰森，《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第十二章“大罢工”；以及菲利普·霍尔的《严肃的享乐》第五章“序曲……”。“光明的年轻人”的传播见约翰·蒙格马利的《20年代》第十四章“光明的年轻家伙们”。贝弗利·尼科尔斯说的话见《甜和20年代》(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58)第九章“注定要失败的行动之家”。1927年《时尚》(*Vogue*)杂志的口红引语出自玛丽·杰奎琳·兰卡斯特的《布莱恩·霍华德：失败者的画像》第二部分“1927—1940：废弃的年代”第十一章“20年代的滋味”。

关于斯蒂芬·坦纳特(Stephen Tennant)作为“光明的年轻人”运动中最后一位名人，见菲利普·霍尔的《严肃的享乐》第七章“舞台中央”；关于坦纳特对美国女演员的仰慕，见第二章“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关于1928年春的派对，见第八章“插曲”。关于布兰达·丹·保罗和“光明的年轻人”之死，见《我的第一次生命》第六章“今天我们活着”。布莱恩·霍华德(Brian Howard)所说的“我烦透了伦敦”和阿兰娜·哈波(Allanah Harper)的话同出自玛丽·杰奎琳·兰卡斯特的《布莱恩·霍华德：失败者的画像》第十四章“‘光明的年轻人’的起起伏伏”。

关于诺哈·C.詹姆斯(Norah C. James)，参见《白白受累》(*Sleeveless Errand*) (纽约：威廉·莫洛出版社，1929)。温德姆·刘易斯关于大产业和青年人的引语出自《青年的宿命》第一部分第一章。“40岁的人孩子似的天真”出自温德姆·刘易斯的《青年的宿命》第三部分“展品”。关于斯蒂芬·坦纳特的“屈尊态度”，见菲利普·霍尔的《严肃的享乐》第八章“插曲”；引语则出自1928年9月14日的《每日快报》上的一篇文章。

关于20世纪20年代这一代的胡闹，见伊芙琳·沃的《邪恶的躯体》(*Vile Bodies*) (伦敦：企鵝经典出版社，2000)。关于战争书籍的出现，见塞缪尔·海因兹(Samuel Hinds)的《想象出来的战争》(*A War Imagined*)第二十一章“创造神话”。关于19世纪90年代这一代的解体，见罗伯特·格雷夫斯的《摆脱一切》、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的《英雄的死亡》(*Death*

of a Hero)以及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 Maria Remarque)的《新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雷马克的话出自《新西线无战事》第十二章。关于战后一代理想的幻灭,见诺艾尔·克华德的《验尸》(*Post-Mortem*) (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31)。

汉斯·齐赫(Hans Zehrer)的文章,参见罗伯特·沃尔,《1914 这一代》第二章“德国:年轻一代的使命”。对保罗和伊丽莎白的“卧室圣地”的描述见让·考克多的《折磨人的孩子》(*Les enfants terribles*) (伦敦:哈维尔出版社,1999)第一部分。关于《折磨人的孩子》的写作背景和布赫光特(Bourgoint)兄妹的故事,参见弗兰西斯·施泰格缪勒的《考克多:一本传记》第六部分“鸦片、俄尔甫斯和《诗人之血》”。更多20年代青年理想幻灭和死亡的信息,参见玛丽·杰奎琳·兰卡斯特的《布莱恩·霍华德:失败者的画像》;理查德·M. 苏德霍尔特和菲利普·R. 埃文斯写的比克斯·贝德贝克传《比克斯:男人和传奇》;布兰达·丹·保罗的《我的第一次生命》;伊芙琳·沃的《邪恶的躯体》;杰弗里·沃尔夫的《黑太阳》以及南茜·米尔福德的《丽尔达·菲兹杰拉德》。

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情绪延续到30年代,参见伊瑟尔罗·曼宁的《20年代的年轻人》第十四章“向三十年代泛滥”。《美丽新世界》1932年由查图与文德斯出版社出版。萨巴斯蒂安·哈夫纳对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之死带来的影响的看法,见《反抗希特勒》序言第十三章。引语“一个垂死年代”出自汉斯·齐赫之口,见罗伯特·沃尔的《1914 这一代》第二章“德国:年轻一代的使命”。关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联盟和候鸟组织,见沃尔特·拉克尔的《年轻的德国》第十六章“联盟的全貌”和第十八章“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

## 第十八章 纳粹思想指引下的士兵

基尔传单的内容出自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起源和发展 1922—1945》(*The Hitler Youth: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1922—1945*) (纽约:库珀·斯奎尔出版社,2000)第五章“统治”。下面几段中引用的梅丽塔·玛舒曼(Melita Maschmann)的话出自《清单:以前的我的档案》(*Account Rendered: A Dossier on My Former Self*) (伦敦:阿贝拉尔-舒曼出版社,1964)第一章。350万希特勒青年这一数据出自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

关于代间对抗的引文出自玛舒曼的《清单》第一章。巴尔杜·冯·席腊赫(Baldur von Schirach)所说的“从一个民族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青年人永远是对的”这句话出自艾里希·米乔德(Erich Michaud)写的《思想指引下的士兵: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年轻人》(*Soldiers of an Idea: Young People Under the Third Reich*),选自乔瓦尼·列维(Giovanni Levi)和琼-克劳德·史密特(Jean-Claude Schmitt)编的《西方年轻人史卷二》(*A History of Young People in the West Volume Two*)第八章。希特勒说的“从年轻人入手”引在格哈德·雷姆珀(Gerhard Rempel)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Hitler's Children: The Hitler Youth and the SS*) (查珀尔希尔: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9)第一章“绪论”。

关于普遍的经济危机,见约翰·肯尼思·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1929 经济大萧条》(*The Great Crash of 1929*)(伦敦:企鹅出版社,1975)。关于批量生产改变整个社会秩序的能力,见爱德华·A. 费林的《成功生活在这个机器时代》,引用的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的话则见《大众的叛变》(*The Revolt of the Masses*)(纽约:诺斯安姆出版公司,1932)第一章“大众的到来”。关于希特勒青年成为思想指引下的个体士兵,见 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大众是被奴役的一群”的说法出自《乌合之众:流行心理研究》(*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第三章。

关于“世界上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之间的斗争”,见朱利安·塞蒙兹(Julian Symonds)的《30年代:萦绕的梦想》(*The Thirties: A Dream Revolved*)(伦敦:费伯出版社,1975)第十二章“西班牙”。关于年轻人中的极化现象,可参见的书有:萨巴斯蒂安·哈夫纳的《反抗希特勒》、朱利安·塞蒙兹的《30年代》、梅丽塔·玛舒曼的《清单》、大卫·普赖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的《尤内蒂·米特福德:追求》(*Unity Mitford: A Quest*)(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76)、凯文·英格瑞姆(Kevin Ingram)的《反叛:埃斯蒙德·罗米利的短暂生命》(*Rebel: The Short Life of Esmond Romilly*)(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85)、以及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的《荣誉和叛军》(*Hons and Rebels*)(伦敦:维克多·戈伦茨出版社,1960)。

路易斯·麦克尼斯(Louis MacNeice)笔下的“通过放弃自我来实现自我满足”可见米兰达·卡特(Miranda Carter)的《安东尼·布朗特:他的人生》(*Anthony Blunt: His Lives*)(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1)第五章。引文“我们想要的是同样的东西”出自丹尼尔·格林(Daniel Guerin)《褐色瘟疫:旅行于魏玛德国晚期纳粹德国早期》(*The Brown Plague: Travels in Late Weimar and Early Nazi Germany*)(伦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4)中的“灾难之前”。

关于纳粹通过 1930 年的选举获得权力,见萨巴斯蒂安·哈夫纳的《反抗希特勒》第十四章的序言,以及 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四章“诞生”。关于法西斯对民族社会党人的影响,见艾里希·米乔德的《思想指引下的士兵》。关于联盟没能形成持久的反对力量,见沃尔特·拉克尔,《年轻的德国》第十五章“恩斯特·巴斯克和自由团”。恩斯特·威廉埃·施曼(Ernst Wilhelm Eschmann)的引语,见罗伯特·沃尔《1914 这一代》第二章“德国:年轻一代的使命”。

联盟和德国整体上的青年运动的反民主化倾向在彼得·盖伊的《魏玛文化:局外人成为当事人》(*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第六章“父辈的复仇:客观性的上升和降落”中得到很好的诠释。《新西线无战事》中的表述,见 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四章“诞生”。关于希特勒承诺“1914—1918 伟大的战争游戏”的回归,见萨巴斯蒂安·哈夫纳的《反抗希特勒》第十四章序言。

失业对德国年轻人的影响详见沃尔特·拉克尔《年轻的德国》第十八章“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纳粹的传播见丹尼尔·格林《褐色瘟疫》中的“灾难之前”,下面几段引用丹尼尔·格林

说的话也出自同一章,包括他对青年旅馆中政治极化现象的描述、德国青年的迷惘和痛苦的分化、以及他对“野团伙”的描述。杜克大学版本的《褐色瘟疫》附录中也收录了克莉斯汀·弗尼亚(Christine Fournia)写于1931年的名为《环形青年团伙》(“The Ring Youth Gangs”)的文章。

关于青年运动和纳粹夺取权力的关系问题,参见沃尔特·拉克尔《年轻的德国》第十八章“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第十九章“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关于德国的失业、青年运动的失败以及德国青年对纳粹的倾向,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这一章还详细讲述了1932年10月在波茨坦的胜利集会事件。

小说《希特勒青年夸克斯》(*Hitlerjunge Quex*,)及其改编的电影的重要性,参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Detlev J. K. Peukert)《纳粹德国之内:每日生活中的服从、反对和种族主义》(*Inside Nazi Germany: Conformity, Opposition and Racism in Everyday Life*) (伦敦:企鹅出版社,1993)第二章“民族社会主义的抬头和工业阶级社会的危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uer)的《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德国电影心理》(*From Caligari to Hitler: A Psychology of German Film*) (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第二十一章“民族史诗”。关于赫伯特·诺库斯(Herbert Norkus)的真实故事,详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四章“诞生”。

关于纳粹政权和美国大众控制试验的关系问题,见丹尼尔·格林《褐色瘟疫》中的“灾难之前”,以及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纳粹德国之内》第二章“民族社会主义的抬头和工业阶级社会的危机”和第四章“每日生活中的元首神话和赞同”。关于早期的纳粹宣传和1932年希特勒青年团的禁止,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

关于希特勒青年团和共产主义以及社会民主青年组织的规模比较,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一章绪论。关于纳粹鼓吹和德国现存文化神话之间的关系,见彼得·盖伊《魏玛文化》第三章“秘密德国:诗歌的力量”,第四章“全体的饥饿:现代性的试验”。对纳粹夺取政权后的活动,参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以及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纳粹德国之内》第七章“工人阶级:每日生活和反对”。

对授权法案第一人称的叙述,见萨巴斯蒂安·哈夫纳《反抗希特勒》中的“革命”第十九章。关于关闭工会和焚毁书籍,见丹尼尔·格林《褐色瘟疫》的“灾难之后”,第十章“工会上的卐字标志”、第十三章“他们的监狱”、第十五章“地下组织”;还可参见萨巴斯蒂安·哈夫纳《反抗希特勒》中的“革命”、“告别”和第二十八章;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关于马格斯·西谢腓(Magnus Hirschfeld)博士的性学研究所被洗劫,参见梅尔·戈登的《生理惊慌:魏玛柏林的色情世界》中的“烈火中的世界”。

关于野蛮和技术的结合,详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纳粹德国之内》第三章“‘小人’情绪的矛盾”,以及丹尼尔·格林《褐色瘟疫》的“灾难之后”,第十二章“另一个德国”。引语“永不停止的进行曲和鼓声”出自萨巴斯蒂安·哈夫纳《反抗希特勒》中的“告别”第三十四章。关于纳粹完全控制的目的,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就和在民族社会主义德

国的所有部门一样,对所有德国人的完全控制是这个政府的终极目标。”

引语“3月的紫罗兰”用来指在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加入的人,参见梅丽塔·玛舒曼的《清单》第一章,他们还被称为“三月意外”。哈夫纳对“百万倍的精神崩溃”的分析,见《反抗希特勒》“革命”第十九章。格林1933年4月住进一家青年旅馆的详情,见《褐色瘟疫》“灾难之后”第一章“潮流”;关于“候鸟运动”坚持者,见第十二章“另一个德国”。

关于德国青年内心向纳粹革命投降的问题,见萨巴斯蒂安·哈夫纳《反抗希特勒》第一章序言。希特勒1933年所说的“你的孩子已经属于我们了”收录在基莉的《希特勒青年团中的生活》(圣地亚哥:朗森特图书出版公司,2000)第五章“家庭生活”里。关于德国青年运动的终结,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以及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三章“统一者、犯罪者和执行者”。

巴尔杜·冯·席腊赫1933年6月的就任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以及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的《纳粹德国之内》第八章“年轻人:动员和拒绝”。360万希特勒青年这一数据出自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冯·席腊赫对希特勒青年团结构的重整也出自这一章。关于希特勒青年的宣誓,见珍妮弗·基莉(Jennifer Keeley)《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Life in the Hitler Youth*)第一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

关于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项目,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关于统一服装问题,见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一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这种统一的着装是由希特勒设计的这一点在艾里希·米乔德的《思想指引下的士兵: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年轻人》和乔瓦尼·列维和琼-克劳德·史密特编的《西方年轻人史卷二》中都有提及。

俄里卡·曼恩对“和平运动”的引用见丹尼尔·格林《褐色瘟疫》“灾难之后”第八章“战争或和平”,格林所说的“一代人正在公然地进行自我准备”同样也是出自于此。关于军事教育和“我们大部分的阅读材料”这段引语,参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的《纳粹德国之内》第八章“年轻人:动员和拒绝,希特勒青年团内的镇压和‘解放’”。关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民意国家”的概念,详见H.W.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八章“教育”。

关于希特勒青年团入团典礼的描述和完整的誓言内容,见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一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阿道夫·希特勒说的“捕食猛兽的骄傲和独立”这段话引在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七章“竞争者、拳击手、格斗手”里,希特勒的名言“和克虏伯钢铁一样坚强”也出自这里。梅丽塔·玛舒曼对这一名言的反应以及加入德意志少女联合会的决定见《清单》第二章。

关于纳粹对待女性的态度,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纳粹德国之内》,第八章“年轻人:动员和拒绝”,以及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一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和第四章“希特勒青年团中的学校日”。关于希特勒青年团中没完没了的日程安排,见H.W.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六章“意识形态”,以及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纳粹德国之内》第九章“褐色革命”。关

于给每年取名,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

关于青年领导青年的事实,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六章“意识形态”,关于几代人之间的关系,见第八章“教育”。纳粹的教育政策详情可参见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二章“种族大战”、第四章“希特勒青年团中的学校日”;还可参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七章“竞争者、拳击手、格斗手”。

关于梅丽塔·玛舒曼和父母的分歧,见《清单》第三章。父母和孩子间混乱的关系,见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五章“家庭生活”。关于对未加入者的制裁,见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一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以及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三章“统一者、犯罪者和执行者”。关于希特勒青年团特有警察力量的建立,参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四章“男孩警察、告发者、反叛者”。

希特勒在 1934 年的纽伦堡集会上的讲话,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这一章同样也是冯·席腊赫“你的名字,我的元首,对我们来说就是永垂不朽的生命”这段口号的出处。希特勒产品的销售,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纳粹德国之内》第十章“公共表演和私人感觉”,以及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关于和伟大领袖会面的经历,见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一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

关于抵抗和引用的 J. 纪尔基(J. Georgi)的话,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十章“异议”;卡玛·劳胡特(Karma Rauhut)的话则见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七章“抵抗”;引文“这是对强加在青年身上的监狱组织的一种健康的抵制”出自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三章“统一者、犯罪者和执行者”。关于旧的青年组织试图继续他们的行动和“红色冲锋队”,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十章“异议”。

关于旧时“候鸟运动”生活方式的持续,细节见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三章“统一者、犯罪者和执行者”,这一章同时也详细介绍了“尼禄泰拉海盗团”的情况。关于纳粹和天主教青年组织的关系问题,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纳粹德国之内》第六章“中产阶级和纳粹国家”。关于希特勒青年团内部的纪律问题,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三章“统一者、犯罪者和执行者”。

关于 1936 年作为“德国少年队年”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1936 年“关于希特勒青年团的法律”也出自这一章,这一法律的全文在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一章“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中得以完整再现。关于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之间更强的联系,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二章“广泛同盟的建立”、第三章“统一者、犯罪者和执行者”。关于希特勒青年团变得令人尊敬,见艾里希·米乔德写的《思想指引下的士兵: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年轻人》,关于德意志民族政治教育学院等等机构的建立,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九章“精英”。

纳粹政权愈演愈烈的军国主义和服从机制,参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十章“异议”,而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的《纳粹德国之内》第八章“年轻人:动员和拒绝”则包含了德国流放者 1938 年报告的详情。关于希特勒 1938 年 12 月针对德国青年作的一生策略,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九章“精英”,这一章同样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防御准备和能力训练以及 1938 年成员总数的出处。

关于 1939 年希特勒青年团强制青年服役法令,见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五章“统治”,以及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三章“统一者、犯罪者和执行者”。关于纳粹牺牲和军国主义的理想,见珍妮弗·基莉《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三章“行动的意识形态”,以及 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六章“意识形态”和第八章“教育”。

## 第十九章 儿童军团和新政

关于克林奇·卡尔金斯(Clinch Calkins)的章前引文出自埃尔罗·林肯·尤伊斯(Errol Lincoln Uys)的《骑着铁轨:经济大萧条时期的青少年》(*Riding The Rails: Teenagers on the Move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纽约:电视图书出版社,1999)第一部分绪论,“不再上学时”。年轻的流浪汉布林克(Blink)的日记内容出自托马斯·迈汉(Thomas Minehan)的《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Boy and Girl Tramps of America*)(纽约:格罗斯顿与顿拿普出版公司,1934)第十四章“两篇日记”。全美 25 万流浪的“货车车厢男孩女孩”这个数据出自埃尔罗·林肯·尤伊斯《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

迈汉加入年轻流浪者的决定出自《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绪论。关于他对流浪者日记的评价,见《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十四章“两篇日记”。关于青年人问题和儿童军团,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绪论,马克森·安德森(Maxine Anderson)1932 年 9 月发表在《妇女家庭杂志》上的文章《20 万流浪儿童》(“200000 Vagabond Children”)的引用同样也出自这里。戴维斯(Davis)后来又发表了一篇讨伐性文章,名为《迷惘的一代:今日美国青年画像》(*The Lost Generation: A Portrait of American Youth Today*)(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6)。

关于迈汉对流浪男孩德克萨斯(Texas)的描述,见《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十五章“他们的部落生活”。芭芭拉·斯达克(Barbara Starke)漫游全美的记录分别在美国出版:在美国名为《生于圈养》(*Born in Captivity*),在英国则叫《触摸和行走:一个女孩逃跑的故事》(*Touch and Go: The Story of a Girl's Escape*)(伦敦:乔纳森·凯波出版社,1931)。关于迈汉对革命俄国的野孩子和德国流浪年轻人的评价,见《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绪论。

关于大萧条对美国总体上影响的细节和数据,见大卫·A. 仙农(David A. Shannon)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新泽西:普伦蒂斯·霍尔出版公司,1960)第五章“中产阶级、银行破产和失业”。

关于大萧条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对黑人和女性的影响,见罗伯特·S. 林德和海伦·莫瑞

尔·林德的《转变中的米德尔镇》(*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纽约:哈考特布莱斯出版公司, 1937)第二章“谋生”、玛乔里·罗森(Marjorie Rosen)的《爆米花美人:女性、电影和美国梦》(*Marjorie Rosen, Popcorn Venus: Women, Movies and the American Dream*) (纽约:雅芳出版社, 1973)第三部分第八章“整个城镇在谈论”、路易斯·A.埃伦伯格(Louis A. Erenberg)的《摇摆梦想:大型乐队爵士和美国文化的重生》(*Swingin' the Dream: Big Band Jazz and the Rebirth of American Culture*)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98)第一部分第一章“只要再一次机会:爵士时代的衰落和摇摆乐的兴起 1929—1935”。

关于工资收入下降了40%,参见格雷斯·帕拉迪诺(Grace Palladino)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Teenagers: An American History*) (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 1996)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三章“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进步’教育和全国青年总署”。关于美国国内对革命的讨论,见大卫·A.仙农《大萧条》第七部分“会爆发革命吗?”,以及第四十三到五十章。关于10个高中适龄青年中有4个上不了学的描述,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骑着铁轨》绪论以及格雷斯·帕拉迪诺《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三章“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

美国的人口数据见《总统调查委员会社会趋势报告:美国近期的社会趋势》(*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 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纽约:麦克格劳-希尔出版公司, 1933,第一章中渥伦·S.汤姆森(Warren S. Thompson)和P. K.惠尔普顿(P. K. Whelpton)写的《国家人口》(“The Population of the Nation”)。关于大萧条对家庭的影响,见鲁斯·享诺·凯文(Ruth Shonle Cavan)和凯萨琳·赫兰德·兰克(Kathleen Howland Ranck)合作的《家庭和经济萧条:对100个芝加哥家庭的调查》(*The Family and the Depression: A Study of One Hundred Chicago Families*) (纽约:Books for Libraries Press, 1969)第六章“经济萧条中的调适”。

迈汉对流浪者为什么离开家的看法见《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附录,表12,“流浪男孩女孩给出的离家原因”。德萨斯说的话出自迈汉同一本书第二章“大萧条之前”。关于年轻流浪者的家庭地位问题,见《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附录,表15,“流浪男孩女孩家里的经济情况”,以及表16,“一部分流浪男孩女孩家里的情绪状况”。牛顿·D.贝克(Newton D. Baker)的话出自大卫·A.仙农在《大萧条》第四部分“经济萧条中的流浪者”第二十七章“心忧流浪者”。

莉莉安·塞姆斯(Lillian Symes)说的话可见大卫·A.仙农在《大萧条》第七部分“会爆发革命吗?”第四十九章“革命性验尸”。关于吉姆·米歇尔(Jim Mitchell)的故事,详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五部分“出路”中的采访。关于移居加利福尼亚和封闭边界,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中“危险的地方”;还可见格雷斯·帕拉迪诺《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三章“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

关于流浪男孩女孩中的等级制度,见托马斯·迈汉《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十二章“威望标准”。关于旅行的危险性,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中“危险的地

方”；关于残暴的铁路警察，见尤伊斯同一书中第三部分“旅行：欺凌者”。关于到达一个城市的情况，见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中“危险的地方”以及迈汉的《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五章“他们怎么得到吃的”。关于吉姆·米歇尔的引语和前一段故事出处一样。

关于年轻流浪者们提前衰老，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四部分“撞线”。“我们从儿童直接变成成年人。我们从没想过青少年状态。我们只想着生存。”这段引语也出自同一部分。还可参见托马斯·迈汉的《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十五章“他们的部落生活”。

下一段俄亥俄州社会工作者的话可参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二部分“发现，自己去谋生”。关于流浪者聚集地和这些孩子中的规定，详见迈汉的《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一部分“一个流浪男孩生活中的四季”第七章“他们睡的地方”和第十七章“结论”。

关于流浪者的种族成分，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绪论“铁轨上错误的一边”以及第三部分里的个人陈述“艰难的旅行”，对“克拉伦斯·李 1929—1931”的采访，和第四部分“撞线”里对“克里蒂亚·威廉姆斯 1932—1935”的采访。关于年轻流浪者世界中的矛盾，见迈汉的《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十二章“威望标准”和第九章“性生活”。

关于斯科茨伯勒男孩一案，可参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绪论“铁轨上错误的一边”，以及海伍德·帕特森(Haywood Patterson)和厄尔·康拉德(Earl Conrad)合著的《斯科茨伯勒男孩》(伦敦：维克多·戈伦茨出版社，1950)第一部分“大框架”第一二两章，这本书里还包含了斯科茨伯勒一案的时刻表。关于南茜·库纳德的卷入，见《斯科茨伯勒男孩》第六章和安·启思蒙的《南茜·库纳德》第十八章“黑色缘由”，以及第二十一章“黑人的出版物”。

关于年轻流浪者和枪支的关系，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痛苦的丰收”；“美国将会发生一场革命”这段引文出自托马斯·迈汉的《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十一章“政治社会哲学”。关于年轻人感觉被“剥夺了王储身份”，参见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二部分“发现”中詹姆斯·萨·焦尔(James San Joule)的话。关于青少年是“萌芽期的头主”和“明天的顾客”的这部分引语，见斯坦利·C.霍兰德和理查德·杰梅恩合作的《在百事可乐出现之前有没有百事这一代？》第二章“针对青年人的销售史”。

迈汉关于美国城市里流氓团伙猖獗的看法出自《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十七章“结论”。关于反福特汽车装配厂的暴动，见罗伯特·莱希(Robert Lacey)的《福特：人和机器》(*Ford: The Men and the Machine*)第二十一章“侵犯”。关于美国青少年仍然用工作和婚姻来自我定位的问题，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二章“建议和应允：塑造青少年性格”。关于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所说的“年轻人中一种更自觉的亚文化”，见《转变中的米德尔镇》第五章“建立一个家：个人调整的舞台”。

关于引用的1932年《父母》(*Parents*)杂志上的一段话，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一章“高中年纪”。关于引文“你抓住一个17岁的少年”，参见W.赖兰·布尔曼(W. Ryland Boorman)的《少年的个性》(*Personality in its Teens*) (纽约：麦克米

伦出版社,1931)第四部分“他的生活原则”第七章“道德和理想”。关于代沟问题的引文,见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转变中的米德尔镇》第五章“建立一个家:个人调整的舞台”。关于迈汉对国家介入的呼吁,见《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第十七章“结论”。

关于同龄人压力和新的青少年杂志,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二章“建议和应允:塑造青少年性格”。关于学校中性教育的缺乏,见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转变中的米德尔镇》第五章“建立一个家:个人调整的舞台”。关于电影的威力,见《总统调查委员会社会趋势报告:美国近期的社会趋势》第四章中马尔科姆·威利(Malcolm L. Willey)和斯图尔特·A.赖斯(Stewart A. Rice)所写的《传播机构》。

电影《国民公敌》(*The Public Enemy*)最近发行了DVD,收录在《詹姆斯·贾克奈:签名合集》(*James Cagney: The Signature Collection*)里(英国华纳影业家庭娱乐公司,2005)。(合集里收录的还有《脏面孔的天使》(*Angels with Dirty Faces*)、《怒吼的20年代》(*The Roaring Twenties*)以及启示录型的《歼匪喋血战》(*White Heat*)。关于模仿詹姆斯·贾克奈的年轻匪徒,见亨利·詹姆斯·福尔曼(Henry James Forman)的《电影制造的孩子》(*Our Movie-Made Children*)(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4)第十五章“拥挤专栏里的电影”,关于爱德华·G.罗宾逊(Edward G. Robinson)和对詹姆斯·贾克奈模仿的引语也出自这一章节。

短语“创造的大量激情青年”出自福尔曼《电影制造的孩子》第十三章“性——违法和犯罪”;引语“奢侈品和轻松获取金钱”出自第十一章“通往违法之路”。关于这一话题的其他观点还可参见赫伯特·布鲁默(Herbert Bloomer)的《电影、违法和犯罪》(*Movies, Delinquency and Crime*)(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34),大卫·M.康斯戴恩(David M. Cosidine)的《青少年的电影院》(*The Cinema of Adolescence*)(杰斐逊,北卡罗莱纳:迈克法兰出版社,1985)第四部分“青少年犯罪”第八章“死角和死囚区 1931—1949”。

关于电影中表现的主题,见福尔曼的《电影制造的孩子》第三章“他们看见了什么?”,关于“不良民族意识”和“明显模仿电影中做爱的方式”,见第九章“电影和行为”。大学女生之间的对话见福尔曼的《电影制造的孩子》第十章“由电影塑造”。关于新的制造规则,见大卫·M.康斯戴恩的《青少年的电影院》第一部分第一章;还可参见玛乔里·罗森的《爆米花美人》第三部分“30年代”第九章“绅士们偏爱白肤金发女子”。《吉姆贾姆杰姆斯》(*Jim Jam Jems*)和《曝光》(*Exposed*)杂志中的引语出自阿兰·贝特洛克(Alan Betrock)的档案。

关于禁酒法案以后组织犯罪的多样化,见爱德华·波尔的《禁酒》第十七章“后果”。关于新型的谋杀团伙,见安东尼·萨默斯(Anthony Summers)的《公务和绝密:J.埃德加·胡佛的秘密生活》(*Official and Confidential: The Secret Life of J. Edgar Hoover*)(纽约:G. P. Putnam and Sons,1933)第五章;还可参见考特纳·莱利·库珀(Courtney Ryley Cooper)的《万人公敌》(*Ten Thousand Public Enemies*)(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35)。关于1933年犯罪率的上升,见约翰·特里赫恩(John Treherne)的《邦尼和克莱德的奇怪历史》(*The Strange History of Bonnie*

and Clyde) (伦敦:格雷夫斯顿出版社,1985)第十五章“猎手在准备”。

关于克莱德·巴洛(Clyde Barrow)和邦尼·帕克(Bonnie Parker)的故事,见特里赫恩所写书的各处,邦尼·帕克的打油诗《自杀的萨尔》(“Suicide Sal”)出自该书第十二章“蛇眼杀手,抽烟情妇”。克莱德·巴洛对于V-8汽车的评价可见罗伯特·莱希的《福特:人和机器》第十八章“萧条”。邦尼自我神化的诗则见特里赫恩《邦尼和克莱德的奇怪历史》第二十章“猜疑和异议”;葬礼时的围聚场面也出自该书第二十二章“眼泪和葬礼”;J·埃德加·胡佛对此做出的反应则见第二十四章“从胡佛到黑色电影”。

关于G刑警的组建,见安东尼·萨默斯的《公务和绝密:J·埃德加·胡佛的秘密生活》第六章;而关于G刑警的设备,则见同本书第九章。关于美国年轻人是“精神病态时期的产物”的说法,见马克森·戴维斯的《迷惘的一代:今日美国青年画像》第一部分“后代的托管人”第一章“关注青年”。乔治·索尔(George Soule)的美国人正处于“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之中”的说法,见大卫·A·仙农的《大萧条》第七部分“会爆发革命吗?”第五十章“革命:一个成熟的异议”。

关于新政的影响,见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转变中的米德尔镇》第二章“谋生”。关于新政对青少年的影响,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三章“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进步’教育和全国青年总署”;还可参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一部分“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对吉姆·米歇尔的引用则出自第五部分“出路”。

关于鼓励美国青少年待在学校里的政府政策,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一章“高中年纪”,以及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转变中的米德尔镇》第二章“谋生”。关于两代人之间改变了的关系,见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慷慨的父母》(*The Prodigal Parents*) (加拿大:双日出版社,1938),这本书的副标题为《父母对抗反叛的青年》(*The Revolt of the Parents Against the Revolt of Youth*)。

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以及新政的渊源,以及“感到真正的恐惧”这段引语可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中的“不再上学时”;还可参见贝蒂(Betty)与欧内斯特·K·林德利(Ernest K. Lindley)合写的《对青少年实行的新政:全国青年总署的故事》(*A New Deal for Youth: The Story of the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纽约:威金出版社,1938)。关于马克森·戴维斯对德国状况的担忧,见《迷惘的一代》第二部分“忧郁——希望——探索”第二章“为什么变恼火?”以及第一部分“后代的托管人”第一章“关注青年”。

关于“愤恨反叛”,见罗伯特·S·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的《转变中的米德尔镇》第二章“谋生”;关于本地毕业生平静的痛苦,见同一本书第十二章“米德尔镇精神”。关于对德国的担忧,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痛苦的丰收”,以及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三章“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287.7万名16

到 24 岁之间需要救济的青少年这一数据出自贝蒂与欧内斯特·K. 林德利合写的《对青少年实行的新政》第二章“青少年继承了萧条”。关于约瑟夫·拉什(Joseph Lash)对美国学生联合会的看法,见 <http://newdeal.feri.org/students/lash.htm>。

关于天主教牧师查尔斯·E. 库格林(Charles E. Coughlin),见伊莎贝尔·莉顿(Isabel Leighton)编的《阿司匹林时代》(*The Aspirin Age*) (伦敦:企鹅出版社,1964)中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写的《1934:广播牧师和他的教徒》(“1934: The Radio Priest and His Flock”);克雷德·维德(Craig Wade)的《血十字:美国的三 K 党》(*The Fiery Cross: The Ku Klux Klan in America*) (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集团,1987)第三册:1930—1937,第九章“3K 是一个美国组织”;约翰·罗伊·卡尔森(John Roy Carlson)的《揭密:我在美国纳粹地下组织的四年生活》(*Under Cover: My Four Years in The Nazis Underworld of America*) (纽约:杜冬出版公司,1943)第一册“珍珠港事件之前”第四章“库格林的‘基督圣战’”。

查尔斯·W. 陶西格(Charles W. Taussig)的引语出自贝蒂与欧内斯特·K. 林德利合写的《对青少年实行的新政》前言。关于美国青年总署的运作详情,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经济大萧条时期活动中的青少年》第一部分绪论“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还可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三章“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

## 第二十章 “少年英雄”和红色威胁

章前引言出自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的《爱在失业》(*Love on the Dole*) (伦敦:乔纳森·坎普出版社,1933)第四章“情绪高昂”。关于“失业帮”,见 W. F. 莱斯特兰奇(W. F. Lestrangle)的《废弃的生灵》(*Wasted Lives*) (伦敦:乔治·劳特利奇父子公司,1936)71 页(注意:这本书不是按章节后者部分来分的,因此会用页数来代替);关于莱斯特兰奇的动机,见“简要前言和解释”,5—7 页;关于特雷沃(Trevor)的故事,见 120 页。这本书的前言还引用了调查时接触到的政府、个人、以及各种联盟或者组织的话。关于“特别地区”,见 108—112 页;关于年轻人的照片,见 83、109 以及 117 页。

关于经济危机对大不列颠的影响以及最高的失业数据,见克劳德·科克本(Claud Cockburn)的《魔鬼的年代》(*The Devil's Decade*) (伦敦:西季威克和杰克逊出版社,1973),第一章“经济危机过后(1929—1931)”和第二章“英国 1931”;还可参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兰·霍吉的《悠长周末》第十五章“经济危机,1930”。关于经济危机带来的后果,见莱斯特兰奇那本书的各处,以及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通往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 (伦敦:企鹅出版社,1962),第一到六章的各处。

《时代》(*Times*)杂志上 1930 年 1 月的文章被克劳德·科克本在《魔鬼的年代》第二章中所引。关于“社会学小说”的泛滥,见伊瑟尔罗·曼宁的《20 年代的年轻人》第十五章“清醒起来”。《爱在失业》一书中的引语“和在血腥的监狱里也差不多”出自第三部分第六章“一个悠闲

的人”。关于哈里·哈卡素(Harry Hardcastle)认识到自己不过是在废物堆里,见《爱在失业》第二部分第一章“揭露”。

关于学徒制的问题,见W. F. 莱斯特兰奇的《废弃的生灵》第74页,以及墨西塞德社会研究组的成员所作的《真诚地找工作:20世纪30年代墨西塞德的大规模失业》(*Genuinely Seeking Work: Mass Unemployment on Merseyside in the 1930s*) (利物浦:利物出版社,1992),第一部分“失业生活”第二章“谁在20世纪30年代失业?”;关于工业的合理化,见同一出处;引用的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对现代进步的观点,见《爱在失业》第三部分第六章“一个悠闲的人”。

关于工业越来越依赖工时和动作系统以及柏道格斯系统的详情,参见墨西塞德社会研究组的成员所作的《真诚地找工作》第二部分“阶级统治和国家”第八章“你在工作吗?训练然后加速”。(由于一份奇怪的附言,查尔斯·柏道格斯(Charles Bedaux)和英国皇室扯上了关系,并且试图用这种关系来和纳粹党做生意。当美国最终参战以后——他是一名美国人——他在北非被捕。1943年12月他被押解到迈阿密以待审判,但在审判之前就因为毒品吸食过量死在监狱里。)

关于经济情况调查,见墨西塞德社会研究组的成员所作的《真诚地找工作》第二部分“阶级统治和国家”第五章“‘自助者天助之’:法律、国家和失业者”;克劳德·科克本的《魔鬼的年代》第四章“反攻势(1932—1935)”;W. F. 莱斯特兰奇的《废弃的生灵》第123页;以及罗纳德·布莱丝的《幻想的时代:二三十年代的英国》第九章“加洛”。

关于迁移和劳工营成为失业者可能的出路,参见史蒂夫·哈姆弗斯(Steve Humphries)和帕梅拉·戈登(Pamela Gordon)合作的《被禁的英国》(*Forbidden Britain*) (伦敦:英国广播图书公司,1994)第四章“奴隶营和女佣学校”。关于流浪和偷捕鱼船的盛行,见布莱丝的《幻想的时代:二三十年代的英国》第九章“加洛”。关于奥威尔对便宜衣服以及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和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梦想的看法,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第五章。莱斯特兰奇的年轻失业者的照片见《废弃的生灵》第126页。

关于当时的暴力新闻,见亚历山大·麦克阿瑟(Alexander McArthur)和H. 金斯利·朗(H. Kingsley Long)的《重要的城市:格拉斯哥贫民窟的故事》(*No Mean City: A Story of the Glasgow Slums*) (伦敦:朗曼,格林公司,1935)附录。关于年轻失业者穿奢侈的服饰,见哈里·达利(Harry Daley)的《这一小块云:个人回忆录》(*This Small Cloud: A Personal Memoir*) (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86)第三部分“都市警察 1925—1950”第十八章,“哈姆斯密这些地区的年轻人省吃俭用去买华美的衣服,然后像孔雀一样站着,尽管他们的口袋里没有钱,除了身下站着的一小块地以外一无所有,他们却一点也不沮丧。”

关于牛津口袋裤的引语出自史蒂夫·哈姆弗斯(Steve Humphries)的《秘密的性世界》(*A Secret World of Sex*) (伦敦:西季威克和杰克逊出版社,1991)第六章“街头团伙的性行为”。引语

“帮派的蔓延”出自墨西哥社会研究组的成员所作的《真诚地找工作》第二部分“阶级统治和国家”第六章“制服萧条”。关于好莱坞电影的影响、耸人听闻的犯罪新闻、1933年《儿童及青少年法》(*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以及S. F.哈顿(S. F. Hatton)所写的《伦敦坏男孩》(*London's Bad Boys*)详情,见杰弗里·皮尔森《流氓》第一部分“英国生活方式的衰落和坍塌”第三章“战争以来——过去的完美”;还可参见S. F.哈顿的《伦敦坏男孩》(伦敦: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1931)第一章“流氓犯罪”和第二章“青少年”。

关于警察和犯罪者之间达成共识的游戏规则,见哈里·达利《这一小块云:个人回忆录》第三部分“都市警察1925—1950”第十五章。关于抗议经济情况调查,见克劳德·科克本《魔鬼的年代》第四章“反攻势(1932—1935)”,墨西哥社会研究组的成员所作的《真诚地找工作》第二部分“阶级统治和国家”第六章“制服萧条”,以及杰弗里·皮尔森《流氓》第三章“战争以来——过去的完美”。关于海德公园示威,参见以上几本书以及格雷夫斯和霍吉的《悠长周末》第十章“经济危机,1930”。

关于摩兹利(Oswald Mosley)和英国法西斯联盟,见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著的《奥斯瓦德·摩兹利》(*Oswald Mosley*) (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81)第十四章“兼职救世主”;还可参见托马斯·莱恩汉(Thomas Linehan)的《英国法西斯,1918—1939:政党、意识形态和文化》(*British Fascism, 1918—1939: Parties, Ideology and Culture*) (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0)第四章“英国法西斯联盟”;以及安·德库西(Ann De Courcy)的《总督的女儿:柯曾姐妹的生活》(*The Viceroy's Daughters: The Lives of the Curzon Sisters*) (伦敦:菲尼克斯出版社,2002)第十八章“戴安娜·吉尼斯,战利品情妇”。关于经济萧条影响中产阶级,见格雷夫斯和霍吉的《悠长周末》第十章,以及大卫·普赖斯-琼斯的《尤内蒂·米特福德:追求》(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76)第五章“大推动”。

引语“满腔怒火”出自米兰达·卡特的《安东尼·布朗特:他的人生》(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2001)第四章“愤怒的年轻人”。关于英国知识分子的左倾倾向,见罗纳德·布莱兹的《幻想的时代:二三十年代的英国》第十二章“悲伤的熔炉”,以及朱利安·塞蒙兹的《30年代:萦绕的梦想》第三章“旧学校和新自由”。

有名的牛津联盟辩论在凯文·英格瑞姆的《反叛:埃斯蒙德·罗米利的短暂生命》(伦敦:威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1985)第五章“另一个世界”中有所提及。关于剑桥爆发的休战纪念日暴力事件,见米兰达·卡特的《安东尼·布朗特:他的人生》第五章。关于引语“世界在暴力中的动荡”,见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和威廉·亚伯拉罕姆斯(William Abrahams)合作的《通往边疆之旅:加入西班牙内战的两条路》(*Journey to the Frontier: Two Roads to the Spanish Civil War*) (纽约: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66)第二部分“约翰·康福德”第三章“伦敦”。

关于埃斯蒙德·罗米利(Esmond Romilly)的《越轨》(*Out of Bounds*)宣言,见凯文·英格瑞姆的《反叛》第七章“重击——不是哀诉”,以及杰西卡·米特福德的《荣誉和叛军》(伦敦:维克

多·戈伦茨出版社,1960)第十章。1934年6月奥林匹亚集会详见罗纳德·布莱丝《幻想的时代》第十章“恶棍、干线和事件”;凯文·英格瑞姆的《反叛》第九章“越轨”;以及托马斯·莱恩汉的《英国法西斯》第四章“英国法西斯联盟”。哈里·达利的详细论述出自《这一小块云》第三部分“都市警察 1925—1950”第二十一章。

利物浦反法西斯运动的详情可见墨西哥塞德社会研究组的成员所作的《真诚地找工作: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塞德的大规模失业》第三部分“回击?”第十一章“反应方式;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塞德的奥兰治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关于共产国际的人民阵线政策,见安东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西班牙内战》(*The Spanish Civil War*)(伦敦:卡斯特尔出版社,1982)第三章“第二共和国”。关于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低迷状态,见莱恩汉的《英国法西斯》第四章。

关于米特福德姐妹间的政治斗争,见杰西卡·米特福德的《荣誉和叛军》第八章。关于尤内蒂和英国法西斯联盟,见大卫·普赖斯-琼斯的《尤内蒂·米特福德:追求》第五章“大推动”。正如普赖斯-琼斯所写,法西斯主义对于尤内蒂来说是“完全不同的社交生活,黑色代替了白色”。引语“我要去德国看希特勒”出自《荣誉和叛军》第八章,杰西卡·米特福德说的关于家庭生活如堡垒的话出自同一本书第九章,对埃斯蒙德·罗米利的反应出处同上。

尤内蒂·米特福德和希特勒的友情见大卫·普赖斯-琼斯的《尤内蒂·米特福德:追求》第六章“巴伐利亚餐馆中的结识”;关于她写的《一个英国法西斯女孩的忏悔》(“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Fascist Girl”)详情,见同一本书第七章“冲锋队少女”。杰西卡对两姐妹间激烈争吵和拳打脚踢的描述见《荣誉和叛军》第十三章。关于电缆街游行详情,见托马斯·莱恩汉的《英国法西斯》第四章,查理·古德曼(Charlie Goodman)的话则出自史蒂夫·哈姆弗斯和帕梅拉·艾登合作的《被禁的英国》第三章“流血和燃烧”。

关于西班牙内战,见罗纳德·布莱丝的《幻想的时代》第十二章“悲伤的熔炉”及朱利安·塞蒙兹的《30年代:萦绕的梦想》第十二章“西班牙”;关于英国政府的不干预政策,见安东尼·比弗的《西班牙内战》(伦敦:卡斯特尔出版社,1982)第十一章“军事和外交”。约翰·康福德的文章《老人的年轻思想》(“Young Minds for Old”)在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姆·亚伯拉罕姆斯合作的《通往边疆之旅:加入西班牙内战的两条路》第二部分“约翰·康福德”第四章“剑桥”中被引用。

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很多口头流传的故事可参见以下网址:<http://www.geocities.com/HCHill-9820/spain/5.html>。约翰·康福德对革命性巴塞罗那的看法可见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姆·亚伯拉罕姆斯合作的《通往边疆之旅:加入西班牙内战的两条路》第四部分“西班牙”第一章“约翰·康福德”。关于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见安东尼·比弗的《西班牙内战》第十四章“马德里之战”。

关于弗里西亚·布朗(Felicia Brown),见 [spartacus@pavilion.co.uk](mailto:spartacus@pavilion.co.uk)。关于约翰·康福德成为“一个严肃的人”,见凯文·英格瑞姆的《反叛:埃斯蒙德·罗米利的短暂生命》第十四章“马

德里!”。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姆·亚伯拉罕姆斯合作的《通往边疆之旅:加入西班牙内战的两条路》第二部分“约翰·康福德”第一章“鲁珀特·约翰·康福德”中提及了康福德被比作鲁珀特·布鲁克的事实。对这位神化人物的评价,具体可见其同一时代的史蒂芬·朗斯曼(Stephen Runciman)的话:“他是一个极端聪明、有说服力、无情,几乎是非人的人。”——引自米兰达·卡特的《安东尼·布朗特:他的人生》第五章。

关于英国知识分子和“国际纵队”理想的幻灭,见安东尼·比弗的《西班牙内战》第二十章“布鲁内特进攻和地中海”、朱利安·塞蒙兹的《30年代:萦绕的梦想》第十二章“西班牙”;以及罗纳德·布莱丝《幻想的时代》第六章“同志啊同志!”关于坎特的话,见汤姆·杰弗里(Tom Jeffery)的《大众观察:一小段历史》(*Mass-Observation: A Short History*) (苏塞克斯:苏塞克斯大学图书馆,1999)和民意测验档案中第十卷第一部分“需要知道的”第三章“左派读书俱乐部和政治教育”。

1936年9月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之间的混战见《大众观察:英国》(*Mass-Observation: Britain*) (伦敦:企鹅出版社,1939)第二章“危机”中的“宇宙的中心”。关于1937年失业率的上升,见克劳德·科克本的《魔鬼的年代》第十一章“军备重整(1937—1938)”。关于全国失业劳工运动,见格雷夫斯和霍吉的《悠长周末》第二十三章“社会良知”。关于战争无可避免的感觉,见克劳德·科克本的《魔鬼的年代》第七、八、十一、十二章。

关于英国军队改良成“现代军队”,见汤姆·杰弗里《大众观察:一小段历史》第一部分“需要知道的”第二章“30年代晚期的危机”。关于工人带薪休假的权利,见克劳德·科克本《魔鬼的年代》第九章“英国1936”。关于消费主义的抬头,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和阿兰·霍吉的《悠长周末》第二十二章“保持健康,按朗伯斯方式行走”。关于庸俗杂志,参见乔治·奥威尔1940年3月发表在《地平线》(*Horizon*)杂志上的关于“男孩周刊”的著名文章,收录在《乔治·奥威尔的评论、报章杂志以及信件集卷一》(*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 I*)里(伦敦:企鹅出版社,1971),第163篇。

关于“所有这些理论都是胡说”,见詹姆斯·柯提斯(James Curtis)《镀金孩子》(*The Gilt Kid*) (伦敦:企鹅出版社,1947)第三章“朦胧”。关于越来越美国化以及对此的反应,见杰弗里·皮尔森《流氓》第三章“战争以来——过去的完美”。关于“野孩子”的由来,见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的《打砸抢劫:伦敦黑社会里的匪徒》(*Smash and Grab: Gangsters in the London Underworld*) (伦敦:费伯出版社,1993)第三章。关于盖洛普(Gallup)博士建立的英国民意研究所,详情见格雷夫斯和霍吉的《悠长周末》第二十三章“社会良知”,以及汤姆·杰弗里的《大众观察:一小段历史》第一部分“需要知道的”第一章“战争之间的社会调查”。

关于大众观察组织的起源和背景,见罗纳德·布莱丝的《幻想的时代》第六章“同志啊同志!”、朱利安·塞蒙兹的《30年代:萦绕的梦想》第十一章“大众观察”;以及汤姆·杰弗里的《大众观察:一小段历史》第二部分“大众观察:历史和发展”第一章“对象”。关于“工作镇”的详情,

见同一本书第二部分第三章“工作镇和假日镇”。关于杰西卡·罗米利和英国民意研究所,见杰西卡·米特福德的《荣誉和叛军》第二十章。

大众观察组织对广告和大众媒体的批判态度可以参见汤姆·杰弗里《大众观察:一小段历史》第二部分“大众观察:历史和发展”第二章“第一年的工作”。关于广告的调查收录在苏塞克斯大学大众观察档案里:文件报告 A10,1938年11月的“对广告的反应”。关于《画报》(*Picture Post*),见汤姆·杰弗里的《大众观察:一小段历史》第一部分“需要知道的”第四章“纪录片”、罗伯特·基(Robert Kee)的《画报图片选》(*The Picture Post Album*)(伦敦:巴利与詹金斯出版社,1989)、以及琼·萨瓦吉(Jon Savage)的《画报偶像》(*Picture Post Idols*)(伦敦:科林斯与布朗出版社,1992)。

完整的《画报》存档保存在伦敦西区的哈尔顿盖蒂图片社里;关于居家的格蕾西·菲尔兹(Gracie Fields),见第一卷第五张;关于费雷迪·巴塞洛缪(Freddie Bartholemew),见第一卷第十张。关于美国消费主义成为一种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见克劳德·科克本的《魔鬼的年代》第五章“新型消费者”。

大众观察报告“富勒姆的青年组织”保存在大众观察档案馆的青年话题集里。关于《画报》上的《魅力少女的一天》(“Glamour Girl's Day”),见第一卷第十四期;《新舞时尚的诞生》(“Birth of a New Dance Craze”),见第二卷第一期;爱德华·哈尔顿(Edward Hulton)的社论《掌舵的青年》(“Youth at the Helm”),同样在第二卷第一期。关于斯特雷特姆洛迦诺舞厅和伦敦公园里大型的露天舞会,见《大众观察:英国》第五章“按朗伯斯方式行走”。关于引用的乔治·奥威尔关于消费主义革命的引文,见《通往威根码头之路》第五章。

## 第二十一章 吉特巴舞及其舞迷

章前引言出自一篇题为《杰出舞迷》(“Outstanding Ickies”)的发表在《吉特巴舞》(*The Jitterbug*)第一册(纽约,1938)上的文章。关于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乐队派拉蒙剧院之行的详细描述,见詹姆斯·林肯·科利尔(James Lincoln Collier)的《本尼·古德曼和摇摆时代》(*Benny Goodman and the Swing Era*)(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第十三章“终于成功了”;以及路易斯·A.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大型乐队爵士和美国文化的重生》(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第二部分“现在他们叫它摇摆,1935—1942”中的第二章“群众疯狂了:青年文化之摇摆”。

关于观众就是演出的引语出自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二章;关于《唱、唱、唱》的影响,见同一章节。关于广播中的摇摆乐和“想象中的舞厅”,见詹姆斯·林肯·科利尔的《本尼·古德曼和摇摆时代》第十三章“终于成功了”、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二章以及阿贝尔·格林(Abel Green)和小乔·劳里(Joe Laurie Jr)的《从杂耍到广播的演艺事业》(*Show Biz from Vaude to Video*)(纽约:亨利贺尔特出版公司,1951)第五十六章,还可参见拉塞尔·桑耶克和大卫·桑耶

克写的《美国 20 世纪的流行音乐产业》第四章“唱片业的低迷和复兴”。

关于摇摆乐的发展和古德曼乐队,见科利尔的《本尼·古德曼和摇摆时代》第十章“第一张维克多唱片”和第十二章“在帕洛马”。罗德·诺瓦(Red Norvo)的话出自阿贝尔·格林和小乔·劳里的《从杂耍到广播的演艺事业》第七章“了解摇摆乐”。关于低音歌手,见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一部分“从爵士到摇摆,1929—1935”第一章“只要再一次机会:爵士时代的衰落和摇摆乐的兴起”;还可参见查尔斯·汤姆逊(Charles Thompson)的《宾:授权传记》(*Bing: The Authorised Biography*) (伦敦:W. H. 艾伦出版公司,1979)以及鲁迪·瓦利(Rudy Vallee)的《流浪者梦想成真》(*Vagabond Dreams Come True*) (纽约:多顿出版社,1930)。

关于摇摆影响整个青少年世界的详情,参见科利尔的《本尼·古德曼和摇摆时代》第十四章“摇摆乐队现象”,以及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二章“群众疯狂了:青年文化之摇摆”;这一章同样也是“音乐希特勒主义”的出处。

关于美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宣言,见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这一章同样也是 1937 年 2 月华盛顿“要求工作和教育的青年朝圣者”游行的出处;还可参见格雷斯·帕拉迪诺《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一部分“青少年”第三章“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进步’教育和全国青年总署”。

更多关于全国青年总署的详情,见贝蒂与欧内斯特·K. 林德利合写的《对青少年实行的新政:全国青年总署的故事》第一章“对青少年实行的新政”、第二章“青少年继承了萧条”、第三章“失学和失业”以及第四章“利用业余时间”。引语“一部分处于极端抑郁境地的青年人”出自贝蒂与欧内斯特·K. 林德利合写的《对青少年实行的新政》第十章“全国青年总署的资产负债表”。威廉·W. 海克里(William W. Hinckley)的话出自埃尔罗·林肯·尤伊斯的《骑着铁轨》第一部分绪论“对青年人实行的新政”。

关于 50 万青少年通过全国青年总署解决了问题这一数据,见贝蒂与欧内斯特·K. 林德利合写的《对青少年实行的新政》第九章“教育面临的挑战”。关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生育高峰,见《总统调查委员会社会趋势报告:美国近期的社会趋势》卷一第一章中渥伦·S. 汤姆森和 P. K. 惠尔普顿写的《国家人口》。作为和大学市场相对的高中市场的重要性,见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二部分“现在他们叫它摇摆,1935—1942”中的第二章“群众疯狂了:青年文化之摇摆”。

罗伯特·S. 林德和海伦·莫瑞尔·林德关于“商业阶层女孩”引领潮流的观察,见《转变中的米德尔镇》第五章“建立一个家:个人调整的舞台”,还可见林德夫妇在第七章“悠闲度日”中的评论:“商业阶层人物的妻子们现在相对来说摆脱了家庭主妇的身份,她们开始悠闲地享受生活,成为新文化中悠闲的创造者。”关于“社交界新人”这个词,可以参见格雷斯·帕拉迪诺《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四章“摇摆潮:时髦女郎们登上舞台”。

文章《15 岁是多大?》出自 1936 年 5 月 1 日的《时尚》杂志(纽约:康德纳斯出版集团),51—53 页。关于《妇女家庭杂志》和《学生》(*Scholastic*)杂志上最先设的问答专栏,见格雷斯·帕拉

迪诺的《青少年：一段美国史》第二章“建议和应允：塑造青少年性格”；这一章同样也是引语“高级商品”和“男孩子喜欢处于操控地位”的出处。由伊丽莎白·埃尔德里奇(Elizabeth Eldridge)编写的手册《少年礼仪》(*Etiquette for the Teens*)在1937年由《匹兹堡太阳电讯报》(*Pittsburg Sun-Telegraph*)和家庭协会联合发行。

关于本尼·古德曼乐队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著名演出，见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三章“摇摆来了：本尼·古德曼和美国音乐的胜利”；以及科利尔的《本尼·古德曼和摇摆时代》第十七章“卡内基音乐厅的著名演奏会”。关于海伦·华德(Helen Ward)注意到女孩们穿平底鞋，见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二章“群众疯狂了：青年文化之摇摆”。阿瑟·罗利尼(Art Rollini)关于乐迷来信的说法，见科利尔的《本尼·古德曼和摇摆时代》第十四章“摇摆乐队现象”。

关于摇摆时尚，见《吉特巴舞》杂志(纽约：1938和1939)以及科利尔的《本尼·古德曼和摇摆时代》第十四章“摇摆乐队现象”。本尼·古德曼的“跳旋转舞的苦行僧”这段话出自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二章；这一章同样也是引语“先锋派”和对黑人跳摇摆舞的那段描述的出处。关于摇摆舞的起源，见卡尔·范·维克腾(Carl Van Vechten)的《派对：当代纽约生活场景》(*Parties: Scenes from Contemporary New York Life*) (纽约：阿尔夫雷德·诺普夫出版社，1930)第十四章。

关于短语“宗教迷狂”见科利尔的《本尼·古德曼和摇摆时代》第十四章“摇摆乐队现象”。关于爵士乐的表达方式，见《吉特巴舞》第一期和第二期。关于卡伯·卡洛维(Cab Calloway)的《爵士乐迷字典》(*Hepster's Dictionary*)，见《乞丐米尼和我》(*Minnie the Moocher and Me*) (纽约：托马斯·克罗维尔出版公司，1976)和《棉花俱乐部和这个世界》(“The Cotton Club and The World”)；在卡伯·卡洛维的《爵士乐迷字典》第六版重印版本中，这篇文章被收录在第252页的附录中。关于爵士乐的起源，见梅兹·梅兹欧(Mez Mezzrow)和贝纳德·沃尔夫(Bernard Wolfe)合写的《当真蓝调》(*Really the Blues*) (纽约：要塞出版社，1990)，第十二章“告诉新手们一些事”。

关于摇摆乐打着“政府的烙印”这一观点，见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三章“摇摆来了：本尼·古德曼和美国音乐的胜利”。关于爵士是“抗议和反叛的音乐”这一引语，见弗兰西斯·牛顿(Francis Newton)的《爵士场景》(*The Jazz Scene*) (伦敦：企鹅出版社，1961)。关于约翰·哈蒙特(John Hammond)对本尼·古德曼的影响，见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五章“摇摆左倾：摇摆时代的种族政治和文化”。关于音乐家们成为黑人群体的榜样，见埃伦伯格同一本书第四章“来自伟大的狂野世界的新闻：贝西伯爵、艾灵顿公爵和黑人摇摆乐队”；关于摇摆乐产业，则见第六章“摇摆都市：纽约以及黑人白人间的摇摆乐队行业”。

20年代和30年代这两代人间的紧张关系可以参见阿贝尔·格林和小乔·劳里的《从杂耍到广播的演艺事业》第四十七章“了解爵士——摇摆乐的诞生”。更多芝加哥摇摆乐聚会的细节，见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二章。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青年运动和好莱坞，见大卫·M.

康斯戴恩的《青少年的电影院》第二章“从穷街到米德尔镇 1930—1949”，以及第八章“死角和死囚区 1931—1939”。

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对大麻的战役，可以参见哈里·夏皮罗 (Harry Shapiro) 的《等待那人：毒品和流行音乐的故事》(*Waiting for the Man: The Story of Drugs and Popular Music*) (伦敦：曼达琳出版社，1990) 第五章“嗨，嗨，哈里——你今天毁了多少人？”哈里·安史林格 (Harry Anslinger) 和科特尼·赖利·库珀 (Courtney Ryley Cooper) 合作的文章被詹姆斯·A·印细亚蒂 (James A. Inciardi) 在《美国毒品场景》(*The American Drug Scene*) (波士顿：罗克斯伯利出版公司，2004) 中引用。关于大麻和“毒品贩子”的歌曲，可以听收录在双面 CD《麻醉和荣耀：30 年代和 50 年代的大麻歌》(*Dope and Glory: Reefer Songs from the Thirties and Forties*) (慕尼黑：崔空唱片公司，2002) 中的 50 首歌。

关于大麻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渗透进摇摆乐观众中，见吉尔·琼斯 (Jill Jones) 的《爵士乐手、缉毒警察和白日梦》(*Hep-Cats, Narcs and Pipe Dreams*) (纽约：斯克莱布诺出版社，1996) 第七章“天空很高，我也是”，以及科特尼·赖利·库珀的《猩红的设计》(*Designs in Scarlet*) (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39) 第八章“鬼灵归来”。关于《生活》(*Life*) 杂志和肯尼思·琼斯 (Kenneth Jones)，见《青年问题 1938》(*Youth Problem 1938*) (*《生活》*，1938 年 6 月 6 日) 14—15 页。关于引自《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摇摆乐是青年人的呐喊”，见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二章。

弗兰西斯·牛顿的《爵士场景》第十三章“公众”以及吉姆·高德宝 (Jim Godbolt) 的《英国爵士乐历史 1919—1950》(*A History of Jazz in Britain 1919—1950*) 第七章“公爵和小百姓”和第八章“空谈家、唱片公司和节奏俱乐部”中都介绍了摇摆乐传播到欧洲的情景。关于卡伯·卡罗维 1935 年访问英国，见《乞丐米尼和我》中的《棉花俱乐部和这个世界》。关于《画报》上的文章《美国的舞蹈狂》(“Dance Madness in USA”)，见第一卷第六篇。

关于德国的摇摆乐以及希特勒青年所说的“黑鬼有着非常强烈的节奏感”，见迈克尔·H·卡特 (Michael H. Kater) 的《不同的鼓手：纳粹德国文化下的爵士乐》(*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第一章“关于索引：第三帝国的战前活动”中的《意识形态基础和辩证法》(“Ideological Foundations and Polemics”)一文；关于对音乐和媒体的控制，见第一章中的《首次公众控制》和《广播和录音》。关于热辣俱乐部的持续，见第二章“爵士挑战：一个文化的再主张”中的《爵士集会及其主教》。

关于对广播的控制以及卢森堡公国广播，见卡特同本书的第一章中《广播和录音》(“Broadcasting and Recordings”)。关于德国版的温吞摇摆乐，见第一章中《德国爵士乐的尝试》(“Attempts at German Jazz”)；关于国际节奏俱乐部的详情，可参见第二章中《爵士集会及其主教》(“The Jazz Congregation and Its High Priests”)；而汉堡摇摆乐青年团的情况则可见第二章《政治中的爵士》(“Jazz Within Politics”)；这一章同样也是关于社会舞蹈那段描述的出处。关于党卫

队对本尼·古德曼和乔治·格什温的谴责,见卡特同一本书第一章中的《广播和录音》,而汉堡地方长官对摇摆舞的斥责,则见第二章中的《政治中的爵士》。

关于1939年2月德美协会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召开的集会,详情可见约翰·罗伊·卡尔森的《掩盖之下》第二章“在施塔仁博格家上学”。关于来自破裂或者贫困家庭的年轻法西斯分子,见伊莎贝尔·莉顿编的《阿司匹林时代》中华莱士·斯特格纳写的《1934:广播牧师和他的教徒》。关于引语“砰砰砰”,见卡尔森的《掩盖之下》第四章“库格林的‘基督圣战’”;还可参见詹姆斯·T.法雷尔的《汤米·盖拉格的圣战》(*Tommy Gallagher's Crusade*) (纽约:先锋出版社,1939)。

更多关于德美协会的细节可以参见约翰·罗伊·卡尔森的《掩盖之下》第七章“阿道夫·希特勒的木偶”。海伦·瓦罗斯的话出自1939年8月9日星期六的《纽约每日镜报》(*New York Daily Mirror*)第8页。关于从学校离开学生难以找到工作的问题,参见《生活》杂志,《青年问题1938》第11页,以及科特尼·赖利·库珀的《猩红的设计》第三章“他们干的疯狂事情”。关于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的文章,见《生活》杂志1939年6月刊第47页《美国的未来》(“America's Future”)。

对1939年世界博览会的正面描述可见沃尔夫冈·弗利尔比(Wolfgang Friebe)的《世界博览会的建筑》(*Buildings of the World Exhibitions*)第156页,以及官方的指导手册《纽约世界博览会:明日世界,1939》(*New York World's Fair: The World of Tomorrow, 1939*) (纽约:博览会出版有限公司,1939)。《时尚芭莎》上的引文出自1939年2月4日第7219期45—47页上的文章。

关于米高梅公司和秀兰·邓波儿(Shirley Temple)在电影市场上的统治地位,见阿尔金·哈曼兹(Aljean Harmetz)的《〈绿野仙踪〉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Wizard of Oz*) (伦敦:帕维利昂出版社,1989)第四章“角色分配”。更多关于秀兰·邓波儿的信息可参见诺曼·J. 吉尔德(Norman J. Zierold)的《童星》(*The Child Stars*) (伦敦:麦克唐纳出版公司,1965)第三章“秀兰·邓波儿到底像什么?”引文“回到简单、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出自《绿野仙踪:电影剧本》(*The Wizard of Oz: The Screenplay*) (纽约:德尔塔出版社,1989)中迈克尔·帕特里克(Michael Patrick)所作的绪论。

《绿野仙踪》复杂的拍摄过程在阿尔金·哈曼兹的《〈绿野仙踪〉的诞生》第一章“工作室,1938”、第三章“大脑、神经、心脏和音乐”以及第四章“角色分配”中得以详述;关于这一复杂过程,还可参见约翰·弗里克(John Fricke)、杰·斯卡峰(Jay Scarfone)以及威廉·斯蒂尔曼(William Stillman)合作的《绿野仙踪:图说官方50年纪念日》(*The Wizard of Oz: The Official 50th Anniversary Pictorial History*) (伦敦:霍德与斯汤顿出版公司,1989)第一部分“仙踪日记:创造经典”中的第一到七章;关于媒体活动,见同一资源第二部分“仙踪日记续:晋升与接待”,第八章“仙踪活动”。

和《飞过彩虹》(“Over the Rainbow”)相关的引语“一首思念的歌”出自阿尔金·哈曼兹的

《〈绿野仙踪〉的诞生》第三章“大脑、神经、心脏和音乐”。关于1938年的朱蒂·加兰(Judy Garland)和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见同一本书第四章“角色分配”以及诺曼·J. 吉尔德的《童星》第五章“真实的朱蒂”和第八章“米基”。关于“官方欢迎团”竞赛,见约翰·弗里克、杰·斯卡峰以及威廉·斯蒂尔曼合作的《绿野仙踪:图说官方50年纪念日》第十章“曼哈顿的国会剧院演出”。

描述加兰和鲁尼到达场面的资源很多,可参见8月15日星期二的《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对影迷的描述以及引语“队伍中60%的年龄都很小”出自8月17日星期四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关于米基·鲁尼和朱蒂·加兰的表演,见诺曼·J. 吉尔德的《童星》第八章“米基”和第五章“真实的朱蒂”;还可参见杰洛尔德·弗兰克(Jerold Frank)的《朱蒂》(*Judy*)(纽约:初音岛出版社,1989),十到十一章;关于苯丙胺,见杰洛尔德·弗兰克的《朱蒂》的第十四章。

引语“一种奇特的突出的品质”出自阿尔金·哈曼兹的《〈绿野仙踪〉的诞生》第八章“线条之下”。关于朱蒂·加兰和米基·鲁尼参观世界博览会,见约翰·弗里克、杰·斯卡峰以及威廉·斯蒂尔曼合作的《绿野仙踪:图说官方50年纪念日》第十章“曼哈顿的国会剧院演出”。关于梅西百货所做的朱蒂·加兰女装广告,见1938年8月29日星期二的《纽约每日镜报》第11页。

## 第二十二章 征服者与统治者

开篇《黑色军团》(*Schwarze Korps*)的引文出自珍妮弗·基莉(Jennifer Keeley)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Life in Hitler Youth*)第八章“战时的希特勒青年团”。罗伯特·莱伊的“在纳粹德国,个人根本不存在”参见布莱尔·R. 霍尔姆斯(Blair R. Holmes)和阿兰·F. 基尔(Alan F. Keele)编撰的《当真相是背叛:德国青年对阵希特勒》(*When Truth was Treason: German Youth against Hitler*)(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5)序言部分的注释,注17。关于绝大部分德国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参见格哈德·雷姆珀(Gerhard Rempel)的《希特勒的孩子们》(*Hitler's Children*)第一章中的引言。

关于青年警察机构的复杂体系和所有的首字母缩写(书的前言部分有所解释),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三章“统一者、犯罪者和执行者”。负责青年警察机构的团体包括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秘密警察(KRIPO:kriminalpolizei)、保安警察(SIPO:Sicherheitspolizei)、巡逻队(SRD:Streifendienst)。勃兰登堡监狱的迫害,见H. W. 科齐(H. W. Koch)的《希特勒青年团》(*The Hitler Youth*)第十章“异议”。阿道夫·希特勒1940年冬关于教育的演讲出自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十一章“精英”中。

德国青年的备战情况见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和珍妮弗·基莉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八章“希特勒青年团和战争”。关于被访者的情况出自强尼斯·斯坦霍夫、彼得·佩舍尔和丹尼斯·肖特(Johannes Steinhoff, Peter Pechel and Denis Showalter)的《第三帝国

的声音：口述的历史》(*Voices from the Third Reich: An Oral History*) (纽约：戴卡珀出版社，1994) 第一部分“欧洲的主宰”。德国的迅速发展参见马克·阿诺德·弗斯特(Mark Arnold Forster)的《战时的世界》(*The World at War*) (伦敦：皮姆利可出版社，2001) 第二章“虚假战争”和第三章“法国的沦陷”。

希特勒青年团人数愈800万的数据引自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希特勒成功的领土吞并参见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六章“意识形态”。纳粹教育体制的改进见德特勒福·J. K. 珀凯尔特(Detlev J. K. Peukert)的《深入纳粹德国》(*Inside Nazi Germany*) 第八章“年轻人：调动和拒绝”。更多关于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教育体系的信息可参见珍妮弗·基莉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四章“希特勒青年团的校园生活”。

兰格马克神话的延续请参考H. W. 科齐《希特勒青年团》第一章“传统”和第二章“战争”。“我才17岁”引文请看强尼斯·斯坦霍夫、彼得·佩舍尔和丹尼斯·肖特的《第三帝国的声音：口述的历史》第九章“帝国开始缩小”中对佩特·巴索利尔·海因里希·巴提尔斯·斯特莱索芬的采访。关于阿图尔·阿克斯曼发现失去自我的描述，请看《清单》(*Account Rendered*) 第十章。德国1939和1940年间的胜利，请看强尼斯·斯坦霍夫、彼得·佩舍尔和丹尼斯·肖特的《第三帝国的声音：口述的历史》第三章“闪电战”。

为适应战争需要希特勒青年团迅速吸纳成员的详情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八章“教育”和第二章“战争”。“他背上是个塞满瓶子的小包”的引言出自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这一章也是把1940年称为“磨炼之年”的资料来源。关于希特勒青年团和迅速扩张的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参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六章“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掠夺者”。

法国被占领的详情参见伊安·乌斯贝(Ian Ousby)的《占领：法国的磨难，1940—1944》(*Occupation: The Ordeal of France, 1940—1944*) (伦敦：皮姆利可出版社，1999) 第一章“侵略和撤离”和第二章“维希和欧洲新秩序”。关于荷兰的黄星的介绍，参见卡罗尔·安·李(Carol Ann Lee)的《土中玫瑰：安妮·弗兰克传》(*Roses from the Earth: The Biography of Ann Frank*) (伦敦：企鹅出版社，2000) 第二部分“当我们犹太人的苦难真正开始”中的第四章。关于法国的黄星，参见伊安·乌斯贝的《占领：法国的磨难，1940—1944》第四章“出席和缺席”。

行动突击队的活动在所罗门·帕瑞尔的《欧罗巴，欧罗巴：二战回忆录》(*Europa, Europa: A Memoir of World War II*) (纽约：约翰·威利，1997) 第一章“飞向东部”和安德莉亚·沃伦(Andrea Warren)的《劫后余生：纳粹集中营里的男孩》(*Surviving Hitler: A Boy in the Nazi Death Camps*) (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社，2001) 第二章“占领”和第三章“积聚的恐惧”。关于纳粹在华尔斯高的政策，参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五章“雇农、农场主和战士”和第六章“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掠夺者”，同时可参见第二章“战争”。

关于梅丽塔·玛舒曼打算去波兹南的考虑,参见《清单》第六章和第七章。最后的引文“过分的要求”参见第九章。关于所罗门·帕瑞尔在纳粹行进中被抓参见《欧罗巴,欧罗巴》第一章“飞向东部”。关于党卫军在希特勒青年团内部影响的加强,参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八章“精英的空头支票”。关于党卫军卷入被占领土,参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五章“雇农、农场主和战士”。这本书中包含了雇农的反抗以及“向自由世界的宣战”的内容。

1942年为“服务之年”的命名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关于青年从被占欧洲涌向新扩张的帝国,参见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希特勒青年团和党卫队》第五章。党卫军对德意志民族政治教育学院和阿道夫希特勒学校控制的加强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九章“精英”。所罗门·帕瑞尔在其中一所学校的经历参见《欧罗巴,欧罗巴》第三章“去布伦瑞克”。

关于武装党卫队拥有“卓越装备”的引文,见强尼斯·斯坦霍夫、彼得·佩舍尔和丹尼斯·肖特的《第三帝国的声音:口述的历史》第十五章“童子军”中对西奥·洛赫(Theo Loch)的采访。1942年9月欧洲国际青年团会谈引自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

关于梅丽塔·玛舒曼对于党内高层官员的评述,参见《清单》第八章;关于她在她所管理的工人阶级那里受挫的描述见第十二章,她在库诺看到犹太人贫民窟时的情感反应见第七章。关于1942年末纳粹国家达到顶峰,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精英”。

## 第二十三章 无奈的应征兵和社会主义英雄

章前引文出自大众教育手册系列第三期《战争中的孩子》(*Children at War*) (苏塞克斯大学,1987)27页。纳粹日益明显的威胁以及英国的征兵动员,参见安格斯·考尔德(Angus Calder)的《人民的战争:英国1939—1945》(*The People's War: Britain 1939—1945*) (伦敦:皮姆利可出版社,2002)第一章“序幕:慕尼黑和30年代”;同时可参阅第二章“最奇怪的战争: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突降”。

对英国青年情绪的评估,见大众观察资料馆(M-OA)1940年7月的报道“出于良心拒服兵役”。关于理查德·希拉瑞(Richard Hillary),见《最后的敌人:喷火式战斗机飞行员回忆录》(*The Last Enemy: The Memoir of a Spitfire Pilot*) (泽西:博夫德图书,1997)第一章“在慕尼黑笼罩下”。这一章也是他关于纳粹傲慢态度的引文以及他关于“牛津一代”的评价的资料来源。1942年文法学校校长的话,见《战争中的孩子》第5页。

无特权的征兵的“十分厌烦”引自安格斯·考尔德《人民的战争:英国1939—1945》第二章“最奇怪的战争:1939年9月到1940年4月:突降”。关于大众观察与信息部合作的详情见汤姆·杰弗瑞《大众观察:简史》(*Mass - Observation: A Short History*)特刊10号第六章“战争”。关于“大众观察”对反对者的评述,见大众观察资料馆1940年7月的文章“出于良心拒服兵役”。

威廉·L·夏伊勒关于比利时的英国囚犯的描述,见《柏林日记:一个外国通讯员的日志,1939—1941》(*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9—1941*)(纽约:诺普夫出版社,1941)第二部分,5月20日的“战争”日记,脚注。关于夏伊勒对纳粹政权的态度,见1939年9月19—20日的日记:“当希特勒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看到他身后跟着希莱姆、布普克纳、凯尔和其他一些人,都穿得一身土灰色。大部分人都没刮胡子,我不得不说他们看起来很像芝加哥流氓。”

伦敦和乡下青少年成长的比较,见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on)的《青年的希望:世界概览》(*The Hope of Youth: World Review*)大众观察资料馆,FR499,“青年的希望”,1940年11月。对问卷调查的回应,从“年轻人觉得不管是选择工作还是参军都是个死胡同”开始的叙述引自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年,1/F,18到20年龄组的问题,1940年10月。这也是下几段引文的出处。哈里森的“很可能战争结束后,青年们会认为成年人应该为战争负责”出自《青年的希望》。这篇文章也是青年人“大都自寻出路”的引文的出处。

关于在街上跳吉特巴舞的人寥寥无几,参见大众观察资料馆,“音乐/舞蹈”,1/A,舞厅中的观察,1941年1月。“甚至去死”的引文,见《每日镜报》(*Daily Mirror*),1940年11月25日,呼唤青年,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1/D。18岁以下的有超过200万的男女工人的数据见A.P.杰夫科特的《成长中的女孩》(伦敦:费伯-费伯出版社,1942)第四章“工作”。这一章也是“成为国家真正重要的部分”的引文出处。

长线撤离计划的详情见大众观察教育手册第2号,《疏散》(*Evacuation*)(苏塞克斯大学,大众观察资料馆,1987)第1、2页。“更像牲口或奴隶市场”的引文见《疏散》第五页。“他们看到别人不得不领走他们不愿意接收的孩子”的引文见《疏散》第五页,“如果你跟他们说上两句话”见14页;“被疏散者和主人间的主要问题”见15页。“知道了彼此的存在”的引文,见大众观察资料馆,“疏散”,1/I,来自东德文郡-锡德茅斯的报道。关于回到城市中心的描述,见《疏散》第19页。

关于闪电战,见“大众观察”教育手册1号,《闪电战》(苏塞克斯大学,大众观察资料馆,1987)第5页。200万伦敦人失去家园的数据,见彼得·刘易斯的《人民的战争》(*A People's War*)(伦敦:梅图恩出版社,1986)第四章“炸弹结束了”。关于劫掠和“青年中普遍道德观念松懈”的引文,见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2/K,“青少年和战争”,1940年11月。其中包括桑斯瓦克、罗瑟希德、伯蒙德西的社会工作者的报道。“流氓作风”的引文以及青年问题和“青年人实际没有家庭生活”的表述,见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2/A,青年调查,帕丁顿/伯蒙德西,1941年1月。

关于学校被关闭、摧毁、征用和其他一些街道封锁,见上文提到的1940—1941青年调查。战时17岁以下青年犯罪增加了33%的数据,见安格斯·考尔德的《人民的战争:英国1939—1945》第四章“闪电战:1940年9月到1941年5月”。对恶作剧是造成犯罪上升主要原因的认

同,见安娜·W. M. 沃夫(Anna W. M. Wolf)的《我们的孩子面临战争》(*Our Children Face War*) (马萨诸塞:沿河出版社,1942)第四章“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从大不列颠所学到的。”“青年并无什么特别之处”的引文见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2/A,青年调查 1941,同上。

“自从战争爆发”的引文见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1/D,“不可推卸的义务”,摘自时事通讯第4期,54号。N. 阿德勒的“工薪青年”的轰动报道,见《每日之星》(*Daily Star*), 1942年1月,收于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1/D。报道所提供的数据,见1942年1月《论坛》(*Tribune*)上一篇文章,以及1942年1月31日泰晤士报教育副刊,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2/C有转载。下面三段关于青年业余时间和消费的资料来源于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2/E,青年调查,帕丁顿/伯蒙德西,1941年1月。关于服饰的详细描述见同一文本。

雇佣人数达到220万的数据引自安格斯·考尔德《人民的战争:英国1939—1945》第六章“印度橡胶岛:英国1943—1944”。关于年轻女性和工作的叙述,包括“气氛单调乏味”和“愉快的插曲”的引述,见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2/C,对工作的态度,1940年11月。关于十五六岁的女孩在工厂中得到高度赞扬,见A. P. 杰夫科特《成长中的女孩》第四章“工作”。“男孩女孩都做好了准备”的引述见第五章“业余时间(2):跳舞和绘画。”

杰夫科特对一个典型的工厂女孩和她的物品的描述见《成长中的女孩》第二章“24万女孩”。有关女孩们的读物:浪漫杂志和色情读物,也是出自这一章。关于朱迪·加兰、米基·鲁尼和热情爵士乐,见杰夫科特第五章,“业余时间(2):跳舞和绘画。”这一章也是“热情的节奏和音乐的节拍”的引文出处。

战时性病率上升的详细描述见约翰·卡斯特罗(John Costello)的《爱情、性欲与战争:1939—1945 价值观的转变》(*Love Sex and War: Changing Values 1939—1945*) (伦敦:柯林斯出版社,1985)第六章“道德圣人”。大标题“营妓:16到18岁的女孩开始放荡”见大众观察资料馆,“青年”1937—1943,1/D,人民,1941年1月。女孩们“被催熟而不是长大”见杰夫科特第五章“业余时间(2):跳舞和绘画。”父母把孩子看作最后的一代和女孩抱怨她不得不过“爱丽斯奇遇记”一样的生活,见杰夫科特第六章“人际关系”。

妇女被卷入劳动市场和欧内斯特·贝文的引述,见彼得·刘易斯《人民的战争》第五章“周六的曙光”。这一章也是700万妇女参加工作的数据以及“火药到处乱飞”的引文的来源。“女孩在很多家庭里还是低级的生物”的引文,见杰夫科特第三章“教育(2):毕业之后”。关于离家工作,拥有她们自己房间的女性,见彼得·刘易斯《人民的战争》第五章“周六的曙光”。

1941—1942年冬的报道,引述了有多少孩子变得“阴郁放肆”,见大众观察资料馆教育手册系列3号,战争中的孩子(苏塞克斯大学,1987)第十六页。这篇是转载国际保护青年基金会的杂志《世界的孩子》1941—1942年冬一篇文章。原文是帕特里科亚·吉尔伯特罗吉写的,叫“战时伦敦的孩子”。英国青年服务的历史,见约翰·R. 吉利斯(John R. Gillis)《青年和历史》

(*Youth and History*)第四章“顺从与犯罪:青少年的时代,1900—1950”第五部分。

1940年10月的通告“青年娱乐与服务”,战争期间青年服务的详情见大众观察资料馆,FR1353,青年服务,1942年8月到9月第2页。这个文本的报道也是“我受够了坐在那听”的引文出处,以及1941年16到18岁男女青年强制征兵和对“纳粹风格政权”的回应的资料来源。政府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预见彼得·刘易斯的《人民的战争》第六章“战争中的女性”,和安格斯·考尔德的《人民的战争:英国1939—1945》第五章“穿过隧道:1940年10月到1942年12月。”后者也是CC41品牌标志的资料来源。

关于向共产主义方向的努力,见彼得·刘易斯的《人民的战争》第十章“向左看,道路光明”。这一章也是《画报》(*picture post*)的资料,1941英国计划的来源。原文在《画报》第10卷,第一期,1941年1月4日。关于军队讨论组、士兵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见保罗·A.托马斯(Paul A. Thomas)的《战后的希望和期待,对贝弗里奇报告的回应》(*Post - War Hopes and Expectations, and Reaction to the Beveridge Report*) (苏塞克斯大学,“大众观察”教学手册9号,1988)第五到第七页。同一本手册也是引文“伊顿和哈罗这样的公学应该被废除”(第8页)和“年轻人有他们的发言权”的出处。

关于理查德·希拉瑞的自传,见塞巴斯蒂安·富克斯(Sebastian Faulks)的《决定性的英国人:三段短暂的生命》(*The Fatal Englishmen: Three Short Lives*) (伦敦:哈奇森出版社,1996),“理查德·希拉瑞”。同时可参看理查德·希拉瑞《最后的敌人》(*The Last Enemy*)第三章“烈女”和第四章“彼得·皮斯的世界”。温斯顿·丘吉尔有关新圆桌骑士的引述,见史蒂芬·邦吉的《最危险的敌人:英国战争史》(*The Most Dangerous Enemy: A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 (伦敦:奥拉姆出版社,2000)第一章“原因”。同时可参阅保罗·A.托马斯《战后的希望和期待,对贝弗里奇报告的回应》第32页和大众观察资料馆,FR1783,社会保障和国会,1943年5月。

青年战斗飞行员,请看史蒂芬·邦吉《最危险的敌人:英国战争史》第十三章“男人”。这一章也是引文“就是想要啤酒和女人”以及强有力的同龄文化“黑色幽默和团队精神”的来源。引用丘吉尔的“在人类冲突中从未有过”引自邦吉第九章“从长计议。”希拉瑞拒绝国民英雄的角色和“我讨厌这种东西”的引文,见塞巴斯蒂安·富克斯《决定性的英国人:三段短暂的生命,“理查德·希拉瑞”》。

引自希拉瑞母亲的值得纪念的叙述“在你身上发生了这事你应该感到高兴,”见理查德·希拉瑞《最后的敌人》第五章“侵略者”。“不可能只顾自己”的引文出自第九章“我看到他们也抓住了你”。关于希拉瑞的书出版后他的生活,见塞巴斯蒂安·富克斯《决定性的英国人:三段短暂的生命,“理查德·希拉瑞”》。

## 第二十四章 社交界新人和美国兵

篇首语引自莫琳·戴利(Maureen Daly)的《第十七个夏天》(*Seventeenth Summer*) (纽约:斯

科拉斯迪克出版社,1942)。美国青年对欧洲战争的反应,参见理查德·玛丽娜·乌格兰德(Richard Maring Ugland)的《二战期间青年经历:以印第安纳波利斯为个案研究》(*The Adolescent Experience During World War II: Indianapolis as a Case Study*) (印第安纳波利斯:史料部,印第安纳大学博士,1977,由芝加哥大学安娜堡分校论文服务部提供)第二章“适应战争”。

“是的,我们有内奸”的文章刊登在《读者文摘》1940年10月(欢乐谷,纽约)。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埃德蒙·泰勒(Edmond Taylor),转印自1940年9月《美国》杂志。约翰·罗伊·卡尔森(John Ray Carlson)对亲纳粹派和在美国工作的三K党的揭露,见《掩盖之下》(*Under Cover*)。美国青年委员会分歧的叙述,见20世纪30年代学生激进活动的网络资料。可查阅 <http://newdeal.feri.org/students/lash.html> 上的“20世纪30年代学生运动:约瑟夫·P.莱诗采访。”

关于选拔服务法案的通过,见理查德·玛丽娜·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青年经历》第二章“适应战争”和李·肯尼特(Lee Kennett)的《GI:二战中的美国士兵》(*G. I.: The American Soldier in World War II*) (纽约:华纳图书,1989)第一章“征兵”。关于重整军备开始把美国带出大萧条,见理查德·R.林格曼(Richard R. Lingeman)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美国家园的前线,1941—1945》(*Don't You Know There's a War On? The American HomeFront, 1941—1945*) (纽约:帕特南出版社,1970)第一章“序幕:星期六”。“今天‘民主’这个词挂在每个人嘴边”的引文见理查德·玛丽娜·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青年经历》第二章“适应战争”。

1940年10月盖洛普民意调查的详情见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的“美国青年大胆的说”(《读者文摘》,1940年10月51到55页)。美国青年委员会的论述“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状况”和“我们年轻人的希望和信念处于危险之中”,见斯多瑟·马特斯那·格路恩伯格编(Sidonic Matsner Gruenberg)的《战争世界中的家庭》(*The Family in a World at War*) (纽约:哈普兄弟出版社,1942)以及霍华德·Y.麦克鲁斯基的“战争世界中的青年展望”。

1940年间美国高中青年学生数量的数据出自理查德·玛丽娜·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青年经历》第一章“序言”和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Gilbert)的《暴行的循环》(*A Cycle of Outrage*)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第一章“行为问题”。学生数量是20世纪30年代的两倍的数据来自理查德·玛丽娜·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青年经历》第三章“战时的高中”,高中生市场开辟的资料来源出自该书第八章“总结”。

大学年龄学生未受雇佣人数的数据见斯多瑟·马特斯那和格路恩伯格编的《战争世界中的家庭》以及霍华德·Y.麦克鲁斯基的“战争世界中的青年展望”。贾菲尔·哥尔对美国高中的观察出自《美国人:国民品质调查》(*The Americans: A Study in National Character*) (伦敦:克雷瑟特出版社,1948)第三章“全国的美国儿童”。引文“中西部小麦产业带委员会”,见奥古斯特·B.霍林斯黑德(August B. Hollingshead)的《艾姆城的年轻人:社会阶层对青少年的冲击》(*Elm-town's Youth: The Impact of Social Classes on Adolescents*) (纽约:约翰·威利,1949)中的前言。

青年团伙重要性的全面描述见霍林斯黑德的《艾姆城的年轻人》第九章“小集团和约会”。

对乔伊斯·杰生的引述,见同章。关于青年小集团风格的广播,见格雷斯·帕拉迪诺(Grace Palladino)的《青少年》(*Teenagers*)第四章“摇摆转变:短袜少女登上舞台”;这也是1941年1月《生活》杂志社交界新人文章的出处。1940年早期是“检验特定年龄群购买力的合适时机”,见乌格兰德第七章“青少年的浮现”。

关于临时工,见霍林斯黑德第14章“辛劳与麻烦”,“青年策略”板块,见乌格兰德第七章“青少年的浮现”。对《召唤所有女孩》第一期的描述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四章“摇摆转变:短袜少女登上舞台”;更详细的内容见露西·罗琳(Lucy Rowling)的《20世纪每十年间的青少年文化:参考指南》(*Twentieth-Century Teen Culture by the Decades: A Reference Guide*)第四章“20世纪40年代”,同时可参阅迈克尔·巴森和史蒂芬·海勒(Michael Barson and Stephen Heller)的《走近少年》(*Teenage Confidential*)(圣弗朗西斯科:克罗尼克图书出版公司)第一章“科林青年不会早逝:少年文化的黎明”。

20世纪40年代早期青年电影的详述见大卫·M.康斯戴恩(David M. Consideine)的《青少年影院》(*The Cinema of Adolescence*)第二章“从贫民区到中心城,1939—1949”。格伦·米尔斯的兴起,见刘易斯·A.埃伦伯格(Lewis A. Erenberg)的《摇摆梦想》(*Swingin' the Dream*)第七章“摇摆走向战争:格伦·米尔斯和二战期间的流行音乐”,和冈特·舒勒(Gunter Schuller)的《摇摆时代:爵士乐的发展,1930—1945》(*The Swing Era: The Development of Jazz, 1930—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第七章“白色乐队,第二部分:格伦·米尔斯”。

莫琳·戴利对同龄人的焦虑,见《第十七个夏天》第一章“六月”。霍林斯黑德的“早在中型城镇的年轻人能赚钱之前”见《艾姆城的年轻人》第七章“社会群体中的年轻人”。他的假设“青少年的社会行为”可以反映父辈的社会背景,见《艾姆城的年轻人》第一章“研究问题”和第七章“社会群体中的年轻人”。霍林斯黑德对五个社会阶层的描述见《艾姆城的年轻人》第二章“领域过程”和第五章“五个阶层的社会特征”。

“一群认为高我们一等的女孩”的引文见《艾姆城的年轻人》第八章“行动中的高中”。琼·梅尔斯被排斥,见第九章“小集团和约会”。“几乎像是秘密警察系统”的引文,见莫琳·戴利的《第十七个夏天》第一章“六月”。艾姆城年轻人的着装,见《艾姆城的年轻人》第十五章“业余时间活动”。

美国流行文化中自由的意象,可参阅露西·罗琳的《20世纪每十年间的青少年文化:参考指南》第四章“20世纪40年代”和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四章“摇摆转变:短袜少女登上舞台”。青少年处在“不确定的无人关注的地带”见奥古斯特·霍林斯黑德的《艾姆城的年轻人》第七章“社会群体中的年轻人”。

关于成年人和青少年之间的沉默,见《艾姆城的年轻人》第十二章“娱乐和禁忌之乐”,性能力的成熟源自第十六章“性爱和婚姻”。第四阶层和第五阶层青少年高中辍学率引自霍林斯黑德的《艾姆城的年轻人》第十三章“离开学校”,对成年人感觉的追求见第十五章“业余时间活

动”。“17岁的第五阶层斗鸡眼女孩”的引文见第十四章“辛劳和麻烦”。

美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见乌格兰德的《二战时期青少年的经历》第二章“适应战争”。“青年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来强力推动这件事”的引文见理查德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一章“序幕:星期六”。珍珠港的震惊,见乌格兰德第二章“适应战争”和林格曼第二章“空袭中,走,别跑”。这一章也是征兵官员陷入两难境地的资料来源。

征兵、训练和适应军队生活几个阶段的详情见李·肯尼特《美国兵》第二章“问好……”和第四章“兵营视角”。“年轻人仍然是国家的重要资源”的引文,见格路恩伯格编的《战争世界中的家庭》中霍华德·Y. 麦克鲁斯基的“战争世界中的青年展望”。从“爱玩的18岁男孩”到“在东京上空操控导弹”的飞行员的转变,见安娜·W. M. 沃夫的《我们的孩子面临战争》第二章“危险中的纪律”。

“抹掉过去的经历”的引述,见李·肯尼特的《美国兵》第三章“训练营的世界”。和另一个小团伙合并,见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的《第二次世界大战》(WW II)(纽约: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1975)第12章“士兵的演变”关于渎职的军人,见塞缪尔·A. 史托夫、爱德华·A. 舒什曼、利兰·C. 迪范尼、雪莉·A. 斯达和罗宾·M. 小威廉姆斯(Samuel A. Stouffer, Edward A. Suchman, Leland C. DeVinney, Shirley A. Star and Robin M. Williams Jr.)等写的《美国士兵:适应军队生活》(*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纽约:科学编辑出版社,1965)第一卷第五章“军队中个人适应力有多么不同”。

高中生应征兵有更好的教育,见史托夫等《美国士兵》第二章“新老军队”。这一章也是引文“军队传统狭隘过时”的出处。阿瑟·米尔斯关于美国兵“性格更为复杂”的描述出自李·肯尼特的《美国兵》第四章“兵营视角”。战争使男孩女孩们一夜间长大了,见格路恩伯格编的《战争世界中的家庭》中卡罗琳娜·B. 扎迦利的“青少年和他们今日的问题”。这一章也是“进行了很多思考”的引文出处。

美国境内配给的介绍见理查德·R. 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七章“短缺和布莱克先生”和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四章“摇摆转变:短袜少女登上舞台”。“几乎所有学生”的引文见乌格兰德第二章“适应战争”。美国高中生做好了战争准备的材料来自乌格兰德第三章“战争中的高中”。

这一章也是国民防御办公室十点计划、预备军官团的回归、青少年学业完成加速和学生出版物的介入的资料来源。美国青少年需要“严格纪律”的引文出自安娜·W. M. 沃夫的《我们的孩子面临战争》第二章“危险中的纪律”。关于鲍勃·贝格见《生活》杂志1942年11月30日,封面和103到111页。

关于厄尼·派尔和一些男孩的简要描述,见《这是你的战争:美国兵乔的故事》(*Here is Your War: The Story of G. I. Joe*)(纽约:弗洛姆图书,1945)第七章“转变和面对”。关于鲍勃·贝格对为什么要打仗的论述,见格路恩伯格编的《战争世界中的家庭》中埃弗雷特·R. 克林奇(Ever-

ett R. Clinchy)的“多样的群体”。马克·麦克鲁斯基的引述来自同一本书中的“战时的青年展望”。美国青年国会的引述也来自同一章。

关于黑人要求更进一步参与美国民主的躁动见约翰·莫顿·布卢姆(John Morton Blum)的《V代表胜利》(*V was for Victory*) (纽约:哈考德·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出版社,1976)第六部分“美国黑人正在崛起”第一章“杰姆·克劳法”;对安娜·W.M.沃夫关于“美国被困在种族歧视和宗教狭隘之中”的引用见《我们的孩子面临战争》第三章“他们怎么做能帮上忙?”军队中隔离制度的继续,见约翰·莫顿·布卢姆的《V代表胜利》第六部分“美国黑人正在崛起”。

将布克·T.华盛顿和乔·路易斯作为典型,见E.富兰克林·弗雷泽的《十字路口的黑人青年》(华盛顿:美国教育委员会,1940)第七章“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引文“我不相信自己,或者其他黑人”见第三章“邻里联系”。引文“白人没有平等对待我们”见第六章“寻求雇佣”,引文“黑人没有和白人一样好的机会”出自同章。

性欲的发泄,见《十字路口的黑人青年》第七章“战争之墙”。这一段从“其他人屈从政策”开始的引文出自第二章“家庭的角色”。“我希望看到所有隔离被清除”来自第六章“寻求雇佣”。关于男青年想参军,见弗雷泽的介绍。黑人在华盛顿游行和总统“未来将没有歧视”的指令见布卢姆的《V代表胜利》第六部分“美国黑人正在崛起”。

理查德·怀特的“甚至在和平时期”和“我们看到奇怪的情绪控制着我们的孩子”源自《120万黑人的声音:美国黑人的民间故事》(*Twelve Million Black Voices: A Folk History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伦敦:林德西·多姆德有限公司,1947)第三部分“城市道路上的死亡”。这一章也是引文“我们弹着吉他”和“我们的音乐使整个世界起舞”的出处。走出萨瓦音乐厅的男青年的照片出自该书129页。

## 第二十五章 德国的摇摆青年和法国扎祖一族

亨利·斯科罗的引言源自迈克尔·H.卡特(Michael H. Kater)的《不同的鼓手:纳粹德国的爵士文化》(*Different Drummers: Jazz in the Culture of Nazi Germany*)第三章“爵士走向战争:顺从和违抗,军事的需要”。战时德国和纳粹占领国家的摇摆乐,见卡特第三章和简·克洛德·路易斯(Jean-Claude Loiseau)的《扎祖一族》(*Les Zazous*) (巴黎:萨基泰尔出版社,1977)第二章。

关于总体评价,虽然这里没有特别涉及,见迈克·兹文琳(Mike Zwerin)的《圣路易斯的悲伤:纳粹统治下的爵士乐》(*La Tristesse de Saint-Louis: Jazz Under The Nazis*) (纽约:海滩森林图书,1985)。这本书有会见巴尔道夫的精彩评述,他是盖世太保间谍,迫害了法兰克福摇摆青年的哈莱姆集团,参见第八章“巴尔道夫”;1943年一名叫亨利·威尔曼的恩法国老师为反对扎祖组织的精彩狂欢,参见第十七章“扎祖,嘿!”:“摇摆乐让人们持续兴奋。它让人做噩梦,会让你对它上瘾。它就像毒品。”

战争爆发后纳粹德国的青少年犯罪,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四章“青年

警察、告密者和反叛者”。95%的德国青年在政权统治下遭受奴役的数据,见雷姆珀第九章“最后的牺牲”。引文“感到恐惧”见德特勒福·J. K. 珀凯尔特(Detlev J. K. Peukert)的《深入纳粹德国》(*Inside Nazi Germany*)第二章“命令和恐惧”。

无产者团伙的重新出现,见珀凯尔特的《深入纳粹德国》第八章“年轻人:动员和拒绝”,“火绒草海盗”。引文“这是希特勒青年自己的错”来自同一文献。团伙具体的名字来源于雷姆珀第四章和珀凯尔特第八章。该书也是改变的流行热点和“每个孩子都知道尼禄泰拉海盗是谁”的引文来源。

海因里希·希姆莱1940年6月保护青年的警察命令见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四章。这一章也是1940年秋青年服务逮捕令的出处。违抗者和被捕者的数据来自雷姆珀第四章和珀凯尔特第八章。关于纳粹和性别隔离,见雷姆珀第四章。“少数群体的性行为”和接下来的引文来自珀凯尔特第八章下面的“摇摆乐运动”部分。

摇摆俱乐部的继续,见珀凯尔特的《深入纳粹德国》第八章和卡特的《不同的鼓手》第三章中的“大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战争”。对朱塔·西普的引述见后者。汉堡摇摆青年的着装细节来自卡特的第三章“汉堡的不同鼓手”。法兰克福的小团伙和当局乘快艇追赶摇摆乐迷的详细论述见同章。引述的1940年2月盖世太保对摇摆舞的描述,见珀凯尔特第八章“年轻人:调动和拒绝”中的“摇摆乐运动”部分。

下面几段关于汉堡摇摆乐的故事出自卡特的《不同的鼓手》,见第三章“爵士走向战争:顺从和反抗”中的“汉堡的不同鼓手”。听BBC广播的材料源自卡特第二章“爵士乐的挑战:重新宣扬的文化,政治中的爵士乐。”帝国音乐局对摇摆乐的禁止,见卡特第三章“大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战争”。汉堡摇摆青年的地下运动和对莱茵哈德·海德里希的着迷,见卡特第三章“汉堡的不同鼓手”。

希姆莱对汉堡摇摆乐的回应完整引自珀凯尔特《深入纳粹德国》第十章“公演和个人洞察”。汉堡摇摆乐给希特勒和戈培尔留下深刻印象的卡巴莱表演的高潮,见卡特《不同的鼓手》第三章。关于党卫队对1942年夏威夷·阿特尔特乐队的汉堡音乐会报道,见珀凯尔特的《深入纳粹德国》第二章“命令和恐惧”。

1941年春“小摇摆迷”的错误行为详见简·克洛德·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二章。法国摇摆乐和占领区之间的关系,见伊安·乌斯贝的《占领:法国的磨难,1940—1944》第二部分“可耻的和平”和第三部分“你遵守秩序吗?”以及赫伯特·R. 洛特曼(Herbert R. Lottman)的《左岸》(*The Left Bank*) (纽约:豪夫腾-米林出版社,1982),第三部分“德国统治岁月”,第二十三章“德统巴黎的局势”。引文“过度的狂喜”,摇摆乐作为流行时尚的资料,和引文“当你无法承受的时候你会怎么做?”见路易斯第二章。

被占法国的政权见伊安·乌斯贝的《占领:法国的磨难,1940—1944》第一部分“法国的沦陷和协作途径”,第二章“维希和新欧洲秩序”。关于鲜血旗帜,见乌斯贝第二部分第四章“出席

和缺席”。维希政权的资料源自乌斯贝第一部分第二章“维希和新欧洲秩序”。贝当的“青年的精神”见巴特利·宝隆(Patrice Bollon)的《伪装的道德:奇人异事、扎祖一族、纨绔子弟、朋克等》(*Morale du masque: Merveilleux, Zazous, Dandies, Punks, etc.*) (色伊出版社,1990)第七章“扎祖,扎祖,扎祖之歌”。

青年在“农业乌托邦”的地位,见朱莉安·杰克森(Julian Jackson)的《法国:黑暗岁月,1940—1944》(*France: The Dark Years*)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第七章“全国革命”。这一章也是引文“国家的集体自杀”的出处。关于维希青年团体“法国工友”,见乌斯贝第二章“维希和新欧洲秩序”和简·克洛德·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一章。去勒庞的旅程,见朱莉安·杰克森的《法国:黑暗岁月,1940—1944》第二章“宣传、警务和行政”。

西蒙娜·波伏娃的引述“同样的野蛮偏见”源自《生命之初》(*The Prime of Life*) (克利夫兰:世界出版公司,1962)第七章。被占区和法国北部的情况,见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一部分;乌斯贝的《占领:法国的磨难,1940—1944》第三章“你遵守秩序吗?”;和朱莉安·杰克森的《法国:黑暗岁月,1940—1944》第八章“通敌”。协作报道的详情,见乌斯贝第二章“维希和欧洲新秩序”。

关于罗伯特·布拉西亚克,见L. S.卡普兰(L. S. Kaplan)的《通敌者:罗伯特·布拉西亚克的审判和迫害》(*The Collaborator: The Trial and Execution of Robert Brasillach*)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0)第一章“法西斯作家的形成”和第二章“布拉西亚克的战争”。《我无处不在》作为最流行的通敌杂志,见朱莉安·杰克森的《法国:黑暗岁月,1940—1944》第九章“通敌”。“处处和别处”板块,见赫伯特·洛特曼的《左岸》第十八章“协作结构”,和L. S.卡普兰的《协作者》第二章“布拉西亚克的战争”。

让·保尔·萨特的“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不确定”,见J. G.韦特曼(J. G. Weightman)的《关于英国土地的法国文章》(*French Writing on English Soil*) (伦敦:西尔万出版社,1945)附录,“被占的法国”。关于巴黎女孩对德国人的矛盾态度,见朱莉安·杰克森《法国:黑暗岁月,1940—1944》第十四章“重构人类”。关于反抗的结果是迫害,见乌斯贝的《占领:法国的磨难,1940—1944》第五章“活在恐惧中,活在希望中”。“小摇摆迷”开始以着装挑衅,见宝隆的《伪装的道德》第七章“扎祖,扎祖,扎祖之歌”。

阿尔贝·加缪的引述,见《反叛》(伦敦:汉米斯·汉密尔顿出版社,1959)第二部分“反叛”中的“丹迪斯反叛”。从“小摇摆迷”到“超级摇摆迷”的转变见宝隆的《伪装的道德》第七章“扎祖,扎祖,扎祖之歌”。美国参战后对爵士和摇摆的监控,见路易斯第四章,引文“在火山边缘跳舞”见第二章。

扎祖一族和J3的反叛,见伊安·乌斯贝的《占领:法国的磨难,1940—1944》第三章“你遵守秩序吗?”扎祖的行为体现达达主义,同时保留空白的、讽刺的特征见巴特利·宝隆的《伪装的道德》第八章“人民的嘲笑”。引文“献给我们你的20年”见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二章。扎

祖一词的词源,见路易斯第二章和宝隆第八章。

史林·盖拉德和弗莱蒂·泰勒的唱片的详情见查尔斯·德罗尼(Charles Delaunay)非常全面的《新热门唱片》(*New Hot Discography*) (纽约:准则出版社,1982),“1930年后的爵士乐”。扎祖服饰,见宝隆的《伪装的道德》第七章和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四章。引文“油得像色拉”源自后者,“像船一样”源自前者。引文“愚蠢的一代”见奥伊斯(Oiseau)第四章,也是“扎祖总部”的出处。引文“宠坏的卑鄙小孩”见路易斯第七章。

扎祖的惊喜聚会,见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五章;美国的神话,见第六章。引文“态度的问题”出自同一文献。对维希庸俗艺术的欣赏,见第五章,其中包括引文“有对抗精神”。罗伯特·布拉西亚克对扎祖“没有法西斯精神”的批评,见路易斯第八章。关于“爵士的疯狂”的引文,见第六章,“他们不是法国人”的引文,见第八章。

下一处《花环》的引文“这些白痴在玩火”源自同一章。扎祖的服装违反配给原则,见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四章。引文“这些自由法国的年轻公民”见路易斯第八章;观望主义的概念,见巴特利斯·宝隆,第七章和第八章。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引文,见《生命初始》第七章。雅克·多里奥特的引用,法国青年人殴打扎祖,《青年人》标题“打倒扎祖”和扎祖受到常规的警察袭击,见路易斯第九章。

黄星“摇摆”的详情见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十章。1942年摇摆乐变成全国潮流见同章。苦力征召和青年逮捕,扎祖加入逃兵,见路易斯第二章;扎祖忧郁风在第十二章有描述。引文“无处不在的恐惧”见J.G.韦特曼编辑的《关于英国土地的法国文章》后记:让·保尔·萨特的“被占的巴黎”。

注释:让·克洛德·路易斯和巴特利斯·宝隆的法语文本由本文作者翻译。

## 第二十六章 阻特装青年和“胜利女孩”

章前引文出自安娜·W.M.沃夫的《我们的孩子面对战争》前言。1941年12月后战争引起的歇斯底里爆发见理查德·R.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二章“空袭中,走,别跑”。弗洛伊德关于战争释放心理压力的观点,见“关于当下战争和死亡的思考”(1915),收录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学著作全集汇编》(*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伦敦:霍家斯出版社与心理分析学会)第十四卷,273到302页。

更多关于战争歇斯底里的资料,参阅毛里西奥·玛逊(Mauricio Mazon)的《阻特暴动:典型的消灭心理》(*The Zoot Suit Riots: The Psychology of Symbolic Annihilation*) (奥斯丁,坦克萨斯:坦克萨斯大学出版社,2002)第一章“序言”和第六章“暴动的标志、意象和言论”。引自契斯特·赫姆斯的“正是白人脸上的表情”出自《如果他痛喊,放他走吧》(*If He Hollers, Let Him Go*) (纽约:迅雷出版社,1986)第一章。关于日裔美国人的命运,见约翰·莫顿·布卢姆《V代表胜利》第五部分“局外人”的第二章“日本佬就是日本佬”。另两段引文见约翰·冈出的《别,别,孩子》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9)序言。

1942年2月末底特律的骚乱,见布卢姆第六部分“美国黑人正在崛起”第三章“种族暴动”。引文“成百上千的白人”源自阿尔弗雷德·玛克隆·李(Alfred McClung Lee)的《种族暴动》(*Race Riot*)(纽约:德莱顿出版社,1943)第七章“什么是导致底特律骚乱的真正原因”第三部分“过度拥挤的住房、娱乐设施和交通”。

“沉寂环礁湖”的个案详情,见毛里西奥·玛逊的《阻特暴动》第二章“沉寂环礁湖个案”和曼纽尔·P.瑟文编(Manuel P. Servin)的《觉醒的少数群体:墨西哥美国人》(*An Awakened Minority: The Mexican - Americans*)(比佛利山:格伦斯出版社,1974)中帕特西亚·瑞伊·艾德勒(Patricia Rae Adler)写的“1943年阻特暴动:长期冲突中的插曲”。哈瑞·詹姆斯的热门抒情曲,见林格曼《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三章:“变换的景色:战争城镇、战时新娘和华盛顿”。

年轻人在电影院内的狂热和《生活》杂志的引文“突然间国家明白了战争对孩子们做了些什么”,见大卫·M.康斯戴恩的《青少年影院》第八章“穷途末路,1939—1949”,和阿贝尔·格林(Abel Green)和乔·小劳瑞(Joe Laurie Jr.)的《从沃州到广播的闪电战》(*ShowBiz from Vaudeville to Video*)第四十九章“涂猪油的士兵”中有关“阻特装青年”部分。战争早年间美国青年面临的困难见理查德·M.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青少年经历》第五章“紧张和压力”。

引文“受到的战争影响比任何群体都大”源自格路恩伯格编的《战争世界中的家庭》中卡罗琳娜·B.扎迦利的“青少年和他们今日的问题”。年轻人“突然进入”工业领域,见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五章“给我们工具”。受雇佣青年人数的数据,见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青少年经历》第四章“青年雇佣”和詹姆斯·吉尔伯特的《暴行的循环: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青年犯罪的回应》(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第一章“行文问题”。

引文“战争持续期间”源自《二战期间青少年经历》第四章“青年雇佣”,引文“叫嚷着要雇佣出色的男孩女孩”源自同一出处。引文“青少年感觉一夜之间他们整个世界的基础全变了”出自格路恩伯格编《战争世界中的家庭》中卡罗琳娜·B.扎迦利的“青少年和他们今日的问题”。关于爱国电影,见理查德·R.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六章“这些影片有助于赢得战争吗?”

《飞行冒险计划》是战争时期关于“陆军、空军、海军的飞行探测”的典型作品:纽约汉普顿出版公司1943年出版,利奥·麦吉利斯(Leo Margulies)编。

青少年的社会定义再度改变,见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青少年经历》第四章“青年雇佣”。这种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见乌格兰德第八章“总结”。关于宵禁令,见乌格兰德第五章“紧张与压力”。两段引文“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和“我打赌那些委员会成员15岁的时候”来自同章。美国的工业复苏和走出大萧条,见布卢姆的《V代表胜利》第三部分“获得和花费”第一章“繁荣的回归”和第二章“战时消费者”。

引文“疯狂的建设”见理查德·R.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三章:“变换的景色:战

争城镇、战时新娘和华盛顿”。商业需要要求结束社会主义的“无稽之谈”，见斯特兹·特克尔的《有益的战争：二战历史口述》（*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纽约：1984）第三册“大亨：采访托马斯·G.，‘汤米·科克兰’”。关于福特在密歇根的威洛伦经营的导弹实验田和缺乏娱乐设施，同前，见林格曼第三章。

伊利诺斯塞内卡族减少的不利状况见斯特兹·特克尔的《有益的战争》第三册“横财”对艾尔西·罗西奥的采访。结婚率的上升和年轻新娘所面临的困难，见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三章。650万人加入苦力劳动，见布卢姆的《V代表胜利》第三部分“获得和花费”第二章“战时消费者”。

“妇女从模子的束缚中跳了出来”源自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颇具吸引力的新闻集《公共新闻：战时美国的注释》（*Public Journal: Marginal Notes on Wartime America*）（纽约：威金出版社，1945）“新亚马逊”，最初出版于1943年2月2日。新的防御城镇的生活，见格路恩伯格编《战争世界中的家庭》中马克·A. 麦克克洛茨基（Mark A. McCloskey）的“军营和社区中的教育问题”。引自阿格尼斯·梅尔的“社会工作者”源自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三章。印第安纳曼西市电影院的报道出自同章。

年轻的美国兵的塑造可参阅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二章“空袭中，走，别跑”；毛里西奥·玛逊的《阻特暴动》第一章“引言”和第六章“暴动的标志、意象和言论”；以及詹姆士·琼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纽约：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1975）“我没有养育我的孩子……”第30到33页。琼斯在第二章“士兵的发展”里54到55页也描述了美国兵及时行乐的心理，57页描述了钉在墙上的“第一次战争艺术”。

美国兵感觉“能够自由释放他们的能量”，见玛逊的《阻特暴动》第六章“暴动的标志、意象和言论”。不当职的军人，见第四章“军人和阻特青年”。唐纳德·维宁的引文源自《同性恋日记，1939—1946》（*A Gay Diary, 1939—1946*）（纽约：佩皮斯出版社，1979），1942年5月4日，星期一的日记。1943年5月美国国内不满情绪的描述见毛里西奥·玛逊的《阻特暴动》第四章“军人和阻特青年”。6月8日高级巡逻官员的报道，见玛逊附录A。

凯丽·麦克威廉姆斯的引文“行进在洛杉矶市中心的街道上”源自瑟文编《觉醒的少数群体：墨西哥美国人》中帕特西亚·瑞伊·艾德勒的“1943年阻特暴动：长期冲突中的插曲”。这次冲突的背景，见同卷，罗宾·菲茨吉拉德·斯科特的“战时的劳工问题和墨西哥美国人”。引文“一个16岁的男孩已经做好了准备”见玛逊的《阻特暴动》第四章“军人和阻特青年”。

阻特青年“不是跟一种而是跟两种文化”对立，见乔治·J. 桑楚兹（George J. Sanchez）的《成为墨西哥美国人：洛杉矶奇卡诺人的种族、文化和身份，1900—1945》（*Becoming Mexican - American: Ethnic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Chicano Los Angeles, 1900—1945*）（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第三部分“改变家园”第六章“家庭生活和寻求稳定”。关于阻特装成为判断社会地位的标准，也出自该章。马尔科姆·艾克斯第一套阻特装的著名引言源自《马尔科姆·艾克斯自

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 (纽约:巴兰坦图书出版集团,1984)第三章“国内的孩子”。

阻特装的来源,见玛逊的《阻特暴动》第一章“引言”;腓力德·切诺恩(Farid Chenoune)的《时尚史》(*A History of Men's Fashion*) (巴黎:弗拉玛利农出版社,1933)第四部分“流苏和黑色皮草,1940—1990”,第二十章“扎祖和阻特装:虚张声势战争的有趣时尚”;和斯蒂夫·奇布诺尔(Steve Chibnall)的《口哨和阻特:服饰意义的变化》(*Whistle and Zoot: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a Suit of Clothes*) (伦敦:历史工作坊,发行号20,1985年秋)。克莱德·邓肯的详细描述见奇布诺尔的历史工作坊概览论文《风格政策:服饰意义的变化》(*Style Politics: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a Suit of Clothes*) (莱斯特工业大学:未出版)第9页;多亏了作者。

“穿着阻特装周日去见我的女孩”的歌引自奇布诺尔的《风格政策》第3页和理查德·R.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九章“战争神经”。服装配给之后阻特装被禁的介绍,见乔治·J.桑楚兹的《成为墨西哥美国人》第四部分“情感矛盾的美国风”第十二章“第二代的兴起”,和布卢姆的《V代表胜利》第三部分“获得和花费”第一章“繁荣的回归”。高中生涌到哈莱姆买阻特装,见奇布诺尔的《风格政策》第二页。

把阻特装和少年流氓联系起来,以及沉寂的环礁湖案例的冲击,见毛里西奥·玛逊的《阻特暴动》第二章“沉寂环礁湖案例”和瑟文编《觉醒的少数群体:墨西哥美国人》中帕特西亚·瑞伊·艾德勒的“1943年阻特暴动:长期冲突中的插曲”。沉寂的环礁湖案例的详情源自玛逊第二章,同上;桑楚兹第十二章,同上;瑟文编,帕特西亚·瑞伊·艾德勒,同上。最后一个引文“大约600人”的出处。

沉寂环礁湖案例被告的审判,包括“走个过场的私刑”和“冒险计划”,见玛逊的《阻特暴动》第二章,莱尔·艾布纳阻特装的故事,见玛逊第三章“阻特装阴谋”。阻特暴动背后的原因,见玛逊第五章和瑟文编《觉醒的少数群体:墨西哥美国人》中帕特西亚·瑞伊·艾德勒的“1943年阻特暴动:长期冲突中的插曲”。比特里斯·格里菲斯的引文和警察头条,以及引文“大私刑”,见玛逊第五章“阻特暴动”。

新闻中所用的军事术语的讨论见玛逊的《阻特暴动》第六章“暴动的标志、意象和言论”。关于宣布整个洛杉矶市中心失控,见曼纽尔·P.瑟文编《觉醒的少数群体:墨西哥美国人》中帕特西亚·瑞伊·艾德勒的“1943年阻特暴动:长期冲突中的插曲”。对阻特青年“因邪恶目的混在一起的孩子”和“精神不正常”的中伤和4F的等级划分,见斯蒂夫·奇布诺尔的《风格政策》15到16页。少年流氓宣称“我们是美国好公民”见奇布诺尔的《风格政策》16到17页。

底特律种族暴动,见理查德·R.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九章“战争神经”和布卢姆的《V代表胜利》第六部分“美国黑人正在崛起”第三章“种族暴动”。阿尔弗雷德·玛克隆·李的引用源自《种族暴动》第一部分“是什么引起了暴动?”第一章“人民为什么暴动?匆匆一瞥”。底特律的人口数据,见林格曼第九章,种族之间的关系,见布卢姆第六部分第三章。

城市广场上的战斗高潮引自阿尔弗雷德·玛克隆·李的《种族暴动》第二部分“底特律究

竟发生了什么？”第七章“底特律暴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自发烧毁”源自约翰·莫顿·布卢姆的《V代表胜利》第六部分“美国黑人的崛起”第三章“种族暴动”。底特律市长所说的只有“纳粹和日本佬”会受益，见阿尔弗雷德·玛克隆·李第二部分“底特律究竟发生了什么？”第三章“暴动真的是从贝尔岛开始的吗？历史年表”。对副总统的引用源自阿尔弗雷德·玛克隆·李第四章“之后发生了什么？年表总结”。

底特律缺乏青年设施，见阿尔弗雷德·玛克隆·李的《种族暴动》第七章“底特律暴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一章也是引文“孩子们尤其对酒吧和自动唱机感到厌倦”的出处。法西斯团体的行动，见李第四章“之后发生了什么？年表总结”。“19岁流氓”的引文，见李第六章“谁在暴动？谁是受害者？”；年轻白人杀害黑人“不过是为找点乐子”，见李第三章“暴动真的是从贝尔岛开始的吗？历史年表”。

罗斯福总统批评暴动的信详见约翰·莫顿·布卢姆的《V代表胜利》第六部分“美国黑人的崛起”第三章“种族暴动”。1943年8月哈莱姆暴动的来源，见泰德·福克斯(Ted Fox)的《阿波罗的表演时间》(*Show - Time at the Apollo*) (伦敦：括泰德图书，1985)第四章“40年代”；马尔科姆·艾克斯的《马尔科姆·艾克斯自传》第七章“骗子”；刘易斯·A. 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三部分“乱世文化，1942—1954”第七章“摇摆走向战争：格伦·米尔斯和二战期间的流行音乐”。

1943年成为青年犯罪的话题充斥新闻的一年，见迈克尔·巴森和史蒂芬·海勒的《青年的自信》第二章“D意味着犯罪：任性青年的增加”。“战争释放”的引文以及马萨诸塞的男女青年为48美分杀人的事件出自同章。中产阶级的孩子扰乱高中的事件和他们缺乏对他人的尊重，见理查德·M. 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五章“紧张和压力”。

一个13岁的孩子试图炸毁铁路线的事件引自理查德·R. 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三章“变换的景色：战争城镇、战时新娘和华盛顿”。1943年4月哈瑞·詹姆斯表演的描述源自麦克斯·勒纳的《公共新闻：战时美国的注释》第一部分“这块幸运的土地”“狄俄尼索斯和爵士乐迷”，首次出版于1943年4月29日。关于流行摇摆品味回归浪漫风，见刘易斯·A. 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七章“摇摆走向战争”；引自哈瑞·詹姆斯的“明天他就要回去执勤”出自同章。

更多战时美国的宣传，见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六章“这些影片有助于赢得战争吗？”关于女性青少年“性犯罪”的引述，见詹姆斯·吉尔伯特的《暴行的循环》第二章“犯罪浪潮的演练”。“无法回避，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的引文见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五章“紧张和压力”。穿卡其布的怪女孩，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五章“安迪·哈迪走向战争：士兵、防御工人、‘胜利女孩’和阻特青年”。

对胜利女孩的描述源自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五章“紧张和压力”。理查德·林格曼对胜利女孩的描述源自《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三章“变换的景色：战争城镇、战时

新娘和华盛顿”。胜利女孩挑拣军人作为娱乐,见乌格兰德第五章;未满足征兵年龄的女性生活变得艰难,和“十六七岁”的引文见乌格兰德第二章“适应战争”。

女孩们“似乎一夜间成熟了”的引文见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五章,“性犯罪”的数据出自同章。她们缺乏纯真,见斯特兹·特克尔的《有益的战争》第二册“处处长大”,采访了让·巴特利特。短语“成熟的假象”源自乌格兰德第五章。约瑟芬·滕克扎的个案描述见麦克斯·勒纳的《公共新闻》第一部分“这块幸运的土地”,“17岁”,文章初次刊登于1943年4月9号。

《画报》杂志和约瑟芬·坦克泽的故事,以及引文“反叛者的平均年龄”和“我们最为复杂和糟糕的社会问题之一”,见巴森和海勒的《青年的自信》第二章“D意味着犯罪”。好莱坞电影如《年轻人变得狂野》和《这些是我们的父母吗?》中的探索,《你们的孩子呢?》的海报见同章36—37页。成年人的指责引自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五章“紧张和压力”;引自J.埃德加·胡佛的话见巴森和海勒的《青年的自信》第二章“D意味着犯罪”。

对青年媒体批评,以及引文“摇摆乐风格”源自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五章。青年犯罪数据的增长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见吉尔伯特的《暴行的循环》第二章“犯罪浪潮的演练”。儿童局引文“我们不能说”和评论委员会讨论会的详情出自同章。引文“轰动性报道渲染并且鼓励了,而不是阻止了青年犯罪”同前见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五章。

“精神病患者”一词,见罗伯特·M.林德纳的《无故的叛逆:一个精神病罪犯的精神分析》(*Rebel Without a Cause: The Hypno-analysis of A Criminal Psychopath*)(纽约:格伦和斯特拉顿出版社,1944),引言。林德纳的方法论,见《无故的叛逆》,“方法:精神分析”。《无故的叛逆》1944年当时的冲击力详见詹姆斯·吉尔伯特的《暴行的循环》第二章“犯罪浪潮的演练”。

林德纳对精神病患者的所有定义均可见《无故的叛逆》:“问题:精神病罪犯,第一部分:心理方面;第二部分:身体方面;第三部分:社会方面;第四部分:政治方面。”哈罗德的证言,关于枪的主题,见“第22小时”;引文“可能那就是我犯下所有这些罪的原因”见“第25小时”。“萌芽的纳粹党员”见“问题:精神病罪犯”的第四部分:政治方面。

## 第二十七章 和平入侵者

章前引文出自“一个焊接工14岁的儿子”的话出自安格斯·考尔德的《人民的战争:英国1939—1945》第六章“印度橡胶岛:英国1943—1944,扩张”。

“大众观察”对末路青年协会的报道可见大众观察资料馆,FR1353,青年服务,1942年7月,22到24页。引文“理想学校”和“那儿的社会活动能把不同兴趣爱好的人联系起来”源自同一出处,第一页照片。“应该得到特别的调查、关心和照顾”出自同一资料,24页。引文“合作生存”、“永久的安宁感”和“片刻的欢愉”见A.P.杰夫科特的《成长中的女孩》第八章“女孩、男孩和俱乐部”。

“英国青年很有自决意识”一段,见“回应来了”,出自大众观察资料馆,FR1353,青年服务,“青年”,1942年7月,125页。1943年1月,青少年变得“忙碌多了”,见大众观察资料馆,FR1780,“青年”,1943年1月,第1页。14到16岁女孩的态度报道见大众观察资料馆,FR1567,关于学龄和征兵年龄之间的女孩的报道,1943年1月,第1页。

英国青少年是怎样花钱的详情见大众观察资料馆,FR1780,“青年”1943年1月。每周电影院有3千万上座率的数据,见约翰·卡斯特罗的《爱情、性欲与战争》第九章“心灵的弹药”。珀尔·杰夫卡特遇到一个卡门·米兰达迷的描述见《成长中的女孩》第五章“业余时间(2):跳舞和绘画”。接下来几段有关电影的引述出自同章,包括“苏联政府对电影放映的规范很值得一提”。

乔治·奥威尔对美国佬杂志的观点,见《乔治·奥威尔论文、新闻和信件集,第一卷:像这样的时代,1920—1940》,163条,“男孩周刊”,和弗兰克·理查德的回应;原文刊登在《地平线》杂志,1940年3月。杰夫科特对《布兰迪斯小姐的兰花》的评论见《成长中的女孩》第五章“业余时间(1):阅读”。同书中奥威尔的论文见《英国谋杀事件的减少和其他类论文》(伦敦:企鹅出版社,1970),“来复枪和布兰迪斯小姐”。

奥威尔对美国的评价,包括引文“直到大约1930年”、“更年轻的知识分子”和“英国工人阶层”源自《乔治·奥威尔论文、新闻和信件集,第二卷:我的国家向左还是向右,1940—1943》,29条,“关于党派检讨的伦敦来信”,原文刊登于1942年3—4月。他的引文“有相当一部分英国人被美国化了”源自《英国谋杀事件的减少和其他类论文》,“来福枪和布兰迪斯小姐”。

“美国人被看作是爱炫耀”的引文出自“关于党派检讨的伦敦来信”,同上。爱德华·莫罗认为英国“只是欧洲海岸上不甚重要的一个小岛”的观点出自朱丽叶·加迪纳(Juliet Gardiner)的《在这里:战时美国的美国兵》(*Over Here: The G. I. s in Wartime Britain*)(伦敦:柯林斯和布朗出版社,1992)第三章“该死的美国佬军队来了”。大众观察和英国对美国的态度的,见大众观察资料馆FR1501,“英国人怎么看美国人”,1943年1月,第1页。

“和平侵略”见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美国的美国兵》第一章“远在前线的战争”。美国军队为最后宣判口做出的殖民化和调动,见加迪纳第二章“该死的美国佬军队来了”和安格斯·考尔德的《人民的战争》第六章“印度橡胶岛:英国1943—1944,扩张”。《1942年驻英美国军人指导手册》由博得莱安图书馆(牛津大学,1994)重印。引文“一开始你可能不理解”出自13页。

英国记者的“当美国士兵在大不列颠登陆”引自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美国的美国兵》第三章“该死的美国佬军队来了”。主人在公共场合遇到这些侵略者,见加迪纳第五章“了解侵略者”。《驻英美国军人指导》第2页中反对吹嘘和炫耀的警告以及对交换口香糖等的描述见加迪纳第12章“漂亮女孩和她们的弟弟”和安格斯·考尔德的《人民的战争》第六章“印度橡胶岛”。

“英格兰的生活如此乏味守旧”引自朱丽叶·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美国的美国兵》第十

章“小伙子,我们要不要来点娱乐!”关于“有色人种”摇摆风格的《画报》文章源自21卷,12号,1943年12月18日,莱思莉·布兰奇写的“摇摆舞的精彩之处”。吉特巴舞对阵聚会舞蹈和狐步舞,见大众观察资料馆,“音乐舞蹈和爵士”,舞厅中的观察,四篇边框文章中第一篇,“战争会改变英国的风格吗?”1940年3月,和1/8/D,舞蹈音乐问卷调查,8/D,1940年9月。

“一旦你学会了跳吉特巴舞”的引文见彼得·刘易斯的《人民的战争》第八章“战争之外的时间”。皇家空军军人对一场在飞机仓库举行的音乐会的回忆源自卡斯特罗的《爱情、性欲和战争》第五章“多愁善感的子弹”。一个12岁女孩混进去看格伦·米尔斯的故事,见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英国的美国兵》第十章“小伙子,我们要不要来点娱乐!”。有关格伦·米尔斯在彩虹角,见加迪纳第五章“了解侵略者”。

“乘特别列车到伦敦休假”引自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英国的美国兵》第八章“休假和批准”。彩虹角的详情见加迪纳第九章“小美国的群岛”。“时间过得很慢”引自加迪纳第七章“温啤酒和孢子甘蓝”。17岁的伦敦女孩回忆“这些迷人的男人走进来”,见刘易斯的《人民的战争》第九章“漫长艰难的行进”。

奥杰塔·乐思的回忆“有一个我一无所知的广阔世界”出自乔纳·麦克和斯蒂夫·亨弗里斯(Joanna Mack and Steve Humphries)的《伦敦开战了:塑造现代的伦敦,1939—1945》(*London at War: The Making of Modern London 1939—1945*)(伦敦:西季维克和杰克逊,1985)。美国兵“觉得英国女孩都没有什么不同”见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英国的美国兵》第十章“小伙子,我们要不要来点娱乐!”。这一章也是引文“带来了色彩”和英国军人印象中美国人“比他们更加高大、健壮和帅气”的出处。

19到23岁的女孩受到怀孕的沉重打击,见约翰·卡斯特罗第15章“纵欲,代价,都在这里”。怀孕详情,见卡斯特罗第十三章“被他们抛在身后的女孩们”。市场经理的引述“我一个月靠啤酒可以赚4万美元”出自斯特兹·特克尔的《有益的战争》第三册“横财”,采访了雷·威克斯。

犯罪率的上升在大卫·休斯有趣的文章“游手好闲的人”中有涉及,本篇收录于《简朴时代,1941—1945》(*Age of Austerity, 1941—1945*),迈克尔·西森斯和菲利普·弗兰奇(Michael Sissons and Philip French)编(伦敦:企鹅出版社,1964)。约翰·韦恩的“所有人抓住时机”引自《打死父亲》(*Strike the Father Dead*)(纽约:圣马丁,1962)第三部分“杰里米”,第129页。引文“临时单向流动人口”出自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第四部分“杰里米”,203页。

做联络人的“混混”,“很容易辨别的类型”,见罗伯特·墨菲(Robert Murphy)的《破坏和抢劫:伦敦下流社会的流氓团伙1920—1960》(*Smash and Grab: Gangsters in the London Underworld 1920—1960*)第七章“战时的下流社会”。“混混”的详情,见墨菲第七章,同上,斯蒂夫·奇布诺尔的《口哨和阻特:服饰意义的变化》和《风格政策:服饰意义的变化》。“猛然弹出的大舌头”引自大卫·休斯。

《阿报》关于“黑人军队”的描述见17卷,1942年10月第5期。在英国国内的持续隔离,见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英国的美国兵》第十四章“双线作战”。这章也是曼彻斯特骚动和纽伯里枪战详情的资料来源。英国女性发现“和有色男人交往特别迷人”见卡斯特罗的《爱情、性欲和战争》第十五章“纵欲、代价,都在这里”。

马尔博罗公爵对黑人军队的评价引自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英国的美国兵》第十四章。1943年大众观察民意调查揭示英国“极度反对种族歧视”引自安格斯·考尔德的《人民的战争:英国1939—1945》第六章“印度橡胶岛:英国1943—1944,扩张”。原出处是大众观察资料馆,FR2021,1944年2月11到12页。布里斯托女孩和黑人美国兵在她父亲酒吧的故事见加迪纳第14章,同上。

1944年《教育法案》,见彼得·刘易斯的《人民的战争》第十章“向左看,道路一片光明”。

舞蹈音乐对英国青年的重要性,见加迪纳的《在这里:战时英国的美国兵》第十章“小伙子,我们要不要来点娱乐!”和杰夫科特的《成长中的女孩》第五章“业余时间(2):舞蹈和绘画”。关于彩虹角的文章,见艾尔肯·阿兰(Elkan Allan)的“深入彩虹角”,《阿报》,26卷,第4期,1945年1月27日,22到25页。“我常以美国口音自言自语”,见安格斯·考尔德的《人民的战争:英国1939—1945》第六章“印度橡胶岛:英国1943—1944,扩张”。

## 第二十八章 赫尔姆斯·休博内、白玫瑰组织和安妮·弗兰克

章前引言出自英格·绍尔(Inge Scholl)的《白玫瑰:慕尼黑1942—1943》(*The White Rose: Munich 1942—1943*)(新罕布什尔: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83)第二部分“白玫瑰的传单”中的“最后的传单”。吕西安·勒巴黎的书发行详情见朱莉安·杰克森的《法国:黑暗岁月,1940—1944》第九章“通敌”中的“憎恨和友爱的协作:我无处不在”。“憎恨到死”和“很高兴在德国看到第一批戴黄星标记的犹太人”出自让·克洛德·路易斯的《扎祖一族》第八章。

安妮·弗兰克日记中的“很多犹太朋友”见奥图·H.弗兰克和莫珍·普莱斯勒(Otto H. Frank and Mirjam Pressler)编的《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伦敦:企鹅出版社,1997),1942年10月9日星期五的日记。1942年的夏天标志着第三帝国达到顶峰,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九章“精英”和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十章“总结”。同时可参阅罗纳德·弗斯特(Ronald Forster)的《战争中的世界》(*The World at War*)第六章“沙漠中的战争”和第八章“在苏联的胜利”。

德国城市受到更为频繁、更大力度的炸弹袭击,见迈克尔·H.卡特的《不同的鼓手》第三章“爵士走向战争:军事的需要”。1942年1月万湖大会,消灭所有犹太人的斗争见卡罗尔·安·李的《白中玫瑰:安妮·弗兰克传》(伦敦:企鹅出版社,2000)第二部分“当我们犹太人的苦难真正开始”,第四章。

杰克·曼德尔伯姆引用的“我们没有权利”出自安德莉亚·沃伦的《劫后余生:纳粹集中营

里的男孩》第五章“死亡的权利”。发放带号码的条纹制服,去人性化,见安德莉亚·沃伦第五章,同上;“他们想控制我们”见沃伦第四章“绝望”。更多详情见沃伦第六章“学习规则”和第七章“游戏”。

1942年10月强制青年劳动义务,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的《深入纳粹德国》第八章“年轻人:调动和拒绝”,注释16,268页。新的党卫军管辖的训练营,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七章“竞争者、拳击手和战斗者”。科隆地区受训者的引言“这三个星期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像地狱一样,”见雷姆珀第七章,同前。其他更积极的受训者的证言也来自同一资源,“死亡的艺术”亦出于此。

赫尔姆斯·休博内被行刑的详情见布莱尔·R.霍尔姆斯和阿尔·F.基尔编撰的《当真相是背叛:德国青年对阵希特勒:赫尔姆斯·休博内团伙的故事》(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95),62号文件,人民法庭首席检察官处提供,柏林,1942年10月27日和60号文件。赫尔姆斯·休博内生前最后的信展示于61号文件。

在第三帝国内部公然对抗的主要信息,包括80万德国人因抵抗入狱的数据,参见《当真相是背叛》中克劳斯·J.汉森写的“引言:历史和回忆”,和布莱尔·R.霍尔姆斯和阿尔·F.基尔的序。

第一段引用卡尔·亨兹·史尼布的“我再也不喜欢它了”和“与宗教系统竞争”出自《当真相是背叛》第一章“斯沃思提克阴影下的童年”。下面八段集团活动的描述源自第二章“从大屠杀到战争,从广播到抵抗”。1941年到1942年间赫尔姆斯·休博内的所有传单都收在28到46号文件中。

引文“你愿意忍受生活中的乐趣被夺走吗”出自传单“良知的声音”。希特勒青年团“是命令第一的义务组织,为的是征收纳粹奴役的国民,”见38号文件,“希特勒青年团”。休博内的集团被捕入狱的详情见《当真相是背叛》第三章“盖世太保的客人”。

休博内被捕的详情见6号文件,“盖世太保关于逮捕赫尔姆斯·休博内的报告”;40号文件包括最后一份传单的全文,名叫“谁在煽动谁?”引文“绝对是预先决定好的罪行”和“他们一会也不让我们安静”源自《当真相是背叛》第三章,同上。引文“这些日子说真话是致命的奢侈”引自第二章“从大屠杀到战争,从广播到抵抗”。

休博内集团审判的描述源于《当真相是背叛》第四章“判决与消灭”。这一章也是休博内最后两个月生活的资料来源。他最后的信在65号文件中——奥图·博尔迪特对赫尔姆斯·休博内的回忆。他母亲和祖父母死于汉堡爆炸袭击的消息源于74号文件——汉斯·库克尔对赫尔姆斯·休博内的回忆。

“白玫瑰”的主要信息,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十章“憎恨”。引文“你和你的孩子也想遭受和犹太人同样的命运吗?”源自1943年1月白玫瑰传单“呼唤所有德国人”,这部分内容被收录在英格·绍尔的《白玫瑰》第二部分“白玫瑰的传单”“反抗传单”中。白玫瑰的背景

和成立在英格·绍尔的《白玫瑰》第一部分“白玫瑰”中有详细描述。

汉斯·绍尔父亲的话“哈姆林的空头支票”见英格·绍尔的《白玫瑰》第一部分“白玫瑰”，第6页；威利·格拉夫属于一个幸存下来的天主教青年组织，见第一部分13到15页。引文“今天还怀疑现状、还对魔鬼统治抱有幻想的任何人”见《白玫瑰》第二部分“白玫瑰的传单”，第四份传单。引文“归属感”源于《白玫瑰》第一部分6—7页，引文“我们的祖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源自第11页，引文“撕碎了我们的心”源自第16页。

汉斯·绍尔父亲认为政权已经“对人已经没有一丝尊重”源自《白玫瑰》第一部分12页；组织各成员的背景在20—22页有详述。明斯特主教的传单，见17到19页，引文“我仍然能看到汉斯站在那的样子”，见强尼斯·斯坦霍夫、彼得·佩舍尔和丹尼斯·肖特的《第三帝国的声音》第三部分“溃败与犯罪”第二章“抵抗”中对英格·艾舍·绍尔的采访。

引文“现在这个时刻”出自英格·绍尔的《白玫瑰》第一部分，“白玫瑰”，31页。传单的影响力见31页；引文“予以消极抵抗”源自第二部分，第一份传单。白玫瑰是根据一部西班牙小说命名的事实见1号文件，“控告汉斯和索菲·绍尔，克里斯托弗·普罗普斯特”，第三部分。引文“我们必须抗争”源自英格·绍尔《白玫瑰》，一号文件，36页。

汉斯·绍尔到达柏林并计划“在每一所大学建立学生组织”的详情见《第三帝国的声音》第三部分“溃败和犯罪”，第二章“抵抗”，如前，对英格·艾舍·绍尔的采访。索菲·绍尔的故事在《白玫瑰》第一部分。有关慕尼黑学生羞辱当地纳粹长官，见H. W. 科齐第十章“憎恨”。

白玫瑰的标语“打倒希特勒”和“自由”见英格·绍尔的《白玫瑰》第一部分“白玫瑰”48—50页；“抵抗中的战斗伙伴”传单的详细内容，见第二部分“最后的传单”。2月18日他们的最后行动和被捕的详情见51—53页。索菲·绍尔关于埃尔斯·格贝尔狱中生活状况的来信收录于4号文件。

下三段叙述来自《白玫瑰》第一部分“白玫瑰”。包括引文“似乎把未来的岁月都浓缩在这几天里”；索菲最后的梦和他们最后的宣言的详细介绍——索菲大呼“自由”，汉斯在监狱的墙上引用歌德写下的话。第二股逮捕狂潮见第一部分。

引文“当所有的人”和“给德国青年丢脸”出自英格的《白玫瑰》3号文件，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施摩莱、库特·胡伯、威尔海姆·格兰夫和其他与白玫瑰抵抗运动有关的人的语录，1943年4月。纽约召开的人大会详情见10号文件，摘自1969年库特·R. 格罗斯曼给英格·绍尔的一封信。白玫瑰对纳粹青年政策的批评表现在他们的传单“呼唤所有德国人”中，收录于第二部分，“抵抗传单”。

白玫瑰被评判为“典型的局外人”，见《白玫瑰》5号文件，1943年2月22日《慕尼黑最近新闻》（*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的一篇文章。1942年2月“工厂计划”的详情见盖德·贝克（Gad Beck）的《地下生活：纳粹柏林一个犹太人的记忆》（*An Underground Life: Memoirs of a Gay Jew in Nazi Berlin*）（威斯康辛：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99）第四章。安妮·弗兰克关于主

教的信的日记,见《一个年轻女孩的日记》,1943年2月27日,周六的日记(下面所提到的所有日记均出自同一版本)。

弗兰克家庭转为秘密生活,见卡罗尔·安·李的《土中玫瑰》第二部分“当我们犹太人的苦难真正开始”第四章。“让我出去,去有新鲜空气和欢歌笑语的地方!”出自1943年10月29日,星期五日记。安妮自称为家庭的“惹事精”出自1942年11月7日,周六日记。引述伊娃·施罗斯的话,见卡罗尔·安·李的《土中玫瑰》第三部分“到处一片死寂,1942—1944”,第五章。

安妮·弗兰克的“我以前从来没想到过这个”源于1942年11月20日,星期五日记。安妮把日记叫做凯蒂,见1942年6月20日,周六日记。凯蒂名字的来源,见卡罗尔·安·李的《土中玫瑰》第三部分第五章。安妮想“和现在的自己变得不一样”,见1942年11月28日,周六日记。她“在巴黎和伦敦待上一年”的抱负,见1944年5月8日,星期一日记。

她是狄安娜·德宾迷,见卡罗尔·安·李的《土中玫瑰》第二部分第三章;她对去瑞士购物的向往,见1942年10月7日,星期三日记。下一段中她对父母的批评,见1944年3月16日,星期四和17日,星期五的日记。引文“认识自己”和“我像陌生人一样观察我自己”出自1944年7月15日,星期六日记。

安妮关键的一篇日记,回顾她“过去不真实的生活”和她在安妮克斯的生活,写于1944年3月7日,星期二。她对于自己青春期的概念,“像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很没有安全感”,是从1944年1月6日,星期四开始的。她迷恋彼得·范·派尔斯,见1944年3月7日,星期二日记。她对自己阴道的探索,见1944年3月24日,星期五日记;她和彼得·范·派尔斯互相搂着脖子引发的家庭危机见1944年5月5日,星期五,6日,星期六和7日,星期天的日记。

她对“人心中毁灭性的欲望”的指责见1944年5月3日,星期三的日记。她说的“我知道我擅长写作”源自1944年4月5日,星期三日记;引文“只要想象一下多么有趣”出自1944年3月29日,星期三日记;她15岁生日的详情,见6月13日,星期三日记,她对《你怎么看当今的年轻女孩》一书的评价,见1944年7月15日,星期六日记。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疯狂屠杀”和“焚尸间的炉子”,见卡罗尔·安·李的《土中玫瑰》第四部分“是谁把这个强加于我们?”第七章。引文“囚犯死于疾病”,见安德莉亚·沃伦的《劫后余生》第十章“莫尼埃克”。将1943年指定为“德国青年的战争服务年”,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1926年和1927年出生的孩子被送入武装党卫队,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八章“开给精英的空头支票”。

“白玫瑰”的预言“最终所有人都会下地牢”,引自英格·绍尔的《白玫瑰》第一部分“白玫瑰”第2页。德国城市每况愈下的情况和当局系统地撤离了50万青少年。详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征兵训练营1943年以后成为纳粹青年组织的主要机构,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七章“竞争者、拳击手和参战者”。

1944年被命名为“战争志愿者年”见H. W. 科齐,第二章“战争”。动员未滿军龄的青少年

加入党卫队,见雷姆珀第八章“开给精英的空头支票”。美国记者观察到的“很多13或15岁的男孩女孩都在军工企业工作,”见珍妮弗·基莉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八章“战时的希特勒青年团”。原文最早刊登于1944年4月《国家》杂志。

接下来几段党卫军第十二“希特勒青年”装甲师和他们在决战日登陆的行动出自H. W. 科齐第二章“战争”。引自梅丽塔·玛舒曼的“他们不遗余力”源自《清单》第十三章;这也是“没有试图保护”,以及梅丽塔·玛舒曼下一段引文的出处。

德国宵禁城市1943到1944年间青年犯罪率的上升,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十章“憎恨”。“火绒草海盗”和“这些12到17岁间的年轻人”,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的《深入纳粹德国》第八章“年轻人:调动和拒绝”,“火绒草海盗”。“这些地痞流氓”和标语“打倒希特勒”出自同章。

纳粹1943年青年犯罪法详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四章,“青年警察、保密者、反叛者”。出自此章的还有1944年4月希姆莱命令所有青少年监管营的少年由犯罪生物学研究所进行分类、引文“持续增长的小团伙数量”和三种基本违抗者的定义。

第四次“白玫瑰”审判的详情,见英格·绍尔的《白玫瑰》第一部分“白玫瑰”70—72页。白玫瑰跟汉堡摇摆青年联系起来以及引文“所有起于艾灵顿的事情最后都会发展成试图暗杀元首”,见迈克尔·H. 卡特的《不同的鼓手》第四章“几近溃败:爵士乐走向‘最终的胜利’,1942年9月到1945年”中的“爵士乐受害者”。

1944年10月希姆莱最后的青年指令,科隆市中心吊死13名火绒草海盗,见德特勒福·珀凯尔特的《深入纳粹德国》第八章“年轻人:调动和拒绝,火绒草海盗”。更多纳瓦霍人和巴特尔·辛克的资料,见维基百科(wikipedia)“火绒草海盗”词条。

## 第二十九章 青少年时代的到来

维加关于1944年哥伦布纪念日弗兰克·辛纳屈在派拉蒙剧院开场时情景的描述,见《赤裸城市》(*Naked City*) (纽约:精品图书,1945),“弗兰克”。更多详情可参阅凯蒂·凯莉(Kitty Kelly)的《他的道路:弗兰克辛纳屈非官方传记》(*His Way: The Unauthorised Biography of Frank Sinatra*) (伦敦:班塔姆,1987)第八章和阿诺德·肖(Arnold Shaw)的《辛纳屈:职业歌手》(*Sinatra: The Entertainer*)第一章“我是唱歌的:一个歌手”,“派拉蒙剧院惊慌,1943—1944”,21到22页。

女孩们占领了时代广场,见凯蒂·凯莉的《他的道路》第八章和阿诺德·肖的《辛纳屈:职业歌手》“派拉蒙惊慌”,同上。布鲁斯·布利文的引文,见“声音与孩子”,《新共和国》,1944年11月6日,部分引于汗尼夫·库雷什(Hanif Kureishi)和约翰·沙维奇(Jon Savage)编的《流行宝典》(*The Faber Book of Pop*) (伦敦:韦伯-韦伯出版社,1995)。辛纳屈1942年12月的突破,见凯莉第六章;关于辛纳屈“5千个孩子”的引言,见J. 兰道尔·塔拉博雷利(J. Randall Taraborrel-

li)的《辛纳屈：神话背后的男人》(伦敦：主流出版社，1997)第六章。

尼克·斯瓦诺回忆辛纳屈1943年再次回到帕拉蒙时，“这一次，他们扔的不仅仅是玫瑰”，引自凯蒂·凯莉的《他的道路》第六章。辛纳屈的新闻发言人“雇佣女孩子们来尖叫”见阿诺德·肖的《辛纳屈：职业歌手》第21页。辛纳屈名声大噪，以及电影《高些，再高些》，见凯莉第七章和阿诺德·肖第二部分“这只是个纸月亮：演员”，30页。

辛纳屈从人群中挑选人的习惯，见兰道尔·塔拉博雷利的《辛纳屈：神话背后的男人》第六章。辛纳屈那个时期的唱片，见《声音，1943—1952》(索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86：黑胶唱片)和弗兰克·辛纳屈的《哥伦比亚的最好年华1943—1952》(索尼哥伦比亚代理商，4片组光盘，1995)。更多辛纳屈对听众的影响，见凯蒂·凯莉的《他的道路》第七、第八章。布鲁斯·布利文“当他忧伤的歌唱”来自“声音和孩子”。

凯蒂·凯莉的《他的道路》第一、第二章对辛纳屈的背景有很详细的介绍。战争期间他的地位和象征意义，包括他作为彼得·潘一样的人物的地位，见理查德·R.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八章“娱乐，消遣，潮流和愚蠢行为”和刘易斯·A.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三部分“黑色文化，1942—1945”第七章“摇摆走向战争：格伦·米尔斯和二战期间的流行音乐”。

“这是战争年代”，见塔拉博雷利的《辛纳屈：神话背后的男人》第六章。关于布鲁斯·布利文担心短袜少女“在他身上找到了父亲的影子，虽然他很年轻”，见凯蒂的《他的道路》第七章；本章也是“他赚一百万”的出处。对辛纳屈的敌视反应，包括“艺术表现”和“控制他们的情绪”，以及他4F的等级地位，见凯莉第七章；扔鸡蛋和番茄的年轻人，见第八章。

美国兵憎恶任何不穿军装的人的事实，见李·肯尼特的《美国兵》第四章“兵营视角”。引文“皮草商”出自同章。1944年9月辛纳屈见罗斯福总统，见凯蒂·凯莉的《他的道路》第八章。

二战期间年轻女性的地位相对凸显，可参阅理查德·M.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八章“总结”。关于青年就业，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二部分“短袜少女”第五章“安迪·哈迪走向战争：士兵、防御工人、‘胜利女孩’和阻特青年”。1944年14到17岁青年有300万参加工作的数据，见理查德·R.林格曼的《你不知道在打仗吗？》第五章“给我们工具”。

这个年龄段的青年成为美国历史上同龄青年中最富有的，见理查德·M.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四章“青年就业”。1943年导致很多父母害怕孩子的事件，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二部分第六章“你知道你的孩子在哪吗？青少年犯罪、青少年俱乐部和民主解决方法。”

1944年的电影《青年变得狂野》引自迈克尔·巴森和史蒂芬·海勒的《青年的自信》第二章“D意味着犯罪”“任性青年的增加”和大卫·M.康斯戴恩的《青少年影院》第四部分“青少年犯罪”第八章“穷途末路，1939—1949”；引文“我们想要工作”出自同章。全国青年机构停止运作，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五章。1944年5月《展望》杂志关于莫琳、伊利诺斯青年活动中心的特别报道，见巴森和海勒第二章“D意味着犯罪”。

马克·麦克克洛茨基的“这个世界一直试图……”，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六章。麦克克洛茨基征求美国青年的意见，见理查德·M. 乌格兰德的《二战时期的青少年经历》第六章“计划业余时间”。麦克克洛茨基关于哈瑞·詹姆斯的引言出自帕拉迪诺第六章，同上。他引用的“男童子军、女童子军”和“20 出头的一群人”均出自乌格兰德第六章。

青少年餐厅的详情，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六章和理查德·M. 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六章。乌格兰德也是“健康完备的娱乐设施”的引文出处，帕拉迪诺是“底特律双种族青年委员会”的出处。引文“外出娱乐”和“青少年运动”均出自乌格兰德，第六章，同上。

《17 岁》杂志的发行可参阅迈克尔·巴森和史蒂芬·海勒的《青年的自信》第一章“科林青年不会早逝：青年文化的黎明”；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六章；理查德·M. 乌格兰德的《二战时期的青少年经历》第七章“青少年的出现”。乌格兰德也是估计的青少年 7.5 亿美元消费能力的资料来源。

引文“青年的时尚和美丽”见《17 岁》1944 年 9 月第一期封面标语。下面三段的信息，见《17 岁》第一期；引文“你将主宰这个世界”“《17 岁》是你们的杂志”和“给我们写任何话”，见海伦·瓦伦天奴“17 岁在问好”，33 页。“长大自己赚钱”，见艾丽丝·比顿“致高中生”60—61 页。文章“你为战争做了什么？”出自《17 岁》第一期，54—56 页；要完成中学教育的建议来自文章“为什么要完成高中学习？”76 页。

第一期中的广告，“崭新青年时代”，见第 21 页；百隆商店“青少年餐厅”，见第 22 页，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见第 1 页。《17 岁》读者群的兴起，见理查德·M. 乌格兰德的《二战时期的青少年经历》第七章“青少年的出现”；引文“我们为《17 岁》骄傲”，见《17 岁》第 6 期，1945 年 2 月，来信，147 页。引文“我必须用妈妈的信笺和信封”见“感谢你的来信”，《17 岁》第 6 期，第 4 页。

有关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的青年杂志，包括《召唤所有女孩》，出自迈克尔·巴森和史蒂芬·海勒的《青年的自信》第一章“科林青年不会早逝：青年文化的黎明”和理查德·M. 乌格兰德的《二战时期的青少年经历》第七章。关于《好管家》和“我们时代的青少年”专栏，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二部分第四章“短袜少女登上历史舞台”。

报纸刊登“社交界新人和绅士”专栏，两篇关于社交界新人和一篇关于高中时尚的《生活》杂志文章，见理查德·M. 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七章“青少年的出现”。引文“你买平跟软鞋”见《17 岁》第 4 期，1944 年 12 月，22 页。《父母》杂志的“青年策略”专栏，见乌格兰德第七章；这也是青年时代公司和“原创策略”的资料来源。

引文“转移公众关注”源自理查德·M. 乌格兰德的《二战时期的青少年经历》第七章；海伦·瓦伦天奴委托本森 & 本森进行了人口统计调查，《女青年生活》的详情，见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三部分第七章“广告时代：17 岁，尤金·吉尔伯特，青少年市场的兴起”。引用

的广告全出自《17岁》，第9期，1945年5月。“丑小鸭”的特别报道，见《17岁》第10期，1945年6月，20和22页。引文“我愿意停留在17岁”，见《17岁》第5期，1945年1月。

塔尔科特·帕森斯的文章，和下面三段的引文，见“美国社会结构年龄和性别”。这篇文章初次刊登在《美国社会概览》上，1942年10月，604—616页，重新刊登在洛根·威尔森(Logan Wilson)和威廉姆·L.库博(William L. Kolb)的《社会分析：入门和个案》(*Sociological Analysis: An Introductory Text and Case Book*) (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1949)第五部分“社区和国家组织关系结构”，第十七章“家庭组织”。

1944年“teenage”和“teenager”的造词，见理查德·M.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少年经历》第七章“青少年的出现”。这一词条的词源这一章也有谈及，349—351页。其他数据可参阅汤姆·丹泽尔(Tom Dalzell)的《美国青年俚语》(*Flappers 2 Rappers: American Youth Slang*) (马萨诸塞斯普林菲尔德：梅里安姆·韦伯斯特公司)第四章“20世纪40年代：摇摆舞一代”，和露西·罗琳的《20世纪每十年间的青少年文化：参考指南》第四章“20世纪40年代”。

“teens”(青少年)一词早期的使用是用引号的，见斯坦利·霍尔的《青春期》第十二章，“青少年对自然的感觉”第二卷，149页。这一词条的使用可以从卡尔·艾德的卡通《少年哈罗德》(*Harold Teen*) (1919)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更广泛的使用，诸如《美国言论》(*American Speech*)杂志和“家庭学会”的指南《青少年礼仪》(*Etiquette for the Teens*) (1937)。20世纪40年代早期它在媒体上的使用率上升，例如，见《纽约时代报》1942年12月的大标题：“22,453名青少年加入征兵。”博士论文可以就这一题目探讨。

### 第三十章 元年

章前引语出自《局外人》(*The Man Outside*) (纽约：新方向出版社，1971)中的“论迁移：没有别离的一代”。艾略特·E.科恩的“青少年权利法案”初次刊登于《纽约时代杂志》1945年1月7日，16—17页。下面三段引文来自同一出处。青年权利法案其他相关内容，见露西·罗琳的《20世纪每十年间的青少年文化：参考指南》第四章“20世纪40年代”“国内的青年”。

芭芭拉·盖尔的文章，见“你想要什么样的世界？”《17岁》第六期1945年2月，138页。《我住的房子》中的弗拉克·辛纳屈以及他阅读岗纳·缪达尔《美国的两难》，见凯蒂·凯莉的《他的道路》第九章和刘易斯·A.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三部分第七章“格伦·米尔斯和二战期间的流行音乐”。岗纳·缪达尔的《美国的两难：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由纽约哈珀兄弟1944年出版。

辛纳屈的“我无法忘怀对我是多大的伤害”源于J.兰道尔·塔拉博雷利的《辛纳屈：神话背后的男人》第八章。《这发生在斯普林菲尔德》详情见《17岁》第10期，1945年6月，28页，后转167页。安妮·克拉克的“世界结束的方式”出自《17岁》，第7期，1945年7月，第69页。对这个故事进行回应的信件，见《17岁》第13期，1945年9月，“感谢你的来信”第4页。

安妮·弗兰克的“我害怕监狱”，见卡罗尔·安·李的《土中玫瑰》第三部分“到处一片死寂，1942—1944”，第六章。安妮·弗兰克在卑尔根-拜尔森集中营内，“两个人无法分开”，见《土中玫瑰》第四部分“是谁把这个强加给了我们？1944—1945”，第八章。安妮被抓和被送往威斯特伯克的详情，以及奥图·弗兰克的话，见《土中玫瑰》第三部分第六章。去奥斯威辛的旅程详见同一文本。

引文“我的确和安妮说过话”出自卡罗尔·安·李的《奥图·弗兰克的秘密生活》（伦敦：企鹅出版社，2002），第一部分“珍惜千年的东西，1889—1945”，第四章，“灵魂中无法忘怀的印记”。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引文“它太脏了”，见卡罗尔·安·李的《土中玫瑰》第四部分“是谁把这个强加给了我们？1944—1945”第七章。除了以下从《奥图·弗兰克的秘密生活》摘取的部分外，下面三段安妮的狱中生活详情也出自此章。

引文“由魔鬼的规则创造和掌管”和“不会忘记玛格当时的眼神”，见李的《奥图·弗兰克的秘密生活》第一部分第四章；1945年1月奥图·弗兰克被释放时的详情也出自同章。安妮弗拉克确信她的父母已经死了，以及在她姐姐死于痢疾之后她放弃希望，见李的《土中玫瑰》第四部分“是谁把这个强加给了我们？1944—1945”第八章。

梅丽塔·玛舒曼对纳粹政权失败的思想，包括引文“这种可怕的大规模死亡”，见《清单》，第十四章。俄国的迅速进攻并抓住50多万青少年，以及“灾难的漩涡”，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将17岁的孩子作为“牢固的储备力量”的“第三次浪潮”，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九章“最后的牺牲”。850万德国人从西部逃到俄国前线的数据引自安东尼·毕佛尔（Antony Beevor）的《柏林，1945年的沦陷》（*Berlin, The Downfall 1945*）（伦敦：威金出版社，2002）第三章“火和剑和‘崇高的焚烧’”。

哥特罗伯·博格被授权召集17—18岁年龄组中五分之一的人，引自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八章“开给精英的空头支票”。沃克斯登详情见H. W. 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战争的野蛮”的引文，见雷姆珀第九章“最后的牺牲”。雷玛根的青年力量详述见同章。阿图尔·阿克森曼的“从希特勒青年中”见H. W. 科齐第二章“战争”。

梅丽塔·玛舒曼的引文“对他们来说‘直到牺牲’的呼吁不是空话”引自《清单》第十四章。约翰·P. 埃尔文打死一个12岁的孩子，见《另一条河，另一座城：青年坦克枪手在战争中成熟起来—1945》（*Another River, Another Town: A Teenage Tank Gunner Comes of Age in Combat—1945*）（纽约：兰登书屋，2002）第三章“结束安逸生活”。医生的故事“你这个笨蛋！看看战争给了你什么！”见强尼斯·斯坦霍夫、彼得·佩舍尔和丹尼斯·肖特的《第三帝国的声音》第四部分“灾难和自由”第十三章“坍塌”，对伯纳德·施密特（Bernard Schmitt）的采访。

埃尔文对诺德豪森劳工营的描述见《另一条河，另一座城》第六章“堕落的教训”。引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黑有白还有隐蔽处的灰色地带”出自同章。奥图尔·阿克森曼命令四千名男孩组成坦克摧毁部队，见吉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九章，“最后的牺牲”。最后柏林

爱乐乐团表演详情见安东尼·毕佛尔的《柏林,1945年的沦陷》第十二章“等待杀戮”。

梅丽塔·玛舒曼的“当远处战争的炮火声”源自《清单》,第十四章。阿道夫·希特勒最后的公开亮相,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希特勒的疯狂以及他把自己等同于德国人民,见安东尼·毕佛尔的《柏林,1945年的沦陷》第十章“阴谋集团和成员”第十七章“元首最后的生日”和第十八章“金鸡腾飞”。

以“我确信我们在战斗中必将胜利”的演讲引自和珍妮弗·基莉的《希特勒青年团的生活》第八章,“希特勒青年团和战争”。玛舒曼的“他们渴望证明自己是士兵”出自《清单》第十四章。阿图尔·阿克森曼5月1日逃到阿尔普斯见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九章,“最后的牺牲”。西里西亚希特勒青年团领导所说的“在可怕的痛苦中死去”引自同章。

“我们信任希特勒”,见斯坦霍夫、佩舍尔和肖特的《第三帝国的声音》中的《跋》,“德国结束了?”里面包括对苏珊娜·瑞特(Susanne Ritters)的采访。希特勒青年在达豪集中营看到尸体时的反应见H.W.科齐的《希特勒青年团》第二章“战争”。

“狼人青年团”游击队的详情可参阅格哈德·雷姆珀的《希特勒的孩子们》第九章,“最后的牺牲”和安东尼·毕佛尔的《柏林,1945年的沦陷》第十二章“等待猛攻”。梅丽塔·玛舒曼考虑加入“狼人青年团”见《清单》第十五章。她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死的反应,在巴伐利亚山脉闲逛和“我寻求救赎”“看孩子们玩耍”见同章。

1945年5月8日伦敦的兴奋场景见乔纳·麦克和斯蒂夫·亨弗里斯的《伦敦开战了》第六章“新生活”。汉弗里·利特尔顿(Humphrey Lyttelton)的《我高兴,我就玩》(*I Play as I Please*) (伦敦:潘恩出版社,1959)有精彩的描述。联合王国50万人的伤亡人数,见约翰·卡斯特罗的《爱情、性欲和战争》第十七章“性别革命的种子”。美国兵在欧洲大陆上受欢迎,见李·肯纳特的《美国兵》第六章“国外和国外”。

引文“大众的人道主义”引自麦克斯·勒纳的《公共新闻》第一部分“这块幸运的土地”“卖者市场的启示”。原文登在《17岁》“国际关注”1943年12月23日,见理查德·M.乌格兰德的《二战时期的青少年经历》第七章“青少年的出现”。原引文来自《17岁》第八期,1945年4月。托尼·瓦卡罗的图片,见《走进德国:1944—1949》(*Entering Germany: 1944—1949*) (科隆:塔森出版社,2001)。

1945年6月《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青年时代是美国的创造》引自理查德·M.乌格兰德的《二战期间的青年经历》第七章“青少年的出现”。《生活》关于“青少年男孩”的特刊于1945年6月2日发行;关于他们的“饮食”在94页。格伦·米尔斯乐队在纽伦堡体育场表演,他为4万同盟军军人演奏,见刘易斯·A.埃伦伯格的《摇摆梦想》第三部分第七章“摇摆走向战争”。

1945年英国大选的结果,见彼得·刘易斯的《人民的战争》第十章“向左看,道路一片光明”。引文“在军人中”,出自丹尼斯·赫利市长——后来在1974和1979年间成为财政部大臣,是战后英国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之一,它源自同一文本。引文“美国人对英国的改变”和“他们走

了生活变得如此单调”，见朱丽叶·加迪纳的《在这里》第十八章“在那里”。

美国《时尚》杂志封面故事“美貌与年轻一代”见1945年8月期，第23页。引文“大规模爆炸”，见詹姆士·琼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蘑菇云”。“突然一簇耀眼的红白色光出现在天空上”引自同一出处。“又一次，杜鲁门总统对日本采用了心理压迫”，见《时代》46卷，7号，1945年8月13日，“国家：一个时代的诞生”，17页。

尤金·吉尔巴特的生意和下面三段的引文见《时代》，同上，46卷，7号，1945年8月13日。更多关于尤金·吉尔巴特的信息，见理查德·M.乌格兰德的《二战时期的青年心理》第七章“青少年的出现”和格雷斯·帕拉迪诺的《青少年》第三部分第七章“广告时代：尤金·吉尔巴特和青年市场的兴起”。有关尤金·吉尔巴特更为详细的资料，见迪威特·麦克唐纳(Dwight McDonald)的《一个阶级，一种文化，一个市场，一个部分》(*A Caste, A Culture, A Market, part one*)，纽约，1958年11月22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体的伤亡人数各个资料都有不同。我综合了马克·阿诺德·弗斯特(Mark Arnold Forster)的《战时的世界》第十三章“被占国家的死亡和抵抗”，安德莉亚·沃伦的《劫后余生》“附录：集中营，二战中的人力消耗”；和维基百科对二战的注解。关于刘易斯·H.拉帕姆“转移到了美国账户”的表述，见斯特兹·特克尔的《有益的战争》序言。

原子弹的整体效果，见下：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的《比1000个太阳更亮：原子弹科学家的个人史》(*Brighter Than 1000 Suns: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伦敦：企鹅出版社，1960)；唐纳德·波特·戈德斯编(Donald Porter Geddes, ed.)的《原子弹时代开启》(*The Atomic Age Opens*) (纽约：袖珍图书，1945)；杰夫·娜塔尔(Jeff Nuttall)的《炸弹文化》(*Bomb Culture*) (伦敦：帕拉丁出版社，1970)。亚里士多德所说“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处在希望中”，见诺曼·凯尔(Norman Kiell)的《青少年的共同经历》(*The Universal of Adolescence*)，引言。斯坦利·霍尔认为青少年是“新生”的观点见《青春期》第一卷，序言。

# 译名对照表

*Action* 《战斗》

Acton, Harold 哈罗德·艾克顿

Adams, Henry 亨利·亚当斯

Adams, W. H. Davenport W. H. 达文波特·亚当斯

Addams, Jane 简·亚当斯

Adolescence: 青春期:

as separate life stage 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阶段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ce in Europe 作为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Adolescence*(Hall) 《青春期》(霍尔)

Advertising 广告

Aestheticism 唯美主义

Africa 非洲

African Americans 非裔美国人

"After the Ball"(Harris) 《舞会之后》(哈里斯森)

Agathon 阿加松

Agee, James 詹姆斯·艾吉

"Agencies of Communication, The"(Willey and Rice) 《传播机构》(威利和赖斯)

Alcohol 酒

Prohibition and 禁酒令

Aldington, Richard, 理查德·奥尔丁顿

Aldrich, Tomas Bailey 托马斯·贝雷·奥尔德里奇

Alexander, Lewis 刘易斯·亚历山大

"Alexander's Ragtime Band" 亚历山大的拉格泰姆乐队

- Alger, Horatio 赫罗西·阿尔杰
- Allen, Clifford 克利福德·阿兰
- 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Remarque) 《新西线无战事》(雷马克)
- Ally Sloper's Half Holiday* 《艾利·斯洛普的半个假期》
- Alsace 阿尔萨斯
- "American adolescence"(1910s) 《美国青少年》(1910年代)
- American Boy* 《美国男孩》
- American Dilemma, An*(Mydal) 《美国的两难》(缪达尔)
-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美国劳工联盟
- American Field Service 美国野战勤务团
- American Girl* 《美国女孩》
- American Girl Scouts 美国女童子军
- American Idea 美国理想
- American Indians 美国印第安人
- American Law Review* 《美国法律评论》
-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美国心理分析协会
- American Student Union(ASU) 美国学生联合会
- American Woodcraft Indians 美国印第安森林人
- American Youth Act 美国青年法案
- American Youth Commission 美国青年委员会
- American Youth Congress(AYC) 美国青年代表大会
- 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American Youth* 《美国青年权利宣言》
- American Youth Speaks Up* 《美国青年大胆地说》
- Amerika - Deutscher Volksbund 德美协会
- Anarchism 无政府主义
- Anderson, Nels 纳尔斯·安德生
- Anderson, Sherwood 舍伍德·安德生
- Anderston Redskins 安德森·里德斯金
- Androgyny 非男非女的人
- Angry Young Man* (Paul) 《愤怒的年轻人》(保罗)
- Ann Veronica*(Wells) 《安·维罗妮卡》(威尔斯)
- Anslinger, Harry 哈里·安史林格
- Anti-Fascist Committee 反法西斯委员会
- Anti-Saloon League(ASL) 反沙龙联盟

- Anti-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 Apaches 阿帕切
- Apocalypse 大毁灭
- Appel des Armes, L'* (Psichari) 《呼唤武器》(普西卡里)
- A rebours* (Huysmans) 《逆流》(丁斯曼)
- Are These Our Children?* 《这些是我们的孩子吗?》
- Are These Our Parents?* 《这些是我们的父母吗?》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 Arland, Marcel 马赛勒·阿兰德
- Arlen, Harold 哈罗德·阿伦
- Arlen, Michael 迈克尔·阿伦
- Armistice Day 休战纪念日
- Armstrong, Louis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 Arnold, Matthew 马修·阿诺德
- Arnold, Thomas 托马斯·阿诺德
- Arp, Hans 汉斯·阿尔普
- "Art, Morals and the War" (Image) 《艺术、道德与战争》(伊马奇)
- Artamanen 阿塔曼嫩
- Artelt, Willi 威利·阿特尔特
- Art movements: 艺术运动:
- Die Brücke 《桥》
- Dada 达达主义
- futurism 未来派
- vorticism 漩涡主义
- Asbury, Herbert 赫伯特·阿斯伯里
- Ascent of Man* (Drummond) 《人类的进步》(德拉蒙德)
- Ascona commune 奥斯考那公社
- Atlantic Monthly* 《大西洋月刊》
- Atom bomb 原子弹
- Auden, W. H. W. H. 奥登
- Audiffret, Emile 艾米尔·奥蒂弗雷德
- Auschwitz 奥斯威辛集中营
- Ausschuss Für Schulerfahrten 中小学生的理事会
- Austria 奥地利

Axmann, Artur 阿图尔·阿克斯曼

*Babbitt* (Lewis) 《巴比特》(刘易斯)

Buden - Powell, Robert Stephen Smyth 罗伯特·史蒂芬·史密斯·巴顿 - 鲍威尔

Baker, Josephine 约瑟芬·贝克

Baker, Newton D. 牛顿 D. 贝克

Ball, Hugo 雨果·鲍尔

Ballets Russes 俄罗斯芭蕾舞

Band of Hope 希望乐队

Bara, Theda 西达·巴拉

Barcelona, Spain 西班牙巴塞罗那

Barker, Ma 玛·巴尔克

Barnum, P. T. P. T. 巴纳姆

Barres, Maurice 莫里斯·巴莱斯

Barrie, David 大卫·巴里

Barrie, J. M. J. M. 巴里

Barrow, Clyde 克莱德·巴洛

Bashkirtseff, Marie 玛丽·巴什基尔森

Bashkirtseff, Paul 保罗·巴什基尔森

Basie, William "Count" 贝西伯爵

Bates, Ruby 鲁比·贝茨

Battle of Britain 英国之战

Battle of Cable Street 电缆街战役

Baudelaire, Charles 查尔斯·波德莱尔

Bauhaus 宝豪丝建筑大学

Baum, L. Frank L. 弗兰克·鲍姆

Baxter, Willie 威利·巴克斯特

Baxter Street Dudes 巴克斯特街头男孩

Beard, Dorothea 桃乐西娅·比尔德

Beardsley, Aubrey 奥布雷·比亚兹莱

Beatles 披头士

Beaton, Alice 艾丽丝·比顿

Beaton, Cecil 塞西尔·比顿

Beauvoir, Simone de 西蒙娜·德·波伏娃

- Bechet, Sidney 西德尼·贝彻
- Bedaux system 柏道格斯系统
- Bedford, F. D. F. D. 贝德福德
- Beerholm, Max 迈克思·比尔博姆
- Beiderbecke, Bix 毕克斯·比德贝克
- Belgium 比利时
- Bell, Alexander Graham 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
- Benny Goodman Orchestra 本尼·古德曼交响乐队
- Bergen - Belsen 卑尔根 - 拜尔森
- Berger, Bob 鲍勃·博格
- Berger, Gottlob 戈特洛布·伯格尔
- Bergson, Henri 亨利·伯格森
- Berlin, Germany 德国柏林
- final defense of 最后的抵抗
- nightlife in 夜生活
- Olympics in 奥运会
- Wild Cliques in 野蛮团伙
- Berlin, Irving 欧文·柏林
- Bernays, Edward 爱德华·博那伊
- Bernhardt, Sarah 撒拉·伯恩哈特
- Beveridge Report 贝弗里奇报告
- biff boys 少年英雄
- Bill of Rights 权利法案
- Birmingham University 伯明翰大学
- birth control 生育控制
- Bismarck League 俾斯麦联盟
- Bitter Cry of the Children, The* (Spargo) 《孩子们的痛哭》(斯帕格)
- Black, Jack 杰克·布莱克
- Blackbirds, The* 《黑鸟》
- Black' Ell* (Malleston) 《黑尔》(马里逊)
- Blacker the Berry, The* (Thurman) 《黑草莓》(瑟曼)
- blacks 黑人
- music and dance and 音乐与舞蹈
- in Harlem, see Harlem 在哈莱姆, 见哈莱姆

- interracial violence and 种族间暴力  
 racial boundaries and 种族界限  
 segregation and 种族隔离  
 transient 流浪者  
 in U. S. army 在美国军队中  
*Blast* 《冲击》  
 Bliven, Bruce 布鲁斯·布利文  
 Blondell, Joan 琼·布朗德尔  
 Bloomsbury group 布鲁斯伯里派  
 Blueler, Eugene 尤金·布鲁勒  
 blues 布鲁斯  
 Blucher, Hans 汉斯·布鲁尔  
 Blunt, Anthony 安东尼·布朗特  
 bobby - soxers 短袜少女  
 Boden, F. C. F. C. 波顿  
 Boer War 波尔战争  
 Boeuf sur le Toit 屋顶上的牛  
 bohemianism 波希米亚风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主义  
 Bonnard, Abel 阿拜尔·伯纳德  
*Book for Boys* (Adams) 《给男孩们的书》(亚当斯)  
 Boorman, W. Ryland W. 赖兰·布尔曼  
 Booth, William 威廉·布斯  
 Bootlegging 非法贩卖私酒  
 Borchert, Wolfgang 沃尔夫冈·博尔歇特  
 Borezon, Frank T. 弗兰克·T. 鲍宗  
*Born in Captivity* (Starke) 《生于圈养》(斯达克)  
 Bory, Jean-Louis 让·路易斯·波利  
*Boston Times* 《波士顿时报》  
 Bourgoint, Jean 让·布赫光特  
 Bourgoint, Jeanne 让娜·布赫光特  
 Bourne, Randolph S. 伦道夫·S. 波恩  
 Bow, Clara 克莱拉·宝  
 Bowery Boys 鲍威利男孩

Bowman, Karl M. 卡尔·M. 伯曼

*Boy* (Hanley) 《男孩》(汉利)

*Boy and Girl Tramps of America* (Minchan) 《美国的流浪男孩女孩》(迈汉)

boy books 男孩读物

“Boy Dates Girl”(Head) “男孩约会女孩”(海德)

Boyce, William D. 威廉·D. 博伊斯

*Boys as They Are Made and How to Remake Them* (Briggs) 《孩子们的成长及重塑》(布里格斯)

Boys' Brigade 少年军

*Boy's Cinema* 《男孩影院》

Boy Scouts (Britain) 童子军(英国)

Boy Scouts of America 美国童子军

*Boy Scouts of America* (Seton) 《美国童子军》(塞顿)

*Boys' Life* 《男孩生活》

*Boy's Own Paper* 《男孩自己的报纸》

*Boys Town* 《孤儿乐园》

*Boy's Town, A* (Howell) 《孩子镇》(豪威尔)

Brace, Charles Loring 查尔斯·罗林·布雷斯

Brasillach, Robert 罗伯特·布拉希拉奇

*Brave New World* (Huxley) 《美丽新世界》(赫胥黎)

Brendon, Piers 皮尔斯·布伦登

Breton, Andre 安德烈·布伦登

Breuer, Josef 约瑟夫·布洛伊尔

Briggs, F. H. F. H. 布里格斯

*Brighton Rock* (Greene) 《布莱顿硬糖》(格林)

Bright Young People “光明的年轻人”

Britain: 英国: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美国流行文化

anti-German riots 反德国暴动

antiwar sentiments 反战情绪

apprentice system 学徒系统

Boer War 波尔战争

Boy Scouts in 童子军

dancing 跳舞

decadence 颓废

- demonstrations and street battles 示威和街头斗殴
- DORA 领土防御法
- elections 选举
- employment in, during World War II 二战期间的就业问题
- evacuations 大撤离
- gossip columns 闲话拾零专栏
- government regulation 政府调节
- Great Crash 经济大萧条
- imperial ideology 帝国的意识形态
- intelligentsia 知识分子阶层
- jazz and swing 爵士乐和摇摆乐
- manufacturing 制造业
- Mass-Observation polls 大众观察民意测验
- means test 经济情况调查
-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 military training and service 军事训练和服役
- movies 电影
- Neo-Pagans 新异教徒
- political divisions 政治区域
- poor working class 贫穷的劳动阶级
- prosperity 繁荣
- RAF fighter pilots 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
- schooling 教育
- social hierarchy 社会等级制度
- Spanish civil war and, 西班牙内战
- "Special Areas" "特别地区"
- sports culture 运动传统
- unemployment 失业
- vorticists 漩涡派画家
- women and girls 妇女和女孩
- World War I reparations and, 一战战后赔偿
- youth clubs and groups 青年俱乐部和团体
- Britain* (Mass-Observation) 英国(大众观察)
- British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 英国民意研究所

British Union 英国联盟

British Union of Fascists( BUF) 英国法西斯党

Brittain, Vera 维拉·布雷特

*Broadway Melody of 1936* 《红伶秘史》1936

Bronnen, Arnolt 阿诺尔特·布莱尼

Bronner, Augusta F 奥古斯塔·F.布罗纳

Brooke, Rupert 鲁珀特·布鲁克

Brown, Maxine 马克森·布朗

Browne, Felicia 弗里西亚·布朗

Brücke, Die 迭·布鲁克画派(桥)

Buchman, Frank 弗兰克·布什曼

"Budding Girl and the Boy in His Teens, The"(Hall) 《十几岁的少男少女》(霍尔)

Bund Deutscher Mädel 德意志少女联合会

*Bunde* 联盟

Germany, Bunde(youth organization) 德国联盟(青年组织)

Burgess, Guy 盖伊·伯格

Burt, Cyril 西里尔·伯特

Busse-Wilson, Elizabeth 伊丽莎白·布斯·威尔逊

Cabaret Voltaire 伏尔泰

cadet organizations 系统化地人编预备军官组织

Café Society 上流社会

Cagney, James 詹姆斯·贾克奈

cakewalk 阔步舞

California 加利福尼亚

Calkins, Clinch 克林奇·卡尔金斯

*Calling All Girls* 《呼唤所有的女孩》

Calloway, Cab 卡伯·卡洛维

*Camel Caravan* “骆驼商队”

Cambridge University 剑桥大学

Campbell, Frank 弗兰克·坎培贝勒

Camus, Albert 阿尔贝·加缪

Canadian army 加拿大军队

"Can the Masses Rule the World?"(Hall) 《大众能统治世界吗?》(霍尔)

- Capek, Karel 卡雷尔·恰佩克  
 capitalism 资本主义  
 Capone, Al 埃尔·卡本  
 Carjat, Etienne 恩特·卡加  
 Carleton, Billie 比莉·卡列顿  
 Carlson, John Roy 约翰·罗伊·卡尔森  
 Carpenter, Edward 爱德华·卡彭特  
 Carpenter, Mary 玛丽·卡彭特  
 Carrington, Charles 查尔斯·卡灵顿  
 Carroll, Eddie 艾迪·卡罗尔  
 Casque d'Or (Amelie Helie) 金头盔(艾米莉·海莉)  
 Castlerosse, Lord 卡斯特勒罗斯勋爵  
 Catholic Boys' Brigade 天主教少年军  
 Catholicism 天主教  
*Cats Meow* 《猫咪喵》  
 Cavan, Ruth 露丝·凯文  
 censorship, of movies 电影审查制度  
*Century of the Child, The (Key)* 《儿童的世纪》(凯)  
*Chameleon* 《变色龙》  
 Chamson, Andre 安德烈·查姆森  
*Chantiers de la Jeunesse ("Youth Work Sites")* 青年工地  
 Chaplin, Charlie 查理·卓别林  
 Charleston 查尔斯顿  
 Chase, James Hadley 詹姆斯·哈德利·杰兹  
 Chatterton, Thomas 托马斯·查特顿  
 Chester, Francis 弗朗西斯·切斯特  
 Chicago, Ill. 伊利诺斯芝加哥  
     juvenile court set up 建立未成年法庭  
     lawlessness 目无法纪  
     Leopold and Loeb 里奥波德和娄波  
     Loop 卢普  
     social problems 社会问题  
     Swing Jamboree 摇摆乐聚会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

- Chicago Herald* 《芝加哥先驱报》
- Chicago Sunday Tribune* 《芝加哥周日论坛报》
- Chicago Tribune* 《芝加哥论坛报》
- Chicago Women's Club 芝加哥妇女俱乐部
- Child and the War, The* (Leeson) 《孩子和战争》
- childcare 照料孩子
- child labour 童工
- Childers, Erskine 厄斯金·奇尔德斯
- Children and Young Persons Act 《儿童及青少年法》
- Children's Bureau 儿童局
- Child Study movement 儿童研究运动
- Chips* 《薯条》
- Christianity 基督教
- muscular 肌肉发达
- Oxford Group 牛津派
-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丘吉尔
- Church Lads' Brigade 基督教少年军
- leaflet 传单
- Cinderella complex 灰姑娘情结
- cities 城市
- child labour 童工
- gangs in 帮派
- slum children 贫民窟的儿童
- U. S. increase in population 美国人口增长
- vice districts 臭名昭著的街区
-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民间资源保护队
- Civil War 内战
- Clark, Anne 安妮·克拉克
- Clarke, Mae 梅·克拉克
- class distinctions 阶级差别
- Classic Slum, The* (Roberts) 《经典的贫民窟》(罗伯茨)
- Click* 《契合》
- Clifton, Ruth 鲁斯·克利夫顿
- Clinchy, Everett R. 埃弗雷特·R. 克林奇

- clothing and fashion 衣着和时尚
- dandyism 时髦华丽
- delinquency and, 少年犯
- spivs and, “懒汉”
- swing and, 摇摆乐
- Teen-Timers and, 青少年岁月
- cocaine 可卡因
- Cockburn, Claud 克劳德·柯克本
- Cocteau, Jean 让·考克多
- Cohen, Elliot E. 艾略特·E. 科恩
- Cole, Vic 维克·科尔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塞缪尔·泰勒·科尔雷基
- Collected Poems* (Brooke) 《吟诗集》(布鲁克)
-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学院和大学
- Depression and 经济萧条
- fraternities 学生联谊会
- Collier, James Lincoln 詹姆斯·林肯·克里尔
- Comic Cuts* 《连环漫画》
- comics 喜剧
- Coming of Age in Samoa* (Mead) 《萨摩亚人的成年》(米德)
- Comintern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Communists 共产主义者
- Compagnons de France 法国工友协会
- concentration camps 集中营
- Confessions* (Rousseau) 《忏悔录》(卢梭)
-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Fascist Girl” (Mitford) 《一个英国法西斯女孩的忏悔》(米特福德)
- Conservative Party 保守党
- Constitution, U. S. 美国宪法
- consumerism 消费主义
- advertising 广告
- American youth market 美国青年市场
- Depression and, 经济萧条
- “Conte” (Rimbaud) “短篇小说”(兰波)
- contraception 避孕法

- Cooper, Courtney Ryley 科特尼·赖利·库珀  
 Cooper, James Fenimore 詹姆斯·芬尼莫尔·库珀  
 Cornford, Frances 弗朗西斯·康福德  
 Cotton Club 棉花俱乐部  
 Coughlin, Charles E. 查尔斯·E. 库格林  
 Coward, Noel 诺埃尔·科沃德  
 Cox, Katherine 凯瑟琳·考克斯  
 Crane, Stephen 史蒂芬·克莱恩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街头女郎梅姬》  
 Creston, Dormer 多玛·克莱斯通  
 crime, criminals 犯罪, 罪犯  
     Bonnie and Clyde 邦尼和克莱德  
 Cronin, A. J. A. J. 克罗宁  
 Crosby, Bing 宾·克罗斯比  
 Crosby, Harry 哈里·克罗斯比  
 Crowd, The (Le Bon) 《乌合之众》(勒庞)  
 Cullen, Countee 康梯·喀伦  
 Cunard, Nancy 南茜·库纳德  
 curfews 宵禁  
 Curran, Katie 凯蒂·柯伦  
 Current Opinion 《流行观点》  
 Curtis, James 詹姆斯·柯提斯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 Dachau 达豪集中营  
 Dada 达达主义  
 Daily Express 《每日快报》  
 Daily Graphic 《每日画报》  
 Daily Mail 《每日邮报》  
 Daily Princetonian 《普林斯顿日报》  
 Dale, Johnny 约翰尼·戴尔  
 Daley, Harry 哈里·达利  
 Daly, Maureen 莫琳·戴利  
 dancing 舞蹈

- swing 摇摆舞
- dandyism 花花公子派头
- Daniels, Werner 沃纳·丹尼尔斯
- Danzig crisis 但泽危机
- Darrow, Clarence 格莱伦斯·达洛
-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 Darwin, Frances 弗朗西斯·达尔文
- Darwin, Gwen 葛温·达尔文
- Darwinism 进化论
- dating 约会
- Davis, Jack 杰克·戴维斯
- Davis, Maxine 马克森·戴维斯
- D - Day 进攻日
- Dead End* 《死角》
- Dead End Kids' Institute 末路青年协会
- Dead Rabbits 死兔子
- Dean Paul, Brenda 布兰达·丹·保罗
- Dearborn Independent* 《狄堡独立周刊》
- death 死亡
- Barrie and, 巴里
- Brooke and, 布鲁克
- death instinct(Thanatos) 死亡本能
- Death in the Family, A*(Agee) 《家中的一次死亡》
- Death of a Hero*(Aldington) 《英雄的死亡》
- Debs, Eugene 尤金·德布兹
- decadence 颓废
- apocalypse and, 启示录
- futurists 未来派画家
-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自由宣言》
-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人权宣言》
- Décombres, Les* (Rebatet) 《碎石》(勒巴泰)
- Defence of the Realm Act(DORA) 《领土防御法》
- degeneration 堕落
- Degeneration*(Nordau) 《堕落》(诺尔道)

- Delaunay, Charles 查尔斯·狄隆内
- delinquency, see juvenile delinquency 犯罪
- Delinquents and Criminals* (Healy and Bronner) 《少年罪犯和犯罪者》(希里和布罗纳)
- Demange, Charles 查尔斯·德曼歌
- Demeny, Paul 保罗·德门尼
- democracy 民主
- Demuth, Norman 诺曼·德穆斯
- Denmark 丹麦
- Denslow, W. W. W. W. 丹斯洛
- Depression 经济萧条
- Déracinés, Les* (The Uprooted Ones) (Barrès) 《离开本根的人》(巴莱斯)
- Derniers jours de Babylone, Les* (Roche-grosse) 《巴比伦的最后一天》(罗克格罗斯)
- Der Tag* (Barrie) 《白天》(巴里)
- Designs in Scarlet* (Cooper) 《猩红的设计》(库珀)
- de Tarde, Alfred 阿尔弗雷德·塔尔德
- Detroit, Mich. 底特律, 米奇大街
- riots 暴乱
- Youth Council 青年委员会
- Deutsche Freischar 德国自由团
- Dewey, John 约翰·杜威
- Diable au corps, Le* (The Devil in the Flesh) (Radiguet) 《肉欲之魔》(瑞迪戈特)
- Diaghilev, Sergei 谢尔盖·贾基列夫
- Díaz, José 霍赛·迪亚兹
- Dickens, Charles 查尔斯·狄更斯
- Dickinson, Goldsworthy Lowes 戈兹沃西·洛斯·迪金森
- Dillinger, John 约翰·迪林杰
- dime novels 低俗小说
- “Dixie Jass Band One Step” 《迪克西兰乐队的独步舞曲》
- d. j. I. II group 非法组织 d. j. I. II
- Dolan, Dandy Johnny 丹迪·约翰尼·杜兰
- Doom of Youth* (Lewis) 《青年的宿命》(刘易斯)
- Doriot, Jacques 雅克·多里奥特
- Dorsey, Jimmy 吉米·多西
- Dos Passos, John 约翰·多斯·帕索斯

doughboys 布兵

Douglas, Lord Alfred 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Down Beat* 《跳跃》

draft dodgers 逃兵

dreams 梦想

Dreiser, Theodore 西奥多·德莱塞

dress 着装

Driberg, Tom 汤姆·崔尔伯格

Drieu La Rochelle, Pierre 皮耶罗·丢拉罗歇尔

*Drug Traffic, The* 《毒品交易》

drug use 吸毒

in movies 在电影里

by musicians 有关音乐家的

Drumlanrig, Francis Douglas, Viscount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德兰姆兰里格子爵

Drummond, Henry 亨利·德拉蒙特

Dubois, Claude 克劳德·杜布瓦

Du Maurier, Daphne 达芙妮·杜·莫里哀

Du Maurier, George 乔治·杜·莫里哀

Du Maurier, Gerald 杰拉德·杜·莫里哀

Du Maurier, Guy 盖伊·杜·莫里哀

Duncan, Clyde 克莱德·邓肯

Dupont, Maurice 莫里斯·杜邦

Durkheim, Emile 埃米尔·杜克海因

Dystopias 反乌托邦

Eastman, Monk 蒙克·伊斯曼

Eastmans 伊士曼

Ed, Carl, 卡尔·艾迪

Edelweiss Pirates 火绒草海盗

Education Act 教育法案

Edwards, Eddie 埃迪·爱德华

*Eigene, Die* 《个性》

*Eighteen: A Diary of the Teens (A Boy)* 《一个18岁男孩:少年的日记》

Einstein, 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 elan vital 重要组成部分
- Eliot, T. S. T. S. 艾略特
- Ellington, Duke 艾灵顿公爵
- Ellis, Estelle 埃斯特尔·艾利斯
- Ellis, Havelock 哈夫洛克·埃利斯
- Ellison, Biff 比夫·艾利森
- Ellison, Ralph 拉尔夫·埃里森
- Elmtown's Youth* (Hollingshead) 《艾姆城的年轻人》(霍林斯黑德)
- Emile* (Rousseau) 爱弥儿(卢梭)
- employment 就业
- apprentice system 学徒系统
  - Bedaux system 柏道格斯系统
  - Depression and, 经济萧条
  -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and, 全国青年总署
  - New Deal 新政
  - seasonal 季节工
  - unemployment in Britain 英国的失业情况
  - unemployment in U. S. 美国的失业情况
- Enfants terribles, Les* (Cocteau) 《折磨人的孩子》(考克多)
- England 英格兰
- entertainment 娱乐
- equality 平等
- Eros 爱神,性爱
- Eschmann, Wilhelm 威廉埃·施曼
- etiquette 礼仪
- Eton Candle* 《伊顿烛光》
- Eton College Chronicle* 《伊顿校史》
- Etranger, L'* (Camus) 《陌生人》(加缪)
- Europe 欧洲
- adolescence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force 青少年作为社会政治力量
  - back-to-nature movements 回归自然运动
  - mass society 大众社会
  - 1920s youth culture 20世纪20年代的青年文化
- European Youth League 欧洲青年团

*Evening Standard* 《旗帜晚报》

*Everygirl* 《每个女孩》

evolutionary theory 进化论

existentialism 存在主义

extraordinary adolescents 青少年们的不寻常的故事

Fabian, Warner 瓦纳·法碧昂

Fabian Society 费边社

factory work 工厂劳动

fads 潮流

Fairbanks, Douglas 道格拉斯·菲尔班克斯

*Family and the Depression, The* (Cavan) 《家庭和经济危机》(凯文)

*Family in a World at War, The* (Zachry) 《战争世界中的家庭》(扎迦利)

Farrell, James T. 詹姆斯·T.法雷尔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European Youth League 欧洲青年团

fashion 时尚

Father Goose (Baum and Denslow) 《鹅爸爸》(鲍姆和丹斯洛)

FBI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联邦调查局

Federal Transient Relief Service 联邦流浪救济服务

Federation of Student Societies 学生团体联合会

*Fellow Fighters in the Resistance!* “抵抗运动中的战斗伙伴们!”

feminism 女权主义

Fields, James T. 詹姆斯·T.菲尔兹

fighter pilots 战斗机飞行员

Filene, Edward A. 爱德华·A.费林

Filipinos 菲律宾人

films, see movies 电影, 见电影

Findley, Frank 弗兰克·芬德利

*Fire* 《火》

Firth, Henry 亨利·福斯

Fischer, Karl 卡尔·费歇尔

Fiske, John 约翰·费斯克

Fitzgerald, F. Scott F.斯考特·菲茨杰拉德

*Flappers and Philosophers* 《摇摆女郎与哲学家们》

*This Side of Paradise* 《人间天堂》

Fitzgerald, Zelda 丽尔达·菲茨杰拉德

"Five American Boys" (1900s) "五个美国男孩"(19世纪初)

Five Pointers "五只猎犬"

*Flaming Youth* (Fabian) 《烈火青年》(法碧昂)

*Flaming Youth* (film) 《烈火青年》(电影)

flappers 摇摆女郎

"Flapper's Appeal to Parents, A" (Page) 《一个摇摆女郎对父母的恳求》(巴芝)

Flex, Walter 沃尔特·弗莱克斯

Floyd, Charles Arthur "Pretty Boy" "漂亮男孩"查尔斯·亚瑟·弗洛伊德

*Fool There Was, A* 《有过一个傻瓜》

Ford, Henry 亨利·福特

Ford Motor Co. 福特汽车公司

Forman, Henry 亨利·福尔曼

Fourquier, Henry 亨利·费里耶

France 法国

anarchists 无政府主义者

decadence 颓废

jazz 爵士乐

military 军队

Nazi occupation 纳粹占领区

Paris Commune 巴黎公社

Third Republic 第三共和国

Franco, Francisco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

Frankfurt, Germany, swing kids 德国法兰克福, 摇摆乐青少年

Frank, Anne 安妮·弗兰克

Frank, Edith 伊迪斯·弗兰克

Frank, Margot 玛格·弗兰克

Frank, Otto 奥图·弗兰克

Franks, Bobby 鲍比·弗兰克斯

Franks, Jacob 雅各布·弗兰克斯

Franz Ferdinand, Archduke 弗朗兹·费迪南大公

- fraternities 学生联谊会
- Frazier, E. Franklin E. 富兰克林·弗雷泽
-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
- Frederick William I, King 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
- Freideutsche Jugend 自由德国青年会
- Freideutsche Jugendtag* 《自由德国青年日报》
- Freikorps 志愿军
- Freisler, Roland 罗兰德·弗莱斯勒
- French Foreign Legion 法国外援军
- Freston, H. Rex H. 莱克斯·弗里斯顿
- Freud, Sigmund 西蒙德·弗洛伊德
- first American visit of 第一次拜访美国
-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梦的解析》
- frontier 边疆
- Fuller, Rosalinde 罗莎琳德·弗勒
- futurists 未来派画家
- “Gabriel - Ernest” (Saki) “加百利 - 欧内斯特”(萨基)
- Caillard, Slim 史林·盖拉德
- Gair, Barbara 芭芭拉·盖尔
- Galen, Clemens August Graf von 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冯·加伦
- Gallup polls 盖洛普民意调查
- gambling 赌博
- Gang, The* (Thrasher) 《团伙》
- gangs 帮派
- drugs 毒品
- female 女性
- movie depictions of 电影中的描写
- gangsters 匪徒
- Garland, Judy 朱蒂·加兰
- Garnett, David 大卫·加尼特
- “generation,” use and meaning of word “代”, 词的用法和意义
- Mentre and, 蒙特
- generation gap 代沟
- Generation of 1914, The* (Wohl) 《1914年的一代》(沃尔)

- Générations sociales, Les* (Mentre) 《社会代别》(蒙特)
- George, Stefan 施特凡·格奥尔格
- George V, King of England 乔治五世,英国国王
- Georgi, J. J. 纪尔基
- Georgiadis, Demetrius "Kaki" 德米特里厄斯·基奥基迪斯
- Gerbe, La 《花环》
- German-American Bund 德美协会
- German National Youth Association 德国国家青年协会
- Germany 德国
- Die Brück 桥
- democracy 民主
- Freikorps 志愿军
- industrial progress 工业进步
- Jews 犹太人
- juvenile crime 少年犯罪
- in Langemarck battle 兰格马克战役中
- militarism and nationalism 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 National Socialists 民族社会主义者
- political extremism 政治极端主义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社会民主党
- socialists 社会主义者
- teenage culture 青少年文化
-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 Germany, *Bunde* (youth organization) 德国,《联盟》(青年团体)
- Bund Deutscher Mädcl 德意志少女联合会
- Deutscher Freischar 德国自由团
- Greater German League 伟大德国联盟
- Jungmädcl 少女团
- Wandervogel* “候鸟运动”
- Wehretuchtigungslager* 征兵训练营
- Germany, Nazi 德国,纳粹
- anti-Nazi gangs 反纳粹组织
- censorship 审查机构
- concentration camps 集中营

- France occupied by 被占法国  
 Gestapo 盖世太保  
 Hitler Youth in 希特勒青年团  
 mass rallies in 群众集会  
 military service 服军役  
 Germany Nazi(cont'd) 纳粹德国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Police raids 警察突击检查  
 Resistance within 抵抗  
 Sexuality 性  
 Soviet pact with 与苏联的条约  
 SS Panzer Division Hitlerjugend in 党卫军“希特勒青年”装甲师  
 Surrender 投降  
 swastika symbol 卐字标志  
 swing kids 摇摆乐少年  
 Volksgemeinschaft ideal in 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理念  
 Waffen - SS 武装党卫军  
 Werewolves 狼人青年团  
 White Rose 白玫瑰组织  
 women and girls 妇女和女孩  
 Gershwin, George 乔治·格什温  
 Gestapo 盖世太保  
 Gibbs, Philip 菲利普·吉布斯  
 Gies, Miep 密普·吉斯  
 Gilbert, Eugene 尤金·吉尔伯特  
 Gilded Age 镀金时代  
 Gilt Kid, The (Curtis) 《镀金孩子》  
 Girl Guides 《少女指导》  
 Girl's Cinema 《女孩影院》  
 Girl Scouts 女童子军  
 Girls Growing Up(Jephcott) 《成长中的女孩》(杰夫科特)  
 Girty, Simon 西蒙·葛蒂  
 GIs 美国兵  
 Gladstone, William 威廉·格拉德斯通

Glaeser, Ernst 恩斯特·格勒泽尔  
 Glasgow, Scotland 斯考特兰德·格拉斯哥  
 Glueck, Bernard 本纳德·格鲁尔克  
 Glyn, Elinor 艾莉娜·格林  
 Goebbels, Joseph 约瑟夫·戈培尔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  
 Goldman, Emma 艾玛·戈登曼  
 Gollancz, Victor 维克多·戈伦茨  
*Gone with the Wind* 《飘》  
*Goodbye to All That* (Graves) 《摆脱一切》(格雷夫斯)  
*Good Housekeeping* 《时尚好管家》  
 Goodman, Benny 本尼·古德曼  
 Goodman, Charlie 查理·古德曼  
 Gophers “北美地鼠”  
 Gorer, Geoffrey 贾菲尔·哥尔  
 gossip columns 闲话拾零专栏  
 Graf, Willi 威利·格雷夫斯  
 Graff, Otger 渥泰戈·戈哈夫  
 Granada Television 加拿大电视台  
 Graves, Charles 查尔斯·格雷夫斯  
 Graves, Robert 罗伯特·格雷夫斯  
 Greater German League 伟大德国联盟  
*Great Train Robbery, The* 《列车大劫案》  
 Great War 伟大战争  
 Greene, Graham 格雷厄姆·格林  
*Green Hat, The* (Arlen) 《绿帽子》(阿伦)  
 Greenwood, J. M. J. M. 格林伍德  
 Greenwood Walter 沃尔特·格林伍德  
 Griffith, Beatrice 比特里斯·格里菲斯  
 Griffith, D. W. D. W. 格里菲斯  
 Grosz, George 乔治·格罗兹  
 Guerin, Daniel 丹尼尔·格林  
 Guthrie, Woody 伍迪·格斯

- Hafenez, Walter A. 瓦尔特·A.哈芬纳  
Haffner, Sebastian 萨巴斯蒂安·哈夫纳  
Haine, Reginald 雷金纳德·海因  
Hall, G. Stanley G.斯坦利·霍尔  
Hamburg, Germany 德国汉堡  
    prisoners in 囚犯  
    swing kids in 摇摆乐青少年  
Hammond, John 约翰·哈蒙特  
Hampton, Lionel 里奥尼尔·汉普顿  
Hancock, H. Irving H.欧文·汉考克  
Hanley, James 詹姆斯·汉利  
Harburg, Yip 伊普·哈伯格  
Hargrave, John 约翰·哈格雷夫  
Harlem 哈莱姆  
    riots 暴乱  
    Savoy Ballroom in 萨瓦舞厅  
    zoot suit style in 阻特装风格  
Harlem Club 哈莱姆夜总会  
Harley, Joan L. 琼·L.哈利  
Harlow, Jean 琼·哈洛  
Harnaek, Falk 福克·哈内克  
*Harold Teen* 《少年哈罗德》  
Harper, Allanah 阿兰娜·哈珀  
*Harper's* 《哈珀》  
*Harper's Bazaar* 《时尚芭莎》  
*Harper's Young People* 《哈珀的年轻人》  
Harris, Charles K. 查尔斯·K.哈里斯  
Harrisson, Tom 汤姆·哈里森  
*Hatter's Castle*(Cronin) 《帽商的城堡》  
Hatton, S. F S. F.哈顿  
Hawkins, Richard 理查德·霍金斯  
Hays, Will 威尔·海斯  
Head, Gay 盖伊·海德  
Healy, William 威廉·希利

- Hearn, Michael 迈克尔·海恩
- Hearst, William Randolph 威廉·鲁道夫·赫尔斯特
- Hebdige, Dick 迪克·何柏第
- hedonism 享乐主义
- Helie, Amelie (Casque d'Or) 艾米莉·海莉(“金头盔”)
- Helmut Harringa* (Popert) 《赫尔姆特·哈里加》(鲍勃特)
- Hemingway, Ernest 厄恩斯特·海明威
- Henderson, Fletcher 弗莱切·汉德森
- Henke, Milburn H. 米尔本·H. 汉克
- Hennings, Emmy 艾米·亨宁斯
- Henty, G. A. G. A. 亨蒂
- Hepster's Dictionary* (Calloway) 《爵士乐迷字典》
- Here Is Your War* (Pyle) 《这是你们的战争》(派尔)
- Heroin 海洛因
- Herrick, Robert 罗伯特·赫里克
- Hess, Johnny 约翰尼·赫斯
- Hess, Rudolf 鲁道夫·赫斯
- Hess, Walter 瓦尔特·赫斯
- Heydrich, Reinhard 莱茵哈德·海德里希
- Highlanders 高地人
- high school 高中
- class distinctions 阶级差别
- dropping out 辍学
- fads 潮流
- High School Age, The* (King) 《高中时代》(金)
- High School freshmen, The* (Hancock) 《中学新生》(汉考克)
- Hill, Christopher 克里斯托弗·希尔
- Hill, The* (Vachell) 《山》(瓦谢)
- Hillary, Richard 理查德·希拉里
- Himes, Chester 契斯特·赫姆斯
- Himmler, Heinrich 海因里希·希姆莱
- Hinckley, William W. 威廉·W. 海克里
- Hindmarsh, Robert 罗伯特·辛德马什
- Hine, Lewis 海因·刘易斯

- Hipp, Jutta 朱塔·西普
- Hiroshima 广岛
- Hirschfeld, Magnus 马格斯·西谢腓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 American support for 美国支持
- appointed reichschancellor 帝国总理
- British support for 英国支持
- German youth resistance to 德国青年抵抗
- Kiel branch leaflet 基尔分会传单
- Last public appearance of 最后的公开露面
- Mein Kampf* 《我的奋斗》
- Hitlerjunge Quex* 《希特勒青年夸克斯》
- Hitler Youth 希特勒青年
- arrests 被捕
- crimes committed by 犯下的罪行
- Denunciations of parents by 父母的谴责
- discipline problems in 纪律问题
- disillusion in 幻想的破灭
- firefighter poster 消防员海报
- Hübener 休博内
- initiations into 入团仪式
- Law concerning 相关法律
- leadership of 领导系统
- ostracism by 排斥
- police force of 警察力量
- resistance and 抵抗
- structure and hierarchy of 结构和等级
- uniforms of 军服
- in war effort 投身战事
- hobos 流浪汉
- Hobsbawm, Eric 艾瑞克·霍布斯邦
- Hoffman, Herman 赫曼·霍夫曼
- Holiday, Billie 比莉·哈乐黛
- Holland 荷兰

- Hollingshead, August 奥古斯特·霍林斯黑德
- Holly wood, see movies 好莱坞, 见电影
- Hollywood Reporter* 《好莱坞记者》
- Holmes, William 威廉·福尔摩斯
- Home Institute 家庭协会
- homeless 无家可归者
- Home to Harlem* (McKay) 《到哈莱姆去安家》(麦凯)
- Homme révolté, L'* (Camus) 《叛变者》(加缪)
-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 prostitution 卖淫
- Wangervogel and* 《候鸟运动》
- Hooley, Edward 爱德华·胡力
- Hooligan, Patrick 帕德里克·胡力根
- Hooligan Nights, The* (Rook) 《流氓之夜》(鲁克)
- hooligans 流氓
- Origin of term 术语的来源
- Hoover Herbert 赫勃特·胡佛
- Hoover, J. Edgar J. 埃德加·胡佛
- Hopkins Claude 克劳德·霍普金
- Hopkinson, Tom 汤姆·霍普金森
- Horney, Karen 卡伦·霍尔耐
- Houghton, Stanley 斯坦利·霍顿
- House I live in, The* 《我住的房子》
- Howard, Brian 布莱恩·霍华德
- Howell, William Dean 威廉·迪安·豪威尔
-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Riis) 《另一半人怎样生活》(里斯)
- How to Play Indian* (Seton) 《怎么扮演印第安人》(塞顿)
- How to Write a Popular Song* (Harris) 《如何创作流行歌曲》(哈里斯)
- Hübener, Helmuth 赫尔姆斯·休博内
- Huber, Kurt 库特·胡伯
- Hudson, Dusters 杜斯特斯·哈德孙
- Huetsenbeck, Richard 理查德·赫尔森贝克
- Hughes, Langston 兰斯顿·休斯
- Hughes, Thomas 托马斯·休斯

- Hulbert, Harold S. 哈罗德·S. 霍尔本特
- Hull, E. M. E. M. 赫尔
- Hull House 赫尔大厦
- Hullo Ragtime* 《嗨,拉格泰姆》
- Hulton, Edward. 爱德华·哈尔顿
- Huxley, Aldous 阿尔多斯·赫胥黎
- Huysmans, Jons - Karl 乔伊斯卡尔·于斯曼
- 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Holderlin) 《许珀里翁和在雅典的隐士》(荷尔德林)
- id 本我
- ike “四不像”
- Illustration* 《阐释》
- Image, Selwyn 塞尔温·伊马奇
- images 图像
- immigrants 移民
- Indianapolis. Ind. 印第安纳波利斯
- Indians, American 印第安人
- Individual Delinquent, The*(Healy) 《个体犯罪》(希利)
- individualism 个人主义
-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业革命
- 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工人
-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Freud) 《梦的解析》(弗洛伊德)
- Intolerance* 《忍无可忍》
- Invasion of 1910, The*(Le Queux) 《1910年的入侵》(勒魁克斯)
- Irwin, John P. 约翰 P. 埃尔文
- It*(film) 《它》(电影)
- It*(Glya) 《它》(格林)
- Italy 意大利
- Fascism in 法西斯主义
- futurists in 未来主义者
- It happened in Springfield* 《这发生在斯普林菲尔德》
- Jahn, Friedrich 弗里希德里·杨
- James, Harry 哈里·詹姆斯

- James, Norah C. 诺哈·C. 詹姆斯
- James, William 威廉·詹姆斯
- Jam Session* 《爵士演奏会》
- Janco, Marcel 马塞尔·简柯
- Jansen, Willi 威利·詹森
- Japan 日本
- Atomic bombing of 原子弹爆炸
- Pearl Harbor attacked by 珍珠港被袭
- Japanese Americans 日裔美国人
- Jarrow March 贾罗大游行
- Jaures, Jean 简·饶勒斯
- Jazz Singer, The* 爵士歌手
- Jennings, Humphrey 汉弗莱·詹宁斯
- Jenson, Joyce 乔伊斯·杰森
- Jephcott, pearl 珀尔·杰夫科特
- Je Suis Partout* 《我无处不在》
- jeunes gens d'aujourd'hui, Les* (Agathon) 《今天的年轻人》(阿加松)
- Jeunes Populaires Français 法国青年
- Jeunesse* 《年轻人》
- “Jeunesse” (Rimbaud) 《年轻人》(兰波)
- 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 犹太监护人委员会
- Jewish Lads' Brigade 犹太青年团
- Jim Jam Jems* 《吉姆贾姆杰姆斯》
- Jitterbug* 《摇摆乐迷》
- Jitterbugging 吉特巴舞
- Jive Hive 摇摆舞会
- Jive talk 爵士乐行话
- John Barleycorn* (London) 《大麦约翰》(伦敦)
- Johnson, James Weldon 詹姆斯·韦尔登·约翰逊
- Jolson, AL 艾尔·乔森
- Jones, James 詹姆士·琼斯
- Jones, Kenneth 肯尼思·琼斯
- Joplin, Scott 斯科特·乔普林
- Journal* 《日报》

- Journey End*(Sherriff) 《旅程的终结》
- Joyce, William 威廉·乔伊斯
- Joyson, Hicks William(“fix”) 威廉·乔伊森·海克(吉克斯)
- Jugendschaft* 青年团
- Jung, Carl 卡尔·荣格
- JungdeutscheBund 德国青年团
- Jungdeutschlandbund 德国青年联盟
- Junger, Ernst 厄恩斯特·扬格
- Jungmadel 少女团
- Jungwandervogel 青年候鸟运动
- Junior Police Organization 初级警察组织
- Juvenile Court Act* 《少年法庭法》
- Juvenile delinquency 青少年犯罪
- Juvenile Court Art and* 《少年法庭法》
- Marijuana and 大麻
- Mass media and, 大众传媒
- Movie depictions of 电影
- Teen Canteens and 青少年餐厅
- Juvenile Delinquents: Their Condition and Treatment*(Carpenter) 《少年犯:社会状况和处理方式》  
(卡彭特)
- Juvenile Offenders*(Morrison) 《少年犯》(莫里森)
- Juvenile Organisation Committees 青少年组织委员会
- Kater, Michael 迈克尔·卡特尔
- Katte, Hans Hermann von 汉斯·赫尔曼·冯·卡特
- Keating Owen Act* 《童工法》
- Keats, John 约翰·济慈
- Keller, Helen 海伦·凯特
- Kelly, Florence 弗洛伦斯·凯利
- Kelly, George “Machine Gun” “机枪手”乔治·凯利
- Kelly, Paul 保罗·凯利
- Kempton, Freda 弗丽达·坎佩顿
- Kennedy, Joseph 约瑟夫·肯尼迪
- Kennett, Lee 李·肯尼特

- Key, Ellen 爱伦·凯  
Kid Ory's Brownskin Band 基得·奥赖的棕色皮肤乐队  
Kildare, Owen 欧文·基尔代尔  
Kindred of the Kibbo Kift 伟大力量的证明  
King, Charles 查尔斯·金  
King, Irving 欧文·金  
Kingsley, Francis 弗朗西斯·金斯利  
Kipling, Rudyard 卢迪亚德·吉普林  
Kitchener, Herbert, Lord 赫伯特·基奇纳勋爵  
Kittelsbach Pirates 尼禄泰拉海盗团  
Klemfuss, Harry C 哈里·C.卡勒姆方斯  
Klonoe Amo 阿诺·可隆  
Knight Riders 马上的骑士  
Komsomol 前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  
Krishnamurti, Jiddu 吉杜·克里希纳木尔蒂  
Kristel, John 约翰·克里斯泰尔  
Krupa, Gene 基尼·克鲁帕  
Krupskaya, Nadezhda 娜捷施达·克鲁普斯卡娅  
Kuhn, Fritz Julius 弗里茨·朱利叶斯·库恩  
Ku Klux Klan 三K党  
Kustermann, Rudolf 鲁道夫·库斯特曼
- Labor, organized 劳工组织  
Labour Party 工党  
*Ladies' Home Journal* 《妇女家庭杂志》  
Lafayette Escadrille 拉斐特飞行小分队  
Laine, Jack "Papa" 杰克·“爸爸”·莱因  
Lake, Veronica 维罗妮卡·莱克  
Lancashire, England 兰开夏郡, 英格兰  
Landdienst 国家援助局  
Lang, Fritz 弗里茨·朗  
Langernarck, battle of 兰格马克战役  
Lapham, Lewis H. 刘易斯 H. 拉帕姆  
*Larks* 《云雀》

- LaRocca, Nick 尼克·拉若卡
- La Rochelle, Drieu 德里厄·拉罗歇尔
- Lash, Joseph 约瑟夫·拉什
- Last Enemy, The* (Hillary) 《最后的敌人》(希拉里)
- Last Night of the Barbary Coast, The* 《北非海岸的最后一夜》
- Last of the Mohicans, The* (Copper) 《最后的莫希干人》(库珀)
- Laubreaux, Alain 阿兰·劳伯鲁克斯
- Laughlin, Anna 安娜·拉弗林
- Laver, James 詹姆斯·拉弗
- Lawrence, Florence 弗洛伦斯·劳伦斯
- Lawrence, T. E. T. E. 劳伦斯
-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 Lears, T. J. Jackson T. J. 杰克森·里尔斯
- Le Bon, Gustave 古斯塔夫·勒庞
- Leca, Dominique 多米尼克·莱卡
- Lee, Alfred 阿尔弗莱德·李
- Leen, Nina 妮娜·利恩
- Leeson, Cecil 塞西尔·勒桑
- Left Book Club 左派读书俱乐部
- Leighton, Roland 罗兰·雷登
- Leipelt, Hans 汉斯·雷派尔特
- Leipzig Meuten 莱比锡群
- LeMay, Curtis 柯蒂斯·拉梅
- Lenin,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列宁
- Lennon, John 约翰·列侬
- Leonardo* (Papini) 《莱昂纳多》(帕皮尼)
- Leopold Nathan 内森·里奥波德
- Le Queux, William 威廉·勒魁克斯
- Lerner Max 麦克斯·勒纳
- Lesley, Odette 奥杰塔·乐思
- Lestrangle, W. F. W. F. 莱斯特兰奇
- Let's Dance* 《让我们跳舞吧》
- Lewis, Sinclair; 辛克莱·刘易斯
- Prodigal Parents* 《慷慨的父母》

- Ley, Robert 罗伯特·莱伊
- Leybold, Hans 汉斯·莱堡德
- Liebknrecht, Karl 卡尔·李卜克内西
- Life* 《人生》
- Life with Teena* 《与女青年一起生活的日子》
- Li'l Abner*(Capp) 《莱尔·阿布纳》(凯普)
- Lindner, Robert M. 罗伯特·M.林德纳
- Lindsey, Ben 本·林赛
- Lindy hop 林迪舞
- Lingeman, Richard 理查德·林格曼
- Lippman, Walter 瓦尔特·李普曼
- Little Caesar* 《小霸王》
- "Little Cinderella"(Alexander) 《小小灰姑娘》(亚历山大)
- Little White Bird, The*(Barrie) 《小白鸟》(巴里)
- Llewelyn Davies, Arthur 阿瑟·李维林·戴维斯
- Llewelyn Davies, George 乔治·李维林·戴维斯
- Llewelyn Davies, Michael 麦克·李维林·戴维斯
- Llewelyn Davies, Peter 皮特·李维林·戴维斯
- Llewelyn Davies, Sylvia 西维亚·李维林·戴维斯
- Lloyd George, David 大卫·劳埃德·乔治
- Locke, Alain 艾伦·洛克
- Loeb, Richard 理查·娄波
- Logan, Averil 阿维里尔·洛根
- Loiseau, Jean - Claude 简·克洛德·路易斯
- Lombroso, Cesar 萨切尔·隆布罗索
- London, England 伦敦,英国
- Bombing of 爆炸
- Anti-German violence in 反德国暴力事件
- Blackshirt meeting in 黑衣党员会议
- Crystal Palace 水晶宫
- Jazz in 爵士乐
- Nightlife in 夜生活
- Rainbow Corner in 彩虹角
- Rally in 集会

- Soho 苏豪
- London, Jack 杰克·伦敦
- London's Bad Boys* (Hatton) 《伦敦坏男孩》(哈顿)
- London Tatler 伦敦《塔特雷》
- Lond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伦敦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
- Long, H. Kingsley H. 金斯利·朗
- Long. Huey 休伊·朗
- Look* 《展望》
- Loom of Youth, The* (Waugh) 《青年的隐现》(沃)
- Lorance, Stefan 斯蒂凡·洛伦
- Los Angeles, Calif 洛杉矶,加利福尼亚
- Lost Generation, The* (Brown) 《迷惘的一代》(布朗)
- Louis, Joe 乔·路易斯
- Love on the Dale* (Greenwood) 《爱在失业》(格林伍德)
- Love's Coming of Age* 《爱的成年》
- Low, Juliette "Daisy" 茱丽叶·“黛茜”·娄
- Luchaire, Pierre 皮耶罗·吕歇尔
- Luneford, Junnie 吉米·路瑟福特
- Lusitania* “路西塔尼亚”号
- Luxembo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 lynching 私刑
- Lynd, Robert S. and Helen Merrell 罗伯特·S. 林德和海伦·莫瑞尔
- McAlmon, Robert 罗伯特·麦克阿尔蒙
- McArthur, Alexander 亚历山大·麦克阿瑟
- McCloskey, Mark 马克·麦克克洛茨基
- McCluskey, Howard 霍华德·麦克鲁斯基
- Machine age 机器时代
- McKay, Claude 克劳德·麦凯
- McKernan, Maureen 莫琳·麦肯南
- McLaren, Malcolm 马尔科姆·麦克拉伦
- MacNeice, Louis 路易斯·麦克尼斯
- McWilliams, Carey 凯里·麦克威廉姆斯
- Mademoiselle Swing* 《摇摆小姐》

- Madge, Charles 查尔斯·马奇
- Mafeking Cadet Corps 马弗京学生军训队
- 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 (Crane) 《街头女郎梅姬》
- Magnet* 《磁石》
- Malcolm X 马尔科姆·艾克斯
- Malleson, Miles 迈尔斯·马里逊
- Malraux, Andre 安德烈·马尔罗
- Manchester, England 英格兰曼彻斯特
- Manda (Joseph Pleigneur) 曼达(乔瑟夫·普莱奥)
- Manhattan. See New York, N. Y. 迈哈顿, 见纽约
- Manifest Destiny* (Fiske) 《天定命运》(费斯克)
- Manifestoes 宣言
- Mann, Erika 俄里卡·曼恩
- Mann, Thomas 托马斯·曼
- Mannm, Ethel 伊瑟尔罗·曼宁
- "Maple Leaf Rag" (Joplin) 《槭树叶散拍乐》(乔普林)
- Marijuana 大麻
- Marinetti, E. T. E. T. 马里内蒂
- Marketing, see *advertising* 市场, 见广告
- Marks, Percy 波希·马科斯
- Marriage 婚姻
- Marsh, Edward 爱德华·马什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 Marxveldt, Cissy van 西西·范·马克斯维尔特
- Mashmann, Melita 梅丽塔·玛舒曼
- Masses* 《大众》
- Mass media* 《大众传媒》
- Mass - Observation 大众观察
- Mass - Observation Weekly Report* “大众观察”每周报道
- Mass production 批量生产
- Mass society 大众社会
- Massis, Henri 亨利·迈西斯
- Materialism 唯物主义
- Mathiez, Albert 阿尔伯特·马蒂兹

- Matin 马丁  
 May, Karl 卡尔·梅  
 May Report 五月报告  
 Mayhew, Henry 亨利·马修  
 Mead, Margaret 玛格瑞特·米德  
 Means test 经济情况调查  
 Media. *see mass media* 媒介,见大众传媒  
 Medicines, patent 药品,专利  
 Mengele, Josef 乔瑟夫·门格尔  
 Mentre, Francois 夫莱斯瓦·蒙特  
 Metro-Goldwyn-Mayer 米高梅公司  
 Metronome 《节拍器》  
 metropolis 《大都市》  
 Mexican Americans 墨西哥美国人  
 Meyer, Agnes 阿格尼斯·梅尔  
 Meyers, Joan 琼·梅尔斯  
 Michaelis, Kurt "Hot-Geyer" 库尔特“热情的盖尔”米夏埃利斯  
 Middletown: A study in American Culture (Lynd and Lynd) 《米德尔镇:美国文化研究》(林德夫妇)  
 Miss America 《美国小姐》  
 Mitchell, Jim 吉姆·米歇尔  
 militarism 军国主义  
     Apocalypse and 启示录  
 Military training and service 军事训练和服务  
 Millen, Horace H. 贺拉斯·H.米伦  
 Miller, Alice 爱丽丝·米尔斯  
 Miller, Arthur 阿瑟·米尔斯  
 Miller, Glenn 格伦·米尔斯  
 Mills, Florence 弗洛伦斯·米尔斯  
 Minehan, Thomas 托马斯·迈汉  
 Miner (Boden) 《矿工》(波顿)  
 Minstrelsy 吟游诗人  
 Mint, The (Lawrence) 《薄荷》(劳伦斯)  
 Miranda, Carmen 卡门·米兰达

- Mitchell, Jim 吉姆·米歇尔
- Mitford, Diana 戴安娜·米特福德
- Mitford, Jessica 杰西卡·米特福德
- Mitford, Urtity 尤内蒂·米特福德
- Modernism 现代主义
- Mods 摩登派
- Mohr, Hal 霍·摩尔
- Moline, Ill. 伊利诺斯莫林
- Montgomery Guard “蒙哥马利警卫”
- “A Growler Gang in Session”( Riis) 《啤酒桶党的会议》(里斯)
- Montherlant, Henti 亨利·蒙泰朗
- Moore, Colleen 科琳·莫
- Moore, Geoff 杰夫·摩尔
- Morality 道德
- Futurists and 未来派画家
- In Germany after World War I 在一战后的德国
- Horney and 霍尔奈
- London nightlife and 伦敦夜生活
- Music and dancing and 音乐和舞蹈
- Neo-Pagans and 新异教徒
- Prohibition and 禁酒法案
- Morel, B. A. B. A. 莫雷
- Morgan, J. P. J. P. 摩根
- Morgue*( Liewelyn Davies) 《太平间》(李维林·戴维斯)
- Morphine 吗啡
- Morris, William 威廉·莫里斯
- Morrison, W. Douglas W.道格拉斯·莫里森
- Mosley, Oswald 奥斯瓦德·摩兹利
- Mother Goose in Prose*( Baum) 《鹅妈妈童谣》(鲍姆)
- movies 电影
- actors in 演员
- childcare and 照料孩子
- censorship of 审查机构
- college genre 大学生类型

- Flaming Youth* 《烈火青年》
- gangster 匪徒
- low - budget 低成本
- morality 道德
- Our Hearts were Young and Gay* 《我们有颗年轻愉快的心》
- The public Enemy* 《国民公敌》
- sex 性
- The Sheik* 《酋长》
- Muller, Thorsten 托斯顿·穆勒
- Munich, Germany 慕尼黑, 德国
- Murger, Henri 亨利·穆杰
- Murrow, Ed 爱德华·莫罗
- muscular Christianity 肌肉发达的基督教徒
- music 音乐
- blues 布鲁斯
- dancing 舞蹈
- drugs 毒品
- early growth of industry 工业的早期发展
- jazz 爵士
- ragtime 拉格泰姆
- swing, see swing music and dancing 摇摆乐, 见摇摆乐和摇摆舞
- Musil, Robert 罗伯特·穆西尔
- Mussert, Anton 安东·马瑟特
-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 Myrdal, Gunnar 冈纳·缪达尔
- Myers, Charles 查尔斯·迈尔斯
- Myth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Rosenberg) 《20 世纪的神话》(罗森伯格)
- Nagasaki 长崎
- Napoo gang “纳普”帮
-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 有色人种进化国民协会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NAM) 全国制造商协会
- 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 全国童工委员会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 futurists and 现代派画家
-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Education 全国职业教育促进会
- National Student Federation 美国学生联盟
- National Unemployed Workers' Movement 全国失业劳工运动
-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NYA) 全国青年总署
- National Youth Committee 国家青年委员会
- Nation in Arms, The*(Von der Goltz) 《全民武装》(冯·格尔茨)
- Native Son*(Wright) 《土生子》(怀特)
- Nazi Germany, see Germany, Nazi 纳粹德国,见德国,纳粹
- Neems, Clarence 克拉伦斯·尼姆斯
- Negroes 黑人
- Negro March on Washington Committee 黑人游行华盛顿委员会
- Negro Youth at the Crossways*(Frazier) 《十字路口的黑人青年》(弗雷泽)
- Neo-Pagans 新异教徒
- futurists and 未来主义者
- Nerother 尼禄泰拉海盗团
- Netherlands 荷兰
- Neupfadfinder 新探险者
- Newbolt, Henry 亨利·纽博尔特
- New Deal 新政
- New Negro, The*(Locke) 《新黑人》(洛克)
- New Orleans, La. 新奥尔良
- New Romantics 新浪漫主义者
- News from Nowhere*(Morris) 《无处不在的新闻》(莫里斯)
- 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
- New Student* 《新学生》
- Newsweek* 《新闻周刊》
- Newton, Francis 弗兰西斯·牛顿
- New Woman 新女性
- New York, N. Y., 纽约纽约
- Café Society in 上流社会
- Harlem 哈莱姆
- homeless in 无家可归的人
- New York Daily Mirror* 《纽约每日镜报》

- New York Daily News* 《纽约每日新闻》  
 New York House of Refuge 纽约避难所  
 New York Juvenile Asylum 纽约少年收容所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纽约时代杂志》  
 New York World's Fair 纽约世博会  
 Nichols, Beverley 贝弗利·尼科尔斯  
 nickelodeons 五分钱影院  
 Nietzsche, Friedrich 弗里希德里希·尼采  
*Nigger Heaven*(Van Vechten) 《黑鬼天堂》(范·维克腾)  
 Nijinsky, Vaslav 瓦斯拉夫·尼金克斯  
*1914*(Brooke) 《1914》(布鲁克)  
 Nisei 第二代日裔美国人  
*No Mean City*(McArthur and Long) 《重要的城市》(麦克阿瑟和朗)  
*No-No boy*(Okada) 《别,别,孩子》(冈田)  
*No Orchids for Miss Blandish*(Chase) 《布兰迪斯小姐的兰花》(杰兹)  
 Nordau, Max 迈克斯·诺尔道  
 Norman, Lucy 露西·诺曼  
 Normand Mabel 梅布尔·诺曼德  
 Norvo, Red 莱德·诺瓦  
 "Note on Jean Arthur Rimbaud, A"[Action] 《解读让·阿尔图尔·兰波》(艾克顿)  
*Notre jeunesse*(Péguy) 《我们的青年》(佩吉)  
 Nugent, Richard Bruce 理查·布鲁斯·努京特  
 Nuremberg Decree 纽伦堡法令  
 Nuremberg Stadium 在纽伦堡体育场  
  
 O'Brien, Brian 布莱恩·欧布莱恩  
 occult 玄秘  
 Oedipus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结  
 Office of Community War Services 社区战争服务办公室  
 Ogle, Harry 哈里·奥格  
 Okada, John 约翰·冈田  
 "Old Vicarage, Grantchester, The"(Brooke) “古老的歌兰切斯特教区牧师的住宅”(布鲁克)  
 Oliver, Joe "king" 乔·“金”·奥利弗

Oliver sister 奥利弗姐妹

Olympia 奥林匹亚

*Olympiad: Fest der Schönheit* 《奥林匹克:美丽的节日》

Omodeo, Adolfo 安多洛夫·奥莫迪欧

*On Hobos and Homelessness* 《论流浪和无家可归》

"On the Move: Generation Without Farewell" (Bozchert) 《漂泊不定:没有别离的一代》(博尔歇特)

Opium 鸦片

Order of the White Feather "白羽毛规则"

Order of Woodcraft Chivalry "森林侠义秩序"组织

Original Dixieland Jazz Band(ODJB) "原创狄克西兰爵士乐队"

Ortegay Gasset, José 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

Orwell, George 乔治·奥威尔

*Our Children Face War*(Wolf) 《我们的孩子面对战争》(沃夫)

*Our Hearts Were Young and Gay* 《我们有颗年轻愉快的心》

*Our Movie-Made Children*(Forman) 《电影制造的孩子》(福尔曼)

outlaw hero 英雄罪犯

*Out of Bounds manifesto* 《越轨》声明

"Outstanding lckies" 《杰出乐迷》

Owen Wilfred 威尔弗雷德·欧文

Owens, Jesse 杰西·欧文斯

Oxford Generation 牛津一代

Oxford Group 牛津派

Oxford Union 牛津联盟

Oxford Working Men's and Lads' Institute 牛津劳动人民和青年协会

Paganism 异教徒

Neo-pagans 新异教徒

Technology 科技

Page, Ellen Welles 艾伦·威尔斯·巴芝

Panagopoulous, Andreas 安德雷斯·潘那高普罗斯

Pantomime 哑剧

Papini, Giovanni 乔万尼·帕皮尼

Parents 父母

- Teen Commandments 青少年十诫
- Parents 《父母》
- Paris France 法国巴黎
- fall 沦陷
- survey of young men in 青年人的调查
- Paris Commune 巴黎公社
- Parker, Bonnie 邦尼·帕克
- Parsons, Talcott 塔尔科特·帕森斯
- Parties( Van Bechten) 《聚会》(范·维克腾)
- Partying 开派对
- at Four Arts Ball 在“四艺术舞会”
- patent medicines 专利药物
- Patterson, Haywood 海伍德·帕特森
- Paul, Leslie 莱斯利·保罗
- Paulus,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
- Pearl Harbor 珍珠港
- Pearson, C. Arthur C.阿瑟·皮尔森
- Pearson, Geoffrey 杰弗里·皮尔森
- peer culture 同龄人文化
- Péguy, Charles 查尔斯·佩吉
- Pels, Hermann and Auguste van 赫曼和奥格斯特·范·派尔斯
- Pels, peter van 彼得·范·派尔斯
- Pemberton Billing case 潘波图诽谤案
- penny dreadfuls “廉价恐怖小说”
- Penrod(Tarkington) 《彭德罗》(塔金顿)
- Pepper Committee 评论委员会
- Perel, Solomon(Josef Perjell) 所罗门·帕瑞尔(乔瑟夫·珀杰尔)
- Perrot, Michelle 米歇尔·佩罗
- Pershing, John 约翰·珀欣
- Personality in Its Teens(Boorman) 《其少年的个性》(布尔曼)
- Pestalozzi, Johann Heidrich 约翰·亨利希·裴斯泰洛齐
- Pétain, Philippe 菲利普·贝当
- Peter Pan(Barrie) 《彼得·潘》(巴里)
- Pfeffer, Fritz 弗里兹·派弗尔

*Photoplay* 《电影剧本》

“Phrases and Philosophies for the Use of the young”(Wilde) 《青年人运用的短语和人生观》(王尔德)

phrenology 颅相学

*Pic* 《画报》

Pickering, Ruth 鲁斯·匹克林

Pickford, Mary 玛丽·璧克馥

*Picture of Dorian Gray, The*(Wilde) 《道林·格雷的画像》(王尔德)

*Picture Post* 《画报》

pin-ups 偶像裸照

Pius XI, Pope 教皇碧岳十一世

*Plastic Age, The*(Marks) 《塑料世代》(马科斯)

Plato 柏拉图

Pleigneur, Joseph(Manda) 乔瑟夫·普莱奥(曼达)

Poe, 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坡

*Poetes maudits, Les* 《被诅咒的诗人》

poetry 诗歌

Poland 波兰

politics 政治

extremist 极端主义者

Gallup 盖洛普

Mass-Observation 大众观察

Pomeroy, Jesse, xv 杰西·波默罗伊

pop culture 流行文化

Popert, Hermann 赫尔曼·鲍勃特

Popular Front 人民阵线

Porter, Edwin 爱德文·波特

Poustie, Robert 罗伯特·普斯提斯

Pratt, Leonard 里奥纳多·普拉特

pregnancy 怀孕

Price, Victoria 维多利亚·普赖斯

Priestly, J. B. J. B. 普里斯里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大学

Princip, Gavrilo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Printer's Ink* 《油墨》

Probst, Christl 克里斯托福·普罗普斯特

*Prodigal Parents*(Lewis) 《慷慨的父母》(刘易斯)

progressives 进步人士

Prohibition(Volstead Act) 禁酒时期(沃尔斯特德法案)

*Propaganda*(Bernays) 《宣传》(伯尼斯)

prostitution 卖淫

male 男妓

Prussia 普鲁士人

France's war with 法国战争

Psichari, Ernest 欧内斯特·普希卡里

psychology 心理学

Child Study movement 儿童研究运动

Freud and, see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见西格蒙·弗洛伊德

Leopold and Loeb and 里奥波德和娄波

*Psychology of Advertising, The*(Scott) 《广告心理学》(司格特)

psychopaths 精神病患者

puberty 发育期

*Public Enemy, The* 《国民公敌》

*Public Order Act* 《公共秩序法》

Pullen, Ted 泰德·普勒

punk scene 朋克事件

Pyle, Ernie 厄尼·派尔

Quaker Oats 桂格燕麦

Queensberry, John Douglas, Marquess of 约翰·道格拉斯·昆斯伯里侯爵

*Quest for Truth, The*(Freston) 《追求真理》(弗里斯顿)

race and racism 种族和种族主义

Nazi and(see also blacks) 纳粹(还可参见黑人)

Radiguet, Raymond 瑞蒙德·瑞迪戈特

*Ragged Dick*(Alger) 《衣衫褴褛的迪克》(阿尔杰)

ragtime 拉格泰姆

railways, transients and 铁路, 流浪者

- Rainbow Corner 彩虹角俱乐部
- rationing 配给
- Rauhut, Karma 卡玛·劳胡特
- Raverat, Gwen 葛温·拉弗拉特
- Raverat, Jacques 雅克·法弗拉特
-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 Realities of War, The*(Gibbs) 《战争的真相》(吉布斯)
- Rebatet, Lucien 吕西安·勒巴泰
- Rebel Without a Cause*(Lindner) 《无原的叛逆》(林德纳)
- Red Falcons 红色猎鹰
- Reefer Madness* 《君为毒狂》
- reforms 改革
- Regeneration 再生
- Reichskulturkammer 帝国文化协会
- Reinhardt, Hans 汉斯·莱因哈特
-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圣教书会”
- Remarque, Erich Maria 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
- Revolt of the Masses, The*(Ortegay Gasset) 《大众的叛变》(奥特嘉·伊·加塞特)
- Revolution*(Leybold) 《革命》(莱堡德)
-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革命运动
- Rhapsody in Blue*(Gershwin) 《蓝色狂想曲》
- Rice, Stuart A. 斯图尔特·A.赖斯
- Rice Krispies 脆玉米片
- Richards, Frank 弗兰克·理查德
- Richter, Hans 汉斯·里希特
- Riddle of the Sands, The*(Childers) 《时间的谜题》(奇尔德斯)
- Riefenstahl, Leni 莱妮·瑞芬斯塔尔
- Riis, Jacob 雅各布·里斯
-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另一半人怎样生活》
- “A Growler Gang in Session” “啤酒桶党的会议”
- Rimbaud, Arthur 阿尔图尔·兰波
- “Guerre” 《战争》
- Roberts, Frederick, Lord 弗雷德里克·罗伯特勋爵
- Roberts, Robert 罗伯特·罗伯茨

- Robeson, Paul 保罗·罗伯逊
- Robey, George 乔治·罗比
- Robinson, Edward G. 爱德华·G. 罗宾逊
- Roche-grosse, Georges Antoine 乔治·安东尼·罗彻格罗斯
- Rockefeller, John D. 约翰·D. 洛克菲勒
- rock music 摇滚乐
- Rollinat, Maurice 毛利斯·罗里纳特
- Rollini, Art 阿瑟·罗利尼
- Romantics, xvii 浪漫主义
- Horney 霍耐
- Romilly, Esmond 埃斯蒙德·罗米利
- Romilly, Giles 贾尔斯·罗米利
- Romilly, Jessica Mitford 罗米利, 杰西卡·米特福德
- Rook, Clarence 克拉伦斯·鲁克
- Rooney, Mickey 米基·鲁尼
- Roosevelt, Eleanor 埃莉诺·罗斯福
- 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 Roosevelt, Theodore 西奥多·罗斯福
- Rosebery, Archibald Primrose, Lord 阿奇博尔德·普林罗斯·罗斯伯里勋爵
- Rosenberg, Alfred 阿尔弗莱德·罗森伯格
- Rosie the Riveter 女子铆钉工
- ROTC(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 美国后备军官训练队
- Rote Stosstrupp 红色冲锋队
- Rothstein, Arthur 阿瑟·罗思坦
- Rousseau, Jean-Jacques 让·雅克·卢梭
- Confessions* 《忏悔录》
- Emile* 《爱弥儿》
- Rowntree, Seebohm 西伯姆·朗特里
- R. U. R. (Capek) 《R. U. R.》(恰佩克)
- Russell, Bertrand 伯特兰·拉塞尔
- Russell, Charles 查尔斯·拉塞尔
- Russia 俄国
- Bolshevik revolution in 布尔什维克革命
- German pact with 与德国的条约

youth organizations in 青年组织

Ryerson, Florence 佛罗伦萨·瑞尔森

*Sacre du printemps, Le* 《春之祭》

St. Johns, Adela Rogers 阿德拉·罗杰·圣约翰

St. Louis, Mo. 莫·圣路易斯

*Saison en enfer, Une* (Rimbaud) 《地狱之季》(兰波)

Saki 萨奇

*Sales Management* 《销售经营》

Salvation Army 救世军

Samoa 萨摩亚

San Francisco, Calif. 旧金山

Sanger, Margaret 玛格瑞特·塞格

Sante, Luc 卢克·桑提

Sari 萨丽

Sartre, Jean - Paul 让·保罗·萨特

Sassoon, Siegfried 齐格弗里德·萨松

*Saved by the Juvenile Court* 《少年法庭的拯救》

Savoy Ballroom 萨瓦舞厅

Sbarbaro, Tony 托尼·萨巴罗

*Scenes de la vie de Boheme* (Murger) 《波希米亚生活》

Scheel, Tommie 托米·谢尔

Schell, Sherril 薛里尔·谢尔

Schink, Bartel 巴特尔·辛克

Schirach, Baldur von 巴尔杜·冯·席腊赫

schizophrenia 精神分裂症

Schloss, Eva 伊娃·施罗斯

Schmelzer, George 乔治·舒梅尔泽

Schmorell, Alexander 亚历山大·施莫雷尔

Schnibbe, Karl - Heinz 卡尔·亨兹·史尼布

*Scholastic* 《学生杂志》

Scholl, Hans 汉斯·绍尔

Scholl, Inge 英格·绍尔

Scholl, Sophie 索菲·绍尔

- School for Barbarians*(Mann) 《野蛮人的学校》(曼恩)
- schools and education 学校和教育
- college 学院
- Depression and 经济萧条
- gender segregation in 性别隔离
- 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 and 全国青年总署
- Nazi policies on 纳粹政策
- New Deal policies and 新政政策
- sex education 性教育
- Schwarze Korps* 《黑色军团》
- Scotland 苏格兰
- Glasgow 格拉斯哥
- Scott, Walter Dill 沃尔特·迪尔·斯科特
- Scottsboro Boys 斯科茨伯勒男孩
- Scout, The* 童子军
- Scouting for Boys*(Baden - Powell) 《男孩的童子军活动》(巴顿 - 鲍威尔)
- scouting movement 童子军运动
- scuttlers 斗殴少年
- Seeger, Alan 阿兰·西格
- segregation 种族隔离
- Selective Service Bill 征兵选拔提案
- Senior Service Scouts 高级服务童子军
- Seton, Ernest Thompson 欧内斯特·汤普森·塞顿
- Sevano, Nick 尼克·斯瓦诺
- Seventeen* 《17岁》
- Seventeen*(Tarkington) 《17岁》(塔金顿)
- Seventeenth Summer*(Daly) 《第十七个夏天》(戴利)
- Sex Pistols 性手枪
- Sexual Inversion*(Ellis) 《性倒错》(埃利斯)
- sexuality 性
- contraception and 避孕法
- dating 约会
- GIs and 美国兵
- homosexuality 同性恋

parenting 父母的养育

petting 爱抚

premarital sex 婚前性行为

swing culture and 摇摆乐文化

venereal disease and 性病

Sexual Science Institute 性学研究所

Shaw, Artie 阿蒂·肖

*Sheik, The* 《酋长》

sheiks 酋长

Shelley, Percy 珀西·雪莱

Shephard, Ben 本·谢珀德

Sherriff, R. C. R. C. 舍里弗

Shields, Larry 拉里·谢尔德

Shirer, William L. 威廉 L. 夏伊勒

*Shot Full*(Chester) 《全景拍摄》(切斯特)

Sidney, Philip 菲利浦·西德尼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s History"(Turner) "美国边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纳)

Sinatra, Frank 弗兰克·辛纳屈

racial tolerance promoted by 推动种族包容

"Sing Sing Sing" 《唱、唱、唱》

slavery, white 白奴

*Sleeveless Errand*(James) 《白白受累》(詹姆斯)

*Sister Carrie*(Dreiser) 《嘉莉妹妹》(德莱塞)

Sitwell, Osbert 奥斯博·斯特维尔

Sitwell, Sacheverell 撒切维瑞尔·斯特维尔

*Sketch* 《素描》

Sklow, Henry 亨利·斯克罗

"Sleepy Lagoon" case "沉寂环礁湖"案

slum children 贫民窟的孩子们

Smith, Bessie 贝西·史密斯

Smith, Betty 贝蒂·史密斯

Smith, William 威廉·史密斯

"Smoke, Lilies and Jade"(Nugent) 《烟、百合和玉器》(努京特)

- social Darwinism 社会达尔文主义
-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PD) 社会民主党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 Woodcraft Folk and “森林生活知识团”
- Socialist League 社会主义联盟
- Socialist Worker Youth 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
- Social Purity Movement 社会整风运动
- sociological novels 社会学小说
- Socrates 苏格拉底
- Somers Town Boys 苏莫斯小镇男孩
- Sons of Daniel Boone 丹尼尔·布恩之子
- Sorley, Charles 查尔斯·索雷
-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 The* (Goethe) 《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
- Soule, George 乔治·索尔
- soul revolution 心灵解放
-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The” (Wilde) “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王尔德)
- Southwark Cadet Corps 南渥克军官学
- Soviet Union 苏联
- Spain, civil war in 西班牙内战
- Spargo, John 约翰·斯帕格
- Spencer, Herbert 赫伯特·斯宾塞
- Spender, Stephen 斯蒂芬·斯本德
- Spirit of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 The* (Addams) 《青年精神和城市街道》(亚当斯)
- spiritualism 唯心论
- spivs “懒汉”
- sports culture 体育文化
- Spring Awakening* (Wedekind) 《春天的觉醒》(魏德金)
- SS 党卫军
- Panzer Division Hitlerjugend 党卫军“希特勒青年”装甲师
- Stalin, Joseph 约瑟夫·斯大林
- Stalingrad 斯大林格勒
- Stalky & Co. (Kipling) 《斯托基公司》(吉卜林)
- Standard Oil Company 标准石油公司
- Starke, Barbara 芭芭拉·斯达克

Stead, W. T. W. T. 斯蒂德

Stevenson, Elizabeth 伊丽莎白·斯蒂文森

Stopes, Marie 玛丽·斯特普

*Storm of Steel, The* (Junger) 《钢铁风暴》(荣格)

*Story of a Bad Boy, The* (Aldrich) 《坏男孩的故事》(奥尔德里奇)

Stravinsky, Igor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Street, Julian 朱利安·斯特里特

Streifendienst 巡逻队

Stres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

*Strike the Father Dead* (Wain) 《打死父亲》(韦恩)

*Studien uber Hysterie* (Freud and Breuer) 《歇斯底里研究》(弗洛伊德和布罗伊尔)

*Studs Lonigan trilogy* (Farrell) 《斯塔兹·朗尼根三部曲》(法雷尔)

Stulpnagel, Otto von 奥图·冯·司徒普纳格

*Subaltern's War, A* (Carrington) 《皇家陆军中尉的战争》(克林顿)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Hebdige) 《亚文化:时尚的含义》(何柏第)

sub-debs 社交界新人

Sudetenland 苏台德区

*Suicide, Le* (Duekheim) 《自杀》(涂尔干)

suicides 自杀

*Sunday Chronicle* 《星期天记事报》

Swing 摇摆乐

*swing music and dancing* 摇摆乐和摇摆舞

*segregation and* 种族隔离

Symes, Lillian 莉莉安·塞姆斯

Syndicalists 工团主义者

Tarkington, Booth 布斯·塔金顿

penrod 《彭德罗》

*Tat, Die* 《这些行为》

Taussig, Charles W. 查尔斯·W. 陶西格

Taylor, Freddy 弗莱蒂·泰勒

Taylor, Frederick W. 菲特烈·W. 泰勒

technology 科技

futurists and 未来派画家

- paganism 异教
- Tecumseh 特库姆塞
- teddy boys 泰迪男孩
- Teenage* 《青少年》
- “Teen-Age Bill of Rights, A” “青少年权利法案”
- “teenager,” coining of word, xv, xviii “青少年”一词的创造
- Teen Canteens 青少年俱乐部
- Teen - Timers Inc 青少年岁月有限公司
- Teen Trouble* 《青年问题》
- Temple, Shirley 秀兰·邓波儿
- Temporary Emergency Relief Act 临时救济法案
- Tencza, Josephine 约瑟芬·坦克泽
- Tennant, David 大卫·坦纳特
- Tennant, Stephen 斯蒂芬·坦纳特
- Ten Thousand Public Enemies*(Cooper) 《万人公敌》(库珀)
- Terkel, Studs 斯特兹·特克尔
- Thanatos 死的愿望
- That Grim Act Parricide*(Waugh) 《冷酷弑父》(沃)
-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The*(Veblen) 《有闲阶级理论》维布伦
- Theosophy 接神论
- This Island Race*(Newbolt) 《岛屿之争》(纽博特)
- This Side of Paradise*(Fitzgerald) 《人间天堂》(菲茨杰拉德)
- Thomas, Olive 奥立弗·托马斯
- Thrasher, Frederic M. 弗雷德里克·M. 思拉舍
- Thurman, Wallace 华莱士·瑟曼
- Time* 《时代》
- Times*(London) 《泰晤士报》(伦敦)
- Tin Pan Alley 廷潘小巷
- Tom Brown's Schooldays*(Hughes) 《汤姆布朗求学记》(休斯)
- Tommy Gallagher's Crusade*(Farrell) 《汤米·盖拉格的圣战》(法雷尔)
- totalitarianism 极权主义
- “To the Young Writers and Aartists Killed in the war: 1914—1918”(Howard) 《献给死于1914—1918 战争中的年轻作家和艺术家》(霍华德)
- Toynbee Hall 汤恩比馆

- Tracy, Spencer 史宾塞·屈塞
- Trade Union Congress 英国总工会
- Traffic in Souls* 《灵魂的交易》
- trains, transients and 火车,流浪者
- Tramp, The* 《流浪汉》
- transients and homeless 暂时居住者和无家可归者
- Treaty of Versailles 凡尔赛和约
- Tree Grows in Brooklyn, A* (Smith) 《在布鲁克林长大的树》(史密斯)
- Tribby* (du Maurier) 《特里尔比》(杜·毛瑞埃尔)
- Trip to Chinatown, A* 《中国城之旅》
- Triumph of the Will* 《意志的胜利》
- Trotsky, Leon 里昂·托洛茨基
- Trowbridge, John T. 约翰·T.特罗布里奇
- True* 《真实》
- True, Ruth 鲁斯·特鲁
- True Story* 《真实故事》
- Truman, Harry 哈瑞·杜鲁门
- Tulare Migrant Camps 图莱里移民营
-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 Turner, Lana 拉娜·透纳
- Tuthill, Richard S. 理查德·S.塔海尔
- Twelve Million Black Voices* (Wright) 《两百万黑人的声音》(怀特)
- "Two Generations, The" (Bourne) 《两代人》(波恩)
- "200,000 Vagabond Children" (Davis) 《20万流浪儿童》(戴维斯)
- Two Little Savages* (Seton) 《两个小野人》(塞顿)
- Tyler, John E. 约翰·E.泰勒
- Tyler, Parker 帕克·泰勒
- Tyneside 泰恩赛德
- Tzara, Tristan 特里斯坦·扎拉
- Ugland, Richard Maring 理查德·马琳·乌格兰德
- Ukraine 乌克兰
- unemployment 失业问题
- unions, labor 工人联盟

United States 美利坚合众国

American Idea 美国理念

Chicago Exposition as expression of 芝加哥博览会

conformist social structure 国教社会结构

corporatization 公司法人化

Depression 经济萧条

dream economy 梦幻经济

exports from 出口

frontier 边境

military training and service in 军事训练和服役

movie industry 电影产业

music industry 音乐产业

New Deal 新政

Prohibition 禁酒令

stock market crash 证券市场崩溃

swing culture and youth consumerism 摇摆乐文化和青年消费主义

technology 科学技术

unemployment 失业

values shift 价值转换

World War I reparations and 一战赔偿

as young nation 作为年轻的国家

United States Steel Corporation 美国钢铁公司

universities 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芝加哥大学

Unruh, Fritz von 弗里茨·冯·温鲁

"Unusual Young Man, An" (Brooke) 《一个不同寻常的青年》(布鲁克)

*Umom finito, Un* (Papini) 《失败者》(帕皮尼)

Vaccaro, Tony 托尼·瓦卡罗

Vache, Jacques 雅克·瓦彻

Vachell, Horace 贺拉斯·瓦谢尔

Valentine, Helen 海伦·瓦伦丁

Valentino, Rudolph 鲁道夫·范伦铁诺

Vallee, Rudy 鲁迪·瓦利

- Vanderlip, Frank 弗兰克·范德里普  
Van Vechten, Carl 卡尔·范·维克腾  
*Variety* 《综艺》  
*Vatermord*(Bronnen) 《杀父者》(布莱尼)  
Vaughan, F. B. F. B. 沃恩  
Veblen, Thorstein 索尔斯坦·维布伦  
venereal disease 性病  
Verlaine, Paul 保罗·魏伦  
Vichy regime 维希政权  
Victor Talking Machine Company “胜利者留声机”唱片公司  
Victory Girls 胜利女孩  
Vining, Donald 唐纳德·维宁  
“*Vitai Lampada*”(The Torch of Life)(New-bolt) 《生命的火炬》(纽博尔特)  
Voelkel, Martin 马丁·沃格凯勒  
*Vogue* 《时尚》  
Volstead Act(Prohibition) 沃尔斯特德法案(禁酒时期)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志愿者组织  
Von der Goltz, Colmar 科玛·冯·格尔茨  
Vooros, Helen 海伦·瓦罗斯  
*Vortex, The*(Coward) 《漩涡》(科沃德)  
vorticists 漩涡主义者  
Vortrupp 先驱  
voting 选举
- Waffen-SS 武装党卫军  
Wain, John 约翰·韦恩  
Walker, Clement 克莱蒙特·沃克  
Wall, Warren 沃伦·沃尔  
Wallace, Henry 亨利·华莱士  
Walsh, Raoul 拉乌尔·沃什  
*Wanderer Between Two Worlds, A*(Flex) 《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流浪者》(弗莱克斯)  
Wanderverein 远足协会  
*Wandervogel*, xvii 候鸟运动  
futurists and 未来派

- Wandervogel, Der* “候鸟运动”
- Wandervogel Deutscher Bund* “候鸟运动”德国联盟
- war: 战争:
- change in nature 天性的改变
- futurists 未来派
- memoirs 回忆录
- Ward, Helen 海伦·华德
- Washington, Booker T. 布克·T. 华盛顿
- Wasted Lives*(Lestrangle) 《废弃的生灵》(莱斯特兰奇)
- Waste Land, The*(Eliot) 《荒原》(艾略特)
- Waugh, Alec 亚历克·沃
- Waugh, Evelyn 伊芙琳·沃
- Way of Sacrifice*(Unruh) 《牺牲的方法》(温鲁)
- “*Way the World Ends, The*”(Clark) 《世界结束的方式》(克拉克)
- We*(Zamyatin) 《我们》(扎米亚京)
- Webb, Chick 切克·韦伯
- Wedekind, Frank 弗兰克·魏德金
- Weegee 维加
- Weimar Republic 魏玛共和国
- Weintraub, Stefan 斯特芬·温特劳布
- Wells, H. G. H. G. 威尔斯
- Werewolves 狼人青年团
- West, Arthur Graeme 亚瑟·格雷姆·韦斯特
- Westlake, Ernest 欧内斯特·威斯特莱克
- Westwood, Vivienne 薇薇恩·韦斯特伍德
- Wheeler, Wayne 韦恩·惠勒
- When Truth Was Treason*(Schnibbe) 《当真相是背叛》(史尼布)
- Where Are Your Children?* 《你们的孩子呢?》
- Where Does the Young Generation Stand?* (Eschmann) 《年轻一代站在哪边》(施曼)
- White, William 威廉·怀特
- White Knights 白色骑士
- Whiteman, Paul 保罗·怀特曼
- White Rose 白玫瑰组织
- Fellow Fighters in the Resistance!* “抵抗运动中的战斗伙伴们!”

Whyos “哇 - 哦”(帮派名)

wide boys 野孩子

Wightman, Richard 理查德·惠特曼

Wild Cliques 野蛮团伙

Wilde, Oscar 奥斯卡·王尔德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道林·格雷的画像》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社会主义下的灵魂》

Wilhelm II, Kaiser 凯撒·威廉埃

Willan, William 威廉·维兰

Willey, Malcolm 马尔科姆·威利

“Willie the Weeper” 《哭泣者威利》

*Winesburg, Ohio*(Anderson) 《俄亥俄州的温尼斯博格》(安德生)

Winter, Rootje de 卢杰·德·文特

Wintringham, Tom 汤姆·温特林厄姆

*Wizard of Oz, The* 《绿野仙踪》

Wobbe, Rudi 鲁迪·沃博

Wohl, Robert 罗伯特·沃尔

Wolf, Anna 安娜·沃夫

*Woman's Home Companion* 《妇女家庭伴侣》

Woodcraft Folk “森林生活知识团”

Woodcraft Indians 印第安森林人

Woolf, Edgar Allan 埃德加·爱伦·伍尔夫

Wordsworth, William 威廉·华兹华斯

Worktown project 博尔顿的工作镇项目

World Court 国家法庭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哥伦比亚世博会

World's Fair 世界博览会

World War I 一战

casualties 伤亡

civilians 平民

Europe in years following 战后欧洲

opposition 相对

psychological effects 精神影响

reparations owed to U. S. after 战后美国赔款

## World War II 二战

American isolationism and 美国孤立主义

atomic bomb 原子弹

D - Day 进攻日

German occupation of France in 德国占领法国

German surrender in 德国投降

history of youth culture 青年文化历史

Japanese surrender in 日本投降

Pearl Harbor in 珍珠港

poll on youth's attitude to 对青年态度的调查

sexuality 性行为

Wright, Richard 理查德·怀特

Wundt, William 威廉·冯特

Wurche, Ernst 厄恩斯特·沃驰

Wyndham Lewis, Percy 珀西·温德姆·刘易斯

Wyneken, Gustav 维内肯·古斯塔夫

## Yank 美国佬

*You Can't Win*(Black) 《你不可能赢》(布莱克)

*Young Anarchy*(Gibbs) 《年轻的无政府主义》(吉布斯)

*Young Delinquent, The*(Burt) 《青少年犯罪》(伯特)

*Younger Generation, The*(Houghton) 《年轻一代》(霍顿)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 基督教青年会

Young Pioneers 青年先驱

*Young Torless*(Musil) 《青年朵里斯》(穆西尔)

youth, as abstract concept 作为抽象概念的“青年”

*Youth and Life*(Bourne) 《青年和人生》(伯恩)

*Youth and the City Streets*(Addams) 《青年和城市街道》(亚当斯)

youth culture 青年文化

coining of term 造词

*Youth Never Comes Again*(Calkins) 《青春一去不返》(卡尔金斯)

Youth Pilgrimage on Jobs and Education 要求工作和教育的青年朝圣者

*Youth Runs Wild* 《青年肆虐》

*Youth's Companion* 《青年伙伴》

*Youth Tell Their Story* 《青年讲述自己的故事》

Zachry, Caroline 卡罗琳娜·扎迦利

Zamyatin, Yevgeny 叶文京奈·扎米亚京

Zazous 扎祖--族

Zehrer, Hans 汉斯·齐赫

zoot-suiters 阻特装青年

# 译后记

青春是多么美丽！发光发热，充满了梦幻与理想，青春是书的第一章，是永无终结的故事。

——朗费罗(1807—1882)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泽东(1893—1976)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期，是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然而它同时也是一个最容易被忽视的时期。无论在什么时代，青少年都有形无形地受到成人世界的支配，当成人需要他们服从的时候，他们是儿童；当成人需要他们承担责任的时候，他们竟又“瞬间长大”了。他们一面用激情和梦想谱写美妙的青春乐章，一面用叛逆和冲突砸开通往成人世界的大门。

在中国，近些年来，青少年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开始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青少年作为一个群体被赋予了“80后”或“90后”这样的代称、别名。曾几何时，“超女”、“韩流”和 Hip Hop 成为备受青少年追捧的社会时尚，而沉迷于网络、性开放、吸毒、自杀等等社会问题则被笼统地称为“青少年问题”。

当我们关注国内青少年文化和青少年问题的时候，也许应该认识到青少年文化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新潮”，青少年问题更不是改革开放催生的恶果。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这些问题和现象都曾经出现过，不论采取怎样的方式、怎样的形态，青少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必然会想方设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西方,人们总是把青少年与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思潮联系在一起。1961—1973年间的越南战争对美国当时青少年一代影响至深。其时嬉皮士风行,崇尚所谓的自由开放,于是赌博、吸毒、犯罪、自杀和性开放泛滥一时,这个时期的美国青少年被称为“被毁掉的一代”。然而,青少年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远远早于嬉皮士。乔恩·萨维奇(Jon Savage)的这本《青春无羁:狂飙时代的社会运动(1875—1945)》用丰富的史实回顾了欧美两个大陆青少年社会运动形成和发展的整个历程。

乔恩·萨维奇出生于1953年,原名乔纳森·萨奇(Jonathan Sage)。他是英国著名的作家、播音员和音乐记者,他最有影响的作品是发表于1991年的《英格兰的梦想》,该书至今仍被人们视为记录和分析朋克(punk)音乐的经典之作。

在《青春无羁》这部500多页的鸿篇巨著中,萨维奇通过青少年的视角再现了1875—1945年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对历史进行了新的注解。人们在这本书中,不仅可以通过青少年的眼睛重温熟悉的历史事件,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青年文化的史前史(prehistory)作了深刻的剖析:毒品、性、对长辈的反抗以及各种地下亚文化早已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存在过。

“青少年”这个概念要追溯到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发表于1904年的《青春期》。在书中,霍尔把“青少年”的年龄段界定在14—24岁之间。在他看来,青少年是人生的一个独立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着巨大压力和负担。用卢梭的话来说,青春期对人的情感和精神产生的影响之大不亚于“一次重生”。青春期的“症状”集中表现为“脾气改变、易怒、总是心血来潮”。不论是玛丽·巴什基尔森这样的“天才少女”,还是杰西·波默罗伊这样的“恶魔男孩”,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证明,认为成年期紧随童年期是错误的:他俩作为先驱代表了一个“尚未命名的中间状态”。

L. 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的《绿野仙踪》与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起出现在西方认识青年人的关键时刻,揭开了一个性意识的隐蔽地带;而《彼得·潘》和《道林·格雷的肖像》则用不同寻常的方式预言了一个以年轻人为中心的世纪的到来。

本书描述了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青少年组织,如英国的“童子军”、德国的“候鸟运动”以及后来的“希特勒青年团”等,从中无时不在传递一个重要的信息:青少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需要社会和成人正确的引导,而不是教条和管制。

青少年的影响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明晰可见。在战前的法国,年轻人厌恶上一代人的自由主义,渴望通过战争成为某种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在英国,数百万年轻人为了改写历史自愿加入到军队中。在萨维奇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战争的严酷,更看到了年轻人在战争面前的茫然和绝望。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士兵大多数都是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战争中,上百万的青少年即使没有牺牲自己的生命,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

除了战争,《青春无羁》还有一个主题——流行文化。书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开始于19世纪后期的各种青少娱乐方式:书籍、音乐、电影和流行杂志。当时的美国是爵士乐和电影的诞生之地,因而也成为世界青少年娱乐的中心。工业革命、快速的城市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发展,同时也给青少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他们想要的东西。

萨维奇对大萧条时代梦想幻灭的一代人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这一代人渴望政治稳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纳粹青年运动”的影响力发人深省。20世纪30、40年代间,德国的年轻人几乎无一不参加到“希特勒青年团”中,他们被教导要热爱第三帝国和纳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青年人的重要性:如果你抓住了青年人的心,那么你就可以永远拥有他们。

但是,即使是在德国,反抗仍然无处不在。萨维奇描述了20世纪40年代反对纳粹政权的一些青少年组织,其中包括那些散发传单预言德国在二战中必败的青少年。1942年,一群大学生散发“白玫瑰”传单,在慕尼黑大学引起了骚动。这些反抗行为再次显示了青年人的力量,同时也给了人们启示:要想征服这个特殊的群体是多么困难!

《青春无羁》也没有忽视一些重要的亚文化。如20世纪20年代的黑人哈莱姆复兴和摇摆女郎、30年代的摇摆舞热、二战期间用奇装异服抗议自己受到歧视的“阻特装青年”和“扎阻一族”等等。

一代人接受某种信念或理想,而另一代人却可能完全抛弃这一切,社会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进步的。《青春无羁》不仅记录了现代青少年文化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展现了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现代史。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书既是一部青少年文化史,一部青少年社会运动史,也是这个狂飙时期欧美国家历史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本教育工作者、青少年问题研究者、社会学家、文化研究者、父母以及

一切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的必读之书。它会让人们用新的眼光看待青少年,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开放的心态看待青少年流行文化以及青少年问题:既不应简单否定,也不要任其自生自灭,而是科学地、理性地、宽容地对待它。任何社会和时代变革都会在少年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工业化和城市化造成众多青少年处于无人关心的状态,战争给青少年精神和肉体上带来不可治愈的创伤,经济萧条导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总之,这样的一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历史,也更加理解现实,从而能够以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来对待青少年。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最后,我想谈谈这本书的翻译情况。这本书的翻译、校译和再校译花费了近两年时间,同济大学外语学院的三位研究生魏哲、严莹和徐梦迪在这个过程中尽了她们的最大努力,完成了这一艰巨的翻译任务。这本书的合作翻译是她们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共同培育灌溉的美丽果实。伴随着翻译的艰辛,对翻译的感悟同样让人难忘。翻译的过程绝不仅仅是文字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传递思想、记录历史和促人思考的过程,能够通过自己的翻译文字影响人们的思想是译者的骄傲。

从译者的角度来看,书中有大量历史背景,本应加上注释以减少读者阅读过程中的障碍,但如果那样的话,这本书的篇幅将更加可观。因此,译者放弃了过多的注释,真正希望了解更多史实的读者可以通过书后的注释和相关资料进行深入地研究。

经过两次校译后将这部书奉献给读者至少不会太心虚了。但对于这样一部史实丰富、社会背景复杂的著作来说,翻译中的错译、误译可能仍然无法避免。我们只能诚恳地希望读者,尤其是以研究为目的的读者,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

最后,请允许我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与本书的所有读者共勉: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章 艳

2009年8月于上海同济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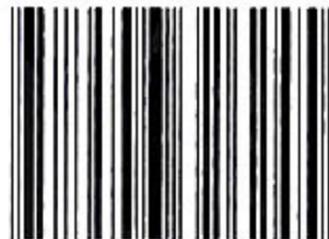
任何时代，青年都以其敏感的触觉、激进的行动来应对时代浪潮。他们同时是勇敢的先锋、易受蛊惑的信徒、战亡者和享乐者……这一部青年运动史和20世纪欧美各国最动荡的历史交织重叠，为历史提供了新的注解。作者描述了童子军、候鸟运动、希特勒青年团等不同时期的青少年组织，以及从“摇摆女郎”、“阻特装青年”到“迷惘的一代”的各种青年类型，为我们呈现了欧美两大洲青少年社会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

通过对个人证词、虚构作品、流行文化、媒体报道和政府政策的深入考察，作者描绘出人们如何试图定义、说明和控制青春期的历史，更是青少年如何努力发出真实声音、追寻理想并摆脱成人控制的反抗史。

青少年由于自身的特质，一直被认为能代表未来：大众媒体持续不断地将青少年塑造成为天才或怪兽，这说明了成年人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充满希望和恐惧。为了循规蹈矩者而忽视那些站起来的先锋就是拒绝参与到未来当中，也是误解了青春的本性。

—— 乔恩·萨维奇

ISBN 978-7-5463-2624-5



9 787546 326245 >

定价：54.00 元